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 前 言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联的。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我们倾吐心血，凝成此书，献给这位历史伟人。

—

毛泽东诗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才在政治、军事、思想等诸多领域，独领风骚。他的一生，曾主宰过中国的命运，影响过世界的风云；他的精神品格，曾是时代与民族的人格化身；他的思想，曾塑造过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心灵；他曾被人民尊崇为紫气东来、灵光四射的神。

中国人民把毛泽东推上神坛，自有其历史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史上，为了重振民族雄风，拯民于水火，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留下悲歌曲曲：洪秀全铁马金戈，浴血沙场；康有为奋笔疾书，维新变法；孙中山奔走呼号，革命图强，如此等等，都未能实现民族夙愿。毛泽东接踵而起，卧薪尝胆，唤起民众，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地位，继而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力图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这种伟大的历史功绩，民众欢呼他为“人民的大救星”。

但毛泽东毕竟不是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在他的晚年，也犯过严重错误，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过重大损失。对此，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了对这位历史巨人的功过评价，使毛泽东从天上回到人间，从神还原为人。对毛泽东的研究，呈百花竞放之态。在这种研究中，有不少客观分析评价的力作，新见迭起，启人心思。但也确实存在轻薄为文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时隔不久，一股“毛泽东热”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人们悬挂毛泽东的像章，聆听毛泽东的颂歌，搜集毛泽东的著作，抢购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作品，进行各种纪念活动，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如此等等。如果说 60 年代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称之为造神运动的话，那么，现实的“毛泽东热”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呢？

一是出于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期望。毛泽东终生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以此为宗旨，要求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他以身作则，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人民，一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不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权。此种遗风余韵，与现实的某些现象构成强烈的反差，令人们怀念不已。

二是出于对社会风气好转的期望。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建造了人民政权，而且在于根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浓疮烂疮，荡除了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人民安居乐业，精神奋发。现在人们把毛泽东的画像挂在车上，供上神坛，以取代钟馗，驱“鬼”祛“邪”，免遭横祸，平度安康，期望着社会秩序的根本好转。

三是出于对毛泽东成功奥秘、人格力量源泉的探索。在现代西方思潮不断涌入的背景下，青年学生欣赏萨特、弗洛伊德、尼采，企求从中寻找“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出路，他们经历了一段心灵探索之苦，体验到无

论是萨特，还是尼采，要么与中国现实相悖，要么与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格格不入，“自我设计”不成，于是他们寻找毛泽东。

.....

然而，所有这些，多偏重于情感，缺乏理性认识。现代中国人对于毛泽东，应该弱化情感倾向，强化理性思考。不是要寻找毛泽东，而是要认识毛泽东。从情感出发，容易导致崇拜，甚至连伟人的错误也予以接受，无益于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理解、认识毛泽东，就需要对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一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和教训，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总结。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我们试图为此尽点微薄之力。

## 二

本书的任务，是对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即从早期到晚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思想主题，进行历史渊源的探索，以展示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轨迹，不是简单地概括毛泽东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内容，不在于叙述毛泽东经由的历史事件的一般过程，而是要透过这些具体历史事件去考察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揭示毛泽东思想的来龙去脉。显而易见，本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与通常所理解的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来说，所谓科学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体现在毛泽东全部的科学著作中”，因此，理所当然地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反过来说，通过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深化理解和认识科学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从区别来说，我们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发展，虽然也旁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见解对于形成毛泽东某些思想的作用，但毕竟偏重于毛泽东个人，而不是“集体智慧”的总汇。同时，既然以毛泽东个人为研究对象，那么，这里所要描述的毛泽东思想发展轨迹，在时间跨度上既要追溯到毛泽东的早期，又要延展到毛泽东的晚期；从内涵上来说，既包容了科学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又涉及了毛泽东早期的“非科学”成分和晚年的一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是在社会历史背景与革命实践、各种文化渊源以及个人文化心理素质等各个方面的交融互合中展示出来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们所特别注重的：

一是社会历史背景与革命实践，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任何思想的形成，总有其现实的根源，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与思考，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实践的进程规定了毛泽东思想发展鳞鳞相接的各个阶段的主题。他思考的焦点，他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与现实实践、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早期革命志向的萌芽发展，中期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精心设计，晚期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失误，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制约因素。当然，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世界风云，共产国际运动的种种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是各种文化渊源。任何思想，“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中国近现代社会是古今中西文化汇合冲突的时代，毛泽东对中西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总的观点是批判吸收，在西学中，他早期吸收各种新思想，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曾发奋读书，艾思奇、李达等人翻译和介绍的马列主义著作，一再批读，即使晚年日理万机，也拨冗研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因此，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至老不衰，其熟练程度也为行家们所折服。他总是从中吸取养料，获得灵感，运用于现实。无论是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论，抑或是晚年的即兴讲话，对传统典籍，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毛泽东对各种文化渊源的吸收、选择和运用，既有极为成功之处，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对其思想发展轨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是个人素质。个人素质对于主宰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来说，是偶然的因素。但如同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因素不可忽视一样，思想家的个人素质对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更显得重要。例如，毛泽东出身农民，他的生活环境，他对贫苦农民的深切了解与同情，对于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又如，就毛泽东思维结构来说，具有二重特征：一方面是求实态度，另一方面则是高扬理想、伦理意志与主观能动性，二者结合，相互制衡，在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复杂而又艰苦的斗争中，获得互补效果。但晚年失衡，弱化一面而强化另一面，造成严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的个人素质对毛泽东思想发展来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动态地把握和揭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目的。

### 三

当毛泽东降临人间的时候，中国已处于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汇合冲突，激起了中国历史的层层巨浪。作为时代的弄潮儿，毛泽东南北奔波，上下求索，开始了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

探索伊始，在思想上，一方面，由于农家传统、封建教育的制约，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思想上经历了“无我论”、“唯我论”、“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农村艰苦环境的熏陶，长期的、多样的社会实践的磨练，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终于看透了，中国“政治腐败已甚，暮气已深，改良一途，绝无希望”，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自此，实现了由唯心论到辩证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他身背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城乡，调查研究，组织建党，从事工运。中国的国情、历史的经验、实践的教训，给予他以新的启示，使他把革命的视角投向了农村。思想的闪光，一旦射入这个园地，这片沉睡的古老土地，立即焕发出革命的勃勃生机。红旗卷起农

奴戟。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被逼上梁山，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包围的革命队伍中，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覆辙，这是摆在革命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毛泽东紧紧抓住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党建军这个根本原则。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手段，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他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的队伍，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了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以此为基础，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从而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开创了“星火燎原”的新局面。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毛泽东以民族利益为重，确立抗日救亡的政治新主题。他率领工农红军，“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跨越千山万水，历尽人间艰辛，转战陕北。他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急流旋涡之中，审时度势，力挽狂澜；思骋神驰，宏论连篇，开始了以全面总结我党历史经验为内容的理论建树的黄金时期。

他追溯我党的血战史，预测抗日战争的未来，愤笔疾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宏篇巨论，建构了独特的军事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园地中，培育了一朵瑰丽的奇葩。

他重游一直眷恋的哲学领域，将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置于哲学的殿堂，凝炼成《实践论》、《矛盾论》等赫赫大作，确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他俯瞰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应运而生。设定了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绘制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胜利蓝图。为了实现这幅蓝图，他制定了人民至上的伦理准则，规定了文艺的正确方向，开展了以整顿“三风”为宗旨的整风运动。……至此，毛泽东作为一个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于一身的民族巨人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正是这种民族巨人的形象，使他成了全党折服、人民敬仰、共产国际承认、敌人惧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革命的领袖地位和非凡的智慧胆略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巨大的权威力量。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与蒋介石反动派展开了中国两个命运的大决战，辽沈战役扼其颈，平津战役捉其尾，渡江战役追其穷，在中国大地上运作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奇观，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伟绩。从此，结束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

毛泽东居功思危。在他看来，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事业更伟大。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能居功骄傲，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股劲，要不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建立人民政权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横扫一切污泥浊水，整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浓疱烂疮。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百孔千疮、破烂不堪的旧社会，改造成了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的新中国。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如何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有过初步的设想。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历史的尺度，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之间，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规定过渡时期的具体时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基本形势和广大人民的心愿，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了用15年的时间实现“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只用3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以苏联为借鉴，提出了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方针。但是，在三大改造的过程中，原定15年的时间，结果只用了3年。这种速度，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出现了操之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滥的现象；二是使毛泽东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用意志的力量进行超常规的发展，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由此肇端。

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毛泽东依据对立统一的普遍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确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把经济建设视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这就恢复了被斯大林中断了的历史辩证法，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难题。

但是，随后不久，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反共叫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风云变幻，国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激化，毛泽东又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毛泽东在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之间，陷入了“二律背反”的迷津。在经济建设上，他想凭借精神意志力量来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掀起了“大跃进”的狂热。在阶级斗争上，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甚至把斗争的触角伸进了党内。“左”倾思想在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客观规律的严重惩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力量走向了反面。

“三面红旗”的严重挫折，引起了毛泽东的痛苦反思，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有这些调整，都未能动摇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哲学基础。所以，当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变化，国内政策调整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一种“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忧患意识涌上了毛泽东的心头。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为世界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他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强调反修防修，终于陷进“文化大革命”的深渊。此时此景，毛泽东虽然憧憬着世界革命，但无法掩盖蒙在他心灵上的悲怆。他依照自然的法则，带着尚未了却的心愿，怀着对社会主义前程的深深忧虑和对人世的眷恋，冥漫九泉，拜会于马克思的灵前……

然而，历史的脚步不会停留下来。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未竟事业，由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下来，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继续结合起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如果毛泽东九泉有知，相信一定能消除忧虑，感到无限的欣慰。

## 序

在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几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撰著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将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毛泽东在其整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弄清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客观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颇具难度的研究课题。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需要跟踪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探究毛泽东解决各个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基本思路。这是一个浩繁的工作。当前，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毛泽东思想公开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功过评价百家争鸣。如何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进行客观的研究，不仅需要查阅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而且需要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可喜的是，几位作者在这艰巨的任务面前，没有畏难却步，而是急流勇进。为撰写这部著作，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毛泽东及其战友的著作，广泛搜集有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性研究，再现了毛泽东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光辉形象。

整体性的全面概括。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已出现了一批理论成果，有不同的学科门类，如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经济思想等专题研究，也有不同历史时期如早期、晚期等分期史论。本书作者根据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思维过程进行了整体性的全面研究，从总体上展现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画卷。就其发展过程而言，有早期思想的追踪，中期思想的展示，也有晚期思想的分析；就其内容来说，包括毛泽东在每个历史阶段，为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而呈现在思想轨迹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哲学等方面的探索。这样，既可扬“史论”贯穿发展全过程之长，避其全而不深之短；又可取“专论”博深之精，弃其专而不全之弊。纵横开拓，既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线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又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建构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本书无论是时间跨度、理论建构、观点评价还是问题阐述、材料取舍、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探原性的轨迹追踪。通览书稿，显而易见，作者立论的目的，重点不在于概括毛泽东在各个历史阶段提出了哪些理论观点，哪些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在于说明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什么能得出那些理论观点、路线、方针和政策。作者们从毛泽东浩如烟海的著作、文件、报告、信件等文字资料和他的每一历史阶段，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践活动中，考察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具体分析了时代条件、历史经验、社会实践基础对它的制约作用，探索了毛泽东本人的思维方式、政治立场、文化修养和个人气质对它

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探原性的轨迹追踪。在这里，旁征博引了历史文化中的人物典籍，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纷争；深入考察了党内路线的意见分歧，人物沉浮的曲直原因。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理论探索，本书达到了应有的理论深度。

客观性的历史评价。作者站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把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具体考察，对其是非曲直，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们既不囿于传统的历史结论，也不附和时髦的褒贬评论，而是从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分析，进行严肃的冷静历史反思。他们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有是的道理，“非”有非的根据，即使对毛泽东中期成熟的思想，也采取分析的态度，他们认为，无论是成功的丰富经验，还是失败的惨痛教训，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都是我们今天极其宝贵的殷鉴。这种科学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导现实的实践。

当然，书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部分需要进一步深化，有些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是，纵观全书，作者的确以新的视角，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是一部严肃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出版，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我们的青年同志学习毛泽东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坚定的革命立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博大精深的理论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习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思想，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

沧 南

1993年2月28日

##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 第一章 认同与反叛

毛泽东拔起于寒乡，驰骋于 20 世纪。这是风云变幻的年代，中西文化的汇合冲突，激起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层层巨澜。毛泽东这位弄潮巨人，兼取古今，吐纳中西，他既是传统的最大挑战者，又是传统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者，这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思想与文化性格。故认同与反叛，构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的历史与逻辑的起点。

### 第一节 农家教养与传统认同

毛泽东诞生于韶山，从小生活在乡村与农家环境，这对于他一生活动与思想的影响至为深远。典型的传统农家文化教育，使他自然地表现出对传统的认同。

#### 一 农家教养

韶山，本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一脉。在重峦叠嶂、绵延起伏的群山中“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即是闻名遐迩的韶峰。韶峰又名仙女峰，山高陡峭，“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气势非常雄伟，风景十分宜人。相传舜帝偕妃臣南巡荆州至此，被这里的秀丽风光所吸引，乃令乐队高奏韶乐，以助雅兴，引得“凤凰来朝”。“音召凤至”，韶山故而得其名。

韶山，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东北面距省城长沙 90 公里，东南面离湘潭县城 45 公里。它的名字美，自然景观更美。它有着著名的韶山八景：兀立云端、葱葱郁郁、白云缭绕、气势雄伟——“峭壁插霄间，扑压群山”的“韶峰耸翠”；流青红赭色泉水——“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的胭脂古井；以及“乐奏九成期，烟幕云帷”的凤仪亭址；“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的仙女茅庵；“砖瓦莫为功，栋宇凌空”的石屋清风；“门户别开奇，两石为之”的顿石成门；“峰峦泼翠鲜，岭断云连”的塔岭晴霞；“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的石壁流泉。此外，它还有韶峰四绝：“六朝松”、“飞来船”、“四方竹”和“白石泉”。

韶山景色虽然秀丽，但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这里的人民却世代过着贫穷凄凉的生活。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些广为流传的饱含血泪的民谣，即是韶山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家居住的韶山上屋场，是一栋湖南乡村常见的“凹”字形农舍，当地人称作为一担柴式的房子。上屋场居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正中为界，东边是毛泽东的家，西边一家也姓毛。这栋房子背山面水，坐南朝北。屋后小山上苍松翠竹冠荫，一片青绿。公元 1893 年 12 月 26 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韶山冲住着 600 多户人家，居民十之七八姓毛，其余为庞、田等姓。毛氏家族原先并不世居韶山。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祖籍江

西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始祖毛太华，曾投奔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明朝建立后，毛太华又以百夫长一类下级军官的身份，随同明军远征云南。云南归人大明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下作为镇滇军人中的一员。他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王氏为妻，生有4子，依次取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公元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毛太华因戍边多年、立有军功，被封官入内地湖南。清一、清四随其父母一道来到湖南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居住，分得田产数十亩。10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迁移至湘潭县7都7甲（今韶山市韶山乡）定居。从此，毛氏家族在韶山繁衍生息，垦荒务农。

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第7代孙即1737年（清乾隆二年）始修族谱，定下20代子孙家谱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远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1881年（清光绪七年）二修族谱时，因虑原订谱系不够，遂又续订：“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以后毛氏族谱历经三修、四修，均未再续谱系，这样相传到毛泽东，已是毛氏家族第20代子孙了。

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记载，整个韶山毛氏族人中主要是务农者，偶有读书人以及中下级军官等，而毛泽东所属震房各支派几乎均是老实忠厚的农民，且每代大都单传，不甚兴旺发达。毛泽东的曾祖父毛四端（1823—1893）名祖人，为17代传人，系毛祥焕独子，是一个寡言少语、勤劳忠厚的庄稼汉。他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砍柴、出卖劳动力维护一家生计。子2人，长德臣，次翼臣。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1846—1904）名恩普，字寅宾，也是一个老实厚道的种田人。1878年与哥哥德臣分家后，从东茅塘祖居之地搬到上屋场。由于家境贫寒，终将祖传部分田产典当出去。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名贻昌，号良弼，系毛翼臣独子。他读过几年私塾，17岁时开始当家理事。虽然家底微薄，但他克勤克俭，又比他的祖父和父亲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积钱逐步还清了债务，赎回了父亲手里典当出去的田产，家业日益发达。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1919），在娘家排行第7，故称文七妹。她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其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垅（后改称棠佳阁，今属韶山市大坪乡），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10多华里。文家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因其祖先埋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要来扫墓拜坟，需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且因毛氏先人与湘乡籍妇人通婚较多，故文七妹嫁到韶山。她生有5子2女：长子、次子早殇，三子泽东、四子泽铭（又名泽民）、五子泽覃（又名泽淋）；2女早殇。

毛泽东的童年是在湘乡四都唐家垅外婆家度过的，直至满过8岁才回到韶山入私塾，从1902年到1910年这8年的时间里，除去辍学两年下地劳动外，整整读过6年“孔夫子”的书。毛泽东的家庭属于湖南乡村中一个中等偏上阶层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包括生活中的无形影响，私塾教育以及自学中所吸收的知识，或者说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是一种典型而又传统的农家文化。

关于“农家”一词的基本概念问题，我们赞同有的研究者的说法：它是指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土地为生产对象，并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其中包括农民、游民、小乡绅、小地主和小财东阶层。它一方面区别于大工业生产的都市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另一方又区别于依靠封建俸禄和地租生存的君主、官吏和上层士大夫。据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叙述自己的生平时说，他10岁时，父亲已经成为中农，并且做些买卖来增加收入。再往后，则成了富农，兼作米商。他在说明这种阶级成分时指出，他家成为

中农时，有田地 22 亩，每年可收 84 担谷子<sup>1</sup>。这个经济地位和政治含义虽然不很准确，且各地农村所处情况并不一致（如土地改革时，南方和北方所定的中农和富农，各自所占田地及家财数目相差较大），但就湖南乡村的情形来说，基本上反映出毛泽东的家庭实际状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家庭不仅属于典型的农民家庭，而且是一个中等偏上的经济较为宽裕的农民家庭，比起那些缺地无田、吃了上顿没下顿，终日为生存发愁的穷苦百姓当然要优裕一些。毛泽东的外婆家也以务农为业。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生活在这样的农民家庭和乡村环境下，接受的显然也就是一种完全的农家文化教育。

农家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呢，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些什么呢，它既是“下层民众意识”或民俗文化体系，包括了下层民众（在这里更具体说来就是农家）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情趣等内容，同时在其中又包含了典籍文化的的核心内容。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浅显的“行为语言”，还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正统中国典籍文化有着斩不断、割不开的必然联系，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具体反映。尽管不同的阶级、阶层，享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但总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基本范畴。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而言，不管是在唐家姥外婆家还是上屋场祖居之家；不管是入私塾读有字之书，还是下地劳动、居家度日，所耳闻目染的当然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这个大范围内的农家文化，有形或无形、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地置身其间。以往，人们在阐述有关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受影响的基本因素问题时，一般都谈到他父亲的治家发财、严厉刻薄等等；他母亲的勤劳贤慧，乐于助人，求神信佛等等；他在私塾对《四书》、《五经》的用功或厌恶，对传奇小说的嗜好入迷等等。毋庸置疑，这种属于农家文化体系的东西，都将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对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产生终身难忘的印象。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更深远的方面，即是这种既有别于纯粹的农民，又有别于都市大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家和工人，更有别于位居上层的君王、官吏和士大夫的、乡村中等偏上的农民家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有其较深的认同。上述父母、亲友及私塾中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的教育和影响，即是促成这种认同的具体化，只不过反映出了经过农家筛选、改造而呈现出固有的特性而已。

揆诸史料，我们可以从《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中看到，对于中国典籍文化中的诚、信、仁、厚、勤、俭、谦、卑等核心部分，曾以文字的形式定为家训、家规，要求毛氏子孙口诵心维，不许有丝毫之离越。

《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家训》反复告诫各派子孙：第一，为人心术要正。如果一个人心术不好，什么事都干不成，不会有好结果，“起心害人，祸在眼前”；反过来如心术正，“能存心地，便是福田”，心底无私，品行端正，才有出息。因为富贵贫贱，前生已定，即“知有命”，如果恣意妄行，“必落陷井”，且将“永受恶名，指为梟獍”。第二，为人须讲纲常伦理。一个人不管是主持国政，还是佐治军民，均须“恪供厥职，勿事贪淫，惟仁惟义，矢公矢忠”。上要敬君王、孝父母，下要善教善养子孙，“子若不肖，为父之耻，子事父母，孝敬自矢，朝夕服侍，常令色喜”，则是格遵伦常，或为君为臣，或为父为子，均是一个有用之人。第三，为人须讲友善。兄弟之间，

---

<sup>1</sup>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第 105~106 页。

《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家训》第 1 页。

本属一体，同为父母所生，气血所养，因之居家须“兄要友爱，弟要敬礼，患难相救，安居酌醴，分多润寡，以义相合”。出外又须广交友朋，但交友之道，须“有善相劝，有过相惩，当求其益，勿忌其能”。尤须“交结良善”，切勿与恶少往来，“自惹葛藤”。对于亲友乡邻，无论是富是贫，均应“一样相亲”，“有事相助，有无相通”，切莫“炎凉世态，令人相瞋”。第四，治家须以俭字为本。因为“俭乃美德，奢侈何益”，当知富贵来之不易，纵使“华屋百间，夜卧七尺，味列千盘”，日久则养尊处优，不思长进，不知祖父辈创业之艰难，且居乡间，“遍身绸缎”，易惹“旁人指摘”，更有甚者，“暴殄天物，子孙落魄”，家业荡尽，终将一无所有，倒不如粗茶淡饭，“黍稷度日”过得长久。此外，家训对于戒赌、不“逞势兴讼”、讲究妇道等也有明确规定。

具体到个人修养的内容，家训则概括为诚、信、仁、厚、勤、俭、谦、卑八个字。诚即“存心中正，做事切实，暗室无欺，天日可质”，不要玩弄机巧和诈术，反之则会“弄巧成拙”，害人不成先害己；信即不说大话，不把事情做绝，“轻许人诺，难已兑现，招人怨憎，抑人扬己，仇祸即临”；仁即“恻隐为怀，爱人及物”，见到人家有美之处，“便当欣悦”，不必忌嫉，见到别人患难，“便当怜恤”，不必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厚即“说话莫占便宜”，占人便宜，“终久吃亏”。因为“博厚”为悠久之道，“宽大”为受福之基；勤即生财之途，兴旺之基，是“作圣工夫”，是“致富秘诀”，懒惰则是“学无成”、“业失败”的根源所在；俭即节流，“起居简朴，欲望淡泊，市衣粗粝”，不会为外物所累，终将“快然自得”；谦即“载道之器”，能谦“学则进道，商则获利”，与人交际，“百事顺遂”，如做然无物，妄自尊大，则“招人怨忌”；卑即不好为人师，不夜郎自大，能“卑以自牧”，则“人望愈尊”。

毫无疑问，上述载入毛氏家训的这些文字，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又体现了农家文化的主要精神，不是有的学者说的那种下层民众单纯的行为语言所能替代得了的。它赋予了真正典型的农家文化的特色，是经过农家继承、吸收、理解、筛选和改造过的有文字记载的农家文化。虽然，有关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究竟是否熟读过毛氏家训的材料，我们无法全面了解到。然而，这一家训的基本内容可以通过长辈们直接的言行传给他、影响他。这种农家的教育，首先又很自然地使得他对传统予以认同。

## 二 传统认同

传统是指民族的、支配千百万人言行的一种观念和力量，是一种习惯势力或者说一种惯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遵循的一种模式。它既包括集体的观念意识，也涵盖了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它具体化为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乃至工作习惯，并且渗透于人们生活与思想的各个方面。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民族传统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勇于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不管是遭遇到自然界或外来民族的巨大灾难，总是以那惊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声战胜一个个困难，去创

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更具有其吃苦耐劳的特性。毛氏家族自云南至湘乡，再由湘乡至韶山，白手起家，与各姓人们共同开发韶山，靠的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毛泽东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农家的传统又促使他自6岁起就开始家务劳动，特别是在13岁至15岁那段停学的日子里，整天得在地里和雇工一起劳动。他从事的体力劳动，包括扫地、放牛、打柴、种菜、挑水、喂猪、推谷等家务劳动；犁田、耙田、插田、踩田、扮禾等田间劳动。家要致富，庄稼要长得好，牛要肥壮，全靠农家一双勤劳的手。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农家的传统，从不懒惰偷闲。在禾苗中耕锄草过程中，别人一两遍，他却两三遍，并且看见杂草就扯，从不敷衍了事。他在喂牛时，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使牛身上不藏虱子。牛栏和猪栏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从而他家的牛和猪很少生病。他在屋后山坡下开垦菜地，精心种养各种各样的蔬菜，使家中吃菜有余，剩下的可以喂猪。少年时期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可是毛泽东做着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吃的也很差。据他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毛泽东忍受了这种生活条件，靠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毛泽东在私塾学习时刻苦用功。他读了《四书》、《五经》，凡是先生教过的功课，都能很快地背诵和默写出来。与此同时，他还读过《精忠传》、《水游传》、《隋唐嘉话》、《三国志》、《西游记》之类的“闲书”。由于刻苦用功，书读得多，记性又好，不仅老师出的“破题文章”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和常常帮助别人作文，而且对于“闲书”里的故事，许多都能背得出。

总之，毛泽东的这种从小就养成的刻苦耐劳的美德，既是农家文化熏染、陶冶的结果，也为他后来千辛万苦地从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是乐于助人。古代中国人就很讲究帮助他人，怜悯他人，有福同享，有苦同当，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养成了一种互帮互爱的传统美德。如前所述，毛氏家训中明确规定对乡邻、亲友，无论贫富均要一样相亲，“有事相助，有无相通”，尤其是毛泽东的母亲待人慷慨，乐于助人的精神对其影响较大。每逢灾荒年月，他的母亲就把家中节省下来的一些米粮悄悄地送给那些穷苦乡亲：“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无疑，母亲的一举一动作出了榜样。因此，少年毛泽东帮助乡邻的事例既很多，又很动人。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离家较远的私塾读书，早去晚归，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放学回来。总是说饿。母亲问他是不是饭菜带少了，他告诉母亲，班里有同学，家里穷得带不起饭，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这个同学。毛泽东的行为得到了母亲的赞许，以后总是让他多带些饭菜去上学。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毛泽东在去上学的路上遇到一个穷

---

斯洛：《西行漫记》第106~107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07页。

苦青年，衣着单薄，冻得打颤。他与这个青年谈了几句话之后，就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夹衣送给他。

有年秋收季节，家家户户在自己的晒谷坪晒新谷。一天下午，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都忙着抢收各自的稻谷，而毛泽东却立即赶去帮助邻居一位妇女，结果自家的谷子被雨淋湿了，甚至被冲掉了一些。父亲生气地责问他：自家的不收，去帮助别人收什么？他却回答说：人家是佃户，谷子要交租，家里又少吃，糟踏一点就不得了。我们的谷子是自己田里的，损失一点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次，一家姓毛的农民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已经按时价交了定钱，尚未把猪赶过来。过了几天，猪价涨了，毛泽东奉父命到那个卖主家赶猪回去。一进卖主家的门，就听他唉声叹气地说：“该你们家赚钱啰。”毛泽东得知原先价钱定低了的情况下，就主动退掉了这桩买卖。

三是诚实守信。“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要求人们在处世为人时做到朴实无华，言必行，行必果。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不少人与它背道而驰，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但整个社会文化不管是见于文字的，还是体现于人们言行的，都要求按照这样的准则去做人，去处世。记载于毛氏家训如此，体现于毛泽东母亲以及乡村中朴实无华的农人的言行中亦是如此。少年毛泽东无形之中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养成了一种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据毛宇居回忆说，毛泽东在南岸读书时，某次他和一些小朋友到一个农民的菜园里去偷摘黄瓜吃。被主人发现后，其他小孩子逃之夭夭，而毛泽东却不走，赶忙给那个人赔不是。有一天，毛泽东受父命与弟弟去扯拖泥豆。弟弟调皮，专拣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扯，很快就扯了一大片。他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很密的地方扯，尽管扯得多，面积却不如弟弟的宽。父亲一看，责备他扯得慢。毛泽东走到父亲面前，请他再看看所收豆子的数量。于是，父亲无话可说了。

四是信神敬佛。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最早问世者，大约起源于公元前 6——前 5 世纪的古代印度。它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先是在统治阶级中流传，以后逐渐与儒、道两教相融合，不断渗透到下层社会中。佛教的全部学说和基本教义的中心就是“苦空”观。它告诫人们，要摆脱苦难，只有皈依佛门，到神秘的虚幻的天国中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它试图让人们明白一个道理，客观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空”（不存在）的，而“有”（存在）则是事物的假象。只有认识到客观物质世界是“空”的，才能超脱现实世界，忘却现实生活中的“苦”，才能脱离苦海，实现慈航普渡，达到“涅槃”的彼岸世界。由此可见，佛教的学说和教义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它一经传入中国并被改造之后，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即被抽掉了具体的阶级内容，把广大劳动人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之苦与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之苦混为一谈；把下层人们求不得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温饱之苦与统治阶级无止境地追求享乐，统称为“求不得苦”。这实际上是抹煞阶级界限，调和阶级矛盾。而在下层民众那里，即被作为克制自己欲望，缓和人與人之间关系以及在心绪不顺畅的时候用以作为对某种需求的精神寄托。

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受其影响，少年毛泽东也信佛。正如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 9 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

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如前所述，佛学含有辩证法因素，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自学生时代起就隐约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的原因之一。但下层民众信佛往往是出于对神灵的虔诚，而不是自觉地把它作为哲学的一个内容来加以思考。少年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对这一传统的认同，较多地是受母亲的影响，比较自觉地怜悯弱者，常能设身处地同情和理解穷苦人，“普渡众生”、行善积德的佛家平等、博爱意识，在他最初的思维观念中留下了较为浓厚的伦理烙印。

## 第二节 权威解体与反叛意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世界近代化浪潮的袭击下，古老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文化传统终于开始解体。它所引起的历史风云虽然未能掀起汪洋大海般的漫野乡村的波涛巨浪，但毛泽东那敏感的心灵毕竟感受到了时代变换的信息。因此，他在认同传统的同时，反叛意识也开始萌芽、增长。

### 一 封建权威的解体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封建制国家。封建王权不仅不可侵犯，而且异常严密而庞大，长时间里维系着封建的国家政权，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度里所没有的。

然而，究竟中国封建权威是什么呢？它包括了什么内容，反映了什么特征呢？

中国封建权威体系，是以家庭——家族——国家这种三级结构的外在形式为起点建构起来的。它的基本观念，自中国最初有文字记载时起，就开始显示其特性，商王自称“余一人”，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商朝的至高无上的神是上帝。因为上帝是赞同或支持君王主宰天下一切的，所以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则被认为能给君王本人赐以唯一的和特有的关注，从而使其王权统治最初具有合法性。到了周朝的时候，君王奉天命而治世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臣民的心中。君王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主宰一切，而且还被作为沟通天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从而他们所行使的权力也就合法和牢不可破。此后，随着秦王朝的建立，王权观念更为增强。不管是外族的侵扰、外来文化的输入，还是政治分裂，社会动荡不安，均未使它的基本体系受到损害，反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而巩固和发展。对这种封建权威起维护、支撑和加固作用的，主要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教相揉合的封建思想文化。自董仲舒大力倡导之后，王权观念被推向了顶点，这种封建王权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中国社会里，王权即是君王的权威，它不仅否定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且否定了作为群体的人，具有明确的“自我”和鲜明独立性的人是不允许存在的，转而又由作为偶像、血统、权力和世俗神祇的象征所取代。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作为一般官僚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基本模式，而且成为要求整个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所严格遵守的准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人伦政治与权威体系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王权与专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封建的权威思想体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不变，支配着各阶级、阶层人们的言行。然而，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冲击之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逐渐陷入了困境。与之相适应，由于这种起维护、支撑和加固作用的王权观念在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冲击之下败下阵来，封建的权威体系也就随之开始解体。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权威感主要体现为通过王权寻找秩序的信念，一旦这种信念破灭，权威体系也就无法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

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这种封建权威的解体主要体现为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作为维新运动首领之一的康有为，最早成为“中国倡民权者”。他曾对“王”字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一画贯三才谓之王，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残贼民者谓之民贼。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向之，非谓其黄屋左纛、威权无上也。”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新解释，表明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运用西方思想武器观察中国思想文化，对封建王权专制政治信仰产生动摇乃至进行抨击的新观念。20 世纪初，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进一步对封建王权思想体系予以抨击。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中疾呼：“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齏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域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干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梁氏这段文字，不仅在抨击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方面更为深刻而激烈，更重要的是把政治与文化结合在一起，从权威意识的角度进行了否定。革命派、思想家之一的章太炎，则第一次直呼光绪皇帝为“小丑”，指斥其“未辨菽麦”。此外，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人亦有否定王权的观念。这种从西方找来经过改造而成的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过程中，对于冲击旧有的封建权威思想体系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封建王权终于在政治上首次崩溃。

这种封建权威的解体，首先表现于人们对政治信仰的动摇，紧接着由思想意识发展到具体的言行之中。在 19 世纪末年至 20 世纪初年，人们对封建权威的怀疑甚或抗拒，是由封建权威自身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崩溃、思想文化上的落后这种客观现实而引发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并未因封建专制的残酷而缓和，相反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之中，整个中国政治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民族危机意识和忧患感普遍产生，爱国志士仁人以及下层劳苦大众冒着“离经叛道”而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对昔日不可侵犯的封建权威进行了新的挑战。全国如此，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更是如此。

湖南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省份。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 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 195 页。

《梁启超选集》第 244 页。

等著名维新派人士，曾纷纷在长沙等地创办新式学堂、学会和报刊等，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向封建专制权威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抨击。虽然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之下，维新运动遭到了失败，但是谭嗣同等人为改革献身的精神却激励着人们继续战斗。1900年，又发生了湖南浏阳人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虽同样因顽固势力的强大而被镇压，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湖南又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区之一，涌现了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大批爱国民主志士仁人。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从理论上抨击封建权威的同时，在行动上掀起了多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自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湖南相继发生了萍浏醴起义、力争路矿权益等斗争。这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对封建权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少年毛泽东虽未能亲自经历，但这种影响已波及韶山这样的乡村。他间接地感觉到了中国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封建的权威体系已不能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1910年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对少年毛泽东心灵的撞击是很大的。

1909年夏，湖南发生严重水旱灾害。粮食奇缺，灾民纷纷涌入省城长沙及附近各县，而官绅、地主和投机商人勾结外国洋行，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每斤由26文增加到80文。1910年4月间，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花很大气力挣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米。店主说其中杂有不通用的钱币数文，拒不卖米。傍晚，他的妻子向邻居借了几文通行币，再去米店买米，但此时米价又上涨了。其妻悲愤至极，跳江自尽。黄贵荪闻讯，悲痛万分，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一起投塘而死。这一消息引起长沙饥民的很大震动，推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按平价崇米并施行赈济，但遭到血腥的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怨愤倍增，纷纷聚拢起来，一举焚烧官府衙门，并于一夜之间将城厢各处碓房的存米一抢而光。清政府立即调集重兵，在帝国主义侵略武装的配合下，将“造反”的饥民驱杀。这次长沙饥民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的影响遍及全省乃至全国。当时，毛泽东正在私塾读书。他和同学们对此议论了许多天。他们虽然不明白这次饥民暴动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总觉得造反的人都是些穷苦的老百姓，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的。因而，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为那些贫苦人遭到镇压而愤愤不平，对封建权威相应产生了逆反心理。他后来对斯诺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它“影响了我的一生”。

长沙饥民暴动不久，韶山冲也发生了穷人“吃大户”的运动。饥饿的人们成群结队涌进富人家，打开粮仓，倒出谷米，就地生火煮饭吃。毛泽东家里也受到冲击。他的父亲对此很恼火，但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见，在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封建的权威已经面临危机，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了。这种封建权威体系的解体，是促使少年毛泽东反叛意识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

## 二 反叛意识的增长

少年毛泽东具有一种自我作主、敢想敢干、无人能阻挡得了的倔犟性格，

反叛意识比起一般小孩子要强烈得多。这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以及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吸收新知有关。

如前所述，在 19 世纪末年至 20 世纪初年，封建的权威体系已经开始解体，封建的纲常伦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已无法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思想文化界黑暗沉寂；列强侵入，掠我物产，夺我利权，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从而引起了爱国志士仁人以及下层劳动大众的反抗和斗争，给予封建权威以沉重的打击。现实促使人民认识到，只有摧毁封建权威体系，代之以民主政体，才能使中国自立自强起来。这种对于封建权威的憎恨、怀疑和抗拒，不管是在人民的信仰系统或者是在具体的行动上，都普遍地显现出来。它既渗透入城市，也涉及到乡村；既发轫于知识阶层，也影响到下层民众。这是毛泽东反叛意识萌发并不断增长的重要的社会思想文化条件。

另一方面，少年毛泽东非常刻苦认真，并且善于思考问题。对于《四书》《五经》之类的旧书，他虽不喜欢它们，但还是下了很大功夫，为他广泛阅读《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闲书提供了文化素质。然而，毛泽东对那些传奇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塾师在课堂点教点读的书文，并且他从读那些旧小说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就这个问题，他反复“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通过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那些文官武将、才子佳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让农民替他们耕种。至于那些穷苦的农民，无钱读书，也就无法去写自己的书。他在读旧小说过程中，既赞美不甘屈辱的造反人物，又为他们屡遭失败“深感不平”。因此，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权威，他都表示反对。诸如父亲打骂儿子，先生惩罚学生，富人剥削穷人，地主压榨农民，官府欺压平民，他都直接或间接地予以反抗。

毛泽东的父亲较刻薄、自私和专横。他送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发家”。当儿子的言行不合自己“发家”的准则时，就常常以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无理责骂毛泽东“不幸”和“懒惰”，有时甚至加以体罚。毛泽东对此很反感。他引用经书的话或父亲自己的话来加以反驳。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古书上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父亲骂他“懒惰”，他就说：大人应该比小孩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个年纪，干的活一定比你更多。一次，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好吃懒做”。盛怒之下，他和父亲当众争吵起来，宣布要脱离家庭，撒腿就往外跑。父亲气势汹汹地追赶他，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他跑到水塘边，对父亲威胁说：如果你再迫进一步，我就投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和谈”条件：“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在毛泽东读私塾的时候，虽然一些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但一般乡下仍是以私塾为学生入学之所。私塾的正墙壁柜上竖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子，身着长袍马褂的先生经常带领学生在牌位前

---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第 109 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 108 页。

作揖磕头，表示崇敬。先生教课总是照本宣科，不加解释，只叫学生死记硬背。背书时，先生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必须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地背对先生站着。背不出就打手心、打屁股或罚跪香。封建的礼教像一根根绳索，把学生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毛泽东对此非常反感。就在他 10 岁的时候，有一次因先生打了他，他挟着书包冲出了私塾。但又怕父亲打骂，不敢回家。他以为湘潭县城距离韶山不远，便莫名其妙地朝着想象中的县城方向走去。3 天之后，他被家里人找了回来，出乎意料的是，他回到家里后，父亲对他的粗暴态度有所改变，先生也温和多了。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 14 岁时，父亲按照封建陋习，为他娶了一个 18 岁的妻子罗氏。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应由自己作主，所以坚决拒绝，不承认罗氏为合法的妻子，也从未同他共同生活过。这一举动，在当时的韶山乡村被人们视为“离经叛道”，父亲也认为是对他的“忤逆不孝”，但在毛泽东坚硬态度面前，谁也没有办法。

有一年，韶山冲有一个叫毛承文的贫苦农民，几次带领穷人“吃大户”、闹平崇，并揭发族长在修建祠堂时侵吞公款的行径。族长勾结地主，给这个农民扣上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沉潭。毛泽东闻讯后，与贫苦农民一齐冲进祠堂，要求族长把打人的理由说出来。族长理屈词穷，又见人们摩拳擦掌，群情汹汹，害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只得释放了毛承文。

上述事例表明，毛泽东对于封建的父权、族权，封建的包办婚姻，封建的礼教等表示出不满和反抗。虽然，这种不满和反抗相对说来还是较为浅显和直党的，缺乏理性的整体的深度，但却触及到对于封建权威的反叛意识和行动。并且，这种反叛意识和行动，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尤其是不断广泛地接触社会的现实，则会继续增长，直至发展到理性的整体的境界。

1906 年秋至 1909 年夏，毛泽东白天和成年人在田间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帐，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如饥似渴地刻苦自学，韶山能借到的书几乎读尽了，又设法到几十里外的舅舅和表兄弟家去借书看。常常在豆大的灯光下默读深思，直至深夜，有时甚至读到拂晓。在夜读中，对少年毛泽东反叛意识的理性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本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冯桂芬，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深以清朝封建统治内忧外患同时并至为虑，亟思革新图强。所撰《校邠庐抗议》计 2 卷，40 篇，附录 7 篇。该书为中国较早一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论集。其内容包括选拔官吏、财政金融、土地赋税、对外贸易、工农业生产、采用西学等，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所谓“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靡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这种思想主张为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所继承和阐发，后来又成为康有为等改良派人士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之一。因时代变易有异，这种思想主张到了 20 世纪初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政治，但毛泽东首次读到这类议论时势的新见解，仍然感到很有启发。

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早期改良主义思

想家。广东香山人。早年厕身洋行，但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所著《盛世危言》经多次增补，计 14 卷。内分《道器》、《学校》、《西学》、《议院》、《游历》、《交涉》、《训诂》、《商务》、《商战》、《技艺》、《纺织》、《铁路》、《邮政》、《银行》、《开矿》、《防海》、《防边》、《船政》等篇目，并附以报章所载中外人士的论说和记事、图表、章程等。书中批评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主张学习西方应从政治改革入手，达到致国家于富强之境的目的。虽然，这部书所宣扬的改良主义主张，经过 1898 年的戊戌政变和 1900 年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思想占主角，但这对于见闻不广的少年毛泽东来说，作者的爱国热情以及在书中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曾使之振奋不已。

冯、郑二人的改良主义思想主张，激发毛泽东更多地关注现实政治，促使他从理性上对于封建权威的专制反动与国家落后衰败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读过其他一些呼吁救亡图存的小册子，尤其是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自 1895 年甲午中国战败，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屈辱地位进一步确立，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展开了投资、夺取租界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 年《辛丑条约》的订立，又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屈辱地位完全确立，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洋人的朝廷”，亡国的危险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少年毛泽东翻开这本小册子，首先看到的是一句怵目惊心的话语：“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他从书中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诸多事实。并且，得知日本侵占朝鲜、台湾的经过，英、法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形。他后来清晰地回忆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连同了解当时各地发生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许多事例，在他“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1909 年夏，毛泽东说服了父亲，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乌龟井塾师毛简臣（即毛岱钟）毕业于法政学堂，在长沙当过律师，以讼笔著称于韶山附近；东茅塘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进步军人蔡锷部下任过职，见多识广，且思想较开明。在这复学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受其老师指点，读过《史记》、《汉书》、《通鉴纲目》之类的古书，也读过不少时论和新书。这些都对少年毛泽东在了解历史兴衰的原因以及丰富中外新识等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时，新派教员李漱清从外地回到韶山。他主张去除神佛，兴办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毛泽东对他非常敬佩，经常向他求教，同时，他在同李漱清的交谈中进一步获得了新知，加深了对旧制度、旧权威的了解和憎恨。他越来越认识到，封建的权威体系必须打破，国家需经改革求得出路。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一批勇于反叛、勇于斗争的志士仁人去为之献身。至此，毛泽东由本能的、感性的、直觉的反叛逐渐向着理性的、整体的，对旧制度、旧思想文化全面挑战的轨迹迈进。尽管这还需要继续摸索真理，不断升华，但是已经具备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2 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 111 页。

## 第二章 上下求索

从 1910 年秋至 1918 年春，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不断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广泛涉猎了中西各家，尤其是近代思想家的学说，有取有舍，融合诸家，初步形成了他早期的政治、哲学与伦理思想，反映了这个时代古今中西汇合的特征。仔细检索他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康梁改良、辛亥革命、严译影响、“五四”前期反封建的呐喊，都以高度压缩了的形式，反映在毛泽东急剧发展的思想轨迹之中，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着铺平道路的作用。

### 第一节 政治意识的启蒙

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就是走出韶山，迈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从而直接接触与面对时代的历史风云。少年时期所萌发、增长的反叛意识也因此具有政治性质。在新的环境下，政治意识得到启蒙。

#### 一 “子任”的由来

毛泽东 16 岁时，在八舅文玉钦、表兄王季范和堂叔毛麓钟等人的帮助下说服了他的父亲，于 1910 年秋离开韶山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当时一所新式小学，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文、音乐以及中外历史和地理。在这所新学校里，毛泽东读了不少新书。从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和现状的书籍中，他进一步了解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取了无数利权；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既赞扬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式的人物，曾使祖国昌盛统一，为之精神振奋；又首次知道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德大帝等为各自国家的独立和昌盛作过贡献的杰出事迹，对之敬仰称颂不已，并对同学肖子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这段话表明，在书中接触到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知识之后，毛泽东那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了深化，一种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也就逐渐萌生。然而，如何从理论上更加明确这个主题，如何去实现这个抱负，还需要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毛泽东在当时为实现这种抱负，从思想上寻找到的导师，首先是维新变法时期思想界的巨子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是 19 世纪末年维新变法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两人都是广东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他们与谭嗣同、严复等具有新思想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感到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

---

参见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出版社 1949 年 3 月版。

应新的形势，只有变革，才能挽救民族危难。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找来进化论等思想武器，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变法维新，以期通过不需根本改变封建制的改良办法，达到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的目的。毫无疑问，这种“变法图强”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毛泽东阅读《新民丛报》等新书报，接触到康、梁呼吁变法救亡的文章之后，立即被吸引住了，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能背诵出来，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是梁启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于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刊，初期连载过梁本人写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顽固守旧派，对当时知识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毛泽东为梁启超那种“笔端常带情感”的文字所吸引，反复研读、批点那些精彩动人的文章，其中《新民丛报》第4号上密密麻麻的批语，足见他已完全倾倒于这位初期的思想启蒙导师。在《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的文字中，梁启超指出：国家与朝廷，“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虽然，具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但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这是因为，如果“朝廷由正式成立者”，通过民选而成立的立宪政体，“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与国家才合二为一，自成一體。反之，如果“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不是由民选而成的，“则朝廷为国家之蠹贼”，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国家，朝廷与国家脱节，互相矛盾。因而，“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在这里，梁启超初步区分了“国家”与“政府”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两音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而从政治学的角度论及了爱国与民权，即民族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甚至大胆抨击那种“朕即国家”的封建王权思想，讥讽那种以“忠君”寓“爱国”的顽固守旧士大夫为“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这对于正在渴望寻求新知识的毛泽东来说，为之耳目一新，深深被这段话所感染，情不自禁地作了一段批语：今日之中国，应像英、日等国一样，“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而不能像“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一样，“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这是因为，“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这一观点完全出源于梁启超。他在这里也与梁启超一样，并不反对皇权，而主张君主立宪。这是因为，他将“君”与“民”看作为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把国家与政府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民，而政府的本质则为君。“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在这里，他同样看不清国家与政府的阶级本质。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使他不仅佩服梁启超的学问，而且因梁启超号任公，所以也给自己取号为“子任”。本来，这时改良已经让位于民主革命，虽然湖南是辛亥革命的中心地区之一，但自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之后，大多数湘籍革命党人远在海外或省外联络会党和新军，策划起义，在思想启蒙方面花的精力并不多，而梁启超曾经主讲过时务学堂，在湖南思想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故毛泽东首先很自然地从小新派尤其是从梁启超等人那里接受了启

---

斯诺：《西行漫记》第113页。

《梁启超选集》第218、219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14页。

蒙教育，而主要不是从革命派那里直接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所以，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崇拜超过当时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进而他仿照梁启超的字号为自己取号为“子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既表明他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又反映出他对改良，对君主立宪的向往。这在当时虽然是行不通的，但这种观念较前已经迈进了一大步，至少已经认识到君应由民推选，为民办事，而数千年的封建朝廷和君主则是“盗窃得国”，不能使“人民所心悦诚服”，从而他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取号为“子任”的积极含义是应当肯定的，是不可忽略的，在毛泽东早期上下求索的思想发展链条中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 二 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

1911年春，在东山小学读了半年书的毛泽东，经这个学校的老师贺岚岗推荐，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来到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之际。湖南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开展民主革命的重要地区之一，而省会长沙则是全省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带。自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从改良转向革命，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再抱什么希望。他们远涉重洋到日本留学，并在那里组织革命团体，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因沙俄拒绝撤走驻中国的军队，激起留日学生回国开展“拒俄运动”。湘籍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于1904年在长沙组织革命小团体华兴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一面组织会党开展武装起义，争取新军和其他革命势力；一面积极参与领导湖南的保路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的斗争，使得湖南的革命形势日趋高涨。毛泽东来到长沙后，很快被民主革命思想所吸引。他不仅知道了同盟会是革命的组织，而且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

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积极宣传民族、民权、民生主义革命思想，与保皇派展开激烈辩论的同时，举行了10余次武装起义，试图配合革命舆论的宣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反动专制统治。这些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加速了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进程。1911年春，由湘籍革命党人黄兴领导的“三·二九”广州起义，不少革命党人英勇殉难，黄兴本人也负了伤。一天，毛泽东从《民立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深为革命党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同时对清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径表示无比的痛恨。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义，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迅速高涨的革命形势，促使毛泽东如其他热血青年学子一样对政治更加关切。他从《民立报》上得知到同盟会革命纲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比当时简单的反满复汉思想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主义，已经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明确提出要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且要铲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通过仔细研究这个纲领之后，敏锐地感觉到整个中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为之欢欣鼓舞。激动之下写下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主张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然而，他并不清楚这3个人早已归属于两个政治上对立的政党。正如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为什么毛泽东在当时，竟把保皇派的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同革命派的首领孙中山摆在同等的地位呢？为什么他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自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往日本，他们虽然不满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但不主张推翻清朝，不主张废除君主制，认为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制，让光绪这样的“贤明”帝王来继续治理国家，中国就有希望摆脱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就会振兴起来。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处于一个改良与革命相互嬗替的时期，也就是由改良进入了革命的过渡阶段。梁启超与康有为不同，他对封建主义的抨击更为激烈，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要多一些，因而在《新民丛报》所发表的文章中，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继续宣传改良的同时多少反映了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这就使得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一时并不很分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曾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前甚至在以后仍错误地认为，革命和改良是殊途同归，只是实现政治改革的方法不一样。至于青年毛泽东，长期生活在较为闭塞偏僻的乡村，他首次接触的并不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新思想，而是梁启超所介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以及梁氏那种“笔端常带情感”的文章。只是到了1911年初在长沙读书之时才第一次知道有个同盟会，有个革命派首领孙中山，所以他一时还未放弃对康、梁的崇拜，认为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就应该让包括维新和革命在内的人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从而他把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视为同路人。这正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但我们不应忽略，毛泽东毕竟把孙中山列在理想中的新政府的首位，说明他虽未完全抛弃“君主立宪”，但康、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新的契机已经产生，为由赞赏君主立宪转变到革命民主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由以往主要在沿海地区利用会党或新军举行武装起义转变为以两湖地区为中心，并利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保路运动这个有利条件，促使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湖南是保路运动首先发起的一个地区，在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湖南绅商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要求铁路商办，并于1909年由湘籍留日学生创刊《湘路警钟》杂志，湘路集股会出版《湘路新志》、《湘路周报》，从理论上宣传“拒借外债”、“实行商办”，在行动上各界踊跃集股，开始修筑株洲至长沙一段铁路。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听从其主子帝国主义的旨意，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合同，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出卖了粤汉、川汉路权，从而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湘、鄂、粤、川各界群众的反抗情绪。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一万余人举行集会，继则铁路工人罢工，各级学堂罢课，商人罢市，全省拒交租税，并成立保路团体，要求铁路仍归商办。毛泽东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他后来回忆说：在保路运

动中，湖南“学生界尤为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我们学校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为了表示与清政府的彻底决裂，毛泽东与另外几个同学带头剪掉头上的辫子。辫子曾是顺从清朝的象征。在清王朝尚未正式被推翻的时候，许多人不敢贸然剪辫，就连具有新思想而与毛泽东相约的一些同学，到了真正要剪辫的时候都犹豫起来，其中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则与毛泽东围绕着剪不剪辫的问题发生争论。那个人是法政学堂的学生，他拖着那条长辫子，从家里走到学校，并不打算剪掉，以示他对清王朝的忠诚。争论双方都摆出自己的理由来驳斥，那个同学从《孝经》上搬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封建教条，攻击那些剪辫的人是不孝之子。毛泽东等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随后，毛泽东与那个首先剪了辫子的同学出其不意地将十几个人的辫子强行剪掉。

从上可见，毛泽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从拥护“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新政府。这一思想转变也体现在毛泽东的行动中，这就是参加辛亥革命。

清末保路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它迅速地促使把下层的革命要求同上层的政治危机推向矛盾的激化点。在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革命党人经过多年的积极准备，选择了湖北革命基础良好，而武汉一时空虚之机，于1911年10月10日一举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湖北革命党人原先与湖南革命党人约定，如湖北首义，湖南则立即响应；如湖南首义，湖北则立即响应。于是，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湖北军政府就赶紧派人来长沙，要求湖南方面迅速举义响应。是月中旬，湖北军政府的一位代表来到湘乡驻省中学报告武昌起义的情况，并提醒湖南能否迅速反正对于武汉革命形势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如果湖南迟迟不脱离清政府的控制，武昌就有可能被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反之湖南起义成功，武汉革命军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与南下的清军作战。这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使得毛泽东心情极度兴奋。他感到清王朝的末日已经来临，革命不久就会在全国取得胜利，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邀约几个朋友去参加革命军，到武汉当兵打仗，以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四五天之后，毛泽东从同学那里筹集到一些钱，准备动身去武汉。他听说武汉街道很潮湿，必须穿雨鞋，就到驻在城外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当他走到半路上时，看到士兵们正在向城里进发。原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已经策动新军举行了长沙反清起义。毛泽东跟着进城起义军折回城里，站在一个高处“观战”。一直看到新军进据抚台衙门，升起“汉”字白旗，才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学校。这天晚上，湖南军政府正式成立，焦达峰、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当时，武汉前线战事频繁，湖北形势很紧张。焦达峰等立即发布命令，招募新兵，组织援鄂湘军。广大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仅3天时间，就有6万余人投军。除会党和其他劳动群众之外，许多青年学生也积极应征入伍。

---

《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出版。

斯诺：《西行漫记》第115页。

湖南军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支学生军。但毛泽东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他毅然进入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列兵。

进入新兵连以后，毛泽东为了练好赴前线打仗的本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对出操、上课都非常认真，很快就掌握了军队里的一些基本训练课目，熟悉了军营的生活。他和那些穷苦的士兵之间建立了友谊，经常同他们拉家常、谈生活。还经常给他们念报纸、讲时事，引导他们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然而，在军营里的生活对毛泽东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通过阅读报刊，接触到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毛泽东当时每月的饷银是7元钱，除了交二三元伙食费之外，几乎都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了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他“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并不知道这“只是社会改良主义”。随后，他又读到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并“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学习、介绍还刚刚起步，其内容也很复杂。在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人中间，其动机也不一样，许多人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去曲解社会主义的。如江亢虎的社会党，虽然招牌打着社会主义，实际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所宣传和介绍的社会主义，实则是社会改良主义。虽然如此，这对于求知欲望很浓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来说，是很难得的，对他思想的发展毫无疑问地起过一定的作用。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革命高潮中日益显露出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趁清王朝尚未完全崩溃之机，积极筹划篡夺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对革命党人采取一打一拉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遣派重兵开赴武汉前线与革命军作战，从军事上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屈服；另一方面又频繁派人到武汉表示与革命党和谈，诱使革命党人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把胜利果实交归他所有。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误认为袁世凯是汉人，只要他能脱离清朝，促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把政权交给他。从而，辛亥革命以孙中山解职，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标志而告终。毛泽东觉得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革命已经成功，不需要打仗了，于是他从新军中退出，“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

### 三 “最有价值的半年”

毛泽东于1912年春退出新军后，决心继续求学。但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起初，他报考了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学校，随后他的朋友极力鼓动他去报考政法学校。广告许诺在3年内学完关于法律知识的课程，并保证学生毕业后都

---

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18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18页。

可以立即当一名法官。毛泽东于是“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并要求家里寄学费给他。此时，另外一个朋友又向他建议，说“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又打动了毛泽东。他又报考了商业学校，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商业专家，于是，他进了这个学校。但他发现“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而他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英语。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学校没有专门的英语教员。“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在这所学校“只住了一个月”。最后，他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随后，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级中学），以第一名考入该校就读。

毛泽东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很快就发现这个学校课程太复杂，校规也很陈旧，正当他打算退学之际，有一位国文教员器重他的文学天赋，便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从而重新引起他在该校的学习兴趣。这部起自黄帝，迄于明代，共 116 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纲目相从，简明扼要。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从而使他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写了不少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则是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和有感而发之作。他在文章开头就大发感慨：“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紧接着，他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强调：“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尽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尽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即是说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做到立法本身有利于民，国家与人民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肯定“商鞅之法，良法也。”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中“首屈一指”者。因为商鞅所制定的新法是为了“惩好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拏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然而，“民何惮而不信”呢？政府为何“必徙木以立信”呢？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造成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民智不开，觉悟程度低下，“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的结局。因而，在 20 世纪初期世界民智大开的今天，如果还搞什么“徙木以立信”，则会使东西各文明国民“捧腹而笑，噉舌而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开民智，使中国人都知道改变自己命运的道理。此文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结合历史事实，以其“逆折而入”的笔调，阐述了作者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且文笔很流畅，故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赞赏，认为是一篇“有功于社会”的文章。然而，毛泽东虽然在这所中学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但他感到课程有限，校规也很古板，不如自己看书，自由研究更有长进。他在该校读了 6 个月后毅然退学，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

1912 年秋至 1913 年春，毛泽东寄居于长沙新安巷湘乡会馆，“订了一

---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第 11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 页。

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湖南省立图书馆是全省藏书量最多的一个图书馆，离毛泽东住的新安巷湘乡会馆有五六里路远，但他每天早晨开门就进馆，直至傍晚闭馆才最后一个离开，中午只出来买两个糕饼充饥，半年时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然而读得最多，收获最大的是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原富》（亚当·斯密著）、《法意》（孟德斯鸠著）、《天演论》（赫胥黎著）、《群学肄言》（斯宾塞著）、《民约论》（卢梭著）、《名学浅说》（耶芳斯著）、《名学》（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著）等世界名著，他读得很认真。这其中，严复翻译介绍的“天演哲学”和逻辑学对毛泽东的影响较大。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生于1854年1月（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卒于1921年，是中国近代直接受西方教育最早的少数人之一。自号“天演哲学家”，以翻译介绍英国达尔文主义者、著名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世。《天演论》译自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自1897年12月起，《天演论》部分内容由严复翻译在天津《国闻汇编》上发表，于1898年4月全书正式出版。严复译介《天演论》的基本论点主要有三点：一是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天演”即进化的过程之中，不是万古不变的。他极为赞赏《天演论》所反复宣传的“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充满变动，只不过是“为变着渐”、“为变至微”而已。二是强调物竞天择是万物进化的途径，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其基本进化的原因在于自身，“无所谓创造者”，是“以天演为体”，物竞天择为用。其总的规律是“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三是强调要“与天争胜”，“胜天为治”。这就是说，虽然“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即自然选择，但人们不应无所作为，“任天之治”，而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迅速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来，是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反映，是救亡图存迫在眉睫的需要。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大声疾呼，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人如果不能“变今之俗”，改革现状，变法图强，就有可能“弱者先绪”，亡国灭种；如能自强不息，则可制天而胜，争得民族生存的权利。严复的深层用意就在于，从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出发，向中国人民敲响自强保国保种的警钟。《天演论》的特殊现实意义，恰恰表现在这里。这种“后胜于今”的进化论思想，不但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成为他后来提出“厚今薄古”方针的理论来源之一。这种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挽救民族危亡，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外界环境作竞争的思想观点，也是毛泽东在摸索改造中国与世界、探寻革命真理的过程中强调自觉能动性的理

---

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严复集》第5册，第1324页。

《严复集》第5册，第1324页。

《严复集》第5册，第1324页。

《严复集》第5册，第1351~1352页。

论来源之一。

此外，严复译介的逻辑学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严复虽然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但他不是从陆王心学出发，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去寻找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而是着重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严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船坚炮利”、“国力富强”，问题就在于他们有各种科学作为理论依据，而之所以能有各种科学，又在于有新的哲学方法作为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指导。当时，在中国士大夫中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之智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严复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虚”、“实”，而在于要有一套正确的科学方法即逻辑分析法。这种新方法就是以费朗西·培根开其端的经验论和归纳法，并把它们称之为“实测内籀之学”。何谓“实测”呢？严复指出，就是一切科学认识必须从观察事物的实际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认为只有实际经验，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检验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标准。何谓“内籀”呢？就是指相对于“外籀”而言的归纳法，“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总之，归纳法（内籀）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对许多特殊的、个别的事物的研究中，得出一般的、普遍的公例；演绎法（外籀）则是从一般到特殊，即根据普遍的公例或公理，推断出具体的、个别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严复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是逻辑的科学方法论，尤其强调逻辑归纳法，认为只有“实测内籀”才能获得新知，创立公例，使科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日益昌盛。正是以逻辑归纳法为武器，严复对于旧学的批判比起康有为等人显得更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于新学的宣传也更具有提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蒙意义。毛泽东对严复这种思想的吸取是非常突出的。在他早期认识论思想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倾向同时并存。唯心主义倾向主要来源于宋明理学和康德的先验哲学，唯物主义倾向则是继承了清代“经世致用”的“实学”。而严复介绍的逻辑归纳法及其对陆王心学、八股制艺的批判，则加强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与此同时，严复在认识论方面，又存在着不可知论的倾向。他追随康德，割裂本质和现象，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经验中的现象，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本质，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然而，这半年的自学生活，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可低估，他自己就称之为是“对我极有价值”的半年。尤其是严复对他的启蒙作用很突出，对他矢志不移执着地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真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毛泽东从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看到一幅世界地图，从中国的现状联想到世界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不时思索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终找到的答案就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并作出结论：“这种制度、这种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然而，“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由此而感到，青年人的责任重大，应该做的事情很多，要走的道路很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的力量。”

---

《严复集》第1册，第23页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

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转引自周世钊：《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年第9期。

## 第二节 “宇宙真理”的探索

1913年春，抱有伟大志向的毛泽东，因父亲不赞同他自修，从而断绝了经济供给，于是便与两个好友一起考入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2月，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8班学习。至1918年毕业，毛泽东度过了前后达5年半的学生生活，在这5年半的时间里，他一心寻找拯救国家和改造社会的真理，其思想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主要著作《体育之研究》、《给黎锦熙的六封信》、《伦理学原理 批注》，其内容体现了他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政治倾向与哲学观点。

### 一 改造哲学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孙中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退出政界，搞他的实业计划去了。但革命后的现实却令人失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认定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要求共和立宪，而思想上则没有触动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他们奉精神革命为主旨，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方面反映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陷入了把社会革命归结为精神革命的唯心史观。毛泽东“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下形成的。

不过，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最直接的还是他在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30余岁以前曾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对朱熹、王夫之、曾国藩等人尤为拜服。1903年曾赴日本、英国、德国留学10余年，专攻哲学与伦理学，可谓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深厚的旧学根底与西学熏陶，以及他兼取古今融合中外的态度，使其思想的渊流极为复杂。但勿庸讳言，在其博杂的思想体系中，中学仍居主流。1913年回国后，杨昌济执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直至1918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教授，在长沙达5年半时间，与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时间相始终。时人记载他“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而毛泽东则在其书信中多次称赞杨先生“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弘通广大，最所佩服”。他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对毛泽东青年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就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而言，虽然其思维路向与

---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参见《杨昌济文集》第375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4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新文化启蒙运动一致，但其具体内容却与杨昌济的影响至为密切。

杨昌济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因此，当今之急，就是要从改造哲学入手，从而改变国民之思想。

对于杨昌济的观点，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理论根据。在他看来，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思想与道德，“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

中国之所以积弊甚深，就因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虚而不实，伪而不真，几千年流传至今，根深蒂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因此，只有改造哲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不是把哲学变革看成社会变革的必要准备，而是看成社会变革的动因与实质。

为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获得并发挥出一整套思想。

首先是要探得“大本大源”。杨昌济曾经指出，要当一个政治家，必须有“学问”，“今之从事政治运动者，多缺此一段预备功夫，故事到手来，总办得不好。譬如庸医杀人，误国事不浅也。”杨昌济的所谓“学问”，即指哲学，也就是“大本大源”。他向学生提问：“万弊都有个由来，只救枝叶，成得甚事？试举其例。”毛泽东具体发挥了这一思想：“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分析了当代人物无术以救天下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问”，即没有探得“大本大源”。如袁世凯，此人与学问无缘，“只能以樗栎之材，欲为栋梁之任”，不能不陷一世一国于败亡之地；又如孙中山，虽然热心于拯中华民族于水火，但他只注重政治革命，没有从抓“大本大源”入手；康有为似乎“略有本源”，在这时的毛泽东眼里，仍然没有探得“大本大源”，“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何以“独服曾文正”呢？原因就在于曾氏以儒生领兵，征战杀伐，却置倡学攻心于首位，好讲“大本一原之道”，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以曾国藩为榜样，勉励毛泽东，毛泽东亦以“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为志向。他推崇的正是曾国藩抓“大本大源”这一点。通过对近代人物的扬抑臧否，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只有探得了“大本大源”，才是抓住了根本，而不致流于枝

---

《杨昌济文集》第 20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6 页。

《杨昌济文集》第 67 页。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 12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节末流。

其次是要“普及哲学”。探求“大本大源”，不是纯粹地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这是古老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杨昌济思想中的根深蒂固的表现。他认为多数国民无知识，无思想，由此造成万事未举，百弊丛生的局面。要根治这一现象，必须唤起国民之自觉，“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毛泽东也把昌明哲学作为救世良方，他认为民智淤塞，国民全失其主观性灵，被那些强权者“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而这些人竟“陋不自知”，“终日在彼胸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要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认为只有昌明哲学，“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倡学”也成了“大本大源”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倡学”出发，毛泽东发出了“普及哲学”的号召：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他在给黎锦熙的同一封信中，反复地强调这一点，足见他对“普及哲学”的重视。他认为只要宣传哲学真理，使“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因此，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其三，昌明哲学的依靠力量是“圣贤”或“先觉之士”。杨昌济把世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在“君子”之中又分为“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前者是圣贤，后者是豪杰。圣贤兼有豪杰的品格，而豪杰则缺少圣贤弘扬教化的功能。因此，要改造和昌明哲学，“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乎少数贤智之士。”这种依靠少数先觉之士启发民智的观点，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改良派康、梁如此，革命派孙中山如此，“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亦莫不如此。毛泽东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更直接受到杨昌济的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杨昌济关于圣贤豪杰的议论，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普及哲学必须依赖圣贤的观点。他认为“小人”们终日忙碌于政治、法律、礼仪制度与工商业，“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无暇也无能探究“大本大源”，只有君子之士有高尚之智德：“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探得了“大本大源”，因而能够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和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毛泽东对那些没有探得“大本大源”的小人寄予深厚同情，反对圣人出世独善其身，主张入世对小人为一援手，“普及哲学”，使愚人“悉归于智”，“彼时至此，天下皆为圣贤”，贤人愚人“共跻圣域”，一个理想的社会就会到来。

---

《杨昌济文集》第 20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86 页。

《杨昌济文集》第 36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7 页。

毛泽东从改造哲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始，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传统的抓“大本大源”、圣贤小人的思想老套，对传统的挑战却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武器。这即是所谓“以传统反传统”的“五四”文化现象，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典型地体现出了这种文化特征。但也必须看到，毛泽东改造哲学、抓“大本大源”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求撇开枝节改良，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辨语言，是推动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精神力量。只是这时他还未找到真正的真理，反而陷入了“宇宙真理”的思辨迷雾之中。

## 二“宇宙真理”

毛泽东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观点出发，把自己的志向定在研究哲学上。只有研究哲学，探得“大本大源”，才能真正树立远大志向。他认为“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段话不仅仅是批评一些人的盲目立志，而且也是对自己立志过程的反省。他曾立过许多志：警官、律师，企业家、商人，最后选择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但杨昌济老师特别强调哲学伦理学的研究，使他思想为之一变：“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开始兴趣仍在史地、文学等方面，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到哲学、伦理学的研究上来。1915年，以杨昌济为首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肖子升等人。那时，毛泽东从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出发，对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将杨昌济刚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工工整整地抄了7大本，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上写了一万多字的批语。他“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在这时期哲学研究的结果也表现出二元论的倾向。

他在1916年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他提出了“精神不灭”与“物质不灭”的基本观点，认为在人的肉体生命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心灵不死”的本体。他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身体和德智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解释，对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定精神和物质同为世界之本原。他说：“国力恭（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他把体力的充实与完美，视为本质与原因，而将成就、年龄看成外在的表象和结果，特别强调体力的生命意义。这是因为，体育与“生”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体育者，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5页。

人类自养其生之道”，这种“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的生命意识，也可以称之为“文明”。人与动物虽生理功能差不多，而人的标志则在于“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愈明”，而动物对此永远不能自觉，因而将永处于人类的统治之下。这是因为人是由物质的肉体 and 精神的德智构成的。这种德智即“宇宙之真理”是先天就存在于人心中的，人人天生皆有德智，只有偏全之分，而无有无之别。后天的学习，只不过使“淤塞”的德智显现出来而已。构成人的两大组成部分，身体和德智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不是谁先谁后，谁产生谁的关系，而只是车与载、神与舍的关系。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进一步指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又说：“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肉体 and 心灵、物质 and 精神，是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统辖的体。进而，他从肉体 and 心灵并存的关系中，推断出世界万物都是由精神 and 物质构成，哪里有物质，那里就有精神存在。这就是说，他不仅把人的生死观，而且把宇宙观也建立在二无论的基础之上。

二无论的基本特征就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从毛泽东继续深入阐发其二元论的基本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特征。他一方面认为，自然界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这就说明，他看到了自然界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有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可循，人是“自然物之一”，同样受自然发展规律之支配。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在他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更有明确的体现：“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就是说，人们的感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人的大脑。这就明显地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然而，毛泽东又把世界本原之“有无”，最终归结为“生于心理”。他说：“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又明显地体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总之，精神与物质、唯心与唯物两者并存，构成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基本哲学观。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观是从探求宇宙之真理——改造中国与世界，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个目的出发而产生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其来源是通过严复译著所介绍的英国经验论，泡尔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6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7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9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9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9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19~120 页。

生伦理学所阐述的康德二无论。但更主要的是明末清初以来所崛起的经世致用之“实学”，而且这一点随着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愈来愈明显和突出，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忽视。

不过，这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倾向还不在二元论或唯物论上面。如前所述，他的从改造哲学入手以改造社会的观点，已是地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而他通过“大本大源”所阐述的“宇宙真理”这个概念，其唯心主义倾向也至为明显。“宇宙真理”是毛泽东这时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论其渊流，则是程朱陆王与黑格尔的学说。

毛泽东曾研究过朱熹的《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等书，经常和同学讨论宋明理学，对朱熹唯心主义体系的庞大精巧甚为倾服。在与黎锦熙、肖子升的通信中，多次征引朱熹语录，对杨昌济提倡的“大本大源”与“大原则”表示出浓厚兴趣。“大本大源”就是宇宙本体，毛泽东把它命名为“宇宙真理”：“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这与朱熹的“理”、杨昌济的“大原则”一样，是客观化了的哲学意识，是精神性的实体。毛泽东还有一段话，更具体地说明了“宇宙真理”与世界的关系：“发显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林林总总的万千现象（即发显）都不过是“宇宙真理”的表现而已。“宇宙真理”产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

毛泽东在论及生死问题时，虽然提出过“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二元论的命题，但他感到意犹未尽，还要更进一步探求宇宙的“大本大源”，探讨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统一的基础，因此马上又写道：“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联系他的早期著作来看，“共存”的基础实际上是“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人的精神与世界物质不过是“宇宙真理”这个体质的“发显”而已。可见，在论及世界终极本原时，毛泽东所持的无疑是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宇宙真理”这一概念正是脱颖于朱熹的“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杨昌济的“大原则”。

但是，在论及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时，“宇宙真理”却又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老师许多主观唯心主义的议论。在本体论上，他提出了“宇宙真理”的概念，但一涉及到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时，客观精神却变成了主观精神，他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宇宙真理”“具于心”而不就是“心”，认识对象不就是认识主体，但已具有主观唯心论的倾向；在《批注》中，他更进一步说：“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本体之意识”就是客观精神亦即“宇宙真理”，人类之意识就是主观精神，二者相“贯通”；再进一步：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2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9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29 ~ 230 页。

“已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神”即本体或“宇宙真理”，心与理完全溶为一体了，这就是所谓“宇宙大本与吾心灵确然同一”。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断定客观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客观唯心论变成了主观唯心论，“宇宙真理”就带有这种双重性质。

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就已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还没有得出“心即理”的结论，这一步是由王阳明心学来完成的。毛泽东的“宇宙真理”则集理学与心学的性质于一身。当然，“宇宙真理”的政治倾向与理学和心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宇宙真理”作为客观精神本体，说明的是世界的根本，社会现象都是它的“发显”和枝节，从而改造社会首先要抓“大本大源”——“宇宙真理”，论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必要性；同时，“宇宙真理”又是主观精神，它“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因而彰明“宇宙真理”，以之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从而证明抓“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

### 三“万变不穷”

如果说“宇宙真理”这一概念的内容还显得比较玄虚和空洞的话，那么，毛泽东早期提出的“万变不穷”的辩证法思想则具体展示了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既是对从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中得出运动变化具有绝对性的认识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中西启蒙思想家“变”的哲学的批判继承。

从毛泽东留下的一些手稿、书信、论文等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阐述其早期辩证法思想时，不时引用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屈原、司马迁、朱熹、张载、王船山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以及有关传统的辩证法命题，与此同时又可以看到，他对于近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的某些辩证法思想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虽然这其中在许多方面是通过别人的介绍和宣传来进行了解和吸取的，但是他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不断进行扬弃的，从而形成了他早期辩证法的固有特点。

关于运动变化观问题，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对“变易”的观点作了论述，近代以来这种“变易”观融合近代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独特的进化观。自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尤其是严复、李大钊、陈独秀的进化变易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运动与静止的问题上，杨昌济颇赞同静止为主，而毛泽东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较多地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运动变化观点，所以对杨昌济的观点不甚赞同。李大钊、陈独秀曾撰文批判过中国的以静为主体的传统文明，认为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把批判旧哲学伦理学视作是批判“静的生活”，提倡动的文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在肯定中国古代“变易”进化观的同时，又间接地批评了杨昌济信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主静”的观点和静坐的做法。他说，“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3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4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5 页。

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又说：“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他坚信只有在运动变化中，人生才能充满蓬勃生机，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因为“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他反复申明其人生态度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他在阐述新民学会成立之诸多原因时说：“这时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作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动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运动变化观点，表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其弊端的果断扬弃。此外，他的运动变化观是对经过改造了的近代西方进化论进行扬弃的结果。康有为等改良派思想家虽然肯定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始终处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更新中的辩证法原则，但他们的变动观具有回归旧物的循环论色彩。譬如，梁启超虽然主张变可以“保国”、“保种”、“保教”，但他认为这种变是“唯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从而以旧为本，以新为用，人为地颠倒了新久的关系，运动变化最终失去其本来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维新派还把变动说成为纯粹的进化，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一方面赞同他们的批判守静思想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在变化运动问题上呈现出的保守成分予以反省和批评，他以德意志等国一变而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例，说明变化发展是“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中国社会也一样，既必须变，也一定会变。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的早期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事物变化的动因即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既然充分肯定整个宇宙处在普遍的、永恒的、“万变不穷”的运动变化之中，那么他对于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内因与外因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问题，是如何辩证地阐发的？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他把本体论贯彻到辩证法中，并用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观察时，认定事物的运动即是自身运动的结果。他说：“宇宙间备物之活动，各物从服自我之活动而已。”这种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自我”运动的认识，使得他很早就重视从事物内部运动变化中去把握事物，驾驭事物。他在探讨人的身体如何致强这个问题时，反复指出：“外力不足以动其心，……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乎体育乎。”只有主观上自觉地认识到体育锻炼的实在意义，主动地去进行体育锻炼，才能使身体致强，反之如是被动地、强迫地进行锻炼，那么条件再好，也是很难收到好的效果的。他反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6 页。

《新民学会资料》第 2 页。

《梁启超选集》第 21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0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3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5、69 页。

复指出：“属于主观，改之在己”；“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并且特别强调：“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这种高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更有具体而集中的发挥。他说：所谓“现实”，即是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在这里，他高度注意到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并认识到只有通过某种“行为”——实践，才能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当然，毛泽东在重视内因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外因的作用。如他在探讨身体致强的内部原因时，还探讨了“外的客观”原因。诸如学校的设备是否齐全，教师的指导和训练是否得体等等，这些客观的因素均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完满发挥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关于量变与质变的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不仅强调量变，更主张质变。他认为，事物运动变化不仅仅是量的积累，不仅仅是渐进，而且，还有一个根本法则起作用，这就是“有成必有毁”。因为成毁不是保守其旧，成全其旧，也不是循环，而是永恒的新陈代谢，“时时涤旧，染而新之”。它在本质上说即是脱胎、再造。他从物质不灭和转化定律得到启发，指出新质是在旧质中生长起来的，“物质之由毁而成”，然并非彻底毁灭：“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然而，毛泽东虽然反复强调质变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重要形式，但他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并不排斥事物的量变过程，相反地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准备，没有量变也就没有质变可言，从而有机地把量变和质变统一起来。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等人的由积而致成的认识论，把积累和贯通看作是事物变化的相互关联的两个过程。他认为，学问的精和通全在于知识的积累：“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他非常重视知识的日积月累，强调要今日学一点，明日又学一点；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这就是“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在这里，他虽论及的是如何做学问，但实质上已涉及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三是关于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性问题。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把矛盾视作“对待”，即由对立或差别构成的统一体，差别构成对立，对立又构成和谐统一的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宇宙本体事实上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的根本差别，它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内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一切事物相互之间都表现为差异性，而最主要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对立的差别。这种对立的差别也就构成了矛盾，“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混差别，不知其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等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03 ~ 20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0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0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2 页。

级差别的存在，“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只要有人类思维存在，就会出现智慧之分、贤与不贤之分。总之，差别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它构成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动而又和谐统一的场面。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而认定矛盾的普遍性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言，幸福与痛苦相对、真理与错误相对，那种“纯粹的幸福”，“纯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是神话而已，“非人生之所堪”。人类社会如此，自然界亦然。生包含着死，这是由“物质不灭”和转化的必然性决定的。整个宇宙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矛盾运动，并经历着永恒的由毁而成的对立统一过程。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由于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曾对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观表示赞赏，对杨昌济说的“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是孔子终极之理想为世界主义”的观点也坚信不移，然而，在受到《新青年》有关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后；他能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进而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和斗争，并把这看作为万物的本性，即矛盾双方的本性决定了大抵抗、大斗争的客观存在。“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从而主张以毫无畏惧的态度去勇敢迎接现实，以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去迎接各种斗争的到来。他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毛泽东还对矛盾对立双方的关系作了探讨，认为矛盾对立双方的互相促成，它们的力量在斗争中增长；对立双方的胜负，全在于力量的对比。他不赞同泡尔生的只有矛盾的一方压迫一方，而无另一方的反抗增长，即“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的观点，明确指出，“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强调一切事物均自强不息，在抵抗与斗争中显示和增长自己的力量：“大抵抗对于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仑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从而，他充分肯定了矛盾对立双方的作用和彼此间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他以人体为例，来说明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推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他在这里运用辩证观点说明人的身体内新旧两个方面相互作用，可以“改易官骸”，或使其强，或使其弱，身体强弱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既然一切事物均因新旧对立而转化，那么它是怎么转化的呢？靠什么来转化的呢？毛泽东以人体为例，说明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是具体的，但必须具有一定的必要的条件才能完成。他说：“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恃：于消极方面则深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5 页。

《杨昌济文集》第 21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1 ~ 18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9 ~ 70 页。

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人类如此，自然和社会亦然。中国虽然很弱，但必须转强。也可以转强。当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由弱转强的条件是什么呢？一是要从身体素质方面改变其虚弱的状况，二是要从思想意识中扫除三纲五常等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人民所造成的毒害，变换其思想；即变化民质，改造国民性。

毛泽东在阐述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运动变化和大抵抗、大斗争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大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大抵抗”、“大斗争”的矛盾运动变化中实现的。这种“大抵抗”、“大斗争”永远不会消失，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这种矛盾中前进的；相反，如没有这种“大抵抗”、“大斗争”，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停止了。他赞赏泡尔生所说的“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的观点是“至真之理，至澈之言。”而“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炼”的观点是“振聋发聩之言”。并就此发挥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强调事物的相互作用、压力和反抗、作用和反作用，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他力主人生应当拼搏向前，发扬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然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他提醒国人，社会竞争并非某一方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客观环境和条件要求双方必争不可，斗争不仅是求生存的需要，而且也是事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号召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立、自强，挽救民族危亡而去斗争，奋起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日本“决一死战”，为中国人民“报仇”、“雪耻”。这种突出辩证法斗争性的作用，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斗争中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然而，毛泽东的早期辩证法思想虽然对于他不断接受新思想，改造旧观念，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他在“五四”前期主要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辩证观念在许多方面还表现出明显的主观随意性，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只有承认运动和静止，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只有承认运动过程中具有相对的静止和暂时的平衡，才能区分大小、尊卑、阴阳、虚实、上下、古今等界限，否则就会否定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它们之间基本的区别性，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毛泽东所指出的事物的相对性，是符合辩证法的，但他取消事物的差别，过分地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把事物任意地等同起来：“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从而否定了生灭成毁的基本界限。又说：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5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0～18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00 页。

“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即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这种否认事物转化的条件、对立面处在任意的变来变去之中，一切均无定形、定质的夸大事物差别的相对性的相对主义，体现得较明显。毛泽东认为，事物之间本来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人的概念之中，“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这是因为，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存在着局限性，“对于客观界，遂以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他虽承认事物均因差别而产生，但一切差别不是来自事物，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的观念差别的产物，是主观存在的。这些说明，毛泽东的辩证法，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

毛泽东的这种相对主义首先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周易》阐述的辩证法思想，其相对主义十分明显；老子的辩证法也具有相对主义；庄子的《齐物论》则大大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相对主义，肯定最真实的存在是无形无象的道和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它们本身是无差别、无矛盾的，客观现象的矛盾只是由于人的观察角度不同而造成的。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的《仁学》则反复说明各事物的分合、存亡、成毁、生灭皆无自性、无常性，“虚空有无量之星日，星日有无量之虚空，可谓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见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见之微生物，可谓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毛泽东在阐发其辩证法思想时，没有摆脱老庄和谭嗣同等人的唯心主义辩证观的影响，认为宇宙万物的差别是虚幻的，是由“我见”即人的观念所造成的，即把“宇宙一切之差别”归结为“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异”，未能唯物而辩证地看问题。

此外，毛泽东的相对主义还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柏格森曾强调，“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唯心主义成分很明显。但由于他的哲学中强调运动变化，一经传到中国后就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毛泽东则在朱谦之等人的倡导下间接地接受其“变”的思想，同时对相对主义也加以了吸收。譬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既割裂运动和静止、相对和绝对的对立统一关系，又夸大了运动变化的绝对性，否定了相对静止与暂时的平衡。

无论是辩证法，还是相对主义，毛泽东所强调的“动”、“变”都是紧紧地与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的，从而突出人生“奋斗”的意义。他曾一连写下三个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赏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69~27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4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46 页。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下册，第 316 页。

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这就是说，英雄豪杰总是勇往直前，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决不退却畏缩，而是奋斗到底，直至实现自我。

### 第三节 “自我实现”论的张扬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宇宙真理”看作客观精神，另一方面又看作是“具于人人之心中”的主观精神。随着他的思想发展，前者逐渐淡化，重心逐渐倾斜于后者，最终把人生价值确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主张“自我实现”论。毛泽东对“自我实现”论的张扬，既有他对中西各家思想吸收改造而形成的个人特色，也容纳了个性解放与救国救民的时代思潮。

#### 一 自我律令

“自我实现”论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Green)的伦理学说。格林(1836—1882)，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提出“自我实现”论，在英国影响很大。杨昌济于1909年去英国留学时，正逢其时，深受影响，归国后主讲一师伦理学，曾把“自我实现”论列为专题讲解。他在介绍“自我实现”论和讲解《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参酌中西，取舍发挥，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心之力》一文已无法找到，但他曾经的确仔细阅读了《伦理学原理》，写下一万多字的批注文字，使我们能够窥见其早期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批注》中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就把“实现自我”提高到了人生观的高度，接受了“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的“自我实现主义。”这是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直到1919年11月毛泽东写《非自杀》一文时，仍认为这种自我实现论“于人生目的，有具体表示，最为可循”。

既然人类的目的在于实现自我，那么，自我就应该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与行为指向，事实上，毛泽东就是这样看的：“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活动而已。”在《批注》中，毛泽东已不再把客观的或外在于“自我”的精神实体看成宇宙的本体，宇宙间唯一的最高的价值本体就是“自我”。“自我”成了他考虑一切人生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

这首先就表现在他对道德律令的看法上。是自律还是他律？这涉及到道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19~220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

本节凡引自《〈伦理学原理〉批注》，均不注出处。\*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9页。

德准则的起源与本质，也涉及到“自我”的价值问题。既然自我是人类和宇宙间的价值核心和服从的对象，一切行为都是实现自我，那么道德律令就不应该是他律，即不应该是来自神的指令，也不应是来自外在于自我的客观精神或社会历史的客观规范，而应该是来自于自我的内在要求，亦即是自我律令，他在《批注》中，把自我律令称之为“主观之道德律”，把他律称之为“客观之道德律”，并把两者尖锐对立起来。

在道德律令上，泡尔生持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义务者，不起于一人内界之意志，而实由外界以无上之权威胁成之”，这是地道的“客观之道德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以义务之故行善，则枯寂无味，殆若傀儡”，这又否定了他律。对于前者，毛泽东表示，“此处吾有疑义”，对于后者则批道：“诚然！”毛泽东认为，“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他在《批注》中对这两种道德律作了许多的议论：根据“客观之道德律”，道德律令发自他人、团体、教会、神或者封建的“天理”——三纲五常，它抹杀了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根据“主观之道德律”，道德律令发自个人内心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要求：“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能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乃以为己也。”根据“客观之道德律”，人成了其他东西的奴隶或工具，而不是把人当作目的：“以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而能实行，此奴之心理也”；根据“主观之道德律”，道德行为“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与所谓义务感情”，道德律令发自主体自身而又以自身为目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完善自我，实现自我。

这两种道德律的对立，反映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封建专制主义所实行的就是“客观之道德律”——三纲五常，“五四”前期的伦理革命就是冲破这个封建统治的精神堡垒。毛泽东认为实现自我自有“最可宝贵的道德律”，这就是“主观之道德律”，尽管他对道德的本质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却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在这点上，他比他的老师更彻底一些。杨昌济虽然也把道德原因归结为发自主体内心的要求，但他又认为：“天命之谓性，道之大原出于天，此上帝之观念，实为伦理思想之中坚。”“唯天为有人格，故人对于天而负道德上之责任。”这实际上就是束缚个体自由的“神学道德律”，毛泽东不敢苟同老师的观点，“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毛泽东的我律令不能说与康德的意志自律毫无关系，当时杨昌济介绍“自我实现”论的道德起源说时，就是把它作为康德主义来介绍的。至少在排斥外在功利这一点上，与康德的绝对命令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在阐述自我实现时，认为哪怕世界上只有我一人，也必须尽力实现自我，此等处不存在任何让人赞美、羡慕之意。如“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乃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如果有功利观念的话，这就是仅在于“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而已。因此，实现自我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

《杨昌济文集》第 76 页。

《杨昌济文集》第 77 页。

都是一种发自主体的绝对命令。但是，毛泽东的自我律令或“主观之道德律”又的确不同于康德的意志自律，前者是属于个体的“自我”，后者是属于普遍的意志形式，因而具有外在的客观的性质，这正是毛泽东所反对的“客观之道德律”，而宋儒的“义理”、“天理”“与康德同”，亦在毛泽东排斥之列。更大的区别还在于，康德与宋儒的道德尊严是在道德律令与感性情欲的冲突中显现出来的，而毛泽东的自我律令恰恰是要使“自我”的理性与感性两方面都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实现出来，以达到身心并完，实现自我。

## 二 身心并完

“自我实现”论虽然强调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但又不像康德那样，把理性理解为赤裸裸的抽象存在，高扬理性，贬谪情欲，而是把人理解为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力图调合两者的关系：“从来之伦理主义，其心理学的根据概不坚固。快乐主义以感情为自我，克己主义以理性为自我，皆视吾人自我之一面为其全体。然此主义，以自我为欲望之全系统，感情理性悉包含之，以全自我调和的活动为道德的生活之要件，能脱快乐主义之弊，又不陷入克己主义之弊，较为得其中正。”在这点上，泡尔生的观点与杨昌济介绍的“自我实现”论完全一致，不过他把理性叫做“意志”或“义务感情”，把感性欲望叫做“性癖”，反对康否认“性癖”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认为二者是一致的，不一致只是“变例”。因此，泡尔生的“至善概念”——“具足之生活”就是自我的体魄及精神之能力发达至高之谓。

这样，“自我”就包括两个方面，感性与理性、体魄与精神或身与心，实现自我就是使这两方面得到发展，身心并完。毛泽东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之前，大概就已经接受了杨昌济所介绍的“自我实现”论。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就说：“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仍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也突出强调“身心并完”，强调“文明其精神”，“野蛮及体魄。”迨至读《伦理学原理》时，这种“身心并完”的人格理想在“自我实现”的人生目的下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发挥。

实现自我，身心并完，首先是要发达身体，强健筋骨。这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一点。“德智所寄，不外于身”，“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专门探讨了发达身体的重要性与方法；其重要性在于“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身心皆适，是谓俱泰。”在《批注》中，毛泽东从发达身体的观点出发，对感性、对冲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把自然冲动就看作是人的本

---

《杨昌济文集》第272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2页。

性，是真的、实在的、自然的，“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善生存发达者，……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自然冲动正是实现自我的基础，是实现自我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甚至把自然冲动看成是人格之源，它们“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其人格之源。”因此，自然冲动就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实现自我的必要性，它们不仅是寻常人的人格基础，也是豪杰、巨夫伟人的的人格之源。或者勿宁说，豪杰之所以为豪杰，正是在于他们充分实现了自我的天然本性：“豪杰之士发展其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需要指出的是，人的本性或自然冲动，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仅是指食色情欲，更主要的是指人的体魄性的物质力量，身体中潜在的各种天然能力。实现自我，就是要使人的体魄能力充分展示出来。这不仅是毛泽东在伦理学上的肯认，而且的确成为他生活中所实行的行为准则。在野蛮体魄、发达身体的思想指导下，进行过各种体育锻炼，他曾“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寒冬腊月，冷水而浴；雷雨之夜，登山高歌。“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越是有阻力，越是能抵抗；越是险恶的环境，似乎越能展示自我的力量。

“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自我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物质存在，因而实现自我就不只是释放自然冲动，展示身体的力量，而且要充分伸张自己的精神能力，即身心并完。

精神或心的能力在毛泽东的批语中涵盖了良心、义务、理性知识与信仰等。由于自我是身与心、自然冲动与精神理想的有机系统，实现自我是使这两方面发达至高，因此，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道德行为并不存在冲动欲望与义务良心之间的冲突，而是协调一致的。其原因在于，自然冲动是自然的先天的，是真的，是第一天性，义务良心是人为的，只是群体规范对自然冲动的一种肯认，对于个体而言，它是源于第一天性的第二性：“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所以，从冲动到义务良心，不是先天本性的淡化，而是群体经验对自然冲动的含纳和升华，“意志本源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因此，毛泽东否认把义务良心与自然冲动的二元冲突看作道德行为的特征：“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需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所明，亦处处承认之。”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如果处处以自然冲动行事，又的确“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依义务良心行事，“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换言之，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又的确存在冲动与良心的矛盾，对此，毛泽东勉强解释道：“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他认为世界变化万殊，人生活于其中很不容易，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场合，如依冲动行事，“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于是良心与冲动相冲突，这只是因为“不得其法”，本可不相冲突，亦未可知也。

由此看来，是否身心并完，自我实现就完全归结为自然冲动的展示呢？毛泽东绝不这样看。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理性知识、信仰和理想的看法上。尽性完心决不能忽视自我的这些方面。理性在实现自我中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它对自然冲动的诱导上。杨昌济曾向学生解释说：“凡正当之行为，无非

以理性适度控制感情，以达一定之目的。”毛泽东则说：食色之欲必须计其“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他所说的“处处需冲动，处处皆冲动所驱使”的说法，肯定了理性在自我实现中的意义，冲动经过理性的梳理，以更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次，发达精神能力的重要性还在于使自我获理性的道德的知识，使道德行为具有自觉的性质。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人的行为之所以可能是道德的行为，就在于其自觉自愿的性质。毛泽东在批语中非常突出这一点。道德信仰和行为必先有对道德规范的自觉意识，他把人的精神活动分为三个依次相关的步骤：“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在这里，他将“知”放在首位，突出“知”的意义，即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性。这也本是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孔子就主张仁智统一，迄至宋明理学，更为突出知的意义，以至于有知先行后说，“信仰”具有意志坚强的性质，毛泽东在传统知行学说中插入“信仰”或意志的环节，具有强调行为自由与道德自愿的意义，这是传统伦理思想中所缺乏的。意志在毛泽东那里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的自然冲动的力量（即“意志本源于冲动”），一是指“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之状态，此种意义上的意志则本源于理性而非自然冲动。只有知之，才能信之、行之：“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所适。”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突出强调立志必先探得真理，批评盲目立志，“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在批语中，他处处不同意泡尔生轻视知识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的观点。当泡尔生说“虽大哲学家，未尝以道德哲学指导其日用行为，而为之指导者，冲动也，感情也……”，毛泽东不同意此说，批道：“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则全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当泡尔生认为人的行为，不必有目的存于意识之中才有道德之价值时，毛泽东说“此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的实行必须“有明白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阐述自我的精神能力和理性力量的发展时，似乎已削弱了他对情欲冲动的隆重礼赞。

第三，更要的是，理性知识或精神理想的高低决定了人格的高下与自我实现的程度。自我的实现，虽然一方面是伸张体魄性的物质力量和自然本性，似乎这些就是人格之源，但毛泽东认为人格之源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精神理想和德智的高低。“人有贤愚，因之而有贵贱”；“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君子小人之别，就在于理想识见的不同：“君子小人于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云耳。识见有高下之别，故手段亦有高下之别。吾人评判其人格亦有高下之别。”因此，实现自我，还要“高尚其理想”。只有身体及精神之能力都发达最高，才算身心并完，这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

---

《杨昌济文集》第25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9页。

圣贤豪杰。

### 三 个人主义

“自我实现”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调和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措社会无个人，离个人无社会，自我之实现外于社会则不可期之，此无论如何不可不顾自己，同时又不可不顾社会也。”在这个问题上，杨昌济对“自我实现”论作了番改造：

首先，杨昌济虽然在本体论上赞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他不同意格林在伦理学上袭取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思想，认为仅仅把人看作“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工具，这样“吾人人类不过为此大精神之搬运器，小我不过为大我实现自己的机关。大我，目的也；小我，手段也”，“此决非吾人之所能堪。”

杨昌济主张个人主义，他对专门追求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极力抨击，但认为“个人主义之人所抱之精神，则毫不能非难之”，“个人非有独立的人格之自己目的，则道德全归于无”；主张“贵我”：“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惟我。”由此可以看出，杨昌济主张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庸俗的个人主义。

其次，格林的“自我实现”论像黑格尔一样，把国家看作一个伦理实体，是客观精神的体现，是地上的“神物”，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国家意志，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也有国家主义思想。杨昌济在理论上并不反对这些，而是吸收过来成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组成部分。他认为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牺牲个人的利益，但不能牺牲个人独立的精神。他常引“宇宙内事皆吾性份内事”的象山语录教育学生，认为救国、爱国、爱人都是“实现自我”的内容：“谋世界之公益，即所以实现自我也。”他把忧国忧民、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以身殉国等等都看成个人主义道德观中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在人的意识中的表现，杨昌济总称之为“公共心”，发挥这种“公共心”，就是实现自我，毛泽东后来回忆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指的就是这种思想。

合“公共心”与“个人主义”，就是“公共心之个人主义”，是杨昌济改造过的“自我实现”论的代名词，他把这种道德观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教育当养成于必要之时牺牲自己利益之精神，又不可不养成有确信、有主张之人，不可不养成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之人。”这集中反映了爱国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

毛泽东根据“自我实现”论，提出了“精神之个人主义”的主张，把他老师的主张向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唯我论方向彻底化，同时又含纳了“公

---

《杨昌济文集》第 270 页。

《杨昌济文集》第 273 页。

《杨昌济文集》第 125 页。

《杨昌济文集》第 135 页。

《杨昌济文集》第 365 页。

《杨昌济文集》第 123 页。

《杨昌济文集》第 49 页。

《杨昌济文集》第 124 页。

共心”的道德规范。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此个人主义乃唯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精神之个人主义”认为：“一切生活之动作所以成全个人”，“成全个人”就是实现自我，“人类生活之本意在于发达个体”，从个人与团体、国家、社会的关系来看：团体、国家、社会都由个人构成，“团体无意思”，“社会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泡尔生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说成“躯干之于四肢的关系”，“予不以为然”。至于社会，“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都是实现自我的“凭借手段”；从个人与宇宙、神的关系来看：“我即宇宙”，“己即神也”，从义务观念来看，“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期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总之，“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一句话，个人有绝对之价值，其矛头直指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的一切东西：“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这种个人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也就是利己主义。这与他老师不同。杨昌济认为“利己心”与“利他心”并存于心中，他把“利己”理解为纯粹物质利益上的利己，斤斤计较于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前者追求物质利益，不可能与利他行为调合起来，后者追求独立人格，可以与利他（“公共心”）相结合，他反对“独扬利己之心”，“以自己为中心而行动”。而青年毛泽东认为，利他仍然是为了利己，利己是核心，利他是手段，“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这不过易其手段而已”，“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因此，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是主体与对象、出发点与途径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人恒以利我为主”。如果“人已并立”，则“无起点，失却本位”，只有“以我立说”，才有起点，才有本位，才能贯彻个人主义的原则，才叫实现自我。而且在毛泽东看来，人已并立，“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是为“大伪”，把利我作为出发点，“念虽小，犹真善也”。显然，毛泽东对利己与利他关系的理解，吸取了梁启超介绍的“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原批语中就有“参见梁启超利己心三种”，梁氏在介绍时认为，人只有“爱己心”，但“爱己心”又可分为“纯粹的爱己心”和“变相的爱己心”。毛泽东接受了梁氏的“利己”观念，把它融入自我实现论，大加发挥，不同意他老师与泡尔生在利己利他问题上的观点。

这种个人主义也就是唯我论。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这又与他老师不同，杨昌济对“唯我论”是极力批判的：“近闻人言，今日民国唯有一我，除我以外别无他物，盖言今日唯有自私自利之可言，他可不必顾也。此诚代表社会心理之言，可哀可惧。”

---

《杨昌济文集》第 125 页。

《杨昌济文集》第 257 页。

他把庸俗的“唯我论”与个性解放混同起来。毛泽东在这点上更多地受到“五四”前期激进思想家的影响：“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从实现自我出发，毛泽东走向了唯我论，以彻底的个人主义和唯我论的姿态出现，向传统的封建制度进行挑战，反映了封建权威解体下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价值重心移向自我。

但是，这一切都是精神上的。个人主义是“精神之个人主义”，利己是“精神之利己”，唯我也是精神之我。因此，毛泽东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唯我论就其内涵而言，与平常所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观念不可同时而语。“精神之个人主义”在阐述自我实现时，主要是实现自己的精神理想；利己主义在阐述利己时，是“利自己之精神”，“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的”；唯我论在阐述宇宙唯我时，完全是剥开了肉体之我的精神之我，即宇宙之我，群体之我，亦即大我而非小我，因此，唯我与利己乃是“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毛泽东甚至提出：“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样一来，实现自我就只剩下实现自我的精神了。原来被他隆重礼赞的自然冲动、感性欲望在精神理想面前便荡然无存。自我成了大我，实现自我就成了实现精神之大我，这又回到了传统的伦理人格理想，“宇宙内事皆吾性份的内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因而毛泽东很坦然地认为，儒家“仁爱”、墨家“兼爱”，都是推己及人的利己主义。这种精神之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与唯我论，就大不同于他老师所抨击的“自私自利而无爱社会爱国家之心”的利己主义与唯我论。相反，其中恰恰包容了杨昌济所推崇的“公共心”的道德规范。在这种精神之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就能够做到“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所有这一切爱人、爱国、爱社会，甚至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道德规范，都是为实现自我而发自内心的道德律令。传统的英雄主义、济世观念居然被浓墨重彩地泼写在那激烈的个人主义观念之中，个人主义也因此被淡化。“自我实现”论与传统的人格实现观念不自觉地融合到一起了。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主张“现实主义”与“实践至善”。实现自我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在“实践”中去实现。无论是探求宇宙真理，还是高扬自我，这都只是提高人生价值的一个前提，关键在于自我的对象化。因此，注重现实，注重实践，就成为实现自我的应有之义。所谓现实，毛泽东认为，它不是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而是“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以此淡化过去与未来，“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此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实现自我就是个人在一生中努力发达自己的身体精神能力，尤其是精神理想，“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与此相关，“实践至善”的要求是牢牢把握现实人生，尽力实现自我。特别是舍身拯人，救国爱民之类的精神和义务，不仅是圣贤豪杰应该努力去实现的，普通人也应以此为期向；“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

---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28页。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3页。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28页。

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于是也，宜为合于伦理之言哉？”从而，毛泽东以圣贤豪杰为期向，终于迈入现实，面向实践，去实现他那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

### 第三章 艰难的选择

“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冲突汇合达到顶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呈现出百家争鸣、异说竞起的局面。这既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文化选择与创造的机会及广阔舞台，同时又使这种选择显得更为棘手和艰难。正在浩浩荡荡的新思潮、新主义奔涌而入的时刻，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也把马克思主义送进了思想沸腾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选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一师醉心于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张扬“自我实现”的毛泽东，毕业后，便由对本源的探讨自然地转为对主义的追求。他信奉过各种主义，进行过一番艰难的选择。

#### 第一节 迈入社会

从韶山到东山小学，从东山到湖南一师，从湖南一师毕业走进社会，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人生历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他思想发展的急剧变化。迈入社会，使毛泽东接触了社会实践和各种社会思潮，开阔了视野，这成为他思想变化的重要契机。

##### 一 寻找新的出路

1918年夏，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在此之前，他邀约一批有志青年，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恰好在这时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商议决定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藉以“修学储能”，为改造社会培养人才。他曾在给陶毅的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由此可见，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8月中旬，毛泽东与张昆弟、罗学瓚等人第一次到达北京，七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以主要精力从事于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诸如计划的制订，经费的筹措等，都以极大热情去进行。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很多，但“没有一个人灰心”，并且在广泛接触社会实际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譬如，他们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长辛店等处开设过留法预备班，两次访问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在职工群众中了解情况，从生产细节到办厂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都作过详尽的调查，由此更加感到中国社会必须改造，寻找革命真理的心情也愈益迫切。

为了生活的需要，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担任了由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主要登记来图书馆读报者的姓名。这虽然是一项不起眼的工作，每月工资也仅8元钱，但它不仅暂时解决了毛泽东必需的生活费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5页。

《新民学会资料》第459页。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他有条件吸取新鲜知识，结识名流学者。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是传播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的摇篮。蔡元培自 1917 年接任北大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新思潮气氛非常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则极力宣扬实用主义哲学。北京大学出现“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首先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读过他写的一些讴歌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通过接触了解了他的学识和思想，就改造中国现状等问题共同交换过意见。李大钊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不仅亲手把北大图书馆办成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购置的两万多册外文书籍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而且，他还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高度评价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文中，他尽情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满怀信心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这一切，毛泽东感到很新鲜，思想上受到了新的震动。

在这里，毛泽东为了广泛寻求真理，还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和胡适，并与北大学生中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朱谦之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他还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旁听大的学有关课程。陈独秀在当时对十月革命前途抱着观望和疑惑的态度，深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公理战胜强权”。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作为该刊的宗旨。尽管如此，陈独秀那种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在寻找改造中国的出路“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曾多次请邵飘萍主讲办报经验，毛泽东以极大兴趣参加听讲，不仅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方面得到有益的帮助，而且邵飘萍那充满着革命热情的宣传、基于丰富的办报经验所作的演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帮助很大”。由于当时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并不很清楚，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大一些进步学生中流传甚广，所以毛泽东在这里阅读了一些有关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且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北京大学学生朱谦之有过接触，与他一起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中国能否实现的问题。

---

《李大钊选集》第 102 页。

《李大钊选集》第 111 页。

《李大钊选集》第 117 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2 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7 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 128 页。

上述这一切，使毛泽东大大开扩了眼界，加深了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形势的了解，从而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思想也越来越激进。然而，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1919年3月中旬，毛泽东借同一批准备去法求学的青年自北京到达上海，并在参加欢送赴法青年的活动后，立即于4月初返回湖南。为什么毛泽东积极组织一大批有志青年出了国，自己却留在国内呢？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很重视了解中国实际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人。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学校求学期间，他就幻想着手解决中国的实际，创造一种新生活。1918年夏，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立即开始“实验自己的新生活”，曾打算与好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下开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但由于感到成效不速，影响不大，便很快放弃，所以才有第一次去北京之行。现在，他在北京逗留半年时间，获得了新知，开扩了眼界，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的了解，思想愈益激进，从而感到有必要脚踏实地来解决国内尤其是湖南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于留在国内的问题，他曾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大少，假使我们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同时，他又感到：“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这种暂时不出国的思想，既受了杨昌济关于留学问题观点的影响，也受到胡适和黎锦熙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政治斗争的召唤的结果。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列举了暂时不出国的三大好处，其中就有一条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上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 二 现实斗争的洗礼

1919年4月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此时，正值“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夜。毛泽东后来曾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作了概括：“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

---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128页。

《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1日。

转引自《光辉的五四》。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新希望。”从他本人的思想状况来说，如前所述，虽然仍在寻找出路，但第一次去北京，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世界革命的大势和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因此，他刚一回到湖南就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向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详细介绍他在北京了解到的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北京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形，并和他们一道商议在湖南掀起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初步计划。据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为了便于发动群众，将湖南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推动起来，经周世钊引荐，毛泽东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在4月初至5月初这月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利用教员的合法社会职业，广泛接触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向他们讲述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见闻，并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商议如何对付局势的问题。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便率先投身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之中。为了深入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他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深入到长沙许多学校发动学生，撰写传单，号召青年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考虑到青年学生是反帝爱国斗争的主力军，而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则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亲自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详细报告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情况，随后就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紧接着讨论全省学联的章程，促成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月28日正式成立。湖南学联成立后，立即通过了全省学生总罢课的决定，毛泽东曾亲往明德等学校动员学生罢课。他以主动活泼的语言发表演讲，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积极参加争回青岛、抵制和焚烧日货等的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很快成立了国货维持会、湖南各界联合会、游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和爱国讲演团等组织，使得各阶级各阶层爱国群众在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过程中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参加组织和领导上述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参与这些政治斗争又使他本人的思想状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这就是说，在投身“五四”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广泛接触了社会和群众，为他鉴别和检验从书本上学习的各种学说，提供了机会。正是在实践中，他通过分析和反复比较，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能够更加注意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现实问题，更加注意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从而有可能逐渐克服在思想上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

## 第二节 超越自我

“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其中最主要的思想依据就是强调“实现自我”。经过政治斗争的洗礼，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在“五四”运动之后，“他的新世界观已经萌芽。从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许多富有战斗性的论文来看，他广泛地接触和研究了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转引自《光辉的五四》。

问题，表明他已向“超越自我”努力，并且初步取得了效果。

## 一 讴歌十月革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人民革命的伟大而成功的尝试，它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前途，作出了榜样。在当时的中国，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进步与否的基本标准之一。毛泽东把俄国十月革命实践、发展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来看待，并把这种“新思潮”比作一股“不可遏抑”的进步潮流。他认为，这种新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乃至亚洲，也“不可遏抑”地席卷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毛泽东指出：“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这是因为，新的一定能够代替旧的，也一定能够战胜旧的，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新旧思潮之冲突”的结果。谁要想阻挡这种新思潮，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这时，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意义，而且认定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种“不可遏抑”的新潮流、新趋势。这是他对社会主义学说初步学习和理解的结果。但是，由于毛泽东在这时正处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因而他在思想上仍然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未能完全摆脱旧民主主义观的痕迹。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许多文章来看，他的许多基本观点还存留有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内容。他把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看成是“对抗强权”、拯救社会的“根本主义”。这种“根本主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平民主义”。他具体解释说：这种平民主义，也就是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在这时，他虽然赞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但却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去夺取胜利的。他虽然欢呼这种“精神”，这种“胜利”，就是那“不可遏抑”地正在或必将遍及于全世界的“新思潮”，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接触和理解并不深刻，因而在欢呼“新思潮”输入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把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新村主义等一起作为“新思潮”看待，并将它们视为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庶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说明，毛泽东在这时，虽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

## 二 倡导民众大联合

通过对社会的了解，毛泽东开始尝试着对社会状况进行初步的阶级分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6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析，寻找斗争的策略。他认为：贵族、地主、资本家赖以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手段有三种：“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他具体分析说：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的平民阶级，绝没有机会去享受。这样一来，贵族、地主、资本家“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慧的阶级”。至于金钱，本来是人人可以取得的，但是那些贵族、地主、资本家们，“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这样就使得“金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机器和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同时又将叫“什么‘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予”。进而劳工阶级既没有金钱，也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出了贫富的阶级”。与此同时，贵族、地主、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的金钱去“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并且招募士兵，为他们打仗卖命。正因为有了武力，有了权势，一般的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从毛泽东在这里所作的三个阶级的划分，可见他看到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当然，在他的视野中，阶级的划分还只是“智慧”、“贫富”、“强弱”的划分，但也看到了这些阶级分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他开始运用这种阶级论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针对长沙城内发生的新娘赵五贞自杀的典型事例，毛泽东于1919年11月间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从包办婚姻到剥削制度，深入剖析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认为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就揭示了恋爱、婚姻问题对经济基础的依赖性，阐明了这个问题的阶级实质。但这些论述还很不严密，很不完整。毛泽东虽指出了产生贫富阶级的经济上的原因，但是他不能从整个经济结构上去寻找阶级产生的原因，而把经济的原因同教育、军队等因素等同起来看待。这就使他在当时不能明确认识到经济利益完全对立的阶级，彼此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毛泽东这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说话，还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来深刻分析阶级产生的根源。

通过参加“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希圣希贤转向寄希望于群众，从自我转向群体。他认定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地位的对立，其主要原因即是由“强权”造成的。并且认识到对这种“强权”必须“打倒”和推翻，要打倒它，推翻它，就必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进而把这种大联合看作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他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到了‘社会改革’的胜利”。我们中国也应该如此。“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贵族、地主、资本家尽管拥有金钱、知识和武力这几样东西，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少，只要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统治推翻。

---

以上引文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34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22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页。

既然实行民众的大联合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如何去进行联合呢？毛泽东主张先以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础，分别组织起来，实行小联合。然后，再以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实行大联合。譬如，工人按产业和行业组织工会；农民成立农会；学生、教员、妇女各界也应分别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这些小联合的基础上，实行整个工农为主体的各劳工阶级的大联合。他满怀信心地预言：民众的大联合必然能够成功。因为长期在强权者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的广大中国人民当中，孕育着一种巨大的谁也“不可遏抑”的革命主动性和社会力量。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然而，毛泽东虽坚决主张用民众大联合力量去向强权者进攻，但是在具体行动方法问题上，却不赞成暴力革命。他明确指出：“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他认为，激烈派“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温和派“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对于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通过比较，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认为温和派的方法更为实际，“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因为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进而，毛泽东列举“五四”运动中的实际事例以论证利用这派人的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说：“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远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们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为什么激烈的方法不可行呢？他从理论上予以说明：“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之间进行的“南北”战争，就是属于此一类性质，其结果平民百姓不但未能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更加重了经济负担。况且，那些“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因此，毛泽东极力“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作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民众“更大大的联合，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3 ~ 39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4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4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41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93 ~ 294 页。

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就可以把强权者——反动派打倒。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位刚刚走出校门一年多时间、对科学社会主义接触和学习并不甚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不十分懂得暴力手段对一切真正的社会改革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理。这时的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以为“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鸞旗易了红旗”，胜利来之很轻松；对于“五四”运动的产生、意义及其影响，也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刻的估价，以为曹汝霖一班人在青年学生的呼声中发抖，会自动退出统治舞台，而不懂撤掉几个卖国贼，军阀政府的性质丝毫没有得到改变的道理。他更多地是用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和观察问题，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尽管这样，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轨迹，在这时已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格局是：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却又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承认现实中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却又不能从经济结构入手作出更科学的解释；主张实行“民众大联合”，却又不赞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这时对于十月革命的接触和学习还是初步的，还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为什么毛泽东在这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有初步的接触和学习，能够从实现自我转变到超越自我呢？除了在理论上受李大钊等人介绍和传播的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实践上的原因。毛泽东一向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能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边接触、学习科学社会主义，边洗刷自身的旧思想、旧观念，对新思潮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能初步接触和学习社会主义，并且能在以后的时期内不断演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是初步接触和学习社会主义的阶段，这就注定了毛泽东这时在思想上还保存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早在1918年夏从一师范毕业时，毛泽东就曾设想过要用一种典型示范的办法去影响和改造整个社会，即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议”。1919年4月北游回到长沙后，仍计划在岳麓山建设新村，并草拟了计划书，计划“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他强调要在这样的学校实行“半耕半读”，即学生在学校里一边读书，一边从事“生产的”、“实际的”和“农村的”工作，这样的“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然后“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样的新社会里，有“公共幼儿园，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进而，“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这些设想显然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后来回忆的：当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41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页。

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是流行较早、较广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而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又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最大。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主张建立一个以自由和互助为根本主义的无阶级、无政府、无军队、无警察、无法庭、无监狱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关于建设新村的诸多设想，即是受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体现在《湘江评论》所撰的文章之中，就使他这时的思想格局含有双重的色彩，既相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又不主张采用暴力革命手段去推翻旧制度，改造旧社会；既从实现自我的思想圈子之中开始进入超越自我的境界，却又不愿彻底寄希望于人民群众。这恰恰反映了历史转变时期，中国思想舞台上的复杂局面以及先进人物摸索革命真理所经历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这种情况，在我国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都有所体现。例如李大钊，在他1919年7月所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马克思的“革命竞争论”看成是一回事。李大钊是当时介绍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在“五四”运动时期尚且如此，何况刚刚走出校门，正在摸索革命真理的毛泽东呢？

### 第三节 “刺取精华”

毛泽东面对各种学说和主义，尚无定夺。他采取的态度是：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思想体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特点。

#### 一 第二次去北京

1919年底，为了造成驱张运动的浩大声势，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如前所述，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发展。1919年12月初，在酝酿学生罢课时，毛泽东曾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学联骨干及教育界部分人士，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驱张的具体办法，决定由各校派学生代表2人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郴州、常德等地作请愿活动，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恶，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12月中旬，由毛泽东率领的一个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到达北京之初，毛泽东积极进行了联络各界驱张力量的活动，诸如出席旅京湖南学生召开的慰劳大会，组织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等，从而使得北京成了“驱张运动”的“大本营”。随后，为了进一步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传递驱张的消息，并争取舆论和各界的援助，毛泽东又着手组织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亲任社长，社址设在北长街99号的一个大喇嘛庙（福佑寺）里。这里条件很艰苦，但毛泽东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则紧张地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地报刊。与此同

---

斯诺：《西行漫记》第12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474页。

《湘潮》1920年2月24日。

《湘潮》1920年2月24日。

时，毛泽东与驱张代表们奔走呼号，积极联络在京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向他们深入宣传驱张的目的和意义。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罗宗翰、彭璜等联名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知名人士和人民团体，全面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种种罪行：“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骋）猛虎之政，推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泊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1月28日和2月4日，毛泽东与驱张代表团组织了向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的请愿示威游行，控诉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强调“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政府苟犹视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视湘民为中华民国之民，则去暴救民，职责固自有在，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钧院）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另委贤能接充，以全民命，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针对一些反动官绅和所谓“社会名流”拼组的“旅京湘省维持会”和“湖南旅京各界联合委员会”两个保张团体的无耻行径，毛泽东等人特撰《湖南驱张代表电讨保张团》一文，再次控诉张敬尧劣迹，指出：“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惟恐不远，去之惟恐不速”。与此同时，又揭露保张团的丑行：“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表示要“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5月5日到达上海，继续作驱张的工作，终于促使各界实力驱张，于6月把张敬尧赶出湖南。7月上旬，毛泽东自上海返回长沙。

在第二次去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广泛接触了各方面的人物，进一步接触了各种社会思潮。这时，李大钊正以北京大学为阵地，介绍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他专门组织人力从北大图书馆于1918年所购介绍各种新思潮和俄国十月革命方面的外文书刊中选译有关内容。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对华和平宣言，已冲破反动政府的封锁发表出来，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也派代表来到中国，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取得联系。因此，各种报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日渐增多，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的节译本也陆续翻译出版。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期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5月9日至6月1日，北京《晨报》刊登了马克思的《劳动和资本》；11月，《国民》杂志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在这时翻译出版。这就使得毛泽东更有机会深入接触和学习科学社会主义，以便“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同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驱有着密切的接触，受其影响较大，并通过他们的言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5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6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7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7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4 页。

譬如，他在此前后加入了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并直接同李大钊研究过许多现实问题。他曾写信告知陶毅：“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在京期间，毛泽东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用心地学习，并结合斗争实际进行思考。前面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等有关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节译本，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与此同时，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也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毛泽东一定影响。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社会主义史》这本书。它虽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五四”运动之后翻译介绍各国社会主义流派最详细的一本书。它对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作了介绍，尤其是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作了详细而具体的分析，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机会。它适应社会主义潮流在中国的兴起，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使毛泽东对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他事后的回忆，似乎并不准确。事实上，第二次北京之行及其尔后的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既有很大变化，又仍然存留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

## 二 思想的二重性

第二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在思想上有了前进性的变化。

首先，向往俄国的心情表现得很强烈。1920年2月，毛泽东写信给陶毅，谈到如何改造的问题。认为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至于改造到什么地步，用什么方法去达到，应从何处着手的问题，都缺乏“详细研究”。毛泽东初步认识到，这种“改造”是一种空想，“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如何克服这个弊病呢？毛泽东在当时尚未考虑清楚。他也强调：“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还不明白，因此他主张集合同志，大家一起来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必须向俄国寻找成功的经验，“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去考察十月革命的经验。从而，他对于尽赴法国留学颇不以为然。他写信告诉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留法学习，“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打算从北京、上海返回长沙之后，“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7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4～465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5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6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页。

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计划在一二年内。“把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参考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由此可知，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抱有一种急欲了解的心情。这种心情的认识基础是：“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准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并且表示，“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

在这里，毛泽东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地欢呼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那种胜利，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不仅是由于有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且有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斗争的有利时机和形势，认定这就是十月革命成功的秘诀所在。这种认识无疑表明他在这时对于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了解，而不是简单的讴歌十月革命。

其次，明确提出“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将封建主义“连根拔起”，从根本上“摧陷廓清”的主张。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也是全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它“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因此，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要求得独立解放，就必须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现在全世界有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取得了这种斗争的胜利，不仅“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而且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也正在进行这种革命斗争，中国也必须“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他对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大国沙文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在世界能够存在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谬论”，“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与此同时，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军阀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得以生存下来的。它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内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从根本上“摧陷廓清”。当然，统治中国的军阀政权，不仅因为它自己有势力，加之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广大劳苦民众要求得自由解放，就必须以更大的气力去对付它，坚持不懈，直至斗争到底。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上，比起第一次去北京到主办《湘江评论》时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那时，他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会改变，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避免，但他既未认清帝国主义与各弱小国家统治者的密切关系，反而认为强权者都是人；同时，他对于帝国主义具有共同的侵略本质，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66 ~ 467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7 ~ 50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4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86 页。

都是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敌人缺乏深刻认识，对战败了的德国在感情上还给予同情。现在，他不仅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整体，认识到他们共同的侵略本性，而且明确指出要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使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许他再来干涉和控制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那时，他虽然深刻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残暴，提出打倒军阀的主张，但是在具体行动方法问题上主张采取温和主义，现在他认识到，不仅要“连根拔起”封建军阀政府，同时还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就是说，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必须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任务。

第三，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阶级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伟大力量。毛泽东不再把人民只归结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他说，“我料得这最大多数的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而在人民这些成分中，“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是造成革命成功的阶级。毛泽东着重强调任何改革和革命必须有群众作为基础，没有广大人民参加的改革和革命都将一事无成。他针对那种“淡漠政治”，“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大错而特错了”。为什么错了呢？毛泽东认为政治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而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事，不要小看劳动群众缺少知识和权力，但正因为政治的好坏，关系到他们自己切身的利益，所以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就能够担负起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的重任。他指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现今的政治已经不是从前的政治了，时间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内容变了。“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毛泽东强调指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这种认识比起以前要深刻和具体得多了。在此之前，他虽然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且主张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去打倒强权政治，但既未规定人民的严格含义，又未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政治应享有主权。这就是说，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政治家开展政治活动可资利用的力量。现在他不仅明确了人民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占人口“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而且从理论上、从政治法律的掌握和使用方面，明确认为人民群众是主体，脱离了人民群众，任何改革和革命都不能成功。

然而，毛泽东尽管在这时有上述思想变化，但他认为还未找到真正的主义。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虽然“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出现了“一枝新文化的小花”，但“几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0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9 页。

年来的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仍在未知之数”，由此可见，“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这表明他虽然向往俄国十月革命，但仍持怀疑态度。同时，他认为，俄国“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的环境还不许可，条件尚未成熟，没有具备这总革命的基础。这是因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因此，“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鉴于此，毛泽东极力强调当时的中国“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毛泽东这时虽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将封建主义“连根拔起”，但是他对于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权问题，都不甚明瞭，甚至可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一点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所发表的文章和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较为突出。毛泽东多次主张湖南“自治”，“绝对赞成”所谓的“湖南们罗主义”，其主观愿望是想使湖南独立，脱离中央政府的束缚，“划湖南为桃源”。并以湖南为基础，“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作出榜样，再树立“一种模范自治”，再向全国推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彻底的总革命”。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他不仅看不出谭延闿等人鼓吹的伪自治的欺骗性，而且赞其在驱张运动中“劳苦功高”，是“乡邦英俊”。虽然，他反复强调“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如果“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但是他却把谭延闿等人作为“民”的首领，认为以“谭延闿氏为首所组织的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并建议由这个“革命政府”出面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去切实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且提出要像胡适主张的“二十年不谈政治”那样，“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认为这种“自治”是对现时中国的“唯一救济的方法”。

这些都表明，毛泽东至1920年夏秋为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掌握还是不全面、不深入的。因为在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击溃和扫除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影响，就是要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广泛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为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对于这个中心任务，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5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6~52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1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3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1页。

毛泽东不仅未在理论上弄清楚，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他虽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并且创立文化书社，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俄罗斯研究会”，探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他受胡适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开宣布要研究各种主义，其目的即是要“以学理解问题”，而不是“以实行解决问题”。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毛泽东在《章程》中提出 140 多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准备把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在湖南范围内做到具体化和行动化。由此可见，毛泽东在 1920 年夏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并未完全接受，在一些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运用什么方法推翻反动统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等等问题上，还明显地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对于当时颇为流行的西方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互助论等，尤其是对于无政府主义保留更多。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就主张全国“无政府”，把全国分成 27 个省，坚持湖南自治、独立的观点，反对全国统一。尽管产生这种思想的政治背景是由于军阀政府的专制腐败，采取这种方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改造社会，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可是这种思想、这种方法即是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未完全真正理解和掌握。

## 第四章 世界观的转变与新的起点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标志，主要看他是否确认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赞成和坚持走俄式革命道路，明确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集中到一点，就是是否承认唯物史观为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据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是在 1920 年底至 1921 年初。这一转变是毛泽东在时代潮流下总结实际斗争经验，并在理论上进行自我反省的结果。同时，世界观的转变又启动了毛泽东实践活动的新起点。

### 第一节 自我挑战

毛泽东自己曾说：“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从这种自我挑战的态度出发，毛泽东逐渐放弃了他所信奉的其他各种主义，朝着马列主义的信仰迈进。

#### 一 理论上的反省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但军阀政府非常恐惧，一再下令查禁“过激主义”，而且也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惶恐不安。他们唯恐中国革命紧步俄国十月革命的后尘，便企图未雨绸缪，早加防范，原来被裹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研究系分子张东荪等人，先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裂出来，并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也跳起来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发起攻击。对于这种挑战，以李大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和陈独秀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了大量文章予以有力的回击。这就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冒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论战双方直接交锋的文章，多半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编辑出版的《每周评论》、《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当时全国卓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在李大钊、李达、陈望道和陈独秀等人写的文章中，针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谬论，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而到达社会主义之路又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等等基本观点。通过论战，使得当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辨明了方向，逐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并且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这场论战促进了毛泽东对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清算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的抛弃；反过来，通过这种清算、反省和抛弃，又促进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化。1920 年 7 月底，毛泽东在长沙主办了文化书社。从书社

初期的经营方向来看，明显地反映了他对种种主义和种种学说进行认真分析比较的情形。当时该社经销的书籍杂志，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十月革命和唯物史观的著作包括《旅俄六周见闻记》、《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介绍无政府共产主义、罗素的温和的共产主义以及种种唯心论哲学的著作包括《工团主义》、《社会改造原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美国民治之发展》以及《赫克尔一元哲学》、《西洋伦理学史》、《哲学概论》、《实验主义》、《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教育哲学》等等。与此同时，他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特向湖南《大公报》专门推荐发表了一些介绍唯物史观的文章，譬如《西洋人倡社会主义者》就是一篇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好文章。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对种种学说、种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明确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

毛泽东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反省检查自己走过的道路及思想认识的同时，也提醒他的同志们对此引起高度注意。他在给李思安的信中指出：“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已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他在给罗学瓚的信中又说：“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但是他认为必须有一个基本原则，只要认定是错的就应当立即改正，只要认定是正确的，即使争辩激烈，也应当始终坚持。为了寻求真理，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既应坚持原则，又要反省错误。从这个基本信念和原则出发，一方面他明确强调要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作当务之急，主张同志们形成一种“主义的结合”；另一方面，他深刻反省过去，用新的思想观点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进行挑战，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理论收获就是他对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省、批判和抛弃。1920年10月，英国学者罗素在张东荪的陪同下来到长沙演讲其学说，毛泽东听讲后当场就同新民学会会员展开讨论，认为道理好听，事实上却做不到。恰好这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讨论学会方针时，发生了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他们写信给国均的毛泽东各抒己见。时值国内发生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毛泽东在复信中联系罗素的讲演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只要资产阶级握有种种特权，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是决无希望的。因为反动派决不会自行退出政治舞台，所以用温和的方法对付地主、贵族、资本家的强权则是空想，只有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这个唯一正确的途径，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目的。1921年初，毛泽东又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直接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在是年元旦召开的连续3天的会议上辩论同一主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又说：“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毛泽东在这里终于解决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问题，认清了实用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57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66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35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41 页。

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反动面目。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勇于去旧布新、不断寻求真理的精神，而且也反映了他在理论上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清算的一个收获，在思想上具备了全面接受唯物史观的基础。

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清算的另一个收获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抛弃、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如前所述，毛泽东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接触比较早。在“五四”运动以前的1918年，他就在北京大学和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问题。在第一次去北京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他发表了多篇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参加发起过上海工读互助团，创办过类似性质的“自修大学”。在第二次去北京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批判，所以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所认识，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因而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极力主张全国无政府，打破全国统一的体系，先从湖南做起，这在客观上就将当时开展的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到了1920年冬天及1921年初，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深入接触并最终接受，同时通过参加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毛泽东终于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他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他说：“我的理由却不仅在于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鉴于此，他明确表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漠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1年初，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认为“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又说：“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因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这种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分析批判，应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接受在理论上深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他洗刷旧思想，勇于以“今日之我”去向“昨日之我挑战”的结果。

## 二 实践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指出：“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从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的基本事实来看，的确如此。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受到过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过程，坚持“今日

---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5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41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6页。

转引自刘斐：《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任何“真知”都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无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不可能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总结。毛泽东主要通过参加和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尤其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实践，才逐步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中最本质的东西，才逐步领会和掌握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东西，才逐步认识到自己原来思想观念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并把这种认识提到新的更高一级的程度。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发生的驱张运动，是按照毛泽东主张的发动各界“民众”“起而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的具体方法进行的。当时，为了动员、联合各界群众投入驱张斗争，有逾百人的好几个驱张代表团到各地造舆论、请愿。毛泽东本人也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他一面成立平民通信社，揭露军阀张敬尧的罪恶行径，争取各界“民众”的支持，一面带领代表多次向北京段祺瑞政府请愿。他认为这样“起而大呼”，强权就会垮台，反动军阀就会自动“舍命的飞跑”。然而，段祺瑞、靳云鹏等人拒不接见他们这些请愿者，张敬尧依靠北京政府的支持，照旧赖在湖南不动。最后，由于直皖两系军阀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直系主力吴佩孚在与西南军阀达成协议之后撤防北上，谭延闿为首的湘军乘势直逼长沙，张敬尧才不得不滚出湖南。虽然，这与毛泽东等人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大造驱张舆论有很大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各派军阀间矛盾冲突的激化。总之，驱张运动的胜利，主要不是靠群众的“呼声”，而是由于军阀的“武力”。这种武力驱张的事实使毛泽东对原来所持的改良主义有所认识。在1920年10月他再次指出：“用兵力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

湖南自治运动开展于驱张运动胜利之后。它是毛泽东将他信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毛泽东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的最初目的即为了解决湖南乃至全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他在当时基本倾向于通过温和的、典型示范的、先建立联合组织然后推向全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他的新村和工读实验是这个计划内的一个内容，而他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则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总设计中最重要的一步。在驱张运动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上海报刊连续发表关于发起湖南自治运动的主张，强调湖南的事应由湖南人来自己解决。是年8月中旬，湖南督军谭延闿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湖南各界名流，发表通电宣布要施行地方自治。针对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毛泽东撰文提出民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设想，并组织了“双十节”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对于这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谭延闿等人大耍两面派手法，始则表示接受人民群众的要求，继则借游行队伍中有人将旧省议会旗帜摘下的事大做文章，不但断然拒绝了《请愿书》上的各项要求，并且制造种种谣言，企图诬陷毛泽东。严酷的事实，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湖南自治的主张。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所持的观点，对于揭露军阀政府的伪自治，维护湖南人民应有的权利起了积极作用。然而，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湖南立国的思想，都明显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它脱离了客观现实，脱离了一般群众的觉悟水平。运动所采用的和平请愿、议会道路、人民立宪的办法，是建立在对封建统治者抱有幻想的基础上的，具有改良主义的

性质。毛泽东虽认为俄国的革命经验很好，但又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中国应当走“先分后合”、“先邦后联”的道路。这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其实质是一样的。此外，毛泽东所主张的湖南门罗主义，并不可能真正起到排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干涉的作用，实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政策，根本无法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在开展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没有看到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反而对它寄予了极大希望。然而，通过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事实的教育，尤其是看清了谭延闿伪自治的面目之后，毛泽东抱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信念，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加快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他在给张国基的信中说：要“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要完成这个大业，就必须“取世界主义”即社会主义。他在给易礼容的信中表示：我们必须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给李思安的信中指出：“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此外，他还认识到：寄希望于谭延闿等人来搞“政治改良”是“绝无希望”的，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从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教训中通过全面反省，终于自觉地抛弃了民主主义立场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观念，为他迅速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第二节 转变标志

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接触，并对辛亥革命前至“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中国的各派哲学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比较鉴别之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思想上具备了接受唯物史观的条件，在1920年冬至1921年初终于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第一，认定“俄国式的革命”是改造中国的一条“新路”。

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之前，对于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就必须打倒“强权”，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个革命目标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标的问题，他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相反，他认为马克思的激烈说和克鲁泡特金的温和说——即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方法都是打倒强权的手段，而且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当时最适合于中国的还是温和说——“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后来实践证明温和说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即对此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就明确表示反对肖子升等人的“用和平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而赞成蔡和森提出的以“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他诘问温和派：“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60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5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7页。

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如无产者在这其中占三分之二，那么“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况且，现在无产者已经觉醒，认识到自己应该占有财产，认识到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所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中国革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经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考察，经过对以往政治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作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无产阶级革命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作为一位初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明确坚持这个基本点。毛泽东在这时已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体现了这个基本原则和方法，与 1920 年冬天以前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的观点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第二，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

毛泽东在 1920 年冬天，对于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了比以前更为明确的认识。他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地主、贵族、资本家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会“回心向善”。例如，拿破仑第一帝失败，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专制失败，又有段祺瑞专制的登台。同样，无产阶级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因“受无产的痛苦”，就必然要“发生共产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使得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形成“自然的结果”，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才能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改造。毛泽东这里论述的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阶级论。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开始接触阶级斗争学说，并初步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考察社会问题，但他那时对地主、贵族、资本家的阶级本质还缺乏深刻的、全面的和准确的认识，误以为“强权者”也是人，幻想他们“回心向善”，“将大礼服收起”，同平民一道“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五四”运动以后，在驱张和自治运动中，他虽也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进行阶级的大搏斗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又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条件和环境，时机尚未成熟，这种阶级大搏斗还是将来的事情，即“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他甚至赞扬谭延闿等

---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105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3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5 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5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5 页。

人“劳苦功高，乡邦英俊”，只是希望他们“能遵守自决主义”，“能遵守民治主义”，“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至于在中国必须通过全国性的阶级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的问题，他的头脑中还没形成明确的观念。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通过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全面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表示：“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个认识不仅表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以前虽然明确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没有深入的认识。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虽然也主张要由人民来治理这个国，但这个“人民”二字含义较广泛，并非明确指无产阶级的专政。1920年冬天之后，由于总结了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对待新民学会内部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意见，进行了分析考察，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指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是什么？就是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的：“‘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回信中对于肖子升等人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肖子升等人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之所以不可取，原因就在于“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教育之所以落在资本家手中，就在于“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通过深入的分析考察，毛泽东作出结论：无产阶级要真正获得教育的权力，就必须打破资本家的统治，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1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41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2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2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3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3页。

建立自己的政权，实行本阶级的专政。“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毛泽东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强调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四，主张各阶层群众“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内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认识，是在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深刻地理解了列宁所说的“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的观点，从政治斗争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以社会的腐败，民族的颓废，没有绝大的努力，不足以“连根拔起”、“摧陷廓清”旧制度。他在给蔡和森的来信中指出：“我觉得创造特别的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他基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基础，主张“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有可能，都要联合起来，“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造成过激派万人，以此作为团结群众的骨干，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战略和策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针对一些人热衷于当时湖南的“实际”运动，缺乏整体的、远大的革命目标的倾向，毛泽东指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在这些运动之外”。这就明确地将属于战略范围内的“根本改造”与属于策略范围内的“权宜之计”区别开来。针对一些人认为“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我们在这两个运动中只能处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阐述了革命策略是实现某种革命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的观点。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虽然强调要“以小联合做基础”，根据各个阶级和阶层人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联合和斗争的策略，但是他对于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区别与联系还不十分明确。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又把实现根本改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湖南的自治上，并幻想与谭延闿等人握手言欢，共同采取改造的行动。正是在吸取和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深入的学习，并最终接受其基本原理以后，毛泽东对于革命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有了正确认识。

第五，明确赞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去北京之前未予重视，只是在1920年7

---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3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8页。

《新民学会资料》第152页。

《新民学会资料》第152页。

《新民学会资料》第84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1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2页。

月从上海回到湖南后，才创办了文化书社，在广大群众中介绍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进步书刊，成立了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这都是在湖南从事组党活动的开端。但是，这些组党活动还是初步的，肤浅的，而且对于用马列主义为指导来组党和建党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不清的。到了1920年冬天，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学习，并最终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由于新民学会内部讨论诸如中国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法，用什么指导中国革命等问题时，蔡和森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和纪律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才更加明确和深化。至此，他不仅明确主张要“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而且坚决赞成蔡和森的建党的思想原则。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且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补充和发挥，强调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其他会员的信中提出要把共产党作为“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的核心，并反复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在中国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他提醒他的同志们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要真正变为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是什么呢？他在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上再次表示赞成何叔衡发言所主张的俄国式的“过激主义”，而不赞成其他任何什么主义。也就是说，他赞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来“组党”，并进一步强调以这种“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要像蔡和森所说的使它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在这里所赞成和提出的建党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政党论的基本思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1920年冬至1921年初这段时间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论、阶级论、专政论、战略和策略论、政党论等5个方面有了基本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他得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结论，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唯心主义转变到了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 第三节 新的起点

毛泽东自1920年冬至1921年初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即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至1924年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也结合中国的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2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6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54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54页。

参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36~137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2页。

实际情况，把主要精力投入组建政党与发动工人运动等实践活动中。

## 一 组建政党

毛泽东不仅明确认识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主义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来组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李大钊于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受陈独秀之委托在长沙筹组共产主义小组。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鼓励他要“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9月16日，蔡又来信建议毛泽东在最近期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于蔡和森的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表示要尽一切努力去进行。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何叔衡等经常同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接受其帮助和支持。陈独秀、李达等人则随时把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寄给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冬正式宣告成立。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采纳蔡和森的在发展党员方面注重质量，在开展活动方面注意秘密的建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以便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

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是一个半公开的革命组织。10月，毛泽东在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章程之后，与何叔衡等人加紧在长沙建立团组织的工作，到12月底，在长沙地区物色了20名左右的骨干分子。1921年1月3日，在新民学会举行的新年大会上，决定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找真同志”，并通过这些人到各地各行业中，首先是在各学校青年学生中“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亲自担任书记。他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多种形式去教育青年团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质，至是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地区的青年团员到达39人。随后，又在省立第三师范、第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共发展了40多名团员。这些团员中的许多人如郭亮、肖述凡、彭平之、夏曦等，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工农运动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二人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

---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第472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87、88页。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5页。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19页。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319页。

产党必须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互相交换各地建党条件和革命工作进展的情况，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

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于8月上旬回到长沙，积极进行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湖南支部宣告成立于长沙，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任委员，党员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共计10人左右。关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具体情况，据萧三回忆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坟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坟堆子和墓碑中间，一时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背略有点躬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一天在这里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三十节’（1921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根据中共“一大”决议和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精神，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一方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团优秀骨干。

在发展湖南地方党组织方面，毛泽东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青年学生中间。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学、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等处，是毛泽东进行重点发展党员的地方。此外毛泽东多次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联络革命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优秀分子入党，于1922年5月建立了中共衡阳支部。在工人群众中，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除了在长沙的粤汉路、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之外，他把重点放在工人比较集中、生活极为低下、革命热情较高的安源路矿。1921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安源，“以朋友的关系”深入矿井、工棚、餐宿之处，详细了解工人的疾苦，并在晚上邀约工人到小伙铺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根据工人的要求，于1922年1月由李立三创办了安源工人补习学校。2月，吸收安源工人朱少连等6人入党，建立了湘区最早的第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

从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至1922年5月这半年多时间里，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湖南范围内无论党的组织，还是党员人数，都有较快的发展。在组织发展方面，先后建立了长沙、衡阳、安源3个党支部；在党员人数方面，由长沙支部成立时的10人左右发展到30余人。按照中共中央局1921年的通告中，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地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明年七月”都能发展党员“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于1922年5月底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

---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第215页。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

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 22 号。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为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湖南地方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曾先后在粤汉铁路新河站吸收了程帝广、卢士英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在长沙泥木、铅印活版、缝纫、纺织工人中吸收了任树德、张汉藩等多人入党，并建立了泥木工人党支部。在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之下，郭亮在岳州建立了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蒋先云在常宁水口山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在株洲铁路站建立了转运支部；陈弗章、余贲民在平江建立了党小组。此外，常德、浏阳等县均在稍后一年余时间里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据统计，到 1924 年 5 月止，湖南全省中共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仅长沙就有党员 89 人，安源 60 人。

在发展湖南地方团组织方面，毛泽东也予以特别的重视。他根据中共中央局 1921 年 11 月的通告中要求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的规定，自 1922 年 1 月 13 日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逐渐将发展青年团的工作由学校转入工厂，重点放在泥木行业、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湖南第一纱厂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并几次赴衡阳培养团的骨干，于 5 月 1 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他在 6 月 7 日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汇报有关团务工作的情况时说：“衡阳 S·Y 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枏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衡阳团组织建立之后，先后派遣团员到衡山、耒阳、常宁、水口山等地发展团员，建立了团组织。此外，常德、安源、平江、岳州、宁乡、安化、益阳、湘乡等地大都建立了团组织。

从当时团组织和团员人数的发展情况来看，以长沙、衡阳和安源最为迅速。1922 年 6 月 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长沙地方团员大会，依照新章程“改组执行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 3 人，毛泽东仍任书记，李隆郅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任宣传部主任。执委会下设学生、劳工等 7 个工作委员会。6 月 20 日，毛泽东在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复亮信中，重点汇报了长沙团执行委员会改组情况：“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央局同意”；“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十二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十三条之规定呈请中局认可。”当时，各地方团组织均直属团中央管辖，而团员的发展，文件的转达，这些工作都由毛泽东担任。为了更有利于地方团组织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建议：“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区执行委员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执行委员会。”

团中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批准长沙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于 1922 年底开始代行团湘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

在建团工作中，毛泽东为了避免团组织成为“学生团”，强调要扩大工农成份，并将团组织严格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团的主要负责人由党员担任，从而使得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地发展。至 1923 年 12 月社会主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2 页。

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湖南全省建立了6个地方团执委会，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急需培训干部，但当时尚无一所培训干部的学校。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党、团骨干分子，毛泽东于1921年8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9月，自修大学增设补习学校，招收年长失学和有志向的青年。自修大学的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至1923年3月，自修大学有学员34人，补习学校共有学生200余人。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的组织形式、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都体现了毛泽东的办学思想，与传统的旧式大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什么要创办自修大学呢？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明确指出，学校和书院存在着三个弊端：一是官式大学和书院“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者当然不能入学，即使是“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二是官式大学和书院，“将学术着得太神秘了”，只允许少数人来做学问，而把绝大多数平民拒之于做学问的门外；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因为平民交不起“千元乃至两千元”，所以他们要想入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最后，他将此三个弊端集中到一点，指出：就是学校和书院的非平民主义的性质。鉴于此，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要“力矫这些弊病”，要把它办成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它的办学宗旨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它除了因房屋关系对住校学生稍加限制外，校外学生则凡有志向学者都可以入学。学生可以到学校来“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机关里做研究，“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

自修大学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规定得很明确，即是通过自由学习和共同讨论研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说：“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对此，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更有明确的要求：虽然我们这个学校刚刚创始，“确实简陋得很”，但“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自修大学对于新学友入学，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求每一个新同学明白几件事：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如何？愿来这个大学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对于人生观的主张，对于社会的批评抱什么态度？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凡要入学者，都要作出明确的回答，“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

《东方杂志》第20卷，1923年3月25日。

湖南《大公报》1921年8月16日。

《东方杂志》第20卷，1923年3月25日。

《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

《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

自修大学设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仅 1921 年下半年就购置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类书籍 421 种，共计 1000 余册。其中包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思 资本论 入门》、《新俄国之研究》、《阶级斗争》等有关马列原著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

在这个学校里，学生主要是靠“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同时也接受教师的指导。课程设置和研究的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 10 多个专业。补习学校则设立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 5 个学科，分 3 班教授，采用选科及学科制。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辅学中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及心理学等课程。学生可以从自修大学图书馆中借阅各种所需的书刊，进行自由学习，自由研究。

为了促进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交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于 1923 年 4 月 10 日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报《新时代》月刊。关于该刊的任务和特点问题，毛泽东在创刊号“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创办的，也可说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的机关报”，因为“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并且表示，对于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在创刊号上，毛泽东还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他指出，当时国内各派包括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三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当然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而“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紧接着，毛泽东对这种现状的发展前景作了预言：“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由此，也就形成了民主派和反动派两大阵营。虽然，各国帝国主义正在协调侵略中国的步骤，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以及广大农民仍处在落后状态，这种政治经济“最利于军阀的统治”。但是，这种“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使得“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为此，他断言：“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所写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所作的分析。它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清中国的现状，寻找革命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办性质的党校，是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它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普

---

《新时代》1923 年 4 月 10 日。

《新时代》1923 年 4 月 10 日。

及之先导”，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来自省内外约40个县的200多名优秀的领导骨干。因此，它的影响普及于省内外，教育界名流对其予以肯定和好评，同时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局的认可和赞扬，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4月底，毛泽东奉调中共中央工作，离湘赴沪，不久即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自沪赴粤，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6月12日至20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毛泽东等人经过与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思想作斗争，促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一起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协助主要领导人处理日常事务、起草和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自广州迁居上海。不久，他回湘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身份，指导中共湘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筹备组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1924年5月10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等决议案，纠正了党只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而忽略其宣传工作，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的错误。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要求共产党员认清国共两党组织的区别，共产党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和秘密性；要求共产党员加强自身的教育、组织工作；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劳工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防止国民党右派插手工人运动，等等。会后，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为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一系列开展国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痛斥国民党右派以及加强党务工作的通告。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仍予以足够的重视。先后起草了一些有关中共中央局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一大”。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直至12月离沪回湘为止。

在1923年5月至1924年12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利用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双重的身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了许多工作。概括起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力促成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集中到一点，就是继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团结“较民主的国民党”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促成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问题上，毛泽东自中共“三大”闭幕以后，积极从事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早在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他就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3年夏又请覃振转交给李维汉信件，要求中共湘区委协助覃开展国民党的事务。9月16日，毛泽东以国民党总部派赴湖南的筹备员身份回到长沙，与夏曦等人商议筹组国民党湖南总支部的问题。先在组织长沙支部、常德支部和衡阳支部的基础上，于9月底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南总支部。随后，又促成中共湘区委员会全力进行发展国

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于 1924 年 4 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至 1925 年 5 月止，国民党在湖南 17 个县市建立了组织。其中县党部 3 个，临时县党部 4 个，县党部筹备处 3 个，直辖区分部 5 个，区党部 26 个，区分部 136 个，党员达 2754 人。这种情况，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初步形成。它与毛泽东的亲自筹划指导分不开。

1924 年，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期间，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为团结国民党左派，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作了不懈的努力。诸如起草“执行部办事通则”、出席会议，议决有关开展工农、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项工作的计划等，毛泽东都参与其事。

上述行动，与毛泽东致力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有关。如前所述，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的民主派）及由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和商人派组成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必将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要合作的”的预见，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针对封建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和时评，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作了较为精辟的阐述。他在 1923 年 7 月 11 日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说：“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合法地位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鲜明的。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当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提出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写进章程里去。大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大钊以章程审查委员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发言，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有力地驳斥了方的谬论，并且得到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毛泽东适时地抓住时机，提议“请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维护。当有人提出“比例选举制”的提案时，毛泽东立即予以反驳。认为它“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坚决表示：“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在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这一提案被大会否决。

在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毛泽东起草或与陈独秀联名签署过许多文件，其中关于维护共产党的适当地位，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的有第 15 号通告和 21 号通告。15 号通告发布于 1924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词。针对孙科等人提出的《制裁共产党案》和张继等人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毛泽东提醒共产党员：“我们

---

《湖南人民革命史》第 114 页。

《向导》，1923 年 7 月 11 日。

《向导》，1923 年 7 月 11 日。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 年 1 月 29 日。

在国民党的工作，其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指出自 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以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通知中向全党同志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方面，为了革命势力的联合，为了国共合作形势的继续发展，决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对于右派破坏国共合作：摧残工农运动的错误，应利用各种场合予以揭露。并且号召中共各级组织，领导党内同志们“努力护（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尽力联合革命势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时候，坚持中共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强调党的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为使中央避免犯“左”、右倾的错误，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了指导性的方针、政策。

由毛泽东参与签署的中共中央第 21 号通告，重点就加强党务工作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通告指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增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有利于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加强中共党务建设，显得尤其重要。然而，我们“内部组织却未（未）有显著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种情况如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对此，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特别引起注意的几件事是：“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交党员同志共同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党组织的领导人，应在规划工作后，给党员同志具体分配任务，“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每次接到党中央有关文件后，应及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并尽力执行，将执行后的结果，“随时报告中央”。等等。这个通告的基本内容，体现了毛泽东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贯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斗争复杂尖锐的环境和条件下，提高党的自身素质，加强和壮大党的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提供了保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担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委员期间，毛泽东与瞿秋白、恽代英等人一道，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孙中山 1924 年 11 月北上途经上海时，毛泽东等 14 人向孙递交了重要信件，揭露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叶楚伦等人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党员以不向“毛头小伙”交待履历为藉口加以拒绝。毛泽东等人在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持原则，明确宣布执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凡不登记者就除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从而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随后，右派分子还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领衔，与恽代英、邓中夏等 10 多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控告叶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毛泽东在早期中共组建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

际相结合，在与国民党合作期间，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将组党的重心放在工人之中，从而使得他所主持的一切党务工作独具特色。

## 二 从事工运

毛泽东在完成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就注意了解工人、接触工人，常去参观、考察一些由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工人义务学校。中共“一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加紧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根据“一大”决议中确定的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的精神，对工人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从工人中寻找革命力量，成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的焦点。

中共“一大”闭幕不久，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同年冬，毛泽东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在此之前，他组织中共湖南支部的同志首先进行了肃清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争取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的工作。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组织星期同乐会，与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青年工人交朋友，谈工作，谈生活；在充分肯定黄爱、庞人铨为提高工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而开办的工人夜校、平民阅报室和女子职工学校、工人读书会、星期讲演会、女子新剧组等活动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指出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远大政治目标，只注重于经济斗争的问题。1921年11月2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借此机会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首先肯定了劳工会一年来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紧接着，他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明确指出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认为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领导引起特别注意。他主张劳工会在组织上应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应当取缔。进而指出，要把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就必须在工会的组织下由工人“自己养活工会”，认为“这一点很要紧”。不久，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已有的8个部改为书记、组织、宣传3个部，并请毛泽东担任会务助理。又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10多个工会，会员也按规定交纳会费。为了把湖南劳工会彻底争取过来，培养成为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性较强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毛泽东还趁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于12月中旬途经长沙赴桂林会商孙中山之机，把黄爱、庞人铨介绍给马林，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劳工会部分骨干“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毛泽东除了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还指派中共党员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毛泽东等人的耐心说服和帮助，使得黄爱、庞人铨等劳工会骨干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

的行动”，使他们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1年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他成员中的不少人后来也相继入了党。至此，湖南劳工会完全归属中共湖南支部的领导。12月25日，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太平洋会议，湖南劳工会受中共湖南支部的委托，出面组织了有工人、学生和市民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黄爱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太平洋会议，是国际资本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会议。对于这个会议，我们工人表示坚决反对。号召劳工阶级团结起来，一致行动起来，去联合全世界的劳工阶级，准备实行全世界的大革命。黄的演说，在游行示威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使湖南军阀赵恒惕感到恐慌和不安。1922年1月16日，赵恒惕派军警将黄爱、庞人铨等人逮捕，于次日凌晨将他们秘密杀害。

黄、庞等工人领袖被杀后，毛泽东很气愤，亲自主持了各界代表在船山学社举行的两次追悼大会，分发“黄、庞精神不死”的纪念章，出版了黄、庞被害纪念特刊，发表《湖南三万一千工人的通电》，指斥赵恒惕督湘两年以来，“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恳请全国各界主持正义，诛此独夫。1922年3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分赴上海、广州，向各界介绍黄、庞被害经过，发动新闻界弹劾赵恒惕。不久，由纪念黄、庞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开展起来。

毛泽东从黄爱、庞人铨被害引起全国反响的事实中感到，只有依靠工人，用马克思主义去启发他们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势力强大，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动立法的问题。因为，只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建立工人团体、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中，就明确“主张别立一种‘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之工时，工值，红利，教育等项为确实的保证”，并且要“特别承认劳动组合的地位”。从而，他建议对省宪法草案作根本性质的修改，以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赵恒惕政府对此根本不予理睬，但毛泽东不放过一切机会予以力争。1922年5月1日，他又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中，希望大家注意到“劳工的生存权”、“劳工的劳动权”、“劳工的劳动全收权”3件事情。现在的“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尽管大家不注意。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反之“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侮之不及了！”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中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倡者。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7月，中共“二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入为劳动立法运动”。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发布了《劳动法案大纲》。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山东分部负责人，于8月16日联合向众议院呈递“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国会制定劳动法案，“依法

---

斯诺：《西行漫记》第134页。

湖南《大公报》1921年4月26日。

湖南《大公报》1922年5月1日。

请愿贵院，尽量采纳通过，……提出大会议决施行。”并将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 19 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9 月 6 日，毛泽东领衔率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 19 条，以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4 项基本权利。否则，全国劳动者将“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为了推动劳动立法运动，毛泽东主持于 9 月 17 日组织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劳动立法虽然未得到北洋政府的许可，但争取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工组合权的呼声，已经深入人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在倡导劳动立法时，就注意在工人中建立革命团体，把他们组织起来。他首先把组织的重点放在产业工人之中。他在派出党的骨干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等重要产业的同时，自己带头深入到工人中去，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曾担任过 8 个工会的秘书。在组织工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织方式就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工人夜校、补习学校。他和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郭亮、夏明翰、罗学瓚等，分头在各地工人夜校和补习学校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分析工人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他们的觉悟，吸收优秀分子入团，入党，先后建立了一些党支部。再通过这些工人中党的骨干分子，去影响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包括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是当时中国南方重要企业之一，有工人 16000 多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非常低下，工人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毛泽东一直把这里作为发动工人、组织工人的重点。1921 年冬，他曾先后两次到安源，采取多种形式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向他们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1922 年初，毛泽东派李立三赴安源办起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讲课的过程中，他们指出工人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作斗争，才有“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经过两个月的宣传发动，“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者日众。”1922 年 2 月中旬，中共安源支部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党支部决定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采用“十人团”的办法把工人组织起来。5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时，毛泽东又增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9 月初，毛泽东又亲自到安源，召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针对工人中某些人不注意斗争策略的举动，他强调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不要过早暴露党的组织。从而，安源党组织的发展很扎实，并成为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对于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也很重视。1921 年冬，他曾多次到长沙北门外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年底，又派得力干部到新河车站办起了铁路补习学校。1922 年 5 月 1 日，中共粤汉铁路新河支部正式成立。8 月初，郭亮受毛泽东派遣来到岳州车站，于 15 日成立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

并主编《工人之路》周刊。

在重点组织产业工人的同时，把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这是毛泽东从事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长沙是当时全省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不下百余个工种，人数多达 10 万人。其中以码头、泥木、人力车、织造工人最多。自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开始，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就花了很大力气对手工业工人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长沙泥木工会是毛泽东依靠一批积极分子，经过 3 个来月的工作，以“十人团”的形式把工人先组织起来，然后于 1922 年 9 月 5 日成立的。下属 108 个团，达 1000 多人。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长沙土木工会章程 18 条，规定该工会的基本宗旨是：“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工会所要开展的工作是：举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互济”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工会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每会员 10 人联成一团，选举代表一人，任期一年，负责“传达、联络的责任”。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牒、会议、庶务、交际 5 股，主持工会的日常工作。各工会的秘书均由中共党员担任，代表党组织领导各工人俱乐部。在长沙泥木工会的影响下，长沙人力车工会于 10 月 8 日成立；长沙笔业工会于 10 月下旬成立。此外，长沙活版业、织造业、理发业、缝纫业等工会在此前后都纷纷建立起来。至 1923 年初，湖南一共建立了 20 多个产业工会和行业性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 4 万多人。

为了把全省各产业、行业工会统一组织起来，以便进一步开展一致行动的工人运动，毛泽东首先于 1922 年 11 月 1 日，主持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各产业、行业 30 余个团体代表 80 余人。会上，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紧接着，毛泽东召集各产业、行业代表 17 人举行全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会议。5 日，省工团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并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情况通告全国。21 日，毛泽东出席了湖南劳工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努力工作之下，到 1923 年下半年，湖南的产业、行业工会达 30 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 7 万多人。在工会中，一般都秘密地建立了党组织，积极而又慎重地吸收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从而扩大了党组织中的工人成分，尤其是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实现了湖南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联合，在由党领导下的 1922 年下半年至 1923 年 4 月的全省性质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进了 1923 年湖南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等人认识到，仅仅把工人发动起来还不行，应当领导他们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去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正当权益。开展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则是夺取工人权益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自 1922 年 5 月至 1923 年 4 月这约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各类产业、行业的工人举行了 10 次罢工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长沙铅印工人罢工等。这些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罢工的目的，大都是为了争取正当的工资待遇，小部分则是争取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湖南地方当局对于工人的罢工斗争采取了阻挠、破坏和镇压的态度，一些反动知识界人士亦对工人运动予以诽谤、歪

曲和谴责。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对罢工斗争及时给予指导，除了代表工人亲自与当局进行面对面谈判之外，他还撰写文章反驳那些攻击工人运动的谬论。在发生于 1922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1 日的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斗争中，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鼓励工人们不要动摇，坚持斗争就是胜利。12 月 9 日，毛泽东组织报界及铅印活版工会代表等举行调停谈判会，“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当场签订草约”。11 日，“复签正约”。经过半个多月的斗争，罢工终于取得胜利。13 日，各报照常出版。然而，就在工人复工的这一天，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对于工人的忠告》的时评，诬蔑工人“受人驱策”，“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欠缺常识”，“不守秩序”，“不知卫生真谛”，“忠告”工人“非注意学问不可”等等。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表的《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一文中，以工人的口气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对那种攻击罢工胜利的谬论予以反驳。他说：穿长衣的先生和工人，“各自要拥护自身利益，各自要显出神通，这也是很不错的呵！”穿长衣的先生自认为以“同情者”的身份来“忠告”工人，但愿他能做到如下几点：一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教我；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二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来指责我们；四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读书和运动的机会，……免使我们长久受人教训罢。”毛泽东这篇用词激烈、针锋相对的反驳文章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既使得那些反对工人运动的人有所收敛，又给予工人罢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22 年底湖南工人运动形成罢工高潮时，赵恒惕政府散布“过激派”操纵工人运动的谣言，企图压制工人罢工。并不断制造向工人挑衅的事件，如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长沙县署准备重新封闭理发工人开的 7 家新店，旧缝纫工会的封建把头，寻衅与工人发生冲突，等等。为了进一步鼓舞工人的斗志，揭破谣言，保护工会，解除部分工人群众的思想顾虑，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于 12 月 11 日至 13 日率领各工会代表 20 多人，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先后与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政务厅长吴景鸿、省长赵恒惕等人，进行了连续 3 天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这次说理斗争的内容牵涉到 10 个问题。其中关于政府对工界的态度问题，赵恒惕、吴景鸿、石成金、周流干等假意宣称：“政府对于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在谈起黄爱、庞人铨被杀事件时，赵恒惕等诬蔑“黄、庞收买枪枝，勾结土匪，运动造币厂罢工”，并狡辩杀黄、庞“并非对工界”，而“系对黄、庞个人”。毛泽东等人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罪名纯属强加于人，“实不是事实”。并警告赵恒惕等，用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段，绝对没有好结果。因为，在“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

---

湖南《大公报》1922 年 12 月 13 日。

湖南《大公报》1922 年 12 月 14 日。

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问题，毛泽东等人拿着政府制订的“省宪法”第12条规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质问赵恒惕等人，宪法既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一（二）条就根本取消了。”集会也是如此；近来常有暗探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恒惕等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必须“守法”。毛泽东等又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与吴景鸿展开辩论：“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并且列举英国不干涉共产党在行为以外之事，不禁止人民佩带手枪，只是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的例证，驳得吴景鸿等无词以对。关于表明工人态度即信仰的问题，毛泽东等明确表示：“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因为，工人信仰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至于工人对于目前政府的态度，“只要政府待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发生的工人要求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的事情，“断不为目前政治上的党派所利用”。然而，“政府不察”，一见到工人罢工，“就疑心有政派在那里利用。这种疑心，实在是错误的”。赵恒惕等提出：“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大损失”，“劝工人稍微忍点痛苦”。毛泽东等立即指出：“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至与之冲突了。”此外，关于“工人与政府接头”的问题，关于“劳资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人力车工会”的问题，关于“理发工”的问题，关于“笔业罢工”的问题，关于“机械工会”的问题，关于“缝纫工会”的问题，毛泽东等代表分别与省政府、警察厅、政务厅、长沙县政府要人作了针锋相对的交涉，取得了胜利。

在这连续3天的交涉过程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既揭露了它的假民主的真面目，又为工人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权益。1923年上半年，湖南工人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之下，继续向前发展。“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唯独湖南的工人运动仍呈高涨之势。例如，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于1923年4月，标志着工人运动走上了反帝的道路。由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领导成员刘东轩在衡山白果组织的岳北农工会，也于此时宣告成立。对此，毛泽东在1923年7月1日发表的《省宪下之湖南》一文中，作了初步总结：“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他对自1922年5月以来，在湖南范围内新组织的工人团体作了统计，共达“二十三团”，“总计人数约三万人”。罢工斗争的次数为“十次”，胜利及半胜利者“九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人”。

湖南的工人运动虽然在1923年底，被赵恒惕政府残酷镇压，暂时处于低潮，但在这以前，无论其组织的发展，还是罢工斗争的次数、规模及其结局，

---

以上引文见湖南《大公报》1922年12月15~17日。

均居全国各省区工人运动的前列。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在开展湖南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产业工运为重点，产业、行业工运一起进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在斗争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支部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发动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工组合权而斗争；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把合法斗争与罢工斗争相结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从经济斗争入手，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等等。这些，都是湖南早期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形成高潮的基本原因，同时也是毛泽东开展早期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工人人数毕竟太少了。仅仅依靠工人的力量，不足以动摇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哪里？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 第五章 寻找革命力量的新视角

毛泽东实现世界观的转变之后，站在新的起点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卓有成效地发动和领导了湖南省的工人运动。但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运高潮被中国的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二七”惨案的鲜血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也教育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没有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绝无成功的希望。从此，毛泽东把视角投向了农民同盟军，以后又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从此，他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民问题。

### 第一节 “注意农民问题”

192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论述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向革命党人疾声呼吁：要“注意农民问题”。他说，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以至现在学校著书立说之知识界，都没有注意到这点，一般同志更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这样，革命就得不到农民的同意和拥护，就一定要失败。毛泽东的疾声呼吁，不是他讲课时即兴的情感冲动，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客观的社会基础和根植于农民沃土中的心理因素的。

#### 一 陈独秀的误区

毛泽东把寻找革命力量的视角投向农民，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着直接的联系。换言之，是对陈独秀寻找革命力量所犯错误的经验总结。

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者，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不能不寻找革命的力量。但是，由于他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于农民的认识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1923年4月25日，他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即“工商业资产阶级”。这部分资产阶级“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故是“革命的资产阶级”。这里陈独秀虽未使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指出了这种“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族性，所以其实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第二部分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门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陈独秀把这部分资产阶级称为“官僚的资产阶级”：第三部分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是指小资产阶级。他把小资产阶级也划入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不科学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应属劳动阶级范畴。所以他实际上还是把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的。他对中国资产阶级构成的这种划分，算是较早而颇有价值的。但陈独秀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则完全不了解。更具消极影响的是，他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过高地估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点。”陈独秀不仅把“工商业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主要动力，甚至视为当然的统帅，要求无产阶级承认它的领导地位。他说：“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正轨”。由此，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对无产阶级，他却估计很低。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只是请资产阶级“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革命而已。按照陈独秀的理论逻辑，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有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之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奋斗中”只是“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样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脱离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对中国民主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脱离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实际，从而低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否定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在这里，他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优点。实际上，中国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年龄更大些，资格更老些”，社会基础也更广泛一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很快，至“五四”运动时已发展到200多万人。在质量上，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他们身受三重压迫，斗争最彻底；他们相对集中，便于团结战斗；他们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但是最关键的，是陈独秀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相对较少，却在他们背后有农民这样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他在阶级分析的过程中，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实际上否认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虽然也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紧接着他就过多地强调了农民的落后性，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他还强调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他们反对地主也只不过是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总之陈独秀虽也一般地认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为国民革命要有农民之加入，但具体分析农民的特性时，便以所谓保守、苟安、散漫、自私而否定了农民的革命性，也即实际上否定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

随着 1923 年 2 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血腥镇压下去，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受到严重挫折而转入了低潮。血的代价惊醒了中国共产党人：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无产阶级力量相对来说仍是弱小的，要战胜强大的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并与他们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而单靠“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此后，党便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而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这样的认识和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然而由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夸大农民的弱点，轻视农民的作用，便没有也不可能热心到农民中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而是把视角的重心投向资产阶级。

陈独秀用错误的认识和理论去看待和指导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和危害革命。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一再向资产阶级妥协退让，而指责和非难农民运动。比如从 1926 年上半年开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阶级斗争日趋激化。陈独秀却先后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三次向国民党右派退让，以后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妥协甚至愈来愈严重。而对农民运动却进行指责、非难和限制，在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问题上处处束缚农民的手脚，生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吓跑了资产阶级而干不成国民革命。因此，在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越来越严重的同时，对农民运动的压制也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错误观点及陈独秀的错误做法，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的思想，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的观点，并对陈独秀有关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干革命前途有所补益。”他强调：对于农民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时局将迫使每个中国人迅速地做出选择。毛泽东适应时代的潮流，做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选择，在理论与实践上，把农民问题摆到了国民革命的中心位置上。

## 二 历史的启示

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曾经指出：“对生活与劳动相结合的农村理想和生活朴素及劳动努力的农村传统深情眷恋，是半个世纪以来毛主义的思想特点，毛虽然从未证明农民传统就是社会主义，但他确曾赞扬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的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我们绝不能同意以此来否定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及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

---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 页。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 97 页。

家和领导者的地位。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根植于农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农民的优良传统对毛泽东以深刻影响的基本事实。正是这种思想根基，不仅使毛泽东深切了解旧中国农民的艰难困苦，更使他认识到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这种巨大作用给了他巨大的历史启示，为他认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思想资料。

“一篇读罢头飞雪”。认真研读历史，是毛泽东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方法。他爱读古书，尤其喜欢读关于中国历史的古书，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生活嗜好。毛泽东从小上学读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而爱看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古代中国许多农民造反，上山为“匪”，安营扎寨之类的传奇故事，及农民战争推翻封建王朝的故事，对他认识中国农民，得出关于农民问题的科学结论，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的确，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确实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处在社会“宝塔”底基的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世世代代几乎从未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史。从公元前20年“陈胜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爆发，到近代太平天国革命，其间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刻，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直至推翻秦皇统治。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南北转战，长达十年，终于使唐王朝彻底覆亡。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驰骋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直捣都城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等等。“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每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已展示出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农民仍在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数十万农军齐下南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威震全国的农民政权，并开始承担着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双重任务。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怒火，燃遍了京津地区，长城内外，其时的中华大地，旌旗猎猎，刀光闪闪，英勇不屈的农民群众，同侵略者进行着殊死血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近代史上历次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侵略战争。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农民更是显示出了巨大威力。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都显示出农民的巨大力量。据农讲所学员的听课记录，毛泽东在农讲所讲到这个问题时，还对工农的力量作了明确的比较。他说：“广东的农民帮助订刘杨，平陈炯明……等都出有很大的量力（疑为“力量”——引者）。倘若国民革命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则仅占人口二百万，现在组织起来的只有成十万，工人的大炮不过如此；而农民的大炮则甚多，能够将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参见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1926年3月18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如将来农民组织起来，则军阀不崩自溃。”总之，毛泽东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即从历史的启示中，越来越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了组织和发动农民、指导农民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三 农民观的转变

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不仅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影响，而且有其直接的理论来源，这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问题历来受到革命者的重视。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经验时就曾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发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不同他们建立巩固的联盟，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他又指出，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也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夺取政权，工人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农民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有力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就将变成孤鸿哀鸣，注定要失败。即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则共和国“天平的升降”仍然“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在驳斥孟什维克由于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会使革命规模缩小的机会主义观点时，指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他强调：无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斯大林甚至一度把农民问题提到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的高度。他号召殖民地国家内的共产主义者，首先要“和农民结合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并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

但是，当毛泽东投身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他出身农家，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传统和农民革命有着浓厚的兴趣，就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

如前所述，毛泽东早期寻找济世良方的时候，把改造世界的希望寄托在

---

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勳听课笔记（1926 年 6 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95 ~ 296 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第 31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74 页。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51 ~ 552 页。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90 页。

《列宁选集》第 1 卷，591 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61 页。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 7 卷，90 页。

英雄豪杰身上，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世界的重任。后来，他以救国救民的姿态投身革命时，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成是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当他开始接受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虽然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农民还不可能达到深层次的理性认识。因此，他把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对农民这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正如后来毛泽东自己所说的：“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这就是说，我党，包括毛泽东在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农民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二·七”工人运动的失败教育了毛泽东，使他从从事工人运动转向领导农民运动。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他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这使他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在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那种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欧洲各国的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占统治地位。俄国虽还存在着封建残余，但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对准资产阶级；且因资本主义发展而无产阶级人数较多，故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和主要力量。农民只是无产阶级的支持者和后备力量或一定意义上的同盟军。中国则不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内有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资本主义很不发展，政治上经济上都极端落后，因而农业经济更占显赫的位置，农民占有全国人口的比例最大，且农民所受到的压迫剥削更重更深，因此农民问题及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就显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重要和突出。正因为中国有着这些比欧洲更为特殊的国情，所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观，而且对农民问题的地位甚至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得更为突出。

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待农民问题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仅仅看作是一个派生的、局部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基本问题、中心问题，即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自觉地把解决农民问题当作处理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此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产阶级政党看待农民，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仅仅看作无产阶级的一般同盟军、后备力量或一般援助者，而应该看作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革命的主力军，即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主要依靠他们来完成。这些正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予以丰富和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民问题理论，也是他将寻找革命力量视角的重心投向农民的思想理论基础。

## 第二节 “红旗卷起农奴戟”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抚今追昔，激情满怀地写下了“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壮丽诗作。这是他对1925年和1927年亲自发动和领导韶山农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的深情回忆，更是对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伟大作用的热情歌颂。

与陈独秀阻拦、指责农民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毛泽东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因势利导，积极地领导农民运动，并从中看到了农民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得出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著名论断。

## 一 农民运动的尝试

1923年春，毛泽东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亲自委派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和安源俱乐部负责人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到赵恒惕的老家衡山岳北，领导衡山农民对土豪劣绅、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发起了全面进攻，同年9月，成立了湖南第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组织——衡山岳北农工会，成为湖南产业工人同农民结合的伟大开端。

1923年4月底或5月初，毛泽东离湘赴沪，调中共中央工作。6月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秘书。由于党务工作十分繁忙和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致使他身体虚弱、睡眠不佳、体力不支，加上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上与陈独秀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于是他于1925年2月回韶山养病。养病期间，遵照中共“四大”的精神，在韶山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亲手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从而使他直接投身农村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寻找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一是广泛的宣传。毛泽东回到韶山后，一方面前来探望的乡亲川流不息，另一方面他自己利用走亲访友的方式，广泛接触贫苦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部分开明绅士，调查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农民的要求，分析农村各阶级的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并向他们宣讲革命的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他以生动的事实和比喻，深入浅出地启发贫苦农民提高政治觉悟。向他们讲述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而自己却没吃没穿；而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绞罗绸缎，有权有势。听了毛泽东讲的道理，受苦的乡亲们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决定的，而是军阀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压迫的结果，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毛泽东还用本乡的事实进一步告诉农民，天下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极少数，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是大多数。接着他以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生动比喻告诉农民，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才能打倒地主阶级、摆脱贫困，争得做人的权利，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还把帝国主义比作洋财东，以帝国主义指使各派军阀争权夺利以致造成连年军阀混战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后台老板，说明不但要打倒地主阶级，还要打倒帝国主义。

二是周密的组织。首先是组织农民协会，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毛泽东不断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通过他们的四乡串连来进行秘密农协的组织工作。这时，毛泽东在安源亲手培养入党的雇农毛福轩，也从安源回到韶山，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二、三月间，在毛福轩、毛新枚等串连发动下，韶山一带的许多乡成立了秘密农协。其次，创办农民夜校。为

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利用伪省长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通过秘密农协的活动，创办了农民夜校。随同毛泽东来韶山的杨开慧，也同毛泽东一样，经常深入农家了解疾苦，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成为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夜校开办后，由杨开慧协助主持夜校的工作。在夜校里，坚持把传授文化知识同宣传革命真理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上夜校，农民不仅学了文化知识，而且提高了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韶山便涌现出了 20 多所农民夜校。夜校的明灯照亮了韶山冲的黑夜，照亮了韶山农民革命的道路。夜校学员积极参加秘密的活动，这使农协随着夜校的发展而在各乡都建立起来了。再次，建立中共韶山支部。毛泽东非常重视在农民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在领导农民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善于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如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李耿侯等。为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毛泽东决定吸收他们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在韶山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韶山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发展。最后，组织“雪耻会”，“五卅”惨案后，毛泽东立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指示秘密农协在各乡成立“雪耻会”，进行反帝爱国活动。由于军阀和土豪劣绅对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的“雪耻会”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便指示秘密农协要利用“雪耻会”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发展农民革命组织，壮大农民革命力量，韶山党支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原有的基础上，“雪耻会”由 20 多个乡扩大成“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韶山农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

三是有力的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韶山农民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了有力的斗争。当时韶山一带掌管学校行政的教育会和掌管经济的学委会，都操纵在土豪劣绅及其走狗手里。他们对农民运动百般阻挠，公开与雪耻会作对，不准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不准办农民夜校，不准农民上夜校读书。且贪污公款，克扣薪饷。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党支部发动群众，把教育会和学委会的权力从土豪劣绅的手中夺过来，使学校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服务。在斗争策略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明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跟他们斗争。党支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依靠进步教师，揭露了掌握教育行政大权的土豪劣绅及其代理人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农民革命斗争及贪污公款、克扣薪饷等罪行，改组了教育会和学委会，选举李耿侯、庞叔侃等为两会执行委员，10 多所学校的校长也由进步教师担任。这年夏天，韶山地区一个多月没下雨，田地龟裂，禾苗枯萎。许多农民家里揭不开锅，而地主豪绅却趁火打劫，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一升米由 60 文很快涨到 160 文，并将谷米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在旱情严重威胁农民的时候，毛泽东到处奔走，了解灾情，指导斗争，指示将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囤积居奇、阻止偷运谷米。党支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以“雪耻会”的名义，坚决开展平菜、阻禁的斗争。他们要求团防局长、土豪成胥生组织平价菜谷给农民。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又组织数百农民点着火把，带着扁担箩筐，连夜跑到银田寺河边，将成胥生等

豪绅地主准备运往湘潭县城的粮食全部截住。成胥生半夜闻讯，急派团丁镇压，团丁见农民人多势众，慌忙朝天开枪，妄图吓跑农民。附近农民闻声赶来，声势反而更大。要求平糶谷米、不准偷运出境的怒吼声响彻银田上空。逼得成胥生只好按平价将粮食卖给了农民。其他土豪见势不妙，也都被迫同意平糶。韶山党支部领导的平糶、阻禁斗争取得了胜利。接着，党支部又领导农民进行了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息等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至 1926 年 8 月底，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已逾半年余。半年多的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敌人便视毛泽东为眼中钉。团防局长成胥生密告赵恒惕，要求派兵逮捕毛泽东。在当地农民的护送下，毛泽东机智地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去广州后，他还时常关心着韶山农民运动。11 月从广州来信，指示韶山党支部派庞叔侃等去广州农讲所学习，建议把“雪耻会”变为公开的农协组织，以便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农民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还寄来了农协组织章程。

毛泽东在韶山卓有成效的农民运动实践，为他后来系统研究中国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进一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准备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 二 百姓齐，泰山移

思想指导实践，实践又产生新的思想。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和巨大力量，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越发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由此，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逐渐提到新的高度。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他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论断。并围绕着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向学员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教育，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大大地推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 年 8 月，毛泽东到广州后，农民问题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就明显地突出起来了。他接连在一些场合突出他讲述农民问题并连续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10 月 20 日，在他撰写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热情赞颂了广东的同志领导农民同地主所作的斗争。讲到大会的责任时强调：尤其是要“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 80% 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10 月 27 日，在这次大会的闭幕演说中，他专门批判那种认为现在是反帝时期，要一致对外，不要扶助农民以与土豪劣绅作对的所谓“中间派”的奇怪论调，并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中间派的理论是站在反革命那边的理论，它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的理论与策略。并断定这种反对农民同地主斗争的所谓中间派是“不能存在”、“不能立足”的。他认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因此这个问题尤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同年 11 月，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的调查表上，明确填写自己现在是“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2 月 1 日，他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

毛泽东：《〈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1925 年 10 月 20 日）。

参见 1925 年 10 月 28 日广州《民国日报》。

参见 1925 年 10 月 28 日广州《民国日报》。

分析》一文，1926年1月1日，他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专论，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这个时候他“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成果。

从1926年5月起，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这里，他除了担负领导责任外，还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收集整理各方面的资料，编辑《农民问题丛刊》，成立“农民问题研究会”，根据农民运动的实际，毛泽东亲自为研究会拟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36个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调查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民运动情况。另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表格或调查提纲，要学员将自己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使学员们交流了各地情况和各自的学习体会，加深了对家乡和全国农村的认识，为以后从事农民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使学员们把学到的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还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学习，参加火热的斗争，学习和摸索农民运动的经验。他还邀请彭湃讲授海丰和东江的农民状况及农民运动情况，给学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毛泽东给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讲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时，他以丰富的材料，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把旧中国的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并指着他画在黑板上的宝塔说，宝塔的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然后他分析道，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一定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接着他又用大量生动的事例和深刻而有说服力的分析，阐述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悲惨遭遇，进一步说明社会上受剥削最深、受压迫最重、生活最痛苦的是农民，也即农民又是宝塔塔基下的底基。

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宝塔的底基的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与中国农民的境遇是完全一致的。旧中国的农民历来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在奴隶社会，压在中国奴隶头上的就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遍布各地的奴隶主。奴隶主贵族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却穿华丽服饰，吃山珍海味，住高敞宫室，玩珍宝狗马。居有臣妾侍候，出有车辇代步，与此相对照的是，奴隶们日夜劳碌、累死拼活，却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住透风漏雨的茅棚土舍，吃不能下咽的野草苦菜。他们呐喊：“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尤其残忍的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施以骇人听闻的酷刑与惨无人道的殉葬。自周秦以来的封建社会及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来说虽是进步了，但压在农民头上的仍有乡绅地主、王公贵族、贪官污吏、宰相皇帝，进入近代中国更加上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买办阶级等等。豪绅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近现代封建法西斯国家政权对农民的强力压榨，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野蛮的武装掠夺等，并不亚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对奴隶的狠毒性。农民将自己收获的六、七成甚至

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苛重的田赋，繁杂的捐税，沉重的劳役，频繁的天灾，强制的封建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等等，像无数根粗大的绳索，将农民死死捆在难以活命的小块土地上，使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罗网中苦苦挣扎。在极端落后的农村经济环境中，广大农民“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逃荒讨饭比比皆是，饥寒而死不可胜数。吃糠渣野菜、嚼树皮草根，更是家常便饭。农民之经济地位，已濒临绝境，老弱者辗转以至死亡，强壮者则沦为乞丐、兵匪、娼妓、流氓。据北京农商部统计，1914年至1918年，4年之间减少农业户数1564万余户，平均每年约减少400万户。在政治上，农民被束缚于封建统治制度之下，毫无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奴隶式的生活。”这就是旧中国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严重性的深刻论述和“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的号召，使来自农村的学员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大增强了学员们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斗争的决心和斗志。他们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带领农民，团结奋斗，打倒地主豪绅，把贫苦农民早日从“宝塔的底基”下解放出来。

### 三 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6月，毛泽东在给学员的讲课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分析，在实际上说明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中国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各受苦阶级阶层的人民，而别的阶级阶层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经考察后向学员分析道：工人要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藉以改善经济待遇，那么，资本家手里的原料必须廉价、丰富，产品必须畅销。而原料是农民供应的，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他们就无法生产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又因农民是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若农民很穷，买不起工业品，则资本家产品肯定滞销积压。而如果资本家既无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又不能畅销其产品，甚至连工厂都有可能倒闭，那么工人哪里会有加工资减工时之希望。可见要想达到工人斗争的目的即要解决工人问题，必先待农民问题之解决。至于商人，即是从农村收购原料进城市，从城市运工业品到乡村，从中获得利润。如此便决定了商人与农民的密切关系：“农民既穷，则农业品也不好，商人购买亦难其选。再农民之购买力不足，则对于工业品当然不要。而工业品之销售多属于农民，农民既是如此，则商人亦遭痛苦。”可见商人事业的好坏也要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假如农民问题解决，则商人问题亦解决”。学生、兵士也与农民关系很大。假如农民问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参见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勳听课笔记。

参见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勳听课笔记。

题不解决，工业难发展，这样，学工业的学生没有工厂可容纳他当工程师，学商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去请他经商，学师范的则会因工农贫穷，子弟上不起学，也要失业。再者，农民问题不解决，兵士的衣食也必无人供给等等。这样，毛泽东就从各阶级阶层社会作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各受苦阶级的问题，但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换言之：“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国国民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为了帮助和推动国民政府加紧进行北伐的准备，早在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就专门讨论了如何准备北伐的问题。陈独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党必须加紧进行北伐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而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会议论证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提出党从各方面准备北伐，“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在这种积极准备北伐的形势下，这年3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后设立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民众运动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江西、湖北、河南、湖南、河北、山东等省是将来革命军北伐所经过之区域，目前应以全力注意这些省份的农民运动。为此，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了招生范围，向全国20个省招了327名学员，其中来自北伐将经过的几个省的学员即占了一半以上。这都说明了毛泽东充分注意到了在北伐所经之地区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对于北伐战争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也就是在北伐出师之际，党中央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应继续贯彻北京特别会议精神，放手发展工农运动，坚决支持北伐战争。但会议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接受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农民问题上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一系列限制农民革命斗争的办法。会议在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还提出要建立包括小地主在内的所谓“农村统一战线”的口号。会议还反对建立农民武装，限制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而且只能是防御性的自卫而不能是进攻性的自卫。对于北伐战争，这次会议也不是表示积极的态度。这样，形势就明显地出现了党的政策与客观要求严重脱离的状况。一方面是北伐战争需要农民运动的大力开展，需要全国工农运动特别是北伐将经过的地区的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需要各地农民起来推翻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根基——土豪劣绅、地主阶级。而另一方面却是党

---

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勳听课笔记。

毛泽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1926年12月20日）。

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金绍勳听课笔记。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1926年2月）。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案》（1926年2月）。

内右倾，不仅不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反而进行种种限制和压制。这样，农民运动的开展就将受到极大的局限，以北代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必定会受到严重影响。

就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发表了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针对党内右倾对农民运动所作的种种限制，他在文章的开篇便大声疾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认为，国民革命的最大对象就是乡村地主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压迫榨取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而他们之所以能压迫榨取农民，就是完全靠封建地主阶级对他们的死力拥护，否则无法实行压榨。因此，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者的唯一坚实基础，不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动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如果不大力开展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因此，那些“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毛泽东就通过反动阶级的依存关系，从更深一层揭示了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深刻说明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批判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正因为农民运动极端重要，决定着国民革命的成败，所以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连呼三个“要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他强调，尤其是要在北伐将经过的湘鄂赣粤直鲁豫皖等“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这样，毛泽东就再一次把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胜利直接联系起来，深刻论证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和研究农民问题、组织农民运动的紧迫性。

### 第三节 革命的元勋

北伐出师以后，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渐由广东移到湖南。湖南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

---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1日）。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1日）。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1日）。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1日）。

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从而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

## 一 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

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必须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他在讴歌农民的革命举动“好得很”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就是说，在中国农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为什么要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毛泽东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首先从革命形势上分析。1927年春，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湖南等省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变动局面。农会组织遍及全国16个省，会员达1000万人，湖南最为突出。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武装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被打破，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充分显示出了农民的伟大作用。这一农村大变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做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作用极大，影响极深，广大农民还积极组织起来大力支援北伐战争，而北伐的胜利进军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民运动。两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促使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革命又潜伏着严重危机。蒋介石正处心积虑篡夺革命领导权。他随北伐军进入南昌后，就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勾结一大批土豪劣绅和买办资产阶级，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他挑起迁都之争，妄图把南昌变成他的反革命大本营。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特别是掀起了一股攻击湖南农民运动的逆流。妄图从攻击农村大革命开始，来破坏和扼杀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党能认清蒋介石的阴谋，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紧紧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特别是发动和武装亿万农民群众，把已经出现的农村大变动局面推向前进，以进一步展示出农民主力军的巨大力量，则蒋介石就有可能顾忌于强大的农民力量而不敢发动反革命政变。退一步说，即使他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我们也会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反击。换言之，只要实现并发展这个农村大变动的局面，发动了强有力的农民运动，就有可能防御和反击蒋介石的政变，克服时局危机，把革命推向前进。可见，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实在是当时争取时局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防止时局可能逆转的关键问题，是革命胜败的关键问题。所以毛泽东断言：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国民革命要胜利，就需要这样一个广泛兴起的农民运动即农村的大变动。然而可惜的是，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页。

陈独秀压制农民运动，不许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他鄙视和看不起农民群众，不相信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只看到农民的保守性，落后性，而低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对农民的革命斗争处处压制和责难。“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这样，当蒋介石发动政变时，工农群众就处于毫无戒备、赤手空拳的地位而无力反击，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可见，要“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是毛泽东分析当时革命形势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其次从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目的上分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大敌人，“民主革命的中心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旧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大农业国。长期以来，封建地主阶级凭借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运用这个阶级掌握的反动国家机器，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生产力受到严重阻碍，贫苦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停滞不前。1840年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封建地主阶级又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忠实走狗，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同时他们又凭借帝国主义和军阀对他们的支持，来维护和巩固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而帝国主义为了便利其对中国的统治和掠夺，除了豢养一个买办阶级，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外，还需极力保持一个封建剥削制度，通过遍布广大乡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来压迫和榨取广大的中国农民，因此它极力支持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统治。军阀和贪官污吏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首领和政治代表。依据中国社会这些反动阶级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如果封建地主阶级在广大农村的反动统治巩固了，则帝国主义作为军阀、贪官污吏、封建地主阶级的“太上皇”的地位也就随之巩固了，反之亦然。所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要摧毁这种根深蒂固的反动基础和墙脚，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农民尽速获得解放，小小的一点力量，细细的一点动作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只有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才能打倒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彻底推翻农村封建势力的统治，也即摧毁几千年专制政治和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统治中国的基础和墙脚，进而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解放农民。反之，若无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农民也决然不可能最后得到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要真正打翻这个封建势力，真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页题注。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页。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页。

正使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就必须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

再次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上分析。1911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民主和独立辛勤奔走，领导了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这个革命只赶跑了清朝皇帝，却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久便流产、失败。失败的原因固然多种，然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没有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解决土地问题。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很大的软弱性，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不敢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同时资产阶级的本质特点还决定了他们同广大的劳动群众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害怕民众”，所以不敢发动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尤其不敢发动亿万农民群众起来开展农村大革命，触动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这就是他们的致命弱点。孙中山虽然提出过“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是他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就是反对用发动农民群众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的办法，而想用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的办法，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主张。这自然只能是空想。不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革命，不来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的伟大作用。所以辛亥革命后，当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稍一反攻，既软弱又孤立的资产阶级便因得不到农民这支雄厚力量的支持而很快败下阵来。而北伐时期湖南的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喜人的局面，“前后两个世界”。毛泽东正是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 二 “革命是暴动”

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的大变动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大变动就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何实现这样一场大变动？由于千百年来，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所以在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中，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要经过激烈的阶级大搏斗，使农民在政权、经济、武装等方面彻底推翻地主阶级，使“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使农民扬眉吐气，获得翻身。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进行推翻地主阶级的阶级大搏斗，其首先的和根本的问题同样是政权问题。毛泽东历来认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广大农民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得不到翻身解放，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这种反动政权在当时湖南的区有都、乡有团、村有牌甲等机构。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封建地主阶级就是凭借着这种反动政权践踏和欺压农民的。他们可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甚至杀戮，农民无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地主阶级还利用政权来竭力维护封建社会各种超经济的剥削。因此，要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首先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这是农村革命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只有这样，广大农民才有可能获得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思想文化上的翻身解放。毛泽东还通过同都市工人运动的比较，说明农民进行政权方面斗争的重要性。他说：“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农民斗争则不一样，“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湖南农民即是这样，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用极大的力量，推翻了地主的权力，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成了当时农村中的政治统治者，封建地主阶级成了被统治者。“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这种前后两个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赞扬，认为这种夺取地主权力的斗争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农民的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为此，他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农村大革命中，首先抓住政权斗争，这是符合农民斗争实际需要的科学结论。

农民进行政权方面的斗争，最终目的还是要获得经济上的解放。也只有使农民获得经济上的解放，才能真正发动和组织农民，夺取革命胜利，巩固革命成果。所以“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包括经济上打击地王，争得农民的经济解放的内容。在彻底打倒地主阶级、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条件尚未成熟时，要引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减押、增加雇农工资，反对退佃，反对囤积居奇等方面的斗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觉悟程度的提高，就有必要及时开展农村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民分得了土地，则诸如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提高，农民经济上的解放，就都迎刃而解。农民也会把获得了土地这一最大的经济利益当作革命胜利果实予以保护，就会有参军参战的积极性，革命

---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5 页。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 页。

胜利才有可靠希望。由减租减息进到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国民革命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减租减息，还是增加雇农工资，还是反对退佃、反对囤居，更不用说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了，地主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服从农民协会而自动放弃经济剥削的，非来一场迅猛异常的暴风骤雨式的农村大变动不可，非如此则农民不能翻身，革命不会成功。前述的辛亥革命就有这方面的教训，它证明以改良的办法而不实行农村的大变动、大革命，农民是不可能得到经济解放的。

要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决不是赤手空拳所能成功的。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利益，都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来夺取和巩固。因为地主阶级决不肯轻易退出统治舞台，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来一个农村的大变动，除了政权、经济斗争外，还必须包括摧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武装斗争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被统治阶级若不采用革命暴力，不进行武装斗争，就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获取政权，这是一条普遍的历史规律。当时的农村大革命当然也不能例外，它也是一场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大革命。所以，建立农民武装，实行暴力手段也是同样必须的。1927年春毛泽东在湘乡考察农民运动时，从工农商学妇等群众组织那里了解到没有“兵”这一项，就对县农会委员长说，没有武装，农民运动就是空洞的，就没有根子。这就指出了武装斗争在农民运动中的极重要地位。所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号召。在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湖南农民包围攻打地主反动武装团防局，强行缴械。当时全省共有地主武装的枪支4.5万多支，大部分夺到了农民阶级一边，这些武装后来一律改为在农民政权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的“挨户团常备队”（这种武装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夺取，变成了反革命武装）。这是建立农民武装的一个方面。此外，农会还普遍建立了另一方面的新的武装——令地主阶级看了就打颤的梭镖队。这种摧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举动，既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个农村大变动的保障和后盾。换言之，不建立这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而让地主仍把持武装，就算不上来了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即使有一个大变动，其成果也会转瞬即逝，毫无保障。

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争取农民经济利益和建立农民武装等三个方面关于农村大变动的内容，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发展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阶段的标志。

### 三 革命的主力军

农村需要一个大变动，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根基，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是，这种革命，不能靠某个伟大人物的恩赐，也不能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依靠城市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辐射，而必须依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猛烈的进攻。因此，毛泽东在韶山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火种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这一火种，很快燃遍了神州大地，在全国许多省，特别是在湖南掀起了一场扭转乾坤的农村大革命。这种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根基，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视，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

很”。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指责、非难农民运动。

为了掌握第一材料，以事实回击这股逆流，把农民运动更加推向前进，于1926年11月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前夕，应湖南第一次全省工农代表大会的邀请，于1926年12月17日由武汉回到长沙，亲临大会指导工作。在两个代表大会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再次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2月28日，在两个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典礼上，毛泽东又发表了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讲。他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严厉斥责了“情农运动”之类的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这就大大鼓舞了代表们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勇气和斗志。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通过了40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革命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解决土地问题。大会号召全省农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击退反革命逆流，推翻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求得自身的解放。这次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取得了圆满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对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为期32天的考察。毛泽东所到之处，耳闻目睹，顿觉一新。与在长沙、汉口的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他欣喜地看到：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鸟铳一呼百应，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每到一地，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驳斥党内外的攻击和指责。他特别赞扬衡山农民敢在湖南军阀赵恒惕埋袍衣的地方闹革命；称赞白果妇女破旧规进祠堂和族尊老爷平起平坐喝酒是革命行动；称赞农民踏上土豪劣绅少爷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等一些人所谓的“过分”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是非常之需要的”；他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农民抓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的兴奋自豪情景，表现了对此莫大的赞赏和欣慰。他宣告：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是乡村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造反。因此，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完全必要的。他热情讴歌农民做到了孙中山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业，称赞农民的举动“好得很”。他用诗人般的激情，呼唤农民革命的风暴冲刷山河，涤荡尘垢。他高兴地预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对农民运动的赞赏与歌颂之声，希望与期待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在此之前，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还从未有人

以如此高昂的激情，如此明朗的态度，如此一往情深地赞颂过农民！对此，美国学者特里尔认为，毛泽东使农民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计划中占了中心位置，这一点是任何人甚至列宁都不曾提出的。从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满腔热情的态度来看，这种评价并不过分。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曾参加过田间劳动，与贫苦农民相处甚多，十分熟悉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痛苦。但囿于时空的局限，那时还不可能达到深层次的理性认识。正如他在农讲所给学员们讲课时所说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晰”。对农民的生活总是认为艰辛、贫穷、痛苦。但也曾闪过商人是在国民中感受军阀外力二重压迫的痛苦最敏锐最迫切的阶级的看法，因此认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据此，他对革命联合战线中国民顺序的排列也曾以商人居首。如他说：在帝国主义军阀两重压迫下的中国环境里成就革命大业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然而从事了韶山农民运动和“注重研究农民问题”后，使他看清了蕴藏在农民中的非同小可的革命力量，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这种以商人居首的国民顺序排列，也为农民居要位甚至首位的“农民工人兵士学生”、“农工民众”、“农工商学民众”或“工农兵学商”等所代替。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排列上的差异问题，而是明显体现出毛泽东在阶级分析和阶级估量上的变化。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也由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要问题而上升为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则更使他对农民力量有了充分、准确和科学的估量。即由过去认为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革命的援助者而提高到农民是“革命的元勋”、“革命的先锋”来大力歌颂。不久更进一步上升到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了。把农民摆到国民革命主力军的极重要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进一步产生了新的飞跃。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巨大力量的估计，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的认识，常常是从两方面来分析的：其一，人数；其二，革命性。当时“中国人口四万万，农民占有80%，当有三万万二千万以上。在人口上看，我们就不能否认农民问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农民不仅人数多，而且有很强的革命性。如前所述，农民是社会宝塔的底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掠夺、盘剥与压榨，所以改变现状、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的要求特别迫切，革命积极性特别高。只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就能发挥出无可比拟的巨大力量，正如毛泽东等指出的：“农民因求解除剥削，而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现实斗争也已显示了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巨大力量：农民革命一起来，地主阶级即威风扫地，

---

摘自农讲所学员冯文江的听课笔记（1926年6月）。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1923年7月11日）。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1923年7月11日）。

《农民运动》1927年26期。

据农讲所学员金韶勳听课笔记。

毛泽东等：《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农民运动》1927年第26期）。

农村即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简而言之，农民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所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必须依靠这个农民大群众。没有他们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这就是毛泽东分析农民的力量和革命要求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孙中山有着质的区别。如果说同毛泽东一样，孙中山也同情农民的痛苦而立志拯救斯民于水火的话，那么二者拯救的道路却截然不同。孙中山依靠的是少数他所谓的“先知先觉”的革命精英，走的是“贤人政治”、“英雄政治”的道路。而毛泽东却是把农民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实现社会政治革命，他既是“为了农民革命”，又是“依靠农民革命”，走的是以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为主体的民众革命道路。如果说马克思认识到工人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更是推翻这种使他们受苦的黑暗制度的巨大力量的后，那么毛泽东则是从中国情况出发，深刻认识到农民也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更是一支推翻使他们受苦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如果忘记了农民这支主力军，“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页。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第63页。

## 第六章 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从农民中寻找革命力量的思想，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没有被全党所接受，造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周恩来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党领导武装革命的第一枪。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秋收起义，把革命的红旗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又在斗争实践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指明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必由之路。

### 第一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特点，通过对我党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刻反思，明确地提醒全党：“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此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 一 专做民众运动的教训

当毛泽东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中国革命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主张用“急烈方式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进行革命。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仍然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强调了暴力在革命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应该承认，我们党一开始也认识到了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并且在我党成立之前已有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同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政局是军阀专制、武人统治和军阀混战。要革命，要打倒武装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必须经过革命的战争。所以，1922年6月，即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曾明确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为此，必须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对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还不懂得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下，毛泽东等党内的这些认识没有成为党的路线和指导方针，党没有认真地组织军队和准备战争，而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是致力于工农民众运动。

诚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大力气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这也是必要的。然而，残酷的事实表明，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离开武装斗争，群众运动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只搞民众运动而不组织军队、准备战争，其结果就吃了大亏。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革命》一文中就表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我们亦说要革命，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国际资本主义，然而要怎样下手去革命，怎样去打倒军阀与国际势力，我们全没有一点的把握。我们亦说要夺取政权，然而从来不曾研究如何运用政权的问题。”当自己没有经验的时候，当然就只有借助于前人的和别人的经验。而在当时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主要的只有两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或叫教训；一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然而当时党的领导人并未全面地和正确地对待这两种经验。关于辛亥革命，陈独秀、彭述之都分别写过不少文章。他们把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不宣传、组织群众，专心致力于军事运动，而这种军事运动又主要是靠会党、土匪、军阀的力量来进行，因此，总是失败。陈独秀等人从这种认识出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要求国民党“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到民间去，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从辛亥革命及以后没有发动群众而屡遭失败的教训中，得出连军事运动也不能搞的结论，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此借鉴和吸取教训，必然会影响我党对革命武装的掌握。对于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陈独秀等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步骤是：第一是宣传群众，第二是组织训练群众，第三是武装暴动。中国也应照抄照搬。但是，他认为中国当时还未到武装暴动的时候，因此不能搞军事行动，只能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很显然，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由于未能正确对待辛亥革命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时中国共产党只能搞群众工作即民众运动，不应搞军事斗争。结果就造成了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的现象。这种只应搞民众运动，不应搞军事斗争的观点，在1924年10月《中国青年》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林根的文章《军事运动与革命》中反映得非常典型。他说：“他们（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只有军事运动，没有群众运动。结果，军事运动造出许多军阀，遍地兵匪，酿出十几年来大乱，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教训么？再看俄国的十月革命，多数派以前只是尽力向民众宣传他们的主义和政策，团结农工阶级，到革命行动时，他们就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马上就把旧政权推倒……”。据此他说：中国革命运动，此时还是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不应该作军事运动。”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军队问题上的态度就是：第一我们自己不搞。在北伐开始前后，本来有很多机会可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势力，但陈独秀明确表示，不要组织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他只同意组织工农自卫军，工农武装不能超过自卫的范围，且只能是防御性的自卫，不能是进攻性的自卫。这样，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第二是帮助国民党搞。陈独秀极力主张所谓建立、发展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为此，我们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结果，使蒋介石、唐生智的势力，以及其他一些名为国民革命军、实则是军阀的势力得到了发展。第三是妥协退让。陈独秀对于国民党右派和右派军人，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于他们

反共、反工农的要求，一味妥协退让，幻想拉住他们不破裂统一战线，结果使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轻易地夺去了军权。蒋介石叛变后，陈独秀又拉住汪精卫集团，为适应他们的要求，极力限制和压制工农运动，甚至主动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收缴劳动童子团的棍棒。但这样并未也不可能拉住汪精卫集团，反而更助长了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使他们更有恃无恐地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里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把民众运动与军事运动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民众运动，忽视对军队的争取，以致使民众运动失去中心支柱，失去保障。这样，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旦叛变，党就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而使革命归于失败。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期间的教训时所指出的：“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历史无情地宣告了陈独秀只要民众运动、不抓武装斗争路线的破产。

我们说这个时期党对掌握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当然并非全党如此。仍有不少同志当时就觉察到共产党掌握革命武装、特别是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即是突出的代表。毛泽东从党成立到1924年主要从事党务工作、工运工作及统战工作，但对农民和武装问题还是关心的，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从1924年建黄埔军校起，我党开始对军事问题的重要性有所认识。然在此之前的1923年8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密令杭州警备团的金佛庄，要注意作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并要设法保存实力。据茅盾回忆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作出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问题。”

1925年“五卅”运动起全国掀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直接推动了广大农村农民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南部和中部各省农民，开始和军阀土豪劣绅进行激烈斗争，这对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有重大影响，使大家对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初步形成了北伐期间要使军事斗争与农民斗争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在“五卅”运动之后，一方面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斗争与农民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北伐之前的192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上提出议案，强调“目前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即按照同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的精神，在北伐经过之区域要预备民众特别是农民组织的奋起接应。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这年3月，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讲习所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他不仅对学员进行关于中国革命理论和农民运动的教育，而且还进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明确指出建立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他说，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这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篡夺军权的“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力主反击，认为对蒋介石如果“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事后他还与周恩来一起建议，把被迫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这些主张、建议都因陈独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

转引自《江淮论坛》1984年第5期，第39页。

《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307页。

秀的右倾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扩大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让蒋介石实现了篡夺军权的阴谋。

北伐出师后，毛泽东针对北伐中国国民政府单纯搞军事斗争而忽视和压制农民运动的问题，尖锐指出，单纯搞军事斗争而忽视农民运动，不重视武装农民打倒乡村封建阶级，将会给革命带来严重危险。另一方面，他高度赞扬海丰农民的斗争成就。在彭湃的领导下，海丰农民坚决反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特别是组织了农民的常备军，摧毁了地主豪绅的武装。在两次东征中还配合军队平定了叛乱。第二次东征到达海丰之前，他们还依靠自己的武装，占领了县城，推举了县长。毛泽东认为，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算得上革命的胜利，或者说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可见，毛泽东是把共产党直接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夺取革命胜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方向。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1月在衡山考察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共产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的团防局、警备队现在已改成自卫军了。要把这些武装真正掌握在我们手里，就要加强党的领导，派党员到那里去做政治工作，把他们改编过来。否则，那就是换汤不换药。他高度赞扬农民建立起来的使土豪劣绅看了就打颤、就发抖的梭镖队。在这次考察中，他高兴地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建立了武装，掌握了广大农村，突破了中央原来所谓的农民自卫军非战时状态不得常备的限制。他公开提出常备武装与非常备武装相结合和“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实际上就是要建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民武装，以占领农村阵地。在武汉时期，他仍一直关心农民武装的问题，不仅对中央农讲所学员加强军事训练，还把他们的武装起来去帮助湖北镇压地主叛乱，参加保卫武汉、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他对北伐尚未克复的河南农民武装也很关心，亲自参加河南农民武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湖南农民运动情况。1927年4月，第二次北伐誓师后，毛泽东又建议成立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便加强各地方农民武装的联合和壮大。同时，为了解决北伐的兵源问题，他还提出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来吸引农民参加作战以增加革命生力军的深刻见解。这实际上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成分，使农民群众的武装能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国际不允许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条件下，毛泽东却大力推动组织农民武装，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以便一旦时局发生变故，就可将农民武装改为正规军队而与敌军相对抗。尽管毛泽东的主张并未形成全党的共识，但是对湖南却有一定的影响。1927年3月，湖南省农民协会颁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4月中旬，省农民协会通令各县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整顿原有自卫军组织。仅至5月份，全省就建立了近50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其中配备步枪的农民自卫队员就有8000人。如果当时能认真整顿，加强组织性，提高战斗力，就能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以应付突然的事变。由于平江、浏阳的农民军这

样做了，所以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仍能在湘赣边坚持武装斗争，后来还与武昌警卫团会合，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的基本部队。如果各地农民运动都能如此，革命就会是另一种局面。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农民问题特别是武装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右倾错误。他针对大革命时期专做民众运动而招致失败的血的教训，特别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在改组后的湖南新省委讨论秋收暴动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掌握革命武装对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秋收暴动必须是军事的暴动，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暴动就可以起来了，否则终归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抗战期间他还反复重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并多次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从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走上了从事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直至夺取全国革命政权。

## 二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和最为重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一，吸取了历史的教训。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中国的出路曾有过各种设想，曾主张“无血革命”和“呼声革命”，而不主张“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但是后来他参加领导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而在反动政府的反革命武装统治下，要想确立“政治权力”，则“群众的行动”就必定要是暴力的、武装的，可以说，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意识到了群众暴力斗争重要性的问题。

毛泽东早年上述实践活动的失败，也不能不引起他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孙中山的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借鉴。他看到：孙中山认识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后，就十分重视对清政府实行“武器的批判”，即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从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孙中山就领导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

---

参见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参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义。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更是接连进行武装起义，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清王朝，就埋葬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着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近代中国的封建割据局面，就是由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造成的。而一些没有军队的政党，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这些史实使毛泽东认识到：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求解放，同样必须组织军队，拿起枪杆子，才能推翻反动统治，夺取革命政权。

第二，掌握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理论。

马列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无产阶级只有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而要进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许多精辟论述。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恩格斯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列宁在谈到国家消亡的规律时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他又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斯大林关于武装斗争重要作用的观点也是非常鲜明的。他说：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对资产阶级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要进行暴力革命，如果“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人民的发动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是武装起义”。对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斯大林也有过深刻见解，并多次为毛泽东所引述。

关于“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是十分突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最先读到的和受影响最深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之一。据1936年他自己的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344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页。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列宁全集》第8卷，第528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卷，第15页。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4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63页。

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就是他 1919 年冬至 1920 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读的，其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另外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也正是在这期间，他还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事情的文章。于是在这年冬天，他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下，“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这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即中国也必须走俄国人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可见，接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是毛泽东最早认识到枪杆子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基于对国情的深刻分析。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适应于中国和外国普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然而就无产阶级政党执行这一原则的表现来看，却会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全凭武力和枪杆子说话。无产阶级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相反，主要的和差不多一开始就面对着的是严酷的武装斗争，是流血的战争。对这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显著不同的国情，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很深的见解，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切身体验。在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湖南军阀赵恒惕先是伪装拥护“湖南独立”运动，但待他通过这一运动达到了赶走军阀谭延闿的目的并篡夺了对湖南的控制权后，就“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1920 年，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组织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示威游行，当时手无武装的示威者试图在会场升起红旗，但遭到军警禁止，“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 12 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但不听，而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可见，封建军阀用来对付人民的只是赤裸裸的暴力，向封建军阀讨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革命群众对付反动统治者也就只能以暴力对暴力，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舍此则无理可讲，无章可循。此后，北洋军阀的凶残，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死于他们血淋淋的屠刀之下，更使毛泽东看清了中国这一特殊国情。井冈山时期，严酷的斗争实践使他进一步看到：“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而在此之前陈独秀却“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未弄清中国的国情，看不到武装斗争在中国的

---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9 页。

参见《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8 页。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3 页。

极端重要性，不抓枪杆子，结果招致惨败，吃了大亏。毛泽东正是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和切身体验中发现了这个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失去了党和人民的一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第四，党内同志的有益启示。

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的深刻见解，也离不开党内同志的共同探索。瞿秋白就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指出：中国的问题有一个革命的解决方法，拥护平民自由的武装革命和团结军民奋斗的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相互作用。还指出：要以平民的社会实力组织国民军。在“五卅”惨案的血的教训下，瞿秋白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他接连发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等文章。他针对敌人的武装镇压而激愤他说：“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未运。”这就明确揭示了一个真理，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革命群众必须要有武装自卫之权。而一旦掌握了革命武装，敌人也就未日来临。北伐前夕，他又撰写了《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等文章，进一步阐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他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进一步分析，只要发动中国失业的农民、工人、小商、知识阶级，即可成为革命军队的主体；争取改造旧军队以及在国外无产阶级援助下“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武装”，综合这三方面即有“造成革命军队的可能”。北伐以后，他针对蒋介石的阴谋篡权活动的日渐暴露和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进一步探讨了共产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问题，提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应是中国共产党，这样才能将中国革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从瞿秋白支持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和下文将要提到的后来瞿秋白邀毛泽东在党中央工作等情况看，瞿、毛二人关系是密切的。更重要的是，从瞿秋白当时在党内的理论影响和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来看，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不可能没有受到瞿秋白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的。周恩来对武装斗争重要性问题也有重要论述。他曾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又说：军队是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者“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此时蔡和森、恽代英等也都对武装斗争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蔡和森特别强调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他认为国民政府掌握下的军队是靠不住的。“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之可能”，“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其实这就是强调建立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北伐后他批评陈独秀不注意掌握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4页。

《瞿秋白选集》第171页。

《瞿秋白选集》第282页。

《瞿秋白选集》第284页。

参见《瞿秋白选集》第284—285页。

周恩来：《军队中政治工作》，1925年6月2日。

《蔡和森文集》第767页。

军队，蒋介石却广泛搜罗，放手扩充自己的军队。而我们却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大革命失败前夕，蔡和森因病在毛泽东家中休养时，又一次向党中央提议要“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否则“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向中央尖锐指出，我们必须保存武力。“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意见和建议，未能引起陈独秀的重视，革命武装未能建立。后来事变果来，无力反击，终致失败。然而从革命发展的进程中却清晰可见，毛泽东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确实是离不开许多有见地的共产党人的可贵思想和共同探索的。

## 第二节 “逼上梁山”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曾与国民党政府要人陈立夫趣谈上山打游击时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段趣谈，一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露和批评；另一方面，也恰当地喻出了我党上山进行武装斗争的背景、原因。

“八七”会议以后，城市武装起义屡遭失败的严峻形势，把毛泽东逼上了井冈山。他利用反动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造成了“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势。

### 一 城市中心论的破产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党认识到，武装工农，军事训练，“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如前之述，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深刻总结教训时就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陈独秀拒绝武装工农、不要兵权、“专做民众运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就在组织上使党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可能。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我党就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只重视民众运动而不重视武装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武装斗争究竟应在哪里搞，以哪里为中心，也即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究竟应走一条什么样的具体道路才是正确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16、134页。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4页。

参见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大革命失败后，关于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开始时全党都有些茫然。当时只能把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榜样。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 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因此，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南昌起义就曾希图重走北伐战争时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的道路，结果失败了。“八七”会议上，由于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的愤怒，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滋长了“左”倾苗头。把“暴动要有一定条件、反对在不利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主张，一概斥为“胆小怕牺牲的机会主义余毒”。这种“左”倾情绪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1927 年 10 月 10 日和 23 日，中央连续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号召工农贫民兵士“团结在工农暴动的旗帜之下”、“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的政府，暴动建立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这两个文件表明，“八七”会议所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此时已演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左”的方针了。而且，中央这些越来越“左”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在党内很少受到反对和抵制，“左”的拼命主义情绪在全党几乎普遍地存在着，从而到处出现不顾客观条件而盲目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其中突出的有：武汉暴动、顺直大暴动和上海暴动等，在实际工作中，给党造成了许多损失。当时党内瞿秋白等人不但没有认真总结这些失败的教训，反而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革命不是处于低潮，而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

由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发展，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瞿秋白等人的主张，在各地得到了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农村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在贯彻 11 月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央常委讨论并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命令广东省委坚决地发动“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并规定总暴动的中心和重点是夺取广州。12 月广州起义爆发，并占领广州。本来，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趁粤军主力回到广州之前，把革命武装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结果起义军被迫同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的军队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几乎在广州起义的同时，湖南省委指导长沙市委发动了一次城市工人武装起义——长沙“灰日暴动”，也很快归于失败。省委及长沙市委机关 10 余处先后被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等

被捕牺牲。在这之前原准备的武汉暴动则根本没有发动起来。

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惨败；而大革命失败后，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发动工农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而结果还是失败呢？这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思考：中国革命、武装起义究竟应走什么样的具体道路，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到底在哪里？

对此，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上山造势。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讨论湖南农民武装问题时就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所谓“上山”，就是在敌强我弱、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将弱小的革命力量从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撤出，到敌人鞭长莫及的农村区域或革命基础较好的山区去保存和发展自己。所谓造势，就是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造成星火燎原之势。

毛泽东上山造势的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早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生裂痕的时候，毛泽东就对“上山”有所考虑。他曾对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讲到统一战线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时说：我是有打算的，实在不行我要带农民“上山”。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后，毛泽东更明确地主张“上山”。1927年5月许克祥叛变革命后，他又对由湖南来武汉请示工作的同志说：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6月，毛泽东回湘担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便对工农武装作了上山安排，并多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还派郭亮等得力干部下去督促。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力主农民自卫军“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交朋友。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毛泽东也曾提到：我们的人不多，就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要干锤百炼，要能走路，要上山为王，还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秋收起义前夕，有人曾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队伍去广东。对此，毛泽东态度仍十分明确：“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认为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又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他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毛泽东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又说：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打圈

---

参见《江西党史通讯》1987年期10期第9页。

据袁任远的回忆。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24页。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第20页）。

《钟期光同志谈话记录》（1977年10月）。

毛泽东1927年8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据何长工回忆。

圈，8年都没被消灭，我们也要“就地打主意”。

总之，从大革命失败前夕到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反复考虑了上山问题，仅根据现有资料，他就9次提到上山问题。因此，当1927年9月，各路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各路起义队伍到浏阳文家市会合。在9月19日晚前委在文家市开会讨论进军方向时，他就实际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原来“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前进、向地图上像眉毛一样的地方（即山区）前进的主张。20号早晨，毛泽东集合部队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然后，部队撤离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向南进发，从而开始将毛泽东关于“上山”的思想付诸了伟大的实践。

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将秋收起义的革命大旗插到了井冈山上。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方圆550多里。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为革命军事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里物产丰富，资源充足，“千山竹，万山木，走路不见天，一望不着边”。大小五井一带虽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但周围各县多稻田，盛产粮棉，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力，可供应部队给养。而且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优越。因此井冈山地区“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后，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首先，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工农革命军初到井冈山时，周围各县的党组织完全被破坏，政权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群众的情绪因大革命的失败遭受过严重挫伤。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首先必须恢复和建立各县的党组织，工农革命军10月底到达井冈山，11月上旬前委便在宁冈茅坪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重建党的组织。11月底，中共茶陵县委首先恢复建立。1928年1月上旬，由毛泽东主持在遂川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遂川县委。同年2月初成立了永新县委，2月下旬成立了宁冈县委。同时还分别于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莲花县特别支部和酃县特别区委（3月改为县委）。这样，边界各县都建立起了党的组织。5月，在宁冈茅坪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这时边界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增加至一万余人。

与此同时，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农革命军到达边界各县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暴动，打倒土豪劣绅，分配田地浮财，帮助群众恢复和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进而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底，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下旬，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王次淳被推选为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遂川县的《施政大纲》，亲自参加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大会。这一天，群众喜气洋洋，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进县城。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起草的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至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毛泽东在会上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农民出身的王次淳，前天还在地里挑大粪，今天被选为县长，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他号召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红色政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成

立后，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规模更大的打倒豪绅的斗争，推动了全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加速形成。2月下旬，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永）新遂（川）边陲工农兵政府也于此时成立。至此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边界武装割据局面业已形成。同年5月和6月，又分别成立了永新县和酃县、莲花县工农兵政府。5月下旬，在茅坪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其次，加强革命武装的建设。在工农革命军内部的建设方面主要是，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对部队的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工农革命军还十分注意帮助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和前委对井冈山上的原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进行了团结、改造工作，将他们的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王佐分别任正、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此外，在工农革命军的帮助和指导下，边界各县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从而使得边界的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四军。这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上的革命武装力量，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但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多次进剿，均被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打败。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总结的：“4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6月的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和遂川、酃县、安福、吉安各一部。边界割据局面进入全盛时期。

实践斗争检验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正确性。山上的红军与某些仍在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的武装力量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起义连遭失败，而红军在山上却进退自如：在这山打了胜仗，便翻到那山休整；等敌人跌跌撞撞追到那山，红军则以逸待劳，趁他们喘息未定，突然一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又迅速转移到山的另一面，练兵和发动群众去了。这样三番两次，敌人前后挨打，拖来拖去，晕头转向，只好溃退或被消灭。然而在这样翻山越岭拖着敌人打时，战士们一方面充满胜利的喜悦，另一方面也由于行军作战极频繁，山高路长，从山下到五井要爬一整天。于是也流露了“翻山怕苦”、“打向城市”的思想和对井冈山的埋怨。在这种思想情绪一露头时，毛泽东就及时给予批评与开导，以通俗的语言阐释革命的道理。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井冈山虽然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利我们机动，便利我们打击敌人。我们有井冈山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这样，敌人的吹嘘就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

会变为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上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摸索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关键一步。它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它既在险恶的形势下，保存了党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又以这些革命力量作为党和红军的种子，在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逐步扩大和发展。这种保存和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退却与进攻结合起来的关系。从退却来说，是一次有计划有阵地有秩序的退却，是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从而保存了革命实力，找到了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阵地。从进攻来说，这是一次有目标的清醒的大胆的进攻，是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这就严重动摇了反革命统治的基础，给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极大的困难，这种由城市转向农村，将保存与发展结合、退却与进攻结合，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与客观规律，是复兴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 二 红色政权理论

对于实践上已经走出的这样一条正确的新道路，在理论上还并未为全党所接受和认识。当时主要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左”倾盲动主义：脱离中国实际，一味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认识或拒绝承认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意义，因而沉醉于城市暴动。“左”倾盲动主义强令井冈山部队去攻打强敌固守的城市，造成了井冈山上因强敌反扑而导致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到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强敌的“会剿”，再加上根据地物质生活的艰苦，于是跟着就出现了另一种错误认识即右倾悲观情绪，不相信根据地能在农村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主张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分城乡而在一切地方，实行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就成了全党和广大革命群众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必须回答的问题。不回答这个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在1928年10月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即是其第一部分）的决议，和同年11月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总结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政权理论。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些原因和条件主要是：

其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

---

参见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见《回忆毛主席》。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中国社会经济中，基本的经济形态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即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这就为红军在根据地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深了各自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他们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种军阀混战一方面给人民造成了灾难和痛苦，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他们本身的力量，而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可乘之机，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就能乘军阀混战的空隙，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坚持和发展起来。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大有回旋的余地。

其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的存在，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并能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大革命时期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方的革命群众，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都曾经开展过斗争，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

其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是又一个客观条件。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形势也就随着国内豪绅买办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其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红色区域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白军的进攻。而有了坚强有力的正式红军，便能够造成长期的日益发展的武装割据局面。

其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日益巩固的一个最“要紧的条件”。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并正确实行“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由于边界的党实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并进而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在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力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战略阵地和依托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也即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也是使红色政权能够坚持和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确立，无疑是对“上山”思想的重大发展，它解决了革命武装力量“上山”之后向何处去和能否继续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存在和发展下去的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从防御逐步转为进攻，保存和扩大自己，即弱小革命力量上山之后的出路问题。同时，这一理论及其形成过程，也为后来进一步寻找一条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了充分的实践准备。因此，红色政权理论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第一个根本前提。如果说“上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危急形势的逼迫即客观条件所致的话，那么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则说明毛泽东已从主观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要想继续革命，不但必须“上山”，还必须“下乡”，即去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积蓄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建立湘赣边界较小范围的农村根据地之后于1929年初。和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进到了赣南闽西更广大的地区。这使毛泽东的政治视野更开阔了。“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瑞金民众如火如荼的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他进一步看清了军阀混战的形势，坚定了创造农村红色政权和发展红军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一起，利用军阀混战的空隙，集中红军主力行动，在地方党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援下，以矫若游龙之势，在赣南闽西地区往返游击，“坚决奋斗”，“不但敌人无奈我们，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红军打垮了闽西和赣南的地方土著军阀势力，从3月到6月，即初步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这两大根据地的开辟，使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写了《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红军必须确立以赣南闽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方针；并向中央建议：“不仅在湘赣闽粤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还特别提出：“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这说明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范围已由原来的湘赣边六县而大大扩展了。

同年3月底，红四军回师赣南。4月3日，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央2月9日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这次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信中对红四军领导作了不适当的指示：“你们应有计划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还认为：“自然，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农民的武装将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来信还提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方便。”为了“隐匿大的目标”，认为“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接到中央来信后，前委即进

---

《前委来信》（1929年4月5日）。

《前委来信》（1929年4月5日）。

行了讨论。毛泽东在3月给中央报告的思想基础上，于4月5日在瑞金以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对中央的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央来信对形势的估计太悲观了。“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复信特别强调了进行农村根据地斗争的重要性及进一步扩大割据区域的必要性。复信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

“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复信重申：“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一大地区的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并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以一年为完成此计划。”

毛泽东3月给中央的报告和4月给中央的复信，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新发展。比他以前创造湘赣边界红色政权时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它超出了湘赣边界根据地六七个县份的比较狭小的区域，进一步提出在包括闽西赣南20余县较大范围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在江西南昌四周的广大农村首先实现一省割据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造成割据的设想。因此，对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文件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意义，是不应低估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即是这两个文件提出的战略构想的实践结果。

当然，这时毛泽东关于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思想，仍未上升到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全国革命斗争胜利的直接联系，仍未提出以农村为中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也即还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

### 三 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以在赣南闽西扩大根据地的思想为“前进的根基”，进一步发展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在这一基础上，他于1929年召开了古田会议。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文章分析、纠正和澄清了当时党内对农村根据地党的性质的非难和根据地内部存在的“红旗能够打得多久”的疑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涌现了一大批农民先进分子，使红军和根据地增加了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

---

《前委来信》（1929年4月5日）。

《前委来信》（1929年4月5日）。

《前委来信》（1929年4月5日）。

《前委来信》（1929年4月5日）。

这不仅引起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非难，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怀疑。这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吸收大量农民出身的党员，是否会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削弱或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呢？换言之，以农村为中心能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呢？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主要的是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的问题。列宁早就指出过：“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是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里，“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影响到党内。即便是工人党员，也容易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中国党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使党员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建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如果这样，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党员也可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反之，如果不以马列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不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没有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那就不光是农民党员，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也未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工人出身的党员也无时无刻不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思想教育。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固然要加强思想教育，对工人出身的党员也要不断进行思想教育。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强调要对党员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坚持对农民出身的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加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从而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员，“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因而能坚持在生活艰难、战斗频繁的情况下，红军仍“维持不敝”。这说明，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农民党员也是可以变为先锋战士的。在井冈山时对红军内党的思想教育已有注意，有所成就，但这并不是说就已解决好了思想建党的问题、解决好了在农村仍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问题。后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发展，农民成分进一步增多，红军共产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不断涌现，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增多而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即思想教育的削弱所造成的。

为了加强党和红军的思想建设，克服红军中和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

---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1页。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强调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大家起来彻底肃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的中心问题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会议规定了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办法。强调首先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党的领导机关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肃清流寇主义”，努力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红军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以保证在农村环境中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即革命以农村为中心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下决心整顿党的组织，规定多从战斗士兵中发展党员，重新规定了党员的入党条件。并规定将不符合党员条件、屡犯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党员清洗出党，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保证党的组织能切实发挥对军队的领导作用。

这样，毛泽东就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革命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保证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就为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正如周恩来曾指出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只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出以乡村为中心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结论来。

与党内对农村党的性质的非难相联系，在井冈山根据地内部，也提出了“井冈山的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虑。其核心，还是一个城市中心论。对此，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讯，实际上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0年新年前夕，林彪曾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尤其是反对毛泽东关于争取江西的计划，“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针对林彪的这种错误主张，毛泽东在信中直截了当地严肃指出：“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在信中不仅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应在城市的重要思想，也即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国胜利的思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在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时写的。由于古田会议决议成功地解决了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中“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的问题，也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个关键问题。也由于古田会议前夕中央的“九月来信”中曾正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因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就有根据、有把握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大必要性。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红军是“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既然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从而夺取全国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力量是次要因素或配合力量，那么党的工作重心当然就应该放在这“最重要因素”——农村根据地方面。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而不是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毛泽东的这一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同时，毛泽东在信中还批判了“城市中心”的思想，指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说：“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突破了“城市中心”的框框，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思想，由此得出了同“城市中心论”者相反的结论，即：要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全国胜利，就必须在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城市。可见，1930年1月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

---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业已形成。

尽管 1930 年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实际形成，然而 1930 年期间毛泽东仍起草过或签发过一些有关攻打中心城市文件并有领兵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行动。如 1930 年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提出“夺取江西全省”和“攻打南昌”的口号；1930 年 6 月 25 日，毛泽东领衔发布了“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通电并率领红一军团由汀州向南昌进军等。对这些事实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二七”会议虽然不适当地提出了攻打南昌的口号，但从“二七”会议的内容及红四军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个口号仅是宣传的口号，而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次会议的实际主张是把党的工作放在农村，通过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基础上再努力造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之势，这同“左”倾思想的城市中心论是完全不能等同的。也正由于他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所以他一再受到李立三统治的中央的批评。说他“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认为‘农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第二步，这理论反映了农民意识’”。至于 1930 年 6 月的汀州会议接受中央进攻南昌的意见，对此我们也可以具体分析。朱德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曾谈及此事。朱德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当时“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可见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方案是怀疑的，是被迫接受的，这种组织上的接受和服从并不表示他思想上改变了“农村中心”的观点而接受了“城市中心”的观点。红一军团进军南昌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郭化若回忆：7 月 11 日由兴国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时，“只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实际并没有部署攻打南昌”，占领樟树后就决定西渡赣江，“并不乘胜北上攻打南昌，反在 8 月 1 日派少数兵力在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八一示威任务达到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筹款。”朱德 1944 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次部队没去打南昌，而只在牛行车站打枪示威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的事也作了类似的回忆。并说：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因为“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总之，在我们对毛泽东 1930 年期间发布的有关文件和行动联系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后，我们仍可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结论。

### 第三节 建设一支新型的军队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由于不堪封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上山称王、安营扎寨的，不乏其人。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成就自己的事业，有些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落草为寇了。鉴于这种历史教训，毛泽东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后，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把军队置

---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316~317 页。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第 7~8 页。

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他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创立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实行了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原则，把农民占绝大多数和处于农村战争环境下的工农红军建设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设了一支既会打仗、又受群众拥护的革命武装力量。

## 一 全新的军队全新的质

如前所述，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湘南农军在井冈山会师后，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1928年5月，各地工农革命军都相继改为“工农红军”，成为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

工农红军创建之初，面临着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弱小的军队如何生存、发展，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各地起义部队中，一部分是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是农民武装，还有一部分土著武装。如何使这支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武装队伍适应严重的斗争环境，担负起创建和保卫工农政权的艰巨任务？又由于中国的国情，这支革命武装队伍中的主要成分不是城市工人而是农民，革命战争主要也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偏僻落后、分散孤立的农村进行。这些工农红军——穿军装的农民，虽然都是有相当觉悟的志愿者，但他们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却又与无产阶级军队的特质格格不入。旧中国文化的落后和封闭的习惯势力，又增加了带领和管理这支队伍的困难。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这支队伍又不只是担负打仗消灭敌人一项任务，还要做大量的诸如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建立党组织等工作，随之也就产生了如何摆正军党、军政、军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种复杂的情况下，解决如何将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而十分艰巨的任务。毛泽东为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创造性工作。

1927年9月底，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部队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不足1000人，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基层没有党的组织。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巩固和发展这支新的革命军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将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普遍建立共产党组织，班建小组，连建支部，营、团建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做到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设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管理。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初步基础。

1927年11月中，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团长陈浩等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部队不做群众工作而单纯搞军事操练，不去打土豪解决给养而是靠摊派，损害了群众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及时予以批评，并就此总结经验教训，于12月底在碓市集合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任务。他向大家说，我们的军队，要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怎么办呢？那就要求每一个战士，既要会打仗，又要会做群众工

作，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闹革命，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接着他宣布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军队的群众纪律问题，并提出过一些朴素的维护群众利益的纪律要求。1927年10月24日，在红旗即将插上井冈山之际，毛泽东在荆竹山集合工农革命军庄重地宣布了三项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又在遂川县城的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随着部队的实践活动，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内容不断修改、充实、完善，如“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不久就改为“不拿群众的一个鸡蛋”，以后又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后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项纪律后来也改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有些条文看来事小，但却生动反映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它对加强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和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加强军民的密切联系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团合力攻打宁冈新城之敌，歼敌一个正规营和一个地主靖卫团，缴枪数百支，俘敌百余名。俘虏被押至茅坪后，毛泽东宣布了宽待俘虏的政策：第一，对俘虏不搜腰包，不虐待，与工农革命军同等待遇；第二，医治敌军伤兵；第三，愿留者欢迎并开欢迎大会，需走者欢送并发给路费、路条。宽俘政策的执行，震惊了敌人，对瓦解敌军产生了巨大威力，连敌人也对此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1929年12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强调红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列举了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指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形成。这样，毛泽东就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而系统地创立了一套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它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等。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三湾改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深刻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确定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原则和措施。明确指出，红军只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明确了党和红军的关系，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红军领导党。1932年9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提出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明确规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毛泽东强调要经常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用马列主义、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指战员，以纠正部队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多而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部队能成为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建立完整的制度和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军必须肩负三大任务。中国的红军必须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建设。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必须有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深刻观念。在有条件建立根据地的地方，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用战斗保卫根据地。因此，中国红军的任务，就不能像其他军队那样只是打仗一项任务。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红军的给养和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其他根据地也规定了大同小异的红军任务。这表明，红军是完全不同于雇佣军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军筹款的任务发展为开展生产运动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又规定：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

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是红军的民主制度。实行军内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体现，是我军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创建红军之初，就注意在红军中实行民主制度，废除官长打骂士兵作风，建立“士兵委员会”。尤其是经济上的民主，“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而“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新型官兵关系的建立，使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后深刻地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当然，我军实行的民主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此，毛泽东还注意及时批评和纠正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的错误观点和行为。三大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打破了旧军队的传统影响，也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反动军队的显著标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统一的革命纪律。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毛泽东创建红军之初就把纪律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他把在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上遇到的一些不良情况提到政治原则和军事原则的高度加以解决，从而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全军统一的革命纪律。它既是政治纪律又是军事纪律，更是群众纪律，是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体现，是全体军人的行动准则，红军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胜利，以及后来人民军队能打败各种敌人，就是靠每个指战员能自觉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实践证明，军队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保持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以夺取战争胜利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和圆满完成党赋予的一切任务，就必须严格地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不但是要实现军内民主，做到官兵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而且要做分化瓦解敌军的工作。敌军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官兵对立，军民对立，矛盾重重，完全存在被我军瓦解的客观可能性。因此，毛泽东把瓦解敌军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制订了宽待俘虏的一系列政策。毛泽东认为，红军的胜利，不但要依靠自己的英勇作战，而且要依靠敌军的瓦解，红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执行，对于瓦解敌军官兵意志，削弱敌军战斗力，增强我军战斗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向苏区进攻的白军士兵，“一方面被强迫进攻我们，一方面却在受我们的革命教育，每个苏区可以说都是白军士兵学习革命的大学校。因此，替蒋介石挖坟墓的不只是红军，前且是他们自己的士兵。”实践证明，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也是人民军队性质与宗旨的体现。是正确处理军队内外关系的准则，是团结一致克敌制胜的法宝。

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确立是现实斗争环境的迫切需要。

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针对当时党的组织薄弱及后来的单纯军事观点而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中虽有共产党的组织，但是力量很弱。即使是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党支部也仅建在团上，党的力量也很薄弱。南昌起义失败也是与此有关系的。秋收起义仍属我党领导武装斗争之初期，故党的领导仍相当薄弱，一个团仍然只有一个党支部。由于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在艰苦斗争环境中无法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因而经不起严酷战争环境的考验。秋收起义吃败仗受挫折，党的领导薄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正是在深刻总结了北伐的最后失败、南昌起义在广东的失败和秋收起义连遭挫折的严重教训的基础上，才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因为连队是部队战斗、生活、工作的基层单位，支部建在连上，就为工农革命军贯彻党的路线，接受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才使弱小的部队逐渐强大起来。后来，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一种排斥党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又在一部分同志中滋生和发展起来，错误地认为军事与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甚至认为军事应该领导政治，并且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错误思想如果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使部队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滑向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上。于是，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重申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从而保证了红军继续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官兵一致、军内民主等制度，是根据地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必然要求。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农村虽然可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能供应部队的吃穿，但在有限的区域突然增加这么多人口，敌人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故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敌人妄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

在山上。红军每天的生活费，除粮食外，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即便如此，全军每月也需大洋一万，连这样的低标准也是难以为继，一降再降。敌人的封锁使根据地物价远远超过外面地区，五分甚至三、四分钱一天的伙食费就只能过最艰苦的生活，经常吃粗糙的红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南瓜和野菜。寒冷的冬天，还只穿两件单衣，全军 5000 人的冬衣，有了棉花又无布。而井冈山的严冬，冰天雪地，常冷至零下五、六度甚至七、八度。战士们又只能以门板当床、稻草作被，大家挤在一起互相温暖着。实在冷得无法睡时，就干脆起来跑步、刺杀、操练。因为作战和营养不良，伤病员也很多，约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药品却很短缺。动外科手术时，经常在缺少麻醉剂的情况下使用简陋器械进行。此外，在官兵关系上，有的军官过去染上旧军队的恶习，还打骂士兵。在这种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如果军官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而搞特殊化，如果没有军内民主，不关心爱护和尊重士兵而是打骂士兵，就必定造成人心涣散、军心动摇。因此，官兵一致和军内民主就成为艰苦环境下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官兵一致、待遇平等，“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甚至新来的俘虏兵，由于对他们采取优待政策，他们也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红军物质生活虽然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作战中的表现就大不一样，在白军里不愿卖命，一到红军中来就勇敢作战了。

有关保护群众利益的一系列制度和纪律，也是斗争实践中逐步提出的必然要求。尽管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发现“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就注意到了群众纪律问题并作过一些规定。然而由于部队处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地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仍在个别战士身上时有发生。现实情况便提出了制订严格革命纪律，保护群众利益，并加强部队自身建设、提高部队威望的问题。为使军人守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毛泽东即把过去口头规定的一些朴素纪律，用文字形式加以严格而明确的规定，于是产生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不但亲自制订纪律，而且经常督促检查执行，经常深入群众听取反映，并亲自处理过士兵中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

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也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治军思想的合理借鉴。

我国古代战争频繁，接连不断，有的历史时期几乎全由战争构成。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500 余年战争连绵不断。几千年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军事典籍、军事思想的遗产。对于这些，毛泽东都广泛涉猎、并有相当的研究。他自己曾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他一生博览群书，从我国古代孙子以及老子、商鞅、韩非、司马迁等古代思想家、军事家那里批判地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不少内容都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有一定意义上的联系。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其思想渊源，有不少也可追溯到古代杰出军事家在军队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成就和作法，也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古代军事遗产的批判继承。

在注重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在军队建设中，最直接的固然是军事

技术和战术的训练及军需供给。但是，隐藏在这些直接东西后面的，还有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政治教育问题。古代许多著名军事著作和军事家，在注意军事训练的同时，十分注重军队的政治教育。孙武即是首先看到政治教育重要性的大军事家之一。他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亲，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在孙武看来，军队的教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令之以文”，即进行政治教育，晓之以道义，以使士卒亲近依附。另一方面还要“齐之以武”，即用强迫性的纪律统一号令，使部队听从指挥，遵守军纪，整齐一致。尉繚子认为，军队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士兵明确作战目的。他说：“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就是说，士兵不明确作战目的，是决不会愿意拼死卖命的。而这一“信其心”的效果则要靠政治思想教育来达到。吴起也认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这也是在讲做好部队政治工作对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性。古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做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如《黄石公三略》中说：“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以上都说明古人治军是非常注意从政治上建设军队，用政治工作、政治教育的办法管理军队的。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古人的思想，强调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生命线。

在正确处理严格与爱抚的关系方面。古今中外的军队，都要依靠严格的纪律来维持其高度的集中统一。可以说，严格，是军队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严格应与爱抚相结合。古代治军思想中，就已经强调要正确处理严格与爱抚的关系，注意将二者统一起来。《尉繚子·攻权第五》中说：“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就是说，只有善于正确处理爱抚与严格关系的人，才会善于带兵。唐朝名将李靖则强调，对士兵要爱在先，严在后，爱是严的基础。只严不爱或“威加于前，爱救于后”，都将“无益于事”，二者“不可反也”。然而爱不是姑息。孙武一方面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另一方面也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显然，爱必须与严结合起来。在实践方面，古代确也出现过一些身体力行、爱护士兵的将领。如魏国大将吴起，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同衣食，分劳苦。士卒生了毒疮，他用嘴吸浓血，因而深得军心，连战皆捷，曾取得战76次胜64次的赫赫战绩。宋将岳飞亦爱兵备至，“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故岳家军所向披靡，屡战屡胜。当然，古人所谓爱兵，是出于对军心的笼络。然而作为思想遗产，在人民军队的治军、管理中，毛泽东对此进行一定的批判继承，仍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在正确处理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方面。古人治军打仗有的也能注意处理

---

《孙子·行军篇》。

《尉繚子·战威第四》。

《吴子兵法·图国第一》。

《孙子·地形篇》。

《宋史》卷365《岳飞传》。

好同老百姓的关系。他们也看到老百姓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知道打仗不但要动员军队，而且要动员老百姓，老百姓若不支持、拥护，战争难免失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又说：“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些都阐明了一个道理，战争的胜负，除了部队本身指挥得当、英勇作战之外，老百姓人心向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要百姓拥护，就必须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古代也有不少军事家带兵打仗时，注意处理好同老百姓的关系，特别是注意尽量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以争取老百姓的拥护。如岳飞就在军中宣布：“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同“掳”）掠”。“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故岳家军深受百姓欢迎，打仗所向披靡，连敌也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明将戚继光备倭守边时，也很重视军纪。他对部下说：国家驻军沿海，是为了巩固海防，保护百姓。而原来的官兵不但不能打倭寇，还扰乱百姓，叫百姓守城杀贼来保护他们。国家养这种军队何用？只有勇于杀敌、保护百姓的军队，才能得到百姓拥护。他还说，如有违犯军令、军纪者，即使是我的儿子，我也要按军法惩处。且他言行一致，士兵们赞颂说：威将军铁面无私，军令如山。在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戚家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军队。当然，封建统治者军队中的所谓不扰民、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是少见的，且纯系从战争胜负本身的目的出发：也即其出发点并非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然而只要他们注意了对老百姓利益的保护，则直接受益者就不能不说是老百姓。这比起对老百姓动辄抢掠、凶残暴虐的军队来说，老百姓的处境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老百姓也能拥护支持他们。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兵家的这些有益作法，为人民军队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保护老百姓的纪律和措施。当然人民军队的纪律完全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唯一宗旨出发的，这一点与古代兵家的治军措施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正确处理处罚与教育的关系方面。规定了严格的军纪就要执行，但如有违犯的怎么办，那就免不了要处罚。然而处罚的目的还是在于教育士兵懂得纪律的必要性、严肃性，以促其自觉执行。所以，处罚必须与教育结合起来。对此，古代兵书也不乏论及。《尉繚子·战威第四》中说：“先廉耻而后刑罚。”就是强调先进行教育，后再执行纪律。诸葛亮虽有挥泪斩马谡的严峻执法的故事，但他也是主张重教育的。他曾总结商鞅专任刑罚的历史教训，认为“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他主张把执法与教化即处罚和教育结合起来。他曾亲自写过“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教令，就是为使部属懂得怎样做是违犯法纪，以促其自觉守纪。人民军队为了切实执行纪律，也强调严格执纪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如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在强调必须坚决彻底纠正红军中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同时，也一再强调：

---

《孟子·公孙丑下》。

《诸葛亮集·论诸子》。

“从教育上提高”、“主要是加强教育”、“加紧教育”等等。

当然，我们不能把毛泽东确立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与古代治军思想混为一谈。毛泽东的治军思想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这是任何古代治军思想所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所在。然而从他为我军制订的一系列建军原则里不时闪烁着古代治军思想的光彩中可见，毛泽东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工作中，对古代治军思想中的精华之处又的确是有所批判吸收的。

## 二 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军队的宗旨，即为谁进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根本目的问题，是决定军队性质的最本质的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反对中国的武装斗争以农村为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中国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他认为，在一个农民区域，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它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到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喝，把老百姓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红军。可见布哈林一点也不知道中国的工农红军完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既会打仗又深受群众拥护的军队，而不是“与民争食”，遭老百姓反对的军队。

的确，工农红军初创时情况十分复杂，一部分是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矿工，大部分来自农民。各种成分的人员当兵入伍的目的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当然，绝大部分是为了追随共产党闹革命，为了摆脱受剥削压迫的地位而参军的。但是，也有许多人是抱着各自的目的投身到军队中来的。有的被形势所逼，有些是为了图报私仇，有些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或者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军队中来的。因此，他们很多人不懂得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和立场，不懂得为人民当兵打仗的道路理，没有树立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因此，确定我军的宗旨，是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强调，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我军的性质，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而英勇奋斗的武装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共产党的党性和军队的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唯一宗旨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

1927年，毛泽东就向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我们有湘鄂赣经过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同我们一道，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党就注意在红军中“加紧政治训练”，使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又明确指出：“世界上的军队，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反动军队，它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

---

参见《中共党史专题讲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2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压迫人民的工具；革命军队，它是为人民群众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工具。”而“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样，毛泽东就为我军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划清了人民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和讲话中，对人民军队的宗旨进一步作了阐述和规定。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认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表现，也是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他要求我军指战员同人民打成一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样才能无敌于天下。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对我军宗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他强调：“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把人类推进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宗旨，紧紧地 and 人民群众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党的纲领、路线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的纲领、路线而斗争，实质上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是我军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决定了我军建设的三个原则：“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团结”，“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中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它是人民军队一系列建军原则的精髓和核心。作为人民军队唯一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固然是“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它既是群众观点的直接体现，又是把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从群众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之可靠保证。红军关于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规定，则是人民军队为人民谋利益的具体的也是基本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民军队统一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民一致”的规定，一方面是使群众利益得到直接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争取群众对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军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以及“官兵一致”的原则，则是群众路线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瓦解敌军看上去是与敌方军队的关系，其实也是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密不可分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1040页。

的。从敌方来说，其广大士兵和一部分军官也是出身于劳动人民，他们是被迫为反动阶级卖命的，因此能争取过来的应尽量争取过来。对我方来说，瓦解一部分敌军，减少一些战争或削弱敌人的一些力量，就为人民减少了一些牺牲和痛苦，减少一些社会财富即人民利益的破坏和损失。所以说，毛泽东确立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是他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的必然反映。他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见毛泽东是把群众利益作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当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当作衡量共产党人及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的。毛泽东还强调：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正是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因而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才得以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力挽狂澜，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一个个异乎寻常的困难，夺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们要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渊源作更深一层探讨的话，那就必然要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唯物史观作进一步的探源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唯物史观的产生固然离不开他从小对人民群众的特殊而深厚的感情，更离不开他对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批判了种种否定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宣扬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论点。马、恩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马、恩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称这是“一条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列宁还强调：群众的革命首创行动和人民的从下夺取政权，是革命真正胜利的唯一保障。“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他还明确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斯大林在这方面也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毛泽东正是把马列主义这些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中，作出了富有特色的创造，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系统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和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路线，并以这种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具体指导人民军队的建设，从而形成了一整套能够保持人民军队新质的建军原则。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页。

《斯大林文选》（上），第147页。

还有一点不应忽视的是，毛泽东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实际上与对中国历史上重视老百姓作用的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社会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代表着他们政治利益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有限地承认并重视人民群众作用的思想观点，比如“君轻民贵”、“君舟民水”、“国以民为本”等等。当然，这些思想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有的清官也确为老百姓平过冤狱，做过好事，但这毕竟是极有限的。他们或出于自身利益，不可能真正实行；或由于腐朽势力的反对，根本难以实行。但这些思想观点提出后，对老百姓的生存多少是有点好处的，对社会发展也多少是有裨益的。尤其是留下了十分丰富、很可宝贵的思想资料。民本思想也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之一。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民本思想加以改造和吸收，从而使传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上升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运用于党的各项工作中。在战争年代，最主要的则是运用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人民战争实践中，使人民军队真正建设成为一支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新型军队。也就是说，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其更深一层的原因也包含了对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的批判和继承。

### 三 独特的战略战术风格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英勇地发动和领导了各地的武装起义。由于党和军队缺乏作战经验，大部分起义都失败了。这个时候诞生的工农红军，数量少，装备差，物质供给非常困难，根据地流动不定。它面对的敌人是掌握着全国政权的统治者，是拥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他们控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并得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弱小的红军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亟需探索的重大军事课题。如果说中外近代史上一般的军事家都只是研究敌我双方力量均衡基础上的军事战略问题的话，毛泽东则不得不立足于以弱胜强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并形成了一整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是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独特风格。

毛泽东在率领秋收起义受挫部队上井冈山后，就开始了以游击战争对付强大敌人的探索，并逐步积累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井冈山上过去有一个名叫朱聋子（朱孔阳）的人，以“打圈子”战术对付官军。敌人来了，他利用井冈山的有利地形，绕几个圈子，就甩掉了敌人。但朱聋子的战法，虽可避开敌人追击，却不能打破敌人的进攻。这样消极防御就始终改变不了自己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吸取朱聋子战法的合理成分，改造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把“打圈”与“打仗”结合起来，做到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

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井冈山上，毛泽东还经常向部队讲战略战术，他风趣地说：我们打仗，好像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毛泽东还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至1928年5月进行了五斗江、草市坳等一系列胜利的战斗后，红军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就基本形成了。毛泽东把它总结概括为著名的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里最先是提出“敌进我退”，就是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保存自己，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反对死打硬拼而作有计划的退却。之后，加上了“敌驻我扰”，就是对于驻扎的敌人，派出正规军或地方武装，以多种形式骚扰，使其疲惫不堪，穷于应付，挫其锐气，耗其精力，再后，又添上“敌疲我打”，就是待敌士气下降，精疲力尽，无力应付时，主动袭击，以歼灭其有生力量。最后，增加了“敌退我追”一句，即对溃逃中的敌军，要乘胜追击、坚决打击之。这样，适合敌强我弱形势下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就在他指挥的对敌作战中逐渐形成了。6月，红军在井冈山与地方赤卫队密切配合，成功地运用了16字诀，消灭了江西“两只羊”（即敌两个师长杨池生和杨如轩），取得了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对这个时期我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高度概括。

1930年以后，随着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和红军的发展壮大。红军的作战形式开始由游击战逐步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过渡，游击战的16字诀也得到新的发展；在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吸取了马克思关于“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的思想，实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毛泽东指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必须将敌人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这样才能变防御为进攻，变劣势为优势，变弱者为强者，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在战略上我们是一当十，在战术上我们要以十当一。“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1930年12月，为了粉碎敌军“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召开动员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这副对联艺术上的造诣很深自不必说，但它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标志着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超出了原来16字诀的朴素性。红军作战队伍也已从小游击队发展到了大游击兵团，作战形式已从朴素的游击战发展到了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当然，作战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那个16字诀。且这种运动战决不是那种深沟高墙、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到1931年9月，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军以劣势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即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就已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104页。

转引自《毛泽东思想发展简史》第17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星火燎原》二，第70页。

较为系统地形成了。这主要包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上打持久战、防御战，在战役上打速决战、歼灭战；实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暂时处于劣势力量和落后装备的红军对付强大的敌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它使得红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

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关野英夫在评述毛泽东的兵法时曾说：“自古以来，‘优胜劣败’是兵家不变的常理。”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在以劣对优或以弱对强时”，“把‘优胜劣败，的规律推翻了”。他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兵法的特色”。也即是毛泽东独特的战略战术风格。应该说，这种评价是颇为恰当的。

如果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的话，那么毛泽东一整套以弱胜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则是使红军和根据地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扩大，逐步发展的必有兵法和战法。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1页。

转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6页。

## 第七章 农民的中心问题

当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开创根据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耕者无其田，地主凭借地权向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封建土地制度，造成了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民的极端贫困。毛泽东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则是土地问题。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 第一节 实现耕者有其田

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积淀的民生主张。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这些主张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毛泽东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进行土地革命，把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既是当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也是红色政权的根本保证。

#### 一 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早年其父亲购买二叔毛菊生七亩田一事，就对毛泽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毛顺生在毛菊生生活困难的时候，不愿接济，而是将其弟自耕的七亩田买回，使其弟破产。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毛顺生却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使毛泽东直观地感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解放后，他还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起。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他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他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之路。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即占乡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 70%至 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 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员，却总共只占有约 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土地所有权愈来愈集中，农民无地化趋势不断发展。这是因为：其一，军阀、官僚大量兼并土地，有的成了拥有数千亩甚至数十万亩的大军阀官僚地主。如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河南的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地 4 万亩。张作霖在东北占地 150 余万亩。云南总督刘楷堂占地 2.5 万亩。湖南督军赵恒惕占地 1 万多亩。许多商人、高利贷者大量购买田产，成为新的商人地主和高利贷地主。据 1930 年调查，江苏南部 161 家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中，原为商人的占 22.36%，原为高利贷者占 42.8%。与此同时，一些帝国主义者勾结封建势力和利用买办侵占大量中国的田地，成为中国的“洋”地主。如 1924 年前后，日本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在东北购买土地约 200 多万亩，其他以日本私人或团体名义买的还有 225.9 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造成自耕农日益破产，小土地所有者逐渐衰落，农民无地化趋势不断发展。据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从 1912 年到 1939 年，全国各省平均佃农从人口的 28%增加到 38%，半佃农从 21%增加到 27

%。

在旧中国，一方面土地所有权不断集中，另一方面土地的使用和经营却日益分散化。地主阶级垄断了大部分土地，但并不愿为农业大生产提供前提，农村并未产生出许多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相反，他们仍是将土地分散出租给农民耕种，榨取高额地租，实行封建剥削。而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除以高额地租向地主租进小块土地苟延生命外，别无他路。地权愈加集中化，经营日益分散化，耕者无其田，地主凭借地权把贫苦农民死死捆在小块土地上，榨取高额地租和其他超经济剥削，这就是旧中国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曾指出：“产品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旧中国地租剥削如此高昂，这就使旧中国的农业生产的扩大成为不可能，不但阻碍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而且迫使农民贫困破产。再如旧中国农民所负担的田赋税率之高，在中外历史上也都是罕见的。据卜凯在1929年至1933年调查，全国农村，有188种不同名称的租税，税额一般占收获量的20%以上，甚至达50%左右，如四川，在1942年每亩稻田收获量的59.5%被政府拿走，在湖南滨湖10县，占收获量的52.7%，云南也达49%。“赋由租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总是将田赋负担通过各种手段转嫁于广大农民身上。农民除实际负担高额田赋正税外，还要被迫交纳更为繁重的附加税。更为残暴的剥削方式，还有粮食征借和田赋预征等。自1918年四川地方军阀开始实行田赋预征制后，各“中央政府”都呈令各省普遍实行起来。这种征借，一年任意数次征收，甚至十数次征收，预征的年限不断增加，一般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据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严重情况。他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对根据地的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调查表明，在江西，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然约占60%，农民只占40%，在湖南，茶陵、酃县两县均有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从毛泽东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仅地主便霸占了60~80%的土地，富农还要占去相当一部分土地，这样一来，广大农民的土地就所剩无几了。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造成了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糠菜半年粮”，就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加上旱涝虫灾，常常使农民倾家荡产，啼饥号寒，甚至迫使许多农民卖妻溺儿，流离失所，乞讨他乡。毛泽东目睹这种惨状，深刻认识到，要把广大人民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首先就要变革封建的所有制生产关系，进行土地革命。只有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才能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如果说，毛泽东因父亲买堂叔的田而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只是一种朴素的感性意识的话，那末，现在提出的土地革命问题，则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探讨了。因此，旧中国土地的严重问题，为毛泽东探索土地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提供了客观基础。

---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897页。

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

## 二 根据地建设的迫切问题

毛泽东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迫切需要。早在第一次大革命面临困境时，毛泽东就阐述了土地革命在进行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就指出：“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必带来生产力的极大危机，“必起绝大的饥荒”；“要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在这里，毛泽东从保护革命的战略高度，把兵士是否永远参加革命、农民愿否参加革命、革命政权的财政问题能否解决等，均归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从解决有关革命全局和革命长远问题的角度提出解决土地问题，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思想。但因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等多方面原因，当时未能付诸实施。1927年4月至5月召开的党的“五大”，也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理论上作了较好的阐述。但因陈独秀的右倾和形势的恶化，又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去讨论，讨论来讨论去，结果不了了之，实际上也成了一纸空文。

大革命失败后，党重新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党领导南昌起义时，第一次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即“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起义部队前委多次进行过土地革命政纲的研究。因此，南昌起义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南昌起义还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问题。比如在没收对象上，南昌起义时曾一度有过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的政策。在地少人多的南方，农民称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认识到“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这标志着对于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全党已有了认识。会议还认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的行动政纲，是“耕者有其田”，“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作了两条规定：（1）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和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2）对小田主的土地不没收，实行减租，这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之分子中立”。由此可见，“八七”会议的土地政纲存在着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土地国有，这是超越阶段的过左政策；二是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这就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

---

根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纪录》（1927年4月19日）。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中共“八七”会议《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中共“八七”会议《最近农民战争的议决案》。

问题。对于这一土地政策，毛泽东在讨论农民斗争决议案时，根据自己过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验，提出了他的四点意见：（1）“大中地主的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2）“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的土地亦应没收”；（3）“自耕农、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所以要确定方向”，提出了如何对待富农问题；（4）“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的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提出对会党应有正确政策。这几条正是开展土地革命亟待解决的有关打击谁、团结谁的路线问题，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没有引起会议的重视。参加“八七”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以苏联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不主张讨论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他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谁是大中小地主是无法确定的”，“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条文仍可照旧”。毛泽东再次提出意见，认为现在是“住下去”如何办的问题，在农民暴动“得着政权的地方”，党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又武断地说：“如果我们有政权，我们的政纲是土地国有化”。这实际上就是说：既然是土地国有，那还需规定什么具体政策。主持会议的瞿秋白因为没有实践经验，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在总结发言时说，现在主要是“号召农民暴动”，至于农民问题政纲，留待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由于人们的认识不一致，关于土地政策的争论也便无甚结果。最后，仍按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把土地革命是“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写进了“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由于会议没有对土地革命作出具体决定，各地发动起义的领导者对土地革命也就只有在实践中去摸索和创造经验了。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毛泽东认为：湖南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湖南省委在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并未简单照搬共产国际在“八七”会议上的指示和“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宠统决定，而是对土地政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研究。毛泽东在出席8月18日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针对“八七”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提出了几点很有见地的意见：其一，没收土地必须有没收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即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故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其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提出来，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其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对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当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其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省委对土地问题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意见”，湖南省委认为：应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普

---

参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通地主，并且只要他们能自耕，仍须享有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这个意见奠定了党的土地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一，明确了没收对象是包括大中小地主在内的所有地主，是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整个推翻地主制度；其二，实际上否定了没收一切土地、“土地归国有”这一超越革命阶段的“左”倾政策；其三，最早表述了党在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其四，强调在没收地主土地以后，仍给予他们中有耕种能力者以土地，从而将消灭地主阶级与消灭地主肉体区别开来，较好地把握了土地斗争中对地主政策的尺度。可见，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坚持下，湖南省委的认识比“八七”会议的认识又有了较大的前进。但是这些土地政策在战事频繁而又接连失利的秋收起义过程中未能付诸实践。因此，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仍是根据地建设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 三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毛泽东土地革命理论不仅是建设根据地的需要，也与中国历史上“耕者有其田”的民生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都曾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张。

长期以来，农村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洪秀全等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系统而集中地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望。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主张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土地所有制变为“上帝所有制”，即土地国有制。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即把全部土地按产量多少分为三类九等，按人口平均分配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在实现土地国有制的同时，也主张废除个体土地所有制，土地绝对平分，企图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上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这些都带有浓厚的空想性质。

孙中山曾在1905年阐明三民主义纲领时，也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企图用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贫富分化与对立。但当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特点。他不主张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倾向向地主收买土地，然后国家把购买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杜绝“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避免贫富的悬殊。显然，这种“平均地权”的主张，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因而，不可能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后来，毛泽东评价这一主张时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后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有了新

---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的认识，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说：“中国的人口，农民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产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同时，他给“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耕者有其田”。“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

太平天国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他们都主张摧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思想，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评价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口号时，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平均地权”，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探索。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耕者有其田”的民生思想，对毛泽东的探索无疑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 第二节 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究竟怎样正确开展土地革命，依靠谁？团结谁？限制谁？消灭谁？土地所有权应归谁？这些关系着土地革命路线的重要问题，对于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来说，的确都还是新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探索，逐步积累经验，终于在1931年初基本上解决了上述问题，形成了我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 一 重提土地问题

如前所述，早在第一次大革命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时，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又重提土地问题，开展了井冈山的土地斗争，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重要的实践探索。

在湘赣边界全面分配土地前，毛泽东曾对湘赣边界土地状况进行过调查，并于1928年3、4月间在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的小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斗争的试点。3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酃县中村时，亲自召开群众大会，通俗易懂地向两千多群众讲述了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毛泽东还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插牌分田。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桂东沙田时，立即领导当地农民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对土地状况的调查和局部地区土地革命的试点，为5月以后的全面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政策依据，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宝贵经验。

---

参见《孙中山选集》第935~939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1928年5月，在毛泽东主持下，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举行。土地革命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会议决定要领导湘赣边界农民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会后成立的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专门设立了由谭震林任部长的土地部。各县也随之相继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分配土地的各项准备工作。5月以后，根据边界有利的军事形势和边界党的“一大”精神，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土地分配的具体做法是：（1）按人口平分土地。（2）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这样可避免地主豪绅利用宗族观念扰乱、破坏土地的分配，更可把土地分得均匀一些、防止肥瘠不等。（3）以原有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4）地主分子及其家属也分得土地。（5）红军官兵中家在湘赣边界的本地人也都分得土地。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赣边界党和政府在土地革命中制订和执行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如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一方面坚决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反对“政治没收”或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从而比较好地防止了右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分给地主及其家属一份土地，使他们能有生活出路，反对了大烧大杀和肉体消灭地主的错误政策，比较好地防止了“左”的倾向。正由于边界党和政府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执行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所以推动了边界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插牌分田的土地革命斗争。至7月，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土地基本上分配完毕。但时过不久，由于井冈山根据地遭到“八月失败”，敌人占领了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夺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破坏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成果。9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红四军主力由湘南返回边界，部分地收复了失地后，领导土客籍农民联合起来斗争，把被地主豪绅夺去的土地又重新夺了回来。

土地的普遍分配，在根据地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广大农民当家作了主人，极大地激发了边界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使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根据近一年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于1928年12月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制定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法令。它共有九条内容。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第一种为主体。还规定：一切土地，禁止买卖。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区域上，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此外还有山林分配，土地税收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红军官兵和政府人员的土地分配问题等内容。由于没有任何经验，没有先例借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明显的错误之处：一是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二是土地没收后归政府所有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耕种权而没有所有权；三是禁止土地买卖。

本来，湖南省委在准备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就规定了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实际上否定了土地国有，这一正确政策是根据毛泽东为多数人的意见定的。但为什么一年后毛泽东自己在主持制订《井冈山土地法》时，却又规定要没收一切土地和实际上的土地国有政策呢？其原因除了缺乏土地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之外，更主要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就武断地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

土地国有”。既然是“土地国有”，那就应将一切土地都收归苏维埃政府管理。在共产国际这一“左”倾思想的影响下，1927年11月的党中央扩大会议，在土地政策方面的中心思想就是没收一切土地，一切土地公有或国有。会议的决议案在文字上虽然写的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作”。但同时又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国有。中央的“左”倾土地政策，必然要对刚刚开展土地革命的各根据地造成严重影响。如海陆丰地区建立工农政权后，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湖南醴陵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时，也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提出“打破私有制度”、“一切归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等“左”的口号。1928年上半年，“左”倾盲动主义虽基本纠正，但6月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仍提出“彻底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和“对于自耕农土地亦实行重新分配”，可见仍是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由于交通阻隔，井冈山根据地收到这封信时是11月2日。这正是毛泽东主持制订《井冈山土地法》之际。中央指示信的到来，难免使毛泽东等误以为至这时中央的精神仍是要没收一切土地。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六大”已规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直至《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六大”的决议案尚未传达到井冈山。直到1929年1月初，土地早已分了下去，《井冈山土地法》也已正式颁布，“六大”的精神才传到井冈山。且“六大”决议案本身也尚未纠正“土地国有”错误。这就使《井冈山土地法》存在着“没收一切土地”、“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等原则性错误。

## 二 土地没收对象的确定

井冈山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使得为数不少的中间阶级与豪绅阶级一起同被打击，所以实际执行时“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他们或恐吓贫农，延宕分田时间；或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如永新南乡直到区政府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土地才实际地分下去。这里讲的中间阶级主要是指富农和小地主。实际上，中农甚至于贫农，由于传统的守旧观念，他们对没收一切土地也未必很感兴趣，容易误以为土地革命也同样是冲着他们那一小块土地来的。所以他们就易被中间阶级所挑动，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愿或不敢积极行动，从而使土地革命受到阻碍。1929年1月初，中共“六大”决议案传到井冈山，它进一步帮助边界党认识到了在土地斗争中“没收一切土地”等偏差。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党决定：对于“六大”决议中的“没收地主土地”一项，“分田已事了结，如再创造或推广割据区域分田时，则采取中央的新政策。”这一正确决定，后来在19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中得到了落实。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沿途散发了中共“六大”有关决议案的油印材料，发布了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说：“地主土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这即是说，只是“地主土地”

---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由农民没收、耕种。同时，毛泽东还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的署名，发布了《共产党宣言》。这一进军《宣言》依照中共“六大”的指示，宣布了十大政纲。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由此可见，《布告》和《宣言》实际上已开始对“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作了初步纠正，只是尚未在正式的土地法令中确定下来。

同年4月，红四军在赣南的于都、兴国、宁都、瑞金等地进行短距离分兵。在分兵活动地区一方面建立红色政权，一方面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为了正确指导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先后在于都、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听取当地党的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召开贫雇农代表座谈会。还率领红四军通过帮助农民耕作劳动等方式，深入群众调查访问。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兴国做江书院文昌宫起草了《兴国土地法》，并随即颁布。这个土地法是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结合分兵地区的土地革命情况，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内容共分八条。它对于土地没收范围、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山林分配法、土地税的征收、乡村手工业工人及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土地分配等问题，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变更，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就把“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在土地法令中正式更正过来了。它明确了土地没收的对象即土地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应是地主阶级，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承认了农民对原有小块土地的所有权，纠正了同时打击中间阶层、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加区别地一律没收的错误。但这个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的另外两点错误仍尚未改正，仍规定没收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禁止买卖”，农民分得的土地只有耕种权。土地不属农民私有，还没有改变“土地国有”的政策。

这个土地法颁布后，毛泽东在兴国县城举办了由党团员活动分子40余人参加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向学员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分析了农民和土地问题，详细讲解了《兴国土地法》。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学员们就回到各地，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按《兴国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

### 三 土地政策的制定

在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过程中，1929年7月召开的中共闽西“一大”及其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有着重要的地位。

闽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在全国各根据地中也算是最早的地区之一。1928年6月，闽西党组织领导永定农民武装暴动之后，开始了捕杀土豪、焚烧田契的农村游击战争。8月在永定溪南区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并确定“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战争和没收分配土地”。由于这时没有任何分田经验，中央和省委也都没有怎样分田的具体部署和指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走家串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召开老农座谈会共同讨论分田的原则和方法，初步摸索和创造了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等办法。并先在溪南金沙乡进行分田试验，取得经验后随即推广到溪南13乡，使两万多贫苦农民迅速得到了土地革命果实，并为以后闽西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为了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更好地领导闽西人民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

而斗争，中共闽西特委在红四军前委的指导下，决定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日期推迟一周以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等方面的情况，为大会制订各项政策作了充分准备。7月20日，大会在上杭蛟洋正式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阐述了闽西工作的三个基本方针和六个有利条件。其中第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总结了永定溪南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闽西党的土地政纲，这即《中共闽西一大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土地政纲及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贯彻了党的“六大”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原则，吸取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的合理成分，在总结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在一些具体土地政策上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区别对待地主与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第二，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对小地主只没收土地、废除债务，但不派款和其他过分打击，以集中打击大地主，并对地主和反动派家属酌量分地，给以生活出路；第三，强调团结中农，规定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第四，规定了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第五，提出了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根据邓子恢等提出的“抽多补少”原则，规定在土地分配中，采取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平分的办法。可见，这次大会制定的土地政策，不仅贯彻了“六大”的正确方面，并且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由于有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闽西六县300多里地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也为党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的完整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四 对富农策略的制订

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也是中国社会阶级中的一个复杂的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既要限制富农，但又不能消灭富农经济。因此，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确定对待富农的策略，是一个极重要而又不易解决的问题。

1929年和1930年上半年的分田，只注意了土地数量上的按人平分、抽多补少，而忽略了土地质量上的好坏搭配、抽肥补瘦。由于出田户一般是富农，进田户大都是贫雇农。富农千方百计把近田、好田留给自己，而把远田、坏田退出来分，所以贫雇农分进来的大都是质量差的田或远田。这样必然严重影响广大贫雇农的分田情绪和积极性，不能正确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并撰写了有名的《寻乌调查》报告。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贫雇农同富农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富农把持肥田，引起群众不满，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就是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分配的中心”。为了支持广大贫雇农，毛泽东以鲜明的立场表示：“共产党毫无疑问应该站在贫农方面，反对那些富农的肥田独霸主义。”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也都在实践中意识到，在分田斗争中，肥瘦不均，富农把持肥田不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闽西特委根据广大贫雇农的要求，首先提出“抽肥补瘦”

的原则，并按此原则对已分田地区进行调整，受到了广大贫雇农的称赞。

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各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经验，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子恢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经验的报告。会议专门讨论了富农问题。邓子恢在会上对闽西提出和贯彻执行“抽肥补瘦”原则的情况和经验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对此很赞赏，故“抽肥补瘦”办法得到了会议充分肯定，认为必须作为重要原则确定下来。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了限制富农的措施，并将“抽肥补瘦”的原则在决议中予以确定。决议指出：“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护符，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大都发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决议还明确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对富农有利，重新确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至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个限制富农的土地分配原则就完整地提出来了。分田斗争也向着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而限制富农的正确方向发展。

然而南阳会议也对富农制订了一些“左”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坚决反对富农”、“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错误影响下，南阳会议把富农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第三种是初期性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农具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农民。其实这种所谓“初期的富农”，充其量不过是富裕中农。加上会议又认为富农在政治上“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在经济上“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因而提出土地革命的“敌人决不止地主一个”，要“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在具体政策上，又提出了对富农要“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这些规定不仅过重打击了富农，而且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为了正确解决土地斗争中的问题特别是富农问题，毛泽东继寻乌调查之后，1930年10月到11月间，又先后作了兴国、东塘、木口村等处的调查，并集中写了一批调查报告，如《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等，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许多政策问题。其中关于富农问题，指出要注意防止过左政策，杀人要慎重；在经济上既不能放任富农自由发展，又不能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即允许富农剥削，但务使富农对贫农的剥削不得过多；允许富农从事适当的商业活动，但不准富农操纵粮食，“政府采取抑制富农政策是对的”。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政策转到了“抑制富农”的政策。尽管在当时总的“左”倾气氛下，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也仍不免带有“左”的因素，但毕竟提出了在当时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地对待富农的策略，毛泽东因此而被骂为“富农路线”。然而毛泽东对富农的较为正确的策略的提出，却对正确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对富农的政策正确，才能既打击和消灭封建地主的剥削，又不伤害中农从而真正团结中农，结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 五 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土地所有权问题是土地革命路线的又一重大问题。中国人多地少，农民长期为土地而斗争，总希望把土地拿到自己手里才放心。因此得到一块归自己所有的土地，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农民“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他们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但这个问题从“八七”会议经过党的“六大”直至“立三路线”统治时期，都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按照共产国际“土地国有”的意见，中共中央一直是规定土地国有或公有及与此相联系的禁止土地买卖。“立三路线”时甚至盲目主张“组织集体农场，以开辟社会主义道路”。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改变了禁止土地买卖的政策，指出“土地国有”现在还只是宣传。但又认为“不能将土地归苏维埃所有解释为土地国有”，故仍然是主张土地公有，土地所有权问题仍未解决。

为了深入土地革命，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打下坚实的基础，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对土地所有权问题作了阐述。通告指出：“农民是小私有生产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土地革命和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从政策上提出解决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毛泽东经过一系列社会调查，也发现“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形势是不好的”。为了从政策上、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解决好土地所有权问题，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苏区中央局2月8日“通告”的精神，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曾山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信中对土地所有权问题在政策上作了明确的规定：过去分好了的田（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分的），即算分定。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藏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动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完租多少，以两边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作生意，赚得钱来归本人。”信中还对土地实行农民私有制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说明，指出所以这样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须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而不是什么恢复地主制度。”毛泽东的这封信，闪耀着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

---

中共苏区中央局：《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年2月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年2月8日）。

辉，它正确解决了我党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信中阐述的理论和政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作出了独特贡献。

至此，经过3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反复的实践探索和不断的理论概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就基本上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土地革命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

在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而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也日趋明显。“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广大农民翻了身，得到了胜利果实，参军支前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从而为红军战争获得了强大的人力物力源泉，为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 第三节 土地革命的曲折与反复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把持了中央领导权后，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经过艰难探索而制订出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而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逐渐出现了逆转。尤其是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大。直至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使党的土地政策重新走上正轨。

#### 一 “左”倾土地政策

王明早在上台前的1929年底至1930年上半年，就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写过不少反富农的文章。上台后，为了更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对地主富农的“左”倾政策，便最先在《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提出：“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再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士兵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农、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这实际上就较明确地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紧接着，“左”倾统治者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土地法草案》，刊登在1931年3月9日的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创刊号上。《草案》规定：“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主，无权取得任何份地”。“富农在被没收以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4月中旬，这个《土地法草案》被王明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带到了中央根据地，强令执行。但受到大部分地区的抵制。为了更迅速、更全面地推行这一“左”倾土地政策，在1931年11月的“一苏大”会上，中央将这个《土地法草案》提交大会通过，这便形成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土地法》明确规定：“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在自己耕种的情况下，“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各苏区已分配的土地，“如不合本法原则者，则需重新分配”。这样，“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就被以法律形式通过而强令在各根据地全面执行。执行的结果，造成了严重危害。它堵死了富农经济的发展出路，即从经济上消灭了富农，也断绝了地主的生路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这又逼得不少地主富农上山为匪、杀人放火、铤而走险，人为地增加了反革命的力量，危害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又由于划分阶级无准确标准而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影响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造成了粮食恐慌、经济困难等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映。

然而，“左”倾《土地法》的贯彻执行并不顺利。发生了许多令“左”倾领导者很不如意或始料不及的问题。一是地主家属仍分了一些田，有的富农也分了一些好田。如福建宁化不少干部群众认为：“不给地主家属分田，还不如把他们都杀了。”这种看法是很普遍的。在江西许多地方，由于“一般农民同志的慈悲心理”，给富农分了一些秧田（属好田）。这些说明农民群众是赞成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二是已分了田的农民不欢迎重新分田。如在江西信丰县，收回地主家属的田，将富农的肥田换给贫农，却遭到农民的反对。他们说：“分来分去，到底分到哪年哪月止？我不要了！”尤其是春耕紧张之时，重新分田已成为农民生产上一件有妨碍的事，广大农民迫切需要的是尽快固定土地所有权而不愿重新分田。三是新区的土地分配遇到困难。新区群众尚未发动充分，是靠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采取派田方式限期分完田的，结果发生农民不敢要地主的田或地主仍来收租的“古怪现象”。这些问题说明“左”倾《土地法》在实践中是有阻力甚至是难于行通的。但是“左”倾的临时中央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纠正“左”倾。而是攻击中央苏区的领导同志，把存在的问题归咎于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说他们“反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说他们“甚至主张‘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富农路线”。为了全面贯彻“左”倾的《土地法》，他们决定开展一场普遍的群众性的查田运动。

## 二 查田运动是与非

1932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议，其中提出：“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因查田运动不符合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脱离了苏区农民群众的要求。所以在1932年，尽管苏区中央局反复要求查田，各地却迟迟开展不起来。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机会主义直接控制了中央苏区，在苏区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和罗明路线。2月1号中央政府土地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再次号召苏区“重新分田”和“查田”，要使豪绅地主得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2月10日，博古以临时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以社论的形式发表文章，重提“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的问题。1933年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即在瑞金县叶坪乡进行了查田运动试点。同

---

《宁化县党史资料》第五辑。

《斗争》第12期（1933年5月6日）。

年6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又作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6月初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临时中央责成已被“左”倾统治者解除了党内和军内职务而只主持政府工作的毛泽东，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因此，当时处于被排挤地位的毛泽东，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前一阶段的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是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一件交织着正确与错误的十分复杂的事件。

毛泽东也是赞成搞查田运动的。但他与临时中央要开展查田运动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临时中央认为他们的“左”倾土地政策没被全面彻底贯彻，中央苏区的同志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的果实还没落到贫农、中农身上，而为富农所攫去”，为此要开展一场查田运动来实现“左”倾土地政策的彻底贯彻。而毛泽东则是将查田运动看作深入土地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或必要途径。他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农村中的土地革命大致要经历三十阶段。这就是“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检查土地的阶段”和“土地建设的阶段”。早在1930年底调查和总结江西的土地斗争情况时，毛泽东就指出：“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他甚至同意“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的意见。毛泽东将土地革命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是将土地革命看作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并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政策措施，这一基本思想显然是正确的。毛泽东还认为，任何苏区大致都有三种区域存在，即斗争深入的、斗争比较落后的和新发展的区域。在第二种区域存在着“革命农民群众同带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这里的中心问题就是查田查阶级的问题”。毛泽东还设想，只要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步骤和方法，查田运动就能健康地进行，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因此，从指导叶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开始，毛泽东就不是被动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而是积极主动地去取得经验、摸索方法、形成政策，力图按自己的意志去开展运动。然而毛泽东既然是在临时中央已搬到中央苏区并直接干预和控制的历史条件下来领导查田运动的，因此就既不可能违背《土地法》规定的“左”倾土地政策，也不能不执行临时中央发动查田运动的指导方针。这就决定查田运动必然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错出现，或基本正确中也有某些错误的十分复杂的情形。

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是1933年6月至1934年1月这段时间的查田运动。他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接连发表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和报告，还起草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重要文件。这些报告和文章，在不能根本改变党中央的“左”倾指导方针的情况下，对查田运动作了详细的说明和部署，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他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这就是说，查田运动既不是搞再分田，也不能把斗争矛头针对地主、富农以外的广大农民群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6页。

《红色中华》1933年6月14日。

众。他规定了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他强调，中农的向背，关系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因此，对富农只能采取削弱的政策，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他制定了划分阶级的标准，为在运动中确定阶级成分提供了基本正确的依据。他设想查田运动大致分四个步骤进行：（一）讲阶级（做宣传）；（二）查阶级；（三）“通过阶级”，他认为这一步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要十分慎重；（四）没收分配。他还强调查田运动中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政策和措施应该说都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但在查田运动开展起来后的实际进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规定的正确方面去实施。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总的“左”倾氛围中，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本身也不能不包含有诸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内容，加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对查出了多少地主富农采用不适当的竞赛的方式，另一方面更由于“左”倾中央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出现了许多“左”倾错误方面的问题。查田运动“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在查田查阶级的高潮中，各地争相竞赛，唯恐落后。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愈多，哪个地方就愈受表扬，被评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反之则受批评，以越多越好代替了实事求是。结果，查田越来越“左”，地富越查越多。许多地方把富裕中农和中农上升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有的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谷租，而极大部分是靠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有的地方把稍微放了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的工人也当地主打了；还有的把做了二、三十年长工或手艺的雇农、工人，仅放几百毫子债、收了几担租谷，也当地主或高利贷没收了。甚至还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等等，出现了严重的斗争扩大化现象。此外就是侵犯中农利益，有的地方专门查中农，说中农中间最容易隐藏富农，搞得中农恐慌，人人自危。还有一个“左”倾现象就是过重打击地主富农，逼得地主富农上山为匪或下水乘船出逃。

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引起了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也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强烈关注。毛泽东在1933年8月作的《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指出，“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尤其是侵犯中农的倾向。“那些经过指导还故意在做这些错误的，当地的上级苏维埃须给他以严厉的处罚”，对侵犯中农及主张消灭富农等“左”倾错误，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过来。为了纠正“左”倾错误，正确地进行查田运动，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0月10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这一《决定》，并同时批准公布毛泽东在6月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虽然仍不可能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但它较明确地规定要以区别劳动与附带劳动来作为富农与地主的分界，要以计算剥削时间和剥削分

量，来作为划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标准，从而使几个较难区分的阶级的划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同时规定要有限制地削弱富农，以避免消灭富农的倾向。依据这些即可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总体上看，这两个文件是符合农村阶级状况和根据地土地斗争实际的，因而也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对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各地依据这两个文件，对错划的成分开始进行更正。如胜利县纠正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1300多家，会昌县踏巡区纠正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57家，西江县3个区纠正了错划为地富的154家等。

正当查田运动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并以纠正错划成分、落实政策而逐渐结束的时候，“左”倾的党中央又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责成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再次错误地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并免去毛泽东担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毛泽东不再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领导工作，也不能再直接领导查田运动了。

1934年3月15日，由“二苏大”产生的新一届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的训令。这个文件无端指斥毛泽东关于划分阶级的正确依据和标准是“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错误地强调“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的‘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开展查田运动依然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样，“左”倾统治者便全盘否定了在毛泽东指导下、在《决定》颁布后进行的纠正错划成分的实际成果，使刚刚开始摆脱“左”倾影响的查田运动又陷入了更“左”的泥坑。所谓“继续开展的查田运动”越来越“左”，不仅将已改正成分的打成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查出许多新的地主富农。如胜利县在20余天内，被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的有890家，还新查出地主富农83家；博生县15天内新查出地主富农50家；胜利县还检举“帮助地主富农翻案”的“阶级异己分子”10多个。中央人民委员会还派了大批干部下去突击、督阵，而且查田运动又与肃反运动、检举运动混合在一起，弄得很多党和政府干部诚惶诚恐，人人自危。对地主富农的肉体消灭也更趋严重。所谓“继续开展的查田运动”在十分紧张和“赤色恐怖”的气氛中强制推行。只是后来由于战争失利，军情紧迫，查田运动便再也搞不下去而不了了之，“左”倾土地政策至此也便宣告破产。

以上可见，在查田运动中，尽管毛泽东也提出了不少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并在发现“左”倾严重时注意及时纠正，因而也的确查出了少数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打击了某些封建残余势力。但由于当时总的“左”倾氛围，即使在毛泽东的文章报告及工作指导中，也难免包含“左”倾因素。更加上“左”倾统治者连毛泽东所起的那些有限的正确作用也不能容忍，因而实际上取消他对查田运动的领导权，这就使事情越办越糟、运动越搞越“左”。因此，从总体上看，为时一年的查田运动给根据地人民不是带来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生产的发展和战争的胜利，而是酿成了根据地内的动乱、农民群众精神的恐慌、生产的停滞和经济的困境。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过左的土地政策带来的根据地秩序的动乱和经济的严重困难，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 三 “左”倾土地政策的纠正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先后撤出各根据地，除川陕、黔东等少数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得不告一段落，“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也因此而在事实上被迫停止执行。但这时并未从中央的政策中明确纠正过来。它的纠正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虽因当时军事形势紧张而未及争论土地政策等问题，但它为纠正“左”倾土地政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这个重要前提最主要的即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同年5月“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8月，党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适应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步纠正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政策。首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随后改变对地主的政策。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富农也可参加抗日，因此加紧反富农的策略已不适当了，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为此，在大多数农民要求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应当照普通农民一样，平均分得土地”，并不得给富农加以特别的捐款或征发。这就把“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改正过来了。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决议等几个中央文件都重申：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但这时尚未改变“地主不分田”和没收富农带封建性剥削的土地的政策。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中央加强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把“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了。为适应这一策略转变，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半年多来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于1936年7月22日又发布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土地政策作了更重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包括封建性剥削部分在内的富农的全部土地都不没收，即“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二是改变了“地主不分田”政策，即地主土地被没收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至此，危害多年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就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全部纠正过来了。

1937年2月，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党中央又声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此后，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就逐渐转变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了。

从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从事和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毛泽东对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其基本思路和设想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制订的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措施，经过了反复实践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最后形成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分配办法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这既包含了作为理论源泉的千百万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重要作用，也离不开党内不少领导同志的斗争实践和理论贡献即集体的智慧以

---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

《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1936年7月22日）。

及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的需要。然而，更主要的则是毛泽东本人的艰辛开拓和勇于探索，以及他满腔热情的创造性工作。除了以上作为占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主导地位的正确方面之外，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 and 实践也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初期的没收一切土地和土地国有、中期对富农策略的略显偏颇和后期对王明“左”倾土地政策不自觉地也有所执行。这里除了缺乏经验之外，主要是这个时期党内接二连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和党内纪律约束等方面的原因所致。因此，其不完善和有某些失误之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并非是毛泽东本人真实思路的反映，这从查田运动中他一旦发现“左”倾危害严重，就力图在自己的权限内尽量纠正便可看出。然而，“左”倾统治者不能容忍他的这种纠“左”，“左”倾土地政策也只有最后宣告破产。直到结束了“左”倾统治，毛泽东被重新确立领导地位以后，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才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 第八章 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了解和掌握城镇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城镇调查。与此同时，他写了《调查工作》一文。该文曾印成小册子，散发红四军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后因敌人多次“围剿”而失传。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一位农民献出了这一珍藏多年的珍贵文献，才使该文失而复得。1964年6月，该文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改称为《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初步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把调查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提出了我党的基本工作路线，总结出了一套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它是我党思想路线产生、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党思想路线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为开创我国革命的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 第一节 “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

1964年毛泽东在回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写作经过时说：“先写了一篇短文，……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对内容作了发挥。1961年他还曾说，他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他是喜欢的。因为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这些回忆，不仅说明了该文对于反对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奠定我党思想路线的里程碑作用，而且反映了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艰苦历程和深刻的时代背景。

#### 一 反教条主义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理论准备不足，革命实践经验不足，对待马克思主义尚缺乏科学态度，加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承认，共产国际曾给予许多正确的指导，这对于中国革命起了许多有益的作用。但也无庸讳言，共产国际也确提出过不少错误的意见，而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又对此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创立发展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根据当时的情况，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这是他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在农民问题、革命道路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建军打仗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产物。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认真地吸取了失败的惨痛教训，在井冈山创建了农村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步。然而，在根据地创建之初，毛泽东也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共产国际“城市中心”的影响，不可能有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要以农村根据地去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然而到1929年至1930年，农村游

击战争广泛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扩大，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城市斗争的开展却累受挫折，非常困难。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国情、斗争的形势告诉人们：中国革命要胜利发展，就必须把工作中首先放在乡村。经过实践的探索和斗争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通信中，最先在实际上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摒弃了共产国际指示的并为教条主义者所奉行的“城市中心”的框框。对此周恩来曾指出：这封信“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这样就开始形成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这是他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的一个重大成果。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国际共运中没有先例，马列书本中更找不到现成答案。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此作出支持和肯定的决议或提出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措施。面对各种各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深入调查，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践中，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以及党和军队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大大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和革命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认真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教训的结果。

与毛泽东相反，由于共产国际完全按照他们定的基调来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他们派出代表罗明拉兹来中国主持“八七”会议，把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中国同志身上。这就使中国党不能也不敢正确总结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而是跟着共产国际指责陈独秀，说是他违背了国际指示才使大革命失败的。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更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更忠实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共产国际右时跟着右，后来“左”了又跟着“左”。共产国际不断发出错误指示，中国党则不断地以错误指示领导中国革命。如果说毛泽东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取得了上述成果的话，那么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此后则教条主义日趋严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为新的斗争指明了方向，是革命转折关头中共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投降主义的不满，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错误指导，便为“左”倾错误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罗明拉兹在报告中将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没有保存革命力量和革命阵地的退却计划，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八七”会议后，这种“左”倾情绪继续发展。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由于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参与，便使“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命令举行毫无希望的武装起义，结果相继失败。1928年6~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一些正确的分析，但仍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划到了敌人一边。对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尤其是忽视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虽然在决议中也提到了发展根据地，根据地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但实际上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发展根据地的目的是要为城市工作服务的。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强调城市对农村的作用。共产国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总是以俄国革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对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产国际不但不予以认可，反而把正确的游击战争同“左”倾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加以批评。如1928年2月，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就教训中国党：“必须反对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这实际是用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观点来指责中国党“沉溺”于农村工作，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忽略了城市对农村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批评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而以“城市中心”模式塑造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不是抵制，而是盲目听从。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党，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而照本宣科地批评各地武装起义，说是“因为缺乏城市领导，且没有适当的配合和联系”而失败；批评湖南、湖北省委在秋收暴动以来“主观上只号召农暴而不要城市”，“沉溺于”游击战争；单纯要求各地党组织“恢复城市工作，建立城市工人对乡村的领导”，强调“城市是乡村的领导者”；并根据共产国际这方面的错误指示精神，以城市为中心向地方作具体工作部署。

除了上述革命道路上的问题外，由于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李立三本人的“左”倾意识等原因，对于共产国际在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等方面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也是言听计从的，这都反映了当时党中央“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严重程度。这从以下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四次来信所作的反映即可看出。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发出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信中对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作了错误分析，开始提出了举行总同盟罢工、准备夺取政权等脱离中国实际的过“左”口号。同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中央通告第37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认为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足以成为中共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接着，《通告》就按共产国际的基调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提出了党的策略任务。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批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上“犯了最大的错误”，认为中共“六大”提出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是路线错误，实际上提出了对富农与地主不加区别地反对的过左政策。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就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表示：“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提出党的策略是“应坚决的反对富农”。此后中央就开始了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这不仅是在消灭农村中的资产阶级，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的通告》（1928年4月30日）。

而且侵犯到中农即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人为地削弱了革命力量。

1929年8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不顾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工运才开始恢复的形势，要中共拒绝利用合法斗争，以消灭黄色工会、公开赤色工会去独立领导斗争等。对于这些脱离形势和实际的策略，中共中央照例“完全接受”。于同年12月14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62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表示：“中央经过详细讨论，完全接受国际之指示”。接着，检讨了过去的所谓“错误”，完全按国际的指示要求布置了消灭黄色工会等等过“左”的斗争任务。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发出了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并以此向中国共产党布置了过左的任务。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可以而且应当去准备群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工农政权了。还布置了其它一些过左政策和任务。中共中央又于1930年1月11日作出决议，“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决议》重复共产国际的调子，认为目前中国“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必须按国际指示，现在就准备群众去“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决议还不加区分地认为要对改组派和改良主义这些“最危险的敌人”作“最坚决的斗争”。

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国际四次来信所作出的反映，鲜明地体现出对国际指示的“本本”主义态度：不管国际指示正确与否，离中国实际差距多大，都亦步亦趋，一概认为是“完全正确”，表示“完全接受”、“完全同意”。再加上中央在给各地发的指示和决议中，又冠之以“经过详细的讨论”一类的语词，那就更具迷惑和强制作用了。对一个远离中国的指挥中心给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脱离实际的发号施令，持如此照抄照搬、盲目服从的态度，当然会严重影响自己策略的制订而危害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势必会激起党内如毛泽东等那样的善于独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同志的抵制和反对。

当然，中共“六大”以后，革命渐趋复兴，形势确有转机。但敌强我弱且十分悬殊的形势并未改变。然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只看到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加上共产国际连续来信中一系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就开始发热。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他同当时党的许多老干部一样，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但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尚嫌不足；他有较多的领导城市工运的经验，但缺乏农村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他立场坚定，且有冲锋陷阵、一往直前的冒险精神和好动敢干的性格，但缺乏冷静的头脑和运筹帷幄的谋略。这样，在国内外出现的某些有利形势的刺激下，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的严重影响下，便使得党内不断滋长的“左”倾思想终于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体系。

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李立三本人多次发出通告和讲话，强调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认为现在不是积蓄力量而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夺取政权的时候了，尤其是片面强调产业区域工人斗争和中心城市暴动的作用。认为只要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形成革命高潮，而只要把许多中心城市的暴动汇合起来，就能实现全国总暴动的胜利。从而认为乡村必须服从城市的斗争，即仍是奉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想。1930年初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思想而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年4、5月间，李立三便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等人的农村中心正确思想。

他断言：“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这期间，李立三还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等论文，发表在4、5月间的《红旗》上。5月中，他又把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以《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为题，在《布尔塞维克》上重新发表，以示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系统批判。其内容基本上仍是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中的不加区别地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坚持城市中心的革命道路和过高估计有利形势等“左”倾论点，尤其是坚持城市中心、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此外，这时还有人以记者的名义在《红旗》发表文章，批评主张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观点是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写到马列主义书本上去了的才是马列主义，书本上没有写的就不是马列主义。

面对上述日趋严重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再也不愿沉默了，他挺身站出来说话了，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响亮而严肃的口号。他在实际斗争中最先认识和感受到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谬误性、危害性。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的勇气，针锋相对，独树一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了党内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错误，强调“本本”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制订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以争取群众，战胜敌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他针对当时党的领导对共产国际指示照抄照搬的情况而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句话中连呼三个“中国”，真可谓令人振聋发聩！

## 二 对“本本”科学态度的结晶

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学说。然而，它的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对自己的理论，也从来就是采取这种

---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科学态度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多次批评过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呆板的公式到处照搬照套的错误倾向。例如多次批评过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的本本主义错误，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不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具体指导本国的斗争，而是把它变成“刻板的正统思想”“到处搬用”，“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的教条主义错误。马、恩一再教导各国无产阶级：“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他们要求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原则时，要灵活地、创造性地用它来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从来就不墨守成规的。马克思主义既是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更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各种错误思潮、流派的批判中产生发展的。如果马克思不能对前人的学说吸取精华、排除糟粕、跳出旧窠臼、开拓新领域，而局限在18世纪末的刻板公式和现成水平上，那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也仍然是发展的学说，它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用来自群众斗争实践中的新结论来丰富自己。马恩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中，是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方法的，他们都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来就认为不同国家的革命应采取适合不同国情的策略和走不同的道路，并从不拒绝来自群众斗争实践所创造的新形式。可见，马恩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与本本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他们也从来就反对人们以本本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理论。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革命，但也并非局限于马恩的现成结论。比如列宁根据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和新特征，就没有为马恩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中“同时发生”或“同时胜利”的结论所束缚，而是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时，也坚持同本本主义作斗争。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是行动的指南，是对于革命的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他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决不能“拿狭隘了解了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否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列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接受马列主义以后，也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种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的，是把马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总的指导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来学习和运用的。他认为马列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照抄照搬是不成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的。虽然它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十月革命作榜样，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开展革命，又不能不遇到马恩所未曾预料到的、别国也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及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比如中国革命的敌人，既有帝国主义，又有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既要反帝又要

---

《马列著作选读》第150页。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2页。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反封建。而英、法、德等国则不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一般说来，都只是推翻国内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待无产阶级革命时，封建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和统治力量都已退出了这些国家的历史舞台。俄国革命时虽还有农奴制残余，但革命的主要敌人也已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不同，由此决定革命过程中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有其特殊性。比如中国民主革命就不能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资产阶级的任务只能留待民主革命胜利后解决。另外，中国的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也都有其与别国这些阶级不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此等等。因此，解决中国革命的这些复杂问题，决不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本本”所能奏效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一直反对照抄照搬而强调把握马列主义精神实质，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而学以致用。他说他“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也即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因为毛泽东一贯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包括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贯反对照抄照搬现成结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以当党内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一切从“上级”指示、从马列主义现成结论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并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危害时，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向教条主义领导者发起挑战，也就是合乎逻辑、十分自然的事情了。所以说，毛泽东一贯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是他能初步提出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 不惧权威的个人气质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党的思想路线，不仅有它客观的社会条件和实践基础，也有他不惧权威，不拘成训的个人气质的影响。

无论是研究早年的毛泽东还是纵观毛泽东的整个一生，我们都可以发现：毛泽东是旧的传统秩序及规范的挑战者和反抗者，是一个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一生敢于为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紧张奋斗的革命家。10岁时他就敢违抗私塾先生关于只能读经书不准看所谓“邪书”的陈规，被先生指斥为反叛学生而被赶出学堂门；他敢于在家长制极为森严的时代同父亲的暴虐展开激烈的反抗斗争；他还敢在当地的“土皇帝”族长头上动土，发动农民开仓济贫，打击族长豪绅囤积谷米的丑恶行为；甚至13岁那年——他还是一个乳气未干的孩子，就敢于向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发出大胆的挑战。一次他偶翻《论语》，几行大字在他眼前跳动：“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看到这里，他就开始怀疑起来，心想：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蠢话来了？贫苦人怎么能够快乐？财主老倌又怎么会穷人对穷人讲究礼貌呢？这位孔圣人只怕有点糊涂呢！13年后，他又一次提出反孔问题，这时正是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认为反孔有很多理由，单就这“孔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老爹”“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他认为凡是要探求真理，成就事业，就必须敢想敢于，而不能满身的奴性和惰性。因为“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必须洗涤国民旧思想，开发国民新思想。他大声呼吁种种方面都要来一个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他对传统观念中的那种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很是反感。他从《西游记》的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传统观念的挑战和突破，于是为这个孙大圣“欢呼”、叫好。他从《淮南子·天文训》等典籍中看到关于共工的神话传说，最为欣赏共工那种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种新秩序的形象，并在自己作诗词时予以歌颂和阐发。他不相信一成不变的现成结论，不愿受既成原则和现成结论的束缚，努力超越现实。他在现实生活中甚至多次同人讨论过这样一类问题：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我们是洋人还是中国人等等这样一类在旁人甚至于几岁小孩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便是住在天上；我们有做神仙的资格；外国人看我们也是洋人。总之，不拘成规、富于想象、努力超凡脱俗，是毛泽东特立独行、一生进取、富于天才的创造魅力的人格内容。他有着激烈的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情绪，有着朝气蓬勃的创新欲望，有着逆反传统习惯势力的文化冲动和蔑视现存思维框架的否定精神。这种个人气质还体现在他早年对读史、立志、行事等方面的观点上。对于读史，他认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因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他的不拘成规的思维方式和独到见解，也时常体现在他对历史现象的看法方面。关于立志，他认为不能以前辈及近人在军事或教育等方面有成就因而羡慕，出于一种模仿性遂“盲从以为己志”。而应从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中求得真理，以奉之为“言动之准”、“前途之鹄”，如此立志，才“非盲从之志”。关于“行事”方面，他认为当今人们行事，往往“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因此要普及哲学，以使人们开动自己的脑筋，“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总之，在读史、立志、行事等方面，他都强调必须有自己的主张和头脑，而不能盲从。这也正如他在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后对全党所郑重告诫的那样：“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以“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到了晚年，他还曾大声呼喊：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他的这种对教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6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68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93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2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7 页。

条主义的批判态度，就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甚至丝毫马虎不得的医疗问题上也“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次，毛泽东牙痛得很厉害，但不肯用药而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去战胜，几天后果真好了，他很是高兴欣慰，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说：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不可不听”、“不可全听”，“尽信书则不如全无书”等观点，都鲜明地体现出了毛泽东不以教条主义的方法去盲从任何权威的可贵精神和科学态度。甚至像医生对病人这样的绝对“权威”也不愿盲从。

很显然，对这样一位一生不信邪、不信神，不盲从权威，不迷信书本，不愿人云亦云，不甘逆来顺受，只相信真理，只相信科学，只相信“人生社会的实际”的革命家、政治家来说，“本本”主义者的那套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拿上级指示来的作法，自然是为他所痛恶、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本本”主义盛行并必然带来危害之际，他不可能不挺身而出，不可能不向“本本”主义领导者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不言从、不迷信国际训令和别国经验的可贵精神，也包括不畏惧、不苟同“本本”主义领导者的无畏气概。他大声疾呼，对执行上级指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而不能“一味盲目执行”；对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要“反对本本主义”。这种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在当时尤其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毛泽东的那种不甘于现状而思积极进取、不人云亦云而善独立思考、不逆来顺受而敢反抗斗争、不拘泥成训而喜变革创新的优良的个人气质，不能不说是他能提出我党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和条件。

## 第二节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我党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话，那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是我党的基本的工作路线。因此，《反对本本主义》既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首次提出，也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并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初步形成。

### 一 注重调查研究

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事调查研究的一生。正如1970年12月他与斯诺谈话时所总结的：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调查研究。这表明注重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1913年进入湖南一师读书起，到1930年5月止，毛泽东深入工厂、农村、矿山、部队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 （一）早年的调查。

由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有献身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远大抱负，所以早在他求学时期就开始了艰苦的调查工作，并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就必

须把握中国的国情。1913年青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遇到了继承王夫子、谭嗣同学说和革新精神的杨昌济先生。在老师的教诲下，在近代爱国志士的影响下，毛泽东一方面发愤攻读，博览古今中外群书；另一方面继承了近代以及古代一些先进人物在调查研究方面的好的认识和实践。他对中国古代近代一些有益的社会调查方法，诸如孔夫子的“每事问”，司马迁实地访问写作《史记》，顾炎武载书游历北方大川等都愿予以借鉴。甚至他还崇尚蒲松龄的调查研究方式。他曾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里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的狐狸精来呢？然而，早年的毛泽东更是羡慕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天下的行动。如司马迁的“览倚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的游历调查。直接启发他外出游历的，则是看到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登载的一则游记：有两个学生走遍全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他当时十分缺钱，“身无半文”，便决定“先在湖南旅行一试”。于是毛泽东常利用周末和星期天，和亲近的同学走出校门，体察民情，边走边观察，看到农民或工人在干活就上前帮助，边干边拉家常，了解他们的人口、耕地、收入、支出、吃穿、住用等情况。1917年暑假，他又邀请当时在教小学的朋友肖子升，采取“游学”的方式旅行调查，身背包袱雨伞，脚穿草鞋，从长沙动身，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多里，去过热闹的城镇，更到过偏僻的农村。一路上，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土人情。同行的肖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不同，他平易近人，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请教，愿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态度不同，收获也不一样。对毛泽东来说，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这次调查，不仅锻炼了筋骨，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能力，而且知道了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事情，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对农村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18年8月，毛泽东带领25名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由长沙到北京。行至河南郾城，因大水火车停开，毛泽东安排大家利用候车的机会，分批到车站附近的农村看看，了解北方农村的情况。他和二位同学来到漯河寨，耳闻目睹了北方农民的痛苦生活，深切感到北方的劳苦大众和南方的劳苦大众都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都需要改变现状。

## （二）调查工人状况，指导工人斗争。

毛泽东不仅在早年就多次考察了农村，了解农民，而且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城市工人、了解工人。他经常到居住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近的铁路、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的工人中去，和工人交朋友，调查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要求。在与工人们的接触交往中，他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因整天忙于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没有时间进学校读书，绝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由于不识字，常被人欺侮，生活上也有极大不便，他们迫切需要学习文化。毛泽东便以学校学友会的名义，于1917年冬创办了一个工人夜学，帮助附近的工人学文化。这是他初步接触了解工人的结果，同时又为他

---

参见《没有带走的记忆》（《解放日报》1983年12月28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工人创造了条件。1918年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近郊的长辛店铁路工厂。他深入到工人中，从生产到生活，广泛进行调查。在了解了工厂的基本情况，就到设在这个厂的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看望湖南青年，询问他们和工人的关系搞得好不好？实习中有哪些困难？能否适应北方生活等。这次考察，使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在先进大企业中，产业工人劳动和生活情况。1919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预备班的湖南青年，并再次到工人中去，调查了解工人现状和要求，深感唤起工人的觉悟，组织工人起来进行斗争，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湖南后，遵照党的决议，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卓有成效的湖南工人运动。首先也是对湖南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了解，以为开展工人运动作准备。安源路矿是当时湖南支部（后为湘区委员会）辖区内的最大工业企业，也是工人最集中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秋，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深入安源这块工人运动的处女地调查。到安源后，他利用同乡关系，住在八方井44号西平巷工段长毛紫云家。第二天就由人陪同，提着小油灯下到环境恶劣危险、工人又很集中的西平巷采煤掌子面，以参观为名，找工人谈话，亲自体验工人的痛苦生活。这里无任何安全设施，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一头积水成河，工人们叫它“水牢”。工人们用粗笨的原始工具，躺倒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看到这一切，毛泽东十分关切地向工人们问这问那。出了西平巷，又去东平巷同工人谈心。从早晨8点多下井，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出井。出井后，顾不得休息，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等地考察，还特地访问了工人的“餐宿处”，一边抽工人递来的竹脑壳烟，一边同工人交谈。还亲自爬到三层床上看工人盖的油渣似的破被，亲口尝了工人们吃的霉米烂菜。这次他在安源约住了一个星期，同许多工人交了朋友。在倾听了工人血泪控诉后，毛泽东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剥削者压迫者斗争。通过这次考察调查，毛泽东发现安源是一个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工人运动处女地。随后派去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等许多干部去安源开辟工作，组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了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此后，毛泽东还多次到安源调查了解工运状况，指导工人斗争。

1921年11月，毛泽东在对湖南工人阶级状况所作的调查中发现，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这一组织人多势大，但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严重，如果不把他们争取教育改造过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就会妨碍湖南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分析和思想工作，终于使劳工会的负责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争取了广大的群众。1922年夏，为发动和领导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的工人运动，毛泽东乘坐小木船从长沙到水口山铅锌矿调查了解工人状况。他一边和工人劳动，一边了解情况，还深入到工人们住的茅棚子里去访问。随后指示衡阳党组织和湘南学联要担负起对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加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

### （三）农民问题的调查。

1925年初起，毛泽东回韶山利用养病的机会，广泛开展了农民运动。自

此，随着他视角重心的转移即对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他更广泛深入地对农村和农民状况的调查。虽然他早年在求学期间也调查过农村、了解过农民，但那时只能看到农民痛苦生活的一些表面情况。而此时毛泽东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和农民作更深入的更高层次的调查，深入解剖该地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分出敌我友，以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指导斗争的开展。

早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工农运动”的大会发言中，就用他调查到的事实努力证明：工人人数虽少，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他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注意农民运动，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广大农民就一定会起来，国民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但因陈独秀的阻挠，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意见未能在大会决议中体现出来。

1925年初回韶山后，他首先所作的工作仍然是调查。他利用会见亲友及深入农户等各种形式，对附近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主佃关系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然后组织农民起来开展了阻禁、平崇等斗争。这期间毛泽东起早睡晚、翻山过坳，深入贫苦农民家促膝谈心，走几十里路去访友，广泛接触群众，深夜回来又忙于写调查笔记或给一些党组织写信，以指导各地的运动。

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除亲自给学员授课外，还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作农村调查，发调查表给他们填写，了解他们家乡的佃主关系等情况。并按地区把学员组织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36项农村调查研究项目，引导学员联系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同时组织学员赴广东的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然后把学员写的调查材料选编成册，收集在《农民问题丛刊》中。毛泽东亲自为丛刊写了序言。他指出：过去一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回尽可能搜集到了一些材料。这些调查材料所述虽只属大略，然有了这一点，便也觉得可贵。他还指出，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间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后，毛泽东来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又对江浙两省的农民运动情况进行了考察。草拟了《目前农民运动计划》，并收集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等地农民状况的资料，于10月在《向导》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这期间，毛泽东还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可耕地的70%，而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可耕地的10%到15%。毛泽东的调查材料清楚他说明了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为了击退各种各样的攻击、责难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逆流，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26年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来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考察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考察湘潭、湘乡、衡山。1月4日从长沙出发，当天到达湘潭县城。他在湘潭县境考察的重点是韶山。他由县城经银田寺、清溪寺进入韶山冲，从1月5日到9日在韶山考察。在韶山的5天考察中，他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召集党的干部、农会负责人座谈，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乡

里农民运动情况。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专门的调查会，并一起研究工作，制订农运斗争计划。他总是一边提问听汇报，和大家交谈，一边亲自作笔记。白天忙个不停，晚上开完会，还要在小油灯下整理调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1月9日，毛泽东离开韶山，下午到湘乡县棠佳阁，10日抵湘乡县城。14日又从湘乡出发，经肖家冲，到了衡山县的白果、福田铺、世上冲，历时好几天，最后到达衡山县城。一到白果，甚至连茶水也没顾得上喝一口，就深入群众中，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当晚，毛泽东在衡山二区农民协会所在地的圣帝殿召集有斗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取汇报。听了有关打土豪、斗地主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高兴，不时称赞“好得很”，指示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播向三乡七泽。毛泽东特别称赞衡山的妇女们为自己的解放所进行的大快人心的斗争。在衡山县城，毛泽东亲自到农训班、妇训班上课。当他了解到农训班是采取边学习、边调查、边工作的方法，便赞扬这样做很好，称赞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方法。1月24日，毛泽东回长沙，将考察三县的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详细报告，并在党校、团校作了报告。第二阶段是考察醴陵、长沙两县。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到醴陵。2月1日，步行25里到南乡东富寺。2日离开东富寺，经县城、龙凤庵到渌口。2月4日到长沙县考察。回长沙后，又把考察醴陵、长沙的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报告。2月12日，毛泽东带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资料，离开长沙到武汉，接着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用大量的确凿的事实，驳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热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奇勋伟绩，说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报告宣传了群众路线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制定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这篇通过广泛深入的考察而写成的调查报告，成为我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经典文献，对后来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都起了重大指导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还可说为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某些理论基础。

关于这次大型调查活动的情况，毛泽东1941年在延安时又作了一次回忆介绍。他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人’。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大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避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遗憾的是，这五县农民运动考察的原始材料放在杨开慧手里，她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这五个县的原始调查材料至今仍未被发现。

##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进行调查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调查工作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调查不是去民间听一些新奇

的故事，更不是为了装璜门面，而是为了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正是这种态度，使他每次调查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革命的决策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部起义，在攻打长沙的目标受挫以后，他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是否适合作革命根据地，它有些什么特点？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毛泽东和起义部队对罗霄山脉的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确立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红军部队在上山前，毛泽东就向了解罗霄山脉情况的人作了大略的调查，知道了罗霄山脉的大概面貌。上山后，毛泽东和广大官兵，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直接观察了险要山峰、大小河流、交通、土地、气候、农产品、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等。同时又向住在山里的农民群众了解山区的政治情况。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罗霄山脉的各个地段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攻可守，中段的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是许多有利条件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北至湖北南部的广大区域，分南、北、中三段。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两省边界。北有宁冈，南至遂川，东到永新，西达湖南酃县。周围500多里，都是高山连绵，有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五大关隘，地势险要，有许多地方连羊肠小道也没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去。山里树深林密，经常云雾弥漫，气候多变。在军事上，可攻、可退、可守。

从经济条件看，大小五井虽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但山上竹木丰富，所谓“千山竹，万山木，走路不见天，一望不着边”。因此，可用竹木换取周围地区的粮食。另外，山间的荒地比较多，可以开垦种植粮、油作物。因此，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红军吃饭问题。这就为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从政治条件看，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都有较好的基础。北伐期间，井冈山建立了地方党组织、政权和农民武装，还建立了许多农会和工会，同土豪劣绅进行过斗争。加上在地理位置方面，井冈山远离中心城市，敌人统治力量也比较薄弱。又因处四省边界，革命力量在政治上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到几个省。

毛泽东在调查中还了解到，由于井冈山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所以过去曾存在过武装割据。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仍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在山上活动。他们各有60支坏枪，曾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靠着井冈山的险要地势，仍然坚守下来了。这越发证实了井冈山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分析了井冈山的各种有利条件，吸取了袁文才、王佐及此前的朱孔阳等在井冈山上坚持地方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得出结论，确认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党内有的人在遇到败仗或被强敌跟追的时候，就产

生悲观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怀疑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然而毛泽东由于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注意调查研究，胸中有数，能够把握形势发展的规律，站得高，看得远。因此即使在败仗面前，在困难面前，仍对革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并向有悲观情绪的人做耐心的思想工作，鼓舞信心，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并由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正是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结果。没有调查研究，靠主观臆想，靠书本上的现成结论，是不可能走上这条正确道路的。

1930年前后所进行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则对制定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井冈山时期，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深入调查了解了湘赣边界的遂川、永新、万安、宁冈、莲花、茶陵、酃县等县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并亲自在永新的塘边村蹲点，总结塘边村的分田经验，征求农民的意见，1923年12月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既是一年来土地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毛泽东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晶，它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却对以后土地政策的制定起了奠基的作用。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土地革命的深入，新的形势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更系统的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在粤赣边的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抓住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具有代表性的寻乌县，找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曾在知县衙门管钱的失业小官吏等各方面的代表共11人，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拜访、直接观察和开调查会等方法。而主要是召集上述11人，在寻乌县的马蹄冈，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开会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口问笔录。除了开调查会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个行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获得了大量生动、丰富、真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调查之后，毛泽东在江西宁都的小布圩，对大量的资料作了分析整理，写出了《寻乌调查》，共8万余字。除“前言”外，共分五章39节，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其内容不仅包括农村，而且第一次调查了城镇，尤其是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历史发展及现状。且寻乌的商业是这次调查的重点。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其中“寻乌的商业”一章就长达3万余字，是毛泽东进行城镇调查留下的唯一系统的材料。毛泽东通过调查得来的大量资料，批判了过去对城镇商人的一些过左政策，为制定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正确对待富农，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是寻乌调查的又一大重要功绩。如前所述，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发现富农在抽多补少时拿出去的只是坏田，不肯拿出好田的情况，认识到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因此，在同年6月他主持召开的南阳会议上，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即于“抽多补少”之外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这是一项限制富农而有利于贫农的重要政策，

从而使土地革命向深入发展。

为了研究土地斗争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又于1930年10月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他选择了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个县交界的兴国县永丰区，找了该区送来当红军的8个农民，在罗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由毛泽东提出调查提纲，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经8人同意然后写下来，一时得不出结论的，就叙述他们的答话。调查中他了解到，通过土地斗争，广大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真正感到工农政府是自己的政权，必须保护它。所以，土地斗争后的农村，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纠察队、红军预备队等组织。这表明经过土地斗争，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对维持地方治安，除奸反霸、支援红军，起了重要作用。从阶级关系来看，“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贫农除了田外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雇农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在土地斗争中，和贫农一样，分了田翻了身，所以贫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依靠对象。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20%，土地占15%。因此，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放哨、开会，这是巩固地团结中农的依据。后来毛泽东回忆兴国调查时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兴国调查的规模仅次于寻乌调查，它对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游民等都分别作了深入调查和专门分析，这就使毛泽东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这些成果都弥补了寻乌调查的不足。

此外，关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区域范围问题、关于土地分配是以人口还是以劳动力为标准的问题、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等等，也都是毛泽东在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得到解决的。

### 第三节 讲究调查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反复强调，不作调查研究就要陷入教条主义。但是，他认为如果没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即使作了调查研究，也仍然难免教条主义，达不到反对“本本”主义的目的。因此，不仅要懂得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而且要注重调查的态度，讲究调查的方法。毛泽东在总结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过程中，不仅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总结出一套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强调要注意调查研究的态度。

#### 一 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

调查研究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但是遵循不同的原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为此，毛泽东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

第一，调查的主题必须明确集中，有的放矢。主题是中心，也即是我们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调查若无主题，就像瞎子摸鱼，随便到一个地方去乱抓一把，不但不能收到效果，反而浪费人力物力。主题应该集中，每次调查最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抓住了这个问题，一切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问题，把

主要的东卤丢掉了，仍然是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提出：“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份。”

主题确定以后，还需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所要调查的项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这些项目应该是把许多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排列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凡调查项目可以制表的，就应事先制成调查表。有了明确的调查纲目，就可以保证围绕主题，步步深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第二，要应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对大量的感性材料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

那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调查研究呢？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的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这就是说，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应当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从事物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才能求出事物的规律。否则调查出来的材料只能是个别事物的堆积，或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得出的错误结论。因此，为了搞好调查研究，就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学习，以便端正思想，善于总结经验，做好工作。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最根本的原则。所谓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是指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就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观成分，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夸大，不缩小，这就是调查中的唯物主义。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调查不是为使主观符合客观，而是要使客观适应主观，“按图索骥”，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这种方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过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假设，小心的主观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我们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就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冷静地了解事实本身。另一种情形，就是要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认真检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在社会调查中，由于被调查者可能受切身利益的牵连，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5 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3 页。

或其他种种的局限，反映的情况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需要检证、核对。为此，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做周密系统、深入细致的工作，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也不能偏听偏信。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和利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新规律往往会遇到强烈的反抗，即使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仍然存在某种阻力，比如当调查研究揭示出某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时，常常会触及某些单位，某部分人或某些个人的既得利益，有时还会触及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就要求我们的调查者要有勇气冲破重重束缚，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打击，没有这种无畏的精神，要想调查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以前，由于“左”倾错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又不允许反映真实情况，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许多调查研究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随风转，成为政治运动、政治口号的附属物，堆满大话、空话、假话。因此，调查研究也有一个提倡讲真话、讲老实话、恢复我党优良传统作风的问题。

第四，调查研究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善于发现新事物，注意事物发展动向，为预测和决策工作服务。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步的，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刚刚产生时，总是比较软弱无力，居于少数，活动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只有得到人们有意识的扶持才能迅速成长。因此，“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在调查研究中，如果不特别注意发现新的萌芽，即使新事物就在面前，也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失之交臂。这样就会使新生事物遭到埋没，延缓了它成长壮大的时机，或者由于不懂得分析鉴别新生事物，说不定把腐朽当神奇，不自觉地压制新生事物，如同后来毛泽东说的“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立足于现实，放限于未来，为了前进而发现新事物，支持新事物。

在现实生活中，及时地发现新生事物，对于预测和决策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前几年农村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仅仅属于个别情况，而且不少人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我们党及时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新生事物，迅速打开了农业生产的新局面，并且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子。运动在发展中，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因此，要努力调查新情况，研究新动向，解决新问题。

第五，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有没有正确的态度，是能否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条件。毛泽东曾经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甘当小学生要有满腔的热情。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抱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和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消除隔阂，得到群众的信任。毛泽东在总结调查研

---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究经验时深有体会地说：“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们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甘当小学生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不能只是昂首望天。如果以领导者自居，居高临下，没有放下架子的精神，是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有些人下去搞调查，盛气凌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一开口就是官腔，自以为是，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群众只会望而生畏，根本不愿理睬。只有眼睛向下，平等待人，才能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甘当小学生，还必须有求知的渴望，虚怀若谷，抱着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恭恭敬敬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地发展变化的，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因此调查研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搜集大量材料与数据，要反复思考与分析，不花气力、不动脑筋是得不到真理的。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明，欲穷千里目，就得先下楼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既不愿下楼，又不愿上楼，怎能穷千里目呢？天下是没有那种便宜事的。做调查研究工作，应该有张良求师的精神，虽百折而不变初衷。

## 二 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调查研究领域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基本调查研究的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

第一，普遍调查。调查研究的规模和范围应根据所要了解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一般可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两种方式。

普遍调查是从面上了解一般情况的方法，可采取“走马观花”、“周游列国”的方式进行，从整体上掌握事物的全貌。也可以采用填表等书面方法进行，对有关范围所有的对象逐一进行调查。例如人口普查，用填表方式便于统计，能具体准确地反映情况。普遍调查的好处就在于它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只能了解表面现象，得到比较肤浅的材料，不能对事物的内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普遍调查必须与典型调查相结合。

第二，典型调查。典型调查是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上，做“解剖麻雀”的工作，取得更为详细的具体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综合起来，对“麻雀”得出总的概念。这就是“下马看花”。这种方法能正确地了解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极为重视并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说：“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

个合作社搞清楚，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这就叫做‘解剖学’。”

典型调查是从了解个别入手，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因此，个别点的选取，必须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典型的选择可以根据调查目的来考虑，解决的问题不同，典型的确定也不同。毛泽东介绍了两种选择典型方法：一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从地理位置确定典型，寻乌调查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寻乌这个县，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二是根据事物发展进程作分类调查。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进的，二是中间的，三是落后的。每类调查两三个，便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为了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仅选一个典型往往还不够，应该在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内由一个典型再及一个典型。因为在一个典型材料中，未必有完全的代表性，而且只研究一个典型材料，有时也可能把它们所特有的现象，误认为一般，有了若干点的详细的典型调查，还要结合面上的情况。这就是说，只有采取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走马观花”与“下马观花”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既广且深，得出结论也就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

第三，会议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忠实可靠的方法。由调查者亲自主持会议，每次参加的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要使情况有代表性，“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年轻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

调查会要采取讨论式，只有这样，才能近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与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的。讨论式调查会的长处，就是能集思广益。由于各个人的经历、环境和职业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难免有各自的局限性，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看法，反映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就需要磋商。调查人按照纲目提出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专门召集调查会外，证可利用各种会议——干部会、代表会、群众会……收集材料。这些会议上所讨论的都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情况很具体，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机会。还有一些会议，如座谈会、汇报会，本来就是调查研究性质的会议，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可以了解很多情况。

第四，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这种方法可以弥补开调查会之不足，更深地挖掘材料。有些会议上不便讲的问题，个别谈话时就能毫无顾忌，谈吐自如，询问的时间、地点较灵活，可以边干活，边扯家常，边了解情况。这样可以把调查会上得到的线索或了解得不够深的材料，弄得更清楚。询问时要对被调查者基本了解，采取适当的方式，提出适当的问题，注意对方的心理状态，根据对方思路发问。如对方不明来意要解释，有顾虑要做思想工作，如有僵持要换个角度去问。尽量使对方畅所欲言，全面深入地掌握真实材料。

第五，收集书面材料。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这也是调

查的一种方法。这样做有助于全面了解情况，提高调查效率，也比较容易。但是，这样收集的是第二手材料，要善于加以分析、验证，不能跟着现成材料转。

第六，蹲点。蹲点实验是深入基层调查的有效方法。有时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就不能仅限于开会、访问等方法，而要使调查研究与当时当地的工作配合起来，协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实践一番，可以在工作进程中得到许多生动的材料，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结果是否真实，也可以随时摆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这样有助于摸到有用的材料，抓住事物的本质。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实践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蹲点的过程同时也应是试点的过程。了解了情况，决定采取某种措施，推行某种政策，在全面铺开之前，先在点上试验，发现利弊，使之不断完善，以达到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一般的目的。

上述几种调查方法，各有长处，应根据所处环境、条件和能力灵活运用。同时这些方法也不是彼此隔离，彼此孤立着，而是互相联系的。因此，在实际调查中，有时还需要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不能局限于某一种方法。我们应当把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认真学习、领会这种方法，并努力学会掌握运用这种方法。

## 第九章 政治思想新主题

抗日战争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反对本本主义》所体现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还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话，那么，抗日救亡的客观形势与价值目标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真正成熟起来；从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来看，日本的侵华政策与活动结束了内战的格局，再度结成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打开了政治上的新局面；从毛泽东思想发展来说，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使得毛泽东思想臻于成熟与系统化，在思想轨迹上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巨涛中，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战略家的形象，一个民族巨人的形象终于出现。

### 第一节 新主题的形成

“中华民族，氏族轩辕；黄帝之陵，口口田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世变沧桑，中更跌蹉；越数千年，强邻蔑德。东等不才，剑履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这是毛泽东长征达到陕北后写的《祭黄帝文》中的文字，民族自尊与抗日救亡之心跃然纸上，表明他的思想主题由苏维埃革命转向抗日救亡，但这一主题的转变与形成却有一个过程。

#### 一 历史主题的变换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政治的一般主题，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规定了自己的最低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两对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决定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主题，决定了不同的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与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九国公约”确定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中国各派封建军阀，控制和统治着中国，并且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他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其政治主题与革命的主要任务正是削平各派封建军阀。1927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这就是1928年开始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战争。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是毛的思想与行为的主要焦点。”

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4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73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占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政府便开始着手制定对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计划，通过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挤进列强侵华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于1915年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机会，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且乘俄国十月革命之隙，取得老沙皇在东北的部分特权。但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是采取逐步蚕食、迫签和约、割地索款、逐步扩大“势力范围”的方式，实行经济掠夺，还未以武力公开占领中国。日本武力侵华阶段的关键性转变，就其政策制定而言，是1927年的所谓“东方会议”，就其政策实施而言，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削去了日本在中国的大部分势力范围，同时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日本统治集团急欲摆脱困境，积极制订新的对华侵略政策。1927年田中内阁的所谓“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史称第二次“东方会议”），精心策划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的决定，炮制了《帝国对蒙满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密奏天皇，谓“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满”。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与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先是在国内制造舆论，借“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煽动国民仇华排华的军国主义情绪，最后终于借口所谓“柳条湖炸车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日本侵华活动进入武装侵略的阶段。“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占沈阳，攻长春，陷黑龙江，1932年1月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成立“满洲国”，东北事实上沦为殖民地。1933年日本移师南侵，犯榆关，攻热河，占承德，薄平津，1934年陷古源，独石口，进窥冀东，以武力为后盾，企图变华北五省为其殖民地。

可见，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长达15年的全面的武力侵华战争。因此，“九·一八”事变决非所谓“地方性事件”或“局部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独占中国的战争行为，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中日矛盾。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各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制定的“九国公约”，更是明确地规定了中国的这一半殖民地地位，“四国公约”又承认和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对华盛顿体制的挑战，即变由各列强瓜分共管的中国为日本的独占领地，这引起了日本与英、美、法列强的矛盾，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的侵略更使中国由半殖民的地位滑向殖民地的深渊。

其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也导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上，也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低潮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重新走向高涨。在东北沦陷区，各阶层人民自发起来进行了各种形式的

抗日斗争；在民族危亡关头，青年学生更是以满腔热情挺身而出，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请愿示威，声势浩大，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群众，出兵抗日；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从东北的马占山等违命抗战开始，继之发生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二十六军在江西“剿共”前线起义以及察绥抗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追随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改变了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甚至公开指责蒋介石等人“误国多矣”。他们主张：在“当前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谋和平的解决‘赤祸’之路”，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功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

这些都说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重新出现的革命高潮采取的是民族运动的形式，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凝结成抗日救亡的思想意识与价值目标。这标志着：在日寇铁蹄深入中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历史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主题乃是抗日救亡，它左右了长达 15 年的中国政治舞台。历史事实说明，谁能真心实意地领导民族抗战，谁就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主宰政治舞台。抗日的广阔历史背景为全国民众真正认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也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系统化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

## 二 “对日战争宣言”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战争，毛泽东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共产党内，他是第一个号召对日宣战的人。从 1932 年至 1934 年，他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多次发表宣言、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的反动集团实行不抵抗主义的严重祸害，号召民众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战争。

1932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指出：“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同时在苏区内发布《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

1933 年 1 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进窥华北，而蒋介石集中 30 万兵力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之际，毛泽东等从民族大义出发，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

《大公报》，1932 年 1 月 21 日。

《我们的希望》，见《国闻周报》1932 年 11 月 8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78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84、185 页。

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危机面前，毛泽东等人的抗日姿态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30年代初，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对日战争宣言”还只具有宣传的意义。从他这一时期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务所公开发表讲话、宣言来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抗日救亡还未真正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主体。

在理论上，对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还未作出系统的说明。虽然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民族危机，但突出的却是阶级矛盾和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在对外的问题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民族的主要敌人与其他帝国主义同等对待，过分强调他们进攻苏维埃根据地以及苏联的一致性。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目前的中国局势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革命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尖锐化的对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族大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进攻苏联战争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争。”

在实践上，虽然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以及《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但这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由于蒋介石集中重兵数次“围剿”苏区，因此当时在实践上强调的是“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用“积极进行的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认为“对日宣战，绝不是要等到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开火时才做……而应认为动员去发展革命战争，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在实践中强调的是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

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公开的讲话与宣言中，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抗日救亡还未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主体。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下述三个原因：

第一，在时间上，30年代初的几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目的在于灭亡全中国，并进窥华北，但其军事武装侵略还主要局限在东北四省。事态初发，对于新的时局很难从理论上及时地进行科学系统的说明，20年代未形成的苏维埃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却依然延续着。同时，在地理上，日本的侵华活动与苏区相隔遥远，使红军没有在实践中直接对日作战的地理条件。

第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于日本侵华活动，想依靠外交途径和国际联盟的对日干涉来解决，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所谓“安内”和“统一”，实际上就是消灭共产党，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内部排异己。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外面的皮肤小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46页。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1934年1月23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78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84页。

病”，而共产党则是“心腹大患”，“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境地了”。在这种“安内攘外”论的指导下，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着着退让，反而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剿共”，并极力压制军界的抗日要求，严令推行“剿共”战：“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这样一来，虽然日本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在整体社会背景中已成为主要矛盾，但蒋介石正在这一时期对苏维埃区域实行第四次、第五次重兵“围剿”，使苏区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危险，这就在客观上使苏维埃区域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

第三，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强制和独断下，王明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王明等人一上台，采取了比李立三更“左”的政治路线，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不适当的决议与指示。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方面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第三时期”，即革命高涨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全面危机和处于总崩溃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对苏干涉战争的可能性与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把日本的对华举动纳入上述分析模式，从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出发，认为日本侵略满洲不仅是反对中国革命，而且特别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中国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些论点抹煞了中国社会历史主题的变换。共产国际理论模式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切实际的指示，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现状的分析与民族特殊性的把握。王明等人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和政治路线，在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变得极为“左”倾。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及苏维埃战争的危險是最主要的危險”。“九一·八”事变则“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因而在民族危机面前，竟荒谬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他们无视其抗日救亡的价值目标，把它同苏维埃运动同等看待，从而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决死的斗争。”从而片面地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在实践上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攻打中心城市，“猛烈地”扩大苏维埃区域。这一切都完全偏离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与政治主题，从而使“对日战争宣言”成为空洞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正好为蒋介石反民族的反动口号——“安内攘外”提供了借口。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等人完全排除了毛

---

《蒋总统集》第1册，第622页。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新编（三）》第36页。

《反对日本侵占满洲》1931年11月6日。

《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1931年12月29日。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

《六大以来》，上册，第152页。

《六大以来》，上册，第146页。

泽东对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他们提出“必须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根据实际情况形成的军事政治路线，被他们视为“富农路线”与机会主义，从而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权力，剩下的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失去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被架空了的职务发表公开宣言和讲话，必然受到严格限制。施拉姆注意到：“当我们要追溯毛在1932年到1934年间的政策时，我们发现情况与其他任何阶段不同。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阅读一篇毛的讲话或文章时，我们可以认为这准确地代表了他当时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拿江西苏维埃共和国阶段来说，把毛真正说过的或写过的东西串连起来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根据可得到的贫乏证据，判定他是当真那样认为还是并不当真那样想。”例如，“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路线脱离中国实际与新的历史主题的最典型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在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职务的讲话中也出现过这样的词句，但它的确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斯诺曾向毛泽东提问说，在共产主义胜利时，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中国之间是否会形成“政府实际上的合并”，他宣布“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将国家交给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讲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1932年至1934年间，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和其他公开讲话中体现出来的理论观点，基本上是沿用了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代表关于时局的理论分析模式，并不是毛泽东的理论特色。可以说，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等人偏离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这正是苏区根据地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进行长征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 三 北上抗日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新主题，是在遵义会议后通过蕴含在他的军事战略方针中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中逐步形成并显示出来的。

早在1934年7月，毛泽东等人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并把红七军团改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但此一宣言仍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产物，其主要目的与意义乃是调动和牵制第五次“围剿”的敌人，“以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广昌失守后，第五次反“围剿”已成败局，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但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失败面前又变得惊慌失措，战略转移变成逃跑主义，没有明确的意图与目的地，《北上抗日宣言》被搁置一旁，尤其是拙劣的军事指挥使红军着着失利，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日益增长的怀疑与不满情绪，以致使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也逐渐醒悟过来，于是围绕着军事指挥问题，从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一路争吵，遂有遵义会议之举行。

遵义会议仍然一般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提出“保卫

---

施拉姆：《毛泽东》，第138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88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380页。

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政治主题。李德曾藉此攻击遵义会议，说毛泽东“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一切基本政治问题都被撇在一边”，“甚至关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国红军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多年来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号，在会上也只字未提。”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紧迫的战争环境下，针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召开的，因此，会议主题自然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由于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使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从而在关键时候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第二，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同时当时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只是反省到军事路线的错误，并未意识到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使遵义会议讨论和改变共产国际规定的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政治问题上与“左”倾路线没有分歧。事实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新主题在他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方针中逐步显示出来。

据陈昌奉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红军干部大会，“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主席那天也很兴奋，他先讲了长征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说日本鬼子已经占了华北），讲了我们要上前线打日本救中国。”“在红五军团工作的有不少是宁都人——我的老乡，他们特别高兴。凡是见着我的人都说：‘毛主席说了，我们也要去打日本了’。”陈昌奉的回忆表明，毛泽东当时鼓舞红军将士的口号，即是抗日救亡，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当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张国焘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毛泽东则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这两个战略方针之间的争论日趋尖锐化，这种争论虽然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但其中的确包含了政治路线问题，并且张国焘当时也无意挑起政治路线问题的争论。他“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他认为苏维埃运动事实上已经失败，而“中央则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的确，原来王明路线统治下的苏维埃运动已变成一个“左”的躯壳，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张国焘的进军川、康、藏，建立所谓“联邦政府”的主张，同样脱离了中国社会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它使党和红军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毛泽东的北进军事战略方针，虽然避开了长征中不宜争论的政治路线问题，但在政治上却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了他与张国焘的争论，这一报告的内容无从查考，但中央“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43页。

见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载《红旗》杂志1981年第21期。

陈昌奉口述，赵鹭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社1974年版，第三册，第1143页。

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对于全国目前的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以致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的西南部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这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政治上的意义正是北上抗日。

在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后，毛泽东以坚定的意志带领党中央与红军北上，克天险，翻雪山。在哈达铺，北上红军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支队（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随后相继占领榜罗镇与通渭城，由于得知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毛泽东等人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更为明显。据当事人事后不久的回忆，在哈达铺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演说：“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民族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到达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在榜罗镇，据当事人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在北上抗日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并讲话：“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sup>1</sup>这激昂的声音，正代表了日本铁蹄下中华民族悲壮的呐喊。会后，毛泽东率红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翻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天险——六盘山，并赋词抒发其政治抱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词和同时的另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一样，“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亦即抗日救亡。1935年10月毛泽东到达陕北，11月28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标志着毛泽东抗日救亡的政治思想新主题的形成，并为全党所接受，苏维埃运动让位于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政治思想新主题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早在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声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不许他国染指，日本侵略分子则叫嚣“满洲市场已臻饱和，……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华北地区）”“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突破长城防线，强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以后，更进一步企图吞并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1935年5月，日本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蒋汪合作政权采取妥协和亲日政策，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步步退让，遂有6月的《何梅协

---

<sup>1</sup>《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05页。

<sup>2</sup>《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68页。

毛泽东1958年12月12日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别的。”关于《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的“苍龙”，众多注家解释成系指蒋介石，这不切合毛泽东此时的实际思想，倒是施拉姆和特利尔说得对，“苍龙”原指日本，见施拉姆：《毛泽东》第158页；特利尔：《毛泽东传》，第161页。

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将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给了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一步公然策划“五省自治运动”，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华北殖民地化的危机迫在眉睫。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等人通过当地的报纸杂志了解到华北局势，从而更明确和坚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以此鼓舞红军将士。到达陕北后，11月13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正如毛泽东所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那时日本侵略范围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中国，……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显然，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转变政治路线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毛泽东个人的文化心理因素。早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便作《救国图存篇》，并常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更深受湖湘文化中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近代湖湘士人“笃信民族主义，固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最敏”。他们具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爱国传统发源于王船山的“民族大义”，中经谭嗣同为国捐躯的壮举而达到顶点。通过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船山“民族大义”和谭嗣同“壮士断腕”精神的提倡和发挥，湖湘士人爱国主义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内化为毛泽东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基本的因素。因而在青年时候，毛泽东即矢志于挽救中国，对那时日本侵略中国即非常注目。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提出21条，毛泽东即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年7月日俄再订分掠蒙满权益协定，毛泽东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导致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成为他从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契机。在以后漫长的军事、政治活动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与价值取向。因此，当30年代日本侵入中国时，毛泽东对此就极为敏感，特别是30年代中期日本侵入中国本土，毛泽东更深感民族的危机。他的这种文化心理素质使他最容易契合普遍的民族救亡意识，并成为他从社会革命转变为抗日救亡政治主题的心理契机。从而，即使在长征的艰难险境中，也使他以坚定的意志，带领党和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引导着全国的民族救亡运动，打开了抗日新局面。

三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进行分工，取消了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实

---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7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

《杨树达文集之十七》第100页。

《杨度集》第95页。

《毛泽东早朗文稿》第51页。

《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8页。

际上成为军事上的决策者。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最重要的职务，它使毛泽东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时局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并支配着红军行动。虽然在长征中来不及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所蕴含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却为中央所接受，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因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的领导权就为他形成新的政治思想主题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四是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转变。1935年7月至8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大会，批判了“爱用死板公式与模型的倾向”，强调了“共产党人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中工作环境的特点”。大会确立了以战争的挑起者——法西斯主义为主要敌人的理论，并指明“受帝国主义大国侵略的弱小民族及弱国，有‘保护民族独立的权利’”，“这类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在这些场合，共产党人的责任，便在于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与站在这种斗争的前线”。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的内容。毛泽东、朱德11月28日署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的内容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可知毛泽东很快接受了国际七大的精神。国际七大对毛泽东与全党形成新的政治路线的作用在于：第一，对于毛泽东抗日救亡主题的形成而言，真正的内在因素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和他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关怀。事实上，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知道八一宣言的内容，而北上抗日的方针却早已确定。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只是毛泽东政治主题转变的外在依据；第二，在国际指示对中共具有支配作用的情况下，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新主题化为全党新的政治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根据，它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举行，从而为统一全党的认识，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第二节 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

要使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成为党的政治主题，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治战略。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步实现了政治主题与政治策略的转变。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并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一 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基础的确立

这一理化基础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其中尤其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长期实行着“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接受了斯大林关于“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73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77页。

的论断，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继续沿用这一理论根据，无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事实而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坚持着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尖锐化对立的理论与观点，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分化。由于错误地把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阶级斗争）看作当时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衡量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的政治标准就是是否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推翻国民党政府，而不是抗日与不抗日。于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势力的抗日要求与主张，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由于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本阶级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虽然不同意苏维埃革命运动，但却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他们有的提出对日绝交，“立请宣战”；有的提出“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有的甚至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有的则极力说明“不分党派”组织统一战线。这些主张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本来就是倾向于革命或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但在“左”倾路线的理论模式下，则成了非常危险的“欺骗”宣传，因为它们模糊了阶级斗争意义下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界线。认为“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行动起来，……所有这些主张，他们的一致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因此提出“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这种极“左”路线的关门主义策略，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清除关门主义“左”倾思想影响，论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势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就成为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思考的重心与焦点。

毛泽东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国内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出发，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抗日的。“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需要向全党解释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一二”政变后附和蒋介石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重新参加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既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也没有买办阶级那么多的买办性。虽然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规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附合了反革命营垒，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3～34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0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遇”。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形势下，这个阶级改变了它的政治态度，倾向于抗日。这种情况，基本他说来是不利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毛泽东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抗日表现，说明了这个阶级的变化及其在国民党营垒中所造成的分化，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论点，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加强对这个可能的有时是动摇的同盟者的争取和领导权，从而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来说，毛泽东的出发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这就需要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与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着重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理论与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理论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词句，不仅错误地把握了历史的主题，而且错误地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力量，犯有严重的革命急性病与“左”倾幼稚病，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不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关门主义”实际上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毛泽东着重向全党指出，如果不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组织统一战线，向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进攻。“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毛泽东严厉批判了极“左”路线的孤立妥协的政策，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的所谓“领导原则”。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仅把握住了抗日救亡这一中心主题，而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革命力量的弱点，论证了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调整有关国内阶级关系的政策。为此，毛泽东等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尔后又改为民主共和国，使之适合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国”的概念突出了民族性质，它“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第15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说，阶级矛盾必须服从于日益突出的民族矛盾。但毛泽东指出，民族矛盾的突出和统一战线本身并不是消弭了阶级矛盾的存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工农阶级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因而必须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这是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实现领导权的基础，否认这一点，也就否认了统一战线本身。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基础的思索与论述，表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学说，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条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程中又深化了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能够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实践观念与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实践的具体环境与条件，撇开了具体的环境与条件，把初始理论或别国经验机械地直接诉诸实践和操作过程，必然是方枘圆凿，格乎不入，这正是“左”倾教条主义的致命弱点。

这里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关系。我们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以及王明等人据此而发布的八一宣言，对于长征后到达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确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毛泽东也曾赞扬过王明起草八一宣言的积极行动。但是，比较一下八一宣言的内容以及王明此时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所作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王明只作关于统一战线的一般号召，缺乏对“九·一八”事变后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特点的深入分析，同时对当时党和红军的力量往往夸大其词，这在逻辑上并不证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毛泽东则是基于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入分析，从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我力量的强弱对比的事实出发，充分论证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抗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次，王明虽然也反对关门主义，但缺乏对关门主义危害的深切了解，尤其是对自己所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作任何反省，而毛泽东则深入批判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而且正是针对王明“左”倾路线而发的。其三，更深刻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参考框架和思想基础与王明根本不同。王明长期在国外，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他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的思想是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以前倡导极左路线，随后倡导统一战线，盖由于国际路线变化使然，这也是他以后从极左倒向极右的深刻根源。而毛泽东则主要是以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与具体情况为参考框架的，他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了解如同他熟悉中国农民一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从青年时候起就倡导“民众的大联合”。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后，更是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非常注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依附了反革命营垒，但“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因此，毛泽东给予蒋介石统治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以很大关注。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注意到“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贫农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页。

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因此注意争取中间阶级（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商人）。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到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清楚可见。毛泽东关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论述，既充分反映了历史主题的要求，也是他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 二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瓦窑堡会议期间所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着重解决的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抗日问题，并没包括联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因此，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的基本口号仍然是“抗日反蒋”。之后，毛泽东等人继续采取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在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在一系列的文件、书信、布告、宣言中，“抗日反蒋”（或“抗日讨逆”）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口号。

瓦窑堡会议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的“抗日反蒋”与“左”倾中央统治时期的“抗日反蒋”的性质根本不同。后者是在突出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突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突出“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政治路线下的“抗日反蒋”，“反蒋”的内涵主要是反对整个国民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而此时期的“抗日反蒋”，则正是在突出了民族矛盾基础上的“反蒋”，因此“反蒋”的范围仅局限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国民党最高当权人物，“反蒋”的内涵是反对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卖国内战的政策，是把蒋介石当作“卖国贼”和“民族叛逆”（而非阶级敌人）的前提下的“反蒋”。因此，从政治主题来说，它是与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相吻合的，并不是否认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瓦窑堡会议期间之所以采取抗日反蒋的方针，主要是因为红军刚到陕北，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些微变化不太清楚，对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与影响估计不足。毛泽东等人所看到和面对的则是蒋介石在根本上未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对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布置重兵“围剿”。同时，国共两党长期内战，血海深仇，要消除这种敌对情绪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时期的“抗日反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权和绝大部分的武装力量，反蒋在事实上不能抗日。从这点来看，“抗日反蒋”虽然在政治主题上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与抗日救亡，但在策略上，排除蒋介石于统一战线之外，便不能保证这一主题的实现。这就促使毛泽东等人把思考的焦点放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问题上，这就是“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页。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公开放弃反蒋口号，称蒋介石等人为“蒋介石氏”和“南京政府”诸公，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一通电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发展，开始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6月2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第一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接着在2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称国民党为“贵党”，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表现的某些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同时针对蒋介石继续坚持先安内（实即内战，消除异己）后攘外，先集中统一，后御侮的政策，严正指出这“实在未免本末倒置”，“全国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表示在建立抗日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目标下，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封信说明毛泽东等人逼蒋抗日的方针甚为明显。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等人“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无疑与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有关。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指出：“我们对南京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现在是必须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去的时候了。”“蒋介石本人并不想建立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制造一种应有的局势，必须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内部制造一场运动，让蒋介石被迫接受统一战线，让蒋介石率同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思想。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既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在中共8月25日致国民党书、9月1日《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以及9月17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

不过，共产国际新的指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苏联的处境。当时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阻止日本入侵的力量。而在莫斯科看来，中共的力量还很弱小，只有蒋介石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4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78页，81页，84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5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9页。

交关系，更加重视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作用，从而迫使共产国际重新探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国际执委会7月会议实质上体现的正是斯大林的战略算盘。这虽然对中共实现逼蒋抗日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但毛泽东等人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探讨与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的。

从可能性来说，首先，毛泽东一贯认为中国是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半殖民地国家，他们在中国境内彼此划分势力范围，为了自身的利益，彼此间是有矛盾的。与此相适应，依赖于帝国主义的中国买办阶级营垒也存在着矛盾，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促使这种矛盾加剧与买办阶级营垒的分化。因此，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毛泽东就说：“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事实的演变也的确如此。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发生分化，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其次，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同国民党许多地方实力派达成重要谅解，同时全国各界无不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使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发生极大动摇，陷入孤立状态，其中尤其是两广事件更给南京政府以极大刺激，使得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抗日姿态；其三，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在继续坚持武力“剿共”的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企图通过与共产党的对话取得苏联的援助，同时也企图通过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引诱共产党投降。由于蒋介石没有谈判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但也反映出蒋介石急于结束内战以便把力量转向对外的心理，从而加深了中共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了解。正是基于这些，毛泽东等人认为：“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从必要性来说，当时的实际情况使毛泽东等人意识到反蒋在实际上不能实现全国规模的对日抗战。1936年2月20日，为了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正式实行东征。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结果进入山西后不久即遭到阎锡山军队的堵截，蒋介石也派了10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阻止红军东进，红军不得不回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朱德于5月5日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同时，在与东北军的统战谈判工作中，张学良将军的态度也是促使毛泽东等人转变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认为抗日非拥蒋不可，蒋介石“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张学良认为，蒋的错处只是在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87页。

应田德：《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65页。

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后，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蒋介石当时是国民党的领袖，掌握着国民党的军队，在国民党中有一定影响，抗日反蒋不利于团结国民党中的其他人，而二月东征的事实也证明不联蒋就无法抗日。蒋介石虽有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但他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剩下的只有“逼蒋抗日”一途了。因此毛泽东等人认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现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对实现联蒋抗日，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在确立这一方针后，立即展开逼蒋抗日的强大攻势。从8月下旬开始，几个月的时间内，他频繁致信杨虎城、宋哲元、傅作义、王以哲、王均、朱绍良、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张学良、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并派人与他们联络，加强对他们的统战工作；致信蔡元培、宋庆龄、宋子文等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人，以期利用他们的影响，“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苟求之错误政策”；直至致信蒋介石本人：“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通观毛泽东这些信件，纯粹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寇深祸亟”，“风雨同舟”，“情切嚶鸣”，一片救国之诚，跃然纸上。正如国外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情况下，毛泽东远比蒋介石成功地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越来越陷入孤立状态，终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标志着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为实现逼蒋抗日方针创造了条件，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毛泽东等人逼蒋抗日方针的本意即是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亦即联蒋抗日。在致王以哲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因此，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毛泽东等人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以安全返回南京。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了蒋对事变真相的歪曲，重申了蒋所允诺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继续迫使他“不打折扣”的实行自己的诺言。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国民党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主张，终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87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7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页。

于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居后筹谋，周恩来等人在外周旋，国共两党展开了多轮谈判，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终于通过逼蒋抗日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历史性转变，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从此展开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

### 三 统一与独立，联合与斗争

中日民族矛盾的突出，只是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政治集团间矛盾的地位，但这些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因此，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在这云波诡谲的政治场景中，毛泽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极为棘手的问题，一是既要与蒋介石联合，共同抗日，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原则性和独立性；二是与此相联系，必须反对来自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干扰。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血的教训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环境，极为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政治形势。他细密地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情况，谨慎地对待各种事变，为党制定了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实现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并保证抗日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既统一又独立，这是毛泽东从着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所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其主旨在于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即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权，反对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早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论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就提请全党注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确定逼蒋、联蒋抗日的方针之后，为了求得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等人在与蒋介石的谈判过程中，向蒋作了重大让步，但他同时指出：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抗日战争爆发，统一战线形成之后，独立自主问题愈来愈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点。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他指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以此作为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相区别的政治路线。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把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看作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分歧，着重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指出：“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在1938年10月至11月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对统一与独立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说明：“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强调，主要是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内的具体情况来考虑的。

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在各种因素下被迫停止军事“剿共”而转向抗日的，并转而对中共采取政治“诱降”政策。蒋介石根本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把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联蒋抗日主张看作是“输诚”，被视作政策转变标志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却是所谓《关于根绝赤祸案之决议》。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种种苛刻要求，暴露出他统制共产党、限制和削弱红军的企图。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提出所谓“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计划，并对抗日根据地采取限制与削弱政策。这一切不仅在毛泽东心中唤起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而且加重了现实危机感。毛泽东在193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说，现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集团“特别表现其被动性，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同，那时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力量要好些；现在更胆小、更小气些，非逼迫着不想分出其已得的宝座。西安事变后，更自觉地来限制我们。”因此毛泽东认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 this 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

其次，在蒋介石的政治“诱降”与统制政策下，党内形成了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卢沟桥事变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种右倾倾向在事实上迎合了蒋介石的企图。特别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性。一贯“左”倾的王明，自从倡导统一战线后，就愈来愈变得右倾了。王明从不考察国内的实际情况，唯共产国际指示是尊。此时斯大林为防止日本从东边进攻苏联，急需寻找力量拖住日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大弱小，只有依靠蒋介石，不仅大力援蒋，而且要共产党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与服从，支持蒋，尽量避免发生摩擦。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意向，授意王明这样“熟悉国际形势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4~52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17页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见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5、36页。

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王明临回国前就对前去苏联养病的王稼祥说，对于蒋介石，“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为了贯彻他的右倾主张，立即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这次报告的意图，王明自己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也说：“1937年12月9日，我从莫斯科到延安，在12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顺便谈了以下情况：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并建议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不仅传达“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把它发展为“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对毛泽东等人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批评。由于他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制造了思想混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这场论争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解决，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强调了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其三，更主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夺取和坚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前提，而这一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实质上涉及到能否坚持抗战到底，担负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历史重任，这也是毛泽东与王明争论的实质所在。毛泽东认为，在国民党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领导权的获得必须不是把共产党降低到依附于国民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正确的政治口号并模范地实行之，必须独立地开展群众运动和创立抗日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争取中间派，从而影响整个国民党，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权，并由此引导民族革命战争达于彻底胜利之途。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软弱性，不能领导革命彻底胜利。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而“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其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

---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19页。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

转引自《王明评传》第357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333页。

《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2页。

，“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是抗日救亡成败的关键。否认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因此，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联合与斗争是统一与独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的推演，但这种推演就其背景来说是更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就党内思想路线来说，既反右，又反“左”，且更主要的是反“左”；就政策的操作来说，更具有灵活性。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大量消耗了日军的进攻力量。面临这种战争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对侵华策略作了一些调整，在政治上采取了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尤其是“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于，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于是逐渐将其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与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逐有策动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之举。在日本诱降活动下，加上国际上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与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这以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而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摩擦事件，直至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甚至发动皖南事变，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破裂的边缘，投降反共的空气笼罩一时，时局几度恶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灭华总方针并没改变，日本与英美等国家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国内抗日力量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使得蒋介石也下敢公开降日，不敢发动类似于1927年的全面的反共内战。因此，争取蒋介石抗日，维持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这需要运用正确而灵活的统战策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制定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以防止时局恶化，力争时局好转。

就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而言，面对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右倾思想还有一定影响。他们为了怕破裂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摩擦不敢反击而一味地让步。他们不知道，这只会助长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恰恰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毛泽东认为，在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反共政策时，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但是，在蒋介石发动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日)松本慎一：《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见《大公报》1939年1月23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4页。

反共高潮时，党内“左”倾思潮更普遍，成为更主要的危险。有些人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估计为“四·一二”事变，混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区别，强调阶级斗争，提倡土地革命，只讲斗争，忘记了联合。对此，毛泽东深为注意，他紧紧抓住中日矛盾这一主题，着重向全党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不会变更的”。针对党内一些人思想上的左右摇摆，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其间的辩证关系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既联合又斗争的辩证关系，在实行中是非常灵活的，它要求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程度的联合与不同形式的斗争，“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认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坚决联合的政策，在此前提下，对其动摇性与某些错误，进行说服与善意的批评。对于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有的投降日本成为民族敌人的，必须坚决打倒，对其他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不悔改者外，也须既斗争又联合。对于以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联合斗争。毛泽东指出，整个国民党并不等于顽固派，其中有进步派、中间派与顽固派之分，而中间派与顽固派则因各种矛盾而因时因地发生某些变化，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中立者争取之，对于其中的顽固派，“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特别是在与顽固派的斗争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著名原则。通过这种灵活策略的运用，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使蒋介石既不敢公开降日，又不敢全面反共，从而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抗日胜利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这种统一与独立、联合与斗争的统战策略，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策略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教条主义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合”实际上也包含了由各种各样的计谋韬略组成的中国悠久的谋略文化传统，它内有独特的精神运思之术（“心术”），外有大量警戒愚智的历史事例编撰（“通鉴”、“汇览”），它是以“争利”为核心，以“斗智”为手段，在无明朗规则下的任智巧夺。马克思说，中华民族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西方人，当指这种谋略文化。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即好读历史小说与历史书籍，深得其中三昧。就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既没有一定的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764页。

组织形式，又没有国共双方认可的共同政治纲领，彼此又经过了十年内战，在这种状况下，要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的确“需要一整套的战术”——“谋略”。“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张闻天在保安曾向他表示：“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就让他去干罢！”不论此话真假，毛泽东应付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党内恐怕无有出其右者。但应该指出，毛泽东对谋略的运用，服从于宏伟的目标——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否则，这种谋略会“心术”不正，失去民心，毛蒋高下之分，除了谋略智慧高低之外，根本原因在此。

### 第三节 抗日主题下的民主思考

抗日救亡主题的突出，并没有冲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的潮流，反而二者呈相互促进增长之势。毛泽东关于抗日主题下的民主思考，把近代以来开始的反帝与反封建的两大目标紧紧结合起来了。

#### 一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使得反帝的救亡爱国运动与反封建的民主自由运动成为社会思潮的两大主旋律。虽然某一具体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中心一环，但从整体上看，两者总是相伴而行，互相促进的。

抗日战争是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下爆发的，它在更深广的程度上激发了民族救亡意识，同时也把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向现实的民主政治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把孙中山“训政”阶段的“以党治国”变成了“以蒋治国”，开始建立封建性的专制统治。“九·一八”事变后，面对蒋介石的高压政策，曾一度沉寂的民主自由呼声又高涨起来，著名民主人士马相伯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呼吁“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定息内争，共御外侮。”与此同时，以“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为口号的“人权运动”沛然而兴，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要求释放政治犯，废除“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争取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一运动无疑是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引起的，其矛头直指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毛泽东在确立了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之后，即开始放弃“工农专政”，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37年5月，他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指出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任务已基本实现，新的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提出了“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第3册，第1235页。

口号。其含义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改革，即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体，具体的作法是使当时开始蕴酿召集的国民大会实行民主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二是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可见毛泽东提出的“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口号，是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相呼应的。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这一思路也并未消隐，提出要在抗日过程中继续进行尚未实现的民主改革运动，并把它标举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总起来看，毛泽东基本上是在抗日的政治主题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内来思考民主自由问题的，其意义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民主改革是在抗日主题下解决国内阶级矛盾的适当方式。这一点实际上已蕴含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其中提出的四项保证与五项要求，表明中共放弃阶级斗争的武装暴动形式，而以民主要求的方式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与阶级关系。毛泽东后来在解释这一政策转变的理由时说，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使国内阶级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变成次要的与服从的东西，但它们依然存在，这些矛盾必须得到适当解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等种种方针之所由来。从国共两党统战关系来看，国民党并未放弃专制统治，民主改革运动将为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创造基本的政治条件，毛泽东明确说过：“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

其次，民主政治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认为，要战胜日寇，必须有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而其关键则在于实行民主政治。就扩大统一战线而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唤起民众”——实行民主政治。就巩固统一战线而言，需要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这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民族主义固然引导内战的停止，和平的实现与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国民党不愿意真正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反而把“统战”变成了“统制”，“统一”变成了“专制”，这就抹煞了各集团各阶级的政治要求，从而影响和平和统一，影响统一战线的巩固。所以毛泽东指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其三，民主政治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关键。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战争正式全面展开。蒋介石虽然在庐山谈话中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实际上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单纯的政府与军队抗战，“其结果就是政府与人民隔离，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366页。

1937年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军队与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与此相反，毛泽东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即把单纯的政府抗战变为全民族的抗战，把单纯的军队抗战变为全民的抗战，这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体现的抗战方针，也是“救中国的关键”。这一方针的要旨是政府与人民的一致以及军民一致与官兵一致，即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毛泽东说，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最主要的条件，必须是为着抗战胜利而发展民主权利，并放手发展民众爱国运动”。他批评了国民党中某些人所鼓吹的“要等到抗战全面胜利以后才能实现民主”、“要抗战就要牺牲自由”的观点，指出“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这就发生“战时政府”与民主自由的关系问题，“战时政府”要求集中权力，减少自由与民主，两者是冲突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民主改革所要求的政府必须真正代表民意，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而人民群众也必须能够自由地支持政府，有机会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必须集中必要的行政权力，“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因此，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集中制的意义，毛泽东民主集中制理论的提出，影响深远，但在当时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专制政策与片面抗战路线而提出来的。他指出：“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这里矛头直指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畏惧人民，把抗日战争纳入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轨道的真实企图。

其四，民主自由口号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在国共两党双峰对峙中偏向中共并结成统一战线的关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是实现民主政治与自由，在社会改革上持和平、渐进的改良方案。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专制统治一般抱有憎恶态度，而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则怀着某种恐惧心理。因此，当北伐战争中，蒋介石中途倒戈，打着“三民主义”旗帜实行“清党”时，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附和了反革命营垒。但两者的蜜月非常短暂，蒋介石随后的政治实践所构筑的社会制度恰是民族资产阶级所企望的反面物。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左路线，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依然附合着蒋介石政府，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与此同时，民主自由主义者也惊奇地发现在苏区“共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如此之大，一个农民可以直接到行政长官那里去，把自己的扁担靠在衙门的墙上，面对面地与长官谈话，就像和平常人谈话一样。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这当然并不是在赞赏共产主义，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6页。

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1937年8月25日。

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1937年8月25日。

毛泽东：《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1937年8月25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4页。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而是发现了与蒋介石专制统治相对照的苏区的民主气氛。随着红军北上，共产主义的危险似乎有所减弱，民主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的紧张关系更加日甚一日。当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时，毛泽东所标举的“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普遍受到民主派的欢迎和赞赏。此后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似乎一时成为民族领袖，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继续卵伏于蒋介石的重压下。但蒋的愈来愈专制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他们在这种双峰对峙的格局中越来越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使蒋介石陷入孤立地位，并给予战后局势的发展以深刻影响。

## 二 手段与目的

民主、自由本是作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而被引进的舶来品，虽然它反映了近代中国弱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它作为一种运动，总是在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的引发下而形成与发展的。从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富强之道”，到维新变法时期严复式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革命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标举，无不是以民族忧患情结为基调。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近代的民主自由运动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所追求的一种“强国保种”之“道”——救亡图存的手段。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自由既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在与封建主义对垒中也是近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严复曾严厉批判专制政体，因为在专制政体下“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高扬立宪政体，因为它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对于自由的价值，严复将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这种价值目标的追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乎更加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意义，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成为“五四”启蒙思想家称道不止的纲领。

学界对近代知识分子上述民主自由观念的两个方面，一般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界说之，的确揭示出相互矛盾的特征。民主自由作为一种价值信念与目的，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与价值，但它同时又是富强之道与救亡图存的工具与手段。因此这两者之间便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以严复为例，他强调“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为第一大法，保种次之”，这当然是强调个体自由与幸福为第一义，但他笔锋一转：“而至生与种相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为大人”，在民族危亡面前，民主自由作为手段就成为第二义的东西了。这种紧张关系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近现代一些思想家的理论层次中或潜意识中。当然，在指出这种矛盾特征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民主自由运动给救亡运动以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给民主自由运动的发展

---

《严复集》第5册，第1284页。

《严复集》第1册，第3页。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手段，但就其与封建专制而言，就其本质而言，与政治自由同义，因而有价值目标的意义。

《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以有利机会，它们是作为富强之道而受到欢迎的，否则，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舶来品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在于启蒙主要因缘于救亡的需要。两者之间既相互紧张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历史命运与发展轨迹。

毛泽东在青年时候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的早期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对特性的词：小我与大我、肉体之我与精神之我，利己与利他等等，实际上和个体解放与救国爱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因此他一方面张扬唯我论，另一方面以救国救民为职志。唯我论与个人主义的强调的确具有追求自由的价值意义，但同时也似乎是他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所发现的一种手段。

抗日战争与抗日时期的民主自由运动是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的论述也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双重意义。

从手段的意义上来看，如上所述，他基本上是在抗日主题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内来思考民主与自由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争取抗日的彻底胜利，民主自由也是如此：“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内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救国的力量。”这里民主自由的工具性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民主是“抗日的民主”，自由是“爱国的自由”。而且毛泽东认为，也只有抗日，才能给民主与自由的发展以有利条件，反过来，民主与自由似乎也只有联系抗日才有意义。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曾写道：“你在二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言论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人类相互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因此，当强调民主与自由不利于抗日局势的发展时，毛泽东持否定态度。1939年民族投降主义开始成为时局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所作报告及结论中指出：“不应过分地强调民生民主。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党内“必须更加集中，减少不必要的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的论述也具有价值目标意义的一面。他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另一面却多了两件……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现在我们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

---

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毛泽东：《反投降纲领》，1939年6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这里把民主与封建专制对举，显然不是作为抗日救亡的手段而获得价值目标的意义。毛泽东还针对“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观点说：“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这就更把民主从工具性意义中游离出来而赋予其独立的价值意义了。应该指出，即使毛泽东在工具性意义上论述民主自由时也未失去其价值面，他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尽管是作为“抗日的保证”，但也不能仅从工具层面去理解。毛泽东认为，应该在抗日战争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任务，他规定民主化的任务是用自由民主的办法选举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选举民主政府，将政府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下，同时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这都是民主政治下的本质性的东西。毛泽东还希望边区与抗日根据地成为民主的模范区，实行“三三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边区群众对于民主选举的意义缺乏了解，对民主政治的操作非常陌生，因此这一运动也是伴随着党和政府大力宣传的启蒙运动，“选举运动，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是重要的教育”。从这一意义出发，事前将干部派往各地，通过传单、广告、报纸、演讲、戏剧、秧歌等形式，宣传选举的意义，接着在每个选举区召开人数众多的集会，决定候选人，并进行正式选举，使广大人民获得参政权利，政治自由的价值意义也就从中突显出来。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民主自由的论述，不能仅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规范与理解，还需注意如下二点，一是他一切从具体情况与实际出发，因而有时强调的角度就有所不同，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不能仅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去说明。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历史主题决定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主题是抗日救亡。二是毛泽东对民主自由的想法带有阶级观点，这使得他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取向区别于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理解，前引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就表明了这一点。正是以具体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为指导，在抗日救亡与民主自由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把反帝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统一起来了。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页、275页。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 第十章 军事园地的奇葩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演讲中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仅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如果说，毛泽东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标志着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成熟，那么，一年后他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则标志着这样一条军事路线的成熟。它与尔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一起，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创体系，蔚为军事园地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 第一节 独创体系的诞生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根源于10年内战的深厚的实践土壤，是党内军事路线上激烈争论的理论总结，乃发愤之作。同时，这一独具特色的军事体系又是更为广阔的抗日救亡的现实民族战争的理论表现，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战争环境而获得的丰硕成果。

#### 一 血战史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似乎并不喜欢枪杆子，并不喜欢战争。在他的煌煌军事大著中，他都以浪漫的激情声称：“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这多少透露出他早年对“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境界的向往。但历史的逻辑规定了他，同时也是他的自觉选择：不要战争必须进行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他悟出了枪杆子和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起义、上山，开始游击战争与创建根据地，开始了刀光剑影的战争生涯。

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充满着血与火的道路。它面临着许多特殊的、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棘手问题，而军事斗争则显得尤为突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得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残酷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幼小红军与强大敌军的拼搏，使得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具有生死攸关的立杆见影的实践后果，如兵力的分散与集中的问题，在战斗中，“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正是这种严酷战争环境，迫使毛泽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东等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它们并不是根据某种理论原则推导出来的，而是由血与火的实践逻辑所规定的。“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相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这就是所谓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这种游击战术也迅速扩散到其他根据地。如“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鄂西）；“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闽北），有效地指导了红军初期的军事斗争。

勿庸说，这是相当朴素的东西，它是适应红军初期小部队作战的形式，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智慧，毛泽东尔后的军事理论正是从中萌芽与生长出来的。1930年，红军经过3年的游击战争，已发展到10万人，创建了10余个根据地。6月，红军主力开始整编，创建了正规军团，统一和健全了编制，在组织上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同时也迎来了蒋介石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亲自指挥了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战役，“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

这就是说，毛泽东反“围剿”时期的军事思想虽然脱去了朴素的外衣，但也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它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在内容上丰富起来。因此“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因为当时的运动战只不过是扩大了游击战，敌我力量还十分悬殊，传统的作战原则仍然有效；同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也容不得毛泽东去作军事理论上的思考。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不足，毛泽东成了“国际派”讥笑和攻击的一个因素：“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当然，更主要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根本上就是与王明“左”倾进攻路线相对立的。进攻路线从“目前中国革命形势转到了一个新局面，中国统治阶级在全部崩溃”的局势估计出发，认为“当前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不仅在政治上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在地理条件上……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因此红军一切的建设必须根据当前和将来作战的环境和任务转变过来，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红军要巩固战斗力，要有正规的特科技能，进行“堡垒战、白勺战、街市战”。因此，在进攻路线的领导者们看来，“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它是“目前红军须要适应于大规模作战中（的）最大障碍”。从此，“反‘游击主义，的空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10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

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毛泽东因此被排除在军事领导之外，去作经济工作了。进攻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开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最后变成军事逃跑主义，其导致红军的惨败就无需赘言了。

如上所说，军事斗争具有立杆见影的生死效果，实践使红军将领认识到了军事指挥的正确与错误之所在。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我们常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候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后就其最直接的意义而言，就是“四渡赤水”之战。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强敌的围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愈是在最险恶的环境中，愈是显示出其坚定的意志与军事指挥才能，他重新运用其原本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非常高超的运动战，红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与部署，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又进又退，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生龙活虎，处处主动，而敌人则被弄得扑朔迷离，晕头转向，处处挨打，疲干奔命’。这种地道的中国式战法，自然使洋人李德不能理解：“行军越来越成为一场退却，有时竟变成了道地的逃窜”，“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是在兜圈子。”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战法，使红军在“关键时候”脱离了危险。

“国际派”的进攻路线在铁的事实面前已彻底瓦解了，但尔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却受到张国焘的挑战。张一方面也攻击毛泽东的“游击主义”：毛“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一般说来，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另一方面他说毛泽东害怕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把毛的北进主张说成是逃跑主义，但事实又证明，真正实行右倾机会主义与逃跑主义的是张国焘自己。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正是在这枪林弹雨的血战史中孕育出来的。在马背上毛泽东还来不及系统思考理论问题，只能一边战斗，一边以充满浪漫激情的诗词描绘那一幕幕的战争场面。待到红军到达陕北，统一战线在望，环境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倒不是用闲情逸致的心情去吟唱那铁马金戈，血战的实践形式变成了思想形态，诗意情怀化为深沉的理论思考。

这种理论思考当然首先是针对过去党内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而发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这场争论，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已作出了结论，会议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其在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容低估。但应看到，这场争论虽然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在思想上征服对方，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充分表明了这点。同时《总结决议》也只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而起草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

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红旗》，1981年第21期。

李德：《中国纪事》。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156、1129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题解。

的，并非毛泽东亲自所作。而且《总结决议》也只是战略战术的经验陈述，并未上升为理论形态。从理论的层次上来说，它并未真正解决这场争论。因此真正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这场争论，就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重要主题。所以毛泽东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对红军血战历史的总结。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处处以过去的战争经验为立论依据，进行军事理论的创造。它是一部优秀的内战史，又是一部辉煌的军事论著，是一部土地革命战争历史与军事理论高度统一的著作。过去的血战历史以物化形态（战争）表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理论，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从理论的高度再现了过去的战争历史。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正是在红军残酷的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创立了他那独特的军事理论。

## 二 现实的迫切需要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作于1938年5月。他这时热衷于军事理论的研究，最终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这个现实就是抗日救亡。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主题的转变之后，主要集中于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开始注意和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就已对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趋势作了大概的描绘。当斯诺问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这可以看作是红军战略战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运用。因此，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不久后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是对过去战争经验的理论总结，但同时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新的战争危机表明，敌强我弱依然是未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就可能重新发生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错误。虽然战争条件起了变化，但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对红军进行科学的适应中国特点的军事理论的教育，使之在新的战争中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就成为一项严重而迫切的任务。这一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非常明显：“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4~445页。

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予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因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在于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成熟，而且在于它上承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下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战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致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不过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思想在新的战争条件下的运用、丰富和发展罢了。

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与军事争论，那么，毛泽东写于抗日战争前期的军事著作则是直接回答现实的迫切问题。

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战略时期，其间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第一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运动战）之间的转变，这一转变使红军从小股游击部队发展为正规部队，从完全的游击战争转变为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虽然在这一转变中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冒险主义，但就其战略转变的性质而言，是一大进步，使红军成功地打破了蒋介石大规模的三次“围剿”；第二次转变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次则是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其中第二个转变是把党所领导的军队从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这“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它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必要转变，但同时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为了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而写的。

就国民党方面来说。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并把抗日的胜利寄希望于国际的干涉，根本就不愿意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也因此否认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就共产党方面来说，毛泽东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并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不仅仅是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出发，而主要是根据于抗日战争中的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情况。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却是一个军事强国；友军是以前的敌人，即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仍抱有仇恨心理；八路军数量少武器差，即使集中起来打运动战，不但不能对日军构成威胁，反而有被包围与歼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发挥自己的特长，深入敌后，一面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就会造成日军后顾之忧，对之构成严重威胁，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并逐渐发展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八路军的这一战略转变，表面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186页。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1页。

上是一个退步，实际是一个进步，它“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但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并未获得广泛的理解。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就有不同的认识，也未充分交换意见。会后基本上按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执行。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并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是年底，王明回国，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对党的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在政治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在军事上，也从这一口号出发，提出“受蒋统一指挥”，指斥了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在统一的抗日任务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要求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的合法运动上。对于王明的这些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辨别和解释，继续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由于王明挂着共产国际的招牌，他的观点使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连忙检查过去的工作，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连彭德怀也有点茫然：“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的，王明又是怎么讲的，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1938年2月至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仍未改变立场，在军事问题上，他仍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仍然反对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军事问题，强调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必须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并从游击战争中创造出大兵团，过去红军就是从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会后王明继续回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仍然把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的谈判上，无视中央关于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所以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说，关于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争论”。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胜日寇的战略高度来进行论述，并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为何具有战略的意义，具体说明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建立根据地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重大军事理论问题。“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而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中的光辉篇章。

如果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主要是回答当时党内的争论，正确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1页。

《彭德怀自述》第266页。

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4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题解。

解决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战略方针问题，那么同时期的另一论著《论持久战》则主要是从全国范围内论述有关抗日战争的重大问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决死战争，人们普遍关心这场战争的发展趋势与结局。对此，当时有三种看法。第一是亡国论，这一论调实际上在抗战爆发以前就存在。就国民党当局来说也患有严重的恐日病，蒋介石曾于1934年散布过“三天亡国论”。他说：对日本“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是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抗战以后，这种亡国论调为亲日派承袭。汪精卫被日军的猛烈炮火所吓倒，积极散布失败主义谬论，策划促使蒋介石对日投降，提出“大战必亡”论，公开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抵抗就是牺牲”，“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文官，以周佛海为首，形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酝酿“和平运动”，这种亡国论严重影响了抗日士气，导致降日逆流，影响极坏。第二是速胜论，早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国民党中有些人就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胜利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这种速胜论也影响到共产党内，认为国民党一抗战，与共产党一起配合，日本不值一打。这种观点导致轻敌思想和错误的军事战略，同样不利于抗日；第三是持久论。这一观点也为当时许多人所主张，其中蒋介石也是一个代表。他以前鼓吹亡国论，主要为他的“安内攘外”政策作辩护。抗战以后又想依靠外援迅速解决战争，但他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持久战，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获胜的要道》一文，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就是我们的胜利。”但蒋介石并未解决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因此在实际作战中却实行与持久战方针相反的单纯政府抗战和阵地保守防御，导致国民党军队与日作战接连失败。上海、太原、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蒋一面声称抗战，一面则暗中谋和，大大违背了他的“持久抗战的决心”。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的，痛驳了亡国论，唤醒速胜论的梦想，阐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根据10个月的抗战经验，准确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从防御到相持到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如何进行这场持久战的方法，规定了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相应的战略战术。《论持久战》的逻辑内容就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二者达到了高度统一。它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的瑰宝，也是军事理论史上的空前绝唱。

### 三 独创体系的方法论

---

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第1集，第795页，（台）中华学术院1974年版。

参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9~200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073页。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著作时，的确参考了一些军事理论书籍，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但也应当看到，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卷帙浩繁的马列著作中寻找他们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更是如此。至少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到了陕北，毛泽东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著作时，他的最基本的论点就是反对把各种军事理论套用于中国革命战争。江西时期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指斥为“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回敬道：“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是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更多的马克思等人的军事理论去论证他的各种观点。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出发，注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经验、特殊，并把这种特殊和经验尽量提高到一般与理论的高度来论述，这就是毛泽东创立军事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辟头就指出“如何研究战争”，提出了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的主旨就在于突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战争或革命战争虽然比较其他的活动有它的特殊情形和特殊性质，但在其自身领域内仍然是抽象的和一般的东西，它总是寓于特殊的战争或革命战争中。因此毛泽东思考的焦点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内和特定的阶段内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果不了解它的特殊性，“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一般的战争、苏联十月革命的战争乃至中国 20 年代的北伐战争的经验如果套用到中国后来的红军战争或抗日民族战争，必然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因此，“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的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因此，注重战争的特殊性，就是注重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从时间的条件说……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凡此种种都规定了“不能呆板地移用”，“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搬用书本或套用一般的战争公式来规范或抹煞战争的特殊性。

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而言，如何找出其特殊性从而发现战略上的指导规律呢？首先是要照顾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全局与局部当然是相对的，但对于某一确定的战争、战区、战役来说，全局与局部是固定的。战争的全局是由

---

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5年12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17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局部构成的，这里的特殊性就在于从全局出发找出那对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局部的东西，有的“连战皆捷”却因“一个败仗”而全盘皆输，有的“连战皆败”却因“一个胜仗”而转败为胜。在这里，“连战皆败”或“连战皆胜”都是无关宏旨的局部东西，而“一个胜仗”或“一个败仗”则是关涉全局的紧要东西。因此，“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其次，这种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特殊东西的把握，以及据此而确定的战略指导规律，仍然“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这就需要知己知彼，“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都是不能从书本上学到的，它勿宁说是一种如何行动的逻辑，只能从特殊的环境和战争经验中去获得。“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关键就在于能否从特殊的环境中找出自己的行动逻辑。

毛泽东指挥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战役并获得胜利，究其根源，就是运用了上述方法。他在考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更是从理论高度赋予这种方法以一般的意义，并运用这种方法，深刻揭示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规律，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按照毛泽东的方法，要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注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主要有四个：第一，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共产党的领导与土地革命。第一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第二和第三个特点形成敌强我弱的尖锐对比，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的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这些特点的彼此映对，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由此，毛泽东总结和规定了红军作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

抗日战争比国内战争具有更多的复杂的参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应采取什么战略？整个民族战争的发展趋势如何，应采取什么作战方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从其特点出发。就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言，如上所述，他从敌、友、我三方面的特点出发，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队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创立根据地，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

见本节第二个问题。

战略战术。就整个抗日民族战争而言，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相互映对而又各自相互矛盾的特点，这些特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些特点，充分地论证了中国既不能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一场持久战，天才地预示了这场战争的发展以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其分析之细入毫芒，其论证之令人心折，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不是书本和马列词句所能规范的，他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来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语），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重特点。在那令人扑朔迷离的战争环境中，他运用这一方法纵横游刃，解难析义，故能独辟溪径，戛戛独造，自成体系。

## 第二节 弱者的战略战术

毛在东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我们这里只从最主要的特点——弱者的战略战术出发，挂一漏万，谈谈几个主要的方面。

### 一 积极防御

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抑或是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前期，毛泽东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敌强我弱。这既是他所揭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同时也因此规定了他的军事理论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关于弱者的战略战术。如何以弱敌强，弱中取胜，从而由弱转强，可以说是毛泽东整个军事理论所关注的焦点。积极防御便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积极防御的思想形成于江西时期。它的背景是“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包围起来。这种情形，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面对如此严重的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等人采取了“十六字诀”的游击原则，后来又形成“诱敌深入”的方针。但这些正确的原则与方针却来自两种倾向的排挤。一是“左”倾冒险进攻路线，无视敌强我弱的形势，企图进攻速胜。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第13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地已经发展到比任何西欧或东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地都大些，”它“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这一精神贯彻到苏区，加强了进攻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在战略上的持久性与长期性，反对防御。这一“左”倾进攻路线待到第五次反“围剿”时，面对事实上的敌强我弱形势，为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从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页。

指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

《王明言论选辑》第323、330页。

军事上的进攻路线转至另一倾向——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冒险进攻，必须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战。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防御。消极防御是一种“专守防御，又叫做单纯防御”，它“实际上是一假防御”，因为单纯防御或消极防御并未把进攻包括在防御的范围内，不能达到打破“围剿”、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目的。毛泽东把江西时期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概括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只有这种积极防御，把攻势与消灭敌人的进攻包括在防御的范畴内，才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达到打破“围剿”之目的。因此，毛泽东主张“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战争和军事行动中的基本矛盾是攻与防，其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攻首先是包含在防御之中的，因此，积极防御或攻势防御本身就是进攻与防御的矛盾统一体，它包含着比进攻性战争更丰富的内容，也因此“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由此生发出毛泽东一整套的战略战术。

首先是战略上的退却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这是积极防御中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战略退却在红军初创期叫“敌进我退”，在反“围剿”时期叫“诱敌深入”，曾经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斥之为“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他们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此作了反批评：“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与实际，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为它完全忽视敌强我弱这一现实，在敌人“围剿”进攻面前，命令弱小红军对付强敌，当然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步骤，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强敌进攻时，若不退让一步，势必危及军力的保存。但这种战略上的退却决不是一种逃跑或单纯的消极防御。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首先必须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因此，战略退却是“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步骤”，它的目的是为了造成有利条件，“准备反攻”。所以战略退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只有在退却过程中，才能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因素，为战役战斗上向敌人发起进攻创造条件。毛泽东分析了战略退却必须造成以下条件中至少两个以上才有利于反攻：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地形；红军主力的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只有这样，才能使战略上的敌强我弱，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敌劣我优或至少优劣均衡，对敌人的进攻才有胜利的把握。如若不然，宁可继续退却，持重待敌。故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是以战略上的退却为前提的。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206页。

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关于退却后的反攻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问题，毛泽东特别注重“初战”或“序战”，认为初战必胜，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必须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这是毛泽东总结五次反“围剿”的血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在尔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活动中，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出色运用。

其二是战略上的持久，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是积极防御概念的应有之义。这一原则仍是由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决定的。毛泽东认为，十年内战史，就是“围剿”与反“围剿”往返重复的历史，而且“‘围剿’与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在这一个过程中，红军一直处于战略上的防御地位。因此，从战略上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但对这种战略上的持久战方针，“左”倾机会主义者讥笑为是“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仍然在山沟里转，要等到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他们要求战略上的速决战，直攻大城市，迅速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说：“这些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战略上之所以必须坚持持久战，是“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因此，由于敌强我弱，战略上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在战役和战斗上，则不是持久战，而是速决战，毛泽东不无讽刺地指出，“左”倾路线要求速决，反对持久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敌人兵多，装备良好，我军则枪少，尤其是缺乏弹药，几乎都取之于敌人，并且打来打去只有一支部队，必须连续作战；敌人的“围剿”虽然分兵进击，但多是比较密集，打其一部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部就相互靠拢，“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迅速解决战斗。这就要求，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不能打成消耗战，必须是歼灭战。消耗战实际上是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拼消耗“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可是“左”倾领导者们全都拧反了，他们在战略上要求速决，而在战役与战斗上则堡垒对堡垒，打持久战，拼消耗，第五次反“围剿”打了长达一年之久，终不能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237页。

打破而实行大长征。毛泽东认为，战略上的速决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是根本不适合敌强我弱这一根本特点的。只有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和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最后使我强敌弱，最终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必须采取的军事原则。

其三是战略上的内线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深入根据地，在战略上采取外线作战与进攻的形式，或是步步为营，或是长驱直入，或是堡垒推进。敌人以这种战略上的外线进攻或“围剿”，居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反之，红军则在战略上实行退却，取守势，反“围剿”，一句话，是实行战略上的内线作战。这样，红军就蒙受许多的不利，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如何打破敌人的“围剿”，击退敌人的进攻，在战略内线作战的被动中获得主动？这就必须通过在战略退却中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将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前述所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速决战与歼灭战，必须通过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才能实现。这种所谓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就是在战略上的内线中，分割敌军，迂回包围，“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样形成“‘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而取得“劣势中的优势”，成为“弱者中的强者”，变“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这其中的机巧，只有那亲历血战场面的人方能领悟，也只有亲自指挥这些战役的大军事家毛泽东方能用语道出这机巧。

其四是集中兵力作战。战略上处于防御、持久、内线作战的弱小军队，要实现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包围和歼灭敌人，打速决战，最关键的问题，是集中兵力。具体说来，集中兵力能够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中就达到了”；其次能够改变敌攻我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的阶段，即‘攻’的阶段，……集中兵力就是为达此目的”；再次能“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将分进的敌人之一部包围起来，以优势兵力临之，从而使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改变为具体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毛泽东认为，人人都知道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看起来集中兵力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却颇难，往往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挥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受环境所支配。为了应付这种环境，往往分散兵力。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的思想，是他在扑朔迷离的战争环境中，紧紧抓住敌强我弱这一根本特点所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3～22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页。

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战术的关键点。他从不为环境所迷惑，总是集中必要的兵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在运动中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全不知此中奥秘，面对四面合击的敌人，往往分散兵力，应付敌军。1932年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南西北四面出击，这“是伴随着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1933年则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结果一个拳头置之无用，另一个则打得很疲劳；待到1934年，军事平均主义则愈加发展到“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毛泽东总结正反经验，使集中兵力成为其用兵要道。他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毛泽东上述战略战术思想，虽然主要是对10年内战经验的总结，但基本的东西仍然贯穿于他以后的军事活动与军事思想中。比如《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与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基本的精神也与上述思想相通。当然，这些思想在以后的运用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此处就不加详述了。

## 二 主观能动性

强调主观能动性，是毛泽东以弱敌强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敌强我弱，我的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那就意味着只有失败一条路了，以弱胜强的概念就被根本否认了。所以，在必要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地、正确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弱中取胜的必要条件。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从早岁到晚年一以贯之的东西，而尤其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中得到了正确的出色的运用，获得了充分的发挥。

毛泽东在青年时候起，其思想就有两条似乎相互矛盾的线索，一是注重国情和实践，二是抽象地突出主观能动性，就后者而言，其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谭嗣同与杨昌济。谭嗣同标举“心力”之说，倡导“冲决网罗”的精神。谭的思想与为国捐躯的人格形象为毛泽东的老师所称道，在讲课中常常对“心力”、“意志”、“奋斗”等字眼详加发挥，认为“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也。”“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鸟，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对老师这套思想，毛泽东深得要旨，曾在日记中一连写下三个奋斗，并著文《心力说》，深为杨先生嘉许，得了100分。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主观能动性的极为重视：“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令从。”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他认为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杨昌济文集》第366页。

毛泽东：《讲堂录》，引文为杨昌济讲课内容。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页。

“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不过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在早年，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是“抽象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后来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抽象性被修正，对心力与心力的过分强调因战争的严酷现实的制约而未流于主观主义。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的恶劣环境中，主观能动性成为极有价值的因素而保存下来并得到强化。在江西时期，从红军与根据地的初创到大规模的反“围剿”，红军的力量与物质资源是非常薄弱的，“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正是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得以打破了敌人的多次“围剿”。长征的情况则更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毛泽东写下了“平生得意之笔”（毛泽东语）——四渡赤水之战。虽然从此使红军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但环境的恶劣仍难以想象。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国白军半数以上的追击”，但这一切都被克服了，靠的是“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可以说，长征更加强了毛泽东对意志力量的信念，使他更加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待到延安时期，主观能动性以及伴之而来的意志、决心和热情，几乎透露在他的即兴讲话抑或煌煌论著之中，而在军事论著中尤为表现得鲜明和突出。

毛泽东认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但是战争的逻辑是：一方面“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必须谨慎从事，不能盲目蛮干，否则立杆见影，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则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必须勇敢战斗，英勇无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方能决出胜负。毛泽东从这种战争逻辑与10年血战的历史经验中，锤炼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这种“正确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是要反对主观主义的盲目的能动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旨之一就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盲目和急躁病，无视敌我力量悬殊这一客观事实，幻想革命很快取得胜利，由此制定一条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迄至进攻不成，依次变成军事保守主义与逃跑主义，由盲目的能动性变成了毫无能动性，这种脱离实际的盲动主义成为毛泽东屡屡批判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主要是根据敌强我弱这一事实，阐述如何以弱敌强，弱中取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它指出：在既定的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把主观能动性提高到决定战争胜负的高度。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38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49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5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这里对正确的主观能动性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思想，即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思想；一是正确的行动，不是盲动。这种表述用的是哲学语言。但毛泽东的目的在于说明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因此，用军事语言来说，自觉能动性表现为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指导能力，以及在这种战略战术指导下的军事行动。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军事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

既然正确的主观能动性以符合客观实际为前提，因此，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就必然受到限制：“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但是，战争的条件只是规定了胜负的可能性，而不是胜负的现实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就在于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战争“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这话的直接背景当然是批判抗日战争中的亡国论，但如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却是根深蒂固的。他进一步认为，战争虽然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是可以起强弱变化的，在这里，主观上的努力，指导的正确，“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以弱对强，弱者取胜，关键就在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本来，事物在发展中由可能变为现实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参与和控制的过程，其从可能发展为现实是盲目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无关；二是人的实践活动参与控制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因人的能动作用使其中的某种可能性根据人的需要而变为现实。战争完全是人参与的过程，它的结局与人的努力的关系至为密切。在既定的战争力量下，胜负谁属，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想战胜强敌，更只有靠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中，主观能动性问题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几乎用同样的语言再三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是大军事家，他自己正是靠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反“围剿”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斗争中，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导演了一幕幕宏阔的战争活剧。

### 三 人民战争

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同时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当他领导武装斗争和进行军事理论思考时，从来不是用单纯的军事眼光来看待军事问题。“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可谓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他正因为这样，“人民战争”的概念在形成、发展与演变中，特别是在解放以后，其内容变得十分复杂，它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涵义，但其最初则是发源于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从军事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进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以弱敌强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思想。正如大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她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思想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理论的重要篇章。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青年时候就倡导“民众的大联合”。那时候他就认为“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都必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而在各种联合中，民众的大联合力量最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毛泽东此时虽然还排斥暴力革命，倡导呼声革命，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以后政治上实行统一战线、军事上发动人民战争的某些端倪。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还未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他已经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精细地计算革命的力量，尽管这种革命力量还是潜在的。在1925年12月发表于《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他详细地列了一个表，计算了敌友我的力量：大资产阶级：100万；中产阶级：400万；小资产阶级：1500万；半无产阶级：2万万；无产阶级（包括农业无产阶级与游民无产阶级）：4500万。他说：“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作敌人，也不在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开进了井冈山。在那惨淡经营的严酷岁月里，面对如此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如何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呢？毛泽东并未忘记他原来看到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他在批判悲观论调时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如果仅从某些现象上去看，自然会发生悲观念头。但若从实质上去看，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然力量弱小，但在中国的现时环境里，是会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中国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在资本家的压榨下正在反抗，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严重了，农民更加仇恨地主”等等。毛泽东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与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是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页。

《革命》第4期，1925年12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1页。

正义的，而正义的战争是必然会获得人民的支持并取得胜利的。他毫不怀疑在他身后有雄厚的力量支持着他。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潜在的力量变为现实的力量？如何使弱小的红军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扎根、生长并壮大起来，从而使弱小的红军对强敌的战争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发展为人民战争？首先，毛泽东着手对军队进行政治改造，其中除了规定红军的各种纪律之外，还着重批判单纯的军事主义观点，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并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使军、政、民融为一体；其次，“民以食为天”，毛泽东深知农村社会的症结所在，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因此开始土地革命，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与方法。武装斗争以土地革命为内容，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形式。当“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却形成“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欣喜气象。如此双管齐下，一方面红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打仗”；另一方面，农民把红军看成自己的军队，并在根据地开始形成童子团、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和正规红军的武装力量体制，以各种手段开展对敌斗争。毛泽东所看到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开始逐步变现实，人民战争的形式也开始形成。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的经验时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进攻敌军的其他条件也容易造成和发现。人民在反“围剿”过程中，积极“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究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由于人民的支持，敌军深入根据地之后，捕捉不到攻击目标，“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由此，虽然战略上敌强我弱，但在战役和战斗上却形成了我强敌弱或敌我均衡的形势。所以，毛泽东运用兵力的一整套战略战术的有效性，首先是建立在依靠人民进行战争的基础上的，毛泽东自己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朱德曾经也指出：“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朱德选集》第131页。

如果说江西时期的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所发动的群众力量还非常有限，那么，抗日战争则为毛泽东发动人民战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国近代以来蓄之已久的普遍的救亡热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达到了沸腾的顶点，爱国救亡的主旋律远比苏维埃运动从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激发了人民的力量。这时毛泽东紧紧抓住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更加超出军事的眼光来看待抗日的军事行动，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口号，批判国民党的单纯片面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各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抗日的胜利，离不开抗日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把抗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政治工作原则。不这样，“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另一方面，则是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动员全体人民。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中国军队数量少，动员了人民，军队就有“源源不绝的补充”；抗日财政困难，动员了人民，“则财政也不成问题”。毛泽东着重强调：“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毛泽东认为，从军事上来说，敌强我弱，但他是一个小国，是在进行侵略的野蛮战争，我是大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只要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

但是，在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的情况下，如何实行全面抗战，进行人民战争呢？这是一个极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毛泽东非常策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创建敌后根据地，在敌人后方开辟抗日救国、实行全面抗战的广阔天地，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抗战过程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逐渐形成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斗争形式上，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开展广泛全面的斗争。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时说：“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51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动员，……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联合……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人民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江西时期的人民战争范围狭小，人民也主要限于工人农民及红军；抗日战争则动员社会各界各阶层，虽然主体是农民，但也包括了抗战的其他军队。抗日战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环节，通过这一环节，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使得弱小的红军武装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获得广泛支持的人民军队。迫至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成了人民的公敌。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所预示的那“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终于变成一股现实的强大洪流，蒋介石的强大战争机器最终消失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 第三节 兵家的智慧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与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若论其思想根源，则勿宁说更多的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兵家智慧。对此，施拉姆说得非常中肯：“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中，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为了研究起见，也可以分开来。两个方面看来都融合了古今的思想，既有传统性，又有创造性。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几个世纪以来，地面部队的作战策略，较之成功地取得人民政治支持的条件，其变化要小得多。”在前章中，我们简要地涉及了毛泽东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策略与中国传统谋略文化的关系。实际上，这种谋略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当推传统兵家思想，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则深深植根于兵家智慧的土壤中。

由于中国古代频繁的战争和治国安邦的需要，使兵家思想很早就成熟起来，且不说众多的兵家著术，即使在经、史、子、集中；也载有各种战史战例与谋兵之道、用兵之法，此外还有各种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野史。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兵家的谋略智慧向来就是与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期间，这种谋略文化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这种文化样式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一直未曾间断，迄至明末清初以至近代，兵家谋略文化在经世思潮中还有复兴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圈中，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人的治兵之术，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毛泽东早在童年上私塾时，就读过《左传》、《史记》，并偏爱《三国》、《水浒》、《岳传》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史的兴趣似乎与研究哲学一样浓厚，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及《曾文正公全集》等，尤所喜好，并留心于战争成败之迹，攻守变换之势：“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

《朱德选集》第 150 页。

施拉姆：《毛泽东》第 12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6 页。

。特别是对《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他通过国文老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已有相当了解，《讲堂录》中就从中别取过不少材料，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对于《老子》，毛泽东也把它当作兵书来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胜）”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从这些史书、兵书及描写战争的小说中，毛泽东识得兵家韬略，并曾小试牛刀。在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毛泽东曾带领数百名学生志愿军，利用居高临下分进合围的有利地形，运用虚张声势、攻其不备，击其情归的策略，竟解决了北洋溃军一个全副武装的混成旅。事后，师生们啧啧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还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毛奇”。

如果毛泽东后来没有走上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上述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对毛泽东产生多大影响。问题在于历史选择了他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迭挫强敌的戎马生涯，这一切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和烙印就非同小可了，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开展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军事路线，当时就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不合时代的東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张国焘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攻击毛泽东缺乏近代军事意识。这些批评与指责无疑表明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愚蠢和无知，从另一角度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活动上的文化背景与选择的精明。战争智慧的发挥与技巧的把握，是谈不上什么阶级性的。因此，毛泽东对这些批评并不在乎，他好像有意为之。作为对教条主义者们的回报，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论著时，致信叶剑英、刘鼎，特别嘱咐他们给他买一部《孙子兵法》，并在他的军事名著中，把古书一一请了出来。古代的战史战例，如数家珍，传统兵家格言，在在可见。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全面探讨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及其思想的关系，只从兵家的智慧或内在精神着眼，举其荦荦大者，以此窥探兵家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活动与理论的影响。

其一是兵家智慧的运思焦点。有的学者在谈及谋略文化时认为，谋略运思的界域在人与人之间，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取舍，其基本规定是：在利害关系与友爱、依托等关系中，它只取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之协作、互助与争夺的两个方面中，它又只取对立纷争的一面。因此，“争”是谋略的基本智慧依据，其发而为谋划主体的基本精神态度是“夺”。故在智慧根基上，谋略与道德的依据恰恰相反。道德的依据在于和，在于利益协调，而谋略的依据在于对立，在于争斗，在于谋者为自我利益的谋算与争取，一句话，在于如何夺“利”。这当然是就一般谋略文化而言。而兵家智慧则是最典型的谋略文化样式，它运思的焦点就在于利害攸关之处如何争利夺利，而且这种

---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5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5页。

关于毛泽东在护法战争中的这一段插曲，参见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51~54页。转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34页。

参见《人、诡、谋》，《读书》1992年第7期。

“利”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利”，它是战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生死之利”，“国家兴亡之利”，这就使得夺取胜利成为兵家智慧的最终依据。因此，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来就是与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说教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精神样式。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计算利害，决定胜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因此，兵家的所有一切计谋，无论是谋天、谋地、谋人、谋道，都是为了谋利，战胜对方。在战争的敌对双方中，使用道德规范是迂腐而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大概古今中外都相同。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他的所有战争指挥活动与军事理论运思的焦点无非就是如何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的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这当然是用现代的理论性语言表述的兵家智慧的运思焦点。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毛泽东所使用的朴素的语言更为贴近古代兵家的计利夺利思想：打仗“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收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和“走”都是利害攸关之处的行为选择，死拼连老本都会蚀掉。教条主义者的“全线出击”正是不知道战争的这种“利害”：“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毛泽东所处的是敌我强弱悬殊的恶劣环境，生死利害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也就决定了他运思的焦点与传统兵家智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是兵家冷静的理性态度。由于兵家智慧运思的焦点在于争利夺利，并且在兵战、伐交之中利害关系太大，而敌对双方都在算计对方，这就把兵家智慧的冷静的理性特征最鲜明地表现出来。所以为兵为谋者必须去情制怒，完全以利害谋划为依据，而不以感情喜怒为转移，不能一时冲动，更不能把军事行动寄托在侥幸的基础上。换言之，不能用任何非理性的东西去主宰军事活动，否则便大祸临头，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所以在古代兵家传统思想中，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是最为突出的：“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君之道也。”这种不以一时喜怒情感而动的冷静理性态度，为历代兵家所承袭。直至近代，湘军首领胡林翼还总

---

《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兵法·火攻篇》。

《孙子兵法·计篇》。

《学习毛泽东》第9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8~509页。

《孙子兵法·火攻篇》。

结说：“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对此，毛泽东可以说领会得最为深刻。这不仅因为他作为军事家在理性态度上与传统兵家智慧相贯通，而且在于他从红军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锻炼出这种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他在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急性病时说，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碰壁，就在于他们总是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告诫人们在战争中必须保持冷静：“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

冷静的理性态度在实际的战争行动中，往往表现为克制态度与“忍”的精神。这就使得兵家智慧虽然以争利为目的，但不得不同直接计较利害得失的自然反应状态相疏离，从而保持一种克制的理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并非见利就上，因此又有所谓“室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里的“不由”、“不击”、“不攻”、“不争”，都表明冷静理性态度的“忍”的精神。但“忍”并非无争，克制并非无欲，它是忍而争，制欲而大欲，即是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因而“忍”的精神进一步转化为深谋远虑、迂回取胜的原则。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须知此。对此，毛泽东可以说运用得非常娴熟。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想先打谭道源师，“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他后来在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时说，走就是为了打，但有许多情况不好打：敌人多了不好打；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关于“争地”也是这样，有所不争而后有所争，“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这一切都体现出兵家冷静克制的态度、忍耐精神与迂回取胜的夺利智慧。它最典型地表现为毛泽东的“战略退却”的谋略思想。在强敌面前，只有先忍耐一下，先让一步，持重克制，待机破敌。而且这种韬略直接来源于古代的战史战例，诸如曹刿论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魏吴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冷静的理性态度在战争中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注重经验和观察，在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敌我对峙的双峰格局中，仔细判断敌我情势，乃至天时地利，从而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规定自己的军事行动。故《孙子兵法》开篇就说用兵“不可不察”，“校之以计而索

---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3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孙子兵法·变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乃至提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一传统兵家智慧，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灵魂了。他认为战争活动虽然具有不确实性，但它不是神物，仍是有端倪可察，有规律可寻。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唯一的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凭意气用事的瞎指挥，以及他们指责毛泽东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并且进行反批评：“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能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可以说，毛泽东的整个军事指挥活动，体现的正是这种知己知彼的理性精神，他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以及他的军事理论体系，无不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

其三是兵家的任智精神。兵家智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生死利害攸关之处的任智巧夺。当苏辙说《老子》一书“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时，正点出了兵家的特点。在兵家思想中，此所谓“智”既非用来实现神圣超越而趋于宗教，亦非用来追求客观真理而获得知识，也不是用来认识道德规范进行心性修养，而是直接用来谋求功利的一种韬略智慧。因此，此所谓“智”是谋求功利的手段，是与实用功利相关联的。正因为将“智”作为谋利的一个精神环节，因而兵家的夺利争利就完全不是对利害的一种自然反应，而保持着克制忍耐的冷静理性态度。利害纷争就转化为智力争斗，任智而不任力，以智胜而不是以力取，故自古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儒将英雄、军师智士、权谋辅佐。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种任智巧夺的兵家智慧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故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突出“算”也就是计谋在决定胜负中的重要性。他甚至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就是说，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所以一部《孙子兵法》，在在都是机略智谋。既然在战争中敌对双方都在使用智谋争夺利害，这里就没有道德规范可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总之，兵不厌诈，诡计、诡异、诡诈为兵家所尚。而且这种暗中算计与谋略是不能泄漏的。“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并不是如《孙子兵法新注》一书所解释的是所谓“不可事先规定”，而是如曹

---

《孙子兵法·谋攻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道德真经论兵要义·叙表》。

《孙子兵法·计篇》。

《孙子兵法·作战篇》。

《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页。

操所说：“传，犹泄也”。泄谋者必败，此为兵家之大忌。这种兵家任智精神，毛泽东可以说得其神髓。他一贯提倡智勇双全，敌人的统帅部也具有某种战略眼光，“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胜利的可能”。他作为军事指挥者，当然懂得军事谋略的秘密性。虽然红军的一般作战方式是为敌人所熟悉的，“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活动与其军事理论中，我们似乎随处可见《孙子兵法》中各种智谋的影子。诸如避实击虚，拣弱的打；诱敌深入，造“势”（创造各种条件）取胜；示于东而击于西（示形）；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先人至，后人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正合，以奇胜（佯攻），等等。诸如此类，纯属兵家任智巧夺智慧的高度运用与发挥，僵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足以语此的”。在这种任智巧夺的战争活动中，毛泽东认为是不能讲究什么道德的，必须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尽可能地给敌人以错觉和给敌人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当然，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有愚蠢的做法。公元前638年，宋国的宋襄公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准备就绪，楚兵正在渡河，宋襄公以君子不乘人之危拒绝攻击楚兵，一直等到楚兵一切都准备好了，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兵大败。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其四是兵家的运思方式。战争运动的特点，就在于敌对双方都是武装的活着的人群，在不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生死攸关的矛盾运动。这就使得战争环境变得极为复杂、扑朔迷离和捉摸不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指挥者容易为这种复杂环境所支配而失掉主动权。传统兵家智慧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在这种复杂的战争环境中锤炼成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是独特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它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不是思维中抽象的矛盾运动，而就是战争环境中的非常具体和多样化的现实的对立运动。兵家智慧的辩证思维方式就表现在从繁杂众多的现象中，“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也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来概括战争中复杂事物的特征，所以《孙子兵法》提出许许多多的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如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正奇、攻守、动静、虚实、劳逸、饥饱、勇怯、多寡……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代替的直观把握方式。并且，兵家的运思方式并不仅仅是静观和认识这些矛盾特征与对立的两项，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自己的需要在战争实践中参与和展开这些矛盾运动，使对立的两项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从而在其中实现利害、生死、胜负之间的勾连转换。并且在战争实践中，这种运思方式最妙之处就在于常常使自己处于对立项的反面而最终稳立于正面，诸如明明皇要生，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分明为了攻，然而以退为攻等等，“故

---

《十一家注孙子·计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2页。

《孙子兵法·虚实篇》。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这种运思方式正是战争实践中的辩证方式，这是战争指导者最难处理的。故孙子认为用兵“神乎神乎，”“微乎微乎”，但总的原则是“因敌而变化”，亦即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泽东对此是极为推崇的。我们不仅在他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看出他对战争中矛盾对立项的巧妙运用与处理，而且在他的军事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兵家这种运思方式的遗韵。诸如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围剿”中的围剿，包围中的包围，封锁中的封锁等等，通过这一切而获得被动中的主动，不利中的有利。直观地看，战争胜负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强弱和兵力的多寡，但兵家智慧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辩证的参与处理而转弱为强，转少为多。在这方面，孙子提出“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一思想完全为毛泽东所继承，形成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以弱胜强的基本战略。并且在用句遣词上也是孙子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和军事理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上面只是略举数端。当然，毛泽东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继承中迭有创新，在运用中又有新的发展。但总起来看，毛泽东军事理论这一株瑰丽的奇葩，的确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兵家智慧的沃土之中。

---

《孙子兵法·军争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 第十一章 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

葛兰西曾认为，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著述，但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寻找。这话准确地点出了政治家哲学著作的实质，他们与专门的哲学家、与远离政治斗争的思想家不同，其哲学思想往往就是其政治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可以说，毛泽东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一直处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中心，其思考的焦点无疑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在哲学上的体现，就是他于1937年7月至8月间写成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也可以说，两论是他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

### 第一节 两论“不能不写”

毛泽东在回顾两论写作的原因时曾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一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一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这段话至少给我们提示出两点：一是两论的写作是出于在中国特殊环境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需要；二是清算脱离中国实际而发生的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 一 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

近代中国面临强邻四逼、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日益走向没落，但它仍以其顽强的习惯势力变换着各种形式继续苟延残喘，成为中国贫弱累积的根源，因而与人民大众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先之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继之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典型的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意义的革命。这些革命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未完成其所承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所寻

---

以下简称两论。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1页。

借的各种武器，既不能有效地对付封建主义，也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而且“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成为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

“五四”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沛然而起，它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它所从事的反帝与反封建的运动，仍是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资产阶级事业的继续。在社会革命的意义并未提供观察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新的思想武器。但“五四”运动却在思想文化启蒙的意义上陶冶了大批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彷徨歧途之中，通过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从俄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式革命”的道路成为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共识。这一选择使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主要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式，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虽然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意义，给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远大的方向，但它的某些具体革命理论与策略，与东方如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相去甚远；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没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极其微弱的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虽然提供了这种分析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俄式革命”的道路及指导理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及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就其普遍性而言，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就特殊性而言，俄国地跨欧亚两洲，其社会基础与中国有相似之点，因而比之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更为接近中国的实际，所以“五四”的先驱者们大都选择了走“俄式革命”的道路。但是，这种特殊性仍然只有一般的意义。中国不像俄国只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度，它具有悠久的封建专制历史，自然地理幅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半殖民与半封建的性质使得中国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呈现出相互交织异常复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革命的对象与力量往往是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以资产阶级而言，它本身就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革命的一面，又具有软弱甚至反革命的一面；买办大资产阶级则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角逐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此等等，都表明了中国社会条件的极其复杂，革命过程与道路的极为特殊。在这样的国度中如何进行革命，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俄式道路也只有一般的意义。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与特殊方式，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甚至俄式道路所能规范的。列宁曾对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比列宁讲到的更为特殊，它不仅要反对“中世纪残余”，而且更主要的是首先获得民族独立；列宁还认为东方共产党组织可以在俄国所开始的斗争中找到革命的答案，而中国的革命道路却与俄式

---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5页。

革命也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正是这种非常特殊的革命任务。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革命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却在理论上没有充分的准备，在实践上也缺乏斗争经验。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俄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即投入了蓬勃发展的、有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没有也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及其精神实质和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进行双重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只能是一方面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策略为准绳，另一方面只能在失败中总结教训，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具体道路。共产国际虽然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它的许多指示与决议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对于中国革命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由一个远离非常特殊的中国环境的国际指挥中心来导演中国革命，不能不说是中国国内一、二次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从中国实际情况中开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血的教训中，获得了对于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正确认识，把革命力量引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省际交界的农村地区，创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并逐渐形成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数次“围剿”。但是，这样一条山沟里的革命道路与山地游击战争的军事路线完全是血的教训与战争的逻辑所规定出来的，并没有多少理论根据。因此，山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也因此遭到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否定，终于又迎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恩格斯曾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在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和亲身体会取得的经验中进行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毛泽东也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正是在这种胜败之间的反复比较中，一方面认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从更广阔更深的层次上暴露出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矛盾，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出来。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正是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两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它根植于这一结合的历史经验，又是对这一经验的哲学升华。

## 二 清算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两论的写作，从另一角度看，则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需要。如上述说，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极其特殊，中国共产党又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因此在革命过程中连续不断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7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

地出现过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其中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复杂的阶级关系缺乏了解。因此，他一方面把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主张“二次革命”论；另一方面，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发展党的力量。在大革命初期，孙中山曾说过：“精卫（汪精卫）、展堂（胡汉民）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但共产国际硬说汪精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甚至“已经走到了工农专政的路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陈独秀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多方迁就，在敌我友的复杂关系与变化态势中失去了应变能力，终于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在中共领导层中引起了一股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又在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向“左”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党内“左倾病只是残余，而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正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但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是以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在莫斯科看来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方式出现的，这就为共产国际所不容。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主要是忠于中国而不是忠于莫斯科，所以在莫斯科看来，这是“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号召中国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党的领导人更加失去了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可能性。瞿秋白上台后只得继续执行“左”倾路线，但由于他对李立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同样遭到共产国际的指斥。于是，在米夫的支持下，本来极力推行立三路线的王明，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更“左”的方式来反对在他看来是所谓右倾的立三路线。他上台的口号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深得莫斯科的要旨，因而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米夫公开说，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体现的就是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对国际。这样一来，在中共党内便出现了一种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的倾向，同时王明的“左”倾路线更加走向极端，更加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路线随着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苏区，便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路线，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排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根源上，

---

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页。

《六大以前》，第812~813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47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112页。

《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关于米夫》

就是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列的一些词句与苏联经验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分离开来，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遵义会议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首先在红军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克服，并在组织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却来不及清理。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首先在中国革命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上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这就是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问题。1935年12月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抓住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向全党提醒统一战线问题上右倾错误的危险。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彻底批判了脱离战争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之所以首先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因为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而“左”右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但是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因为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以其深层的错误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事实上，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从未根除，唯共产国际指示是尊。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后，根本不从复杂的中国阶级关系与实际状况出发，却秉承莫斯科的旨意，从原来的极左又倒向极右，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提出一套右倾论调，并为党内的一些人所接受。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迫切的问题。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他曾指出，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军事路线）与党的建设（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体现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反过来说，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两论的写作，即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 三 “闻道”的兴趣

两论的写作，主要是中国革命与党内思想斗争的需要。但是，也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心理因素与对哲学研究的兴趣。众多的研究者在谈到两论的写作原因时大都忽视了这一点，或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个对哲学毫无兴趣或毫无哲学素养的人，即使现实的斗争如何需要某种哲学理论，也是很难写出几篇有价值的哲学著作的。诚然，毛泽东决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这从两论的内容及上述写作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来。但毛泽东的确从早年一直到晚年，都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忽视这一点，很难说是对两论写作的原因作出了全面的解释。

从学生时候起，毛泽东就对理论上的建树有所抱负。人们都说毛泽东的特点在于他是一个实践家。的确，在一师时期，他就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那时毛蔡齐名，有蔡和森是理论家，毛泽东是实践家之说，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也确实充分表现了他的组织天才与实践才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方面则是毛泽东更倾向于理论上的建树。学生时代他就学于杨昌济门下。杨先生一贯倡导圣贤精神，区分圣贤与帝王之特质：圣贤百代之王，帝王一代之王；前者乃传教之人，创立学说，泽被千古，教化万代；后者乃办事之人，顶多创立一时之基业，影响远非前者之所及；前者如孔孟程朱陆王，后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迄至近代，左宗棠为办事之人，曾国藩则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被誉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的这套理论，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早年的课堂笔记里，也体现在他那时的思想中。那时他就用这一标准指点近代人物，并“独服曾文正”，倾向于衷言、立功并完，尤其倾向于“倡学”。这一价值取向似乎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要毛泽东在统帅与导师之间作一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他经常声称自己是一个教师，其意蕴是非常深厚的。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在于他们观古今之变，通天人之际，从而把握宇宙人世间的根本道理。杨昌济讲《论语类钞》，引孔子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闻道”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研究哲学，所以杨昌济解释说，“人不可无哲学思想，”“人不闻道，是谓虚生”，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哲人如孔、孟、程、朱、陆、王，皆能悟道，乐莫大焉。在杨昌济的引导下，毛泽东曾醉心于探讨大本大源，亦即哲学研究，并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走上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已不再进行学生时代那种抽象的思辨哲学探讨。但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却从未间断过。1920年6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在他所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也特意把“哲学上之主义”列进去，冠于各种主义之首。1920年底至1921年初，毛泽东“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但那时他找不到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只得搜寻其他哲学资料进行研究。在他组织经办的文化书社所销售的各种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各样的哲学书刊。1921年1月，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三次会议，在讨论介绍个人计划时，毛泽东声称自己除了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外，尤“喜研究哲学”。1921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规定“本大学之研究范围”分为“科学、哲学、文学”三类。可见毛泽东对哲学研究始终未曾忘怀。

尔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斗争，从容地进行哲学研究已不可能。但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抓住不放的。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的还很少，但毛泽东1926年6月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时，从记录材料来看，似已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从他

---

《杨昌济文集》第8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9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参加革命时起，读马列著作或研究哲学，已不是纯学问的研究了。但哲学研究的兴趣对于他了解和研读马列著作的影响也不能低估。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搜寻到了恩格斯的《反社林论》以及列宁的一些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在长征路上还读《反杜林论》。红军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安定，同时30年代出现了一股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热潮，这给毛泽东提供了研究哲学的极好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搜寻这些书籍，认真研读。斯诺对此曾有过记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安曾出现过哲学研究的热潮，毛泽东还仿照他学生时代的作法，成立过哲学研究小组，倡导过“新哲学会”，这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了。

两论便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辛勤研究的成果，放远一点看，也是他从青年时候起立志于理论建树、“倡学”与探索哲学的结果。他早年醉心于“闻道”，认为孔子这样的圣人之所以与弟子对答如流，“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矛盾论》的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两相对照，遣词立意前后一揆。

两论无论就其内容或是就其写作背景来看，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毛泽东的个人心理因素的确是不能忽视的。施拉姆曾说：“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崇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这种判断似未抓到痒处。实际上毛泽东对理论与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后来戎马倥偬，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他因此在江西时期被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遵义会议上有人指斥他“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这对于一个一贯抱有理论建树与哲学研究兴趣、在统帅与导师之间宁可选择导师的人来说，其刺激是可想而知的，这无疑是在毛泽东从理论上清算那些旁征博引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者们的心理动机。毛泽东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从这个意义上看，两论的确是“不能不写”的。

## 第二节 从政治军事著作到两论

延安时期及其以前毛泽东的一些著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历程，两论便是对这一结合的哲学论证，标志着这一结合的成熟。

---

斯诺：《西行漫记》第6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

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

施拉姆：《毛泽东》第190页。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8页。

转引自郭化若：《毛泽东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见《中国哲学》第一辑。

## 一 哲学的前导

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来说，两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这一升华过程近看是从《批注》到两论；远看，则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批注》与两论之前的一些政治与军事著作中，两论的思想已初露端倪，甚至是呼之欲出了。

1930年5月，毛泽东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两论的前身。这篇文章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其题解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这与两论写作的目的是一样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响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这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原则，同时也以朴素的形式和语言表达了两论的思想。但是，我们认为《反对本本主义》还不是一篇哲学文章，尽管文中使用了“洗刷唯心精神”这样的字眼。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或者说是毛泽东在这一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反对本本主义》还未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论证和概括，也还未升华到哲学的高度。不过，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主题与思想，的确是两论的雏形或前导。

1935年12月，毛泽东《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标志着我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既反对了右倾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特别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正确处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就是提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所谓主要敌人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甚至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界限。这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结果。在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的情况下，这一路线显得愈益脱离中国历史主题，越发显得“左”倾。毛泽东的报告不是从某种教条出发，而是从中国当前形势的特点出发，紧紧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主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我党从苏维埃革命向民族民主革命转变的一篇关键性的政治文献。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从理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把“本本”当作“圣经”，正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是在政治路线上进一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论正是在哲学上对这些思想的论证与总结。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是两论的前导了。无论从时间上来说（两论是8个月后完成的）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与两论有更为密切的关系。由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称《批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此，作为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与概括的两论，与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的内容可说是水乳交融，相映成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已经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于1936年12月上旬，“因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据说，此文的原形就叫做《军事辩证法》，“最近发现一份毛泽东的题目为‘军事辩证法’的15页打印件。这是60年代莫文骅根据刘亚楼保存的一份内容相同的材料打印的。而且根据莫文骅考证，这是当年毛泽东所写。其目的不是为发表，而是用于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军事辩证法》的公开讲课内容与发表形式。若如此，毛泽东在阐述军事思想时，是有意识地把它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论述的了。

事实上也如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充满着丰富的认识论与辩证法思想。许多论述与两论相去不远。毛泽东在论述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时，要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尤其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研究，突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这可以说是《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特殊性理论与不同矛盾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思想的雏形；在说到学习军事理论时，毛泽东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这与《实践论》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强调“亲知”是一脉相承的；在谈到指挥员认识敌情时，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对军事指挥员认识过程的描述。在《实践论》中则升华为这样的表述：“要完整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两相比照，遣词立意，前后一贯，只是前者讲军事，后者谈哲学；在论述战争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若组成战争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有的时候“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不致使全局引起变化，有时“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便满盘皆输或转败为胜。因此，“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动作上”，而不是相反。这种抓要害、抓关键的战争经验，在《矛盾论》里便表述为抓主要矛盾的思想：“任何过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0页题解。

参见金羽等主编，《〈实践论〉〈矛盾论〉新探》，第12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他诸如战争运动中的许多矛盾对立项，更是《矛盾论》中随手拈用的生动例子。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无论就其整体构思，抑或是其中的具体论述，我们都可以看出两论的思想已是呼之欲出了。

当然，上述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著作，即使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一本充满哲学思想的著作，它们本身还不是一般的哲学著作，还不就是两论。它们只是两论哲学思想的前导。从这些著作到两论，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种哲学的升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从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不是从对思维科学、文学艺术的探讨，甚至也不是从对一般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的研究而通向哲学的。他是经由政治与战争实践，特别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样一条特殊道路而达于一般哲学的。这就规定了他的哲学思想与两论的特点；也使他区别于其他的哲学家，甚至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通向哲学的道路，更区别于那些通过概念思辨而构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历程。

## 二 《批注》的焦点

恩格斯曾经在谈到自然科学家们需要研究哲学时指出，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界辩证联系与发展的认识，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与恩格斯谈到的这种情况相仿佛，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国革命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与辩证性质，它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已经充分反映在上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著作中。但是，要使这一“结合”得到哲学上的论证，要真正运用哲学的概念来说明中国革命的辩证性质，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毛泽东从其政治与军事思想到两论的哲学升华或飞跃，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毛泽东非常自觉地钻研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泽东从30年代到60年代批读10本哲学书籍的情况，其中有8本是在延安时期批注的。在两论写作之前，毛泽东批读的哲学著作是30年初苏联出版的两本哲学教科书，即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以及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从时间上来看，“西氏本”的批读时间是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米丁本”批读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以前。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尤其是“西氏本”读过多遍，批注文字则主要写于“西安事变”之后。因为毛泽东的批注性文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2页。

以下简称“西氏本”。

以下简称“米丁本”。

字大量是用毛笔写成的，在“西氏本”上有这样一段批注：“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并不是不相容的——孙鸣九说。”孙鸣九原为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孙主战，认为抗日与反蒋并不矛盾。这说明批注文字与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无关，但与两论密切相联，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它们反映了毛泽东从政治军事思想到两论的哲学“脱毛”过程，是毛泽东从政治军事著作到哲学著作升华的一个中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批注》，主要即指毛泽东对“西氏本”与“米丁本”的批注。

毛泽东首先批读的是“西氏本”，他通读了全书，但批注的重点主要在绪论和前三章，亦即认识论与辩证法问题。迨至批读“米丁本”时，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毛泽东的批注完全集中在该书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统一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其他的章节，既无批注文字，也很少有批划的符号。

在毛泽东的批注文字中，既有对原著内容的评论，也有对原文的提要与概述；既有联系中国实际的说明，亦有对原有理论的提高与发挥。但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批注》紧紧扣住的是认识论与辩证法问题。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问题。《批注》一开始就抓住了原著在并不显眼的章节中顺便提到与主题无多大关系的列宁的一段话，即“理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统一”，毛泽东对此给予深切关注，批道：“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关于主客体的统一、思想认识外界的途径问题，“西氏本”在第二章第二节“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中说：“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面划了多达5道杠，并且批了提要 and 复述性质的文字。关于认识的真理性的证明问题，“西氏本”说：“我们的感觉和概念，是客观的现实之正确的反映么？答复这个问题的，就是实践”，接着引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多次勾勾划划，批道：“说得很好”，“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关于认识运动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在批读中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西氏本”是以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为例子来阐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虽然意在说明两者的特点与关系，但为许多无关宏旨的枝节论述所冲淡。毛泽东从中提炼和发挥出这样一些批语：“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1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2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3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6 页。

理解他。”毛泽东从“西氏本”冗长的论述中，紧紧抓住和发挥了实践在整个认识运动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理论从实践产生……然后再应用这些理论于实践，就是在实践上实现这些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在批读“米丁本”时，毛泽东除了注意矛盾问题之外，完全把批注的焦点集中在实践问题上，诸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不止一种实践活动的形式”；“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最后，毛泽东从“米丁本”冗长笨拙的论述中，提要出这样一段批语：“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基本上就是《实践论》的开头语了。”

其二是对“特性”、“质”等哲学概念的关注。这些概念在“西氏本”和“米丁本”中都是作为质量互变规律的范畴来阐述的，其基本思想来源于黑格尔。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这些概念。“西氏本”主要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区别来说明事物的质的区别，“米丁本”则从物质运动形式与自然事物来阐述“质”的概念。毛泽东从他们的论述中提要 and 发挥出这样一些思想：“不同的运动形态，就是表现不同的特质或定性”；“事物因质的不同而区（互）相区别”；“质的定性是发展变化的，说不变化不对”；“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只有认识了质的定性，即特殊规律性时，才算认识了某物”；“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其要指出其根本特性，才能认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因此“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诸如此类的批语，在《批注》占有相当的篇幅。这些批语表明毛泽东对事物、过程的质，根本性质以及过程发展中各个阶段的特点特别重视。“西氏本”与“米丁本”是把质与量的互变作为规律阐述的，虽然毛泽东也对质、量及其关系作了批注，但侧重点明显集中在“质”、“根本性质”等概念方面，而且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着眼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所关注的是中国革命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特殊性，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正是从这些特点出发而制定的。有两段批语说明了他关注这些概念的原因。在“西氏本”原文中讨论“质”的概念时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毛泽东在“许多的特殊性”下面画了三道横线和一道波浪线，然后批道：“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首先分析特点。”这的确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8、29、30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3、37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42、143、144、145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81、182、182、42，183、185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44，45、46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43 页。

中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西氏本”原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毛泽东圈圈划划后说：“对”，并写道：“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级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都表明毛泽东对“质”、“特性”等哲学概念关注的特殊的政治军事角度。他对事物、过程以及过程中的发展阶段的质、根本性质等的批语，后来被溶入《矛盾论》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之中。

其三是对“对立统一法则”的特别注意。对立统一规律在“西氏本”中是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中分七节来阐述的，虽然占了相当的篇幅，但这种结构安排冲淡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米丁本”把这一规律放在第四章“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中，用一节专门论述，则又显得份量不足，且内容杂乱，眉目不清。毛泽东在其政治与军事著作中已经涉及了许多矛盾问题，他以其待有的敏锐力紧紧抓住了原著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据统计，在“西氏本”12000余字的批语中，涉及矛盾问题的即有6000多字；在“米丁本”2600多字的批语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批注文字也多达一半以上，表明他对矛盾问题特别重视。在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批语中，提要、概述和发挥了原著中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双方相互联结与相互渗透、差异就是矛盾、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等思想。特别是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其批语也往往比原著的内容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有的则发挥得更透彻。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西氏本”在第三章第五节“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中，设了“各过程之内的矛盾之特性”作为一个小问题，谈及了“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盾，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但这些思想被淹没在大量的对托洛斯基主义批判的文字之中。毛泽东在这些无关宏旨的冗长议论中，独独在上引两段话下面划了四道波浪线，批道：“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并且根据原文发挥道：“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任务”。“米丁本”没有把矛盾特殊性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论述，但其优点是涉及了不同运动形式、不同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矛盾特殊性，毛泽东对这些都作了概要式的批语，强调“共同点和特殊点都是紧要的，而特点尤要。”关于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米丁本”没有涉及，“西氏本”设有专节论述“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批评季诺维尔夫、普列汉诺夫等不能理解矛盾主导方面的错误，惜乎在理论上未作展开与发挥。至于主要矛盾问题，是在第五节讲“统一物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8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2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4~75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6页。

的分裂”时，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为例子，顺便提及的，既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更谈不上在理论上的展开论述。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紧紧抓住了这个思想，对“根本矛盾”、“主要矛盾”给予极大关注，并联系中国实际作了发挥。在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节中，毛泽东更是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与非主导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中心议题，作了长达 1250 字的论述，为《批注》中最长的一段批语，不仅在理论上比原著突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也更透彻，发挥更充分，后来《矛盾论》专辟一节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内因与外因，也是毛泽东《批注》中极为重视的一个思想。“西氏本”对这两个概念用的是“内的矛盾与外的矛盾”，认为“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作用”，但“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毛泽东的批语长达 700 多字，强调内因起决定作用：“物之本身状况如何，是第一原因”；“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迨至读“米丁本”时，毛泽东重新肯了这一思想。“米丁本”写道：“外部条件底作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之内部自身的动力，揭露了使生命本身发展的自内推动，我们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的实质”。毛泽东批道：“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这就比原文更明晰、概括，也更深刻。后来《矛盾论》对此进一步提炼，提出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著名论断。

其四是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经验批读原著。这成为《批注》的一大特色，在上面提到的一些批语中，他几乎都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而加以发挥。例如：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问题，他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认为原文对“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的思想的批判，“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他联系“主要矛盾”的思想，认为“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关于内因与外因，他联系中国革命经验发挥说：“‘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7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9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60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9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9 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68 页。

与巩固”，诸如此类，在批语中占有相当比重。他把批注的焦点集中在认识论与辩证法上，尤其是实践与矛盾问题上，因而能够从原文中一些并不显眼的论述中提炼和发挥出一些重要思想。

毛泽东批注的焦点表明：一方面，认识论与辩证法已是中国革命过程中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所蕴含和突出出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正是两论所具体阐明的两个哲学问题，《批注》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两论正是在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批注》凝结而成的哲学篇章。

### 三 两论的主题

毛泽东在经过一番哲学钻研之后，即于1937年7—8月间向延安抗大学员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课底稿即是《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个提纲共分三章，第一章唯物论与唯心论；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实践论》原为《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授提纲最早于1937年9月出过油印本，尔后于40年代在各地多次出版流行。从《提纲》的整体结构看，与当时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哲学读物一样，带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化的性质，并且许多内容与章节安排也不难从这些哲学书籍有关章节中找到准确的依据。这主要是因为时间短促，《提纲》要在整体上提出新的体系是很难的；同时，体系化也是为了给当时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的需要，但是，从两论与《提纲》的关系来看，则是别具一格的。《提纲》其他章节的内容十分简略，是名副其实的提纲，而两论在《提纲》中显得篇幅很长，内容丰富，是两篇完整的哲学论文。“在那时，《实践论》与《矛盾论》还单独油印过。毛泽东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给吴黎平等同志，我们在吴黎平同志住处曾见到过这个本子。”解放后公开发表时，作者曾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特别是《矛盾论》增删较大，但整体结构与基本思想并未作多少改动。从两论与“西氏本”和“米丁本”的关系来看，如前所述，它们的确吸收了这两本哲学教科书的思想，但《批注》的焦点也说明，两论是毛泽东经过消化、提高、发挥，凝炼而成的专门性哲学著作，因而在整体结构与许多内容上多有创新，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两论作为毛泽东1937年的哲学代表作。

关于两论与中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包括翻译的与介绍的）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者著文加以说明。本节前面“《批注》的焦点”也作了一定的探讨。但我们认为，《批注》只是毛泽东从政治军事到哲学的一个中介环节。因此，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两论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这个历史要求的联系，了解两论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所写的政治与军事著作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两论的实质与主题，本章前面的论述与探讨的立意盖出于此。

两论的实质与主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界说：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两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要求来看，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更具体的说是对马克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6~108页。

许金兴、魏世峰主编，《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第23页。

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中国革命关键问题的哲学论证；从党内思想路线的斗争来说，两论是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的哲学批判，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哲学基础。这三个方面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毛泽东的许多政治著作与军事著作代表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是在与“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从其政治军事思想到两论哲学思想的升华，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总结与论证，是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反过来也一样，对各种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是毛泽东在政治与军事著作中对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批判的继续，是为了提高广大党员与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并把这种批判与认识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关于毛泽东政治军事著作与两论的联系，前面多所论列，而关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论证是与批判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各种错误倾向分不开的。因此，这里仅就两论对“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略述一二。

《实践论》是以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主线索而展开论述的。其主旨正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实践结合起来，反对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错误思想路线。《实践论》特别强调认识源于实践，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来源于工人运动的实践，它们不能“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产生”，换言之，在他们的理论中并未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提供所有的现成答案。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恰恰将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旁征博引马列词句套用于中国革命，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而又自以为是，反诬注重调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针对这些“知识里手”，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他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但是已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比之“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的批判更理论化，也更深刻。

《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与目的；这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认识过程；并且这一认识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推移深化，从而深刻描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过程，从更深的层次上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经验教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

---

《实践论》原稿。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也更深刻地批判了脱离中国客观实际与实践的或“左”或右的思想错误的根源。根据这样的认识论，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必须善于改正，而且当革命过程已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时，必须善于使自己在认识上也跟着改变，提出适合新的形势的任务与工作方案，不能使认识停留在旧的阶段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而“左”倾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些“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是针对那些僵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一结论，蕴含着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它厚积而薄发，言简而意深。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深中肯綮。

如果说《实践论》突出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那么，《矛盾论》则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主题同样是从哲学上论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清算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根源。《矛盾论》在公开发表时几乎在每一个重要观点上都增加了对教条主义批判的段落或词句。应该指出，毛泽东当时写作《矛盾论》的本意也是如此。这不仅在毛泽东读“西氏本”的批语中非常明确，而且在《矛盾论》原稿的内容中也很明显。只是当时没有使用“教条主义”这个词，同时思想路线问题当时在党内也还未公开提出来解决，许多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人也并未在思想上认识自己的错误，有的还继续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在延安整风时期，这一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毛泽东在此其间写的《批注》中也明确使用了“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这类词语。《矛盾论》公开发表时的修改只是使原有主题更加明确而已。

《矛盾论》在开篇中即指出“左”倾冒险主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不仅在于在认识论上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为在辩证法问题上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否认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而不知道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此他们就不能了解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意义，所以《矛盾论》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索，展开对矛盾问题的研究，而尤注重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的论述与阐发。毛泽东说：关于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矛盾的普遍性问题已经被很多人承认，“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这段话把《矛盾论》的主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矛盾论》用大量篇幅精彩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几种情形，虽然其中吸收了“西氏本”与“米丁本”的某些思想，但其如此明确和系统，如此深刻而独到，分明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毛泽东以往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而其哲学批判的锋芒所指，无不以教条主义为靶子，这都是不能用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所能规范的。

辩证法即是认识论。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入手，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人类的认识秩序总是首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然后才能认识事物一般的和普遍的东西。当认识了普遍的本质之后，就以这种普遍性的知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的具体特殊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以丰富和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这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生动的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而其要害就在于不能脱离矛盾特殊性的认识。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不懂得必须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不懂得在认识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还必须继续研究新的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

辩证法也即是方法论。矛盾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各种运动形式的事物，具有不同质的矛盾；各种事物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具有特殊的矛盾与特殊的本质；事物发展的过程因为矛盾的变化而显现出阶段性来，不同阶段上的矛盾也有其特殊性。所有这些“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在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中，毛泽东认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只有具体地研究矛盾的特殊

---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4 ~ 30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1 页。

性，找出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一样，弱小的力量在革命与战争中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斗争促使矛盾的主次方面发生变化。这一切都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毛泽东从认识论与方法论、辩证法与世界观相统一的高度，论证了全面地、客观地精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意义。这就是说必须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研究，而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片面性与表面性。要研究各种情形下的特殊矛盾，特别是要研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也就是要了解矛盾的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以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只有这种精细的研究，才能了解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研究“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它在政治上的要求是要了解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与地主，从而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的要求是“知己知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总之，两论以阐述认识与实践、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基本内容，以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为主题，从哲学上总结了革命的经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使毛泽东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并在以后得到了运用与发展。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的继承与转换

殷海光先生在考察中国近代文化变迁时曾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与另外一个文化接触时，它不可能站在文化基线的零点上。无论如何，它不可能不站在它与另一文化接触以前自己既有的文化积累上。这既有的文化累积，也就是它与另一文化接触时的文化基线。并认为这一文化基线，基本地决定着它对某一文化和它接触时所产生的反应结果。我们认为，这一反应结果从根本上取决于外来文化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但殷海光先生提出的“文化基线”概念也有其非常合理的一面。外来文化受到中国人的吸收或排斥，的确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整个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就是如此。毛泽东批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作两论，特别注重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矛盾问题，除了深深扎根于深厚的革命实践的土壤之外，的确与他原来固有的传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32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313页。

统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哲学中，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传统，一是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二是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就知行关系而言，早在《尚书》中即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先秦孔墨诸家也都各自阐发过自己的知行观。迨至宋明以来，知行关系得到更为充分深入的探讨，涉及了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朱熹主知先后说，以为论先后，知为先，但论轻重，则行为重；王阳明则辟知行先后之论，以“心即是理”倡“知行合一”：“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这是宋明理学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其共同特点都是内省致知，即使倡导格物求理的朱熹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崛起，他们力辟言心言性之空谈。王船山对宋明理学作了一番根本改造，他批判朱熹“先知以废行”、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错误，认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主张“先后知”，“知行相资”，“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特别是颜元紧紧抓庄“格物致知”这一命题，企图赋予新解，训“格物”之“格”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之义”。因此他认为“致知”并不在于读书、讲问、思辨，而在于“亲手下一番”，例如“如此菘蔬，虽上智老圃，不知为可食之物也，虽从形色料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著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可见，颜元特别强调“习行”、“亲知”与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格物”（变革事物）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迨至近代，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继续知行关系的讨论，但在这一点上，都未超过颜元的“习行”哲学。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即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那时杨先生特别推崇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人的学说。在知行关系上，对这些人的思想取折衷态度，主张知行并重。向学生说：“（吾）生平得力有二，一在力行，一在深思”，“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而力行尤要”。而在知行先后问题上，杨昌济则归本于朱熹：“心中先发一种思想，然后实现之于行动”，认为“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力，则危险愈大”。他也提出过“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但细析起来，仍是知先行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在那时即已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有所了解，而且其观点与老师一致，信奉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认为知为信之先，信为行之先，“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这是他那时提倡研究哲学以立志、醉心于“大本大源”探讨的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杨昌济也极力提倡颜元的“习行”哲学，认为“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特别强调“求证于今”、“求证于事物”。

---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尚书引义·说命中》。

《习斋余记》卷六。

《四书正误》卷一。

《杨昌济文集》第24、365页。

《杨昌济文集》第67、365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8页。

《达化斋日记》第51页、90页。

曾就学于杨门的舒新城回忆说：杨先生“极重实践”，认为自己后来取得的成就是他注重实践的“潜移默化之功”。毛泽东乃杨门高足，杨昌济提倡的实践、关怀国事民瘼、注重国情研究，在那时就已为毛泽东所特别注意，并身体力行，以后便逐渐成为他卓尔不群的思想风格。

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也历史悠久。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易经》即已用阴阳八卦形式推测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后来的《易传》提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些命题以比较抽象的形式揭示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产生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连轻视中国哲学传统的黑格尔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维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老子》一书则进一步深化了对矛盾同一性的认识，提出了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相反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诸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等。至于《孙子兵法》一书更是以辩证的运思方式把握复杂的军事活动，对战争中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这种辩证思维传统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阴阳矛盾对立项固定化，使形而上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但辩证法思想从未中断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到了近代，主“变”思潮兴起，古老的辩证思想又成为论证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

这种辩证思维的悠久传统与近代的主“变”哲学，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从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动”、“变”、“斗”几乎是他无条件地推崇的几个概念；史书中描画的战乱画面令他喜读，“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的辩证思维对他的熏陶，他在批注中列举了诸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等对立概念，并认为“无差别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

上述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在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前，在写作两论之前，已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素养。这里的问题是，两论与传统的知行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两论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哲学，但这种批判继承的含义与途径又是什么？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用林毓生所介绍的博兰霓知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博兰霓区分人的意识为明显的“集中意识”和无法表面明说的、在与具体事例接触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人的创造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思想中的意图与关怀用博兰霓（Michael Polanyi）的话来说是‘集中意识’（focai awareness），我们意识中有一个集中点”；另外，“在我们思想的时候，往往受了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响，用博兰霓的名词来讲，是受了‘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的影响很大。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虽然他在想他的意识中要的东西；实际上，后面的根据是

---

舒新城：《我和教育》。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6页。

他过去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经过潜移默化所得到的东西。”两论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可以说类似于这种“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虽然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提出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要使它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虽然毛泽东的《实践论》后来加了一个副标题“论知与行的关系”，《对立统一法则》后来改为《矛盾论》，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换言之，明确地提出并着手批判继承传统遗产至迟也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以后的事。两论的主题或“集中意识”并不在这里，如前所述，两论的主旨是从哲学上透彻地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但这并不否定两论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恰恰相反，两论的形成，传统哲学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援意识”的作用，这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其一，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而在毛泽东政治军事活动及其思想形成过程中，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他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支援意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之后，并没有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没有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接受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与俄式革命道路。但由于中国国情的极其特殊，仅靠这些理论是不能具体地找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的。正如他后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所回忆的，他后来进了共产党，只知道是搞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了。如何革，更不懂。可以说，他这时的“集中意识”是寻找如何革命的现实道路的具体答案。他也回忆到以前信过孔夫子，受过十几年的教育，对于革命用不着。这些封建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不能用于革命的，但阶级斗争理论要具体应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是不容易的，尤其不能生搬硬套。在处理这些现实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哲学中那种注重“实践”、“实习”的思想对他潜移默化而形成的“支援意识”的重大作用。他在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只得着手“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了；对于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才搞清楚”。正是在这种注重实践、注重现实的基础上，毛泽东找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但随之而来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书本里能够找到的。在这里，传统兵家的辩证思想又成为毛泽东处理现实军事活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辩证法思想最深刻地体现在兵家思想中。李泽厚曾很有见地地指出，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的特定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的神秘的阴阳观念多样化、世俗化了，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体“谁吃掉谁”的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具有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活动而冷静理知的根本特征，这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毛泽东青年时

---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5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82~83页。

代，诸子百家，无所不窥，谙熟《孙子兵法》，史书中的战史战例，小说中的战争场面，深受兵家传统的熏陶。这对于他后来从事军事斗争，是一种丰厚的思想资源或“支援意识”，它在实际中的运用或许是不可明言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但的确是毛泽东对付现实环境的重要思想依据。1965年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他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汪澍白先生对此评论说：“我领会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打仗毋需研读兵法，而是说，只有平时学的功夫深，达到了‘得意忘言’的境界，到作战时，对敌我形势又‘了如指掌’，才能运用自如，不着一丝刀斧痕。”这可说是点到关键上了，所谓“得意忘言”的境界，类似于那不可明言或并不自觉的“支援意识”；所谓“不着一丝刀斧痕”，正表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与传统兵家辩证思维的暗合无隔，但到总结经验，写作军事著作时，古书又都被一一请了出来。至于毛泽东与传统兵家智慧的具体关系，前章多所论列，此处毋需赘述。总之，传统知行学说与辩证法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正是通过毛泽东具体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思想而被吸纳到两论之中的。这是在探讨两论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时应当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二，传统哲学也是毛泽东写作两论时的重要思想资源。从整体上看，两论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实践性格，诸如强调认识要指导实践，以实践为目的，要求注意抓关键，在现实时空中通过主观努力转化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对矛盾特殊性的精细分析等等，的确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的根本观点。但毛泽东之所以注重了这一点，之所以在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具体实现了这一点，之所以在他的政治军事思想中体现了这一点，确乎与传统哲学中轻抽象的概念思辨、重现实实用的所谓“实用理性”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从两论的一些具体论述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实践论》在批判教条主义者、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与感性经验时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与颜习斋强调必“亲手下一番”、“箸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两者不但命意相同，而且措辞也相仿佛；30年代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并没有区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只说明了认识来源于经验。《实践论》独特地提出“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强调“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这样对知识来源的理解，可以溯源于墨子，墨子肯定知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且特别重视“亲知”。为通俗地解释这种认识来源的观点，《实践论》原稿中说：“中国商人有一句话：‘要赚畜牲钱，要跟畜牲眠’，这句话对于商人赚钱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在说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实践论》解释说，《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这也说明传统兵家智慧对于毛泽东理解

---

汪澍白：《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载《求索》1982年第6期。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认识深化过程的意义。至于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尤其是兵家的辩证运思方式，对于毛泽东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则显得更为突出。如《矛盾论》在说矛盾的普遍性时，也未忘记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等矛盾现象；在说明研究矛盾特殊性、尤其是了解矛盾各方面情形的意义时，毛泽东引《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加以阐明，并说：“《水讲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矛盾论》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一“辩证法的精髓”在原稿中的理解和论述，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因矛盾之各个特殊，大宇长宙，无一同者，变化无穷，其存也暂，所以是相对的。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照现在的意思来说，可以说他说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说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这一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他，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矛盾这个道。”所有这些，并不仅仅是一个表达形式的通俗化、民族化和中国特色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理解的思想基础、知识背景与内容吸收的问题。

“支援意识”在理论与知识的创造性过程中，乃至对现实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愈是丰厚，就愈具有创造性。两论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由此可以得到说明。但是，“支援意识”毕竟不是“集中意识”，它并不等于创造性的结果。传统哲学在两论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两方面的矫正，一是现实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二是外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两方面的影响，两论不仅继承而且转化了传统哲学，这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把传统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知行观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与认识论。传统哲学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虽然也涉及到了一些认识论问题，但主要局限在伦理道德与修身养性的范围。“知”主要是对道德规范的认识，“行”主要是道德规范的践履。孔子强调“智”，即是要求道德的自觉；倡导“行”，也是“行之以志”、“行义以达其道”。后来宋明理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便是沿着这一轨道进行。正是因为局限于伦理道德来讨论知行观，所以就发生先后、难易、轻重的争论。到了近代，孙中山把科学实验与政治行为列入“行”的范围，应该说是“行”的概念的一个突破，但他也仍然没有从社会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界定；在知行关系上他主张的仍是“知难行易”、“知行分任”说。《实践论》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些界限。毛泽东一方面置身于严酷的现实的阶级斗争与政治军事活动之中，使他能够从中抽象和总结出科学的实践概念；另一方面，他主要是接受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观点，从而对“行”、对实践概念作了科学规定，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实践与认识问题，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作为实践概念的基本内容。同时，他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失败的反复经验，批判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辩证地论述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应该说，这不仅是对传统知行理论的一个根本转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论语·颜渊》。

《论语·季氏》。

换，而且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贡献。

其二，脱去古代辩证法的朴素衣装，把它提扬到现代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矛盾论》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社会就产生了。但是古代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朴素性质，特别表现在它的具体经验性。古代思想家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但他们在思考、描述时始终保持着矛盾对立项的具体性，而未上升到抽象的形式。《易经》用吉凶、乾坤、泰否、谦豫、损益等等表示矛盾的对立统一；《易传》企图从天地、男女、君臣等概括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仍是直观的思维形式；《孙子兵法》中所列举的诸多对立项更是如此；《老子》这样高度抽象的哲学，尽管把矛盾的普遍性提扬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也仍然保留着具体经验的特征。中国辩证法的这一直观朴素的性质一直到近代谭嗣同的《仁学》中仍余韵犹存。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与军事著作中所娴熟运用的也是传统兵家的那种具体经验性的辩证思维方式。《矛盾论》尽管充满着大量的政治军事与现实生活的例子，但毕竟把这一切提升到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的高度进行阐述，脱去了传统辩证法的直观朴素的经验性质。这一转换应该说得力于毛泽东对现代唯物辩证法的钻研。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脱胎于黑格尔的纯粹抽象形式的逻辑概念辩证法，保留了它的抽象形式，又赋予它以现实的内容。《矛盾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些特点，而不同于古代朴素辩证法。

其三，从现实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批判了古代哲学中传统观念。两论的根基在于现实的政治军事实践，只有这才是毛泽东的“集中意识”。无论是古代哲学遗产，抑或是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只有在其内容符合现实需要时才被吸纳到两论之中，与现实需要无关甚至相反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忽视或批判。就两论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而言，这点显得很突出。《实践论》可以说是对“知先行后”说的根本否定，而且在行文中也明确批判“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见解。《矛盾论》也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很多研究者认为《矛盾论》最富有中国特色。但如果深入地考察，毛泽东除了真正继承传统兵家辩证法之外，他的《矛盾论》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世界与许多传统辩证观念是完全相左的。传统的阴阳二元对立的矛盾观念，把“天道”、“地道”、“人道”统一起来，强调对立中的和谐，变易中的不易，在现实中的要求是建立一整套社会规范与秩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与儒家不同的老子学说，虽然从“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现实中看到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矛盾转化现象，但它仍然非常执着地肯定矛盾的一方，如“守雌”，“贵柔”等等，以防矛盾的激化与转化。因此，传统的矛盾观念，特别是在儒家那里，它的实质是要求矛盾双方的和谐、互补、不变和统一。《矛盾论》的现实基础与此完全不同，它是政治军事上的激烈斗争的世界，是矛盾双方相互斗争着的，是一方侵犯、吃掉另一方的世界。因此《矛盾论》强调矛盾双方的转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易·系辞上》。

化，矛盾斗争的绝对性，这就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相去甚远了。

总起来看，两论既继承又从根本上转化了传统哲学。而这一切，包括两论与 30 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都是以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为基础的。两论是以现实实践为深厚土壤，以传统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来源而形成的哲学篇章。而从根本上来说，两论以哲学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

## 第十二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

如果说两论是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论证，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既反映了这一结合的历程，也是这一结合的具体产物。这一理论是与毛泽东分不开的。自从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公认为党的领袖后，毛泽东便愈来愈从整体上考虑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了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集中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连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主要著作。这些煌煌大论体现了毛泽东这时理论上的恢宏气势和深刻的历史使命感，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模式，设计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獨特道路和发展前途，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长期探索的革命理论臻于成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

### 第一节 旧问题与新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既以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又吸收了关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是抗战中新争论的理论总结。总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中老问题与新问题的全面系统的解答。

#### 一 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

中国共党从成立那天起，即庄严宣告把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十月革命在中国传播获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怎样达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方法？当前的革命任务是什么？来不及解决。正如李达在回忆中所说：“‘一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路是肯定的，但是革命以后怎么办，就不知道了。”

时隔一年，中共“二大”接受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国家革命战略的理论，明确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认识到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尔后党的“三大”、“四大”着重探讨了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问题，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建立领导权与工农联盟的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与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认识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形成的，很难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自觉结合的成果，因而每次党的大会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局限。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许多革命的基本问题，诸如

中国革命性质和发展前途、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等等，这些缺乏现成答案的问题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五卅”运动以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人已开始自觉地总结革命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初步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设想，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的宝贵成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但是，这些论述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个别成员各自探索而提出的，是零碎、分散的，彼此间的认识又不完全一致，而且在他们提出的思想中还有不确切不完备的地方。因此，它们还远未达到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系统而具体的把握，更没能形成党的集中的指导理论，这是与党的幼年状况相适应的。

中国 20 世纪初以来，大凡谈论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中国落后于世界历史的前进步伐而处于挨打的耻辱地位。他们因此无不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历史进化的强大动力和压力，无不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必须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步伐。但是，怎样才能赶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呢？自从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蓬勃崛起之后，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面临选择的道路更加趋于复杂化了。这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懂得：人类历史的演进是“由射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惟入工商之期而后有社会主义”，中国却仍然处于“耕稼”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按部就班，由耕稼而工商，再入社会主义；或者急起直追，举资本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由耕稼而工商同时实行社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即滥觞于此。这，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进行革命的思想背景。这种思想氛围不能不影响到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缺乏深刻把握的幼年中国共产党。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如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根本问题。党的“二大”宣言的伟大意义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认为无产阶级是处于“援助”或“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这种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而资产阶级则“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在此之后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进行第二步奋斗。这反映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党内一些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宣言也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强固，紧接着民主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可以“即刻成功”，反映了党内某些人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的思想痕迹。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尤其是二次革命论于此已露端倪。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际斗争中，二次革命论逐渐成为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更进一步右倾化，在党的“三大”上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因此大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在以后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思想虽有反复和变化，但其基调正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虽然也幼稚，但其“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革命的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 141 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 年 6 月。

前途“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自然会放弃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利益而迁就国民党。随着大革命的深入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倾向愈来愈明显，国共两党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当时研究系的机关报《时事新报》发表时论，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是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是苏俄将帮助中国的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陈独秀对此发表文章说：“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又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于此可以说表述得相当完备，并且可以在马恩的著作中找到理论根据，但完全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无视国民党新军阀的屠刀正在砍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自觉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百般迁就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遂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诚如蔡和森当时所说：“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于与资产阶级联盟……认革命胜利一定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根本没有革命转变的观念，以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之后，又发现‘一次革命论’：以为从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就是‘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一次革命论是对二次革命论的否定，是伴随着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清算而来的“左”倾机会主义，它同样是没有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在大革命后期，瞿秋白针对陈独秀的右倾观点撰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一书就已有“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观点。党的“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故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八七”会议改变了党一贯忽视武装斗争的观念，是为一大转变，但一次革命论的“左”倾思想继续发展。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斗争方针，但同时也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观念，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和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实践中导致“左”倾盲动主义。“六大”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形势，规定了党的任务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而斗争？》，《向导》第172期。

《蔡和森文集》下，第200页。

《蔡和森文集》下，第200页。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

和政策，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在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六大”在这样规定的同时，却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革命的对象，而且认为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强调“城市中心”论。这样，六大的决议在肯定中国革命在现阶段是民主革命性质的大前提下，实际上暗含了一次革命论的观点；虽然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因此，“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立三路线明显地又回到了一次革命论上，它也承认现阶段是民主革命，但认为资产阶级正是革命的对象，因此“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错误”。紧接而来的王明路线，更是把这种极左路线推上了顶点。

总起来说，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党也取得了许多正确的经验，但革命失败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在理论根源上，它们都没有把握中国国情，没有正确地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右倾错误以二次革命论为理论基础，“左”倾错误虽然肯定了现阶段的革命性质，而其实质却是一次革命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老问题。

## 二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规模甚大、时间较长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带有学术性质，但主要是场政治论争。从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所要解决的正是在大革命时期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性质问题。诚如当时参加了这场论战的蔡和森所说：“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的前面，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所以这问题是旧的；同时在最近三年伟大的革命时期中，革命进展的速度有如此之快，使革命动力和革命阶段起了上述之巨大的变动（按：指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所以在这样历史的事变之后提出这一问题，人们自然要感觉是新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可见对社会性质或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明确革命性质、任务、动力以及策略的关键问题，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情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为当时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继续进行革命，并深入农村，开始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从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当时的共产国际发生了托洛茨基、拉狄克与斯大林、布哈林之间的争论。中共“六大”确定的革命性质反映了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观点，对中国革命的继续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场争论很快蔓延到中国共产党内，并波及到学术界。论争主要是由托陈派为反对

---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1930年6月。

《蔡和森文集》下，第194页。

“六大”决议而引起的。卷入这场争论的，除了托派（陈独秀、严灵峰、任曙等）外，还有以陶圣希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基地），这两派虽然论据有异，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则基本相同。中共主力是王学文、吴黎平、杜鲁人（何干之）、潘东周、方亦如、刘梦云（张闻天）等人，以《新思潮》、《读书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为基地，对他们进行了批判。

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涉及许多方面，但其主题与焦点是，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托派完全继承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蒋介石取得政权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因此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更不用说，即使在农村，也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无视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封建性质和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从这种观点出发，托派否认现阶段的革命是民主革命，而是“打破私有财产制”，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等人由此鼓吹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斗争方针，实际上是取消革命。另一些托派分子则主张“追随于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战线之上”。这正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它就变成要么是合法斗争的取消主义，要么是一次革命论。

对托派的观点，中共论方进行了批驳。他们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肯定了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农民因‘经济以外的压制’，强迫地须把全部剩余产品甚至超过这数量以上的部分，交纳于地主，并受许多附加的剥削。”“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剩余劳动。凡维护此种剥削方法的制度便是封建制度。”由此引出的结论与托派完全相反：“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

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托派认为，一方面，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的发展“使许多后进国也踏进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去”，“工业发展的根本的诸条件都已经确立”；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封建势力只是起了消极的抵抗作用，而日趋于衰落。”由此托派认为，中国无封建可反，无产阶级要反对

-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8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391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91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455 页。43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188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243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121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257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373 页。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403 页。

国内外一切资产阶级，既反帝又反资；无论中外资本主义，洋土资产阶级……应加以同一的对待，无所用其区别”。中共论方与此相反，一方面认为，中国的民族工业，不仅由帝国主义引起，而且受帝国主义所支配，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支配下，“中国民族资本决没有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过买办，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同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拥护他们的统治，共同宰割中国的民众”。因此，中国革命一方面要区别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既反帝又反封。

这场论战后来还延伸到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都是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联系着的。仅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这场论战的真正成果就是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弄清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而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对象与任务，同时也就为当时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科学的论据。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进程中，中共中央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实际上都是企图“跳过”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即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尤其把民族资产阶级或“中间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急转直下直达社会主义。这与托派在论战中的某些主张似乎并无二致。这种阴错阳差的状况表明，一次革命论并没有在这场论战中得到纠正，中共中央的领导并没有真正吸收这论战的成果，来认真地制定自己的策略方针，结果在实践中招致革命的重大损失。它从反面说明这场论战成果的重要性，说明托派主张的错误与中共论方观点的正确。

真正吸收这场论战成果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30 年代后期，中共论方的主力成员许多到达延安，时值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同年毛泽东倡导组成延安“新哲学会”，不仅研究哲学，而且研究包括历史、经济等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论战中的许多成员参加了“新哲学会”，其中的一些人就参与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的写作，无论是从实际情况而是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科学依据。

### 三 抗战中的新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事实表明，它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同时也是对抗日战争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系统解决。一方面，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而言，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与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其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哲学思想都臻于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提供了基础。同时，抗日根据地及其民主政权形式的建立与实践，实际上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提供了蓝本；另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614 页。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855 页。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 559 页。

一方面，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的《论联合政府》的写作而言，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回答抗日阵营中新的争论。

这场争论与前述的两次争论不同，它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自从日寇深入国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统一战线以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与第一次不同，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合作的组织形式。因此两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蒋介石在内战时期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一是带有浓厚的反共反人民的色彩，成为其对日妥协的理论基础；二是具有对外依赖的性质，把中国看作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三是其构想的抗战体制，要求国民“整齐划一”，接受蒋介石解释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领导，“忠党爱国”，提倡一种“兵营国家”的法西斯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内攘外”论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国民党的抗战理论中，抗战开始即表现为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统一战线，企图使抗战纳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轨道，毛泽东深知蒋介石的企图和他所代表的这一政权的本质，因此在倡导统一战线时，根据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出合作抗日的政治纲领。并在抗日救亡的主题下，把革新内政、实行民主政治作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力主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路线，使反帝（抗日）与反封（民主）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得以完成，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了保证这一点，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权问题。而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只不过是“输诚”而已。因此，抗战伊始，国共两党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抗战初期，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促使国民党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本质并未改变，中共争取民主的斗争也越来越冲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蒋介石所反对。1938年底，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开始加强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政策也开始转向，变为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天下莫予毒”的专制独裁者。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强化”国民党的统治，以对付“华北各地共产党之竟起”，“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因此蒋介石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其特色是注重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作斗争。蒋在会议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以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事实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1939年3月，蒋介石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特设一个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国家至上民

---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族至上”的名义下，要求对蒋介石国民党“竭忠尽孝”，凡是违背蒋介石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1939年5月，蒋又作《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进行之程序》的讲演，借研究三民主义之名，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理论。他认为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皆有缺点，“偏而不全”，而三民主义则是“涵盖一切”的唯一正当的主义。但蒋介石完全阉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借孙早年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理论，强调“建国程序”的重点是“训政”，而“训政”不过是要用封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贯输给国民，以加强其封建法西斯的统治，维护封建性的专制独裁。

为了配合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如《三民主义月报》、《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前卫》等刊载了大量反共文章，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其中叶青等人鼓吹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进行反共宣传最为起劲。他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搞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先后抛出各种“关于三民主义的研究著作”。叶青完全歪曲和篡改孙中山的思想，尤其是不承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主义”或“原则”，说它是随时代和环境而变化的具体办法，从而否定了孙中山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并说“毛泽东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看作‘新三民主义’，就是不懂得这种区别”；与此同时，叶青又鼓吹“一次革命论”，认为“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革命了。这就是说，欧洲三个时期底历史任务，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完尽”。叶青的“一次革命论”与中共党内曾经出现过的“一次革命论”完全不同，其实质是借三民主义排斥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塞维克主义”，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用不着共产党那一套，共产党又怎样拿这点来作为存在的理由呢？共产主义“已包含于三民主义之中，用不着共产主义了”，为此，他公开说：“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吧”。这就是叶青三民主义和“一次革命论”的实质。而其目的，则是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张目，他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要求人们对蒋介石“绝对信任”、“绝对服从”。正如叶青的一个同伙所说：“法西斯主义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即主张集中主义。民权主义亦系如此。所以，在这一点上，民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相同的。”这可说是道出了蒋介石和叶青的“三民主义”的本质。

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理论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砍向民主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砍向共产主义者。民族资产阶级的个别右翼分子如张君勱之流，附和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要求毛泽东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的军队，统一于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既然现在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从事民族战

---

叶青：《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上编）第6页。

叶青：《三民主义底创造性》，《时代思潮》第1期。

叶青：《三民主义底创造性》，《时代思潮》第1期。

叶青《中国政治问题》，第24页。

《时代思潮》第24期。

叶青：《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下篇）第58页。

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应以国家至上为第一义，不要“沾沾于一党一派之利益而不肯抛弃”。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认识也很模糊。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当时党内就有一部分人有疑问，实行了三民主义，还要不要共产主义？国民党借三民主义排斥共产主义，进行反共宣传时，党内“左”的情绪又有所抬头，对党的路线与政策缺乏统一了解。

蒋介石国民党挑起的三民主义论争与反共宣传，是与其对日妥协互为表里的，“不反共则不能投降”，它“把全国人民又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这场争论实际上关系到抗战能否取得胜利，涉及到抗日的前途，涉及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这迫使中国共产党起而应战。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纲领》中指出：我党应实行“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政策，他还指出：“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叶青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批驳。”于是，从1939年6月到年底，共产党发表了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批驳了国民党投降派与顽固派的反动理论。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及其前途的理论高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根本见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既是这场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总结性论著，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尔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重弹独裁专制的老调，毛泽东又著文《论联合政府》加以批驳，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一般纲领具体化，为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指明了方向。

## 第二节 中国式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即是对这一历史阶段发展规律的描述。从宏观上来说，这一中国式的独特理论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

---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5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页。

社会理论。这节我们主要探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 一 革命的道路——两步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首要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揭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包括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这个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过程。毛泽东认为，区分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明确了革命的性质，才能明确革命的对象与任务。

区分两个革命，明确现阶段的民主革命性质，必须以对中国的现实国情研究为基础。“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毛泽东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对民主革命性质的认识亦是如此。虽然党的“二大”和“六大”都明确地肯定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性质，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在对国情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因此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就毛泽东个人而言，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了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深深体会到“中国现时确实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对那时“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进行了抵制，他因此被指斥为执行“富农路线”；“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主题异常明显，但“左”倾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最危险的敌人，直到瓦窑堡会议才扭转斗争方向，毛泽东在这期间又明确地肯定“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1937年5月延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比喻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作好，下篇才能做好”。以后毛泽东紧紧抓住抗日（反帝）与民主（反封建）这一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制定党的各种策略与路线。1939年底，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充分吸收了30年关于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从而在理论上具体把握了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为确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毛泽东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区分，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中各种错误理论的批判。党的历史上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斗争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究其实质，正是一次革命论。毛泽东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革命性的，与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资产阶级没有什么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68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78页、276页。

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则不能套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能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应与之建立统一战线。托派在革命对象与任务问题上与“左”倾错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毛泽东说，我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

叶青的“一次革命论”与上述错误完全不同，毛泽东称其为“恶意的宣传家”，是“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共产党，“‘一次革命论’，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除了叶青的反动理论外，当时还有一些人并无恶意，也迷惑于“一次革命论”，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还在走第一步，革命的任务与对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为党的各项方针和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避免重犯“左”倾路线的错误。

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割裂两个革命的关系，“两步走”不是“二次革命论”。毛泽东在谈到两个革命的联系时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断然否定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这种革命虽然一方面在客观上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它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为什么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呢？按照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任何民族和殖民地各种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由于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因而它就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6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6—64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5页。

义。”列宁的这一理论为斯大林所继承与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四大”接受了列宁的理论，强调了“中国革命已经属于‘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但这种认识，总的来说还没有与中国复杂的国情结合起来，因此在实践中的结果是“二次革命论”。毛泽东把列宁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与中国的国际国内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这期间，他还使用过人民民主主义等概念，其含义是一样的。毛泽东以1919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界，把中国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之后，则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从国际环境来说，它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从国内环境来说，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了，革命的主力是工农大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因此，这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这种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革命的性质上仍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领导阶级变了，革命的主力军变了，革命的前途也变了。毛泽东认为，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绝大的变化，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位的可怜虫。”从民主革命的这一历史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出发，毛泽东批判了党的历史上的“二次革命论”，尤其是批判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错误论调，国民党要建立一党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国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幻想重走欧美资产阶级的老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这种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第一，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所绞杀的，无数先烈为此抱恨终生：在日本帝国主义想独占中国的时候，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

---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5页。

可能，它是要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它的入侵是要断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二，社会主义阵营不容许。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完全的梦吃？”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不容许。在新式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大众，民主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想“一脚踢开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是绝然不行的。大革命失败证明，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脱离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建立的仍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离开工农群众，其结果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是断然不行的。

毛泽东关于“两步走”的理论，沉淀着中国革命历史的丰厚经验，反映了当时世界形势的格局，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溶进了他那代表人民大众利益、推动历史步伐的巨大意志力量。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终于使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之途。

## 二 革命的关键——领导权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与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区别开来。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并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衔接起来，关键是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思想。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提到极高的地位，认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历史经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远可追溯到近代中国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近可寻因于北伐战争。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革命都失败了。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崛起，孙中山改弦易辙，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面貌为之一新，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导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遂导致革命失败。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

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从这种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在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极为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着重指出 1927 年陈独秀所犯的历史错误不应当重复了。他认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突出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第 1 卷，

抗日战争的现实，也证明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首先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来看，就说明了这一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长期实行“安内攘外”的政策，把武装力量集中在消除异己、进行反共反人民的事业上。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倡导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顽固地执着于内战政策。只是在西安事变的特殊情况下，他才被迫答应停止内战，逐步转向抗日，而且其政策的转变很不彻底。因此，毛泽东说：“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与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其二，抗战中的民主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抗日与民主，就是反帝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抗日战争中的具体化。蒋介石政权在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党、一个领袖，在所谓实现“国家统一”的名义下，实施其封建式的独裁统治，不愿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毛泽东在抗战中则把民主问题提高到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高度，对蒋介石的反民主政策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评，认为抗日与民主是绝然不能分离的，并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与蒋介石提倡“国家的统一”相反，共产党提出“人民的统一”，最终的结局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终于在民主浪潮中被“席卷以去”。其三，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从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蒋介石的抗日，完全是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实施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依赖外援，惧怕人民起来，威胁其统治。蒋介石政权的本质是欧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政权，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进行抗日战争。蒋介石把中国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公共殖民地”，他明确说过中国抗日是为美国而战。当美国援助不力时，他又暗中谋求与日妥协谈判，但日本的停战条件太苛刻，蒋介石认为如果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段话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毛泽东在抗战伊始即预言了大资产阶级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强调只有充分发扬无

---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61～26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转引自林茂生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第 401 页。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因此，当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毛泽东还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特点论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过出色的分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各阶级的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也使他对这种认识深信不疑。毛泽东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买办资产阶级不但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反而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一起，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同，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又有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而表现出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大基本任务。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是革命的领导者，只有他们才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游民的破坏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还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论》原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叶青等人在思想战线上宣传假三民主义以排斥共产主义思想的反共倾向而写的，因此有相当大的篇幅讨论文化问题。毛泽东驳斥了“一个主义”的说法，论述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与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一致，毛泽东把文化革命也区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文化革命是民主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与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的斗争。“五四”以前，所谓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争，是旧式资产阶级文化斗争的表现，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斗争。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内容上仍是民主主义的，但这种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页。

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正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领导民主革命一样，在文化领域也不能实行领导，“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的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就彻底批判了叶青之流“一个主义”的叫嚣。

总之，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实行反共政策，而某些中间阶级的政治代表则幻想走欧美资产阶级的老路，中共党为曾出现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使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突出出来。毛泽东深入分析和论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通过各种具体政策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与整个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 三 革命的“三大法宝”

无产阶级如何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并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呢？毛泽东认为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毛泽东的这一结论，既是他自己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对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他的思想发展来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自如，军事思想达到炉火纯青的圆熟境界，两论的写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奠定了哲学基础，三大基本问题可以说是他这些思想的总结；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与党的历史积累了“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丰富的经验”，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根据党的历史经验与自己的深刻体会，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匠心独运地提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并精辟地分析了三者的丰富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是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既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与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革命的力量和因素就应该包括一切愿意参加这一革命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人们。无产阶级就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这些因素与力量仅仅是一定条件下的和暂时的同盟者，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右倾路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固然会使革命遭受失败，但“左”倾路线天天喊领导权，搞孤家寡人政策，实际上得不到领导权。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毛泽东精细地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精心地掂量着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细密地制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与阶层中，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革命的潜在伟力。也许是他在中国历史与小说中看到了历代王朝更替中农民的力量，也许是他出身于农民而深知农民的处境和深切渴望，也许是他与农民的天然的情感联系，使得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倡农民运动的人，但却是最为重视农民并与农民浑成一体从事革命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土地革命战争完全是一场新式的农民战争，那时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轻视农民的做法进行抵制，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军队的来源，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服务对象。“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所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把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以此为基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成强大的民主革命阵营。

统一战线中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毛泽东一直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二重性，这决定了它政治上的动摇性，决定了它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尔后又附和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又转变政治态度。无产阶级必须根据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变化，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之。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开始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明显，但后来证明这个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因此毛泽东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加写了一段，认为这个阶级“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买办资产阶级按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对象，但由于它们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因此，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时，在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时，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这一斗争，这时无产阶级应利用这种矛盾，与之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但这种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本质并未改变，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不仅争权夺利，采取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且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有可能叛变革命。这里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又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另一主要法宝。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不太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但对斯大林所说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的优点之一”这段话却非常欣赏，多次引用。不过，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理解，毛泽东却是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的。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口号，并开始了实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非常突出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俄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必须一开始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毛泽东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看出枪杆子的重要性。蒋介石是“有军则有权”，“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没有军权的其他政党，都闹不出什么名堂来。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实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要在统一战线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是断乎不可能的。所以，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在与国民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之后，毛泽东极力强调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号召共产党员不要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人民的兵权，民族的兵权。当张君勱、叶青之流遵照蒋介石的意图，鼓吹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时，毛泽东严加驳斥，并谆谆告诫全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是如同俄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观点，认为在力量异常强大的敌人面前，革命战争是长期和残酷的，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革命队伍不能在力量不够时与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这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积蓄力量，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这一道路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并且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半殖民地条件下，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城市不能统制乡村；大国条件下，有充分回旋的余地；再加上先进政党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的援助，乡村是能够战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页。

胜城市的。毛泽东认为，在民族抗战的形势下，这条道路比内战时期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总结革命的经验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在论述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时，总是把它们提高到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认为党的建设，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看能否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就成了革命的另一法宝，从而有延安整风运动。

### 第三节 独特的社会模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式，即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解决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相比，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一 源出而又超出三民主义

这里的三民主义指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有时就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甚至干脆说，这种新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或社会理论，是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一脉相承的。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他审定的著名宣言。这个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以此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是国民党“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在他的脑海中有着深刻的印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评价有了转变。1927年10月《布尔塞维克》的发刊词还把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精神”与“反动思想”两方面。随后，在党内“左”倾路线指导下，对三民主义的评价转向全面否定。当时有的中央刊物说三民主义已成为“垃圾桶”，“杀民主义”等等，并且把蒋介石说成是“孙文主义的嫡传”。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一次革命论”影响所致，未能区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从而也就不能把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纲领。在这种“左”倾路线统治下，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国现时“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1929年，毛泽东撰写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用通俗的顺口溜阐明红军的宗旨，究其内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容，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若合符节。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模式，尔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中，又把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并号召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在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三民主义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其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的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但是，蒋介石与毛泽东所理解的三民主义完全不同，他实际上否定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假借三民主义旗号，实施封建法西斯式的专制统治，进行反共活动，挑起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驳斥了“一个主义”的说法，阐明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区分了真假三民主义与新旧三民主义，认为只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愿意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在用“政治力”侵略中国的同时，用“经济力”对中国进行残酷掠夺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狼狈为奸的关系。从而改变了原来以“反满”为核心，未能独立提出反帝任务的局限，坚决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纲领；在民权主义问题上，认为“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主张建立一个既与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所专有”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相同，又与俄国新发生的“工人独裁政治”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相同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而所谓“平民”，“实为多数人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可见，孙中山所设计的实际上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在民生主义问题上，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不容许私人垄断资本的形成，主张大资本国有。但不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而是保护和私人资本主义，同时又“限制”或“节制资本”，“以免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在土地问题上，则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状况，反映和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因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项纲领时，处处沿引孙中山的言论，足以证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源出于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曾明确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71页。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8页。

的新三民主主义共和国。”

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他始终未能了解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虽然提出了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对工农群众的力量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孙中山民权共和国的主张的要害就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观念，没有确定各个阶级在这个共和国中的地位，从未正式回答过谁领导谁的问题，这在现实中就很难实现。这一点由毛泽东解决了：民权主义的共和国，“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孙中山的经济纲领中，正确地提出了“节制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但在他所追求的共和国中，缺乏明确的领导阶级，这些方针就缺乏实现的可能；他的土地纲领也不彻底，他虽然斥责了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但他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置于农村大变动的革命中，相反却沿袭了过去的带有改良主义的方案，过分低估了农民的力量，害怕如果地主与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没有找到实现土地纲领的真正道路。所以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孙中山始终未能接受唯物史观，认为不论在民主革命中或民主革命胜利后，都应当大力宣传和力争实现他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并且要以“民生史观”作为指导思想，“不可再说物质问题是历史的中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就使他不能不把以阶级斗争为其内涵的许多社会现象诸如平民、国家，政治等概念，抽去阶级内容而变为空泛的概念；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看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从而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所以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

毛泽东指出：“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又克服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他那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 二 特殊的社会模式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1、3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1页。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挑起的反共高潮，使人们发生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困扰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里的要害是两个革命的衔接，民主革命之后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两者都不是，那么，民主革命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内有人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将引导中国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但非资本主义前途是一个很不明确的概念，人们不知道，抗战的胜利是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呢，还是要经过其他阶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如同孙中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条件下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是独特的一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所设计的社会模式也是独特的。

毛泽东充满着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他总是追溯中国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将通过抗日战争，将通过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终结，其结果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或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描述了这个社会制度的蓝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大纲领。

在政治上，既然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因而它所建立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工人与农民单独承担民主革命任务，因而那时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扩大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因而“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主革命的分子”。这种政治制度是独特的，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几个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世界上现存的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不外乎三种：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第一种是旧式民主革命的结果；第二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第三种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如中国所进行的新式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毛泽东吸取了孙中山“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主义政纲，但明确了这种政权的阶级属性，以及谁领导谁的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至于“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权能分开，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毛泽东则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这种制度即民主集中制”，这种国体与政体的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在经济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也是独特的，它既不是完全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更不容许是旧的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

计’”。毛泽东完全吸收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纲领，并把它彻底化和付诸实施。他非常赞赏“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口号。就“节制资本”来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本国人或外国人独占的规模过大而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类，由国家经营管理，免使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生计。但既然是“节制资本”，因而“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就“平均地权”来说，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合作经济。但农村中的富农经济，还是容许其存在。换言之，“平均地权”“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从上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包含有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经济三种经济成分，而国营经济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这种经济结构的设计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纲领是一致的。不过，孙中山在政权结构上没有明确谁领导谁的问题，因而在经济纲领的阶级属性上也是含糊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国营经济，明确地指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因而他认为这种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在文化与思想意识形态上，毛泽东也提出了独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是指形式，科学是指内容，大众是指服务的对象，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相适应，这种文化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与封建复古的旧思想；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相适应，文化上也是各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因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其中的盟员；与政治上无产阶级的领导相适应，文化上的指导思想也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思想。但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因而就整个文化来说，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这被毛泽东称之为“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观察研究问题等等的方法与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混淆起来。毛泽东认为，整个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值得指出的是，与政治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不同，文化上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与封建复古的专制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强调批判地吸收外国的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67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5页。

古代文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反对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另一方面，借鉴外国文化是吸取精华，反对“全盘西化”、生吞活剥与形式主义，即使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与这种态度相一致，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也要清理与吸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无疑是对蒋介石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而发的，但上述这一切都明显反映出毛泽东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态度。

毛泽东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把这些纲领具体化，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具体地解决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问题。

### 三 历史尺度与社会主义前途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所构想的社会模式，其独特性还表现在它是一个中间性的或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则是社会主义。毛泽东论证了建立这样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制度的必然性。在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体现出他的历史主义态度。

如前所述，毛泽东断然否定了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论证了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中国不能成立的必然性，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为什么其结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前面我们谈到“两步走”的理论只是区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中，我们看不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它不能回答民主革命的结果为什么不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因为从理论上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且我们勿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上的体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所以这种“不可移易”的必然性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上。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它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容许私有制的存在。毛泽东在这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纯策略问题，而的确是社会历史的进程。早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就批评“左”倾路线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5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现在还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一方面要“节制资本”，其要旨是阻止出现操纵国民生计的大资本家的出现，就当时的实践意义而言，主要是要没收官僚大资本家的财产；另一方面并不没收其他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并不阻止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理由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提出，正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毛泽东曾满怀激情地指出，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要实现这个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中就悬着这个崇高目标。但是，中国的现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现实目标是要摆脱这一悲惨命运，要建立一个“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毛泽东一谈到这点，就变得非常现实和冷静。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忽视为这个现实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完全只是空想”。毛泽东指出，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拐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而叶青之流，则要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前者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者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而共产党人则认为，除了新民主主义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才能有益于社会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头脑的”。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出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针对这些人的误解，毛泽东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拿资本主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16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106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这一观点，明显地符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态度。马克思曾经批判过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在落后的德国进行资本主义的革命，他们学着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样子在德国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很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阶级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什么。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毛泽东与马克思所处的背景和论述的角度不同，但其所取的历史尺度则是一样的。正是从这一尺度出发，毛泽东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

当然，毛泽东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时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结果并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无论是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政治上无产阶级的领导，经济上国有经济的发展，文化上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都被毛泽东看作是这个社会中的重要因素，即使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也是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因此，这是一个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既有社会主义因素亦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独特的社会模式，是一个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中介性和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至于这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在这时期所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一方面强调不到政治经济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要轻易谈转变到社会主义，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时期的社会形态，“不但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视上层建筑中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主导因素，突出经济领域中国有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占主导地位，他认为这就使得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必然的趋势。毛泽东的分析中透露出这个过渡社会形态的短暂性，以及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变革中的突出意义。这些大概是导致后来党内某些分歧的最初根源。但无论如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的理论创造，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1页。

## 第十三章 实事求是的阐发

毛泽东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成功地制定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策略，并为他的军事著作、两论以及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画上句号之后，他的成就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共党内当之无愧、无与抗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了。其权威性并不在于毛泽东熟悉了多少马列主义的“本本”，而在他的理论符合并成功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从他的思想与中国革命失败与成功的反复经验中，抽出这样一个原则，即马列主义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凝结成这样一个思想：实现这一结合的关键是“实事求是”。

### 第一节 旧瓶新酒

“实事求是”是一古老词语，原本就是一种学风。迨至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对之作了解释，并赋予新的涵义，使之代表了一种新的学风与新的思想路线。

#### 一 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

如所周知，“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最早出于班固《汉书》，班固为刘德作传，称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求是”。可见，“实事求是”原意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后来真正继承并发挥这一精神的乃是乾嘉之际的考据学或专门汉学。皮锡瑞说，“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

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其治学方法几乎是唯汉是尊，唯古是信；皖派以戴震为首，继承与发展吴派的考据学，其治学方法如钱大昕所说：“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是一种脱离现实实践的态度：“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有见于实、无见于行”、“有见于阙，无见于信”。可见，考据学的所谓“实事求是”，实际上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书本，使之埋头故纸，烦琐考证，皓首穷经，不务现实，实在与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学风大相径庭。

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另有渊源，这就是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

经世致用本是儒学的传统观念，自孟子而后，特别是到宋明之际，这一观念在精巧的心性分析与修养的“内圣”功夫面前，事实上被淡化。迨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反思清谈误国的教训，儒学的经世思想便发展为一种实学思潮。当乾嘉汉学使顾炎武等人的实证思想折入考证一途时，这一思潮在由王夫之奠基的湖湘文化中却辗转流播，浸润灌溉，培养出湖湘学人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如人所指出的，清嘉道间崛起的经世派，“其发展

---

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418页。

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系和淮系的一批人物”。

王船山生当鼎革时代，明社颠覆，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他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从“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经世务实观念出发，注经、衍子、评史、论政，写出数百卷博大宏富的学术著作。清道光年间新化人邓显鹤汇刻《船山遗书》，船山思想始流播湖湘，形成湖湘士子突出的经世致用的务实之风。杨笃生著《新湖南》，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典型的如魏源，他批评考据学家束发就学，皓首穷经，专务记取，屏斥躬行，“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同时他也指斥理学末流“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下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从经世致用观念出发，魏源编纂和撰写了《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海国图志》等经世实学著作。特别是《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编辑原则是“书各有归旨，而道存乎实用”，一切取舍以实用、经世为鹄的。此书一出，学者景从，“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正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使得魏源在外强浮海入侵，天朝帝国危机四伏，士大夫抱残守缺之时，能够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近代史影响至深的著名口号。

把魏源这一口号首次付诸实践的洋务派曾国藩，其经世务实的精神也极为突出。曾氏在南京曾广泛搜集船山著作，重刊《船山遗书》，在序中称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万物之仁、经邦之礼”，揭示出船山著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他还认真研读过魏源的《圣武记》与《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本崇奉程朱理学，一生讲求心性修养，但他不是空谈性理的腐儒。在王船山、魏源影响下，“详览前史，讲求经世之学”，故当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道仅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时，他认为学有四科，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皆是。虽然义理与经济在他那里乃是体用关系，但他标举经世实学的态度是至为明显的，而考据之学为他所不取。他曾对满清士大夫的脱离实际，不能学以致用空疏学风进行了尖锐批评，称之为“识字之牧猪奴”。他倡导一个“实”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禁大言以务实”。当时宋学与汉学互争雄长，曾国藩从经世实学观念出发，力图调和二家之结。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

---

《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第203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17页。

《魏源集》第539页。

《魏源集》第36页。

俞樾：《皇朝经世文编增编序》。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页。

《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9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0页。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如果考虑到曾国藩的务实态度，他在这里把“实事求是”训为“即物穷理”，一方面似有批判考据学钩研诂训、脱离现实的烦琐学风之意，另一方面则借“实事求是”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由此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总之，曾国藩虽然以理学名家，但其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也非常突出。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把“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作为“救时第一要务”；能够创建湘军，以儒生领兵，征战杀伐，被称之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其倡导的务实学风挟其赫赫功名对湖湘士子发生了深远影响。

很多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广泛接触了实学思潮的影响，饱受湖湘学风的熏陶，但对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杨昌济了。杨昌济与曾国藩一样，服膺程朱理学，以至被人称为“湘中理学大儒”，但他的整个言行与著作，其主旨仍在经世致用之实学。他曾钻研《船山遗书》，圈圈点点；曾把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立为常课；对曾国藩，杨昌济尤为心折，一一拜读其家书、日记。对曾氏提倡“经济”之学，极表称颂。并补充道：“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计者，乃是真人才。”对曾氏赋予汉学考据“实事求是”之旨以新解，杨昌济拳拳服膺：“近世汉学家言，薄虚悟而尚实证，夫其尚实证是也。然但求证于古而不求证于今，但求证于文字而不求证于事物，又岂得谓实哉？”这段话比曾国藩又有所发展，明确批判了考据学只求证千古而不求证于今，只求证于文字而不求证于事物的所谓“实事求是”之旨。古与今、文字与事物对举，其倾向至为明显。因此他主张“通今”，主张“重行”，向学生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曾国藩。这些都体现在毛泽东早期的《讲堂录》中。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最明显的还表现在杨昌济与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经世观念本是魏源、曾国藩“师夷”、“办洋务”的思想基础，在杨、毛这里则发展为融合中西的主张。他们都认为要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而以结合实际、研究国情为基础。杨昌济向学生说：“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要“适合本国之情形”。在杨昌济影响下，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曾游历农村深入调查，从一师毕业后，他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实际说话，从实际和事实去研究真理。在出洋留学热潮中，他冷静地考虑了自己的去留，主张先要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在这种学风陶冶下，毛泽东形成的经世致用、讲求实学、注重国情的思想风格，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从《湘江评论》上的薄物小篇，到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论，尽管形式与内容有异，但这一卓然独立的思想风格，却前后一揆。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西论争的焦点在于向西方学什么这个问题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之后，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毛泽东之所以独具卓识地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赋予“实事求是”以新

---

《曾文正公书札·复夏弢甫》

萧瑜：《湘中理学大儒杨怀中》，《湖南文献》（台北）第3卷，第4期。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81页。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第90页。

《杨昌济文集》第199页。

解，并非偶然。论其渊源，正是湖湘文化中突出的务实学风。

## 二 两论主题的再现

任何思想的产生，既是对先前思想材料的继承，同时从根本上来讲又是以现实的需要为基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旧命题的新解释也是如此。这一现实的需要就是从学风上与思想路线上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曾经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毛泽东于1937年7月至8月间写作两论，如前所述，其主题即是从哲学上批判教条主义，论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是，两论虽然就其内容本身而言，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却并没有在党内真正实现这一任务；虽然毛泽东在主观意图上针对“左”右倾路线而阐述哲学问题，但在客观上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两论的原稿中甚至还没有使用“教条主义”这个名词，也未提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许多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仍在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王明远在莫斯科甚至仍以“太上皇”自居，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还未十分巩固，这些在客观上很难开展一场党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的大讨论。因此，虽然遵义会议之后，党的路线与策略是正确的，但也在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是没有争论。这些都表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思想路线上的是非问题并没分清。

上述情况最明显的体现是王明的回国。就在毛泽东写作两论后不久，王明于1937年底从莫斯科乘机飞到延安，毛泽东对这位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也摆出一幅领袖的架式，新来乍到，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长篇报告。“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从“左”倾又倒向右倾，对毛泽东等人的统战策略、抗战方针等提出了批评，在党内造成了思想混乱，随后王明主持中共长江局的工作，继续贯彻其右倾思想，在组织上又闹独立性，甚至阻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发表。1938年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来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肯定了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指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一指示促成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会议批判了抗日战争新环境下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和结论。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王明一贯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始提出学风问题，尖锐地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但是，王明并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继续坚持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1938年底，王明针对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作诗说：“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1333页。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28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在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的同时，王明对过专自己的“左”倾错误也缺乏反省，甚至还想推销给广大新党员与新干部。这时他又再版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三版序言中他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并认为成千累万的新党员与新干部，“尤其是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与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可见，王明在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的同时，又坚持过去的“左”倾错误，故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根本错误”，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王明之所以如此，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究其思想根源，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列，称其为教条主义，确实中肯。

王明拿不出任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真正的理论与毛泽东相抗衡，但他对马列“本本”却非常熟悉，以理论家自居，口口声声不离马列词句，讲话、写文章旁征博引，迷惑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其教条主义习气也感染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很快在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潮，哲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但是，有许多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按毛泽东所讲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现实问题，把学习理论当作一种“时髦”，“他们从哲学书籍上学取了大堆抽象的哲学名词和大册难解的哲学语句，并且熟练地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名词和语句，然而一到被问起这些词句的真实意义时，不但不能够给予任何确定的回答，……至于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际斗争，那更是谈不到。”

上述情况表明。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仍然存在，并且影响了一些干部和青年学生，不少新党员新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体会和认识，在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面前，这种教条主义余毒也影响了党的政策与方针的贯彻。因此，彻底肃清与击败教条主义，总结和消化党的历史经验，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就成为当时的一项迫切任务。两论的主题再次突现出来，不过采取了在全党倡导一种新学风的形式，使之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采取了以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相对立的形式，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特征，阐发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把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相对举。教条主义就是学风上与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毛泽东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几个方面系统揭露了主观主义在学风上的表现，即对周围环境的具体情况不作周密调查，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想当然地发号施令；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理论脱离实际，无目的地抽象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只会引用马列词句，而不会用运用其观点、立场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实际上推行的却是一条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其出发点则是抽象的、

---

转引自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第360页。

《王明言论选辑》第115页。

《王明言论选辑》第114页。

《王明评传》第372页。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载《解放》杂志第127期，1941年4月。

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脑子里想当然的主观愿望；教条主义以理论家自居，却只知背诵马列词句，“徒有虚名并无实学”。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作了尖锐批判，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相对立，毛泽东标举“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思想路线。这就是要求对周围环境作周密系统的调查；要求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以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现实，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基础，赋予“实事求是”这一旧命题以新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既吸取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务实观念，同时又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它实际上是两论思想的简化了的并且进一步中国化了的表述。“实事”已不是乾嘉考据学的古书古籍，而是人脑之外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也不是考据学的翻寻故纸，而是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能动地进行正确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的过程；“是”更不是考据学的书本知识，而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实事求是”在这里完全区别于考据学的与现实无涉的治学态度，而是要求从客观事物中找出内部联系与规律性，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去改造世界。整个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观，即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它的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与群众观点融为一体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简化了的形式，以中国化了的表述，具体化为党的崭新学风与思想路线。从此，这一古老命题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瓶装上了新酒。它既凝结着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充满着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风云，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经世致用务实学风合乎逻辑的发展。

## 第二节 的矢之喻

实事求是，以高度压缩了的形式，包含着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和调查研究等丰富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特色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全党提供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 一 理论联系实际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实事求是的主旨，就是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过来说，要真正实现这一结合，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态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此相反，教条主义的态度就是“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

毛泽东在这里又引用了传统的语言“有的放矢”与“无的放矢”来比喻这两个关涉到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的”“矢”之喻，出自王充《论衡·超奇篇》。王充是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曾对汉代一些儒生专以背诵儒经、拘守章句为事、日趋“浮妄虚伪”的学风进行了抨击，提出重“效验”、“得其实”、“不违实”的思想原则。在《超奇篇》中，他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可见，王充的“的”“矢”之喻，本就是指读书与效用的关系。毛泽东借此来论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可谓恰到好处。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毛泽东用“有的放矢”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包含着丰富的意蕴。从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的现实了。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了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做调查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里已经初步包含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教条主义则被称之为“本本主义”。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了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向全党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但另一方面，他又突出地指出，不应当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为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习马列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们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列的一般的结论，而且应当注重学习他们观察与研究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这两方面的要旨“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把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就看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日益结合的过程。迨至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更深化了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把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和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是在同一意义上论述，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成为一种有机的联系。“有的放矢”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也就是实事求是。由于将这样一个过程契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之中，这就使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变为一种创造性的复杂工作，而不是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际，两个相加或简单拼合，这并不是真正的有机的联系。因此，毛泽东责备有些人天天讲“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上却是在“隔离”。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一种糊涂观念。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进一步从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这“才叫作理论联系实际”。他甚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从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尖锐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运用。其表现就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或有矢不放，“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些人偏偏又以理论家自居，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当时延安就有关于毛泽东与王明究竟谁的学问大的议论。因此，毛泽东说，现在对于理论家有许多糊涂观念，真正的理论家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像王明那样虽然非常熟悉马列“本本”，却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窍不通，是称不上理论家的。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说，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每本又读了一千遍，以至于句句背得，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这种与中国革命实际不发生关系的理论，只是教条。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出发，对于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以至说，教条实在比狗屎还没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

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他这样说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这些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好拿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认为，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对他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不能把毛泽东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认为经验主义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者偏于局部的片面的感性知识，缺乏理性知识，看轻理论而自得于一孔之见和一得之功并常常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与帮手，因此必须使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都背离了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所要求的则是理论与实际的有机联系。

从宏观背景来考察，党内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这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有它们的深刻根源。毛泽东是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深知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极大功绩就是反对旧教条，提倡民主与科学。但是，这场运动也有缺点，即那时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这个运动的发展。他认为五四运动后来分为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是形式主义地向右发展。而在共产党内也不一致，其中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拿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所谓形式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全盘西化论”，即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这就产生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去研究与了解。因此，“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开玩笑。”毛泽东似乎并未忘记他早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看法，那时他就认为既要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中国文化。特别是杨昌济关于“吾人留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吾愿留学生之归国者，于继续其专门研究之外，更能于国内之事情有所考察”的话，在他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毛泽东的确与中共党内许多留学回来的领导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不同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独具卓识地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 二 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中，“实际”是一个出现得比较频繁的词。“‘实际’这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之所以是“双关的”，是因为实践的成功与对客观真实情况的判断分不开；是因为毛泽东并不纯是在讨论唯物唯心这些哲学概念，而是注重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制定是否符合一定条件下的真实情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实际”这一概念是指人们的行动必须符合客观情况，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的确有这样一个思想，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认识什么事物，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以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评论思想界“是空虚的思想”，“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的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把人们“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那时他就认为，讨论问题，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已经具有从实际出发的初步思想，并且逐渐成为他后来的思想风格。1929年12月，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认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必须是从实际情况中来，否则就会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就是主张从实际出发。迄至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时，独独拈出马列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主张主观计划必须与实际相符合。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策略，莫不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延安整风时期，他提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其首要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就是指人的头脑之外的一切客观事物。只有首先承认客观存在，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人们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才能从中找出“是”即客观的规律性来，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行动计划与策略方案。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此，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就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不能从“本本”出发，就不能从一般的理论出发。因此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突出的是实际，而不是理论；“有的放矢”，突出的是“的”，而不是“矢”。再进一步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上，突出的是中国革命这个实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明确说过：“‘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毛泽东虽然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但更强调这种理论的应用——“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理论也只有它们在它们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实际、解决问题时才有意义。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8页注释[1]。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义。否则就是空洞抽象的教条与本本，这在毛泽东看来，正是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毛泽东突出的是：“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从实际出发，如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事物应该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从它本身的实际状况来考察，想一想某种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马列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他们所处的实际抽出的总结论，而中国则有中国的实际。理论来源于实际，又服务于实际。因此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理论与实际这种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所以，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重视他们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为着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而去找马列主义这根“矢”，就是“从它去找立场、找观点、我方法”。为此，毛泽东在延安组织研究人员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书中搜集了不少他们有关思想方法问题的论述，诸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方面，“不是从历史类比或历史比拟中，而是从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事实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正是要注重实际。毛泽东这一着，彻底击败了“躺在马列主义结论上”的王明教条主义。参加编辑这本书的温济泽先生说：“这些教导，也使我们联想到，王明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很‘可笑’的吗？不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事情吗？”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既不能从“本本”、从理论出发，也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虽然人们的行为总是带有主观愿望和行动目的的，但要使这种行为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曾指出有两类人脱离实际，一类是所谓理论家、教条主义者或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他们总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或把兴趣放在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一类则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是凭主观愿望，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党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遵守这一起码的唯物论真理，“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他反复强调要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作为全党要牢牢掌握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看似平凡的结论，却凝结着中国革命不平凡的经验。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满怀激情地从事中国革命事业时，却并不懂得中国国情的极其复杂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办事情，想问题，或者从“本本”和定义出发，或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或者从自己的愿望和感想出发而陷入主观主义，使革命遭受了极大损失。特别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转引自《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第77页。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第7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是王明“左”倾路线，鼓吹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共产国际，结果几乎使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尤其是在军事斗争中，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竟荒谬到这样的地步，用毛泽东的评论来说，就是他们不知道人总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正是军事上的碰壁，才使教条主义的统治得以垮台，毛泽东也首先从军事上清算教条主义思想，认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客观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到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路线上清算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这才为全党所接受。张闻天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我们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一个唯物论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自以为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碰了许多钉子，受了许多损失，还不知道这个钉子从何而来，“只有经过牺牲和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之后，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个钉子是客观实际的钉子，如果我们再不理睬它，再不承认它，我们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中国党“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真理。

### 三 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所一贯主张的。早在“五四”前期，毛泽东就倡导研究国情。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提出要对农民、工人、女子、小学教师、车夫等进行研究：“田主怎样待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工人“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等等，都要“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更开列出100多个调查项目。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真正实践并发展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他“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中，为了确定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党内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延安整风前夕，当王明再版他的教条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后，1941年3月，毛泽东也整理和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他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说：“这句话，虽然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同年5月，毛泽东作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182页。

《张闻天选集》第319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4页。

《邓小平文选》第109~11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8月1日，在他的倡导下，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3日，他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从此，全党才真正开始兴起调查研究之风。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备和成熟。调查研究也就成为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要理论联系实际，就必须调查研究。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把倡导调查研究同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环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就是“有的放矢”，就是运用马列的立场与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马列主义的结论，是根据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况而得出来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复杂情况进行具体研究与论述，中国的情况要靠中国党去了解与研究。因此，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向全党倡导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一切实际工作者也都必须向下作调查，而对于只懂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来说，“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我们党曾经吃亏不可胜数，就是吃了所谓“钦差大臣”的亏，他们仅仅根据马列“本本”、外国经验，这也指责，那也批评，而无视中国具体实际，他们只是将马列词句与外国经验硬套在中国革命身上，没有对中国实际作周密调查，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认为，现在还有很多人保持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针对那种夸夸其谈，一知半解，凭想当然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遗风，指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因此，“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者是认识世界，后者是改造世界。要正确地认识与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实际情况作详细的调查。客观实际只是认识的前提，它不会自动地跳入人的头脑，人必须能动地积极地去反映它，才能获得对它的正确认识。这个能动的积极的反映过程，也可以说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否则，就难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甚至染上夸夸其谈，凭愿望办事的主观主义作风，所谓从实际出发就成为一句空话。张闻天在1943年3月27日写的《出发归来记》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从实际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出发，要认识实际，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内容、态度与方法的论述，使实事求是这一带有哲学味道的命题成为可操作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从内容来说，毛泽东当时强调要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整体的研究。对近百年的中国史，应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的分门别类与综合的研究，这是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中国现代革命就是从近代革命继续和发展而来的。毛泽东甚至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给以研究与总结，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环境并使之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不过，毛泽东更强调的是对中国现状的研究，他向全党提出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抗日战争环境下各种情况的任务，要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与研究，然后引出必要的和应有的结论，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基础。从态度来说，要向社会和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必须有诚恳谦逊的态度。要眼睛向下，不要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与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都很熟悉，他从自己做调查研究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要了解中国社会，更主要的是向下层群众、各色人物虚心请教，必须向他们“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从这里，毛泽东后来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方法上来说，首先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列宁说：“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可谓找到了马列主义这根“矢”，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要在中国进行革命，就必须弄清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接受的是“阶级斗争”，他的许多社会调查著作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法，革命也就是中国的阶级革命，而其特点则是农民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始终未曾放弃的理论。当他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的比重相对民族矛盾而言有所下降，但决不是消除了。因此，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其中仍然存在着斗争。一贯主张中国社会特殊，没有阶级之分的梁漱溟还以为毛泽东放弃了阶级斗争，待他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时，才明白共产党并未改变其基本观点，而梁漱溟的理论则被毛泽东称之为怪议论。毛泽东是最主张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但他认为阶级斗争则是普遍的共性，问题是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关系是什么，这就需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毛泽东向全党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

---

《张闻天选集》第 32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90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87 页。

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其二是开调查会，这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与方法，是占有材料的直接步骤。毛泽东总结他多年的调查研究经验时说：“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他还指出，开好调查会，一定要选好到会人员，必须有调查纲目，自己口问手写，展开讨论，将问题引向深入，再集中意见，作出结论。其三是详细占有材料，并抓住重点。实事求是，首先就是要掌握事实，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材料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要在众多的材料中，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材料。如在十样事物中，调查了九样，但都是次要的，把主要的材料丢了，仍然不能找出事物的规律性来，因此，“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枝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然是没有发言权的。” 其四是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这是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重要一环。如果只占有材料，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不进行分析与综合整理，就不能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指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观察、分析与综合的三个步骤，“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即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毛泽东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认识事物的方法，称之为“四面受敌”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他原来本已非常突出的调查研究思想，并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6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 第十四章 文艺方向的确立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与高深修养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在这方面的诗作、兴趣、品评所展示出来的精神世界与文艺观，意蕴丰厚，情怀博大，一时难以窥其堂奥。这里所要述说的主要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论如何，《讲话》是毛泽东文艺观的具有思想性的理论化表述，从而也是他文艺观的代表作。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继阐述“实事求是”，反对王明教条主义之后一年，接着把整风运动引入延安文艺界，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如同“实事求是”一样，这篇《讲话》在党的历史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上，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讲话》中的某些论述与个别观点具有局限性，但从整体上讲，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精神仍是现阶段文艺运动方向的指导思想。

### 第一节 《讲话》的缘由与视角

《讲话》并不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艺理论教科书，毛泽东也无意要建构一个文艺理论体系或教本。他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谈论文艺理论，规定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的，而这个特定视角又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 一 座谈会的因起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讲话中，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讲话》中他又重申了这一原则，指出讨论文艺问题也必须从现在的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中国进行了5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及其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农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等等。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挑明了在文艺界实行整风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

从当时的时局来看，无论反法西斯势力还是革命势力，都处于艰难时期。从反法西斯阵线来看，苏联的卫国战争在1941年6月还处在退却与防守阶段，日本于1941年12月又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苏联和其他盟国都处于德、意、日三国法西斯的进攻之中。在中国战场上，抗日战争从1938年10月起已进入相持阶段，其特点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对国民党进攻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进攻为主，特别是在1941年和1942年，更加集中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扫荡”战，使根据地人力、财力和土地损失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连续发起了几次反共高潮。如毛泽东所说：“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同，也和抗日的第三年第四年不同。抗日的第五

---

以下简称《讲话》。

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政治上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军事上军民浴血奋斗，经济上实行精兵简政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搞“挖土经济”，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与生活上的极端困苦等问题。

从当时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来看，文艺人才可谓称盛一时。这支文艺队伍有些是从苏区根据地转移过来的，但大量的是抗战初期以来从大城市进入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直到1941年，党还帮助最后一批文艺工作者脱离国民党的高压政策，通过封锁线来到延安。随着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集中延安，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渐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和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许多专业演出团体。直到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同时出版的文艺期刊就有《草叶》、《谷雨》、《文艺月报》、《诗刊》等。《解放日报》专辟《文艺》副刊，大型综合杂志《中国文化》和青年、妇女期刊，也登载文艺作品。这支文艺队伍的形成，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逐渐走向现实革命斗争的积极成果。他们到达根据地之后，投身到了战争环境，感受到了强烈的革命气氛，为根据地军民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所吸引，并且和工农兵群众有了一定的接触和结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初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作出了相当的成绩，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与演出为抗日战争服务，采取适合战时情况和群众便于接受的形式，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五四”运动中的那种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也一直传存下来，“当环境较好时，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这一缺点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身上。他们的许多人是从上海“亭子间”来到“山顶上”的，所面临的环境变了，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服务对象与工作任务也变了，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城市学生、职员、店员等等，而是根据地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他们的干部，其中尤其是占人口绝对优势的农民群众，他们文化落后，风俗习惯上和思想上也存在一些落后因素。在这种状况下，许多新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并不能一下子适应新的环境与对象，存在着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即用“城市观点”与“正规化”来服务于新的对象。特别是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使他们与群众在实际工作与行动上很难结合起来。尤其是在1940年以后，由于局势的紧张与生活的艰苦，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弱点与问题，就集中、迅速、尖锐地暴露出来了，一度造成了延安文艺界的思想混乱状况。在文艺思想上，出现了不少错误观点。有的人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文学创作对立起来，说“最近整个脑子都装满了革命理论，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了”；有的公开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有的强调艺术第一，倡导资产阶级人性论；有的对待革命现实和革命群众的态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未能正确处理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问题等等。当时延安文艺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文艺创作上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关门提高以及小资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0页。

鲁迅：《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12~115页。

见欧阳山：《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解放日报》1941年5月19日。

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等倾向。这些错误观点都是在当时时局严重困难的时候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的，与革命环境显得极不协调。

有一件事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与复杂起来，更加引起了毛泽东与党中央的重视，它直接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野百合花”事件。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王实味的小品文《野百合花》，此后王实味又接连写了《政治家、艺术家》与《硬骨头与软骨病》，发表在《谷雨》和中央研究院墙报上。王实味在文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错误思想，并以更加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文中说什么“到处乌鸦一般黑”、“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用政治家“灵魂肮脏”的说法来号召艺术家改造政治家，认为“大人物”的“小事情”也至关重要。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和有的人写的杂文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编印成材料，并改编成戏剧上演，借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生活，加重了事态的严重性。

《野百合花》马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也激起了广大干部与群众的不满，由此也牵出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遂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 二 《讲话》的视角

为了表示对文艺界的高度尊重，毛泽东与凯丰以个人名义联合下请柬的方式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小礼堂举行，到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各方面文艺工作者200多人，从1942年5月2日开始到5月23日结束。座谈会的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5月2日，毛泽东首先作了“引言”的讲话，启发大家畅所欲言；第二次是在5月18日，大会进行讨论，毛泽东出席参加，会议讨论“剧运方向”、“戏剧界团结”等问题，在关于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第三次是在5月23日，先是大会发言，再是朱德讲话，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引言”与“总结”构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科学地认识毛泽东《讲话》的思想及其主题，首先必须弄清毛泽东是从什么角度和方法去考察他所面对的文艺现象和回答文艺界出现的问题的。

文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精神现象，它的复杂特性可以使人们对它的研究是多角度的。人们可以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去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心理学、美学甚至符号学、形态学、发生学等角度去进行考察。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有不同的出发点、侧重点，为人们提供了切入文艺现象不同层面的可能。但无论哪一种角度，都不可能阐释全部文艺问题，穷尽文艺的所有特性，建立包罗万象的毫无遗漏的文艺理论体系。当然，不是一切角度和方法都不分轩轻，同等重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开辟了人类运用唯物史观从整体上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规律的新时代，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科学的水平，从而也就第一次真正为艺术社会学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法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说：“从十九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

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并以此为基本点解剖了一些重要的文艺社会现象，论证了文艺要表现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斗争。他们也考察了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它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但马、恩的重点毕竟是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包括艺术观念在内的各种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以致“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所以他们对文艺理论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在文艺的社会学研究方面。列宁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直接实践问题的时代，空前激烈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决定了他对马、恩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偏重于文艺社会学思想。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但他提醒人们不要把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同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更加明确地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应当直接地服务于劳动群众，并制定了在批判继承文化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理论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讲话》的视角与立足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一脉相承的。《讲话》的原版本中引用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齿轮与螺丝钉”的比喻，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增引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过程中，列宁的这篇文章是重要的学习文件，5月14日《解放日报》摘要刊发了该文。以毛泽东的审美趣味与个人修养，他当然深请文艺的审美特性，事实上，《讲话》也未完全忽视这一点，但《讲话》毕竟注重的是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在考察文艺现象的诸多视角中，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而论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时代使然。如上所说，那是一个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动荡的年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把文艺家从“象牙之塔”中驱赶出来，当他们带着灵魂深处的“象牙之塔”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后，同“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同生活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同正在和敌人作残酷流血斗争的人民群众发生了冲突，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存在而又长期没有克服的一个根本弱点，即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没有完全结合。于是文艺家们在面临“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文艺向何处去”的选择。因此，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制高点上，以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眼光，从无产阶级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出发去考察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文艺运动，就不能不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对文艺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宏观认识与把握。

然而，《讲话》也不是要写文艺社会学的教本，它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文艺运动的方向性问题。《讲话》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按照

---

转引自花建、于沛《文艺社会学》，第46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页。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35页。

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向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因此，《讲话》不是从定义出发去写文艺理论教科书，而是从实际出发探求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特殊规律；通过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这一特殊对象的研究，揭示出文艺的一般与革命文艺的一般。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的而不是美学的角度去考察文艺现象的社会本质、功能和发展，虽然也涉及到文艺的审美属性，但主要还不是以美学家的眼光从美学理论本身去阐发，而主要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从社会学的视角去触及。他考察文艺问题的基点是更高的层次，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这样。从理论上来说，唯物史观的方法是更根本的方法；从实践上来说，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主题，特殊他讲，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离开这一社会实践，一切都是主谈。因此，《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解决文艺界存在着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等问题。其主题就是为文艺运动定向，即规定文艺运动的功能方向——促进革命运动；服务方向——面向广大革命群众；创作的途径与方向——深入革命生活，而为广大革命群众服务则是最根本的方向。

## 第二节 文艺与革命

文艺革命的关系，是《讲话》的出发点，是毛泽东考察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这里涉及的是文艺的功利问题，涉及到文艺的革命宣传作用，文艺的政治性与党性原则以及党的文艺政策等问题。

### 一 文武两支军

毛泽东极为重视文艺的革命作用，这是他作为革命家所必然具有的眼界。《讲话》开明宗义地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话，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这就点出了当时文艺的功能就在于服务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其中也可以说就是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仅有这支军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支文化的军队。这就是说，要文武两支军队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细索一下，毛泽东关于文艺的革命功能作用与文武两支军队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他就全力以赴整顿和改造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使之革命化，使之面向工农大众。而宣传工作最有效的是采取文艺形式。他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认为，与其用论文，毋宁用小说及有韵的歌谣或问答体的短文，或用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

革命故事和传说，代替乡村的神话与传说，去动员农民。在江西苏区时期，尽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战斗频繁，工农民主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艺术局抓文艺工作，并且成立了“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等文艺团体，演出歌舞、话剧、戏曲等节目。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革命歌谣的发展特别突出，起到了促进革命的宣传作用。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苏区的时候，首先重视的就是发展江西的兴国民歌，在扩大红军的‘扩红’运动中，民歌起了很大的作用哪。”

尽管江西苏区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及文艺活动，但10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艺的主力军却不在“山顶上”，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中。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逐渐陆续来到革命根据地。如当时的著名左翼作家丁玲于1936年11月来到保安，毛泽东欣喜之至，写《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纵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里体现出来的不是毛泽东与丁玲的老乡之谊，而是表现出毛泽东对文艺革命作用的高度重视。1922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词中所引正是孙中山的意思。丁玲到来之后，当时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倡议成立一个文艺组织，毛泽东提议把这个组织叫做“中国文艺协会”，意在根据地组成一支文艺大军。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作即兴讲演，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当时内战尚未停止，抗日亟需动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出击。他在这篇讲演中提出的“文武双全”与后来《讲话》中说的“文武两个战线”、文武两支军队，即朱（德）总司令的军队和鲁（迅）总司令的军队，是一脉相承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文化军队从“五四”以来就开始形成，并帮助了中国革命。但是，自大革命失败后，文武两支军队却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认为，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即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即农村革命的深入与文化革命的深入。在《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这种隔断就造成了不合理的状态，革命中心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心却在半殖民地的最大城市——上海。于是这两支军队就只能遥相呼应，各自作战。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大城市来到了延安和敌抗日根据地，在农村根据地逐渐形成

---

转引自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人民戏剧》1978年第1期。

《新观察》1980年7月号。

《红色中华》1936年11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848页。

了一支文艺军队，与武装的革命军队一起，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话》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认为现在的关键在于要使这两支军队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把文艺看作是一支革命军队，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必然否认文艺的非功利观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讲话》特别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性质；这种功利主义不是只看到局部的眼前利益的狭隘的超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当时的抗日主题，规定了文艺的革命方向和战斗作用，“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出发，把文艺看作是一支革命的军队，规定了文艺运动的革命功利方向。

## 二 文艺与政治

从文武两支军队的观点出发，自然就引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有些人早在抗战初期来延安时就说政治家与文学家不能相互了解，要求各走各的路；座谈会上，又有人说“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都不能领导谁。”针对这些说法，毛泽东的观点异常明确，即文艺服从于政治。

文艺服从于政治，毛泽东是从“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从“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来说的，实际上就是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来规定的。革命就是剧烈的政治运动，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也就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里考虑的仍然是文艺的功利方向和性质。

首先，毛泽东认为，从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来看，决定了文艺服从于政治。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了文艺对于政治的伟大影响，对于革命事业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突出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只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只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好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因此，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文艺服从于党的整个革命工作。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其次，从党的文艺工作与非党的文艺工作关系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5页。

转引自王燎荧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第9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

来看，党的统一战线政治策略决定了文艺的统一战线策略，这里仍然是文艺服从政治。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抗日的文艺统一战线，抗日是当时的第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在抗日这个前提下，可以而且应当团结党外一切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赞成抗日的地主资产阶级文艺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没有机械搬用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第二个层次是民主政治问题上的文艺统一战线，这个层次比抗日的层次范围要小些，因为在民主问题上有些人不赞成。第三个层次则是文艺创作方法与风格的特殊层次，“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毛泽东这三个层次的排法，把文艺自身的特殊性问题放在最后，而把抗日与民主这种政治上的团结与联合放在前面，意即文艺必须从属政治。事实上，人们也不可能用一种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去统一一切。因此，文艺上的宗派主义在抗日救亡与民主政治面前便显得毫无意义。当时延安就存在着这种忽略政治团结而斤斤计较文艺创作上的各种纠纷，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则早已存在，当时鲁迅就指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鸳鸯蝴蝶派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互相批判。”毛泽东文艺服从政治的提法正是他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文艺问题上的具体运用。1944年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

从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出发，自然又导出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

当时延安的一些作家中，有人反对从政治上来看文艺作品，说这是“想把所有的作家纳入他的政治面具的模子里，有意无意地让艺术价值化为海洋的沉淀物”。还有的人认为“一个批评家对于一个创作者，如果不看他的生活和技巧，而单单强调‘政治’是不妥当的。我们晓得过去左翼美术的成绩太差，就正是轻视技巧的结果。”毛泽东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他也注意到文艺批评的复杂性，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他论述的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问题，这就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从政治标准来看，一切利于团结抗日，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一切不利于团结抗日，使群众离心离德、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而好坏则是以功利效果为准的。从艺术标准来看，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毛泽东认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他要求政治与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观点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注重提出作品的艺术性，并不仅仅是从文艺作品的审美特性的要求出发的，而主要是注重作品艺术性的革命功利效果和感召力量。因此，文艺服从政治与革命，使他主张：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既然政治标准第一，那么，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可能有某种艺术性。也不可取，“内容愈反动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第75页。

转引自玉燎荧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第13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

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显然，在文艺与革命和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的天平倾向于后者。

关于毛泽东对文艺与革命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是人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是从革命需要出发来规定文艺的政治功能与革命的功利方向的。在这方面，他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的思想。列宁曾在1905年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观点来看，文艺作为一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决定于并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社会分裂为各个阶级的时代，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从而超阶级的文学艺术，为艺术的艺术，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讲话》完全是运用这些观点来观察文艺现象的。至于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提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仍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当时激烈的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当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几次反共高潮时期）的双重困境中，革命与政治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使文艺服从于政治与革命的需要，发挥文艺的政治与革命的功能作用，正是时代主题所迫切要求的。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中，有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中既有公式化、简单化的教条主义，“重政治、轻艺术”，以政治压倒一切，但更严重的是非政治化的文艺教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以艺术否定政治的不切实际的空谈。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更成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所以，文艺服从政治的提法，既是时代主题所规定的，也是对症下药的重量药剂。忽视这一历史背景，轻率否定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以至于要使文艺完全脱离政治，又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但是，问题也有另一面。当毛泽东从革命与政治的功利方面规定文艺运动的方向，从而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时候，在理论上也有疏漏之处，对建国以后文艺运动的发展，也有不良影响。由于文艺服从政治只是那个时代主题的规定，但毛泽东在论述时却把它提升到了一般的规律的高度，这就容易导致人们对《讲话》的“误读”，毛泽东也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化为“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但“一定革命时期”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的概念，既可理解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也可解释为一个短时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由于它与“文艺服从政治”的一般提法紧密相联，后来在执行过程中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甚至提出“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口号。此外，毛泽东在遵循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提出文艺服从政治的口号时，也明显忽略了列宁的另一段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页。

有位翻译家觉得列宁这篇著作对讨论文艺问题有重大意义，特译出全文以供研讨。但《解放日报》在摘刊时却删掉了这段文字，《讲话》引用了列宁“齿轮与螺丝钉”的比喻，但“两个无可争论”这段尊重文艺特点的名言却在原版本或修改时始终未曾进入《讲话》的文本。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恐怕与毛泽东对于文艺公式化简单化可能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估计不足有关。后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代时期，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的祝辞》中，重新摘引了列宁关于两个“无可争论”的名言，并不再提“文艺服从政治”，而是确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话又重新说过来，《讲话》关于“文艺服从政治”的说法，是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从文艺的功利层次上规定文艺运动方向的，而不是在讨论文艺的特殊问题。《讲话》所确定的文艺运动的更根本的方向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基本精神来讲，新时期的文艺方针仍是《讲话》的继续。

### 第三节 文艺与人民

革命的主体是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因此，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这是《讲话》的核心问题。

#### 一 根本方向

《讲话》的中心问题是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规定整个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批评过去有些同志，只是在一些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争论、对立和闹不团结，而对于为什么人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几乎一致地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认为，只有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从文艺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艺总是面向社会、面向读者的。不管作者在主观上如何坚持着“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但在客观上总脱离不了文艺的社会作用，脱离不了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事实出发，明确要求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约而同地批评过拉萨尔的《济世根》，因为拉萨尔在这一悲剧作品中把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赞美为创造历史的英雄，而对人民运动及其历史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当历史从圣西门、欧文时代进到1887年，在工人阶级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政治力量的背景下，恩格斯认为有充分理由向文学艺术提出这样的历史任务：“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文学艺术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列宁在新的时代明

确指出要把这一历史的必然要求付诸实践，“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从其诞生之日起，实际上也注意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五四”时期提出“平民文学”，不久以后还出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是要为“被侮辱被压迫”的多数人的生。以后创造社也曾明确地提出过“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文艺事业应该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左联”的成立，是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一开始就注意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即进步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始终都是围绕着为大多数人这一中心而进行着。但是，这一问题由于环境和文艺工作者本身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工农为主体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并没有真正成为文艺描写的对象，文武两支军队并没有完全结合起来，这就出现了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所说的，文艺表现人民群众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

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农村根据地的开拓，出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新的群众的时代”。文艺需要人民，而人民也需要文艺。全国的进步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涌向延安。文武两支军队终于会合。但这种“会合”并不等于“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继恩格斯和列宁之后，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责任放到了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肩上，明确规定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毛泽东把“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方向明确化，把马列主义关于文艺为人民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国情进一步具体化。他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第二是为农民，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毛泽东要求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

细究起来，毛泽东所说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服务方向还是农民。工人人数极少，尽管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是服务对象，但毛泽东要求不要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去创作文艺；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是革命的主体，是军队的主体，因此，文艺为人民大众，在实际上就是为农民。毛泽东在小时候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

---

《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真实主体：“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因此，在中国这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中，革命文艺的主要方向自然是要去表现、描写、反映农民的情感、意识、姿态、语言、命运与斗争的事迹。这的确是“五四”以来文艺运动未曾以高昂激扬的笔调所触及的领域。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讲话》以后文艺题材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了压倒一切的文艺主题，《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血泪仇》、《王贵与李香香》、《我的两家房东》等等成了解放区文艺的著名代表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延安平剧院的《逼上梁山》以后，欣慰之至，写信表示祝贺和感谢，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sup>1</sup>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为农民服务，这是由当时的革命战争环境规定的。但毛泽东在确定这一文艺的根本方向时，还是提出“人民大众”这一概念。历史的变化，也使“人民大众”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变化，例如，知识分子就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他们的作用也愈来愈大，现在知识分子也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当然其中也就包含了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这是新时期党在文艺方针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重大发展。

## 二 情感转变

要实现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关键是文艺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必须实现立场、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要在情感上转移到人民大众和工农兵方面来。只有文艺家们的自我意识与情感真正融化与转到工农兵群体意识与情感之中，工农兵群众才能真正进入文艺创作者的视野，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才能真正实现。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文武两支军队会合了，“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要实现这个结合，还有一个情感转变的问题；在谈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在各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也似乎是已经解决了，因为他们来到根据地，目的无非是为了革命，与革命人民一起奋斗，“文章下乡，文艺入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其

---

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8页。

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为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的意见中，发生了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而其关键也是情感没有转变到工农兵群众方面来。所谓情感没有转变，就是文艺工作者中有些人，“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

这是一个老问题。“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提倡新文学，甚至提出“平民文学”。但“‘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凡是先知或引路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野老夫’都可领会”。可见，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虽然提出了“平民文学”，“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后来的创造社、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生搬硬套拉普文艺，只是在理论上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初步认识；左联曾在1930—1934年组织了几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问题，但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把大众化看成是通俗化；或者把“大众化”变成了“化大众”，认为不是大众的文艺，也不是为大众的文艺，而是教育大众的文艺！可见还是把自己看作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鲁迅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

毛泽东认为，从上海亭子间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上述传统，还是在思想深处保存着一个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的感情王国，即个人主义，自我表现，对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因此“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因此也就不可能熟悉工农兵大众的语言，不懂他们的情感和愿望，不善于描写工农兵，“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不可能实现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只有将立足点转移过来，将情感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什么叫情感转变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在《讲话》中向文艺工作者现身说法，谈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在自己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在一起了，相互熟悉了，“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周作人：《平民文学》。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鲁迅：《而已集》第1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3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

鲁迅：《而已集》第851页。

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可见，这种情感转变，就是要使知识分子的“自我”与工农兵群众的“大我”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感情世界、情绪世界来一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变化，随着这一变化的真正完成，“自我”对世界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因此，这种情感转变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改造，更与理论世界观的转变不同，而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变化，是一种“自我”在群体中世界观的变化。一个人的理论世界观可以倾向于某个阶级，可是不一定真正在情感中属于这个阶级。毛泽东在强调情感转变的时候，使用得更多的字眼是“体验”。“兴趣”、“爱好”、“热情”、“偏爱”、“同情”、“感情”等等，他把这种情感的变化当作世界观改造的深刻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大众化。这对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真正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还指出了文艺工作者情感转变的途径，这就是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与学习社会。他强调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学在群众生活与群众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阶级，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他们的面貌和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使自己熟悉群众，而且要使群众了解自己，而这都只有通过情感的融成一片才能真正达到。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非有七年八年不可，非要痛下决心不可。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毫不迟疑地、无条件地去接受这个灵魂洗礼和情感转变过程，扔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感王国，转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英雄才有用武之地。

这里有一个大众化与化大众（启蒙）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他独特的理解。他认为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首先当群众的学生。《讲话》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只做群众的先生，这在毛泽东看来，大概就是近代以来革命运动的教训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每当社会变革遭到挫折时，总有一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从“民心”、“民气”、“民智”上去找原因，但谁也没有从领导者、宣传者本身脱离群众、轻视民众，特别是轻视农民群众这一关键因素上去总结经验教训。“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其意义不可低估，但在毛泽东看来，它的根本缺陷就是只局限于知识阶层，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能只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取得胜利。“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85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为何会“一事无成”？原因就在于，既是启蒙，就有一个启蒙者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启蒙者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而是站在民众之上或民众之外，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脱离实际与陷入空谈和空想。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对工农兵群众的启蒙问题（化大众），认为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首先必须大众化，即来一个情感转变。毛泽东认为，工农兵群众也是有缺点的，“都有落后的思想”，问题是如何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这不能采取讥笑的态度，而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善意地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毛泽东认为，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与他们打成一片，有时还不得不迁就群众中落后的东西。1942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当群众的尾巴，但有一条，一定要按群众的要求。例如彭湃是个共产党员，留学生，中央委员，他不信菩萨，但老百姓一年总有一天要去拜观音菩萨，他去了，群众就说他是个好同志，群众见了他就请他坐下，请他喝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该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这些话与《讲话》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强调情感转变，强调大众化，但并未忘记化大众，忘记教育群众。不过，毋庸置疑，毛泽东更突出的是大众化的问题，情感转变的问题，这在《讲话》中是非常明显的。

### 三 普及与提高

在某种意义上讲，普及与提高也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在论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时，就论述了“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的问题。但普及与提高在《讲话》中占着引人瞩目的地位，则是由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直接引出的第二大问题——“如何去服务”。在毛泽东看来，这个问题既与文艺的根本方向紧密相联，同时，它的正确解决又关涉到这一根本方向的落实与否。

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普及与提高是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争论双方各执一端。但在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形成较早也比较普遍的现象却是“关门提高”的现象。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对抗战初期某些比较粗糙、简单的普及工作不满；就其历史原因来说，它是“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中某些倾向的继续。例如在上海时期，曾有过“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接着又发生“接受文学遗产”的讨论，就讨论的问题来看，后者正是前者的答案。一些人对文艺遗产盲目崇拜，过分强调向外国古典作品学习技巧，模仿和照搬。这种倾向在延安，在战争和根据地条件下就显得更为突出。有一个时期，在延安普遍地上演大的、洋的、古的戏剧；有的则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强调磨练技巧，强调面向全国，面向“大后方”，突出“专门化、职业化、正规化”，“专门从事各种技术上的研究”，“有系统的介绍国内和世界名剧”。就艺术本身而言，这种倾向并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问题就在于这种倾向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显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成了“关门提高”，置正在流血牺牲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于不顾。延安“来去的同志，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回延安的同志，身上的战袍还未脱下，尘土还未扫净；即将离开延安的同志，也立刻就要跨上战马，驰骋抗日前线；哪有闲情逸致来欣赏这外国古典剧啊！”

所以，普及与提高的争论，尤其是“关门提高”的倾向，论其根源来说，还是归结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与文艺的根本方向紧密相关的。“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毛泽东将分析的切入口，选定在“对象”上，一开始就抓住根本。既然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那么讨论其他一些问题也以这一根本方向为标准。《讲话》以工农兵大众的需要为尺度，来界定普及与提高的概念内涵，两者的轻重缓急以及它们的辩证关系。

从普及与提高的概念内涵来看，《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向工农兵提高。在这里，普及与提高的内容都具有政治性与阶级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能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向工农兵普及，而是要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向他们普及。提高的问题也是如此，“不是把工农兵提高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毛泽东这些话当然有所指。因为当时延安文艺界在争论普及与提高时，有少数上演的戏剧是反映18和19世纪外国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还有的戏是宣扬升官封爵、夫贵妻荣、男子多妻、女子守节的，以及肯定民族投降、镇压农民起义或带有黄色意味的。这些都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不相容，更与激烈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实践相冲突。在毛泽东看来，这都是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必须是反映工农兵的斗争实际，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文艺应当“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与压迫，文艺就必须反映这些问题，“使人们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方向与内涵。

从普及与提高的轻重缓急来看，《讲话》指明重点应放在普及上。这也是由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规定的。文艺既然为工农兵服务，自然就应以工农兵的文化水平和接受欣赏水平为基础。蔡特金在《回忆列宁》中记述了列宁这样一段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底

---

陈戈：《我的回忆》，载《电影文学》1962年第5期。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9～86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1页。

层有深厚的基础。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毛泽东深知中国底层群众的愿望、要求与情况，他早就认为，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中国历代以来，只有地主有文化，而农民没有文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使农民从政治上与经济上得到解放。但文艺首先要面向工农兵，就应该配合他们的实际斗争，顾及他们不识字、无文化的状况，要满足他们所急需的文化知识，创作他们容易接受的文艺作品。因此，“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普及的作品自然会简单、浅显，为一些艺术家们所不愿创作，但毛泽东认为，现在群众是在唱“下里巴人”，你唱“阳春白雪”，于工农兵群众没有多大意义，文艺“必须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利益，才是好东西。”以毛泽东的个人爱好和文学修养，他当然喜欢高级的文艺作品，但他的标准是群众的实践需要，即使粗糙一些，简单一些，只要是群众能接受的，他也提倡。因此，把普及工作放在第一位，对于他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毛泽东在强调普及的同时，也未忽视提高的必要性，而是给予二者以辩证的说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就指出，这种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文艺工作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普及工作与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重视普及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贬斥提高。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当时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如果普及工作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总是一样货色，一样的“小放牛”，那么这种普及工作也没有意义。“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普及是基础，提高是目标，普及工作不但不妨碍提高，而且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在大量的普及工作中，名篇佳构必然会有所涌现；持续的普及也会逐渐提高群众的欣赏水平，从而对普及工作产生更高层次的要求，也会使作家的创作水准渐次提升和获得适应读者新要求的能力。这里的关键是普及要向提高方向发展，而提高则必须以普及为基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而无论是普及与提高，都是以人民大众为方向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是人民的提高。”

在论及普及与提高时，毛泽东认为都有一个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艺术的源泉和遗产的继承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在《讲话》中，

---

《列宁论文学和艺术》（二），第 91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70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0 页。

他也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这都是流而不是源，如果脱离源而对文艺遗产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这是最没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与《实践论》中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提法相似，在《讲话》中，毛泽东认为文艺遗产是间接经验，文学艺术的源泉是直接的生活实践。“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但生活却并不等于艺术，因此，艺术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在这里论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但他讲的生活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生活，虽然他以这种普遍的一般的形式提出和论述。他讲的生活是人民的生活，工农兵实际斗争的生活。因此，无论是普及或提高，或是情感转变，都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从中改变自己，同时又吸取艺术营养和生活素材，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文艺运动沿着为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方向发展。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1页。

## 第十五章 政党建设的探索

延安时期，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展开，毛泽东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也日趋系统化。正像毛泽东关于政治、军事、哲学与新民主主义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现实斗争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样，他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也是这种结合的成果，有其独特的内容与基本特征，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延安整风这样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 第一节 特殊环境下的重大课题

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和发展，理论上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历史环境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这两个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正如中国革命走着不同于俄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极为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并壮大起来的。

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从整体上来看，表现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这种社会状况使得党的阶级基础极为薄弱。一方面，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人数很少，年龄很短，文化素质低，易受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人数众多的是农民群众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从其革命的一面来说，大多数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参加民主革命；就它的落后面来说，不但有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各种弱点，而且在政治上左右摇摆，思想上具有主观性、片面性，组织上表现出涣散、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封建思想，或追随资产阶级。在这种无产阶级弱小以及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如何可能？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模式，党的队伍的壮大依靠在产业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事实上，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领导人正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他们无视中国社会的特殊环境，曾经一味强调党的组织基础的工人成分。显然，依照这一模式，在中国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党的发展必须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中吸收力量。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客观上逼迫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中寻找革命力量和立足点。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漫长曲折但却符合国情的独特道路。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舞台是农村，党员来源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成员。党凭借着农村的广阔舞台，不断发展。虽然中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而使党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但抗日战季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以农村为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打破共产国际和王明“左”倾统治时期只注重在工人中发展党组织的关门主义模式，要求积极地大胆地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官兵中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向他们开门，以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并认为这是

“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由于采取这一政策，党的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巨大发展。1937年7月仅有党员4万人，到1940年7月发展为80万人，3年中党员数量增加了20倍。到1945年召开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已经“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的强大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与解放区，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心。

党的发展的特殊环境，即远离工人聚居的城市而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党的组织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75%，其余党员中还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成员。对于这样一个主要由农民组成并长期活动于农村环境的政党，党内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共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因此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而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则用他们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担心这个党离无产阶级太远了，会非无产阶级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而照旧以城市为中心，就难以得到保存与发展力量，“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样一个在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斯大林明确表示怀疑与轻视，他曾与哈里曼谈话时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

这种轻视当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成长的特殊道路的简单否定。但也明显的是，大量农民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必然把他们所固有的弱点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进党内，影响党的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这样，在产业工人人数极少、而小资产阶级成分极为广大的历史环境中，党员数量很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如何使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便是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环境，也决定了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进而决定了党的特殊的政治路线。从总体上来说，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一是武装斗争问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党所处的环境和所负的任务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特殊的斗争环境、特殊的政治路线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78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见《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转引自汪澍白：《艰难的转型》第12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页。

来看，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即革命的一面与软弱甚至附合反革命的一面。“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

这条政治路线就是确认现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独特的革命斗争环境中，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的二重性质，从而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这不是能用共产国际和别国革命的模式所能规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如果不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的同时又与之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并失去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就会失败。因此，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关联与策略，关涉到中国革命的成败。从武装斗争来看，中国革命斗争的环境也是非常特殊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长期的农村游击战。它是长期的，必须以极大的耐力对待之，不能企望一举成功；它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起义为特征的；它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的阵地战。这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这“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向那些国家不相同的。”毛泽东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武装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

由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胜利与失败、后退与前进、缩小与扩大、发展与巩固都不能不联系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表明，当党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反过来，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过程，就是这样密切地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亦即密切联系于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与否的理解和处理。

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所突出出来的党的建设重大课题的关键，是能不能根据复杂的斗争环境机动灵活地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其实质就是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页。

模式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三大基本问题和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并指出，只有加强党的建设，亦即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掌握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他说：“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因此，在以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党的建设重大主题便显得极为突出。

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方面由于党从创立时起理论准备不足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极其复杂，另一方面则由于党处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包围之中，党员的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从而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等思想特征带进了党内，使党在处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时，极易犯“左”的或有的错误。毛泽东 1942 年 11 月 21 日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传统，但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一般来说，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容易表现为右倾，而当这种统一战线破裂时，又容易表现为“左”倾。最典型的的就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得离谱，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右得厉害。这种左右摇摆均表现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问题上，而究其实质，则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在毛泽东看来，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标准来衡量，叫嚷“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王明，其实是最不布尔什维克化的。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王明教条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逐渐被克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党的政治路线、斗争策略走上了正确轨道，党的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了民族战争的支柱，其政治影响愈来愈大。但是，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根源与恶劣影响仍然没有根除，王明直到 1940 年还在延安再版他“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造成不良影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学风、党风、文风还有些不正，“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建设重大课题依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特殊的环境还可更缩小到 1939 年以后的抗战艰苦阶段。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把进攻矛头指向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也采取了消极抗日与积极反共的政策，对解放区实行包围与封锁，屡屡发起反共高潮，甚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 1941 年至 1942 年，是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物质匮乏，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各种不利于革命斗争的思想倾向都有所抬头。这种艰苦环境所要求的是吃苦耐劳、大公无私、艰苦奋斗、服从纪律、同心同德等精神风貌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理想、个人主义、贪图享受、意志薄弱等不利于斗争的习惯倾向。为了对付这种恶劣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之一是强调自力更生，进行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2 页。

大生产运动，以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而另一个则是整风运动，以解决“精神问题”，这也是特殊环境下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与课题，所谓“延安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即是道德风貌与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斗争环境与艰苦环境，要使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并担负起艰巨而又复杂的政治任务，党的建设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重大课题。

## 第二节 建党理论的基本特征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如同中国革命一样，也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毛泽东的建党理论经过长期的探索而在延安时期臻于成熟。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或理论包括诸多方面，诸如党的性质问题、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等。这里不拟全面涉及，而只探讨一下毛泽东建党理论的特征。

### 一 思想建党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是严格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邓小平曾说：在建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列宁的建党理论主要是在同改良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在俄国革命的环境下形成的。列宁一方面强调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对于党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突出党的组织建设，强调集中与铁的纪律。注重组织建设是列宁建党理论的特征，苏联共产党长期坚持的观点是认为党的建设是研究“关于党及其组织建设的学说”，基本上反映了列宁建党思想的特点。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列宁建党学说的这一方面，诸如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但毛泽东建党理论的重心则移向思想建党，这是他的建党学说的首要特征。

如前所述，在一个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特殊环境中，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得发展，必须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打开大门。但如此一来，就使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这就在理论上产生一个矛盾，即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以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员组成，而在实践上也产生一个能否保持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列宁从党的政治纲领对于建党的意义的角度曾提示道：“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1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1~832页。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41页。

斯列波夫主编：《党的建设研究提纲》第1页。

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的话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并不只在于党的纲领的制定，而主要是揭示了党的性质与党员出身的区别。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但党的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处理好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的关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明显继承了列宁的思想，而又增添了思想教育的内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更明确地说：出身和入党不同，这是两件事，出身是农民，入党就是党员。但入党还有一个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只有思想上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因此，思想教育、思想入党就成为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或党的思想建设的原则，是在实践中逐渐确立起来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开辟农村根据地。面对红军和党员大部分出身农民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界党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家族观念、土客籍之间的不团结等问题，毛泽东向中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这表明毛泽东在特殊的环境下充分意识到农民成分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治任务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从思想教育入手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但由于当时严酷战争环境，事实上来不及从实践上贯彻这一思想建党的原则。因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甚至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重申并在实践上着手进行思想建党的问题。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他精细地分析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了种种纠正方法，而其要旨则归本于从思想上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亦即进行思想建党。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注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开始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基本特征。

迨至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思想建党的特色更为突出。延安整风，主要是整顿思想、或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亦即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延安整风时期所经常出

---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5页。

刘少奇：《论党》第1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现的两个对待性的词语。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论断，的确概括了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实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当然也包括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贡献）得到系统化，党的性质、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得到全面阐述，而思想建设则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从党的性质来看，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就规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号召“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无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这首先就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因而保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必须加强思想建设。从党的政治建设来看，如前所述，在特殊而又复杂斗争环境中，政治路线、政治策略的正确与否，关键是能不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就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需要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片面性、狭隘性、狂热性与急躁病。因此，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从组织建设来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党的组织建设的诸多问题，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干部路线与干部政策等，都有明确的论述。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要解决组织建设问题，要进行组织上的整顿，首先必须进行思想建设与思想整顿。他说：“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主要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因此，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就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思想教育置于首位。从作风建设来看，按照毛泽东的概括，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它们本身就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正是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在全党形成了著名的三大作风。

总之，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党内问题的焦点，被毛泽东和刘少奇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载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的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从而思想建党便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核心。

## 二 道德修养

与思想建党相联系，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强调道德修养，培养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特色之一。

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延安时期他强调的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早期突出的道德理想在新的基础上的改造和发扬。他那时强调精神之我，亦即精神之个人主义。在这种精神之个人主义中，容纳了“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履危蹈险、舍身拯人”的传统美德。正是从这种道德理想出发，他矢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尔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个人主义”的概念被他纳入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加以批判和抛弃，而其中所包容的高尚的道德理想则被改造为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而纳入无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并大力弘扬。于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道德修养的过程，所谓思想上入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道德修养。

这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毛泽东所写的《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代表作，贯穿的就是这一思想。他树立的白求恩、张思德形象（以及后来的雷锋精神）就是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化身。由于为人民服务被规定为党的宗旨，因此，通过道德修养而自觉地为为人民服务，也就能够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同时，党没有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为党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党性修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道德修养。

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毛泽东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诸如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国家而工作；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的热情；应当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忠于人民，忠于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等等。总而言之，毛泽东提倡“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而“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而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要求“完全”、“彻底”地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把是否为人民服务看作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志。刘少奇则更加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刘少奇：《论党》，第1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发挥了这一思想：“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

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规范，必须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和道德修养。毛泽东提出了“自我批评”的修养方法，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洗脸”和“扫灰尘”。要经常洗，经常扫，使党和党员的思想保持纯洁。实际上也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就是展开了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来看，进行自我批评与道德修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刘少奇则明确地把这种“自我批评”表述为道德修养：“要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

以这种道德修养为特征的党的建设理论，的确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述道德规范时，融入了一些传统的思想，在用语上也大量征引古代成语，诸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公无私”，等等。他的“自我批评”的修养方法，来源于传统的“省身”；他的“扫灰尘”的比喻，渊于“时时勤拂拭，不使染尘埃！”而刘少奇提倡的道德修养，则更是如此：“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进行自我修养。”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经过改造的：“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路线。”但无论如何改造，这种道德修养从内容到形式都吸收了传统伦理，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吴玉章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道：“我常常把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处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圣先贤所谓‘修己治人’之道相比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实行人类最高的道德”，党性修养“与古人慎独、毋自欺切合”，“我们共产党要消灭阶级的压迫，消灭民族的压迫，这正是中国古圣先贤‘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最彻底的忠恕之道。”

---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3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6～1097 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09 页。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诸葛亮：《后出师表》。

《吕氏春秋·去私篇》。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09 页。

吴玉章：《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载 1943 年 7 月 2 日《解放日报》。

以道德修养为特色的党的建设，不像其他国家共产党那样只从组织上清除出党为巩固队伍纯洁组织的方法。当然不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没有采用过这种组织手段，而是说它采取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教育、道德上的自我反省。这在具有深厚伦理传统的中国，其效果是巨大的。连邓颖超也说：“经过学习和对照，使我大吃一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在组织上入党十八年”，“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入党。”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大家“脱裤子”，亮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尾巴，不要害羞，“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从当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人的回忆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来看，表明当时共产党人对思想改造、自我反省、道德修养的忠诚，他们把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通过理性的自觉化为自愿的行动，把党内的复杂问题与矛盾化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把能否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与信念提到是否思想入党的党性修养的高度。这使得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无不诚心诚意地进行自我反省：“要知道灰尘是有的，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自己不觉得，懒去拂拭，将使灰尘越积越厚。自己不承认有灰尘，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灰尘，这是危险的。”“改造自己，使自己完全变个样，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不是件易事，要工夫深，火候到。‘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要达到“炉火纯青十二分”。这种道德修养的提扬，大概是延安整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 二重特征

思想建党与道德修养是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基本特征，但如果深入考察一下，则在这一理论的深层处，还存在一个致思趋向上的二重特征，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与高扬道德理想的伦理意志。这是毛泽东思维结构的二重性。把延安整风仅仅说成破除教条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或把思想建党仅仅说成道德修养，似乎都带有片面性。

从求实精神这一特征来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强调调查研究，矛头直指主观主义，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整风初起，还未点出教条主义的代表王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也只是有所暗示。1942年3月9日发表的《教条和裤子》的社论中说：“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吗？”

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王明教条主义根源就公布于众了。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他的求实精神。本书前章“实事求是的阐发”表明了这一点。在《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中，毛泽东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把“自由”限定为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而获得自由。显然，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伦理学上的自

---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81 年第 13 期。

《延安文萃》上，第 14 页。

《延安文萃》下，第 699 页。

《延安文萃》下，第 700 页。

《延安文萃》上，第 15 页。

由意志。要获得这种自由，不能凭主观热情与道德理想，而必须精细分析现实的必然王国。毛泽东说：“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要建筑中国革命这栋房屋，必须先有中国革命的总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乃是从国内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各国相互问的关系等复杂情形中分析而来的，“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塌糊涂的随意的主观愿望，“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延安整风，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破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鹄的，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因而又被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引导人们脚踏实地地去干革命，从而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从高昂道德意志来看，如前所述，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悬为高尚的道德理想，要求共产党人进行道德修养，树立起坚强的信念与意志，自觉因而自愿地把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在这里，高尚的理想与为这种理想而奋斗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作用在于，对于个人来说，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不计个人利害，不畏艰难险阻，自觉克服各种名利打算，成为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坚强的革命者，能够做到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丢；对于整个党来说，能够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能够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种高尚的道德意志力量将感召人民这个上帝，愚公移山，并不孤立，全国人民大众将与共产党人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对于全民族来说，只要党的作风正派了，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因此，道德修养，伦理意志的发扬，就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伦理意志的高扬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构成了毛泽东思维结构的双重特征，也是毛泽东建党理论的两个特点。对此，刘少奇揭示得相当清楚：“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标准。”

这种双重特征当然由特殊的历史环境使然。如前所述，特殊而复杂的斗争环境，所要求的是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革命模式。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要求根据实际状况制定既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85～486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86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8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11 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28～129 页。

联合又斗争的谨慎的统一战线策略，分析各种矛盾，利用矛盾，促使矛盾的各方面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同时，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游击武装斗争，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格局，必须充分了解判断各种复杂情况，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制定一整套的适合于敌强我弱形势的军事策略。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毛泽东充分展示出他的求实精神，并锤炼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些成为延安整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人数所包围的环境中，如何使党员在思想上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艰苦匮乏的物质生活环境，如何使人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这使毛泽东诉诸世界观的改造，道德的修养，伦理意志的发扬，高尚理想的信念，消除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观念，从而鼓舞人们的斗志，战胜不可想象的困难。而这事实上是极为成功的。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实践活动，使许多共产党人渡过了一重又一重的难关。

求实精神与高扬伦理意志的双重特征，实际上早已表现在青年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毛泽东成长于湖湘文化圈中。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一方面经世观念极重，崇尚实学；另一方面则是理学遗风，注重心性修养。后者使湖湘士人咬牙立志，不计名利。而前者则使他们脚踏实地，注重现实，不致陷入空谈心性的理学弊端。而这两个方面的学风在近代民族危机下，指向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救亡图存。从王夫之到谭嗣同、杨昌济，这些传统一以贯之。在杨昌济的引导下，这种文化因素深深内化在青年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他在那时就表现出求实精神与发扬心力的二重趋向。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特殊的环境更加强了这两个方面，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求实精神被表述为实事求是，心性修养与心力被表述为世界观的改造和主观能动性。这两方面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处于制衡状态，而在革命实践中则获得了互补的效果。惜乎晚年失衡，强化一面而弱化了另一面。

### 第三节 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与强调思想建党与道德修养相联系，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了延安整风这种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通过延安整风，理清了历史是非，党员的思想得到改造，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起来，思想也高度统一，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 一 整风运动

毛泽东把党内矛盾主要看作是思想矛盾，认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刘少奇也指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由于把党内矛盾主要看成思想矛盾，而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只能是开展思想斗争，即无产阶级思想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1页。

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是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于思想建党原则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实际是整风运动的雏形。但那时毛泽东虽然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然而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一方面大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照搬苏俄模式，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手段处理党内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找到了适合于思想斗争的整风运动形式。当然，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从主观条件来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策略得到系统阐发并在实践中为全党所接受，马列主义著作开始大量翻译。从客观条件来说，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不大，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虽然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这反而使毛泽东等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应付这一环境。因此，上述主客观条件使毛泽东等人有可能认真清理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发轫于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于1945年4月的六届七中全会。但在全体干部与党员中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则是1942年2月从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开始，到1943年10月。整风运动的过程与内容在此无须赘述，这里只拟述说一下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实行思想建党原则的一些方式。

一是学习。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且必须着重致力解决的大问题。而所谓学习，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1年5月，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学风问题，纠正理论上脱离实际的毛病。1942年2月，他又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继续强调学风问题。

毛泽东倡导学习和学风，在高级干部与全体党员中引起巨大反响。1939年2月，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理论、学习历史的运动。从1941年起，中共中央不断发布有关学习的决定，并指定学习文件。这种学习，一方面旨在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注重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因此，学习文件中有《整顿党的作风》的学风部分、《〈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学习又旨在提高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对照学习文件，检讨自己思想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因此，指定的学习文件中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反对宗派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主义的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

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然党内矛盾主要是思想矛盾，党内斗争是思想斗争，就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通过说理和自我检讨，使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与人为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混淆党内思想矛盾与敌我阶级矛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同志。其结果不仅伤害了党内不少优秀干部，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而且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说：“我们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认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又被表述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亦即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一方针指明了应把团结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又把批评作为解决思想问题、工作错误以达到团结的手段。在这里，批评在手段上就区别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既和风细雨，又不掩盖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斗争手段本身成了目的，而批评则以团结为目标。毛泽东把党内团结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与重要基础。在他看来，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都应讲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党内更应该讲团结。只有通过“团结——批评——团结”，才能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建设一个巩固的有战斗力的党。

整风运动发展到1942年12月，开始了审干运动，其目的已不是解决思想矛盾。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说，抗战以来大批人入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忽视了。他指出，整风运动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大多数党员是这种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从而有审干运动。应该指出，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在国民党特务加紧活动的条件下，审查干部还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对敌情作了过分估计，把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也怀疑成反革命问题，甚至采取“逼、供、信”的方法，从而使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偏差。后来康生发起“抢救失足者运动”，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这就违背了“治病救人”和批评团结的宗旨。

三是科学地分析历史是非问题。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弄清历史是非，毛泽东用了半午时间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随后又在1942年10月编印了《六大以前》，提供给干部学习，认真总结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弄清“左”右倾错误的实质与根源。为此，毛泽东随即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检查，1943年10月，又重新回到历史问题与党的路线问题的总结上来。由于通过三风的整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深入人心，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为全党所认识，这就为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结论提供了条件。

对于党的问题的总结，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讲演中，提出了科学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李立三错误的斗争，这是应该的。但其方法上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这样“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

总之，延安整风采取学习、团结——批评——团结和科学地总结历史是非问题的方式，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这是毛泽东创造的区别于别国共产党单纯从组织上清洗党员以纯洁党组织的政党建设的独特方式，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

## 二 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

整风运动与历史问题的总结，使全党深切认识到了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完全取决于这种结合的深浅程度。而毛泽东作为这种结合的突出代表，其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开始提出并得到阐发，而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再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在这个基础上，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同时，王稼祥还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实质有所揭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得到传播和广泛运用，在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谈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载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

话中，不断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如1943年12月，邓小平在北方局的两次会议中，就明确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作进一步规定和准确阐述的当推刘少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的这一论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特征，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长过程。同时，刘少奇还在报告中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和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这一理论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只能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创造出来。刘少奇还概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认为它表现在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以及许多党的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特别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这个极为特殊的革命环境中的艰难性，“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种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随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阐发，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的理解，做为这一“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逐渐为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同月，中共中央总学委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要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与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年8月，周恩来在演说中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0页。

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这是中共中央一些核心领导人明确表示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在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倾向。1943年8月，晋察冀边区在一份《一年来宣传工作的检查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文件中，指出我们不但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依据，而且要以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我们思想建设的指南。1943年12月，邓小平在北方局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他说：“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1944年1月至10月，晋察冀分局聂荣臻等人在讲话或报告中，以及该局在为出版《毛泽东选集》所写的《编者的话》中，都明确地提出，要在党内外广泛持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七人参加起草的，经过了多次修改，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的精心修改。这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把历次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对比，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个方面，系统阐发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学说应用于中国环境，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议最后指出：“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个历史决议，为毛泽东思想正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因此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并获得通过。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它使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加速了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历史进程。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5页。

## 第十六章 两个命运的较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但是，近代中国社会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则相反，代表着中国的黑暗前途。围绕着中国的两个命运、两种前途，武装的革命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 第一节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中国的先进仁人志士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外反动派殊死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 一 独裁政治与反独裁政治的斗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永远摆脱了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奴役的历史，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多种矛盾纵横交错的矛盾体。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只是解决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使中国的独立发展成为可能或现实；而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斗争的焦点，就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与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在抗战胜利后提上了中国社会的主要议事日程，但是，这种矛盾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或者说在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前早就开始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是中国现代社会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大政党。自从两党对峙时起，就代表着中国不同命运和前途。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中国不同命运、不同前途的斗争。如果说，在孙中山组建国民党时，或者说在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时，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党的话，那么，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新老右派的掌权，国民党就逐步失却其革命性。如果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还有某些共同之处，那么，也随着国民党逐步失却其革命性而变得尖锐对立。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国民党从整体上背叛革命，走向反动，尽管国民党内仍不乏宋庆龄、何香凝等主张革命的著名人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开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殊死斗争，实际上就是中国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斗争。至抗日战争爆发，围绕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整整进行了10年。尽管蒋介石施展了浑身解数，但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中国共产党却代表现代中国的发展

方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蒋介石在中国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并没有完结。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共同面对着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在举国上下呼吁抗日的强烈呐喊声中，国民党不得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从维护民族大义出发，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是被迫的，是迫于全中国人民的压力和呼声，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是竭尽全力消灭共产党。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味地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一片大好河山拱手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只是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汇集成的西安事变的爆发，才迫使蒋介石走向抗日的战场。尽管在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内不乏值得称颂的抗日将领和爱国志士，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抗日赞歌，但蒋介石却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不仅企图借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共产党，而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亲自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自己躲在峨眉山上，将他的军队集结在西南一带，以保存实力。而当抗日战争行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抗日战争行将取得胜利时开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即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表现为国民党蒋介石鼓吹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的斗争。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3年2月，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歼灭德军精锐师团33万人。这次战役成为苏德战场的转折点。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也扭转了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开始反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便加紧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它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革命根据地“为变相割据”，叫嚷中国“今后的命运全在内政”。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宣布，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和英美“友好平等相处”的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反动派却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1943年6月，蒋介石秘令胡宗南召集反共军事会议，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先头部队便开始向陕甘宁边区寻衅，企图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为了反击蒋介石国民党在思想领域掀起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流，粉碎蒋介石企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对《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批判，并且向社会各界呼吁团结，共同制止内战。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1943年夏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糟粕来推行其法西斯统治的实质；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浴血奋战是人所共知、人所共见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

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建立民主的自由的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3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毛泽东首先列举国民党撤离对付日寇的河防军队围攻陕甘宁边区的事实，尖锐地说明“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己。其次，列举大量的事实，深刻说明蒋记国民党“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蒋记国民党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蒋记国民党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蒋记国民党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保卫河防，蒋记国民党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反共，蒋记国民党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蒋记国民党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毛泽东最后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等文件，用铁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已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危害国家的种种活动。与此同时，解放区的军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活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国民党部队的试探性进攻。中国人民的反内战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苏、美、英等国政府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从而，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浪潮还未来得及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犯时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下来。

尽管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浪潮被制止，但是，国民党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实行法西斯统治，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意义上的改革。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又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声言国内问题将实行“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接着，国民党又操纵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同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反对共产党的决议案。

鉴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主张，1943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评论一文首先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国民党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什么是第三种方向呢？毛泽东指出：“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6页。

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

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争取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目前国际条件也有利于实行这种方针，只是国内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毛泽东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评论一文还列举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针对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提出的国共关系要“政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不过，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只是“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共关系问题要“政治解决”的虚伪性，以及“准备实行宪政”的欺骗性，但是，为了维护民族大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团结和合作的诚意，表明对国共关系问题“政治解决”的积极态度，1944年1月，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明确表示中共愿意派出代表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94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派出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在延安重开谈判。5月17日，林伯渠又飞抵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蒋介石执意地奉行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的斗争，仍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面临的严峻任务。

## 二 独裁政府与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治，其目的在于抗战结束后，建立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府。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的斗争中，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从1944年春天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日伪军作战的局部反攻。1944年在局部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共一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0余万人，俘虏日伪军6万多人，争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1~92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6~92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6页。

《毛泽东选集》，第918页。

《毛泽东选集》，第921页。

取伪军反正 3 万多人，解放人口 1700 多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已成为中国整个战场实行战略反攻的主力。而国民党领导的部队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在作战中完全丧失战斗力。1944 年 4 月至 11 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沿平汉、粤汉、湘桂路发动了河南、湘桂等战役，国民党反动派百万大军望风而逃，造成抗战以来又一次大溃败，损兵五六十万，使约 2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140 余座城市、6000 万人民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国民党对日作战的军事斗争节节败退，但其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却日益加强。国民党在蒋管区推行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以“中统”和“军统”为基础，建立了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大量的监狱和集中营，并与美帝国主义勾结，成立了法西斯特务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囚禁和屠杀，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削殆尽，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经济上，蒋介石集团打着“抗日”的招牌，大发国难财。四大家族穷奢极欲，巧取豪夺，而广大人民却痛苦不堪。

在这种形势面前，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彻底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责国民党拒绝民主，排除异己。鉴于国民党的统治危机，鉴于国内各界人士日益高涨的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的呼声，中共中央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 年 9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林伯渠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法西斯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又书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10 月 10 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各界人士纷纷撰文，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0 月 10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在社会各界迫切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呼声中，国民党被迫与共产党再度举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以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为使命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赫尔利来华后，也参加了国共两党的谈判。1944 年 11 月 7 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带来了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文件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等。这样的规定，实质上是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保留毫无战斗力的国民党军队，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毛泽东看了这个文件后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

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中国需要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天会谈。通过会谈，赫尔利也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且还与毛泽东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战的武装力量，公开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协定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在协定上签字作证时还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

然而，蒋介石却拒绝这一协定，认为这些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赫尔利也不仅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而且为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出谋划策，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当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由于赫尔利的支持，蒋介石更加顽固地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拒绝实行任何民主改革，并且还当着周恩来的面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1945年4月，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除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极力替蒋介石主张召开的“国民大会”捧场外，还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对于赫尔利的行径，毛泽东曾予以严正警告：“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撰写了《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新华社评论，尖锐地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为了系统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政治统治，批驳蒋介石的所谓《中国之命运》一书所阐发的观点，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严正立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向中国人民指明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底至6月中旬在延安隆重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

---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5页。

运。”蒋介石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一党专政，宣扬法西斯统治，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另一种中国之命运”，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命运，因此，“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针对蒋介石鼓吹一党独裁专政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长篇报告，写出了一本精辟阐明光明中国之命运的书。毛泽东指出：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应顺应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反映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并且，由于国内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和强大的解放区以及国际上法西斯力量行将被消灭而反法西斯力量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有利形势，中国人民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了。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特别是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奉行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即“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党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摆脱殖民地命运，获得独立的命运的斗争，只有获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才谈得上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但是，即使夺取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因为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和外国的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希望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希望实现这个前途。“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方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更有信心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毛泽东强调指出：“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4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3页。

人民的伟大任务。”

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这个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论联合政府》把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具体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论证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必要性。

毛泽东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人，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只有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所阐述的观点，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所主张的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所争取的是中国的光明前途。《论联合政府》一文，不仅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对于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该文中所系统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论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组织原则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成果，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即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的中心议题是两个：一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动员国民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内战，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在5月18日的大会讲话中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国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国民党六大与共产党七大是代表着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会。这两个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 第二节 内战与和平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围绕着和平与内战而展开。毛泽东等人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战略与策略，审时度势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即贯彻执行党的七大确定的路线，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6~1067页。

针对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下放松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在策略问题上，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及时地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蒋介石企图发动的内战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粉碎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得了有利的地位；及时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建立独立、自由、统一和民主的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一 揭露内战阴谋

1945年8月11日，即日本政府接受投降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其猛烈的，有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内战。中共中央要求解放区部队和人民，“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泽东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历史、现状及将采取的方针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首先，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动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在抗日战争过程中，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从峨眉山上下下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要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来打内战了。总之，“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定了，并且又由于不要打内战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要打内战的力量，因此，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

其次，毛泽东阐述了我们党对于蒋介石的内战的方针。一方面，“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毛泽东既分析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性，又指出了“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人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3～112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

不赞成内战。”由于上述原因，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要采取坚决反对内战的方针，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内战作好相应的准备，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方针，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都曾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但是，“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我们要“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与蒋介石斗争的策略。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权利是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对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总结了1927年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强调指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好，不要像陈独秀。”“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在这篇演讲中，毛泽东还概括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面临的两个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形势，明确指出：“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其目的是准备内战。毛泽东反对内战的斗争也随着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而展开。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求降照会后，朱德总司令即发布命令，命令日本侵略军及其伪军向人民军队投降。但是，蒋介石倚仗美国的支持，企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8月11日，他连续发出三个命令，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各地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除经蒋介石许可外，“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针对蒋介石的三个命令，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发表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新华社评论。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113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页。

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蒋介石叫日本人缴枪给他，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流、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这就是蒋介石叫八路军“驻防待命”的实质。毛泽东在评论中呼吁，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应与解放区的人民一致起来，坚决制止蒋介石企图发动的中国内战。同日，毛泽东还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拍了一个电报，揭露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的反革命面目，号召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且电报明确表示坚决拒绝蒋介石于11日要求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发言人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针对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8月16日，毛泽东又发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新华社评论，明确指出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毛泽东在评论中，再一次阐述了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一贯的。“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经过他的发言人，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以为这样做就找到了反对共产党的借口，其实这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在中国，谁都知道人民的公敌是蒋介石。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是真正坚决反对内战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蒋介石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指出，尽管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一贯的，但是要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也完全是办有办法的。这就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毛泽东在评论中，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

同日，毛泽东又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拍了一个电报，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总之，只要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一露端倪，毛泽东就给予及时揭露和无情斗争，唤醒了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内战危险的觉悟和警惕，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创造了条件。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8~114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4页。

## 二 粉碎“和谈”骗局

抗日战争结束后，尽管蒋介石的内战方针经过了长期准备，但是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面临着重重困难。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演中提到的三个方面的困难外，蒋介石要发动内战还面临如下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呼吁和平，坚决反对内战，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斗争；二是“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这对蒋介石也是一种牵制；三是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战后期均远离抗战的战场，集结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军队不能一步到位，调兵遣将尚需一定的时间。

正在这时，即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唯一合法政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承认。早在条约签订前，斯大林在与宋子文、王世杰的会谈中，就曾向宋子文建议：“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宋子文深深懂得了国共和谈的重要性，当即电告蒋介石。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电告中共中央：中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共应与国民党谈判，寻求维护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给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美蒋反动派认为，苏联的政策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可以用来束缚中国共产党的手脚，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苏共指示中共屈服，并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中共就会照办；如果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则只要美国支持国民党并给予援助，国民党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

据此，战后初期尽管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和援蒋反共，希图建立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亲美的政府，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但是在策略上，美国政府却采取了两面性的手法。一方面采用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援助蒋介石，通过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名义，命令日本政府和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并且大力加强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帮助国民党把大批军队运送到内战前线，从而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以曾经共同作战的盟国身份，在国共两党之间充当“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调停者。美国政府充当调停者，是希望中国共产党重蹈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覆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共产党坚持国内斗争，至1944年9月法国本土解放时，法国共产党拥有100万党员，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武装，解放了大半壁河山的国土，还领导着全国半数以上的各省解放委员会。形势十分有利于法国共产党和法国人民。但是以多列士为首的法共领导人却推行一条“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在国外坚持斗争、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代表戴高乐谄媚奉承，百依百顺。法共多次声明，领导权应归于戴高乐，并愿意在戴高乐领导下重建法国。多列士交枪让权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捞了个一官半职，却断送了法国革命的前途。意大利共产党也是如此。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

亚蒂同多列士一样，醉心于议会，迷恋于入阁作官，尽管暂时捞了个一官半职，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和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却丧失殆尽。美国希望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因此也积极地敦促蒋介石运用政治谈判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在美国政府的导演下，蒋介石也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政策，戴上了谋求和平的假面具。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对于蒋介石的和谈阴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和谈，他们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罪名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同意和谈，他们就可以利用和谈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目的；如果和谈阴谋不能得逞，则也可以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内战。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是，由于这时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国际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日益加强；由于蒋介石集团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他调兵有困难，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经过我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路。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用实际行动粉碎蒋介石的“和谈”阴谋。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确定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方针。8月23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同确定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向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意愿，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以维持国内和平，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方针明确规定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人民利益的立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原则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为保证和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并且提出了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而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立即采取的六项紧急措施。8月25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了“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建国方针，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这一建国方针，宣言提出了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避免内战和实现政治民主的六项紧急措施：“（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

---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73~674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74页。

《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阅读文件选编》，第335页。

军。（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这六项措施的提出，确定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原则立场和内容。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及这六项措施以宣言的形式公之于众，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为夺取和平谈判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阐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并对和平谈判后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提出了对策。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必须取得党内全体党员的理解和支持。为此，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向全党阐明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必要性，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行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因为，“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毛泽东要求全党做好精神上的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后，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使全党做好了对付国民党蒋介石和谈阴谋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在完成各项准备后，于1945年8月28日以惊人的气魄和胆略，偕同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毛泽东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和谈阴谋的彻底揭露和否定，同时又是一个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的和谈是一个幌子，事先并没有对谈判进行认真的准备，因而在谈判过程中处处处于被动地位，而毛泽东则处于主动地位，他从历史到现实，深刻批评了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阐明了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

由于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由于解放区战场及时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的地位，这次谈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就迫使蒋介石

---

《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阅读文件选编》第33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115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

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另外，“双十协定”还就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民主自由；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达成了协议。这些都是这次会谈取得的重要成果。然而，正如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毛泽东的重庆谈判之行所签订的“双十协定”尽管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随时可以撕毁，后来的事实也是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但是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迫使蒋介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第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和平建国的诚意，争取和团结了广泛的和平民主力量，特别是争取了中间人士。第三，揭露和粉碎了蒋介石的和平阴谋，击破了蒋介石宣布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并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这样，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总之，毛泽东的重庆之行，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更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更处于不利的地位。

### 三 击退军事进攻

与蒋介石谈判，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采取自卫立场，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这就是毛泽东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的主要内容，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避免内战、争取和平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早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仅靠和平谈判，靠谈判作一些让步，这实现不了和平，也不可能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毛泽东就阐述了这个观点：“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中国共产党靠坚持严正自卫的立场，凭借自己的力量，迫使蒋介石结束十年内战，一致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坚持严正自卫的立场，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挑起内战的三次反共高潮。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避免内战，实现和平，也必须坚持自卫的立场，力争坚决、果断、及时地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蒋介石的内战准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主要体现在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上。抗战结束时，华北、华东、华南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特别是华北解放区，兵力占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华北解放区又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依托华北解放区，既可以向北发展，创建东北根据地；又可以向南防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1页。

御，支持中原和华中解放区军民的斗争。蒋介石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华北解放区的战略意义，因而他制订的战略计划也是重点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干线，以分割和压缩华北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出兵占领全东北。华北解放区便成为国民党向共产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军事进攻区。截至 1945 年 9 月上旬，国民党从西南、西北调往内战前线的 37 个军 73 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就用于进攻华北解放区。

蒋介石的和平谈判是假的，而军事进攻、发动内战才是他的真实意图。这一点他在 1945 年 9 月 20 日的一份密电中表露无遗：“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间，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蒋介石的这一战略意图，在接受蒋介石的和谈要求、去重庆谈判前，就要求全党做好反击蒋介石军事进攻的准备，“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针对华北解放区面临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强调指出：“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应巩固华北的有利形势，“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

重庆谈判开始后，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则针锋相对。9 月初，傅作义部奉蒋介石的命令沿平绥路进攻察哈尔解放区，贺龙、聂荣臻领导的晋绥、晋察冀部队则奋勇反击，粉碎了傅作义部队的进攻。9 月下旬，阎锡山派遣 3.8 万人的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进攻晋东南解放区的上党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奋勇反击，歼敌 3.5 万人，阎锡山部队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既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又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

“双十协定”签字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协定办事，将江南新四军撤离北上，以表明自己的诚意。然而，蒋介石却于 10 月 13 日发布内战密令，命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0 月下旬，国民党孙连仲部三个军侵占解放区磁县和马头镇，并向邯郸进攻。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部队展开反击，将其包围。30 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31 日，其余两个军也被迫放下武器。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4 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冀南解放区的进攻。11 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制订了对解放区的全盘作战计划。仅 12 月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达 120 万，内战遍及 11 个省。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严正的自卫立场，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不但没有得逞，反而酿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的高潮。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纷纷发表言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美军。学生还举行罢课。1945 年 12 月 17 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也发表公报，要求中国制止内战。美国

---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3 卷，第 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5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5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53 页。

政府还表示将在最短时间内撤退驻华美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颁布了停战令。历史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观点：只有坚持严正自卫的立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才能避免内战，争取和平。

### 第三节 土改与统战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蒋介石又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两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在“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先后达成后，人民曾怀揣着一种和平希望，以为内战从此可以制止，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毛泽东也曾一度设想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到来。但是，对蒋介石的历史和现状、战略和策略有着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并没有陷入和平发展的幻想，并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而重蹈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覆辙，而是始终保持着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警惕。因此，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进行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中，即在进行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时，也在进行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

#### 一 重提自力更生

蒋介石发动内战，是倚仗他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经济上，他不仅向人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以损害人民利益服务于他的军事斗争，而且还有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却相反，只能靠自力更生，组织解放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经济上作好对付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

坚持自力更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方针。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毛泽东号召人民坚持自力更生，打败日本侵略者。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面临蒋介石依仰美国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支持而发动内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

战的危险，毛泽东又重提自力更生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演讲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毛泽东又提出：“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

由于毛泽东认清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强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党便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实施了正确的经济政策。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确提出了减租、生产、练兵三大任务，毛泽东并强调，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只有普遍地实行减租，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广大农民群众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军队的需要，才能打好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长期斗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要求全党提高对开展减租运动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强调指出：“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有力地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各解放区军民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增强了反对蒋介石军事进攻的经济基础。

## 二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农民是天然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调动农民参加战争的积极性。

毛泽东从领导战争起，就非常注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一整套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耕种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结束后，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卫解放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又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能否实施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关系到人民解放战争的成败。

#### （一）土地改革的政策和策略。

1946年，随着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各解放区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一些解放区还通过清算霸占、清算不合理负担等办法，开始直接从地主手里获取土地。为了支持广大农民的正当要求，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所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五四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五四指示”还规定了指导这一群众运动的各项原则：“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所区别，要保护工商业，适当照顾开明绅士等。“五四指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解放区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已由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五四指示”下发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

但是，“五四指示”仍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宣布无偿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是规定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因而作为农村中根本封建制度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完全触动。由于各地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不一，政治觉悟不一，而做法也不一。一些解放区已经超出“五四指示”的政策规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沉重地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使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而一些解放区则机械地执行“五四指示”，对农村封建势力打击不力，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另外，也有一些解放区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为了及时总结经验，制定更加符合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需要的土地改革政策，1947年7月至9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就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制度，打击了农村

---

《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阅读文件选编》第339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39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39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39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45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篇》第345页。

中的封建势力，顺应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

《中国土地法大纲》具有重要的反封建的革命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下举起的一面废除封建制度的战斗旗帜，对于推动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正式公布这个大纲。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希望各地在执行这个大纲的过程中，制订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然而，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农村封建制度的根本变革，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广大工作人员又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而在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划定农民的阶级成分上，没有掌握正确的划分标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重印1933年由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以指导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时，毛泽东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也及时地提出了纠正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避免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解决土地改革工作中具体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前进，使之跟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步伐，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作了明确的规定：

1. “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强调指出，这种带头作用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而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毛泽东针对一些地方提出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明确指出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受压迫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等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 “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划定中农成分，划错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必须纠正在农民代表和农会委员中排斥中农及在土地改革中将贫雇农与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

3. “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毛泽东强调，要继续执行“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

4.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予以适当的处置。”

5. “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院审处。”

6. “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

7. “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

8. 土地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不应过分强调去平分地主的其他财物。

9. 对待地主和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

10. “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

11. 对极少数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院判决执行枪杀是必要的，但“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运动中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 （二）土地改革运动总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导，是正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理，总结中国土地革命实践的经验，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总路线。

毛泽东领导土地革命伊始，就重视制订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在井冈山时期，他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但限于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系统的土地革命的总路线。经过几年的实践，土地革命政策几经修改和完善，便形成了一条符合当时实践水平的关于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这条路线作了概括。他说：“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这条正确的路线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后又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执行。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127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127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1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

在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各解放区认真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方面要求制订出一条正确的路线加以指导；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使得有可能对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作出新的概括，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毛泽东及时总结土地革命运动中的实践经验，在中央“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为我党制订了一条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总路线。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中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为此，毛泽东规定了我党土地改革的方针。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毛泽东强调，贯彻这一方针，要“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并对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内容作了全面的阐述。毛泽东说：“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总路线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土地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最完整的表述，阐明了土地改革的基本力量和团结力量、土地改革的对象、目的和任务，以及有步骤、有区别、分阶段地去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等等。

关于土地革命的基本力量。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早在20年代，毛泽东就认识到了贫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贫农和雇农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70%左右，“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农村的基本革命力量。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其革命作用仅次于工业无产阶级。因此，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毛泽东紧紧地依靠贫农，从而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土地改革的团结力量。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团结中农的问题，是一个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131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中农占农村人口的 20%，不仅是一支必须团结的力量，而且也是一支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解决团结中农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各地在平分土地时，必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关于土地改革的对象。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毛泽东将土地改革对象的范围划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从政策上明确了打击的目标，避免了打击过宽的现象出现。

关于土地改革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还有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贫雇农和某些中农的正当要求得到了满足，就实现了土地改革的任务。

关于土地改革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也就是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到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作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土地改革的目的，但不是最终目的，毛泽东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毛泽东强调指出：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就应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上来。“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是一项艰巨而极其复杂的斗争。因此，他强调要有步骤、分阶段、有区别地进行。“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5 页。

毛泽东制订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以及他对贯彻这条总路线的具体方针、政策、步骤的阐述，为我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随着土地改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被打破，解放区广大农民焕发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他们不仅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踊跃参军参战，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可以说，农村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 三 统战策略的新发展

毛泽东一贯重视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总结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明确将统一战线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的方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同时，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发挥到了很高的水平，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又有了新的的发展。

（一）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为巩固和发展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而奋斗。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在7月20日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为了达到与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的目的，毛泽东对在农村和城市应该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毛泽东指出：在农村，应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对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同汉奸、豪绅、恶霸应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主要放宽些”，以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减少敌对分子。在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坚决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自觉地行动起来，与人民解放军一道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至1947年1月，人民解放军就取得了歼敌正规军56个旅的重大胜利，“被歼灭的大量伪军和保安部队，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未计算在内。”人民解放军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军事进攻。而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美蒋勾结而发动的全面反革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命内战本来就持反对态度。国民党蒋介石在全面内战中大量地损兵折将后，为了补充兵员，又在其统治区内强迫征兵；为了维持它的军事进攻，又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又残酷地迫害人民。这便更加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从而广泛地掀起了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反对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而掀起的学生爱国运动和以反对国民党残酷镇压而掀起的上海摊贩的斗争，将国统区人民群众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国民党蒋介石不仅在军事进攻中受到打击，而且在政治上也陷入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认为，“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

“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依据对国内革命形势的科学分析和估计，于1947年2月1日起草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指出：“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 1. 关于团结中农的问题。

团结中农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问题。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就初步提出了团结中农的思想。党的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也坚持了团结中农的方针。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

为了解决团结中农的问题，毛泽东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明确规定：一是要正确地划定中农的成分，“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划错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12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尽可能退还”。二是在土地改革中，“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在平分土地时，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如果中农不赞成平分，“则应向中农让步”。三是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农会和乡区政府的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毛泽东还把“巩固地团结中农”列入我党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中，从而保证了占农村人口 20%的中农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巩固的统一战线。

## 2. 关于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问题。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既有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对革命的一面。毛泽东在 20 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美蒋勾结发动的全面内战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和民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在政治上给中国共产党以相当的帮助，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

为了巩固和发展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不仅一再强调要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而且于 1948 年 3 月 1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规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都属于人民大众的范围，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并且，“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团结他们。

为了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是：一是在政治上，对于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效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则予以打击；对于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二是在经济上，“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

为了团结和争取开明绅士，毛泽东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是：一是“毫无例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7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28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289 页。

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二是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分别情况，予以照顾”。三是对于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吸收或“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

### 3. 关于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

毛泽东对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将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也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毛泽东指出：“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党对于知识分子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中，还将“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列入劳动人民的范围。

### 4. 关于分化地主阶级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

封建地主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毛泽东对农村中的封建地主阶级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一是强调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地主这个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这个人，在分配土地时，也分给地主与农民同样多的土地。二是保护和鼓励一般地主、富农发展工商业。三是鼓励地主、富农参加生产劳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地主、富农，视其表现而适时改变其成分。这就将中国革命的敌对势力减少到最低程度。

由于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动员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在内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奠定了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提出来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了中坚作用，但由于国民党在力量上居优势，因而占据了形式上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尽管国共关系的中心仍是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的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也是争夺领导权，但在公开宣传中从不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也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代之以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从政治上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7页。

把握团结抗日的大方向，使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抗日战争后期，即抗日战争行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以便在此基础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自始至终地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1947年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还提醒全党要牢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放弃领导权和抗日战争初期党内错误思潮的教训，要坚持对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还就如何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以共产党实现对中农的领导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首先，共产党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争取胜利，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者虽有斗争而没有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其次，在土地改革中，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再次，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再其次，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就不能实现对中农的领导。“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是如此。”

由于毛泽东制订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实现了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和有力的领导，从而不仅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创造了条件。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 第十七章 伟大的战略决战

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斗争是分两条战线进行的。一条是思想政治战线。主要是解决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即解决什么才是光明的前途，以及应该怎样去争取光明的前途。一条是军事战线。军事是政治的手段和后盾，敌我之间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最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也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解决。因此，军事战线的任务，主要就是怎样实现光明的前途。毛泽东正确领导了这两条战线的斗争。在思想政治战线上，毛泽东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相继粉碎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为对付蒋介石的全面内战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了充分的思想政治准备。在军事战线上，毛泽东充分依靠全国人民，集中全党的智慧，发挥自己卓绝的斗争艺术，从实际出发，从敌情出发，制订了彻底打败蒋介石的军事战略和策略，成功地领导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 第一节 “纸老虎”策略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完成全面内战的准备后，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于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的形势，确立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方针。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从思想上、精神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作坚决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 一 “纸老虎”策略的形成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论断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口号。它的提出虽然是在1946年8月，但这个论断的内容早就蕴含在毛泽东的思想中。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对革命的悲观情绪而写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蕴含着这一论断的内容。当时正值革命处于低潮，而反革命的力量却异常强大。毛泽东提出了科学地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方法，即“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依据这一方法，提出中国革命“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很快的”。而反革命的力量看起来很强大，但从实质上分析，“也是相对地弱的”。中国革命很快会走向高潮。毛泽东还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展示了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信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反动派。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针对错误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而写成的《论持久战》一文，也蕴含着这一论断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尽管强大，但“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并且它所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已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而中国虽然是弱国，但正处于进步，“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并且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已经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只要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战，日本虽强，但将愈战愈弱；而中国虽弱，但将愈战愈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分析和预见。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阐述了一切反动势力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人民大众的进步事业必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指出：“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1942年10月，苏联红军粉碎了德国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在为庆祝这一胜利给《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社论中，又明确指出了反动势力外强中干的实质。毛泽东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704页。

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世界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消亡，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并且毛泽东提出的反动势力“外强中干”的看法已经很接近他后来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的内容。

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提出美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1945年8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演讲中，明确提出：“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在谈到原子弹时，毛泽东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论断时，同样有类似上述的论述：“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属于人民。”“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从以上的摘引和分析来看，毛泽东一贯坚持这样的观点：真正的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进步一定能战胜落后；革命一定能战胜反动；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新生的事物一定能战胜腐朽的事物。同时，我们也看到，毛泽东一贯把进步、革命、正义、光明及新生事物等联系在一起，而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总是把落后、反动、邪恶、黑暗及腐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认为是必然要失败或灭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并不是毛泽东一时的思想火花，而是他的一贯主张，或者说是他思想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4～88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11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 二 纸老虎论断的战略意义

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气势汹汹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和阐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军事力量方面：国民党拥有正规军和非正规军达 430 万余人，居绝对的优势；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不过 120 万人，居绝对劣势。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后期集结在西南西北各省，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而得到了充分的休整；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处在抗日战争的最前沿，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而未得到完全的休整。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方面：国民党军队拥有“飞机加坦克”的现代化兵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从日伪军手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重新控制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运输线，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3 亿以上人口及丰富的物产资源；而共产党部队的装备是“小米加步枪”，装备简陋，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开始，后方并不巩固，内有封建反动势力尚未肃清，外遭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在外援上：蒋介石背后站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而共产党没有外援，只有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道义支持。

由于国民党军队拥有上述方面的绝对优势，所以蒋介石狂妄地叫嚣：“只需三个月至六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

面对这种严峻的战争形势，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国内外、乃至中国共产党内部都有一些人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人民革命的力量，只看到美蒋反动派表面上的进攻优势，而没有看到反动派的本质，从而对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缺乏信心，缺乏用革命战争去粉碎反革命战争的勇气。针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从战略上武装人民，使人民树立必胜的信心。毛泽东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首先就具有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我们能够打败他”的战略意义。

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我们不打败它们，而让它们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阴谋得逞，那么，中国就将处于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之下，“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所以，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争取光明的前途。

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的军事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起暂时作用的因素。而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则是起经常性作用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卫战争，是爱国的和正义的革命战争，必然会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战争，必然会遭到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尽管蒋介石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86 页。

石在军事力量上居优势，“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尽管蒋介石拥有装备上的优势，甚至背后站着唯一拥有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但是，“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卫战争，虽然“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高了中国人民对于美蒋反动派的本质的认识，使中国人民增强了战胜蒋介石的信心。

## （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既是一个战略口号，也是一个战术口号，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的认识，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从其本质上说的，是从长远的观点说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强大的美蒋反动派，必须做好与之作长期斗争的战略准备，应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是，从战术上说，美蒋反动派暂时确实强大，是一只真老虎，不仅能吃人，而且能成千上万地吃。如果中国共产党不重视它，它就有可能吃掉整个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战术上要重视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在与美蒋反动派的斗争过程中，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斗争形式上，都要取谨慎的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条件，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和消灭敌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后来又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详细地阐发了这一论断。毛泽东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被人民所推翻。”一切反动、落后、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都有两重性。一方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但是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这是历史事实。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时期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4—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毛泽东在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时所采用的策略。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就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1946年6月，当蒋介石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发动全面内战时，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我们能够打败他。”这就从战略上表现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藐视。但是，在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上，毛泽东一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亲自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党内指示。这就是从战术上重视敌人。

1948年1月18日，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毛泽东又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开篇就指出：“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的战略战术，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是坚定地相信人民、坚定地依靠人民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依据自己制订的战略战术，正确领导和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各个战场的重大战役，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夺取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 第二节 战略准备

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到内战全面爆发，为军事决战的准备阶段。

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早已决定了的，并且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就准备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共产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7—126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党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即使在和平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斗争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可以说，在军事决战的准备阶段，国内外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处于边谈边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力争取和平民主，避免内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坚决的斗争，并且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对付国民党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为后来彻底打败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 一 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实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关键的问题是集结力量，建立起能够展开大规模作战的作战兵团。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早在党的七大时就形成了。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要迅速地发展人民军队，不仅要建立“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而且要建立“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抗日战争结束时，即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战区的电报中又强调指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毛泽东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三或三分之二；在集中主力组建正规兵团时，应保留和建立必要数量的地方部队和加强民兵建设。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若干军事区域作了新的划分，组建了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下辖10个军区。在华北解放区，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下辖5个军区，并组建了津浦前线野战军。在苏皖地区，组建了华中军区，下辖8个军分区，并组建了华中野战军。在华北解放区，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分别下辖4个军区，并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察冀第一、第二野战军。在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区域，划分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在晋绥区建立晋绥军区，下辖3个军区，并组建了晋绥野战军。在中原解放区，组建了中原军区，下辖3个军区。至1946年6月，全国共建成三级军区34个，军分区102个，除东北民主联军外，还建成了6支野战军和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或旅，形成了以野战军为主体的与地方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从组织上实现了由分散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打运动战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2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68页。

为主的战略转变。

在部署从组织上整编人民军队的同时，毛泽东狠抓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并把练兵作为 1946 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和三大任务之一。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论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在开展军事练兵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对部队进行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政治教育，从政治上练兵。通过练兵，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适应了正规作战的要求，为迎战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创造了条件。

## 二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与共产党谈判，以所谓政令军令必须统一为借口，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另一方面，积极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抢占战略要地，为全面发动内战准备条件。

抗日战争结束时，全国的战略形势大致是：国民党军队雄居西南、西北各省；而共产党的军队则控制华北、华中。在长江以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比较分散、薄弱，容易被国民党军队所占领，尤其是江浙一带，更是蒋介石的必争之地。而在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他要很快控制东北比较困难，并且要控制东北，势必先夺取共产党控制下的华北，因为华北是关内通向东北的必经之地。而共产党在东北较国民党有一定的优势。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里不仅有一定群众基础，而且人民军队已控制了若干地区。共产党还在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创立了冀热辽根据地，这就有可能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交迈发达，余粮较多，如果能在东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人民革命极为有利。

针对全国的战略形势，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依据中苏条约对它有利的规定，占领全东北。从这一战略意图出发，蒋介石迅速将西南、西北地区的大量军队运往前线。1945 年 8 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队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向华北解放区推进，力图占领华北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

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党中央的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变化，在电告毛泽东，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于 1945 年 9 月 19 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的指示中指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的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向北发展”，就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5 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 338 页。

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向南防御”，就是人民军队撤离广东、浙江、苏南、皖角、皖中、湖声、湖北、河南（不含豫北）等 8 个解放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部队撤至苏皖边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二师、四师、七师大部分主力北移山东，这样使 8 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不致被国民党各个击破，同时，使华东解放区的兵力更加集中，以利于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宗旨，就是集中力量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战略上改变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局面。国民党蒋介石也熟知东北是战略要地，充分了解中共力控东北的宗旨，因而也把主要矛头指向东北。国共两党之间展开了一场抢占东北的斗争。

为了抢占东北，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收编伪满洲国军队，组成保安支队、保安总队，为它在东北占领地盘。其次，大量增兵华北，企图占领华北要地，从陆上打开东北的通道。再次，请求美国支持，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 5 个军运送到天津、北平、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还出动美军海军陆战队 5 万多人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以接应沿铁路向华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并准备运兵东北。再其次，请求苏联红军延期撤离，以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确保对东北的占领。

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贯彻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首先，9 月 14 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奔赴东北开展工作，10 月 31 日，又成立了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统一领导和指挥进入东北的所有部队。其次，派遣大量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去东北开展工作，干部中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20 人，其中还有 4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加强东北的自卫力量。早在 8 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即遵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部分兵力分三路挺进热河和东北。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先后派出 11 万人的部队开赴东北，这些部队包括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恒所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 6 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率领的部队 3.5 万人，等等。再其次，中共中央及时地关心、指导和支持东北局的工作，在热河、冀东一带调集重兵，掩护东北部队的战略展开；10 月 28 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又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决定东北部队让出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将主要力量迅速转向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12 月 28 日，毛泽东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党内指示，强调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应“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建设。”东北局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部队撤离锦州、沈阳等大城市，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

---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 33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7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8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80 页。

生产运动，建立地方武装和人民政权，很快在东满、北满、西满以及南满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东北局还根据毛泽东“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指示，将东北人民武装迅速扩大整编成 21 个师（旅），并建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 10 个军区。至 1945 年底，东北人民军队总兵力已发展到 28 万多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大批部队迅速北移，争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比蒋介石的军队提前 3 个月进入东北，不仅赢得了发展的好时机，为控制热察两省和争取控制东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而且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在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又及时地将分散于江南的兵力集中到江北，不仅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加强了华东和华北解放区的力量，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基本阵地。这样，就形成了对付国民党全面内战的有利战略态势。历史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确实是一项正确的具有远见的重大战略方针。

### 第三节 战略防御

1946 年 6 月底，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自卫，从而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战争开始时，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达 193 旅（师），共 160 余万人，占国民党总兵力的 80%，并且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确处于绝对劣势，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只有 61 万人，加上地方部队，也只有 100 余万人，并且缺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后，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明确提出：“我们是能够打败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从 1946 年 6 月全面内战爆发，到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依次由内外线转入外线，转入战略进攻止，为军事决战的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依据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 一 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在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提出了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

（一）以保存自己实力为主要目标。

要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标，首先必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条件，这是毛泽东弱者战略的一贯思想。中原解放军的突围就是这一战略方针的生动表现。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8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87 页。

全面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解放区点燃。中原解放区位于南京、武汉之间。日本投降前，中原解放区扩展到60余县，形成了对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态势。抗日战争结束后，武汉成为国民党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枢纽。国民党调集20多个师，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至1946年6月中旬，中原解放区被压缩到方圆不足一百里的狭小区域，面积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在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之际，毛泽东于6月1日、6月19日两次致电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等。要求做好突围的准备。中原解放军鉴于国民党重兵围攻的情况，为了争取主动，保存实力，于6月21日电告中共中央，请求突围。6月23日，毛泽东回电指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6月25日，毛泽东又电告郑位三、李先念：“（一）巧妙避开敌人，分途突出包围圈。（二）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三）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开始后，中原解放军即依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一部分地方部队原地坚持游击斗争，以皮定钧旅伪装主力，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部队分左右两路从26日开始向西突围。7月13日，毛泽东又电告郑位三、李先念：“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毛泽东在中原解放军突围时，就提出了以后经略中原的设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李先念等率领的右路约1.5万人，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终于到达陕南，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并于8月初成立了鄂豫陕军区。王树声率领的左路约1万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武当山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并于8月下旬建立了鄂西北军区。担任迷惑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的皮定钧旅，转战20余天，跋涉上千里，进入苏皖解放区，编入华中野战军序列。中原解放军主动突围，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还扩建了两块根据地。同时，中原解放军坚持原地斗争的地方部队，共牵制国民党30个旅的兵力调往豫西和陕南，使之不能在预定时间内转向进攻华中、华北和西北解放区，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正如毛泽东在7月15日致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中指出的：“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 （二）实行内线歼敌。

实行内线歼敌，就是依托解放区，在解放区内歼灭敌人。实行内线歼敌，可以保护解放区，鼓舞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华东解放区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京、沪、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国民党军队以主要兵力进攻华东解放区。蒋介石采取的方针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企图先占领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野战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地区同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决战，以占领整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1~282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2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3页。

个山东。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于7月4日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华中局，提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粟裕等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主动迎击12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华中野战军充分利用在解放区作战的各种有利条件，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作战方法，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而且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和晋冀鲁豫两军的作战，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作战提供了经验。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陇海路徐州至开封的国民党军队。接着转入内线，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主力进行了定陶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在菏泽地区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合击消灭的计划。定陶战役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可以大量歼灭敌人。8月28日，毛泽东在给备战略区首长的电报中，总结了集中兵力实行内线歼敌的作战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 （三）机动灵活，主动撤离。

机动灵活，主动撤离，即采取灵活作战的方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能攻则攻，能守则守，攻不破，守不住，则主动撤离。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就采取了这一作战方针。1946年7月至9月，贺龙领导的晋绥部队和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进行了晋北战役和大同、集宁战役，攻取了朔县、宁武、繁峙等地，控制了同蒲路以北、大同以南一段，予国民党军队以很大打击，并向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同城发起进攻。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大同城久攻不克，于是，在傅作义东犯时主动撤离大同，并随之主动撤离集宁。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又进行了张家口保卫战。在张家口保卫战中，中央军委的方针是：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队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实行机动歼敌，改变原定在北线的外线作战计划，而取内线歼敌的方针。晋察冀部队在张家口外围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后，于10月11日主动撤离张家口。经过7、8、9三个月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虽然“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但大量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10月中旬，东北国民党军队为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首先在南满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消灭或赶走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然后全力北犯，进攻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于10月底至11月初一举歼敌一个整编师8000余人。这又是一个主动弃城弃地，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6~1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6页。

实施内线机动歼敌的一个成功范例。

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冀东军区和冀热辽军区的电报中，又部署了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指出：“你们作战方针，应着重歼敌有生力量，然后敌占各据点自然容易为我收复。为实行此方针，应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集中七八倍于敌之兵力（例如集中四五个团打敌援兵一个至二个营），每次事前均应有充分准备，不浪打，打则必胜。打时须用包围迂回，以期尽歼。”

## 二 集中优势兵力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的一贯作战方针。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反对分兵击敌，主张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大于我之敌。1930年至1931年，毛泽东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成功地指挥了红一方面军以四万人的兵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集中兵力是我军作战的重要原则，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集中兵力一着。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在反敌围攻作战中，对数路前进之敌，应集中兵力打破敌之一路后，再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如此各个地击破之围攻。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为实现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地方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还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党内指示。1946年10月1日，他在起草的《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同时强调指出：“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毛泽东起草的《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还要求全党：“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并强调指出：“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11月9日，毛泽东在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电报中，又强调“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1947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提出了“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箝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箝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毛泽东《三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121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6页。

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下达后，各解放区部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

在华东战场，华中和华东野战军会合后，于1946年12月中旬在苏北宿迁以北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队3个半旅计2万余人。1947年1月，华中、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进行鲁南战役，围歼包括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师和国民党自称为“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部队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共5.3万余人，开创了一次歼敌两个整编师的胜利记录。鲁南战役后，华中、华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坐镇指挥的53个旅计31万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鲁南会战。华东野战军采取集中主力打运动战的形式，包歼孤军深入之敌，歼敌两个军7个师，计5.6万多人，创造了一次歼敌7个师的范例。

在晋冀鲁豫战场，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前4个月作战中遭受严重打击，但仍然力图控制鲁西南，追歼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黄河以北，借此打通平汉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打破蒋介石打通平汉路的计划，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远距离奔袭，先打击敌军首脑机关、打乱敌军部署的“掏心战术”，打破了敌人预期的战役目的。然后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大踏步地退至国民党后方徐州西北地区，1947年1月中旬，在鲁西南一带歼敌1.6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蒋介石在华北、华东战场失利后，集结重兵，进攻东北的南满地区，企图歼灭南满主力或压迫南满主力北撤。据此，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南拉北打、南北满密切策应、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方针，从1947年1月至4月，进行了三次南下松花江以南、四次保卫临江地区的作战，在运动中歼敌4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进攻，迫使国民党军队由攻势转为守势，从而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局势。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下达后至1947年2月，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尽可能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取得了歼敌34个旅计41万人的重大胜利，大量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这一时期的作战，较全面内战爆发初期的作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歼敌万人以上的歼灭战明显增多，为初期的4倍；二是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损失和城市失守大幅度地下降。这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力量显著提高，战局正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 三 诱敌深入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贯彻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城市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坚持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尽管丢失了一些城市和地方区域，但大量地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66个旅计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共计71万余人。而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虽然抢夺了一些城市，占领了一些解放区，但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据统计，国民党军队每抢夺一座城市，平均付出了7000人的代价。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又由于抢夺的城市须留下军队防守，这就形成了战线拉长与

兵力不足的尖锐矛盾，国民党军队在这种尖锐的矛盾面前陷于被动。不仅如此，国民党在政治上也处于孤立的状态。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独裁政策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上海摊贩为反对国民党禁止营业，于1946年11月底12月初率先举行了数千人的请愿游行。1946年12月底，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事件，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爱国运动。与此同时，国统区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与蒋管区后方民变武装起义也不断发展，与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互相配合，形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军事上受挫，政治上孤立，更加处于被动的局面。

全国的战略形势面临着转变！

在这种转变的前夜，即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召集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还指出：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改变，争取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关键，是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争取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必须继续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

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维护全面进攻的局面，遂改为重点进攻。从1947年3月起，集中了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即94个旅，重点进攻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压迫华东野战军至胶东狭窄地区而加以消灭，以解除对它的心脏地区南京、上海的威胁；攻占延安，打击中共首脑机关，并消灭西北野战军；然后分头北进，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进而出关攻占东北，达到将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的目的。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战略目的，在晋冀鲁豫战场实施所谓的“黄河战略”，“引黄归故”，企图依靠黄河的天然屏障，构成从风陵渡至济南约7000里的正面防线，以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抽兵支持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战斗。

1947年3月中旬，国民党派飞机狂轰滥炸延安，进攻延安的战斗正式打响。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部署是：胡宗南部14万人从南线主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12个师及榆林第22军两个师分别从西、北策应，叫嚷“三日之内占领延安”。

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6个旅计2万人，兵力约为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特别是在装备上，更处于绝对劣势。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兵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采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兵力寻机歼敌，各地方部队、民兵在敌占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同时还集中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支援战争。

中共中央于3月19日撤离延安后，于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的精干机关和解放军总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5页。

部继续留在陕北，统一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以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继续留在陕北，对西北野战兵团官兵和整个西北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国民党军队进驻延安后，气焰十分嚣张，认为中共“不堪一击”，并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根据敌军求胜心切的心理，采用变化莫测的运动战法，一方面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埋伏，于3月25日和4月14日进行了青化砭和羊马河两次伏击歼灭战，歼敌7000余人；另一方面则采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牵得敌人东奔西跑，精疲力竭，情绪低落。

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又制定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毛泽东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因此，“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毛泽东强调指出：“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西北野战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安定、瓦窑堡、清涧、永坪之间与国民党军队继续周旋，并于5月2日成功地进行了蟠龙镇战役，歼敌6700人。尔后，西北野战兵团又进行了陇东战役、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分别歼敌4000余人、5200余人和6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1947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各军区、各野战军的电报中，肯定了彭德怀指挥下的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投入的兵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人。它的战略部署是：第一步，占领鲁南解放区；第二步，集中主力向鲁中推进，迫使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与之决战，或压迫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在作战方法上，它也吸取了以往分路进击常遭分割围歼的教训，采取了集中兵力，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打稳扎、逐步推进的方针。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度，在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后，即1947年3月6日，毛泽东就电示华东野战军：“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考虑。”“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在5月4日给陈毅等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2~1223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1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7页。

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在5月6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我主力距敌要远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后面一枪不打，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

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坚持内线作战，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成功地组织了新泰、孟良崮和沂蒙山3次战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孟良崮战役全歼敌“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的巨大胜利，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孟良崮战役后，毛泽东于5月22日在给陈毅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的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宣告了蒋介石重点进攻战略的破产。

#### 第四节 战略进攻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至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计78万人，歼灭非正规军34万人，共计歼敌112万人，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而且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增加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在100万以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及时地提出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

##### 一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这不仅提出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任务，而且也指明了其重要意义。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0页。

首先，人民解放军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但其重点进攻仍在进行。1947年7月，国民党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方案》，颁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决心采取更残暴的手段，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搜刮人力、物力、财力，继续贯彻执行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方针，以进一步破坏解放区，最后达到摧毁解放区的目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战争在内线进行，解放区的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和人民解放军在人力物力的补充方面面临严重困难。而毛泽东部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从内线引向外线，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就不仅能避免战争对解放区的进一步破坏，保护解放区，利于解放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为人民解放军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及时补充提供保证，粉碎蒋介石“使我不能持久战的反革命战略方针”，而且还可以变“使我不能持久战”为使国民党蒋介石不能持久战，加速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程。

其次，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尽管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奋斗，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但是，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并没有被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大大多于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外线，深入敌人的后方，这就可以调动敌人回防后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破坏蒋介石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而且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样就可以改变敌我双方的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

再次。当时的战争形势也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可能。当时，全国的战争形势已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在军事上遭受严重挫折。国民党军队尽管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仍然占着优势，但已明显地暴露出弱点：一是国民党军队连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又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战斗力显著削弱；二是用于作战的机动兵力不足，在国民党全部兵力的248个旅中，能用于战略机动的兵力不足五分之一；三是国民党后方空虚，担任守备的只有21个旅，且遍布在10多个省区。而共产党在政治上却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得到了解放区人民的信赖，而且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正与国民党军队相反：一是由于连连告捷，士气高涨；二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实施了各项政策，充分调动了解放区人民的积极性，解放区广大人民不仅从各方面支援人民解放军，而且还踊跃参军参战，人民解放军的兵员能及时得到补充，用于作战的机动兵力多。这些都为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在提出战略进攻的任务时，还充分考虑了这样做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毛泽东指出：“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毛泽东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

在坚持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毛泽东强调指出：“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及时提出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人民解放战争历史进程中的一项伟大的战略部署，大大缩短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

## 二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而拉开序幕的。

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以后，在使国民党军队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受到严重挫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已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展开局部反攻。至1947年6月，全国的战场形势是：在北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动攻势；在南线，敌人还在对陕北、山东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其主力已经深深陷入这两个战场。而连接陕北和山东这两个战场的中间部位，即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局面。

早在中原解放军突围时，毛泽东就有日后经略中原的构想。晋冀鲁豫野战军展开局部反攻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晋冀鲁豫野战军向中原出动，转至外线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在1947年5月22日给陈毅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

1947年5月，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并决定6月实施这一战略。毛泽东在5月8日给刘、邓、陈、粟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着在6、7两个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之目的，“刘伯承、邓小平军仍按中央五月四日电，争取于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六月十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陈毅、粟裕军在六月十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六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震林率七纵亦似于六月十日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947年6月30日突破黄河天险，挺进鲁西南，随后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计6万余人，由此正式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为了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在鲁西南战役进行中，即7月19日，毛泽东又电告刘伯承等，对兵力部署和归属作了调整。毛泽东指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袁、谢富治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0~123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2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4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5页。

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德怀、习仲勋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提议赵基梅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三十八军与陈谢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

至此，毛泽东为实现“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已经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三军配合，即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防线，在鲁西南地区歼灭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然后挺进大别山，在鄂豫皖实施战略展开；以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陕鄂，配合西北野战军兵团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豫西、陕南、鄂西实施战略展开；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后，首先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人，支援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行动，然后挺进豫皖苏实行战略展开。以上三支大军的任务是在江淮汉之间以“品”字形阵势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策应内线兵团的作战。两翼牵制，即以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动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军北上，以利于陈赓兵团的行动；以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开展攻势，把进攻山东的敌军引向海边，以利于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行动。同时，毛泽东还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等部继续坚持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以策应外线作战。

7月23日，毛泽东又电告刘伯承等：“刘邓军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即7月29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等，指出：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原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视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7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刘伯承等做好直出大别山的准备。8月6日，毛泽东又电告刘伯承等，分析了直出大别山后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三种对策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根据国民党可能采取的对策，毛泽东分析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三种可能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创建了根据地。毛泽东指出：“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勇于克服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09~31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11页。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进入鲁西南的华东野战军的掩护下，刘邓大军迅速甩开向它围拢的几路国民党军队，提前于8月7日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先后跨越陇海路、黄砭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先后进入大别山。进入大别山后，先后胜利地进行了张家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至11月底，共歼敌3万余人，创建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北野战军的策应下，于8月22日渡过黄河，挺进豫西，截断横贯中原的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然后挥师南下，以一部进击陕南，主力进击平汉路两侧。至11月底，共歼敌5万余人，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了在豫陕鄂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于9月初会合于鲁西南，月底分五路进入豫皖苏平原。至11月底，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三路大军胜利实现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和中原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改变整个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1948年3月7日所说的：“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毛泽东“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计划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战略进攻的方向选得准。中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毛泽东充分地利用了敌人所造成的“哑铃”形战争态势，采用从中央突破的方法，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国民党军队防御薄弱的中原地区，直捣既是敌弱点，又是敌要害的战略纵深大别山，这就如同一把利剑刺进了敌人的心脏，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人民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战略进攻的时机选得及时。毛泽东曾在论述战略退却时说：“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退却过早或过迟，都有损失，但一般来说，过迟的损失大于过早的损失。“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有极大的影响。”那么怎样选择战略退却时机呢？毛泽东指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也是这个道理，也是这种方法。毛泽东的战略进攻时机选择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这就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进攻展开后，国民党蒋介石还以为人民解放军“立足不稳，被迫流窜”，直到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沙河南岸时，蒋介石才恍然大悟，认清人民解放军南进的真实意图，因而在蒋介石尚未抽出时间组织有效的战略防御、建立战略防御体系时，人民解放军却已经完成战略进攻的准备，展开战略进攻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形势，为人民解放军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再次，战略进攻的方式独特。“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进攻，不是像通常的战略进攻那样，采用大兵团逐城逐地推进，而是采用大兵团跳跃式地推进；不是像通常的战略进攻那样，建立巩固的后方，有回旋的余地，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直插敌人的心脏；不是像通常的战略进攻那样，攻占大城市和控制交通要道，而是占领敌人守备薄弱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创建根据地，作为战略进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总策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军事决战战略进攻中的运用。

### 三 内线与外线相结合

毛泽东在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任务，并对战略反攻作了具体部署：“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夜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泽东的战略进攻方针，是一个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略进攻方针。

在实施“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进攻计划时，毛泽东就采用了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相互配合、相互牵制敌人的方法。刘邓出击外线，本身就是为牵制内线敌人；陈粟集中6个纵队于内线，也是为了配合刘邓出击外线。三路大军完成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后，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从内线和外线同时对敌人展开攻势。

在外线，三路大军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攻势。1947年12月30日，三路军各一部胜利会师于确山地区，将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三块新开辟的解放区联成一片。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经过4个月的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恢复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国民党的战略后方构成严重的威胁，并且有力地策应了内线作战。

在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逐步转入战略反攻。

在陕北战场，西北野战军主力攻击榆林，虽未攻克，但调动了胡宗南主力10个旅北援，策应了刘邓“经略中原”的作战。8月20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后由于陈谢兵团进击豫西，威胁西安，胡宗南主力南撤，西北野战军乘势转入内线反攻，发起黄清战役，解放了延安东北广大地区，并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

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为策应外线主力挺进中原，进行前后侧背相配合的机动作战，大量寻机歼敌。国民党抽兵回援中原后，华东野战军主动发起攻坚战和追击战。至12月，共歼敌6.3万人，收复胶东大片地区，胜利地进行了胶东保卫战，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局势，而且配合了外线兵团的作战。

东北民主联军从9月14日至11月5日，发起秋季攻势作战，重创敌军，使国民党军队退缩到锦州、沈阳、长春等仅占东北总面积14%的34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在晋察冀战场，晋察冀野战军于9月上旬发起大清河北战役，并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扭转了这个战场的战局。11月9日至12日，晋察冀野战军又一举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石家庄，全歼守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7年下半年，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形成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共歼敌75万余人。至1947年底，人民解放军基本上都转入外线作战，从战略防御转入全面战略进攻，标志着战争形势已经根本转变，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 四 十大军事原则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0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为了制定全面的行动纲领，准备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了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谈到军事问题时，提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全面规定了人民军队作战的指导思想、作战形式：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大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力求全歼敌人；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等。十大军事原则全面规定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作战形式、作战对象、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及兵力休整和兵员补充等原则；成功地处理了先打弱敌与后打强敌的关系，夺取乡村与夺取大小城市的关系，歼敌有生力量与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在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时明确指出：“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

1958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十大军事原则的确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凝炼而成的独特的作战思想，其中的基本内容不难从毛泽东在内战时期与抗日时期的军事思想中找到准确的依据。前面已有专章论述，此处不复赘述。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十大军事原则提出的直接背景是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1页，注（4）。

时期，作战规模不断扩大，兵力集中性也空前提高了。特别是从内战准备到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过程中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为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

首先，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检验了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战略战术依然有效，这就促使毛泽东将早已形成的战略战术上升到军事原则的高度。

其二，人民解放战争新的实践，提供了大量新的军事经验材料，毛泽东依据这些经验材料，能够概括出一些新的战略战术原则。

其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发展，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这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标志着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将从此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开始新的军事实践。新的军事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指导。这就促使毛泽东依据已有的军事实践，对未来的军事实践作出科学的分析，提出科学的理论原则去指导未来的军事实践。

其四，人民解放军的其他高级指挥员也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也为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其五，从解放战争初期起，毛泽东就注意及时总结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的经验，在他根据各地战场的经验而写成的给党内的指示中，如《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党内指示中，基本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成为毛泽东概括十大军事原则的直接基础。

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了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在步骤、方针、方法上，即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以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基本作战方针，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为基本作战方法。而其核心的歼灭敌人，因此，毛泽东主张“尽可能的歼灭战”，并明确指出人民军队的“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具有明显的特点：

首先，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究其原因就在于：蒋介石代表反动，不代表人民，他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却代表人民，代表进步，所进行的是人民的革命战争。

其次，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十大军事原则为指导，迅速地打败了蒋介石，夺取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然，还必须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奋斗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 第五节 战略决战

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发表后，人民解放军以十大军事原则为指导，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进一步的战略进攻。至 1948 年秋季，即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歼灭国民党军队 264 万人，尽管国民党军队经过大量补充，但其兵力仍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下降到 365 万人，并且在其构成中，相当部分军队或者是被歼灭后重新组建的，或者是遭受过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而分布在第一线的正规军 170 万人，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割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 5 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的守备任务，或在其附近地区作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性机动的兵力已经不多。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 127 万人扩展为 280 万人，敌我双方的兵力比例大大缩小，并且由于后方巩固，兵力可以集中于前线，用作战略机动的兵力明显地优于国民党军队。另外，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已有极大的改善，战略战术水平和攻坚作战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不仅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积累了攻克石家庄、四平街、洛阳、开封等大中城市的攻坚作战经验。

解放战争两年后的形势表明，蒋介石已经衰败，而毛泽东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正走向全面胜利，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 一 两个会议

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为了扭转败局，经过精心筹划后，于 1948 年 8 月 3 日至 7 日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军事检讨会的宗旨是总结两年作战的经验教训，制定出扭转败局、战胜人民解放军的新战略。军事检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军事上于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止人民解放军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攻，一面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一面攻打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军事检讨会还确定了若干条对付人民解放军的战法和提出了建军 500 万的任务。军事检讨会后，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军队即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国民党国防部也声称国军“仍有绝大把握，得到胜利”。美国驻华使馆也为蒋介石助威。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61 页注（4）。

在国民党企图扭转败局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前两年的作战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政策。

关于战略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究竟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打倒国民党，这是毛泽东从内战全面爆发后就一直关注的问题。1947年7月，毛泽东估计，从1946年7月算起，要5年左右的时间。1948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又提出“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指出：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被歼112万，补充100万，总兵力由430万降为373万；第二年被歼152万，补充144万，总兵力为365万；两年中，被歼的多，补充的少。照此下去，第三年如果又被歼152万，补充100万，总兵力就将降为312万，第四年降为260万，第五年就只有180万了，那时战斗部队至多9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现有兵力280万，今后3年准备从俘虏中补充170万，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200万，除去消耗，5年作战的结果，仍可达到500万军队。毛泽东指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关于战略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并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一方面“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另一方面，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所需的大量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毛泽东强调指出：“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南京军事检讨会和中共中央西柏坡村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两个针锋相对的会议，尽管在扩军数量上有着相同的500万的指标，但其战略目标截然相反。国民党希图转败为胜；而共产党则希望再用3年时间歼灭国民

---

《任弼时选集》第5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5~134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8页。

党军队。因此，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刚开始，交战双方都紧锣密鼓，打算决一雌雄。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战略决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 二 决战序曲

1948年9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

在人民解放军的秋季攻势中，给国民党军队打击最重、对战局影响最大的是华东野战军进行的济南战役。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围歼国民党主力和解放国民党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的序幕。

济南位于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处，是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并且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948年7月以后，济南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认为守济南有困难，向蒋介石提出了“放弃济南”的要求，美国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也劝告蒋介石“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但蒋介石基于为了屏障徐州，隔断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并箝制华东野战军使之不能南进的考虑，不仅认为济南应该守，而且自信能够守住，因而拒绝了王耀武的要求和巴大维的建议。蒋介石决定以10万余人的重兵守备济南，加固防御工事，并从徐州调集17万人的强大兵团北援济南。

毛泽东很看重打济南，夺取济南，一是可以拔掉国民党安在山东解放区腹地的钉子；二是可以便利于华东野战军毫无顾虑地全力南进；三是可以使华东、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利于支援大规模作战；四是可以从攻克济南作战中解决如何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难题。毛泽东尤其看重第四点，因为人民解放军敢不敢打大城市，能不能攻占大城市，是影响战争发展而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在8月28日致粟裕的电报中明确提出：济南战役“关系甚大”。8月15日在致刘伯承等的电报中也提出：“九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

毛泽东从7月中旬开始，就考虑济南战役的问题。7月16日在给粟裕等的电报中，毛泽东指示：“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8月12日，在致粟裕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分析了济南战役的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部署情况，提出了适应华东、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重兵密集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1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5页。

特点的战略战术，即“攻济打援”。在此电中，毛泽东倾向于争取第二种可能，认为“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

8月22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等的电报中，对作战时间作了规定：“提议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九月十五日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九月十五日以前进入指定阵地。”8月26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毛泽东强调指出：“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在8月28日给粟裕的电报中，毛泽东针对“攻济打援”战役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明确提出：“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毛泽东希望粟裕把根本出发点放在一个半月、两个月，甚至更多些时间才能攻克济南这个基点上，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毛泽东指示粟裕：“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在9月11日给粟裕等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攻城部署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毛泽东指示，整个攻济打援战役由粟裕指挥。

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总兵力的44%即约14万人攻打济南，以总兵力的56%即约18万人部署于阻援和打援。战斗从9月16日午夜开始，至9月24日黄昏，人民解放军就攻克济南，全歼守敌，活捉王耀武。济南战役所需的时间大大超出毛泽东的估计，以至国民党军队的援兵尚未集结完毕，济南城已落入人民解放军的手中。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仅为人民解放军积累了攻占国民党重兵占据的大城市的经验，而且极大地振奋了人民解放军打败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7~438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8~43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9~44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4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4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43页。

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

### 三 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也是东北野战军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东北的最后一个战役。

至 1948 年夏，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全东北 97% 的土地和 85% 的人口，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 11 万人扩充至 100 万，其中正规军达 70 万。并且装备有了极大改善，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冬季攻势后的休整，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却只有 55 万人，并且还被人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 3 个孤立的地区内。由于北宁铁路若干地段和营口被人民解放军控制，长春、沈阳国民党军队通向关内的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不能满足需要，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已居战略上的优势，具备了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将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东北战场的决定。

#### （一）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形成。

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即当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正在顺利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等的电报中，就针对蒋介石撤离东北兵力至华北的两种可能，提出了东北野战军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线，切断国民党军队由陆地撤退的通路，封闭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毛泽东指出，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请林彪等“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可见，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结束冬季攻势后的作战主张，即以主力向南，打义县至滦县地带，切断北宁线，堵塞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

然而，东北中央局林彪等对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还不甚理解，在讨论今后的作战问题时，提出了先打长春的方针。毛泽东遂尊重东北中央局的意见，在 4 月 22 日致林彪等的电报中，同意先打长春，但仍然针对东北局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指出：“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东北野战军对长春的进攻，虽然扫清了长春外围的一些据点，但并没有达到攻占长春的预期目的。长春外围战后，东北野战军又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试图吸引沈阳之敌北援以歼灭之。然而东北国民党“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以不变应万变，沈阳国民党军队按兵不动。东北野战军又没有达到预期的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457 ~ 458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457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459 页。

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东北野战军林彪等才开始执行毛泽东南下作战的方针。

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方针确立后，首要的作战目标究竟指向何处？这又是毛泽东重点考虑的问题。毛泽东曾提出多个目标：或打北宁线义县至滦县之敌；或打平津线之敌；或打平承线之敌；或打平绥线之敌。供东北局林彪等考虑。1948年7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明确指出：“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9月5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9月7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等：“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毛泽东把歼击范汉杰作为重点，首先是因为歼灭了范汉杰集团，攻占了锦州、山海关、唐山诸地，就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能够实现封闭蒋军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其次，北宁线是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的结合部，从结合部开刀，实行中间突破，有利于以后向两翼发展。再次，如果不先打卫立煌、范汉杰，而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会将兵力集中于锦唐线，卫范协力援傅，会使东北野战军陷入被动局面。还有，“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毛泽东还预计，在围歼范汉杰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毛泽东明确电告林彪等：“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提请林彪等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攻占锦州，封闭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 （二）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确立。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举行北宁路作战。经过20天的奋战，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造成了封闭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的有利态势。但是，作为北宁路战略枢纽的锦州尚未攻占。因此，并未完全切断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退路。

在1948年8月召开的南京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还力图东北求稳定。但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6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0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2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6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3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3页。

是，济南失守，锦州被困，使蒋介石意识到军事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改变战略，决定放弃东北，将东北国民党军队撤至华北、华东，以确保黄河、长江之间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区域，以延长自己的统治。为了确保突围，蒋介石还于10月2日飞抵沈阳作亲自部署，摆出了一副以锦州为中心，东西对进，同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的架势。

本来，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时，是准备执行毛泽东的攻打锦州的计划的。9月27日在分析战情时，也提出了先打锦州，后打锦西的方针。济南战役的胜利，对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9月28日，林彪致电毛泽东，表明了“先打锦州，后打锦西”的决心。毛泽东在9月29日的回电中对林彪等的决心表示赞许：“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并强调指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三点（即义县、锦州、锦西——引者注）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攻占三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三点至少三点中之两点。”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9月29日，林彪等电告毛泽东，汇报了军事部署和表明了决心。9月30日，毛泽东回电林彪等，明确指出：“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毛泽东还催促林彪等，动作要快，“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然而，当林彪获悉锦西方面国民党军队增加了4个师，攻打锦州，主要援敌不仅来自沈阳，也来自锦西时，林彪便对攻打锦州产生了犹豫。10月2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出了回师攻打长春的计划。毛泽东接电后，于10月3日17时和19时连续起草了两份电报告林彪，明确指出：要坚持既定的攻打锦州的方针，坚决制止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毛泽东强调指出：“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毛泽东再一次指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

林彪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前，已在罗荣恒、刘亚楼的斗争下改变了回师长春的计划，并致电毛泽东，决心攻打锦州。毛泽东在10月4日1时30分看到林彪的电报后非常高兴，于10月4日6时致电林彪：“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4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8页。

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绝不要有任何的慌忙。”

至此，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就正式确立了。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首先攻克锦州，并准备连续大举歼灭援敌，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于东北。

由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也由于毛泽东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还由于东北野战军指战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奋勇作战，并且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给予了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战略决战——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开始发动，至11月2日就取得了彻底胜利，歼敌47万，解放了全东北！

辽沈战役的胜利，对蒋介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时，蒋介石住在北平，眼睁睁地看到东北国民党军队彻底灭亡，伤心得“在北平吐血，回到南京后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白皮书》中也写道：“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了。”

辽沈战役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广大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和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后方，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即东北野战军投入关内其他战场作战，以加速革命战争的胜利，还取得了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这对于战略决战的进一步展开和胜利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 四 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淮海战役发起前的形势与辽沈战役发起前的形势不同。辽沈战役发起前的东北战场，无论兵力、装备，还是战略态势，东北野战军都处于优势，因此在东北决战半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而在淮海战役发起前的华东、中原战场，国民党是兵多装备好，处优势，而人民解放军则是兵力少、装备差，处劣势。就是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因而直至淮海战役打响时，毛泽东还下不了吃这锅夹生饭的决心。淮海战役打响后，毛泽东才大胆、果断地作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英明决策。

##### （一）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形成。

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即于25日召集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付华东野战军南进，中原野战军东进，华东、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的问题。蒋介石决定，对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实行有限制目标攻击，确保对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的控制，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与中原野战军汇合。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在蒋介石的有限制目标攻击的基础上，大加发挥，制订了一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79页。

李敖：《蒋介石研究》，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1页。

个“攻击山东计划”。由于东北战场吃紧，锦州陷落已成定局，杜聿明被蒋介石调往东北收拾残局，“攻击山东计划”自然流产。明显地看出，东北战场作战的胜利展开，延缓了国民党军队在华东、中原战场的进攻。

在国民党蒋介石蕴酿有限制目标攻击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提出了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粟裕提出的淮海战役的战略方针是：第一阶段，乘两淮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由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线，准备歼击来自徐州的增援之敌。第二阶段，用3个纵队攻击海州、连云港，结束战役。尔后，华东野战军全军休整，作渡江作战准备。粟裕说：“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涪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毛泽东收到粟裕9月24日的电报后，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对粟裕的意见作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总的作战构想，并于9月25日电告饶漱石、粟裕和刘伯承、陈毅等。在电报中，毛泽东除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外，还明确指出这个战役，应“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强调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分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毛泽东真是神机妙算。9月27日，黄百韬果然命令所辖部队返回新安镇地区。邱清泉兵团由成武，单县退回商丘、砀山地区。李弥兵团由徐州以西退往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因此，华东野战军要打两淮，必须首先歼灭黄百韬，而要歼灭黄百韬，又必须挡住徐州东援之敌。根据这种情况，9月28日，毛泽东又电告饶漱石、粟裕等：“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箝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百韬兵团。”

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粟裕等，对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提出了重要意见：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

“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70页注释（1）。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17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18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19页。

敌，并占领各城。……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箝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

“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箝制。”

毛泽东 10 月 11 日的电报对 9 月 25 日电报中的第二、第三阶段的歼敌目标作了较大调整。由此可以看出，计划中的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战役。要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要使用华野的全部兵力，而且还需中原野战军战略和战役上的配合。于是，毛泽东于 10 月 11 日又致电命令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州）徐（州）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毛泽东在 10 月 11 日的电报中，还分析了“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毛泽东指出：如果出现这种形势，则华东野战军“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规定了作战步骤和时间。毛泽东指出：华东野战军于 11 月、12 月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1949 年 1 月休整，2 月西兵团转移，3 至 7 月与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敌人打至长江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至此，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突破口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基本上形成。

## （二）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的确立。

毛泽东 10 月 11 日提出的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主要是打淮阴、淮安、打海州、连云港，以歼灭黄百韬兵团等部的十几个师。这与后来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是“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但这个方针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这个方针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是在原来的淮海战役方针的基础上，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和华东、中原地区敌我情况的变化而逐步形成的。

毛泽东 10 月 11 日提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后，中原野战军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实施了郑州战役。郑州、开封的国民党军队遵照蒋介石保持徐州，加强徐州、蚌埠间防御的部署，弃城而撤。中原野战军遂于 10 月 21 日和 24 日相继占领郑州和开封。

郑州解放时，毛泽东对中原野战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箝制徐州之敌；二是出淮南，迫使徐州之敌南援，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10 月 22 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希望陈毅、邓小平作出全盘考虑，拿出具体方案，电告中央军委。

10 月 24 日，陈毅、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后，电告毛泽东，提出了中原野战军主力东进的三个方案：一是，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后，乘邱清泉兵团东进，黄维兵团又远在豫西，集中中原野战军 4 个纵队和华东野战军 2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520～52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55 页，注（6）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521 页。

个纵队，歼灭开封、徐州线上的孙元良兵团；二是，如果孙元良兵团不好打，则以6日行程于11月10日左右进至徐蚌线，实行军委原定任务；三是，如黄维兵团孤军东进，亦属歼击一两个师之良机。陈毅、邓小平认为，“无论哪个方案，我们位于商邱西南均机动。”10月25日，陈毅、邓小平致电毛泽东，主张“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线进攻”。而“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

陈毅、邓小平关于不出淮南的意见，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意见。中原野战军位于徐蚌线以西，既可以箝制徐州之敌，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又可以根据战局发展，逐步向徐州以南推进，同华东野战军联合，遂行歼灭徐蚌地区之敌的任务。10月26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同意陈、邓不出淮南，并明确指出，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个胜仗。

10月27日，中原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由郑州地区东进，于11月初进至睢县、柘城、亳县及商丘以南之间的地区。10月31日，粟裕电告毛泽东，建议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毛泽东于11月1日接受粟裕的意见。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愿意负指挥之责。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军，使原来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格局，变成了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新格局。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形成了新的力量，作战能力极大地增强。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好几倍的力量。”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是促使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于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重要原因。

淮海战役打响前，即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已经预计到人民解放军有出兵苏北和攻打郑州的可能。因此决定放弃郑州、开封等地，必要时甚至可以放弃南阳，以加强和确保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然而，东北决战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固守徐州，能否守得住，国民党内部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徐州难守易攻。不如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凭借河川的自然条件，阻挡人民解放军的攻势，确保京沪；一种意见认为，徐州是南京的屏障，要有效地保卫南京，必须守住徐州，因而主张以一二个军固守徐州，布主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确保徐蚌通道，作攻势防御，伺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但蒋介石对徐州是守是撤，一直举棋未定。至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展开，蒋介石撤离徐州已经成为不可能，于是连忙调整兵力部署，迅速向徐蚌地区集结兵力，把能够调动的兵力全部调往徐蚌地区。

因此，淮海战役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从总兵力来讲，中原、华东野战军会合后，总兵力还不足60万，并且装备上不如国民党军队；而国民党总兵力达80万，不仅兵力高度集中，而且装备比较好，其中几个军有根强的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军事形势又对人民解放军有利。首先，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对固守徐州失却信心，由于信心不足，决心不定，兵力部署几经调整，部队处于慌乱状态；而人民解放军

---

《淮海战役》第1册，第88～89页。

《淮海战役》第1册，第9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页。

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挥员对进行淮海战役，歼灭刘峙主力信心百倍，不仅主动建议组织淮海战役，而且群策群力，向毛泽东提供作战的方针和部署，兵力调整和展开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次，东北决战国民党军队全军覆灭给刘峙官兵以沉重打击，刘峙官兵士气低落；而辽沈战役的彻底胜利却给中原、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极大鼓舞，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战员斗志高昂。再次，蒋介石与白崇禧矛盾公开化，根本调不动白崇禧支援刘峙，指挥不统一；而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已经会合，指挥统一。还有，中共地下党员，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和何基淬正积极策划绥靖区部队起义，有利于人民解放军从该区获得突破口。

总之，形势既有利又不利，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不能不慎重地权衡利弊。毛泽东一贯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果达不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就是失败的战争。毛泽东将此时的形势比喻为“一锅夹生饭”，如何吃这一锅夹生饭，他此时还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必须就地歼灭刘峙主力。他最后拿定吃这顿夹生饭的主意，制定出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得力于华东和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努力。

首先，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粟裕等的努力。粟裕率先提出了打淮海战役的要求，并阐述了自己的具体设想。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夕，刘峙一面变更部署，一面南运物资。张克侠、何基淬及时向粟裕汇报了这些情况。粟裕根据张、何提供的情况及从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判断蒋介石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守备的可能。11月7日，粟裕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认为淮海战役发起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如果冯治安部顺利起义，则徐州北面、东北面完全暴露，邱清泉兵团如被中原野战军拉住，刘峙很可能将李弥兵团靠近徐州，加强守备；二是，如果黄百韬兵团及刘汝明部被华东、中原野战军分别歼灭，而邱清泉兵团又被分割不能收缩徐州或已退缩徐州，只要华东野战军运河以西各纵队能包围李弥兵团，则可能孤立徐州，使刘峙不能南撤；三是，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第二步歼灭李弥兵团，则徐州之敌可能提早南撤，固守蚌埠淮河线，黄维兵团集结蚌埠或退守信阳。根据以上分析，粟裕建议：（一）华东野战军运河以西部队应乘冯治安部起义，迅速直出陇海线，分割包围碾庄、曹八集地区李弥兵团，切断其徐州退路，逐次歼灭之；运河以东部队在解决黄百韬兵团大部后，抽出2个纵队加入运河以西作战。（二）建议中原野战军歼灭商丘、砀山线刘汝明部后，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切断刘峙退路；华东野战军运河以东部队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即以主力协同中原野战军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粟裕强调：“孤立徐州，切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这样可更有利于尔后之渡江作战。”

11月8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扣留刘峙集团，将其歼灭于长江以北的建议。在建议中，粟裕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第一，以现在长江以北部队和从葫芦岛撤回的部队，继续在江北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的防御。如果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则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有大量歼敌机会，从而造成今后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渡江后不致有大的战斗。第二，立即放弃徐州、蚌埠、信阳、淮阴、淮安等地，将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长江防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争取时间整理

部队，以图划江而治，俟机反攻。如果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则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要困难得多，渡江后还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而江南的作战条件较江北差。粟裕认为，迫使蒋介石实行第一种方针，对于人民解放军有利。如果这样，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7日至9日，粟裕还几次致电陈毅、邓小平，提议在华东野战军歼击黄百韬兵团时，中原野战军以一部兵力破坏徐州、蚌埠段铁路，使徐州粮食困难。

粟裕明确提出了切断徐州之敌的退路，歼灭徐州之敌的构想。

其次，是中原野战军指挥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努力。

11月3日，即淮海战役打响前夕，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会攻徐州的意见。刘伯承指出：“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有一津浦路，……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刘伯承指出：“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按：此时孙元良兵团移至宿县），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刘伯承的意见明确地提出了“隔断徐蚌”、“会攻徐州”的方针。

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于11月5日进至永城西北会亭集、白庙及亳县以东地区，决定先歼灭尚在商丘、蔡道口、马牧集地区的刘汝明部，同时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从11月7日开始破击津浦铁路宿县南北段，以切断徐州与蚌埠的联系。11月8日，陈毅、邓小平根据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判断刘峙有可能南撤，随即电告中央军委，如果判明蒋军系南撤，设防淮河时，则建议华东野战军应举行追击，迅速进至淮河以南，津浦路以东地区，堵塞敌人的退路。

华东、中原野战军前线指挥员对敌情的判断，无疑比毛泽东更准确。在淮海战役打响前夕，华东、中原野战军的指挥员们基本上形成了“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方针。这正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相吻合。早在10月22日，毛泽东就提出了切断徐蚌线，孤立刘峙全军的构想，只是在如何围歼刘峙全军的方针上，尚未有成熟的意见。华东、中原野战军前线指挥员关于会攻徐州的种种设想和关于徐州刘峙集团可能南撤的份份电报，使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的构想进一步成熟，决心进一步坚定。同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战员高昂的斗志也鼓舞着毛泽东发出进行战略决战的命令。

11月9日16时，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提出了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电报说：“（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

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毛泽东指出：“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11月9日亥时（21至23时），毛泽东致电粟裕，“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毛泽东要求中原、华东野战军，“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并强调指出：“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这样，淮海战役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淮海战役了，它由原定打淮阴、淮安、打海州、连云港，歼灭黄百韬兵团等部十几个师，发展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铁路两侧，南达淮河的广阔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决战。从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来看，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表现了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对毛泽东制订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淮海战役总的作战方针的制订，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正式打响，至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中原、华东野战军经过66天的英勇奋战，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人，胜利地完成了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预定任务，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省的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给予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据统计，在淮海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5.7万头，船只8539艘，为战役筹粮9.6亿斤，其中运送到前线的粮食达4.3亿斤。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有力地保证了淮海战役战略决战的胜利。正如陈毅元帅指出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共中央在1949年1月17日的贺电中也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和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

## 五 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军事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发起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和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过程中。因此，平津战役发起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平津战役上已经处于战略上和战役上的优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3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3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35页。

势，并且在全国的战争形势上也处于主动地位。

#### （一）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形成。

辽沈战役临近结束、东北全境将要解放时，解决华北问题自然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问题。由于东北与华北接壤，经过辽沈战役锻炼的东北百万野战军一入关就是踏上华北的土地，华北国民党军队便成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首先打击的对象。拥有 100 万东北野战军作为机动部队的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解决华北的问题。而所谓解决华北的问题，就是歼灭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解放北平、天津等地；就是歼灭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集团，夺取太原。毛泽东解决华北问题的初步设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毛泽东的初步设想是先进行归绥战役和太原战役，然后进行平津战役。

1948 年 10 月 30 日，林彪在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的同时，致电毛泽东：东北野战军主力“等营口、沈阳之线战斗结束后，稍加补充兵员，即向北平、天津前进，夺取平津。”毛泽东接电后，从既定的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后夺取平津的战略构想出发，以及考虑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于 10 月 31 日致电林彪：“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干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毛泽东还就东北野战军主力休整期间的工作部署给予了具体指示。太原战役于 10 月 5 日打响，于 11 月中旬交战双方处于时峙状态。归绥战役也于 11 月 5 日前部署完毕，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早在辽沈战役进程中，蒋介石就坐镇北平，并与傅作义一起制订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企图以此改善华北战局。辽沈战役结束时，蒋介石满怀凄惨的心情，于 10 月 30 日伤心地溜回南京，偷袭石家庄的计划遂告破产。11 月 4 日，蒋介石在南京官邸会见傅作义，征询傅对华北作战的意见。经过多方切磋，仔细权衡利弊，蒋介石与傅作义终于形成共识：暂时固守平津。但是，蒋、傅的暂时固守平津不是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人民解放军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基点上，带有很大的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对付华北的人民解放军，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野战军必然要进关，东北野战军一进关，他们就对付不了，但他们认为东北野战军不可能立即进关，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 3 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时间，才能入关作战。暂时固守平津，就可以暂时阻滞东北和华北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和组训新兵所需要的时间。傅作义作出暂时固守平津的决策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固平津地区的防御，同时，蒋介石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集中兵力加固平津地区，傅作义从 11 月中旬开始，先后放弃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形成了以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唐山为重点的一字长蛇阵部署，以保证西撤或南逃的通路。同时，傅作义还有意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西，将蒋介石的嫡系部

队部署在北平以东，以便形势发展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可以各奔东西。

针对傅作义的兵力部署和从有关方面获得的情报，中央军委及时分析了傅作义今后可能采取的两种行动方针：一是固守平津。固守平津，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可以将傅作义部队就地歼灭。二是放弃平津。放弃平津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傅系部队退归绥、包头，蒋系部队撤至南京一带；二是蒋、傅两系部队均南撤。傅作义采取这种方针，对人民解放军有利有不利。有利，即不战而占领平津；有不利，即没有消灭平津的敌人，对今后作战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11月9日和1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两份电报，提出了“抑留傅匪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总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总方针，周恩来还提出了停攻归绥，将包围归绥部队撤至归绥与集宁之间休整，稳住傅作义，使傅作义不致西撤的意见。

停攻归绥，将包围归绥的部队撤至归绥与集宁之间休整，是中央军委为稳住傅作义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林彪接电后，除认为“暂不攻归绥的方针很好”外，还于11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暂不攻太原”的建议。林彪建议“暂不攻太原”，集中华北解放军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采取围而不攻的作法，拖住傅作义，等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再同时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

毛泽东认真考虑了林彪的建议。毛泽东认为，集中华北解放军，可以阻止傅作义嫡系向绥远撤退，但无力阻止蒋傅两系从海上撤离，并且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至于包围保定，“包围与否不关于大局”。毛泽东仔细分析了形势后，于11月16日电告林彪，希望林彪考虑争取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的问题。同时，毛泽东又指示华北解放军，对太原停止军事进攻，而进行政治攻势，“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人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撤围归绥，停攻太原，东北野战军主力提早入关作战，是毛泽东原来解决华北问题的战略构想的重大改变。毛泽东将解决平津之敌的时间从1949年1月至6月提前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

林彪接到毛泽东11月16日关于考虑争取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问题的电报后，于17日致电毛泽东，陈述了“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的问题。11月17日，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仔细地分析了所处的形势，认为人民解放军要抑留华北国民党军队于就地歼灭，必须增加华北战场上的兵力，而唯一能调动到华北的兵力，只有东北野战军。因此，中央军委于17日在给林彪及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中，又请林彪考虑争取早日入关作战的问题。

11月中旬，淮海战役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原野战军不仅取得了徐津作战的胜利，已经攻占宿县，切断了徐州“剿总”的唯一补给线与唯一陆上退路，陷徐州主力于孤立地位，而且重挫了从西面支持刘峙的黄维兵团。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的围歼已近尾声。整个战场的形势日趋明朗，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预期的胜利。在这种形势面前，华北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集团撤离平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必须及时地阻止傅作义集团撤退，否则，就会丧失良机，犯最大的错误，毛泽东冷静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有困难，但困难并非不可克服。为了争取时间而下致贻误战机，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令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的决定。11月18日，毛泽东电令林彪：“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

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11月19日，林彪回电毛泽东：“我们决遵来电子二十二日出发。”

至此，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提早入关，与华北解放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唐地区予以歼灭的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 （二）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确立。

已经形成的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其基本点是加强华北战场的兵力，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唐地区予以歼灭，但是，究竟怎样歼灭，此时尚未制定出明确的方针。

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至张家口一线，随时准备西逃；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至唐山一线，随时准备南撤。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稳住傅作义，使傅作义不致西逃和南撤，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特别是东北80万大军挺进华北，人民解放军便在华北战场占据绝对优势，傅作义西逃或南撤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傅作义早就认识到，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他无力与人民解放军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应选择什么样的攻击对象，才不致傅作义西逃或北撤，或者说能够有效地阻止傅作义西逃或南撤，这是毛泽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11月19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提议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于24日左右包围唐山，使唐山守敌不能南撤。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林彪的建议，认为在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唐山、天津较远的情况下，用先遣兵团包围唐山无异于打草惊蛇，这样会促使敌人从海路南撤，而且敌人也有足够的力量解唐山之围，接出唐山之敌，完成从海路南撤的准备，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很难歼敌。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于11月20日致电林彪，明确指出包围唐山之敌的时间值得考虑，须等候毛泽东的最后命令。11月26日，毛泽东又电告林彪，明确指出“不要去包围唐山”。

毛泽东主张平津战役应从西线开始，即攻歼平津铁路的平、张段之敌，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首先是稳住傅作义集团，待到完成战略包围之后再予以全部歼灭。因为傅作义部队部署是一字线长蛇阵，如果把唐山、塘沽、天津比作蛇头的话，那么绥远、张家口则是蛇尾，捉住蛇尾，蛇头必然回转。也就是说，包围张家口，即可稳住傅作义，使之不致南撤，也不可能西逃。毛泽东说，只要在12月份内吸引傅作义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平张线上的作战，并对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作战任务及兵力部署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兵力部署，毛泽东的设想是，东北野战军位于锦州、大虎山、营口等地区的5个纵队先行出发，其中以3个至4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之敌；以1个纵队隔断天津与塘沽之敌；以1个纵队与先遣兵团隔断唐山、塘沽之敌。即从兵力部署上分割北平、天津、塘沽、唐山之敌，使之不能收缩，也不能从海上逃走，以利各个歼灭之。关于作战任务，毛泽东指出：东北野战军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平津线上廊坊等地之敌，只有歼灭此地之敌，并歼灭北平方面可能派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84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90页。

出的增援之敌，才能实现切断平津联系的任务。与此同时，还应以必要兵力包围唐山之敌，使其跑不掉。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切断平津联系和包围唐山的任务完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是歼灭唐山与天津之间的敌人。然后逐一歼灭唐山之敌，占领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最后夺取北平。

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分割围歼傅作义集团的步骤，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兵分南北两路，夜行晓宿，浩浩荡荡向华北挺进。

11月29日，平张线上的作战正式打响，平津战役正式揭开战幕。毛泽东选择在平张线发起进攻，旨在拖住傅作义，一是阻塞其西逃，二是使其不致南撤。然而，傅作义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认为华北解放军在张家口方向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于是决心趁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华北解放军分散的时机，集中兵力给进攻张家口的解放军以一次歼灭性打击，以利回过头来固守平津。他即调主力驰援张家口，以保障平张线的畅通，便于以后西逃。

平张线上的作战将傅作义的嫡系大部调往平张线上，造成北平势力薄弱。为了加固北平，傅作义又急忙调整部署，除令增援张家口的部队返回北平外，还从天津、塘沽地区调集兵力增防北平，这样又造成天津、塘沽、唐山等地兵力减弱。

为了达到将傅作义集团歼灭于平、津地区的目的，毛泽东于12月11日致电林彪，提出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方针明确规定，平津战役的攻击次序为：“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方针规定了继续抑留傅作义集团的重大战略措施：

首先，“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毛泽东强调指出：“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毛泽东提议林彪命令东北野战军，“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的地区，即廊房、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其次，“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幸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再次，“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至此，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正式确立了。这个方针可概括为：东北野战军主力提早入关，与华北解放军联合作战，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稳住傅作义集团，并实施战略分割和包围，待到完成战略分割包围后，对敌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求就地全歼。叶剑英曾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傅作义集团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下围”以及对杜聿明集团延缓最后歼灭部署的战略措施，认为这是“超乎寻常的”，表现了毛泽东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

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正式打响，至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平津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平津战役的胜利，使整个华北基本得到解放，并使东北、华北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的基础。

## 六 三大战役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精心组织和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142天，共歼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人，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有生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在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呕心沥血，密切注视各个战场的变比，起草了300余份军事电文。亲手制订了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不仅充分调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也表现了自身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作为杰出的军事家的才能。

毛泽东的首要贡献，在于根据战争形势，掌握战略决战的时机，审慎地选准决战方向和决战目标，从而奠定了三大战役战略决战的胜利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很多著作及论文均有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我们不打算进一步展开。我们只就毛泽东在三大战役中采用的战略战术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首先，毛泽东根据不同的敌情，采用不同的战略战术。这是三大战役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形成的战略态势，采用了关门打狗的战略战术。东北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都市及其附近地区。从长春、沈阳、锦州3个城市自然形成的战略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1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

态势看，可以作这样的比喻：锦州是其头，沈阳是其腹，长春是其尾。如果打以锦州为中心的北宁线，就可以扼住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咽喉，切断其陆上退路，置国民党军队于死地；如果攻打长春，则是揪住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尾巴，沈阳之敌可能增援，人民解放军可能拖住或歼灭长沈之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之敌不增援，反而利用人民解放军攻打长春之机，撤离沈阳退至锦州，这就更加强了锦州的力量，锦州和沈阳之敌有可能浩浩荡荡，破关而去。并且蒋介石早有撤离东北之敌的主张。如果打沈阳，不仅是沈阳地区集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兵力多，战斗力强，不好打，而且在攻打沈阳时，国民党军队有可能从长春和锦州增援，对人民解放军形成南北夹击、中间突破之势。针对长春、沈阳、锦州自然形成的战略态势，毛泽东力主先打锦州。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攻破锦州，就造成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战略态势。

在攻打锦州时，毛泽东采用的是集中兵力，实施“攻锦打援”的确略战术。一方面力求迅速地攻克锦州；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攻打锦州时，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援锦之敌。毛泽东9月7日命令东北野战军：你们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榆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9月10日，毛泽东又命令东北野战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还对如何歼灭援锦之敌作了具体部署：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陵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集中兵力80万，采取一点两线的作战部署，把部队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线津浦线上，重兵密集，便于相互支援，以免被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毛泽东采取了集中兵力分割围歼、中间突破，并以一半以上兵力阻击、打援和牵制敌人的战略战术。当时，黄百韬兵团位于徐州以东，是刘峙集团的左翼劲旅，歼灭了黄百韬，就等于砍掉了刘峙的左臂，并还可吸引徐州的敌人东援，便于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消灭了黄百韬，也切断了徐海之间的联系和敌人的海上逃路，形成对徐州的包围，从而为战役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明确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毛泽东在部署围歼黄百韬时，同时部署攻克宿县，切断徐蚌线。这就完成了分割围歼，孤立徐州的任务。第二阶段，在宿县双堆集地区围歼蒋介石从华中调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同时将从徐州南下增援的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包围在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当即消灭孙元良兵团。第三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平津战役中，针对傅作义的一字线长蛇阵，毛泽东采取了与辽沈战役相反打法，即辽沈战役先打头，其次打尾，最后包围腹部，而平津战役是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1页。

先打尾，其次打头，最后包围腹部；辽沈战役是关门打狗，平津战役是先捉尾，迫使蛇回头。毛泽东首先发动了平张线上的作战。平张线上的作战迫使傅作义将部队调往平张线上并加固北平后，毛泽东立即部署部队，切断傅作义的海上退路，进行分割包围，并成功地运用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其他一系列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一贯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战略原则贯穿三大战役的全过程。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决战，交战双方都拥有重兵，或者说是重兵交战。蒋介石也深深地懂得这一战略原则的作用。然而，毛泽东却比蒋介石技高一筹，将这一原则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一是毛泽东尽可能地将尽可能多的兵力部署于一个战场。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毛泽东集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于淮海战场，集中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兵团于平津战场，两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二是在战役发展的阶段上，毛泽东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对象。在打锦州时，毛泽东叫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集中兵力歼灭锦州之敌；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人民解放军分别包围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毛泽东部署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第三阶段集中兵力歼灭杜聿明集团；在平津战役中，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完集中兵力打新保安，接着集中兵力打天津。三是毛泽东采用集中兵力的办法，切割敌人的兵力，从整体上削弱敌人，陷分散的敌人于孤立的地位，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辽沈战役开始前，国民党军队就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都市；淮海战役开始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将相互策应的一点两线部署的刘峙集团分割在碾庄、徐州、蚌埠、蒙城四个地区。平津战役中，傅作义集团的一字长蛇阵部署迅速地被人民解放军切割成若干段。另外，毛泽东还用集中兵力的原则组织战略协同、打援和阻击。

毛泽东在三大战役中，不仅坚持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敌人；而且坚持打大规模的阵地战，夺取敌人的重要据点和大城市；并且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辽沈战役中的“攻锦打援”，不仅是攻破锦州这个大都市，而且试图调动沈阳之敌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对于城市攻坚战，毛泽东强调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才能开始攻击。要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尽可能多的炮火和炸药，以及灵活机动的战术。当国民党军队撤离或逃跑时，要跟踪追击，平行追击和堵击，应大胆地穿插在运动的敌人之间，实行分割围歼，各个击破。

毛泽东在三大战役中，还成功地运用了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战略战术。1937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并提出了“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的方针。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一直坚持了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辽沈战役攻占锦州后，人民解放军对困守长春的敌人在采取军事包围的同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政治攻势，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第60军起义，国民党新7军投降，长春宣告和平解放，在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后，针对傅作义的和

谈要求，于12月19日派出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但傅作义要价太高，没有和谈的诚意。人民解放军遂于20日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间的联系，并于21日至24日，先后发起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从军事上给傅作义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傅作义举行第二次谈判，然而傅作义依仗手中的几十万军队，不肯接受和平改编。人民解放军遂于1949年1月14日发起天津战役，仅29个小时便攻克天津，全歼守敌。这又给傅作义一个严正的警告！1月1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向傅作义送去和平解决北平的最后通牒，限傅作义于4天之内作出最后答复。在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不得不选择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的结果。

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三大战役丰富生动的战争实践，也给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养料，培育了军事天地里这株大放异彩的奇葩。

## 第十八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有生力量，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中国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个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国胜利的任务，面临着最后地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任务，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任务。一句话，即面临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成功地制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和策略，使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乘风破浪，永往直前。

### 第一节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口号，是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如果说这个口号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战略口号，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出的话，那么，在三大战役结束后，这个口号就成为一项具体的任务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并且完成这一具体任务的时间也指日可待了。

#### 一 粉碎新的和谈阴谋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其反动统治已陷于土崩瓦解的绝境。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美蒋反动派深深感到，单纯依靠军事斗争已经无力阻挡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于是，又策划了一场和平阴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扑灭革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的。当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时，美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鉴于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美帝国主义便开始在中国重新寻找代理人，以期“扭转潮流”。1948年10月，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建议可否劝告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时离职，并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他就可以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而将共产党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12月，司徒雷登又告诉孙科，明确提出蒋介石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得到美国政府更多的支持来扭转败局。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增加援助和派一名高级军官来中国直接指挥作战：遭到杜鲁门的拒绝后，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

赴美乞援，但宋美龄在美国处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找李宗仁商议，准备以“主动下野”的办法促成和谈。1949年元旦，蒋介石正式发表求和声明。于是，美蒋反对派导演的再次和谈的闹剧便拉开了帷幕。

对于美蒋反动派策划的这场和平运动，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某些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民主党派曾寄予希望。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接受美蒋反动派的和平建议，举行没有反革命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成立他们所主张的联合政府以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既与美蒋反动派有联系，又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美国的拉拢和煽动下，形成了所谓“中间路线”。这些人中，或主张联邦制，划江而治；或主张建立反对党；有的甚至企图通过和平谈判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三分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面临着半途而废还是进行到底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争取的中国的光明前途不再是建立联合政府，也不再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光明前途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指出：美蒋反动派的和谈，实质上是“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指示：“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是蒋介石的20多年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所证明了的。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行动，粉碎美蒋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动摇态度，毛泽东强调指出：“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新华社评论，进一步揭露了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的和谈阴谋。

为了更加深刻地揭露和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使全党保持高度的警惕，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重申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

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但是，基于“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的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声明发表后，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同时，毛泽东的声明，也是对蒋介石求和阴谋的深刻揭露。

蒋介石的求和阴谋不能得逞，不得不于1949年1月21日以所谓“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台后，玩弄了种种“和平”游戏，以“培养国内和平空气”，并宣布愿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但李宗仁进行和谈的真实目的，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确保控制江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从而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代蒋介石，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尽管这样，中国共产党仍把李宗仁与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因此，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周恩来作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李宗仁政府举行和平谈判，谈判从1949年4月1日开始，至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4月20日，南京李宗仁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这就彻底地揭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面纱，显露了他们要将反人民的战争打到底的决心。

## 二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国民党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人民解放军遂发起渡江作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22日胜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精心设防的千里江防阵地，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的灭亡。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中南和西北、西南进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渡江部队中、东两突击集团实行东西对进，包歼南京、镇江逃敌5个军，并于5月3日解放杭州，进逼上海；西突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1页。

击集团分多路齐头并进，截歼逃敌 10 万余人，并于 5 月 17 日解放九江，22 日解放南昌。四野先遣兵团 5 月 14 日横渡长江，16 日解放汉口，17 日解放武昌和汉阳。5 月 27 日，上海宣告解放。在进行渡江战役的同时，华北人民解放军和第四野战军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先后解决了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据点，使华北除绥远外全部解放。5 月 20 日，第一野战军也解放了西安及渭河流域地区，为向西北进军创造了条件。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于 5 月 23 日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的电报，决定：（一）第三野战军向福建进军，争取于 6、7 两月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相机夺取厦门。（二）第二野战军目前的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待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消失后，以主力或全军西进，经营四川、贵州、西康等省。（三）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占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歼灭白崇禧部队。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后，一部负责解放新疆，一部进军川北，协助二野经营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二野在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消失以后，迅即占领贵州、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五）鉴于胡宗南正向四川撤退及向昆明撤退的动向和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军阀正在作迁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准备，为了消灭胡宗南及四川、西康的国民党军队，非从南面进军断其后路不可。因此，除二野经贵州进军四川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追歼。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后，分路向浙江、福建进军，至 7 月上旬，解放了除舟山群岛外的浙江全省：8 月 17 日解放福州，10 月 17 日解放厦门。第一野战军和华北人民解放军 8 月 26 日解放兰州，9 月 5 日解放西宁，9 月 23 日解放银川，9 月底，新疆宣告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从 7 月开始发起解放中南各省和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7 月 16 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提出了和白崇禧集团作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9 月初，原来担负警戒美国武装干涉的第二野战军开始行动，经武汉，常德，进入四川。9 月 12 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重申了“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第四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 1949 年 11 月，历经 1 个月的追歼作战，将白崇禧和余汉谋部歼灭于广西地区。第二野战军在一野一部和四野一部的配合下，从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4 月，历经半年作战，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诸省，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粉碎了蒋介石迁都重庆，依托西南，图谋东山再起，或经云、贵逃往国外的迷梦。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除了采用远距离包围迂回，然后再打的作战方针外，还正确地运用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解除敌人的武装。对于负隅顽抗之敌，毛泽东则采用就地歼灭的作战方针。由于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地提出和采用适

---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339 ~ 340 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342 页

合敌之特点的战略战术，因此，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至 1949 年 9 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至 1950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便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 第二节 新形势下的战略转轨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任务”，就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基本歼灭和国民党政权的濒临崩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将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任务。也就是说，历史发展进入新时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战略转轨的任务。

### 一 战略转轨时机的成熟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提出的“革命前途问题”时，就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两篇文章的观点，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有几个基本点：一是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否完成；二是政治条件，既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是否提高，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否实现；三是经济条件，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否增长。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才谈得上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 1949 年初，上述条件基本上具备。也就是说，战略转轨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基本上完成，这是革命转变的总前提。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推翻作为美帝国主义走狗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后，“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也就是说，作为蒋介石集团主要支柱，或者说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摧毁，蒋介石集团面临着覆灭。而人民解放军正以压倒的绝对优势展开战略追击，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73 ~ 137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73 ~ 1374 页。

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民主革命即将完成，便将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在革命面临转变之际，蒋介石又重新玩弄和谈的阴谋，而一些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人物企图走反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中间路线”。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表了《论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明确指出，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而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将中国引向黑暗的世界。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路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走！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求毛泽东尽快作出革命转变的决策，以保证中国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

其次，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为顺利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条件。

领导权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由于陈独秀坚持“二次革命论”的立场，放弃领导权，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权的斗争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伊始，就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贫雇农，团结中农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并实现了对工人阶级、贫雇农和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人民解放战争是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包括工人阶级、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之间进行的。当然，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还交织着一种所谓的中间势力。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前途，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第三条道路。

人民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的方针，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947年2月，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3页。

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反复强调了思想，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以及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的真诚态度，与国民党蒋介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蒋介石在疯狂反共的同时，也对坚持民主进步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进行迫害、殴打、监视，甚至逮捕、杀害民主党派的著名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镇压学生爱国运动。1947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的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 月，民盟被迫解散。

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面前，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深切地感受到：“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应当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1948 年 1 月，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否认南京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会议重新确立了民盟的政治路线，批判了中间路线，决心联合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从此，民盟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人士的代表。会议强调，脱离和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并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月 5 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1948 年 8 月以后，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1949 年 1 月，到达解放区的 55 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至此，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对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一方面表明全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的光明前途，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去；另一方面还表明，全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率领全国人民奔向中国的光明前程。因此，中国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3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7 页。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 718 ~ 719 页。

共产党领导地位在全国人民中的确立，本身就提出了战略转轨的要求，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成长，为实现革命转变提供了内在驱动力。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经济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重视经济问题，努力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见，毛泽东此时便认识到了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因此，毛泽东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农业方面，鼓励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鼓励组织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对于某些重要农产品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在工业方面，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尽管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应当有精密的生产计划。在对外贸易方面，有计划地组织人民进行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当时根据地的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强调：要“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由于毛泽东既注意处理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关系，又强调了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解放区贯彻实施这三大经济纲领，进一步改变了解放区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的构成，包括国营经济，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中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0~13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是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为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财贸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农业方面，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东北地区恢复的耕地面积，1947年为80万响，1948年为78万响，1949年为50万响。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1947年为600万吨，1949年为1400万吨，两年之中增加了一倍多。

在工商业方面，各解放区都创办了一些公营企业；许多城市解放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而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私营工业、私营商业也有较大发展。公私工商业的发展，使解放区的工商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财政金融方面，1948年以前，由于各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各解放区的货币、财政是分散管理。1948年12月，召开了各解放区联合财政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人民币，逐步收兑原有的各种地方性货币。人民币的统一，是人民革命胜利的标志。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实施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解放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不断增多，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

总之，至1949年初，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即将被消灭，大部国土已经解放，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都站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历史的发展将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要求提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要求毛泽东实行革命的战略转轨，并提出战略转轨的任务，以顺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

## 二 战略转轨的任务

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已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顺应革命发展的要求，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建立全国政权和实现革命转变的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并着重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的任务，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即提出了战略转轨的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首先，要彻底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力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还剩下 100 多万军队，这 100 多万军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毛泽东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决敌人；绥远方式，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处境比较孤立的敌人，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再进行改编。毛泽东指出：尽管用后两种方式解决敌人的可能性增加了，但“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其次，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毛泽东指出：从 1927 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必须城乡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用极大的努力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要立即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第三，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没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第四，要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正确的政策，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要进行限制。毛泽东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第五，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 90% 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六，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个矛盾，必须强化而不是削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

第七，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强调，全党务必克服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2 ~ 1433 页。

弹的攻击，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将党的领导者的名字用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第八，革命胜利后，要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我们决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制度。我们要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战略转变的任务，解决了我党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使全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做好了迎接革命转变的充分准备。

### 第三节 革命转变的战略和策略准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面临着两个革命阶段的交叉与衔接。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在革命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由革命转变引起的政权性质的转变、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和社会性质的转变，交错于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在革命转变过程中，必须使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分逐步减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逐步增多，并占居整个社会的领导地位，才标志着革命转变任务的基本完成。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完成革命转变任务的战略和策略，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又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 一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列宁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实现革命转变的重要保证和根本标志。

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对于实现革命转变任务的重要性。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的设想，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一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

---

《列宁选集》第1卷，第576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

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最后覆亡，实现了毛泽东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的设想。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领导机构——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即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百年来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回答了人民共和国的前途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会议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平，同时恢复北平原来的称谓，改称北京。

9月30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式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革命转变过程开始的最根本、最关键的标志。正如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指出的：“标志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88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89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90页。

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时也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便命令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摧毁一切残存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权便建立起来。至1951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时止，除台湾省及一些沿海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全国其他地方均获得解放。

## 二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指挥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向西南和中南进军，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从政治上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又部署经济建设工作，确立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方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全党工作的重心应放在生产建设上。并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政府所有，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使人民政府控制了国家经济的命脉，操纵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牢牢掌握了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为组织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和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经济条件。

建国初期，毛泽东还正确地领导了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建国初期，一些投机资本家趁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之机，凭借他们在市场上占有的经济力量，扰乱金融，囤积物质，哄抬物价，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威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及时部署了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斗争，与投机资本家展开“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毛泽东称这次斗争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打击投机资本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04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4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要开支。第二，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棉布、工业器材等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以便有计划地调节国内供求，控制市场和组织对外贸易，对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数量，采用转帐支票和银行汇拨，以便有计划地调节现金流通。中央人民政府雷厉风行地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初步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从根本上稳住了物价，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刚成立，中国人民和中央人民政府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在农村，约有 3.1 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地主阶级还没有推翻，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枷锁还沉重地套在农民身上，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在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没收官僚资本后转为国营厂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旧的官僚机构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还影响着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地位的确立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瘫痪多年的交通运输还没有修复，货流不畅，城乡交通困难的问题还困扰着国家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平稳物价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形成的虚假购买力骤然消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固有的弊端和弱点彻底暴露出来，对新的环境一时无法适应，在生产经营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一大批工厂商店因商品滞销，经营亏损、资金短缺、周转不灵而倒闭。工商业的不景气，扩大了失业人群，仅上海市，1950 年春即新增失业工人 10 多万人，全国失业工人达 117 万。由于家长失业，学生辍学，上海中小学的 80% 因学生来源不足而被迫关门停课。革命胜利后经济改组带来的困难和阵痛，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的紧张，资产阶级误认为共产党要提前实现社会主义而惶恐不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或由于失业、失学，或由于负担过重而对人民政府有怨言。人民政府面临的形势仍是异常严峻的。

为了全面分析建国以来，特别是平稳物价、统一财经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结前一段的工作，明确今后的任务，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中共中央于 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全面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了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应做好的工作，并详细地阐述了在这些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建国后几个月来，虽然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三年内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强调：“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指出，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做好下列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为了达到尽快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目的，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对人民解放军和国家行政机关进行整编和精简，以节省军事行政费用，加强经济建设事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认真做好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六）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问题；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让人民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权。

（七）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搞好 1950 年的整风工作，克服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批评了在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批评了粗暴对待知识分子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急于进行改革的“左”的情绪，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毛泽东的报告，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七届三中全会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首先是调整工商业。

调整工商业，包括三项内容，即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要求是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在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国家从经营范围、原料供应、产品销售、价格政策等方面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应有的照顾和扶持，适当减轻私营工商业的负担，使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有所发展。调整劳资关系的要求是，既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又防止工人的过高要求；劳资间的纠纷，按有利于生产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调整产销关系的要求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通过各行业内部及行业之间的协调，克服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和经营中的盲目性，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达到产销平衡。工商业的调整，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轨道向新民主主义的新轨道的转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得到了扶持和发展，不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行业被淘汰，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彻底改革土地制度。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6月30日颁布实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或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借此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年冬，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铺开。中央人民政府在总结老区土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新区的土改作了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将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量的200%者均保留不动；规定在土改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规定在土改中，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规定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规定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分批分期进行，不误农时；要求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预期的胜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再次是国家机构的整编和精简。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讨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决定时，就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行编制(草案)》和《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七届三中全会后，政务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提高工作效率，精简节约的原则，对中央人民政府、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省(市)人民政府、专员公署，县人民政府等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作了统一的规定。在精简整编过程中，各级领导机关还注意把精简整编与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注意加强财经部门和基层，注意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撤销重复设立的机构，尽量减少机构层次。在国家行政机关精简，整编的同时，也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国家行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减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第四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主要有：网罗各种反革命力量，组织各种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武装，妄图与人民政府对抗到底；组织暴乱，袭击和进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袭击、暗杀革命干部，制造白色恐怖；破坏交通，烧毁民房，抢劫仓库、粮站，扰乱社会秩序；造谣惑众，制造混乱，离间人民群众与人民政府的关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而且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的根本好转带来巨大威胁。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后，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毛泽东为镇压反革命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毛泽东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

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 1950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策略问题的电报中提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又进一步规定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1. 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 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 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 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 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1951年5月，毛泽东又提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由于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镇压反革命的策略，及时纠正了镇反工作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至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共消灭国民党特务、土匪200万人以上，镇压了大量的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基本上肃清了残存的各种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镇反运动本身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通过镇反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充分焕发出来，这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争取财政的根本好转，同时也为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第五，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在农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工作，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粮食产量为11318万吨，至1952年则增加到16392万吨；棉花1949年为44.4万吨，1952年则增加到130.4万吨。在工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在国营工矿企业广泛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使企业从所有制到经营等方面均成为名副其实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企业，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营获得了根本好转。这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争取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六，大力发展国内外贸易。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不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衰落，而且也表现在国内外贸易的萎缩和停滞。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是实现国家财政根本好转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国内贸易方面，党和政府采取建立和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大力发展城乡合作社商业，并充分发挥私营商业的作用等措施，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在对外贸易方面，1949年12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页。

月 22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先后同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朝鲜、锡兰、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以及英国、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芬兰、荷兰、智利、日本等国建立或发生了外贸关系，1952 年的进出口额从 1950 年的 41.6 亿元上升到 64.6 亿元，并且基本上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平衡。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也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至 1952 年底，中国人民克服了建国初期的严重困难，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封锁和破坏，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伟大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 三 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

建国初期，在一部分干部中滋生了一种由于革命胜利而来的“左”的情绪，他们主张乘胜消灭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在 1950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人就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的经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要无限制的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例如火柴工业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国营生产很多，对私营不必扶持，甚至禁止”。对资本家提出不要与民（即民族资产阶级）争利的问题，说我们就是要“与民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有人说，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对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过“左”的作法，不让教授上课，不让旧艺人演戏，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文化教育部门的改革。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改革的偏向，等等。这些“左”的思想和行为，造成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在生产和经营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人民政府稳定物价的工作中他们的急刹车，引起社会经济一时发生“后仰”现象，货币流速大为降低，商品销售量大为减少，一大批工厂由于商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而关门停业。在困难面前，民族资产阶级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人民政府的税收、公债。有的甚至认为共产党迟早要共产，不如早共产，因而要求献厂、献店、解散职工、消极经营，有的还逃至香港。这时，“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为了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和行为，调整和理顺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集中力量，一致对敌，为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9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 页。

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条件，毛泽东从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出发，全面分析了统一战线内部和外部的请种矛盾关系，分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阶级和阶层在新形势下的特点，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中就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

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面临着复杂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为此，“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现在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毛泽东提出：（一）要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二）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三）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四）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和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五）对知识分子，要通过办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以使用他们；同时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等课程，以教育和改造他们。（六）在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要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毛泽东指出，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2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页。

了。”

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中心问题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纠正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时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错误，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一道，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党和政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采取谨慎稳妥的步骤，牢牢把握主攻方向，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对资本主义加以区别，先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立即消灭资本主义，以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建国初期，既发挥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因素，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经营，又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甚至破坏因素。针对投机资本家四次刮起的涨价风，党和政府采取坚决的打击措施，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1952年，党和政府又针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运动中采取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争取和改造了大多数资本家，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反动资本家。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党和政府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使镇反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党和政府把以往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样“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从而使土地改革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1952年底止，由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巩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际形势也正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便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审时度势，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完成革命转变的总路线，从而使中国革命顺利地、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72页。

## 第十九章 人民政权的新模式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锐不可挡之势，跨过长江天堑，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灭亡。如何建立人民政权的任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织部分，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面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 一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发展为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他们在考察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时，认为英国与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不同，因此英国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采取与法国和德国不同的形式。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国度有不同的形式。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用俄国的实际，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并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因此，在最初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中，也沿用了苏维埃的称号。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1931年，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已经成为最紧迫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了将工农共和国的口

---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192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19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

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并对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作了充分的说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使得我们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过去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

毛泽东强调指出：“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不会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的。因为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为保护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提供了保证。

从上述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此时尚未明确地提出他后来所表述的“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口号，但实际上这一口号所包含的内容在此时基本上都明确地提出来了。毛泽东这时的人民共和国方案，实际上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由此表明，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毛泽东初步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进行政权建设。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服务于抗日战争，服务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毛泽东依据各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于1940年3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他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15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在成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即“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

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还规定了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组织形式和施政方针。毛泽东指出：“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1940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日三周年撰写的《团结到底》一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政权的观点：“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

从上述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标志着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基本成熟。

## 二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化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国内人民大众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突出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愿望出发，为争取使用和平的手段建立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建国的诚意。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却毫无和平建国的诚意，于1946年6月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反革命内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被迫应战。

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1947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向前发展，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将建立全国政权的任务提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7页。

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从理论上解决了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任务。

1948年12月31日，毛泽东针对美蒋反动派新的和谈阴谋，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这里虽然仍沿用他以前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称谓，但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与他以前即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并非完全一致，而有所区别。在以前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产党是争取领导权；在这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产党已经实现了领导权。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及任务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的这些话，都被写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成为中共的主要政治纲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专题论文，系统地、完整地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首先，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其次，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

再次，确定了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1479页。

《毛泽东选集》，第1479页。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第四，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第五，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毛泽东指出：对反动派则实行专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已经系统化。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政权体制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巩固自己的统治，管理国家和社会，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经指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创造了适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政权建设的道路。

### 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成和发展

政权体制不仅体现着国家的阶级本质，而且是国家阶级本质实现的保证。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种不同的政权体制，即君主制政权体制和共和制政权体制。君主制政权体制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典型政治形式，它的特点是个人独裁，终身任职和权力世袭。共和制政权体制是与君主制政权体制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权体制。资产阶级政权体制貌似公正，实际上不过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只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考察了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政权体制后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权形式是社会共和国。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体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逐步形成的，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7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9页。

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时建立的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实行会员代表大会制度，农会会员代表大会是农会的最高决策机关，决定农会的一切重大问题。“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虽然农民协会仍是农民的群众性组织，但它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我党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初形式。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并进军井冈山，开始了武装斗争的生涯，同时也开始了政权建设的实践。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县、区、乡组织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军队中也组织了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央临时政府，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当选中央临时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在政权的产生方式、组织原则、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划分和行使方面，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或者说，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程。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权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提出了政权组织的“三三制”原则。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虽然在政权机关成员构成以及基层政权的设置方面不同于工农兵代表会议制，但政权的产生方式及组织原则方面，仍然沿袭着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的传统。因此，人民代表会议制是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政权的建设，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和国理论的重要发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相继提出了建立人民政权的要求，有些完成了土地革命任务的地方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为了加强对建立政权工作的领导，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对政权建设问题作了规定。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

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普遍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各解放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不同的形势下召开的。有的已经完成土地革命，有的则土地革命刚刚开始。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更有利于组织和领导土地革命工作。各解放区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同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成功经验，改变了毛泽东原来设想的在土地革命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计划。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充分肯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同时建立区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不但晋绥解放区应当这样做，在一切解放区，都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每夺取一个地方，就帮助当地人民完成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工作。1948年8月，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根据毛泽东早就明确提出的方针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这样，就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从而使我国的政权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 二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确立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原则。毛泽东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机关的建设中，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时，同时确立了国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2~127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9页。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89页。

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原则。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选举政府的执行委员会时，就提出了工农兵代表会和政府执行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强调要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又强调在党和红军中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到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组织原则时，提出同样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指出：“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毛泽东强调指出：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不仅强调政权组织应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明确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

---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这就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为我国政权机关的根本组织原则，从而既体现了人民政权的群众性和权威性，又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毛泽东确立的政权机关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权体制的重要内容。

###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既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又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出发，并没有拘泥于苏联的“一党制”，而始终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从而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历史地形成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力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的党外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毛泽东采用“三三制”的原则，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势力参与抗日政权，共同抗日。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与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势力建立了亲密合作的关系，这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打下了基础。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势力在政治立场上与中国共产党存在根本的差异，他们大多是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随着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阶级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相继建立了一些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从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出发，试图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制度，去争取国家政权，实现他们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它们中，有的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与国共两党分权合作；有的主张在国民党的独裁专政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之间谋求“第三条道路”，拿所谓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所谓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既有妥协的、甚至反动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它们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争取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为统一战线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1944年10月，毛泽东指出：“统

---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9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为了改造，先要团结。”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针对一些人怀疑共产党的真诚团结的方针时指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对民主党派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推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于非法的地位。这就使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更加密切。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结成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全面内战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各民主党派的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必须尽可能地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4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毛泽东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积极响应，从1948年8月以后纷纷来到解放区，参与新政权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等先期到达解放区的55个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支持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根据“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的情况，明确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负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又阐述了对民主党派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强调指出：对民主党派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提出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团结合作的方针。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这次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9页注（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 23 个单位。1949 年 9 月 12 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等。毛泽东在 9 月 21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及《共同纲领》的通过和会议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已经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权体制的重要内容，为调动各民主党派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献计献策，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了重要的作用。

### 第三节 执政党面临的新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使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从此结束了被屠杀、被围剿的历史，从战争时期进入和平时期，党从在野党变成执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从形势、任务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求出发，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执政党建设的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执政初期的严峻考验，并领导人民胜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

#### 一 面临执政时期的党的建设

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殊死的奋战，逐步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中国共产党面临全国执政的任务。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提出的历史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 （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1947 年底至 1948 年初，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然而，在党内和军队内部，还存在一些与这一新形势不相适应的情况。这些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党我军长时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处于被敌人分割围剿的环境造成的。这种被敌人分割围剿的环境和游击战争

环境，虽然锻炼了各地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斗争能力，但是也形成了某些无纪律和无政府的现象，形成了各自为政和各行其是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主要表现为，对于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细心研究，不认真执行，对于带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粗率地不细心地擅自处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以至在某些行动中和宣传中违反党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将一切可能统一和必须统一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党组织不犯或少犯错误。为此，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办法。”毛泽东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毛泽东明确指出：“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

但是，《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发出后，一些地区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仍不大重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仍然极其严重。为此，中共中央于1948年2月22日发出了《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部署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整党工作。1948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首恶者必办的问题和关于集中领导权力的问题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再一次阐明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集中领导的重要性。指示说：“我们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道路上，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的政策和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工作上在几个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工作、政府行政工作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宾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在各地区和各部队，则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统一领导。”

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必须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纪教育。为此，毛泽东又指示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即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然而，由于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是长期形成的，不易克服，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一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126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页。

《党的学说文件汇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6～17页。

些地方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仍然不大重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并且还有一些同志由于对于何者属于中央的决定权，必须事前请示报告不明确，因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使中央不能及时了解情况和予以指挥。为此，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从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工作等方面，明确规定了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批准后才能付诸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案。决议指出：凡属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情，中央已有决定指示者，各地必须严格遵守，认真执行。在执行中遇有困难或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时，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中央尚未作出决定指示者，各地有权向中央建议，并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处理方案，拟出决议草案，请求中央公布或由中央批准后以地方名义发表。毛泽东在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还根据当时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历史原因及其危害，明确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提高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所以，全党有效地克服了党内、军内的无组织和无纪律状态，克服了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保证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毛泽东厉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建立报告制度，不仅为迅速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准备了条件。

## （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是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基础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战斗历程中能够不断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坚强地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斗争，渡过许多难关，取得伟大胜利。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或由于处于地下状态，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没有很好地发展的。“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在政府工作中的民主生活的不足，已使我们党的组织及政府机关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在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又常常发生极端的民主现象或无政府现象。所有这些情形，就使党内某些错误的、不正派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和无纪律状态，得以暗中流传和滋长，因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许多的损失。”这种情况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适应的，也是不利于实现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课题。毛泽东把这少任务的完成视为能否完成党面临的其他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

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上述情况，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问题作了以下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党的学说文件汇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9页。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开会要有充分的准备。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此外，还规定要健全党委制，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的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这些规定，有利于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但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机关长期形成的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惯不是一下子可以克服的。在当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既不利于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利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为了健全党委制，实现党的集体领导，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为了使党委集体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会议制度能够坚持下去，毛泽东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一是：“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大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二是：“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三是：“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四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毛泽东制订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指导全党各级党委坚持集体领导，克服个人包办的现象起了重要作用，使党的建设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阶段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准备了条件。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 （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中央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精力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三大战役取得了彻底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134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题解。

全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面临全国执政的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全国执政的准备，中共中央于 1949 年 3 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阐明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战略问题，并且还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在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将要成为执政党，党的地位的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要求党必须特别注意加强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毛泽东充分预料到党执政后的情况：“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要求全党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党执政以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使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炮弹的攻击，是党执政后自身建设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党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毛泽东在党临近执政时及时地提出这些问题，要求全党注意这些问题，为党执政后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打下了基础，为党迎接执政后的新考验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认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也就是说，毛泽东深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经得住执政后的新考验，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 （四）制订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中央九月会议上提出了健全党委制的问题，紧接着又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阐述了党执政后所面临的任務。然而，这些任务能否完成，党能否经得住执政后的新考验，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又论述和制订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着重阐述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问题，为健全党委制，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制订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的内容是：

第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就是说，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8 ~ 14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9 页。

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善于向党委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把这一班人指挥好，使党委一班人团结一致，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就是说，书记与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级的，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第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就是说，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下摆到桌面上来讨论，就会长期得不到解决。书记和委员之间、委员之间要开诚布公，不要在背后议论，同时要互相谅解。领导干部之间的谅解、支持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一班人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语言是十分重要的。取得了共同语言，有利于实现党的集体领导。如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则不利于实现党的集体领导，必须予以克服。毛泽东指出，取得共同语言的思想基础，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四，要“不耻下问”。就是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领导干部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的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对于下面的意见，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于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的做。对于不正确的意见，也要认真听，不过听了以后要给予解释、说服甚至批评。

第五，要学会“弹钢琴”。就是说，党委领导工作要有节奏，书记和委员之间要互相配合。要抓紧中心工作，同时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兼顾，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

第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工作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第七，要胸中有“数”。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如果不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注意基本的统计分析，不注意百分比，就不懂得决定事物数量的数量界限，就是胸中无“数”，就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事物的质量总是通过一定的数量表现出来的，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第八，要“安民告示”。就是说，开会要事先通知，让大家知道会议要讨论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如果会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这是不好的。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第九，要“精兵简政”，就是说，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不宜开得太多，每一次会议也不宜开得太长。

第十，要注意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党内还是党外，不论是地方还是部队，都应如此。对于那些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也不要嫌弃他们，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第十一，要力戒骄傲。就是说，不管对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不管在工作

中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忌骄傲自满。对于领导者，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领导集体内部团结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强调指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第十二，要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不要混淆敌我；其次是划清革命队伍中正确与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以便对一个人的工作有一个基本正确的估价。毛泽东指出，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 and 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泽东制订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集中概括了长期以来党委会工作方法的丰富经验，发展了《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的思想，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 二 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执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带给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执政的新考验。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面对的新问题和必须接受的新考验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在临近执政时，已采取了一些适应执政需要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1949年11月，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情况，在中央及各级党委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责是，检查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审理并决定中央直属各部门、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违犯纪律的处分，或取消其处分；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纪，执行党的决议和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议，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党的工作，及时揭露和纠正党的工作中可能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克服官僚主义，促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开始就采取上述措施加强党的建设，以接受执政的新考验，但是，中国共产党是由几百万党员组成的大党，党员分布在社会各个方面，与社会各个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执政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新问题。首先，尽管毛泽东在党执政前就提醒全党，要经得起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警惕资产阶级的腐蚀侵袭，但还是出现了少数党员经不起胜利和执政的考验，经不住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从而发生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的现象。据北京市政府报告，进城一年来，已发现有贪污舞弊行为的干部88人。济南市一年多时间内，就处分了58名违法乱纪的干部。在华北地区，1950年发现和处理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干部达303人。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日趋严重。其次，尽管毛泽东在党执政前就提醒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党执政后，在一些党员中，特别是在老党员和老干部中，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或者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或者把完成任务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认为“为了完成任务，不强迫命令不行”，甚至说“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因而采取蛮横的态度去完成任务和执行政策。例如，陕西华阴县一农户因没有种政府发的棉种，竟被干部强迫铲掉，并处罚一年内不许种棉花。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严重地破坏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第三，建国前后，党的组织发展很快，仅1949年就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总的来说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具体表现在一些党组织忽视或放松必要的审查。将一些不够党员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了党内，并且事后没有也来不及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和训练。特别是一些动机不纯的投机分子也趁机混入党内，致使党员队伍中思想混乱，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发挥。

针对上述情况，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结合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0年5月，毛泽东还在一封来信的批语中，针对农村工作中的违法违纪情况严肃指出：“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毛泽东在同月给胡乔木的信中，将这次整风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为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个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

全党的整风运动从1950年6月开始。1950年8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西北局的整风经验。西北局的整风经验主要是：（1）各省市均采取总结工作的方法，办整风训练班和开三级干部会，整训县、区、乡干部。（2）自上而下整顿领导，结合自下而上检查工作的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3）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领导上应态度明确，肯定是非，并及时加以解决，以消除顾虑，增强信心，发挥群众的积极性。（4）领导应集中力量注意解决各单位的主要问题，具体分析情况，研究改进办法，建立工作制度，克服不合理现象，使干部从具体工作的改进中得到思想上的提高。（5）为了克服工作中的忙乱现象，需要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中创造出的一套新的制度和办法，同时加紧培养90%的新干部，使他们学会工作。（6）整风主要是整顿领导，对非党干部，则欢迎他们自觉地以共同纲领为标准，提高思想认识，但主要还是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推动他们进步。毛泽东将西北局的整风经验批转各地，以指导全党的整风运动。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导，这次整风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在党内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得到了一定的制止和克服，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有所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得到改善，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这次整风时间较短，并且重点放在解决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对党组织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严格党员标准，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和组织观念的问题，成为党在执政条件下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1951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3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67页。

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和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就整党建党问题，阐述了四个方面的意见：（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3）“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行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在整党时，务必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清洗出党；对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的人，劝其退党。（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后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1951年5月开始的整党工作规定了方针和政策。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1951年3月底至4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分析了党执政后全国的组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确定这次整党的目的和内容：第一，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继续提高那些好党员，教育和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第二，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认真的审查，发现并清理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对不够党员条件、经过教育仍达不到党员标准的，劝其退党。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质量和战斗力。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制订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1）党员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2）党员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并具有为彻底实现党的最终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3）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在任何环境下，都不退缩，不背叛党，不投降敌人。（4）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积极地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建设工作，并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5）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即党的公共利益。（6）党员应该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7）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及时地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领导群众前进；党员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的分配下担负一种工作。（8）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最后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

1951年5月，建国后第一次整党工作在全党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1952年，当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的指示》，使整党工作和

三反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使“三反”运动成为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格考验，对党组织的一次实际的和有效的整顿，使整党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动力。1953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分裂党的活动，提议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体党员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不做，反对任何宗派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仅指导了正在进行的整党工作，而且对于党的自身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工作，到1954年基本结束。历史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整党。

首先，这次整党工作适应了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抓住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强调了在党执政条件下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帮助广大党员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定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念。

其次，这次整党及时地纯洁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团结，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据1955年统计，在这次整党工作中，有65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不仅有被清除的腐化堕落分子和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也有经过教育仍不够党员条件而被劝退的消极落后分子。这就纯洁了党的组织。这次整党工作又结合建党工作进行，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在城市和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在完成土改的新区和城市的工矿企业机关及学校中，新建了8200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107万名新党员，不仅巩固和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还改变了党的基层组织分布不平衡的状态，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再次，这次整党工作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结合进行，与土地改革运动结合进行，与“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进行。整党工作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土地改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它不仅为执政党的建设积累了经验，使党经受住了执政后的新考验，而且促进了新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转变，或者说为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提供了保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三 执政党建设的新部署

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正确地领导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斗争。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毛泽东贯彻自己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对高、饶本人在进行斗争的同时进行挽救，等待他们的觉悟。但高、饶本人拒绝接受党的教育，因此，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团结。

在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时，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依照自愿互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年初，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国内形势的发展，要求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进一步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方面来，转移到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各方面还不完善，需要稳定、巩固、调整和改革，并且这种调整和改革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他借反对斯大林的错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混乱。对国际国内这种变化的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前的迫切任务。

为了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召开八大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就宣布，中央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召开八大的决议。为了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对苏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总结，以引为鉴戒。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其指导思想是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需要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因此，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他多处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在谈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共

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毛泽东指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对党政机构要进行大精简。当然，“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中国“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但是必须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此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谈到是非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如果“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在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最后号召：“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为党领导即将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党的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思想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和贯彻。

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八大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作了两次重要讲话，规定八大召开的宗旨为：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的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要犯长期性的路线错误。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毛泽东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9~2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从七大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过一些错误，这次大会要加以总结，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艰巨、很繁重，经验又很不够，必须善于学习。毛泽东强调：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在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国际关系以后，阐述了党的领导问题。刘少奇指出：要保持党的正确的健全的领导，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必须贯彻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内民主。在党内斗争中，要把党内是非问题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根据党执政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七大党章的基础上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在总纲中，规定了党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对党的群众路线也作了充分的阐述。新党章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党员义务中，增加了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积极完成党分配的任务，遵守党章和国法，遵守共产主义道德，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忠诚老实，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内容，新党章还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权利，规定党员可以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有权亲自参加组织对其作出的处分或鉴定性决议的会议，对决议有异议，除无条件执行以外，可以保留或向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新党章规定，侵犯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处分。在民主集中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规定。规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工作中应由上级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示；党的各级组织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的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在上下级职权范围方面，规定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规定的问题，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因地制宜。在政策的讨论和执行方面，规定党的政策问题在领导机关未作出决定以前，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成员可以在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讨论；一经作出决议，则必须服从。

八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即建设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路线，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历史任务，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使党的建设适应了执政的要求，适应了全面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正如 198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 第二十章 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就向世界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毛泽东 1955 年向全党提出：“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这是一脉相承的战略任务。如果说，马恩的“消灭私有制”还只是一种社会理想的话，那么，在毛泽东这里，却已成为一种社会实践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领导人民没收了地主、官僚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现在他要运用政权的杠杆作用，开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绝种的新战略

毛泽东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如何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了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新的战略思想。

#### 一 两种不同的心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随着土改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农村和城市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纷纷呈现在全党面前。对于这种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映。

农村土改以后，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存在兼并和雇工现象，初步拉开了贫富差距，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呈现出涣散的状况。

据中共山西省委 1950 年在老区 6 个村的典型调查，中农户数已占 80%，人口占 88.7%，产量占 80%。两年间出卖土地的有 139 户，占总户数的 11.8%，出卖土地 410 亩，占总田亩的 2.28%。这些除因调整生产和转业迁移需要等原因外，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抵抗的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有的中农占有土地已超过当地平均数的 1 至 2 倍，并有少量雇工。

同年 3 月，中共东北局报告提出，东北农村有 1% 左右的农户已成为新富农。据 18 个村的调查，富农占农村户数的 1.8%，人口的 2.6%。同年 9 月，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关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对策的报告中说，新富农所占比重，据河北、山西、察哈尔 8 个村的统计，占总户数的 2% 稍强，加上其他剥削阶层共占 2.23%，估计可代表华北一般情况，这是当时农村调查材料反映新富农发展状况的最高估计。

这些报告，还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基本心态：中农具备了独立生产的条件，愿意单干，不愿参加互助合作，但又不敢“冒尖”。他们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才能发财。现在把他们编在互助组里，是为了“拉帮穷人”，要他们等一等穷人。因此，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或者

---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 235～239 页。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 253 页。

1953 年 3 月《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

生产不积蓄，认为够吃够用就行。而贫农由于天灾人祸，或者不善于经营，不具备独立的生产条件，生活不好。他们则希望通过互助合作组织把自己发展起来，产生了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和依赖国家的情绪。

面对农村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如何引导农民积极发展生产，是摆在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新课题。对此，党内不少人发生忧虑，担心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害怕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说：“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力、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农村阶级分化之所以如此迅速明显，从党的领导作用方面来说，与互助合作开展不力，党在农村的政治工作不强有极大关系；但是，其实际社会原因：在于个体农民自发发展着资本主义。这种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农村雇佣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相当的发展；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给以必要的限制，不能放任自流，任其泛滥。”

在城市，通过“五反”运动揭露了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而进行的种种非法活动乃至犯罪活动，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因此，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它是否还存在两面性，是否应当借“五反”运动的东风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在1952年第1、2、3期连续发表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等文章，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加分析，一概抹煞，甚至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描写成一种欺骗的手段，实际上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的特征。这些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应该历史地分析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现在“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并非现在就要消灭资产阶级。”

究竟如何分析对待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和城市资产阶级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何分析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如何分析城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乃至整个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产阶级成分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主张。他认为，农村必须有80%的中农，10%的富农，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发展集体农业。对于农村中所说的剥削，他认为，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不

---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35页。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1952年11月编《西南区农村工作会议参考材料》第17页。

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天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针对有些省提出把互助组发展成合作社的意见，刘少奇说：有些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搞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他认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资本主义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刘少奇认为，比较进步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国只有10%。所以，中国近代的工厂、私人工厂有进步作用。不管资本家的工厂也好，国营工厂也好，中国的工厂多一点，中国的生产力就会提高，人民的生活就会改善，所以它是进步的生产方式，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把工业收起来，对人民没有利益，就要伤害工业生产的积极性。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破坏作用，是反动的。

但是，毛泽东面对农村两极分化，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反映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心态。他虽然对1952年《学习》杂志第1、2、3期发表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几篇文章持批判态度，但对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对农民的自发势力，农民走资本主义的倾向，表示了极大的担心。他对刘少奇关于把互助组提高为合作社以动摇私有制基础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思想。”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止在原来的地方，不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认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他还指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31~32页。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33页。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40页。

他还批评了“发家致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既反映了他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城乡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忧虑的心态，也可以看出他改造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思路。

## 二 对主要矛盾的新判断

毛泽东对城乡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忧虑的心态，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考。

对于判断主要矛盾的意义，毛泽东早就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曾做过基本的分析，他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强化。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这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但是，这种基本矛盾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却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近3年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就阶级矛盾而言，无疑是主要的，因此，他断言，“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由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斗争所规定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制约着社会生活的过程。如前所述，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逐渐趋于中农化，出现少量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少数农户上升为富裕中农，个别的还成了新富农。老解放区原有的互助组织出现涣散现象。中农的基本要求是发家致富，但其内心又是矛盾的，想致富，又怕“冒尖”，怕说“剥削”。面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党内不少人产生忧虑。毛泽东更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此情况，10年前，陕北有此情况。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提出来的。正是这种发展资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7页。

本主义的可能性，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这是他提出新的战略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

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为什么能引起毛泽东如此的警觉？在他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使祖国独立富强，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斗，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的改良运动，以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但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2 年的血与火的战斗，才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国际局势的发展，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上。毛泽东早就精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他指出，由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了。”可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绝非偶然，它是历史的选择，是近百年中国革命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无论是小农经济、个体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和落后的，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同时，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随时引向两极分化，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这是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后不愿、也不容看到的。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远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通过合作社的道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由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主要方法。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只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克服这些矛盾，我国工商业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才可能全面实现。如果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因此，毛泽东的忧虑和警觉，不是没有根据的。

两条道路斗争制约着社会生活的进程，束缚了已经解放了的生产力，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供求关系的深刻矛盾。

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即没收官僚资本，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由于广大工人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护，由于革命胜利激起的工人阶级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国营经济确实生龙活虎，发展很快，生产情况明显地超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51年以后开始试办的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合作社，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社员的生产积极高涨，生产确实比多数单干农民要好。而私营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对国家政权和机关于部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对国民经济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加之，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始，各方面供求关系紧张，就把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当作是解放社会生产力一个很好的办法。毛泽东在1953年10月15日的谈话中说：“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后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从普遍规律的高度概括了“一化三改”、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社搞得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而是因为他们的土改是靠行政命令，是从上而下恩赐的。他们在土地改革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接人口平均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道路。

毛泽东遵照“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普遍规律，把握革命进程中的有利时机，顺利地转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要矛盾在国际上的表现，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侵略朝鲜和我国抗美援朝的战争。朝鲜战争，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增加了恢复因长期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困难。但同时也加深了我国人民加快经济建设的紧迫感。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将有利于充分利用抗美援朝赢得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苏联援助等有利条件，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国防，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指导工作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一个任务将要完成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革命意志松懈下来。当时，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

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美帝国主义想通过发动朝鲜战争，实行经济封锁来扼杀中国革命胜利的企图彻底破产了。国际国内的条件对我们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非常有利。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现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时说：“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了，这个说法有部分道理，……但这是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新世界诞生了36年，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旧世界尽管叫嚣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形式上是两个阵营的对立，但矛盾的焦点是在旧世界的内部。这种矛盾，有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有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旧世界的矛盾，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与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

毛泽东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虑，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他反对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突变。这不仅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也符合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的逻辑。

### 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

毛泽东根据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审时度势，提出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确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1952年9月，毛泽东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后，毛泽东在视察工作时，同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也谈到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毛泽东在视察湖北孝感时，他对孝感地委干部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比如过桥，走一步算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10年到15年走完了。要他们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抵莫斯科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信中说：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我们估计，再过5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再过10年，则私人工业会

缩小到 10% 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在 10 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 90% 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 10%，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他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到那时，少数资本家可能完全处在社会主义的包围之中，全部工业（手工业除外）国有化的步骤不能抵抗。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经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 10 年到 15 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对于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扶助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的生产，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

斯大林收到信后，在接见刘少奇时，就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是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些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都在考虑着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但是，直到 1953 年 3 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还处在酝酿阶段。据刘少奇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过。1965 年薄一波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主席是从 1952 年 9 月以后经常讲的，但开始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辞。”

中央正式讨论，还是 1953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事。1953 年 3、4 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研究在新的形势下的公私关系和如何加强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问题，组织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武汉、上海、南京、济南等地调查。随后，调查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根据 3 年多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建议。调查组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部分。所以建议我们在目前集中地或着重地来解决我们同这一主要部分的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关系问题。

---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第 53 ~ 55 页。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第 60 页。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第 60 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都非常重视中央统战部的调查报告，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党的任务是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部份：（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6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也肯定了这个报告，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并开始作为党的总路线正式向下传达，要求全党贯彻执行。1953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 年 2 月 6 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报告说，1953 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 月 10 日，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其主要内容来说，被称为“一化三改”的路线，也称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这是随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结论的提出而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使现存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使资本主义绝种。

## 第二节 农业和手工业的出路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国前后的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单家独户的手工劳动力主要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怎样对待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是采取自由放任，向资本主义发展？还是逐步引导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 一 农业问题的掂量

一个出身农家、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夺取革命胜利的毛泽东，对农业问题的掂量是非常持重的。他曾多次说过，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

本问题。“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因此，当毛泽东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农业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党观点一致，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么，在农业的改造问题上，却出现了几次大的争论。在争论中，他站在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战略高度，力排众议，举纲张目，紧紧抓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主题，进行农业改造的决战。

把农业改造问题置于这种极端重要的地位，不是毛泽东的主观臆造，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毛泽东掂量农业改造问题的前提。他认为，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厂，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无粮则乱，粮食不仅是事关全局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这就深刻揭示了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及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原料，它是人类生存之本，衣食之源。没有农业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再生产就无以为继，只有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农业不仅可以供养农业人口，而且还可供养非农业人口时，社会分工才成为可能。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发展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提供必要的粮食、原料和劳力等，而且也是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非物资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之后还有剩余，才有可能使一些人专门从事文教、科学、艺术等活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条客观规律。

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条规律表现得特别强烈。解放初期，我国农业是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仍是分散的、落后的。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的压力。毛泽东在批判艾奇逊称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谬论时，表达了人民政府能够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当然，在毛泽东看来，这不只是一种辩词，也不仅仅是一种承诺，而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心。因此，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他就把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一直看成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土地改革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粮食产量迅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他为之欢欣鼓舞。但是，靠小农经济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这又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当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19大报告中宣布，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永远彻底地解决了苏联最为尖锐、最为严重的粮食问题的时候，不仅赢得了大会暴风雨般的掌声，也给毛泽东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展示了希望。当年10月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粮食问题时，他以苏联的成果鼓舞到会的同志，主张用苏联的办法，去寻找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出路。10月15日，他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谈话时指出：个体所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8~29页。

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改小农经济为集体所有制。1955年《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办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毛泽东正是从这个历史的制高点上，展望未来的前景，高瞻远瞩地把农业合作化问题，置于党的议事日程的显赫位置。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厚伟力潜藏于农业的改造之中。毛泽东早就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具有像中国这样如此众多的农村人口的极其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中国工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毛泽东后来总结说，“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毛泽东认为，只有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农村市场的扩大，对工业部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对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所以，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因此，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有机地联系起来，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农民也是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承担者。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国家从农村积累建设资金，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税收，二是通过工农产品的交换。因此，要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用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利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提供巨额的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使农民有比现在不知大多多少倍的购买力。

第三，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倾向，这是毛泽东掂量农业改造问题的真谛。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1~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

毛泽东认为，小农经济不稳固，会向两极分化。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但是，来自山西、苏北的报告表明，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情况，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党内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有些进而鼓励这种分化，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对一些同志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各级农村工作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他批评农村工作部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他认为，“纲举”才能“目张”，搞农贷，发救济粮，价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都必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必须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如果从小农经济出发搞一套，就是“确保私有”的资产阶级观点，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小惠于富农、富裕中农之邦，就难以希望大增产粮食，难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反映了他仇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政治心态。当毛泽东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就把救民于水深火热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之中，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1910年，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波及韶山，当时还在东茅塘读私塾的毛泽东，就对此愤愤不平，围绕着这件事，与同学们议论了好几天，后来他回忆说：“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的冤屈，我深感不平。”这使他萌发了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模糊意识。后来，他多次深入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看到了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强力压榨和残酷剥削，目睹了连绵不断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军阀长年混战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广大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景。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以农村为阵地，以农民为主力，经过20多年的流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国家政权，广大农民分田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作为一种感情，作为一种责任，毛泽东再也不愿意、再也不容许看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重演。因此，他对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反映非常敏感，对容许、支持两极分化的观点，批评得特别尖锐，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是那样地持重，那样地执着，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关怀备至，那样地高兴激动。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感情世界显露和理性思辨的结晶。

## 二 趁热打铁

毛泽东掂量了农业合作化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极力主张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困或者生活还不富裕的状况而希望变革的心态，趁热打铁，从速引导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在1958年1月4日杭州会议上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

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

但是，能否“趁热打铁”，组织农业合作化，这在党内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

第一，在合作化与机械化先后关系上，毛泽东力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这充分表现在对待山西省委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土改以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出现涣散解体的情况，主张要扶殖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认私有制基础，从而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刘少奇得知山西的报告后，明确表示：现在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化。后来，他在给马列学院一班的讲课中，在修改华北局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中，更加系统地阐明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找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等人谈话，明确地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严肃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是完全可行的。这就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合作化与机械化谁先谁后的关系问题。

刘少奇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出发，提出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以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上万的农业机器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只能是反动的幻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刘少奇反对土改后“趁热打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是，毛泽东认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思想是脱离我国实际的。解放初的中国农民机械工业几乎还是空白，其他机械工业也十分落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在10多亿亩耕地、近20亿亩林地和50多亿亩草地、近亿亩可捕捞养殖鱼虾的水域内实现机械化是决不可能在一代人手中完成的；同时，在一家一户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和土地占有极其分散的条件下，有多少农户买得起机器？即使那些买得起机器的农户，在几亩耕地上或十几亩林地或二三十草地上使用机器合算吗？农民会在极有限的小块土地上使用机器吗？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硬坚持先机械化后合作化，那就只能先经过漫长的两极分化过程，然后由农场主实行机械化，而那时小农经济已经基本上或大部分不存在了，到那时，如果仍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那么无产阶级所要考虑的就不是搞合作化的问题，而是去考虑如何剥夺农场主的生产资料问题了。因此，在当时条件下，若硬要坚持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实际上就是取消合作化。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论断。这就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趁热打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依靠农民合作的力量逐步实行农业机械

---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0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448~449页。

化。这种设想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从而也就逐渐为党内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毛泽东认为土地改革后，由于贫农分得土地后积极地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贫农中农化的趋势，虽然在当时并不严重，但是，若不加以限制，分化的速度将逐步加快，不少农民将会破产，重新陷入缺地少吃、受剥削的困难境地。要阻止这种两极分化趋势，从根本上说，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

合作化不但可以防止两极分化，而且有利于提高农村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其一，土地改革后，从当时的每个家庭来看，一方面普遍存在着缺耕畜、缺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耕畜、农具利用率低的情况。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由合作社或互助组集中使用生产资料，就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又可以解决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其二，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劳动，而协作本身就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这就是说，即使在农业生产仍然主要是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协作的力量，也可以在一定时期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在考察工场手工业时说过，多数力融合为一个总体力时能创造新的生产力，“12个人在144小时的共同劳动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独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个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其三，合作社有能力购买大型农具，也能够在大片土地上使用大型农具，它比单个农户有大得多的能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抗御自然灾害。

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设想，不但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农村提供工业原料和城市人口所需要的食物，而小农经济，由于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产品商品率低，不可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农村的广大市场，而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根本无力和无需购买农业机械，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缺乏对其他工业品的购买力。

在我国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组织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仅需要，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我国大多数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力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第二，在“上马”与“下马”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上马，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争论上。

1955年1月4日，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简报上简略地向周总理和党中央报告了发展合作社计划的执行情况，

---

《资本论》第1卷，第36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9页。

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章程，规定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签发了邓子恢的意见，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提出：全国已有 48 万合作社，其中 30 万新社，有退社现象，合作社应停止发展，全力转入巩固，适当收缩，允许减少。当时浙江省在反对饶漱石的错误后，合作社发展很快，1954 年共达 55000 个，但问题不少。3 月下旬，邓子恢邀请省委书记江华开会研究，以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向省委发出电报：估计你们在加强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 3 万个社，保持 10% 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合作下去“就是很大的收获”，结果，砍掉了 1.5 万个。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向中央上海局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

毛泽东觉察后，曾向邓子恢提出警告：不要重犯 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后来，上海局柯庆施将林乎加的电报呈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即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其他到会人，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的后面加了一句批语，“这种估计不对。”

7 月 31 日，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指出，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就从 5.3 万个合作社中解散 1.5 万个，包括 40 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的。胜利冲昏头脑，犯“左”的错误，当然不好。胜利吓昏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这是一种“上马”与“下马”之争，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9 月 26 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邓子恢就浙江整社问题作了检讨。毛泽东在邓的检讨稿上批示：“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是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占 20% 到 30% 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 60% 到 70% 的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都熟视无睹，敢于抹煞、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在浙江整社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子恢发生争论后，1955 年 6 月，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又发生分歧。

6 月 14 日，刘少奇主持开会，听取邓子恢的汇报。会议认为，计划到 1956 年秋，发展合作社 100 万个。之后，暂时关门。6 月下旬，毛泽东视察归来，约见邓子恢谈话，认为可发展到 130 万个。邓子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7 月 11 日，毛泽东又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谭震林和陈伯达，重申自己的意见，并严厉地批评邓子恢。邓坚持自己的意见。谈话持续 5 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对邓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 月 18 日，毛泽东要杜润生将几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全部送他，写了“关于农业合作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地评头品足，不适当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在“上马”与“下马”、“130万个”与“100万个”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第一，毛泽东强调要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从1921年到1937年，共17年时间完成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1929年到1934年这6年间完成的。苏联经验证明，我国合作化采取大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加快农业合作化动因时，强调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就是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毛泽东强调群众的积极性为加快农业改造的步伐提供了最大可能性。7月29日，他看到中央农村工作部整理的《农业合作化最近简况》的材料，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他说“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去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第三，对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运动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在运动的前头，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能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过多地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只要我们积极地帮助他们，就会克服和纠正。这才是一种对待群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 三 农业改造的依靠力量

农业合作化是在中国农村消灭私有制的一次深刻而广泛的革命。要顺利地取得这一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根据不同阶层对这一革命所处的态度制定出正确的阶级路线。在苏联的集体化过程中，苏共实行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的阶级路线。那么我国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否可以像苏联一样呢？对此，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开始，他依据列宁、斯大林的思想 and 我国土地改革的经验，认为在我国的合作化运动中应该坚持“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后来由于缺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发展了生产，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其中一部分贫农还增加了不少农具，其经济地位上升为中农，从而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到1950年，贫雇农由土改前占农村人口的70%以上，下降到29%，中农由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的20%左右，增加到62%，地主富农由土改前的占农村人口的20%，下降到4.6%。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坚持只依靠贫农的政策呢？苏联在集体化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阶级关系的变化，把依靠的对象局限于占农村人口少数的贫农。这就给富农挑拨中农与贫农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使农业集体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从而不得不由国家派出大批的工人去帮助农民，后来这种帮助也就演变为强迫，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毛泽东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对我国农村各阶层对待合作化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贫农的生活困难，生产资料不足，资金十分缺乏；

新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经济状况虽然比贫农稍好，但在生产上和生活中也困难。这两部分人对个体经济的前途比较悲观，对发家致富缺乏信心，对卖地破产前景更是不寒而栗。所以他们最容易接受合作化的思想。新老中农中的上中农，即富裕中农，他们占有的土地比贫下中农多一些好一些，并且一般都有自己较好、较齐全的农具。由于他们生产上有比较优越的条件，加上经营比较细致，产量比较高，收入比较多，生活比较富裕，对依靠自己的优越条件发家致富抱有信心。因此，在对待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态度上，他们大多数人是动摇的，甚至有少部分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合作化。然而，富裕中农毕竟是个体劳动者，家庭的经济力量并不很大，也十分担心因天灾人祸而破产。这一部分人在明显地看到合作社的好处后，也是可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富农有极为优越的生产条件，可以凭借自己的生产资料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们总是力图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他们与土改后的地主，都是反对并力图破坏农业合作化的，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制定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富裕中农，孤立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在实践中开始主要组织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同时也在生产上也给富裕中农以照顾；后来逐步引导富裕中农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基本巩固之后，才允许富农和地主加入合作社。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因此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进行得比较顺利，合作社的发展也比较健康。

#### 四 独具特色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旧中国的落后不但表现在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上，而且还表现在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占居重要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 1952 年的调查，全国手工业生产者约 1000 多万人，生产总值达 100 多亿元；农民所使用的手工业品有 60—80% 是由个体手工业生产的；不少手工业品不但驰名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有相当的市场，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手工业的行业与品种很多，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现代工业机器的产品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手工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手工业的个体经济都是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不相适合的。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地位和农民的个体经济一样，经营极端分散，生产规模极端狭小，技术落后，工具简单，劳动生产率低下。个体手工业者通常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绝大部分是夫妇、父子、师徒连家铺，他们缺乏劳动分工，往往一个人要经手生产品的许多工序，甚至还要兼营商业，在技术上墨守成规，很少改进，他们的资金少，不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小，而且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靠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勉强度日。

对这一落后的简单商品经济，若不加以组织和管理，势必发生两极分化，被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并不是每个手工业者可以成为资本家的，而只是极少数人发了财，大多数人破产失业。这就证明了手工业者向资本主义发展也是没有前途的。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认为，必须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完成对手工业的改造。

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因此，对他们的改

造，同样只能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和谨慎的组织工作，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逐步地把个体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但是个体手工业有着不同于个体农业的特点，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形式上，就不能与改造个体农业一样。

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相比，一个基本的区别是：解放初的个体农业基本上属自然经济，农产品商品率极低。而个体手工业则是一种纯粹的商品经济，它的产品是全部作为商品出售的，同时必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同市场、商业、信贷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在解放初仍然受着资本主义商业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个体农业的主要困难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个体手工业的困难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即发生在产品的销售和原材料的购买上。

根据手工业的这一特点，毛泽东认为，对于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像改造农业和苏联改造手工业一样，首先从生产领域的互相合作开始，而必须先是从供销方面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解决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困难，切断个体手工业者与私营商业之间的联系，使他们摆脱商业资本家的剥削，逐步培养小手工业者的集体主义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把他们从生产上组织起来，改变个体私有制，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容易为广大个体手工业者接受。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依次采取如下三种办法，逐渐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供销小组。**这是一种低级形式的合作生产组织，一般由推选的组长代表集体，统一向国营企业或供销合作社接洽和安排原材料采购，产品推销，加工订货等业务。小组不改变手工业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每个成员各自保持自己原来的独立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自负盈亏。参加的成员只是各手工业户的户主，合作小组的规模一般很小。在手工业供销小组中，各个成员初步解决了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困难，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生产和发展生产。但是，由于它基本上没有改变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还不可能克服生产上的落后状况，因而随着生产的发展，也逐步暴露了其固有的弊端，特别是滋长了资本主义倾向。有的小组把好的产品自己出售，次品卖给国家；旺季要求自产自销，淡季要求加工订购。这就同社会主义工商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用新的合作组织形式来取而代之。

**手工业供销合作社。**这是一种从供销小组到生产合作社过渡的合作组织。它开始主要是统一经营供销业务，生产活动仍由各社员户分散独立进行。后来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社员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合作社也用公积金购置一些财产，合作社还对社员户的生产活动进行一些干预，在户与户之间实行简单的分工和协作。手工业销售合作社比供销小组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手工业生产的盲目性，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但是，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基本上还是被控制在流通领域以内。生产资料的小私有制依然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先进技术的采用，小生产者的心理习惯也不能得到根本的改造，而且也不能完全避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为了解放生产力，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有必要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条件下转变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实行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合作社收入除向国家纳税和提取一部分公积金、公益金外，采取工资和劳动分红的形式，在社员之间实行按劳分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与手

工业供销合作社和供销小组相比，有显著的优越性。在集体经营的基础上不但能实行劳动过程的协作和分工，并且随着公共积累的增加，有可能逐步地过渡到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1955年的统计，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员每个人平均年产值是1357元，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每人平均年产值是1970元。

我国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采取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方式，使广大的个体手工业者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不但顺利地消灭了个体手工业的私有制，而且还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向机械化的过渡，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的又一大贡献。

## 五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教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53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1953年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期，我党对改造是十分谨慎的，严格执行自愿互利、全面规划、典型示范、逐步发展的方针。然而到1955年7月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以后，由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明显地暴露了过急冒进的倾向。此后，毛泽东开始放弃了早两年坚持的正确方针，合作化的速度人为地加快。1955年底，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由6月底的14.2%，猛增到63.3%。1956年春，农业合作化运动就转到以办高级社为主了。本来，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时在那些办社经验较丰富的地方，特别是对于已经办了两三年又具备了转化条件的初级社，适当转一批高级社给农民以示范，是必要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一下子由重点试办掀起大办的高潮。1956年1月底，高级社发展到13.6万个，占总农户的比重由上年底的4%，一跃而为36.7%；12月底又发展到5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加入初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原来想用15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结果不足4年就完成了。本来1955年夏季以后，初级社的发展就有些过急了，接着1956年上半年，绝大部分初级社的脚跟还没站稳，就一哄而起往高级社转，有不少互助组和个体农民还没有经过初级社就“一步登天”进入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与此同时，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55年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总人数的26.9%，到1956年一跃而为91.7%。由于改造的速度过快，不但对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而且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其一，在生产资料的处理上出现了平调现象，特别是在小社并大社的运动中，搞穷富拉平，这就为后来的“共产风”的平均主义盛行埋下了种子，影响了后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二，过分地强调公有制的优越性，忽视了家庭副业，使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逐渐减少。其三，在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上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把一些宜于分散经营的父子铺、夫妻店合并到合作社统一经营，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其四，高级社在一年之内铺天盖地到来，数以万计的个体农民一下子成了合作社的干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懂生产责任制、经营管理、经济核算，从而使合作社内部管理发生混乱。当时，由于广大农民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极大热情，农民的劳动比较主动和肯干，以致

混乱的管理没有破坏农业生产，但随着合作社再生产的进行，管理不善的问题便成了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几乎在每一次关于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都要讲到：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防止“左”倾冒进。但是在实践中还是犯了冒进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把个体经济看作是绝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而要迅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要迅速合作化。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片面的。诚然，个体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限制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无力迅速采用先进的农业机具，因而，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以手工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体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这个作用不到一定的时候不能被别的经济形式所代替。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生产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对生产的关心程度，取决于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很显然，个体劳动者对自己的生产是极为关心的，对自己的各项活动充满热情。而这种对生产的关心和热情会随着个体经济的消失而减弱甚至混灭。所以，个体经济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个一定的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它也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 50 年代中期，当时的正确作法应该是，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克服个体经济的弱点，另一方面又要发扬个体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这就应该让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充分地发展，并坚持多种合作形式并存，不宜全国性地宣传推广一个模式。

第二，毛泽东对当时农村的两极分化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广大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两极分化就意味着一部分人成为新的剥削者。另一部分人成为新的被剥削者。因此两极分化是与共产党的宗旨相悖的。土地改革后，在不少的地方确实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毛泽东就把它当作洪水猛兽，而且认为要制服这洪水猛兽，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它赖以生存的条件——土地私有制，迅速地组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实际上，我国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虽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情况并不严重，分化的速度也十分缓慢。绝大部分农民的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贫农中农化的趋势。贫困的农户不是逐渐增多，而是逐渐减少。

第三，对工业化的急于求成和片面地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旧中国的工业是极其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想富强起来，彻底改变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的地位，就必须大力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基于此，毛泽东在建国后，就极为注意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极力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计划在 15 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走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了二三百年的路程。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机器大工业不能与小农经济并存，因为小农经济既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原料，又不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广泛的市场。所以，必须使我国的农业迅速合作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实际上，在中国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要在短短的 15 年内和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而且一穷二白的国度里实现工业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可能用现代化机器全部装备农业。当时制约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因素是资金和技术而不是市场需求问题，即农村对机器的购买力问题。同时，过分强调农业对工业的适合也是片面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与工业只能互相适

合，互相制约，而不能片面地要求农业被动地适应工业。如果我们先给工业定下很快的发展速度，然后再以此来要求农业保持相适应的高速度，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再生产既是经济再生产，又是自然再生产，它作为自然再生产，受到一系列的自然条件的制约，而大多数的自然条件又非人力所能控制。所以农业除了在恢复战争或其他灾害的创伤时期之外，再好的生产关系也不能使农业像工业一样高速发展。

### 第三节 工商业改造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跟踪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轨迹，提出了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设想。他以两个联盟作后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地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运用马列主义的和平赎买理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之路。

#### 一 大势所趋

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曾提出过既不能遥遥无期，也不能太急太快的设想。他在1953年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强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地主不同。因此，只能稳步前进，不能太急。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至于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透露了他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他说，我在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同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这就向全党发出了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信号。

大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他先后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谈话，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随即，毛泽东去杭州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1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中强调，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现在民族资产阶级一只半脚踏进了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变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因此，要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

对工商业的改造，毛泽东原来主张不要太急，为何时下却要强调加快呢？他认为，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

第一，我们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取得过政权，没有专政的工具，他

他们在力量上无法与无产阶级分庭抗礼。这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是统治阶级，十月革命后虽然失去了统治地位，但仍然保留有武装力量，他们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有力量与无产阶级一决雌雄。因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拒绝接受无产阶级的赎买。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既然在力量上无法与无产阶级匹敌，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不敢强硬拒绝无产阶级的赎买。

第二，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包销产品已把他们一只半脚夹进社会主义。全国解放接收大城市时，将私营企业中的战犯、汉奸官僚股权收归国有，实行公私合营；在统一财经管理、平抑物价时，为取缔投机倒把，人民银行与私营银行、钱庄开始实行联营，随后又实行公私合营，接受人民银行委托办理业务；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实行了调整，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这些措施原为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但是，在实施中，却把私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限制了它追求暴利、盲目发展的消极作用。所以陈云说：“这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它们夹到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只半脚进到了社会主义。

第三，“三反”、“五反”运动为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充分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同时，也使资产阶级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思想上、政治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使他们懂得，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法令，接受工人、店员的监督，老老实实地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才有光明的前途。正如毛泽东所说，“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

第四，统购统销加快了改造的进程。旧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银行业等国民经济部门基本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民主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家没收了这些企业，从而就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同时，由于国家对外贸易的统制，切断了民族资本主义与国外资本主义直接的经济联系，这就使得私人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的壮大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政策推行，一是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二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更进一步加快了改造的进程。1953年10月，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及棉纱、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对其他重要的农业和行业产品也加强了收购工作。这就使我国整个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而私商所占比重显著下降，使农村征收和收购总额的42%的粮食、油料和棉花基本上脱离了自由市场。与此同时，在商业领域也出现了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这样，私营粮商、油商只能充当国营粮油公司的代销店。这在实质上，作为流通环节的私营商业的改造，已经走在私营工业的前面，反过来又推动着私营工业加快改造的步伐。

第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在我党历史上，有一个巩固的工农联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人与农民就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农民在工人阶级的帮助下，分得了土地，从而更加依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1955年前后，在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割断私营企业与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更是孤立，更感困难。巩固的工农联盟，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这样就完全把民族资产阶级包围起来了，要它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限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就是说，现在我们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势，资本家不接受改造就要垮台，就要破产，接受改造就统一安排，也就有饭吃。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加上党的总路线教育，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和平改造是可行的。

## 二 和平赎买

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1955年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切不可坐失良机。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全党的认同，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改造用何种方式，取何种途径，毛泽东经历了艰难的选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是和平赎买，一种是暴力剥夺。

早在1848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对于能否用和平的方法来废除私有制的问题作了回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1894年，他又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有理论上的说明，没有实践的经验。列宁根据马恩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和平赎买理论。他在《论“左派”幼稚性和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指出：“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但是理论的权威受到了实践的挑战。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赎买思想运用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时，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极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19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9～550页。

端仇视，对和平赎买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因此，列宁的和平赎买理论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实际作用，列宁采用了暴力剥夺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斯大林在开展对布哈林的斗争中，把和平赎买当作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加以批判，断定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能消灭阶级的。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这样，毛泽东就面临着和平赎买和暴力剥夺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的选择。毛泽东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不流血的转变”问题。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但我们希望实现不流血的转变，并应该力争这一着。当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没有正式把社会主义革命方式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仅仅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设想。

解放前夕，毛泽东根据不同层次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应地把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没落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因而它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一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即必须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予以消灭，决不能放在赎买之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在经济上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控制和束缚。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时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与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由于资产阶级有与无产阶级联盟的历史，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仍然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也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始终幻想着资本主义的“天堂”，因而他们没有勇气彻底反对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害怕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强调，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能像对待官僚资本那样，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合理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产生起就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严重束缚和战争的摧残，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一旦在中国消灭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它就有可能得到飞快的发展，这对于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是很有利的。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

---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32~13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125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第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没有理由一脚把它们踢开。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两个联盟，一种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就是劳动人民的联盟，一种是以工人阶级和剥削者的联盟，跟资产阶级的联盟。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有这个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那些可以合作的剥削者，他们才会来同我们合作。由于这四个联盟，消灭剥削阶级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取直接剥夺的方法，另一种是采取逐步改造的方法，即经过教育、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进行安排等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引导那些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三，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农村。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初，“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培养了一些管理工商企业的干部，但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没收了 2858 个资本主义企业和接收、管制及征收了 1000 多个外国企业，管理这些企业的干部已经不足，如果再把 12.3 万多家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那将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而且一下子没收这么多企业，那我们势必树敌太多，造成全面紧张和社会动荡，这对于新生政权的巩固是极为不利的。

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仅不能没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也不能凭借我们掌握的国家政权和所控制的国民经济命脉并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以‘排除’二字了之”。这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当时还存在其合理性的原因外，还由于：首先，连续不断的战争几乎摧毁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强烈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其商业也是直接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若这些企业停工破产，就会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当时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有职工 800 多万，若这些企业被挤垮，那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工人。再次，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能无偿征集农民的产品来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要，而只能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若挤垮了资本主义企业，我们就无法拿出足够的物资去与农民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我们就只有一种选择，不能采取暴力剥夺或挤垮的方式，只能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商业。

在确立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之后，毛泽东接着就碰到了采取什么形式赎买的问题。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赎买资产阶级的财产。列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31 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42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99 页。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50 页。

发，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赎买资产阶级财产的途径。他说：“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的”，所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赎买资产阶级的财产，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来逐渐赎买。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具体形式就是租让和租借。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价赎买设想，在我国无法实现。中国当时面临着百废待兴、国家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哪里有钱来高价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呢？而列宁的设想对我国的改造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成功之路。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型国家资本主义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

在建国前夕新解放的城市中，由于没收了股份企业中官僚资产阶级的股权，从而产生了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东北及其解放较早的城市中，还出现了收购产品、租让、加工、订货和代卖等形式。毛泽东对新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和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些条件，从生产和交换活动中挣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这种经济形式，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要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直到1950年春天以后，在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实践中，又把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后来在七届三中全会明确确定通过调整工商业，通过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

在调整工商业后，国家大规模地推行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方面解决了私营工商业的经营困难，发展了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又逐步地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

当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与限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刻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从1950年底开始，由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展

---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3～544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8页。

参见《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92页。

开，农村购买力逐步增长，再加上抗美援朝对国内市场的需求增加，从而彻底扭转了市场萧条、产品相对过剩的局面，市场价格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加工订货的利润就不如自产自销的利润了。于是一些资本家就从欢迎加工订货到拒绝加工订货了，在无法拒绝加工订货的情况下，他们有的采取不按量、不按质或不按时完成任务的对策；有的大搞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有的私自抬高自己的薪金和增加工人的工资，借以增加成本，从而增加利润（因为加工订货是按成本计算利润的）。资产阶级的这一进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开展一次“五反”运动。

经过“五反”运动，虽然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扩大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范围和规模，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也使资产阶级受到一次强化教育。但是这一措施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以及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了。因此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仅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还不够，必须在利用和限制的同时对之实行改造。这时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要在10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任务。

第二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

1953年，我国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时，由于各项民主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起来。其一，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更加激烈。经过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五反”运动的教育，资产阶级中涌现出一批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分子。但大多数资产阶级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并不能正确地接受“五反”运动的教训。一方面，不是积极改善生产经营、改善公私、劳资关系，而是表现出了消极情绪。他们不但不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甚至有的资本家企图抽走资金，以搞垮企业了事。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施放“五毒”。特别是在1953年，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和全国土地改革的完成，人民的购买力普遍提高，全国市场空前繁荣，商品供不应求。很多资本家为了牟取高利，又拒绝加工订货。甚至高价与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争购粮食、日用品和各种工业原料，造成市场紧张，物价波动。其二，劳资关系恶化。工人方面，通过“五反”运动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对企业经营的监督；资本家方面，“五反”运动后，降低了威信。这样就出现了一方面工人的劳动纪律松弛，不听资本家的指挥，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维护威信，也对一部分工人实行压迫虐待，打击积极分子，无理欠薪和解雇工人，收买少数见利忘义的工人为其服务。其三，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矛盾日益突出。到1953年，国营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劳动生产率高于私人企业，成本低于私营企业，产品质量高于私人企业。但是为了维护私营工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得不适当在原料分配、产品销售等方面给先进的国营企业加以限制。这些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须对之进行根本的改造。

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3年9月7日与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举行座谈，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确定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基本方式。

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和平过渡的改造政策，这就需要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必须是一个

身兼二重性的经济形式。它既带资本主义性质，又具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操之过急，它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开始应采取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如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这些形式，容易为民族资产阶级所接受，使它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的。这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要及时地把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转变为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

毛泽东指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它只能缓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进和社会主义优势的加强，随着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的加强，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合作化的前进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的小和消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家资金和国家管理力量的增大，随着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要求的发展，国家可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思想公布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工商界人士表示热烈拥护。但是，一些工商界人士也产生了极其矛盾的心理。他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优越，还是“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现在他们思想上震动很大，有的资本家自问：“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因此，虽然对改造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船在河中，只好认头。”有些资本家甚至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1953年进一步扩大了对私人工业加工订货的范围和规模及私营商业的经销代销范围。1954年有计划地扩展了公私合营。1956年初，在全国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1956年底，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总产值的99.6%。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已经转归国家使用，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本家只能按规定的资本数量取得一定数量和一定时期的利息。因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基本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 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

以强调主观能动性著称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停留在企业的改造上，他非常重视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开创了一条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成功之路。马克思曾经设想的赎买，着眼点在于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因此，他们考虑的只是物质财富的赎买。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物质基础，而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资本的人格化。因此，不改造企业就不能有效地改造资本家；同时，不改造资本家就不能顺利地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只

有把二者的改造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胜利。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毛泽东在确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毛泽东谈到过渡时期两个联盟时说：党内有些同志把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当成包袱，主张干脆取消统战工作，这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干脆取消应该是干脆不取消，丢掉包袱应改为不要丢掉包袱，首先要肯定民主党派、各种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是可以改造的，这样做统战工作才能有信心，如果认为他们大多数是不可能改造的，那么做统战工作就没有信心了。”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就是要采取种种措施改变其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比改造资本主义企业更艰巨的任务。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且与农民保持亲密的联盟，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按照无产阶级所安排的道路，将自己的企业逐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但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它的本性决定了它总是力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发展资本主义；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也总是迷恋其生活方式。因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它本身就排除了采取任何暴力方法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设想凭借国家权力改变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毛泽东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过程中，采取了批评教育、逐步改造的方法。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下子要求资产阶级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去掉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并相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是遵守共同纲领。毛泽东 1952 年 9 月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即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是可能的。但作为一个阶级，在现阶段，则不宜这样要求。我们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剥削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教育，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自觉遵守《共同纲领》中的规定。

在“一五”计划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应当……接受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因此，在这个时期，除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爱国守法的教育以外，主要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传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采取的方式是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和引导资本家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些，使他们了解到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了解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党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是：去掉剥削思想，将自己变成自食其

---

《毛泽东书信集》第 441 ~ 442 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 70 页。

力的劳动者，在劳动中接受锻炼、教育和改造。在这个时期，党大规模地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鼓励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唯利是图的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

#### 四 成功之路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很成功的。但在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偏差。除了改造的速度过快以外，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公私合营的面过宽，改组过多。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同经济改组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小型占优势，经营非常分散。对于这种情况，适当地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实现公私合营后，接着就来了步子相当大的“裁并改合”。这样一来，许许多多的中小型企业就合并成大规模的企业了，原来各企业的经营方式和产品上的特点就被单调的经营方式和产品所代替。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由于合并得过多，留下来的门市部和零售店就显得太少。这就使消费者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排队，去拥挤，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其二，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当。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消灭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也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些合理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也全盘否定了，把那些有经营管理经验的资方人员或资方代理人，统统当作人格化的资本。尽管对这些人，都安排了工作，但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管理干部之外，没有发挥他们的专长，并在反右斗争中把原来一些工商业者当作右派分子管制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而否定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诚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历史性胜利，不仅体现在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之中，更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之中。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就是评价这一段历史时，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进行种种指责。他们认为，1953年提出总路线是毛泽东不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他们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希望有一条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路线。他们认为，50年代的新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发挥出来。希望在新民主主义胜利之后，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当时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必然剥削。过早地消灭这种剥削，只能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认为，衡量一条路线，一个政策的正确与否，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1956年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确立，在极短的时间，不仅医治了旧中国遗留下的浓疱烂疮，而且生产力迅速提高，开创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崭新局面，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消灭了产生旧社会浓疱烂疮的经济基础。时至现

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出现许多不正常现象，致使社会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屡禁不止，原因也多，但也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存在产生这些丑恶现象的经济基础。至于发展的速度，也不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毛泽东自己喜悦之余，也想到搞得太快，要求太高了，他在 1956 年 1 月 25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预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说：‘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陈云同志也说：‘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 2 万户，雇店员的不到 1 万户，50%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采取经销代销方式的，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写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如果因批评在对资本主义改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缺点，并以此为借口，而从路线的高度来否定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担心，乃至断送中国革命胜利成果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按照这些同志从“如果”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设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如果真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如果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让广大人民群众再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中去后，再来举行二次革命，不知中国社会发展要倒退多少年！因此，我们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什么历史的局限，而是一种历史的开拓！

## 第二十一章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就为开创中国工业化道路创造了一个基本的社会条件。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就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开创了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落后的优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时指出，中国有两个缺点。其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其二，我们的革命是落后的，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30多年。但这并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包袱，相反，更激励了他性格中浓厚的挑战意识和诗意般的想象力，落后的中国竟成为毛泽东施展革命意志的优越舞台。他认为，中国这两个缺点，同时也是两个优点，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越穷越要革命，越能激发起巨大的意志力量。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摆脱落后的状态，就成为他新的挑战对象。

#### 一 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

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把我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仅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理想追求，解决民生问题的平生夙愿，也是我国一直面临的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过许多“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藏富于民”等主张。儒家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设想。他们在《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描述、主张，激励了不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身。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烧杀抢掠，官僚资本、封建买办的敲骨吸髓，使中国人民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权利。这种惨况，使中国的志士仁人怀着不甘屈辱的复杂心态，提出了各种强国富民的主张。太平天国有“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方案。孙中山更是集民生

思想之大成，系统地阐述了“民生主义”的理论。他提倡“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实行“按劳分配”，主张消灭贫富阶级，实现真自由平等博爱。为此，他制定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措施，以实现中国工业化，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然而，所有这些，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都先后失败了。对此，美国统治阶级曾断言，“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美国把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即国计民生问题归结为中国人口太多，这当然是为自己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事实。

中国有句古谚，“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也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毛泽东早年也认为，在民生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他说：“当前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他对国计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但是，与中国历史上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民生主张相反，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以革命为前提。因为民生问题的发生，从一般规律而言，是由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及其代表剥削者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夺而引起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这种反动、落后的上层建筑，改变腐败、没落的生产关系，打倒他们的阶级代表，才能使被束缚的活生产力即劳动者本身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满腔热血，认为提倡“实业救国”就能把民众从水深火热的惨景中拯救出来。其实，他们不懂得，要实施各种实业计划，必须先推翻腐败的社会制度。只有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才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评价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时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准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在这里，毛泽东站在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度，不仅肯定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而且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具体措施。毛泽东在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经过财产的重新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方面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公平，从而使广大贫苦人民改善了生活，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历史上所提出的民生主义的理想，真正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认为，革命是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前提，但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革命与生产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现实的物质财富，而生产力的发展，还要靠生产活动本身。如果解放了劳动者，不进行生产活动，或者不满腔热情地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力依然不能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加生产”、“抓革命，促生产”的解决国计

---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679页。

民生问题的方针。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从加强工农联盟、支援革命战争的高度，提出了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的主张，批评了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倾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用极大的精力组织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发动解放区的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解决当时经济上的困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更是把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作为建国的中心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在晋绥干部大会上说：“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加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党和政府在开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改善民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提出了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价值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里清楚地表明，这个价值标准不是别的，就是生产力。要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有好的政策。而什么是好的政策呢？这就是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应当肯定，解放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综合国力与我国在世界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加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工业刚刚起步，国防薄弱，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挑战，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党的“八大”曾深刻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直接危及到国家社会生活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的政治问题。

## 二 “以苏为戒”

毛泽东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借鉴。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毛泽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1~131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页。

东在 1955 年 12 月和 1956 年 4 月，先后两次提出“以苏为戒”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

从 1953 年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管理现代化经济的经验，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在计划管理、金融财政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但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其中包括对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使毛泽东陆续觉察到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发现苏联一些成功的经验也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实际和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苏联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再生产内在规律时指出，为了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首先必须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列宁则把马克思这一原理上升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以后，列宁、斯大林又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贯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将生产资料的重工业置于经济建设的首位。列宁、斯大林确定的这条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到轻工业、再以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相反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是一个农业国，按工农业净产值来讲，在 1899 年，工业只占 36.2%，农业占 63.8%，从 1850 年到 1919 年，农业总产值从 16 亿美元增加到 237 亿多美元，增加了 13 倍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首先发展的是轻工业。1860 年，产值最高的四个部门是面粉、棉纺织、木材加工，制鞋等轻工业部门，而铸造和机器制造居于第五位，轻工业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以后，随着农业、轻工业的迅速发展，重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轻工业部门。在 1860 年到 1913 年，棉纺织业增长约 6 倍，而铁路猛增 11.4 倍，从而带动了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发展。1900 年，钢铁业的产值一跃而为第一位。铸造和机器制造业产值上升为第三位，屠宰和肉类罐头业为第二位，木材加工、面粉业降为第四位，第五位。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1.8%。按总产值计算，工业超过农业的两倍。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是先从农业、轻工业发展带动重工业发展的。

然而，为什么苏联却要从重工业开始发展呢？这里有其深刻的原因。列宁说：“防御力如此薄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处于非常不稳固、而极端危急的国际状况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全部客观形势给我们的这个喘息时机，来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严重创伤，来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真正国防多少增强一些国防力量。”列宁认为，除苏联刚刚建国时期政权还不稳定的原因外，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这一原因。他说：“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其他国家的资本推翻，只要他们还比我们强大得多，那末，他们随时都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我们，重新挑起反对我们的战争。

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更加强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展大工业，必须发展运输业。”可见，列宁、斯大林之所以提倡优先发展重工业，从重工业入手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完全是为当时苏联国内外环境所迫。

我国夺取政权以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苏联的经验，毛泽东也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肯定，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是对的。众所周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以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前提条件的。由于技术进步，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像我们这样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为了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国朝工业国的转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显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要。

但是，在执行毛泽东这一方针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矛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用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出现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矛盾；在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上也出现了偏差。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重工业也不例外。重工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农业和轻工业在自身内部得到发展，但重工业决不可以完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重工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为生产消费资料服务的。虽然重工业为自身服务的那些生产表面上和生活消费资料生产无关，但最后落脚点仍必须在消费资料生产上。而我们当时却片面地强调发展农业、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服务方面，而忽视了发展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消费资料服务的方面。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积累与消费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在这一过程中，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对我国经济建设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轻工部和纺织工业部在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你们干起来，将来也会好。”这些插话，实际上就提出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听取重工业的汇报时提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重要。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一长制’这个名字有些独裁。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又改了，改成跟我们的一样：设有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工商业改造，就不要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政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

---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迷信。”这些，实际上谈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苏联经验问题。

在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插话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去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搞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不用说过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

在说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强调减少军事消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大大不好。”他批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是想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19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怎么说呢？”

在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学，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的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以至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达，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无利的。”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没有苏联经济建设的鉴戒，没有我国学习苏联经济的教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的“十大关系”，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 三 服从“大仁政”的需要

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就国家经

济发展的方针问题，提出了“小仁政”与“大仁政”的关系问题。1949年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美帝国主义惊恐万状，它一方面发动侵朝战争，另一方面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企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革命的摇篮里。毛泽东针锋相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一方面进行抗美援朝，以击败美帝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计划。对此，党内有些同志，也包括党外朋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片面强调中国经过22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的生活亟待改善，应该多搞些轻工业。有的甚至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当时，这两种议论，呼声甚高。毛泽东把这种思想称为“小仁政”，进行了批评。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们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这就深刻阐明了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建国伊始，百业待兴。但必须有大小主次之分，轻重缓急之别，“小仁政”不能妨碍“大仁政”，眼前利益不能损害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不能损害整体利益，生活消费不能冲击国家建设。如果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只引导人们满足于现有条件，好行小惠，吃光分光，去追逐眼前利益，贪求个人享受，那么，它将是一个开始堕落的民族，从根本上违背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给人们指出远大的革命目标，并号召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浴血奋斗，勇于牺牲。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是生气勃勃，大有希望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维护国计民生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时，时刻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的个人和目前利益，主张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他对苏联发展重工业不顾农业，不顾农民利益的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苏联从1929年到1940年，工业年均增长16.8%，钢产量从430万吨猛增到1830万吨。但由于集体化中的强迫命令和农业政策的失误，1953年的谷物生产只有8250万吨，比1913年沙俄的8600万吨还要低，直到1951年至1955年的平均产量才达到8850万吨，稍超过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究其原因时强调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是阐述发展重工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重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民本经济”思想，即探索工业化道路、发展经济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任何一个阶级，一旦获得政权，实行对社会的统治，首先就面临一个共

同问题，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各个统治阶级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却随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各异。封建统治阶级，发展生产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地租和劳役，横征暴敛。资产阶级发展生产是为了追求超额的剩余价值，它们对内敲榨盘剥，对外疯狂掠夺。纵观毛泽东经济著作，经济观点和他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可以发现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他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是一部以人民为本位的经济学，人民群众的经济学，民本经济学。

毛泽东在 1933 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人民经济”的概念。

1943 年，毛泽东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活动》一文，针对当时党内少数干部不注重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不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不注意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只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集中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毛泽东民本经济中一个根本观点和根本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在他所有的经济著作中，反复强调指出，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和最高标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和保证。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人们从事生产斗争，直接是为了经济利益。人们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物质利益。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一直十分注意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认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早在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定为我们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并强调指出：不顾人民困难，不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强强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我们的经济建设，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的。因此，“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共产党一党之利益，而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此外，别无其他目的。因此，毛泽东思虑的是，如何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全国人民早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的民本经济，不是历史上民生主义者的“赐富于民”，而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创造社会财富，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毛泽东认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8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4 ~ 86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9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7 页。

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强调，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群众路线，反复强调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保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是泼冷水、压制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民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善于组织、发动人民进行生产。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必须多快好省，热气腾腾。这样，就必须组织人民，发动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把人民群众的一切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他提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为了组织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他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要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放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在十大关系中，无论是处理农轻重的比例，还是解决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抑或是沿海与内地、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始终遵循服务人民利益这个根本宗旨。

## 第二节 中国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认清什么是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既不同欧美，也不同苏联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这一命题，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

### 一 从“一五”计划到十大关系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设计新中国发展的美好蓝图时，就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任务。他强调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胜利，毛泽东在集中主要力量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社会改革的同时，根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重点的经济建设。一方面大力改造旧工业，一方面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挤出巨额资金，进行新的工业建设。从1950年到1952年，国家用于工业建设上的投资达26.98亿元，新建企业3,300多个。阜新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梅州露天煤矿、阜新发电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国棉一厂、鞍山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等一批规模庞大、设备先进的大中型企业在中国大地兴起，这对于恢复国民经济，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顺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旧中国的工业非常落后，这些企业的兴起并没有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仍然是一个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这样，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的艰巨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

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问题，1956年刘少奇曾作过一些设想。他认为，如果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了保证，在经济恢复以后，我们要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以主要力量去发展重工业。他说：“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

但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形势的要求和苏联当年的建设工业化的经验，毛泽东制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工业化道路。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他说：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还形象地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米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怎么能使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着重阐述了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它强调，只有建设好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宣传提纲总结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10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苏联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现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根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国际形势要求我们更多地注意我国的国防建设。而国防工业又需要重工业的基础。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确立以重工业为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是合理的，正确的。为全党所接受。周恩来在1953年9月8日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汇报会上说：“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根据这一方针，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编制好“一五”计划，先后派了周恩来、

---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07页。

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到苏联考察学习，征求苏联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斯大林对我们的计划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五年计划工业年平均增长 20% 的速度是勉强的，应该降到 15%。他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他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1953 年 4 月米高扬为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对我国的“一五”计划的意见，他们认为，（一）从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计划基础是工业化，首先是建设重工业；（二）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以 14—15% 为宜。但从政治上、舆论上和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三）要培养自己的专家；（四）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如此等等。这些意见，显然是苏联经验的总结，但也基本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个意见，“一五”计划展开了以“156 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 694 个，实际施工的达 921 个，内有苏联援建的 156 项，实际施工的 150 项，东欧 6 国援建的 68 项。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 50 个，中部地区 32 个，44 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 35 个，其中 21 个安排在四川、陕西两省。这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旧中国不多的工业设施，70% 左右集中在沿海一带，这是半殖民地经济所决定的，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广大的内地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因此，毛泽东在工业布局上，是颇费苦心的。着重考虑了三个因素：一是资源。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的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方；机械和加工企业，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二是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在落后地区摆点大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三是军事上的需要。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集团还在妄图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建的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

“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农业和轻工业不相适应的情况也逐步暴露出来了。无论是物力，还是财力等各个方面，都使国家感到摊子大，难以应付。社会上也出现了哄抬物价、抢购紧俏商品，以及投机倒把等问题。

毛泽东对经济建设中的这些问题，十分关注。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1955 年 12 月 21 日到 1956 年 1 月 12 日，他乘火车从保定开始，经由京广线到广州，再由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做调查研究工作。然后，毛泽东从 2 月 14 日起，先后听取了 34 个部委和部分省、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审阅了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材料。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连续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汇报材料进行讨论归纳，提出了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

义建设，必须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即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指出，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4月到7月，国际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由于两个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使帝国主义不致轻易动武，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间。毛泽东基于这种分析，主张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设想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军事费用开支由第一个五年计划占国家预算开支的24%减到15—20%左右，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这样，各类经济建设的比例就好安排了。这是安排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政治局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了《论十大关系》问题。1965年12月，根据刘少奇建议，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取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由于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上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国际形势分析中过高估计战争的危险，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照搬苏联经验的缺点和错误等内容，没有收进去。

1975年，邓小平向毛泽东建议，由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整理过程中，根据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补进了1965年整理稿中没有收进的内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这种关系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鉴于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经验，牺牲轻工业、农业，片面地发展重工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毛泽东在1957年4月25日，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不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

1958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破坏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正常发展。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总结经验教训时，明确地指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在第三位，放他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后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时，对这个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对“农、轻、重”提法的误解，对“并举”思想作了全面的解释。

## 二 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 1975 年 7 月 10 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联为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1956 年 4 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后来，在几次会议上都强调，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来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就是中国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所谓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在另一场合则严厉地指出，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就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苏联、东欧工业化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西欧的工业化道路，是欧洲产业革命后人类走出的第一条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用“羊吃人”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马克思曾经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决不允许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他明确表示，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以发展经济，但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即两极分化的道路。因此，他主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毛泽东经过一段实践，很不满意。他认为，苏联东欧是通过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即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方法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斯大林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过分地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在实践过程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运动时，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提出了两大部类划分的理论。社会总产品及其生产部门，种类繁多，错综复杂。

---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6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268~269 页。

他按照社会总产品的最终用途第一次把社会再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为第一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为第二部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划分，毫无疑问对社会主义再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目的，不同于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目的，不能满足于对社会再生产的抽象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作为抽象的理论概括的重要意义，在实际经济部门进行具体运用，就应当将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具体化为党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工作的指导原则。这就从客观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理论具体化，使之适用中国的具体经济生活实践。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在研究和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的时候，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的原理，着重提出了农、轻、重的划分，并且将两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地、有机地统一起来。

毛泽东的这种划分与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划分并不相矛盾。众所周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往往通过农业、工业等具体物质生产部门反映出来，离开了工业、农业等具体物质生产部门，就不存在抽象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正是从农业、工业等具体物质部门概括抽象出来的范畴。因此，具体考察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主要也就是考察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等具体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两大部类的关系和农、轻、重的关系不可能完全相同。两大部类是按照产品的最终用途划分的，而农、轻、重则是按照生产工艺、生产分工的特点划分的。同时，农、轻、重并不包括全部社会生产，而两大部类则包括整个物质生产部门。所以，两大部类与农、轻、重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有交叉。一般说来，重工业的各个部门虽然有的也生产一部分消费资料，但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基本上属于第一部类；而农业、轻工业的各部门虽然也有的生产生产资料，但主要是生产消费资料，基本上属于第二部类。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把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比较、有分析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运用于实践是十分有益的。这不仅能照顾极为繁杂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实际。

毛泽东的思路没有停止在纯理论的研究上，更重要的，放在国情的考察上。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像苏联那样，不发展农业，只是片面地发展重工业，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状况必定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中国革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获得成功的，农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只能加强工农联盟，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离开了这个国情，工业化道路也走不通。基于理论的、实践的研究考察，毛泽东 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崭新概念，开辟了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 三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内容和目标

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生产，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新型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他指出：“这

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又特别强调：“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工业化道路，就其内容来说，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发展轻工业和发展重工业同时并举的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精神，它的核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既要使人民有吃有穿，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毛泽东认为，要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其基础，应抓农业。应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情况怎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不可否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马克思首先科学阐明的。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是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生产部门，当农业有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除了供应农业人口外，还可以供应其他人口时，工业才能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从中包括上层建筑各部门在内，都取决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社会为生产者、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毛泽东把马克思这一原理丰富与具体化了。他认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二，农业关系到农村人口吃饭、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主要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

毛泽东还发现，要实现工业化，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工业和农业是物质生产的两大部门。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这两大部门之间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整个经济的发展才会更加迅速。“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和物价高涨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工业与农业并不对立。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业和农业两者对立发展所形成的形式的基础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0~361页。

《列宁全集》第22卷，第84页。

上，为一个新的高级综合——农业和工业的联合——创造了物质的前提。”很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和农业关系进行理论概括。当然，我们也不能强求马克思将一切都概括。列宁则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

并以这一原理作指导，恢复和发展俄国的经济。他一方面十分重视农业。说：“目前整个形势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就是发展全部经济，首先是发展农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也非常重视。说：“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不挽救重工业，不能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列宁的这些论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工农关系的理论。但无可讳言，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未来得及对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概括。

继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斯大林很重视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他说：“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并且具体阐明了要发展工业，必须有以农民市场为主的国内市场，要有更为发达的农业原料，并能拿出必要的农产品供给工人。正如他所说的：“要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首先必须给工业创造某些市场的、原料的和粮食的前提。”这样，“就必须从农业开始”。斯大林较为正确地概括出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是工业的基础”。但是，斯大林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将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手段，这不能不是以后他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以工业排挤农业的一个病源。斯大林之所以重视农业，其目的是要借助于农业来发展工业，一旦工业发展起来，对农业则不重视了。正如他说的：“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期，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依靠农业的”，“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时期，那末现在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正是由于斯大林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一度不重视农业，在政策上把农业搞得很苦，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苏联农业长期落后，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

---

《资本论》第1卷，第544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6页。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5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6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6页。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0、111页。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页。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页。

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应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马列主义原有的认识水平上，而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一原理。1956年，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以苏联为戒，深刻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继《论十大关系》以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农、轻、重的发展关系提高到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指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是互为条件、互为促进、互相制约的。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轻工业的发展，有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才有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的发展又转化为农业、轻工业的更大发展。此后，又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理论。1959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到1962年，再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进行的这些探索无疑从指导思想正确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本质的内在关系，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

毛泽东不仅阐明了中国工业道路的基本内容，而且制订了中国工业化的目标。什么是中国工业化的目标？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认识的。“八大”以前，毛泽东只是笼统地提“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在当时，这是提得较为笼统、简单和抽象的。1954年9月，毛泽东代表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一提法虽比以前具体和进步了，但毕竟还是十分笼统和抽象。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指哪一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还是经济意义上的，这里看不出来。更没有提到工业化这个词。同年，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种提法无疑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真正对我国工业化作了较为详细和明确的解释则是在“八大”。“八大”指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提法显然比以前具体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指：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3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44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业、农业等等。”然而，毛泽东并不是到此为止，到了1975年，他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比以前又大大进了一步。这说明我们党已初步弄清了我国工业化的目标了。

### 第三节 实现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中国工业化道路，确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行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相结合，如此等等。要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 一 正确处理农轻重内部的比例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顺利地实现我国工业化，不仅要处理好农轻重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内部的比例关系。

##### （一）关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对于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粮食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建国后，尽管我们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国领导人仍没有放松对粮食的生产。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如此重视粮食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人口多，几亿人搞饭吃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所以，稍不重视粮食生产，全国人民将有挨饿的危险，从而政权也不会巩固。然而，是不是将粮食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就可以将其他农业生产放弃呢？毛泽东否定了这种作法。他认为，不仅要重视农业对于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在重视发展粮食的同时，还要十分重视发展粮食与发展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从而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任何生产都有一个内部结构问题，即该生产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就农业生产结构来说，粮食部门和多种经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是多部门的综合性生产，“单打一”是不行的。斯大林曾说过：“必须建立自己的农业基地，自己生产蔬菜、马铃薯、油类和乳类，并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生产出粮食和肉类。”应该看到，多部门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等于各个部门之间的地位彼此相等，在农业生产的各部门中，显然粮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0页。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94页。

不可否认，对于粮食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放松，但党内一些人容易忽视粮食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忽视农业与林业、牧业、渔业等部门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政策实际执行中犯了忽视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错误，造成了这些部门生产长期发展不起来。毛泽东同这些不正确的作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逐步认识到，农业同林业、牧业、渔业和其他副业之间、粮食生产同经济作物生产之间，彼此既是互相制约，又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粮食生产上不去，多种经营也就发展不起来，而且要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另一方面，如果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单独抓粮食，那就会使多种经营受到破坏，粮食最终也上不去。毛泽东说：“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并举，全面发展。”在农业内部，“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毛泽东还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相互依赖的道理”。

### （二）关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对于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由于建国初期加工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钢铁产量十分有限，所以，我国一度将加工工业和钢铁生产作为重工业中的发展重点。这样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期，加工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正如周恩来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然而，重视加工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忽视原料工业的发展，如果煤搞不了很多，钢铁搞不了很多，那么轻工业生产也好，重工业生产也好，基本建设也好，都上不去。我国一度忽视原料工业生产，以致原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提出了要求燃料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能够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不可否认，我国由于长期没有十分重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落后的状况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 （三）关于农、轻、重的投资分配。

重工业的发展需要较大的投资。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时，它的投资问题怎样解决呢？毛泽东深刻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加重一点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这样，既可以满足人民对于消费的需要，又可以更多地增加积累，进而可以更快地发展重工业。这样，从表面上看，重工业的投资似乎少了一些，但从长远看，从实质上看，重工业的投资则会更多一些，重工业发展的基础

---

转引自 1960 年 8 月 2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 1960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红旗》杂志，1978 年第 9 期。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31 页。

更加稳固。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不仅力发展重工业找到了一条稳定可靠的资金途径，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列宁、斯大林经过努力都没有解决的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从而也十分辩证地提出了发展农轻重各自投资比例的原则。

但是，也应该指出，毛泽东的这些主张，为以后我国盲目发展重工业，用重工业挤农业、轻工业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他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从发展重工业方法上说是对的，但从社会主义生产实质，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来说则是不对的。毛泽东提出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落脚点和目的并不是在于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在于发展重工业，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满足人民消费需要而生产。重工业在我国一般来说是生产生产资料的，所以，多发展农业、轻工业的目的在于多发展重工业，实质上是生产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资料。这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相矛盾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发展重工业以后，再用重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来武装农业和轻工业，落脚点放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再到农业、轻工业。正是由于我们发展生产的落脚点在重工业，所以，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早已提出了正确处理好农轻重关系的问题，但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不是作为发展重工业的目的，而是作为发展重工业的手段，因而，农业和轻工业并没有真正被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每当投资于农业，轻工业和投资于重工业发生矛盾时，就挤掉农业、轻工业资金来保证重工业的资金。因为我国长期的指导思想是农业和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服务，这样使得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且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也极为缓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任何时候，在指导思想上都必须明白，发展重工业的目的，最终还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还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

#### （四）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已经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较为具体和详尽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要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劳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思想。然而，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从何开始，以什么为基础来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建国初期，我国的计划工作是沿用苏联的办法，首先提出重工业，特别是钢铁这个指标，然后围绕着它来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向农民要多少粮食和工业原料，向农村要多少劳动力，很少考虑到农业这个基础。结果使重工业的发展超过了农业这个基础所能负担的能力。这种作法，无疑已不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因为重工业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投资，从而要用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成投产形成生产能力以后，为使这些生产能力充分运用起来，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和动力，供应维修和更新所用的机器设备，零配件，供应职工生活用品等，属于生产资料方面的需要，基本上可以靠重工业自身解决；属于生活资料方面的需要，就要靠农业和轻工业了。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是供主社会消费用的，

仅其中的一部分供应重工业生产部门的职工（包括家属），所以不能超越农业、轻工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在一定的生产水平条件下，用于重工业的部分增加，用于社会其他方面的部分就会减少。如果依靠重工业作为安排国民经济的起点，既会形成脱离人民消费需要的畸形生产结构，又会造成重工业的安排时常超过农业、轻工业的负担能力，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经常处于不良循环之中。苏联为之吃了不少苦头，我国经济生活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根据对农、轻、重问题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安排要以农、轻、重为次序，并强调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应该肯定，毛泽东提出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制定计划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次序，还是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这不仅仅是一个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这是计划工作指导思想是否正确，是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涉及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明不明确的问题。

毛泽东讲的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真实含义是：国家制订计划，必须以发展农业为出发点，在分配资金、物资与劳力时，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是为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不是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即使重工业为国防工业提供生产手段和材料，说到底也还是保障国家安全，使人民过安定的幸福生活。然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轻工业放在重工业之前，是不是说重工业就不优先发展了呢？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仍是为主。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呢？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同样如此，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不否认重工业为主要的地位，因为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不是就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和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重点，还是为主。这样安排是在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优先增长，这和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农业、轻工业不同，可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资金、物质、动力不再被挤掉。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虽然可以解决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解决第一部类劳动的分配问题，避免沿用苏联那种以重、轻、农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弊端，减少重工业的盲目发展，但终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第二部类劳动的分配问题，没有解决第二部类内部之间各种产品所需劳动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分配多少劳动于粮、油、棉、茶，或者农、林、牧、副、渔之中去；不知道分配多少劳动于轻工业中的日用品与食品、服装等产品中去。实际上，要解决农业、轻工业内部各个产品的分配问题，就必须研究人们的消费结构，

根据人们消费结构的内在要求来探求人们的需求结构，再根据人们的需求结构来确定第二部类（或者农业、轻工业）内部各产品的劳动分配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在一个和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那时就应该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恩格斯这里讲的“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实际上是指根据人民的消费需要来确定生产。斯大林对此则说得更加明白：“同样很明显，未来生产将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生产，他将顾及社会的需要，看社会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斯大林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要根据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和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不错，按农业、轻工业要求组织生产，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是按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因为农业、轻工业主要是生产消费资料的。但是，仔细一观察，情况则不完全是那样。其一，农业和轻工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生产生产资料，按照这一部分组织生产，实际上是按生产生产资料来组织生产；其二，农业、轻工业自身也可能盲目发展，也有可能不按人们消费需要进行生产，也有可能造成这种或那种消费品的生产大于或小于人们的消费需要，形成不同程度地过剩或供不应求。因此，克服这种弊端，则只有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办事，从人们的消费需要入手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样一来，就应该按这个次序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了：消费结构——需求结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等部门，以这个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之中。

## 二 农轻重与工人、农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原理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是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把物质产品的相互关系同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强调在处理好农、轻、重的相互关系时，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处理好。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的主要是工人，在农业部门从事生产劳动的则主要是农民。因此，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关系。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既要做到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也要做到改善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同时进行，从而巩固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50 年就说过：“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斯大林则说得更明白：“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可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15 页。

《斯大林全集》第 1 卷，第 30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90 页。

的基础之一。”斯大林这段话是十分有创见的。他实质上是将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市场方面看成是互为前提关系，一方面削弱和加强，必然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削弱和加强。然而，应该看到，斯大林讲的这些话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实行，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给农民物质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善。正于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度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避免了苏联这一错误，十分强调要注意改善农民生活。他说：“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关系”，并认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在处理同农民关系发生了错误时，毛泽东敢于承认，并善于立即改正。他说：“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购。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70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年就少购了70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200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正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我党一再强调关心农民生活，然而，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农民生活水平一直较大程度地低于工人生活水平，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削弱了工农联盟。这个问题较为妥善地解决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放宽了对农村的经济政策，许多地方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整个农村出现了近30年来少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第二，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加强工农经济联盟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行工农产品的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结合还只能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民经济的粮食与原料之间的经常联系，经常交换”。这样一来，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比价对于双方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生产的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工农联盟能否巩固。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不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我们就不能保护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工业与农业间的结合”，“我们要真正保持这种结合，保持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并继续发展农业，我们必须实行不断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

---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27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11页。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7页。

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毛泽东认识到，要加强工农联盟，不仅工业品和农业品比价要合理，同时也要降低农业税，减轻农民的负担。正是毛泽东采取这一政策，所以我国农业税确实是很轻的。1957年农业税为当年农业实际产值的11.6%，到了1982年降到只占3%。不可否认，我们尽管想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缩小。在1950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产品的平均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上升幅度。在1953年~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继续上升，而农村工业品的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在逐步缩小，但并没有消失。从这以后的许多年，农产品的成本随农机、化肥、农药的使用有很大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却变动很少，甚至出现了一些“高产穷队”，“高产穷县”的不合理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作出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并继续提高了粮食，棉花，牲畜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提价。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扩大议价，1978~1981年3年里农民累计增收481亿元。同时，还减免部分经济条件差的地区的农业税累计78亿元，从而使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加强了工农联盟。

第三，根据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要求工业的发展必须面对农业市场，保证农民对工业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需求。既要求“花布联盟”，又要“钢铁联盟”。工业建设的任务，不仅要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且要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服务，这就为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为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架起了一座“金桥”。特别是农业通过工业所提供的机器装备后，进而又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密切工农关系。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农、轻、重关系的探索，不仅对于马克思关于农、轻、重相互关系的原理有着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于解决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若干理论选择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三 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进行的。多种因素，从哲学的高度来抽象，无非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两大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只有物质因素，没有精神因素不行；同样，只有精神因素，没有物质因素也不行。

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物质因素，就是生产力及其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这里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实际存在的物质财富，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能维护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也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更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建设规模的大小，速度的快慢，建设战线的长短，不能任凭人的主观意志的想象，而是依物质资料的多少而定。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客观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就要犯错误。

但是，毛泽东认为，物质因素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本身并没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必须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因此，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发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要开发利用这些物质因素，就必须有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引出思想，提出计划，才能利用得好。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毛泽东更看重精神因素。

所谓精神因素，主要是指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根据形势和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程度、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意志力等精神面貌，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一定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意识等等。

毛泽东认为精神因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好坏、快慢，就决定于精神因素了。

第一，精神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精神生活会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激励人们的斗志。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那就等于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摧毁了人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精神支柱，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过去，我们靠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革命业绩。今天，它仍然是实现工业化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认识一致、目标一致、步调一致的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这样，在必要的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就会快得多。

第二，精神因素制约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在当代，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有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到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诚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引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方面的文化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样必然以巨大的革命力量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改造人们的文化素质，也要求人们在知识、能力等方面都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思维方式、传统观念上有较大的更新。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也会随机而入，不断地侵袭和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3页。

如果我们淡化四项基本原则，只注意物质因素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样，我们工业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失去自己的理想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无法抵制各种腐蚀因素的侵袭，走上畸形发展和蜕变的邪路。因此，我们必须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引导人们在国际文化思想的交流中提高鉴别、抵制、批判和吸收的能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汇集世界思想文化的精华，造就既有民族气质，又有时代风貌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思想文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思想情绪，使社会主义工业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

第三，精神因素是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认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典不断地壮大。但是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有得而复失的可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毛泽东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对波匈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于国内少数人的闹事引起了高度的警觉。所担心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的社会主义的红旗落地，社会主义的国名被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更替，社会主义国土被吞并，广大共产党人横遭迫害。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坚持对各级干部和全体人民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倡延安精神，永葆革命热情，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也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碰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发扬这种精神优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第二十二章 恢复历史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带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难题，解决这一难题，就历史地落在毛泽东身上。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动因的历史考察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贯穿于每一社会形态始终的基本矛盾。它决定每一社会形态的性质，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做了精辟的论述。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基本矛盾的地位、作用及表现形式如何，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怎样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时代在呼唤着指导实践的正确理论。这就是毛泽东在我国确定社会主义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

#### 一 尚未解决的难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原理做过精辟的论述，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且对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做了明确的表述。恩格斯指出：“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情况，由于历史的条件和实践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做出现成的答案。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他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但毕竟具有规律的统一过程”。他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他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是“骨骼”和“血肉”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正是这种联系，协调社会不断发展。

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实践，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制度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0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下的基本矛盾作了探讨。具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他具体研究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矛盾体系，指出了这个时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过渡时期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围绕这个矛盾而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解放生产力的斗争。第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地解决生产力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得到发展的。列宁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第三，列宁在过渡时期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探讨了作为社会所固有的矛盾的特征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和形式。他指出：“对抗和矛盾截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而解决这一非对抗性矛盾的形式和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探索为我们了解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提供了一把钥匙。然而，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没有经历较长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没有经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实践，因此，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出具体的考察和明确的论述。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本质和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有过正确的论述。他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即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但是，斯大林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苏联从 1917 年至 1936 年，经过 2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此，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他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一面，否定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的论断。同时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提及。斯大林这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配着苏联理论界。1940 年，苏联《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讨论，该杂志编辑部关于这场讨论的结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完全适合。也就是说，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那时苏联理论界占了统治地位。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斯大林对自己的错误观点作了改正，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而且认为，如果领导执行不正确的政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障碍者”。

斯大林虽然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的存在，但

---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89 页。

《列宁全集》第 60 卷，第 282 页。

《斯大林选集》（下集），第 502 页。

《斯大林选集》（下集），第 449 页。

《斯大林选集》（下集），第 590 页。

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也没能迈出新的步子。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停留在 1936 年的水平上，战后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这种理论当作“绝对权威”照搬运用。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尚未解决的难题。

## 二 崭新的理论概括

1956 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波折。由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诱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激化，波兰和匈牙利连续发生了三起动乱。波匈事件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震动。苏联作为一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日益暴露出其内在的、固有的矛盾。这种情况，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自称没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动乱，这些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根据这些事实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便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针对实践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了崭新的理论概括。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内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这样，我们党开始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为全面性的问题推到了议事日程。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之后，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的种种疑虑，毛泽东又亲自南下宣传，反复向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南北奔波，到处宣讲。其目的只有一个，为适应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要求，力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讲话，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57 年 6 月 18 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还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法国《世界报》6 月 20 日社论指出：“……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毛泽东的讲话，有人反对，也有人赞同。赫鲁晓夫针对毛泽东的讲话称，苏联不存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苏联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苏联哲学博士祖鲁努索夫则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讲话，称毛泽东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如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来就没有人作过这样辩证的全面的分析，报告不仅总结了中国的经验，而且概括了苏联的经验。1957 年 6 月 22 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的《大家都来谈毛泽东的报告》一文中说：“这是

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毛泽东的讲话，尤如一阵春风，吹遍全国。党内外迅即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活跃空气，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

第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对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没有上层建筑这一层，就不能构成社会形态。当然，从两对基本矛盾的关系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更为根本，是起最后决定作用的矛盾，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必须经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解决而解决。社会主义两对基本矛盾的概念，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貌，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只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对”的观点。

第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基础的思想。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社会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繁纷的矛盾现象，找到了一个总根源，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三，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前进的。

第四，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旧的矛盾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又会出现，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必须及时地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就经常不断地处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运动中，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第五，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和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特征，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为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逐步改变为互助合作的关系。同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也是相适应的。它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找到了根本动力。

### 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在不同场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一

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二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三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所有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原因。但是，人们在讨论社会发展动力的时候，往往各执一端，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多元论，无法回答现实提出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认为在考察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时，不能把视角投向某一方面，也不能用数学的方法，将几种力量简单相加，而应该以系统的观点，从客观上进行综合考察，这样，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不能归结为单一力量的影响，而是动力系统即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动力。毛泽东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活中最活跃、最首要的因素，是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的无比强大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合力中最坚实的成分。他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通过劳动者来讲，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善讲不听，就会武讲。”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的矛盾，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矛盾，主要表现不是在社会结合之中，而是在技术的结合之中，是以纯粹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是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子时代和原子时代生产力并存，是以蒸汽时代和电子时代为主导的生产力水平。因此，体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矛盾中，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社会能力低，科学技术不能有效地渗透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中去，使两者达到最高的技术结合，加之技术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低，不能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最佳的社会结合，使本来较低的科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的矛盾中，主要是教育工程生产人才的能力低，多数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不高，不懂科学技术，熟练工人、技术员水平的劳动者人数不多，工程师水平以上的劳动者人数更少。在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矛盾中，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技术构成的水平不高，生产工具陈旧落后，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不能配套，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有效作用。根据这一特点，毛泽东强调，要在生产力领域内，广泛地开展技术革命，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来抓，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通过挖潜、改造、部分革新和全部更新的方式，尽快革除那些陈旧、落后的生产工具，开拓新的劳动对象。与此相适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工程生产人才的能力，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在更高技术和更高水平上的统一。这样，生产力内部矛盾和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推动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

第二，政治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人际关系上，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动力系统。马克思曾把阶级斗争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往往是通过阶级斗争直接表现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基本矛盾的具体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政治的动力作用则通过两类社会矛盾表现出来。其一，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动力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坚持阶级斗争，对于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生产的正常秩序，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阶级斗争在社会的合力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解决敌我矛盾中，不论是以威慑的斗争手段打击敌人，还是以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转化敌人，都会为社会发展增添力量。因此，他极力反对和批判否认阶级斗争作用的观点。但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毛泽东没有看到阶级斗争的性质、形式、地位和发展趋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已经愈来愈小了，反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犯了阶级斗争扩大的错误。其二，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直接动力。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关系中，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工农群众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趋于融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日趋缓和。但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的矛盾突出起来，由于我党所处的执政党地位，有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有些则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必将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股强大的动力。

第三，精神动力。就是精神力量在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无论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突出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远大的革命理想，饱满的政治热情，为了革命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是精神的原子弹。因此，他认为，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他提出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他看来，精神力量，一方面，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可以反作用于政治制度，并通过政治制度，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就思想领域来说，存在着各种思想流派，它们彼此进行激烈的论争，并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作用于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但是，国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国内封建残余意识依然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到处在泛滥，侵袭着人们的灵魂。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激励人民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斗私批修”，增强集体观念，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提倡愚公移山精神，为实现四化而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这些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腾飞，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三者不是孤立地、单一地分别作用于社会生活，而是作为一种合力，以集合性、相关性、动态性为特征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合力结构中最根本的动力，政治动力是经济动力的现实表现，是推动和决定精神动力的基本因素，又是联系精神动力和经济动力的中介。精神动力则是经济动力和政治动力作用方向的指南针，是社会航船的方向盘，又是社会腾飞的点火器。

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由于社会主义矛盾性质的变化，与恩格斯所

说的合力性质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恩格斯所说的合力论，主要是针对原始社会末期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实际而作出的理论概括，是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客观依据的。在这一阶段，由于生产与需要的根本矛盾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手段的落后所造成的认识水平的不同，甚至个人的性格、爱好、气质、民族传统的差异等等。所有这些，都表现为个人意志和各个阶级的相互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每个人，每一阶级和社会集团进行反复较量，以图调整，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对处在不自觉的，盲目的状态之中。而社会主义的动力系统，合力结构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不再是以个人意志的相互冲突为根据，而是以协调一致为前提。在阶级社会，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由于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合力的作用是在各个阶级相互冲突中实现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生产的目的是与社会的需要基本保持一致。社会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自我调节加以解决。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日趋缓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基本一致。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各个成员的意志、各个阶级、各民主党派的意志在总体上能够保持一致。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在总体上消除了冲突，克服了内耗，趋向协调，保持一致。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不再以无数个相互冲突的平行四边形为基础，而是以整体性的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共同意志为原则。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这与社会化生产是基本相适应的。即使存在个体所有制成分，也只是公有经济的补充，受着公有制经济的制约。国家各部门和各企业结成一个根本利益一致的统一整体，劳动者正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中的联合劳动者，他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企业的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公共的和个人的需要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物质利益，国家与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物质利益等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们之间建立的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各阶层、各党派都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下开展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技术革命具有全球性、复杂性、整体性的特点，日益趋向开放，彼此联合密切。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系统越来越呈现出整体性的趋势。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力量不再以毫无自控能力，毫无预见能力的盲目性的形式融入合力之中，而是高度自觉地为合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界处于盲目无知的状态，他们仅仅为争取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依靠大自然的恩赐，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以往时代不可想象的生产力。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日益深刻，改造自然的自觉性大大加强了。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偏见，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处于盲然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体意志处于毫无自控能力、毫无预见能力的盲然形式作用于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管理者，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

的发挥。社会主义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改造世界的手段不断提高。特别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预示未来的发展趋势，憧憬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因此，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每个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都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 第二节 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认为，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发展的合力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别。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合力结构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意义的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基本矛盾，则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合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成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力。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 一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历史考察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解决，不仅要有社会实践所提出的客观依据，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社会的阶级结构如何，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主要任务，如何区分和处理这些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来并必须回答的新问题。

对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时，除曾说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外，还谈到各阶级之间，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矛盾，也谈到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等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全面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观察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同时还指出：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不仅要向群众公开承认，而且要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这时列宁只是这样提出问题而已。斯大林所处的时代，客观上出现了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阶级矛盾转化的情况，已经为他提供了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他也曾试图作出理论的概括和说明，他在1925年发表的《问题和答复》和1930年写的《给契同志的信》以及其他有关著作中，曾经把苏联国内的矛盾明确地区分为“结合内部的矛盾”（即工农之间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并指出，这种矛盾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工农之间有着“在各个根本问题上利益的共同性”，同时又有“在各个目前问题上的利益之矛盾”，处理这些矛盾应当“竭力缓和斗争，以协议和互相让步来调节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弄到尖锐化的程度，弄成冲突”。“随着工业化的增长，这种矛盾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而无产阶级同富农阶级的矛盾不同，“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以前，这种矛盾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同时指出，两类矛盾在不同情况下，可能转化。应该说，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但是，这些思想，只是

散见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其中一些概念，也没有严格规定，在实践中，并没有把这些思想贯彻到底。因此，社会实践提出的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活生生地摆在我国人民面前。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熟悉过程。我党过去长期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迅速到来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有一个学习、探索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也因阶级矛盾的基本解决而突出起来了。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在我国国内出现了一些风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退社等情况时有发生，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及时地发现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为解决这些矛盾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6年4月5日，毛泽东根据苏联的教训和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分析研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问题。《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实行技术革新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矛盾的正确解决，正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想。认为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这十大矛盾包括经济、政治、思想领域，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4月28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这一年的下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处理艺术，学术上的矛盾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正确方针。

9月召开的八大，就我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进一步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 809 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 810 页。

12月4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存在“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仍将层出不穷，必须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式加以解决。

12月29日，从《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相互关系及处理方法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我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关系的矛盾。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地分析了国内发生的闹事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方法，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等问题，强调指出：目前，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的倾向，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随后，即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同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少量的表现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如此等等。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完整形成的标志。

嗣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继续发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1957年3月12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要讲也可以，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个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多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不大妙了。而我恰好换了这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共产党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他强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来，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这个思想问题应该抓起来。”在这里，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见解。

接着，毛泽东在南下视察工作过程中，就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沿途作了不少宣传工作，3月17日，他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说，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针，别的方法都不要。3月18日、19日、20日，毛泽东先后在济南、南京、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过去的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你们要知道这个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同社会经济制度，仅仅是为了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的生活发展起来，为我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开辟道路，矛盾应该分两类，第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工夫就是解决第一个矛盾，现在是在解决第二个矛盾。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哲学基础。

## 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规定了处理好这一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作用。他要求全党把注意力由解决全局范围内的对抗性矛盾，真正地转移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现实“主题”上来，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停顿地进行社会革命。

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并没有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感到满足，他仍然思考着革命。认为旧的革命结束了，就意味着新的革命的开始。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一万年也要革命。他曾断言：“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它虽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他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革命极其广泛的含义。他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解决矛盾就是革命。因此，矛盾无时不在，革命无时不有，革命二字，在字典上不会取消，革命永远存在。人类社会的矛盾形形色色，革命的形式会多种多样；在诸多矛盾中，性质各异，解决的方法有别，革命的性质也不相同；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就没有发展，革命永远是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形式表现出来，矛盾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革命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这些矛盾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就是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还需要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来加以解决。在上层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制度

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当然，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需要打破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在保持现有社会结构稳定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使矛盾得到解决。很显然，这个革命，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毛泽东那里，革命和改革，是当作同等概念来使用的。他说：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是需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毛泽东一再强调改革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他认为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裕和强盛。他要求我们同党外仁人志士为改革和建设无所畏惧地奋斗。因此，他具体地提出了许多的改革意见。如下放中央权限，扩大地方自主权，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计划方法，扩大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精简机构，改变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如此等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我们国家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是“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国家，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因此，中国人民还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就是“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他在1957年3月，视察江苏、上海等地的讲话时明确指出：“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技术革命就是在生产力方面实现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进步和变革。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懂得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一切都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文化革命，就是要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要革愚蠢无知的命，要扫除文盲，普及扫盲，讲究卫生，提倡体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使全体劳动人民在文化上翻身，为经济建设服务。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成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拟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革命的基本任务。他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革命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他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和热情，不断地革命。“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们仍须努力。”这里，不仅反映了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也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呢？

---

毛泽东 1956 年 12 月 8 日，全国工商联代表座谈会上的指示。

毛泽东：《关于思想工作问题》。

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 年 5 月）。

第一，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决定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这种表现形态，制约着这一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所呈现出来的不同表现形态，它又以主要矛盾的形式表现为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所呈现出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时期内各种矛盾最突出、最主要的一个，在性质上往往是基本矛盾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建立以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必然地表现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二，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其中包括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社会革命首先总是要集中进行政治革命，表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们的革命，虽然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继续前进作为自己的革命任务，只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剥削制度而告终。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伟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当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和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各种矛盾，但所表现出来的大量的矛盾，是根本利益、奋斗目标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不能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第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所面临的矛盾不同，主要矛盾也各异。

我们已经经历了由 1949 年到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无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党的注意力，党的工作重心，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1956 年，我国胜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地位。从此以后，便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努力发展生产力，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 and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早在 1957 年，就敏锐地看到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

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对我们今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只能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革命的纲领、战略措施提供一般的指导原则。只有找出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才能为我们党在一定革命阶段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具体依据。毛泽东早就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必须“用全力找出他的主要矛盾，否则如

堕烟海，找不到中心”。由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严谨而又复杂的社会整体。犹如一部巨大的运转着的机器，各种各样的矛盾纵横交错，呈现出繁杂的运动形式。但是，在这错综繁杂的矛盾运动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进程中，就必须着力把握住这个主要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这一时期运动的基本环节，确定革命前进的方向，把握工作的重心，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革命引向既定的目标。否则，就会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漫无头绪、缩手缩脚，在工作中分不清主次，找不到中心，使革命蒙受损失。毛泽东在这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根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从而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成为我们运用矛盾规律指导革命斗争胜利的光辉典范。

### 三 阶级斗争并没熄灭

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整体来说，是一部运转着的机器。但是，社会运动比任何机器的机械运动要复杂得多。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不是绝对的、凝固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在革命的进程中，必须严格地、客观地、随时随地地把革命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不能以为抓住了一定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就迎刃而解，万事大吉了。这样，就会把变化无穷的主要矛盾，限制在僵化、半僵化的思想框子里，限制在由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之内，这就会阻碍甚至破坏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时候，绝不能忽视其他方面。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旧制度的残余，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他依据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复杂的表现形态，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的同时，并没忽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两类矛盾问题。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些观点，虽是后来毛泽东在修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过程中加进去的。但历史表明，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阶级斗争乃至要批判修正主义，在反右斗争酝酿之前就有了。这是在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在国内引起反响的形势下形成的。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曾谈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矛盾在一个长时期内还会存在。1956年12月29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也并列地提到要批判修正主义；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两种片面性，教条主义同机会主义，或者叫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评。

接着，毛泽东在南下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在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的讲话中，都讲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以及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1957年3月18日他在济南党的干部会议上说，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

态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要延续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两种制度作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斗争，谁胜谁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说的，应该说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两种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人们还要看，资产阶级还要看，小资产阶级要看，农民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也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他们也还要看。这些论述说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是反右派的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在1956年底就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其次，这些观点本身，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必须与反右派斗争后逐步形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区别开来，更应该把它与后来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矛盾，以致逐步升级，最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区别开来。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后面将有专节论及。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把它置于客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进行具体的分析。

#### 一 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矛盾，苏联赫鲁晓夫演变的经验教训，国内社会生活实践中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

第一，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他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上的事情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些观点，是毛泽东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基础。当然，用矛盾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列宁就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还会存在。这一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哲学论断，指的是什么？斯大林没有全面地加以研究。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认为这种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只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与斗争。因此，当我党在八大把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理论界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起初也没有意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会出现阶级斗争。是苏联、东欧出现的问题，以及在这个背景下

出现的中国的右派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警觉，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第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等意识形态领域。他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因此，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对这种情况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主要阵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不完全同步。人们的意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不愿或不能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这一特点，不仅使得旧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了的时候能够暂时继续存在，而且阻碍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社会意识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阶级立场的人，而代表反动势力的人总是尽力维护旧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正因为这一特点，国际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也逐步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意识形态领域就成了和平演变的战场。

第三，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他认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有些人所讲的“统治术”，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有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他在研究列宁的思想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时，曾经指出以下四个原因是这种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据。（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朽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

第四，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他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即以政权为中心展开的斗争。如果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仅仅是不同思想的争论，不同世界观的交锋，不会危及政权问题，那是极其天真幼稚的想法。对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来说，过去的任务是夺取政权，现在的使命是巩固政权。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他告诫人们：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的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

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第五，他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党领导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社会，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这个特殊的“社会”内部；党组织内部不可能纯而又纯，许多党员存在着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问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甚至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一方面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存在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时候，总是把眼睛盯在党内，盯在党的领导干部上，担心他们变修正主义，危害社会主义，他尤其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第六，毛泽东曾经多次论述，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不要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界限。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少数人同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还多次说过，只有正确区分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才能使社会上出现的坏事转化为好事。

第七，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求人民民主专政相应地具有两种不同的职能：一是专政的职能，用以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二是民主的职能，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逐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是，民主和专政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只要当国家还是国家的时候，民主总是与专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阶级性的。

以上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论述中，所占比重最大，最为突出。

我们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因为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过，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对于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确曾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列宁的这些讲话，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还很不巩固，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地主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疯狂的战争和破坏，而且投机活动非常猖狂。面对着资产阶级及富农、投机商贩的猖狂破坏，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把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论述，误解为普遍规律，以此来估价和分析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第二，脱离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混淆了党内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的性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在一定范围内的个别事件看成是普遍的、全国性质的，因此，导致了阶段斗争扩大化。1957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分析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势力是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却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如此等等。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简单、粗暴、过火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党内不同意见的认识问题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面临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去完成这个任务，在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加以上纲上线，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从而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第三，以经验主义的态度用民主革命时期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来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民主革命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势力，毛泽东充分运用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形式，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但是，社会主义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与过去历史上的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其斗争的对象和范围变了，地位和作用变了，规模和形式变了。它已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是支配和影响其他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不能袭用过去一套搞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而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

## 二 主要矛盾的演变

对于主要矛盾的含义及其功能，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作过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根据这一原则，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八大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尽管在表述上有些毛病，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会使人误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但它反映了党的集体智慧，就总体来说，还是正确的。

八大的决议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但是，他为什么对主要矛盾的观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呢？对此，理论界有诸多批评，说这是毛泽东“提出了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这些批评是值得研究的。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提出还存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变化，有着主客观的原因，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开始在思想上、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比较理想化，没有预料到还会有尖锐的斗争。因此，当国际、国内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原来的观点发生怀疑。后来他在1958年3月19日自己总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种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这个讲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以及由此引起观点变化的原因。

其次，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含义，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但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他提出，“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 and 方针任务的规定不对”时，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

“这句话有语病，当时本想改，但已印发出去了，没有害处，没有发生坏的作用，就不必去改它，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这些说明，毛泽东在使用这句话时，不仅有保留意见，而且有他自己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的著作，他都没有使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个概念，以避免因为“主要矛盾”这个概念“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闹得天翻地覆”。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修改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226页。

曾涌泉1980年10月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的发言。

参见毛泽东1958年3月，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参见毛泽东1958年8月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甚至是很激烈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话。这样，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提法。

随后，即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在这里，毛泽东虽然出于策略，没有提“主要矛盾”的问题，但事实上阐明了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

1957年9月20日到10月9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地把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提了出来。与会许多同志提出，毛泽东的提法与八大不同，希望中央负责同志解释。会上随即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0月7日，毛泽东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作了具体的说明，对在策略上如何处理这种改变，提出了意见，他说：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服服贴贴，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好，只讲两条道路斗争，不马上公开重提两个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覆，这不好，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免得引起许多麻烦。这样，便先在党的内部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看法。

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报告宣布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样，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正式修改了八大决议的有关主要矛盾的论断。

### 三 阶级斗争的误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主要矛盾”的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8页。

哲学含义。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当他在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他的功力，不在于简单地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了。这里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概念，而是他解剖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现象，寻找内在的发展规律，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但是，当他运用这一“工具”去解剖社会现实时，却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因此，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基调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刚刚落音，就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随即，把阶级斗争的触角伸到了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错误地开展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以至后来针对党内对克服经济困难提出的不同意见，导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少同志提出了种种责难，设定了许多“如果”叹息，“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派，“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设定历史，而是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毛泽东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以及为解决“主要矛盾”所采取的阶级斗争形式，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究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反右派运动，为毛泽东判断“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客观依据。

党的八大刚刚闭幕，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引起国际上反共逆流所结出的苦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一严重事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肃清。他内联外挂，看到了波匈事件在国内引起的反响。他说，党内外有人为波匈事件叫好，引来了“蚂蚁出洞”。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他批评了人们包括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在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动摇和右倾情绪；另一方面，他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资产阶级代表力量，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为此，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与波匈事件是相联系的。

随后，资产阶级右派问题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致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急转直下。1957年春，我党为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在密切注视阶级斗争动向的同时，注意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强调防止干部特殊化，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为此，毛泽东在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宣传工作会议上鼓励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错误展开批评，以利帮助我党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乘机向党发起了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的说共产党已是“进退失措”，有的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与国际上的反共逆流遥相呼应，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对此，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及时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我们必须反击右派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无论是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还是后来所实行的反击，都是必要的。现在有些

同志对此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书生气味。当然，在反击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对这种错误进行了理论概括，而这种概括又为尔后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直至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制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就偏离了党的八大路线。

客观条件还必须通过主观因素才能起作用。对客观条件，有的熟视无睹，有的轻描淡写，有些却一拍即合。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为什么在毛泽东思虑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虔诚信笃有关，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深层内因。

毛泽东抱着一个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夙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设定了一个理想模式，即要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完全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胜操国计民生的大业；实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绝对不容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主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这个理想模式，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但是，也应该肯定，它里面包含了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因此，当毛泽东的这个理想模式付诸实践时，或因有人不理解，而实施不力；或因有人不同意，而遇到抵制和反对；或因客观条件不成熟，实施遇到种种困难而搁浅。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一直执着地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信之以笃，坚不可摧。当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阻力的时候，往往不是检查自己理想模式与现实情况的差距，而是把它看成来自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和破坏，谁如果怀疑他的理想模式，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威信，不允许谁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动摇，成了阻挡社会主义前进步伐的障碍，那么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不管他是昔日亲密战友，还是曾经信任过他的下级，一概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视为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都在他那“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的批判、打倒之列。因此，自1957年以后，他把寻找社会主义阻力的视线从党外移到党内时，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就从党外扩大到党内，从一般扩大化到严重扩大化。从1957年的反右派，到庐山会议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从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深刻的根源。

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深深地打着毛泽东尚动主变、崇尚斗争的文化心理的烙印。中国近代社会外掠内扰，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战祸连年，内乱迭起。动乱的时代酿成了尚动主变、与世抗争、寻求国富民强的民族心态。这种民族心态，作用于毛泽东的精神心理，形成了他的动、变、斗的精神性格，这种性格对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由于对现实不满，强烈要求变革，在思想上充满了主动求变的辩证法思想。他把“动”看成是天地身心的本性，是英雄豪杰的人格之源。他认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因此，对“统一”，“安定”，“稳定”等世界现象表示怀疑。认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动是规律，静是现象，动来自对立，静来自统一，一致、和藹是暂时的，差别、冲突是永恒的，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的本质所在，是其变化过程的基本动力。而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治乱迭乘也有着实际的价值。他说：“治乱迭乘，平和与

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正是这样，他把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斗争看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他把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作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对斗争生活，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怀揣着这种尚动主变的文化心理，尽管后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但矛盾双方对立的斗争，由此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他思维过程的一个兴奋点。正如斯诺所说的，毛是一位活动家，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交替使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战略成功的大师，他不相信会有长时间的稳定，而且变化的步伐、速度从不满足。在毛泽东的思维里，和谐、安定、稳重等主静观念，没有应有的位置，而斗争、不平衡、跃进、运动、变化等主动概念则有驰骋的领地。因此，他总是主张用激进的方式，打碎旧世界，突破旧平衡，以致不惜造成破坏和混乱。他的格言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总是试图以跃进的方法，迅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为此，他总是不满现状，对前进的速度不满，对落后面貌的改观不满，对党内的观潮派、稳妥派不满。他的内心里永远激荡着骚动不安的情绪，需要在大风大浪的剧烈运动中，在你争我夺的斗争中获得一种满足和快感。这种文化心理个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溶贯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表现在他的认识论上，认为“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性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表现在他的辩证法上，反复强调“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前进，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上，认为历史就是“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过程，是新生战胜腐朽，进步战胜落后，被统治阶级战胜统治阶级，革命战胜反革命的文明史。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毛泽东的思维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纯粹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精神意志力量，即主观能动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能不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 第二十三章 意志与规律的搏斗

三大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开创了人民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的实现，还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用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克服一切物质障碍，实现自己的目的。然而，客观现实是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当毛泽东想凭借意志的力量迎战中国球籍的危机，实现赶超英美的战略，步入共产主义殿堂的时候，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的搏斗便开始了。

### 第一节 给发明者“一号博士”头衔

1957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它强调，现在“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对此，毛泽东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批驳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口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调动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以无比的革命热情，炽烈的理想追求，迅速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跃过刚刚到来的社会主义，跨入共产主义之门。这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积淀起来的民族心态，也是毛泽东迎战球籍危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 一 球籍危机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谈到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赶超资本主义强国时强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这，不是毛泽东的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接过来的旧中国是一副破落不堪的烂摊子。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至1949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大约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占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83%左右。在仅有的工业中，重工业不到30%，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70%以上。在重工业内部，又是门类残缺不全，互不协调，多数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除一些从事修理和装配的工厂外，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由于工业落后，旧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基本上还是几千年相传下来的手工工具，有些农村地区甚至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极其缺乏；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不发达。解放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经过“一五”计划，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巨大工程，加之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挑起的朝鲜战争，给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与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相比，很不相称。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而且，绝大部分还停留在手工操作为主的、半机械化生产的水平上。国防工业也很薄弱，没有具备生产现代常规武器的能力。广大农村则仍然是以牲畜和手工进行耕种，有些偏僻的山村，还是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与此相联系，我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也很落后。据 1957 年的统计，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仅 44.7 万人，中学生仅 708.1 万人，小学生仅 6428 万人，农村人口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职工们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严重不足。全国科技人员不足 5 万人，其中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到 500，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 30 多个，并缺乏起码的仪器设备和科研经费。科技人员、科学技术管理干部奇缺。科学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竟落后半个世纪。这种状况，显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 28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多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这些都不行。”他还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样的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干部严重缺乏。这与大规模的建设，很不适应。

当时，人民的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群众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与生产力落后相联系，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很低。1957 年，农村人均收入仅 70 元。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同毛泽东工作过的同志回忆，大约是在 1957 年 12 月，有一次，卫士马维回家，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馊，参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这时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窝头时，他的手有些抖，很费劲才把窝窝头掰开，将一块放入嘴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透了，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的淌下来：“吃，你们都吃一块。”喉咙窒塞，鼻音喃喃，一边哭，一边掰了窝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食的人吃的粮食啊……。”之后，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嘛，不应该嘛……。”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这对毛泽东的心灵，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他，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土之中，深切了解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他走南闯北，含辛茹苦，受尽磨难，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的这种境况，为人民谋幸福。但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仍然处于这种缺吃少穿的境地，一种巨大的历

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撞击着他的心灵。他决心迎战球籍的挑战！

## 二 公平分配的孜孜追求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除了迎接球籍的挑战之外，他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一条人们收入均等，防止两极分化，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跃进的理想道路。

纵观毛泽东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可以发现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问题。

公平分配，这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就一直在寻求解决方式的恒常课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但与此相伴的却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和工人生活的绝对贫困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逐，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境况愈加贫困化。要改变贫富分化的不平等状况，只有彻底破除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把一切资本集中到社会手中，以消除不平等分配的经济根源。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进入分配领域的只能是最终消费资料，能够参与分配的只能是社会成员提供的属于自己的劳动量。因此，分配的差异只表现在劳动量的差异上。但是，马克思基于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他并没有到此止步。他认为这种劳动量上的差异，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因此，他进一步强调，以劳动量参与分配也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事实上却是不平等的。因为还存在劳动者个人秉赋的不同，人口供养的不同。真正的平等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依据社会成员各自的特别需要而获得足够的其需要的消费资料，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不再是分配的尺度，仅仅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一种享受活动。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推论，正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具体揭示平均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态关系，这就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留下了一个艰深的难题。

在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问题，同样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儒家以民为本、均富养民的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不发达，自然经济束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虽然财富供给大大高于原始社会，但是仍然相当匮乏，养民只有靠平均财富才能实现。平均分配观念一直根植于中国百姓的心中。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当他在解决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动态关系的艰深难题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原则对中国传统的平均观念进行了综合的剖析，提出了一个公平分配优先、均平求富的经济发展方针。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梦想新社会生活”。认为“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据此，他主张创造以求完全人格独立的新家庭，由若干新家庭汇合而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从公共幼儿院到公共学校，从公共银行到公共工作厂，从公共消费社到自治会，样样齐全，应有尽有。在这里。尽管是一种空想，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公平分配的关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着重于变革农村的封建所有制，消灭和打击农村的土地富有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生产方式，以解放农民，满足农民均等拥有土地的要求。在革命队伍中，主张实行革命的民主主义，采取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在经济上官兵一律平等。

在 40 年代，他设计了新中国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平均地权使占中国人口 80% 的农民获得相等的土地份额，这既为实现公平分配作了实质性大变革，又为中国工业化扫清了障碍。节制资本，就是在城市限制资本扩张，适当提高工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劳资两顾”。既承认已有的贫富差距，又抑制资本的扩张。这两项政策，对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独特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短短几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就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基本消失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被一举歼灭。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最突出的结果，就是使任何人都不能孤立于他人而独占集体或社会的生产资料，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生产收入的分配方式就此消失了。在农村，早先对生产资料的人均分配，使小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这次则使小农交出土地，归集体所有。在城市，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社，使生产资料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里，少量的归集体所有。这样，就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分配原则的实施创造了社会条件。在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中，打击了富裕农民，扶植了贫苦农民，铲除了收入分配重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城市的和平赎买中，消除了城市收入不平等现象，使城市人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公平感。同时，由于政府控制了社会所有资产，就能依据政府意图发展工业生产。因此，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民收入总额增长 53%，全国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 42.8%，农民收入增长近 27.9%。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分配公平化改革，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第一阶段产生了经济、政治效应，不仅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还存在着剥削。就所有制这一点来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从分配上看，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原则，社会还存在着造成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应该进一步地改革利益结构，消除不平等因素，以使经济收入分配更加均等化。这就需要寻找一条既能保证收入均等，又能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超常规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于是，从 1958 年起，毛泽东从分配与增长两个方面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大胆试验。在分配上，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取消工分制，吃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跃进，以使分配趋于平均化，消除因天赋或家庭人口多少等方面造成的收入差异。在财富增长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9000 万人齐上山，大炼钢铁。在农业生产上，以深耕密植为特征，争放亩产 3.6 万斤的大卫星。这样，分配公平与财富增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了毛泽东设想的和谐统一，分配与增长的两难问题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进程中解决了，在“一穷二白”的国度里，描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不难看出，以

快为灵魂的“三面红旗”，正是毛泽东借以最佳实现孜孜追求的公平分配目标的大胆实验。

### 三 不断革命的情怀

毛泽东发动多快好省的“大跃进”运动，还有着他那永不满足现状、超越局限的个人主观因素。

如前所说，毛泽东早年由于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他在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寻求救国救民的济世灵丹的时候，积淀了主动尚变的文化心理。当他以这种心态关注自己民族未来的时候，他总是渴望冲破传统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界域，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使命。正是这种责任感，搏动着快速的心律节奏，激励着他奋力抗争、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显露出对未来的神往恋情。正是这种情怀，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思维方式。

他在1958年1月31日，草拟工作方法60条时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的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他的实践中，就是趁热打铁，不断革命。他要求革命一个接着一个，中间不要停顿，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自己的智慧和想象，以对民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他设计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刚刚进行8个月，毛泽东便从中日双方的矛盾分析入手，确定了抗日战争进程中的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解放战争伊始，面对美式装备的400多万强敌，毛泽东从人心向背等因素考察，断言5年打败蒋介石；解放后，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计划10年到15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构想，成功的进程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这些成功的经验，更激起了他“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超越情怀。于是，他对未来的奋斗目标，愿望越来越强烈，信心越来越坚定，激情越来越高昂，步伐越来越急迫，时间越来越紧促。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特别是1957年通过反右派的斗争方式，完成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要求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地球的命。应该肯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思想的继续发展。毛泽东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将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到首位。这是一个带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时就大声疾呼：“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两个转移的思

想：首先要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然后再实现工作重心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的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进一步说，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党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任务并且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在各条战线开展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1953年，农村掀起了互助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百业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各个业务部门片面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形成了“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样样首长负责，党委保证”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对此，毛泽东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之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在实践中，毛泽东也始终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心。在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中，都没有离开这个中心。例如，在进行土改时，确定了土改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农忙搞生产，农闲搞土改。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时，主张一面搞生产，一面搞运动，在实施过程中，“白天搞生产，晚上‘打老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提出了“努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口号。即使在抗美援朝期间，对国内的生产建设也没有放松，更没有停止，而是坚持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广泛地掀起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生产高潮。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经济工作来开展这一正确思想，所以在建国初期的几年，尽管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但都没有影响经济建设。

如果说，在这里，毛泽东还只是把工作重心问题在具体工作安排上来加以处理的话，那么，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就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为战略部署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1957年3月，他在南下视察讲话时多次强调：“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1958年元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三大改造之后的“不断革命论”时指出，我说的不断革命和托洛茨基说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的革命步骤是：（1）夺取政权；（2）土地革命；（3）是再次土地革命；（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5）技术革命。前三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然有，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1958年元月31日，毛泽东以文件的方式为全党起草工作方法的条文时详细地论述党的工

---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9页。

《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48页

作重心转移的思想，他指出：我们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立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

如果到此为止，这不愧为毛泽东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但是，当他运用战争年代的时间观念和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来估计和预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进程的时候，便激起了他那超越情怀的冲动，展开了雄伟而奇特的想象：要在短短的几年里炼出几千万吨钢；增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粮食；15年赶上或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举国上下，“跃进再跃进”的口号喊得天价响，卫星指数扶摇直上。如河南省委1958年2月2日向中央汇报关于传达和学习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情况时写道：“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思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这不单是某个部门对上级表决心的文字，而是当时全国人民摆脱“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普遍心态。毛泽东对于那些天方夜谭式的卫星指数，尽管并不真信，但是对于只要有了忠诚的信仰和奋发的意志，就可以破经济发展的常规，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的观念，却是信之以笃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必将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这种不断革命的超越情怀，不能不说是他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轰轰烈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二节 热雨洒江天

自毛泽东赠予“大跃进”一词的发明者以“一号博士”头衔之后，经过1958年1月以批判“反冒进”为基调的南宁会议和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主要精神的3月成都会议，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对此，毛泽东曾赋诗抒怀：“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这里，充分表现了他对大跃进的热风吹雨洒遍神州大地的喜悦心情，对国际反动势力攻击大跃进的蔑视态度。

### 一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毛泽东认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胜利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基于这个前提，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赶超英美的战略构想。

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建设的发展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贯思想。列宁、斯大林曾经就提出过15年赶超美国的发展战略。1917年，列宁提出：“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从而把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提高到关

系社会主义国家生死攸关的政治高度。在 30 年代，斯大林多次论述了快速赶超的经济发展战略。1931 年，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至 100 年，我们定在 10 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为达此目的，斯大林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追求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增长速度。在工业的增长速度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斯大林于 1939 年 3 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在最近十至十五年之内在经济上也超过他们”。后来，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打断了这个发展战略的计划。战后，经过经济恢复和调整，赫鲁晓夫又重提这个战略。在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 15 年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赶上美国。”

毛泽东接受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就进行了赶超美国的酝酿。1955 年 11 月，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作过粗略的设想，“大约 50 年到 70 年左右即 10 个到 15 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设想 50 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7 年 7 月，他在《1957 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因此，当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听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之后，受到启发，便提出了 15 年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 52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1000 万到 1500 万吨钢；再过 15 年，可以有 3500 万到 4000 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 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 2000 万吨钢，中国呢？再过 15 年可能是 4000 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呢？在 15 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思想比较一致，党内也没有异议，为党中央所接受。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宣布：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 10 年到 15 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 15 年后，苏联在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

---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8 页。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 2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3～464 页。

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同时，李富春对赶超战略作了详细解释，认为15年后中国钢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英国目前生产2000多万吨钢，将不可能达到那个指标，同时，在煤、金属切削机床、水泥、化肥等方面的产量，也可能在15年之内超过英国。随后，《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进一步宣传了15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毛泽东这一赶超战略，并不是有些同志所批评的“妄想曲”，而是有一定根据的。应该肯定，苏联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确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期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也始终处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有关资料表明，1949年社会总产值仅557亿元，到1952年已达1015亿元，到1956年又增长到1639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这种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在当时看来，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同时，这一战略也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欲望。赶超战略，当时在人民中起了很大的鼓舞、动员作用，实现15年赶超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只用23年就走完英国102年所走过的路。这对于渴望中国能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基于赶超战略的构想，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具体部署。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同14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的《农业十七条》中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一万亿斤，确定以此作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随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12月27日，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5000多万农户加入合作社，“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因此，他强调，凡是办得到的，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这一精神，1956年的经济建设迅速地发展，生产计划出现了一些失衡现象，引起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上的紧张局面。对此，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提出了“反冒进”的批评，强调要注意避免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

见《新华半月报》1958年第1号。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3号。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

对 1957 年经济建设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当时，毛泽东勉强接受了这个计划。他在 11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点，那么今年冒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就没有什么。

但是，由于反冒进，引起了两个问题。一是在 1957 年整风中，张奚若、陈铭枢等人对 1956 年的冒进引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紧张局面提出了诸多批评，他们说，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毛泽东认为党内的“反冒进”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提供了炮弹。二是 1957 年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如上年，农业没有达到计划，而农业增长低又会影响下一年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毛泽东认为，1956 年“反冒进”反错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带来了不良后果。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 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 40 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给群众泼了冷水。进而他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称为方针性的错误。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右派来了一年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 年 6 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引经据典，嘻笔怒骂，矛头直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称他们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没有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强调，多快好省、农业 40 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我们要避开联走过的弯路，比苏联搞的速度要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南宁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口号。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 5 至 10 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在 5 至 8 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实现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上改观的大跃进。这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如果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提出 15 年赶超英国的战略口号，只是为“大跃进”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的话，那么，经过 1958 年一系列中央会议，毛泽东把“大跃进”付诸了实践。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九省两市书记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各级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另一方面又着重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提出以后只许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不许提“反冒进”的口号。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在会上他多次讲话，又把党内的“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

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于是，在会后不久，中央就批发了冶金部负责同志的一个报告，计划钢铁产量在 10 年内赶上英国，20 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即到 1977 年前后年产钢铁一亿吨。

“大跃进”就是在这样一种激情中拉开了序幕。

随后，1958 年 5 月，毛泽东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上，毛泽东突出地论证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他甚至兴奋地提出，15 年内不但可以赶上英国，而且可以赶上美国。当时毛泽东自信这条总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强调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算最后形成。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二年，如果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这样，就在全中国开始了大跃进。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为“大跃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时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因此，毛泽东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主要任务应转攻工业，决定 1959 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即达 1070 万吨，为达此目的，决定动员全民上山，土洋并举，大炼钢铁。同时，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在全国很快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农业上高产卫星一个高于一个，最高早稻单产竟达 43075 斤。工业上，9000 万人上山，土法上马，整个中国处在激动与狂热之中。

应该指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进而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并非出于个人意气之争。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针、方法之争。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南宁会议提出的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大跃进”也不是有人所批评的那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它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之林的普遍欲望，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的关心和决心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意志。但是由于他没有深入细致地调查国情的变化状况，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样使得“大跃进”在提出之前就缺乏充分的论证与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毛泽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完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鼓舞下，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加速的问题。所以，“大跃进”

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导致对经济的破坏。“大跃进”就在这样远离本意的失控情况下，悲壮地失败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二 向共产主义过渡

与“赶超战略”相结合，1958年春，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种活动提出了土地连片和劳动集中管理的要求，出现了并社办公社的热潮。

亿万翻身农民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之中，激情满怀地感受到共产党、毛泽东为他们带来的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自然，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已骤然化为他们一种狂热的理想追求。而把广大农民变成彻底摆脱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新人，更是一直萦绕于毛泽东心中的问题。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感召力与人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欲，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族心态，人民高歌着：“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电气化，麦克风前来讲话”的狂热曲，而毛泽东则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看来是寻求彻底解放农民、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也是准备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导思想，全国很快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从7月开始发展，8月普遍规划、试办，9月进入高潮，到1958年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毛泽东在1958年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说，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取消私养牲畜，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搞农业工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总之，它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单位。

公社所有制形式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高级社的财产全部无偿地转为公社所有，劳动力和产品由公社统一调配，公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公社的公有化程度。

与所有制相联系，公社的分配制度是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公社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令毛泽东更为兴奋的是，供给制成了人们向往的共产主义因素，成为生活中的“大部分”。很多公社，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可实行衣、食、住、

生、老、病、死、学、育、婚，全由公社包起来。当时实行“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徐水县，甚至实行“全民供给制”。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从而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进城以后，我们发明了一个东西，要给100元钱，计件工资，这不是个好东西，争吵，不积极，出懒汉，脱离群众，与国民党差不多。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是打了20多年的仗，长期实行供给制，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星期天，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有人说，平均主义容易出懒汉，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这种作风，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是一种便于过渡的形式，为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过渡的时间上，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说，要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同赶超美国，过渡到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当我们赶上或超过美国时，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就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但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及其以后，认为超过英国只不过是7年，5年和两年，赶上美国也不过是15年、10年。因此，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提到了面前。毛泽东看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大大提高，吃饭不要钱的分配制度，似乎不但消灭了私有制，而且也消灭了等级制、特权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因此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样，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美好、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会降临人间了。人们开始跑步过渡共产主义。当时山东范县，他们想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县委书记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中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当他们宣布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毛泽东兴奋不已，11月6日便命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派员前往视察。当然，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然苏联脸上无光，如果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

在过渡的方法上，毛泽东认为要搞群众运动。他认为，苏联之所以搞得比我们慢，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

### 三 破资产阶级法权

在毛泽东看来，经他发动起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物资条件。但是，实现这个过渡、单有物资条件还不行，还需要在思想上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以便为这个过渡提供思想条件。为了克服阻碍共产主义到来的消极因素，及早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培养共产主义因素，毛泽东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到了议事日程。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干部要改掉官气时说，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想到和他们平等。后来在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汉口会议上，他对这个问题做了理论概括。他认为，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在其相互关系与分配关系方面，则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在劳动阶级内部，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因为有官气，不是平等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单改变所有制的平等还不够，还要继续改变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中的不平等。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上，明确地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是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制，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当时，张春桥在上海听到毛泽东讲话精神之后，立即在《解放》杂志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责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他在转载此文的编者按中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春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这是毛泽东借题发挥，公开表达自己要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想法。

当然，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供给制”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措施产生了消极的严重后果，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审视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上的，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靠资格、靠权力吃饭等等；另一部分是经济上的，工资制度，按劳分配等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前者必须破除，后者适当保留。但是，在许多场合，毛泽东仍然执着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乃至成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因。

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呢？

第一，出于对马克思、列宁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毛泽东在审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时，他对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等空话时，谈到了未来社会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能有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公平分配，至于对“社会一切成员”在消费品分配的“平等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这

里通行的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这里平等的权利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交换中，一切商品交换者都必须遵循价值尺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商品的平等交换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被确认的，因此马克思称它为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加以比较分析时，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赋予资产阶级法权的涵义，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所谓“平等的权利”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局限，从本质上说明了它不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不能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纲领。

列宁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发挥了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出这种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明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人们不可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进行劳动，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因而需要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以行政手段来强迫人们共同遵守“资产阶级法权”，维持社会主义的正常秩序。

列宁的思路和结论，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8年，他在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对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的部分，如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都密密麻麻地画着各种符号，重要的段落还画着竖直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在论述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圈画更加多。1964年后他再次读《国家与革命》时，所注重的仍是这些段落。

当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不是停留在马克思纯经济意义的“形式上的平等”问题上，也不是停留在列宁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政治意义上，而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官僚主义、摆资格、玩权术等不合理现象。毛泽东用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来审视这些问题，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第二，出于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如何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不能不引起思虑。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不能不搞按劳分配。但是，共产党人不能把按劳分配原则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更不能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共产党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不是为了捞取社会给他个人的报酬。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而按劳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要求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是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痕迹，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时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

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在于所有制变更了，其他方面，如工资制度和商品经济等都没有完全变更，因此，在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很容易出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1974年底他明确地对周恩来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正是这个原因，1975年初，他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他强调：“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看成了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民主派、走资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于文化传统与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素质。追求大同理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历代知识分子都把这一理想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当作平治天下的最终目的。特别是近代一批仁人志士，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曾热烈而真挚地追求过这一大同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曾经指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梁启超则把中国古代的《礼运篇》，康有为的《大同书》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挂钩。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以今语译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国际联合主义存焉，儿童公育主义存焉，老病保险主义存焉、共产主义存焉，劳作神圣主义存焉、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早在1917年就曾表示，“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当他政权在握时，这种大同理想被用来作为解释共产主义的注脚。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作了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中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千古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道治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正如法国学者余敦华所揭示的：“人们可以

---

见《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6~67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

从这些思想中找到对现实的许多解释，对现在的许多预示。例如，二世纪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动乱时期。‘黄巾’的道家运动便向被他们动员起来的穷苦大众宣扬：一个繁荣和平等的时代即将到来。农民公社组织起来了，大家分享食物，公开忏悔自己的过错……”。的确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词汇来解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化素质层面上的深刻原因。

### 第三节 庐山上的迷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决定召开庐山会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的思想陷入了庐山的五里云雾之中。

#### 一 众说纷纭

大跃进的狂热，人民公社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带来了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国际社会反动势力的有意攻击不论，国内党内的思想认识极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应该肯定，“三面红旗”伊始，全党全国人民都沉醉在战天斗地、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热之中，包括彭德怀在内，全党思想并无二致。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出现了许多乱子之后，不少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各自的意见。1958年12月，王稼祥向刘少奇谈了对八届六中全会高度评价人民公社的保留意见；陈云、彭德怀对会议公布谭震林、廖鲁言估产粮食7500亿斤的数字表示怀疑；陈云在毛泽东生日时提出了1959年钢产1800万吨指标恐怕不能完成的意见。1958年12月底，彭德怀、薄一波在湖南株洲调查时，对1959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问题，向中央打电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显露出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向中央如实汇报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了一些脱节、失调现象，看来主要还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走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的也就大了，设备数量要的也就多了，于是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分开看，似乎都可能解决；加起来，就超出了客观可能性。原因之一，是计划的制定缺乏细致的科学的综合平衡过程。6月17日，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在一次会议上说，“大跃进发生了比例失调”，“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是从科学到空想”。他针对党内有人批判“算帐派”的观点时说：危险的不在算帐派，而是当家的不算帐，当权派不算帐危险很大。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长李云仲致信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形成一个主张，全民大搞土法炼钢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去年人民公社运动，在生产

关系变革方面——所有制问题，可能跑得太快了。如此等等。这些意见，反映了庐山会议之前党内外对“三面红旗”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状况。这些思想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在会议上反映出来。

毛泽东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思想认识上也持矛盾态度。当“大跃进”的狂热在国家经济生活中造成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为此，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以便纠正经济建设中的种种错误。

第一，提请全党划清两个界限。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提出要划清两条界线，即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他认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超越阶段，不能“夸海口”。与此同时，他强调了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和价值、价格货币的积极作用，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需要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用商品交换的方针来团结几亿农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认真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使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所有这些，对当时全党、全国经济狂热的情绪不愧为一针清醒剂，使许多人的混乱思想得到了初步澄清，行动上的盲目性和脱轨现象开始受到制约。

第二，要求“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在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当时的“急性病”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止步不前，但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级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者，革命的各个阶段是互相联系又是互相区别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必须把每一个阶段的基本性质弄清楚，据此制订符合实际需要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口号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口号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更合理，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之后才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轻易地否定按劳分配的方针，就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不利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他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种轻率的表现，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庸俗化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会上唱低调，说丧气话，讲倒霉的事，其目的，就是说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要符合实际。根据他的建议调整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这对于那些在“大跃进”的口号下“飘飘然”起来的领导干部，是一付镇静剂。

第三，纠正平均主义，调整同农民的关系。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即1959

年2月，他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进行调查研究。情况表明，公社化后，农村严重存在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的问题，国家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毛泽东在1959年2月29日至3月5日立即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他在会上指出：现在全国普遍存在瞒产自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问题，这是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价值法则的结果，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革命方面，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犯了冒险主义，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认为，现在必须立即提出和纠正两种倾向，一是平均主义思想，一是过分集中的思想。目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的状况，限制积累率，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要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又先后4次写信给省级领导，强调要允许群众说话，要征求群众意见，关心群众利益，克服独断专横、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这对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党内民主生活作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措施，是在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作为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加以解决的。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更快地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毛泽东当时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觉得过渡时间太快，认为“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觉得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河南说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8年”。“现在就是太快，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照有些人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认为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看来过渡时间还是长一点好，商品经济搞久一点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实践中，找到了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道路，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组织形式，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一方面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陷入了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他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另一方面，他对超越物质生活条件的公共食堂，供给制这些所谓“有利于过渡的共产主义因素”，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在经济建设上，仍然坚持北戴河会议以来的高指标，降低不多。一方面他领导和催促全党在工作上纠“左”，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只爱热”。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强调反右，批评“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充当“观潮派，算账派”。如此等等。毛泽东正是怀着这种矛盾心态，准备在庐山召开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 二 庐山风云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分配形式等问题，经过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调整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指标，到6月份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但对于5、6月出现的大中城市市场供应紧张的形势，他感到很茫然，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为什么搞不到鸡、鱼、肉？经过周恩来、李先念以及各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至此，毛泽东认为各方面的问题大体得到解决，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通过一下调整的指标，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明确几条基本原则，大家回去照办，形势就可以进一步好转。

因此，当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由武汉乘船到达庐山的时候，会前在山下、山上两次讲话，提出了会议讨论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读书、形势、计划指标、体制、综合平衡、宣传、“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群众路线、团结等18个问题。他强调，领导干部不要忙于事务主义，要好好读书，以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克服谎报、浮夸之风，做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认为，“大跃进”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他指出“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的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首次提出了农、轻、重为序的方针，过去安排计划是重、轻、农，现在要反过来，农、轻、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过得舒服，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如此等等。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看，他要继续发动大家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正因为这样，会议初期，毛泽东主张开神仙会，发动大家在会上毫无拘束、轻松自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此会议六大组的发言也很热烈，各种见解陆续发表出来。最突出的，是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上，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许多看法，直接涉及毛泽东。彭在7月3日的发言中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毛泽东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主席也去过那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彭在7月4日发言说：“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系指1959年计划钢产量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彭7月6日发言说：“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彭7月7日发言说：“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彭7月8日发言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彭7月9日发言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出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你们抵制过没有？”“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彭 7 月 10 日发言说：“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在此期间，李锐、周小舟、周惠等在会下有些接触议论，周小舟、张闻天也到彭德怀住处交谈，认为中央内部政治生活不正常，感到毛泽东的领导作风已存在一定问题，以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不便于讲话，彭德怀只好自己出来讲话。

对于会议中的这些情况，毛泽东并没提出异议。7 月 10 日，毛泽东召集各大组组长会议，布置大会安排，初步确定 15 日结束，指定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对会议讨论的 10 个问题起草一个会议纪要；对形势、任务、群众路线等七个题目，由李富春起草文件，作为向中央的报告；体制问题，由李先念搞个规定。

会间，毛泽东还“礼贤下士”、不拒逆耳，先后找有关同志谈心交心。7 月 11 日晚上，他找周小舟、李锐等人饮酒叙谈，作自我批评说，1958 年，有些事情，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不能全怪下面，否则曹营之事难办。其他同志也肝胆相照。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亦无反感，李锐等提议陈云同志出来管经济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毛泽东要这些同志转告大家，要丢掉怕字，去掉压力，敢于说话。对此，李锐曾经赋诗：“山中半夏沐春风、赠饮茅台意兴浓，说到曹营事难办，笑声震瓦小楼中。”这反映了会议的和蔼气氛。这些说明，毛泽东至此，并没有因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而有反感。

但是，彭德怀听到会议不久就会结束，想到会议上有些人对问题的认识不够，“左”的思想仍对人们有压力，因而非常忧虑。他不顾周小舟的劝阻，7 月 13 日晚上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对问题的看法。信中，他认为 1957 年至 1958 年基本建设过急过多的“大跃进”是错误的，认为现时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情况的发展已有政治的性质，指责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么得心应手，指出过早地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信中认为，所有这些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毛泽东接信后，于 7 月 16 日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但是，这时毛泽东是否就决定了反击批判呢，尚不一定。7 月 17 日下午晚上毛泽东仍找到了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五人谈话，谈得多而融洽。毛泽东说，总路线真有 70% 的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 30% 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毛泽东又从彭德怀的信讲到 1938 年 8 月的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分会的决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即说了彭德怀的“历史账”。其用意，似乎是要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他的，不要站在彭一边。

毛泽东对会议没有什么新的部署，同意按照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再用一周时间，让大家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组具体围绕

胡乔木、周小舟、李锐等人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1959年7月2日至×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和彭德怀的信展开讨论。

在讨论中，《记录》在各个组引起了许多责难，大都集中在总结性的部分，说对“大跃进”的成绩写得不够，对缺点说得太多，对形势的估计太泄气，给群众泼了冷水；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刮“共产风”等问题已经作过检查，正在改正，不要再多谈，如此等等。

更多的是对彭德怀的意见。许多人赞成彭的观点，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更有人提出信里刺很多，许多话是影射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等等。后来，又传出彭德怀在西北组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二十天娘还不行？”后又传出说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

无独有偶，张闻天不顾胡乔木的劝阻，7月21日在小组会议上作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共讲了13个问题，对“大跃进”的缺点，做了理论的分析。他说，对“大跃进”的缺点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讲多一些。《记录》上讲了点，我再加一条，上马过多，体制紊乱，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张闻天认为，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好大喜功。张认为，强调主观能动性，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他指出，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但光要求不怕还不行，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现在不要吹，他最后针对人们对彭德怀信的责难，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掂量彭德怀的信，面对秀才们在《纪录》里超出自己布置的问题所做的对“大跃进”有关缺点和错误的概括，揣度张闻天的长篇发言，再也不能容忍了。7月22日深夜经与在山上的中央常委们磋商之后，独自在后院竹林彻夜思考，决定23日召开全体会议，对彭德怀等人做尖锐严厉的批评，进行政治反击和历史清算。平时，毛泽东讲话那种引经据典、极度夸张、讽喻迭出、妙语联珠的语言艺术，那种要仔细揣度弦外之音，甚而正话反听、方得要领的风格，常使听众倾倒。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却单刀直入。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接着他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观点，说群众想早一点搞共产主义，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心是好的，但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我们已经检查多次，他们没听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他针锋相对地批评有些人是“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了。他生气他讲到自己的责任。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

我身上，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 1070 万吨钢，是我建议的，结果 9000 万上山，补贴 80 亿元，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毛泽东说到这里哽咽了。

毛泽东的震怒改变了会议纠“左”的初衷，转而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8 月 2 日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中断了纠“左”的过程，开始了 1960 年新的“大跃进”，带来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 三 历史的误会

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有其客观必然性。毛泽东自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开始出现了以高速度为特征的“左”的倾向。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在给毛泽东以极大鼓舞的同时，似乎也给了他一个“启示”，即可以用意志的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因此，他想用主观能动性的意志力量加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人类社会生产力超常规发展的奇迹。“大跃进”的实践、碰到了主观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矛盾冲突，但仍试图用具体政策去解决这些矛盾。但是，做为发动“大跃进”的“左”的思想基础并没有得到清算，因此当彭德怀等以激烈尖锐的意见触动他那“左”的思想根基的时候，自然会迸发出碰撞的火花。

但是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也有其历史偶然性，因为无论从会议的初衷以及会议的整个安排，包括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之后的会议议程来看，毛泽东并无整人之意。对于各种不同意见，尚能中听。但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存在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毛泽东的震怒，不是他一时感情冲动的即席讲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据有人撰文回顾，21 日张闻天的发言之后，22 日晚上，深夜电令中央常委到他房子里磋商，之后一个人在后院竹林里抽烟沉思，烟屁股扔了一地。这些表明，这场斗争，有着它深刻的原因。

第一，国际背景。毛泽东在讲话的开头就单刀直入，尖锐地提出了“党内外夹攻”问题。他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压力的结果，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当时，在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华势力在向我发起猖狂的进攻。杜勒斯在《进步与人类尊严》的演说里，攻击“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否定了人的个性和人格，破坏了家庭和家庭的價值，破坏了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是一种可悲的陷入奴役人类的深刻的过程。”赫鲁晓夫因毛泽东对苏共 20 大路线的批评和严厉拒绝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开始了中苏关系的决裂，对我国国内政策进行了种种攻击。1959 年底赫鲁晓夫在同美国议员汉弗莱谈话中，对中国要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极为不满，他通过内部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对对表”。意思是跑得也太快了，因为苏联当时要 15 年超过美国，20 年才进入共产主义，中国不应抢先。无巧不成书。恰庐山会议之前不久，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和东欧各国访问，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因此，对比之下，毛泽东把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看成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彭德怀的上书批评有国际背景。故在 1962 年的 7000 人大会上，刘少奇回答其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平反，而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原因时，就

称彭有国际背景。

第二，认识根源。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党的领导集体，抑或是他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这场“大跃进”，是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反映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尝试。于人民群众劲可鼓，而气不可泄。彭德怀作为党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却对“大跃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批评，这不是一人或几个人的问题，是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美帝蒋匪相呼应的一股右倾思潮。在这种内外夹攻的思潮中，内部的进攻是最危险的，如果不清算这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思潮，“大跃进”就难以为继，党的领导就受到挑战，人民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害。因此，毛泽东断然放弃了纠“左”的进程，转而去反击在他看来已构成主要危险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反击看成是个人品质的缘故，这无益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为什么毛泽东对于同样批评“大跃进”的李仲云的信却予以充分肯定，即发全党呢？为什么当彭德怀9月9日致信毛泽东承认错误时，又以极大的热情表示欢迎呢？7月24日两位同志与彭德怀谈心揭了谜底。他们在谈心中指出：“你的一股骄傲劲，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连毛泽东同志你都看不起，还有谁你能看得起呢？毛泽东同志健在，你尚且如此，万一毛泽东同志不在，还有谁管得了你？危险性就在这里。你骄傲、孤高，假如是在庐山上当和尚，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还不要紧，而你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一员，政治局成员，又当国防部长，功劳很大，名声很大，地位很高，带几百万军队，你一马当先，亲自挂帅，来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事情就严重了。至此彭德怀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这里既反映了思想认识上的时代特色，也揭示了毛泽东批判彭的心态。

第三，一心两极的虔诚碰撞。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时代根源，而且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各自个性特点的反映。事实说明，庐山的毛彭之争，事先并无蓄意。而是两颗于民于国的耿耿忠心的两极碰撞。带有很大偶然性色彩。根据彭德怀的回忆，彭德怀本不准备参加这次庐山会议。即使参加了，作为一个行武出身的军人，任职国防部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彭德怀性格粗犷刚烈，耿直爽快，心地坦荡，无所奢求。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不信邪的气魄。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资深望重，功勋卓著，对于“大跃进”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一种对人民，对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促使他挺身而出，虔诚地向毛泽东写信，把会议不便于说、人家不敢于讲的问题提到主席面前，以便统一认识，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减少损失，而毛泽东却是一个以主观能动性为特点定夺无产阶级江山的革命领袖，他在个人生死的紧急关头，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不怀伤感，不怨天尤人，力主弘扬革命精神，永葆旺盛斗志、凭借意志的力量，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民主革命，家破人亡，开国创业，心力交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真是老泪漫漶，但于国于民，仍一片耿耿忠心。因此，当彭德怀对“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再三提出尖锐批评的时候，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于党的事业所不容，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醉心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心态，高扬一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恪守“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等人格力量的挑战。这样，两颗忠于人民事业的心，在两极的思虑中相互碰撞了。

## 第二十四章 忧患意识

当毛泽东经历“三面红旗”的洗礼，沉思经济困难的时候，大洋的彼岸传来了“和平演变”的喧嚣，营垒的中心高唱着“三和”、“两全”的赞歌，党内提出了“包产到户”克服困难的主张。审视这种种情况，他似乎发现有三曲同工之妙。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敏锐地思虑着：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会不会变质？自己亲手建立的共和国会不会变色？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这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责任，一股严重的忧患意识袭击着毛泽东的思绪。他要不断革命，反修防修。

### 第一节 杜勒斯的预言与毛泽东的忧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越来越膨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世界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推行的战争政策和武装侵略政策接连遭到失败。于是，美国政府不得不使用反革命两手，在推行战争的同时，极力鼓吹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时地洞察了美国政府这种政策的变化，从世界革命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思想。

#### 一 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此十分恐惧。它们在以武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遭到失败之后，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构想的，是凯南。1946年2月，美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看法。当时，主持美驻苏大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日夜疾书，于2月22日给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1947年1月，凯南在这份电报的基础上，写成了《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苏联的软化趋势出现之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允许在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由此可见，凯南阐述的对苏联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

继凯南之后，美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他在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于1949年8月5日公布了

《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和他本人同年7月30日致杜鲁门的信。在这些文件中，艾奇逊明确提出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的主张。他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够促进实现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杜勒斯更是“和平演变”的鼓吹者。他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侵朝战争失败后，杜勒斯提出所谓的“和平解放”战略，即用“和平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宣称要“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一旨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杜勒斯于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如果说，凯南“和平演变”的目标旨在苏联的话，那么，杜勒斯则把“和平演变”的目标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杜勒斯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在1957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要消逝的现象”，美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他在同年7月2日又说，如果他们（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言下之意，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会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发表谈话称：“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很多，叫得也很响，因此，我们把他称为搞“和平演变”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提出的实际办法却很少。解放战略由于在1956年波匈事件中没有表现出有解放东欧的能力，被肯尼迪批评为“空话和幻想”。肯尼迪主张制订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措施和计划，提出了“从铁幕裂缝中培养自由种子”的设想。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中说：“高谈‘解放’或‘和平演变’，当然都是很好的。但是，除非我们确定了美国为帮助达到这些目标到底能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并制订实行这些措施的计划。否则，我们提供给铁幕后面那么仍有可为的自由战士的就只不过是空话而已。”从此，美国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逐渐转化为具体的措施和实践的行动了。他们利用经济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利用新闻媒介搞攻心战术，利用“维护人权”作旗号，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扶持反对派势力，利用人员往来撒播“自由种子”，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通过隐蔽渠道的“秘密活动”，拉出去，打进来，大挖社会主义墙脚，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全面的“和平演变”的攻势。

## 二 对“和平演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敌人的武力进攻，总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是，面对帝国

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却充满了忧虑。他在1964年6月14日谈到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问题时，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帝国主义说，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在不同场合，对着不同对象，他多次警告人们：我们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心思，不无道理。

第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44年正处于抗战胜利的前夕，为迎接胜利的到来，我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时，郭沫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叙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境地的史实。郭文指出：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两个月，就全军覆没，致命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居功骄傲，二是队伍很快腐败了，终日沉醉于享乐之中，昏昏然以为天下太平无事。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应代代引以为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又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病，实在值得注意。”一再提醒全党同志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1949年3月，在进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又一次讲到李自成。他说：“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在进京的那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变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曾明确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会成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果然，不少共产党员被毛泽东所言中。在执政之后，党的队伍中有些不纯分子和经不起糖衣炮弹攻击的意志薄弱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贪污案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清除腐化分子，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防止“和平演变”，于1951年冬，在党和政府机关内部开展了“三反”运动。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写道：“这件事经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处理、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

---

转引自《生活中的毛泽东》第1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23页。

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如果我们不同资产阶级的腐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其自由泛滥，李自成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北京重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些情况一再出现，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

第二，“和平演变”有其现实基础。

首先，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演变与反演变、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的。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嗣后，毛泽东在关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评论中，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他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内战消灭社会主义力量的包围失败后，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但是艾奇逊还要依靠一批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进行捣乱。要警惕艾奇逊宣称的“依靠民主个人主义者”，组成“第五纵队”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艾奇逊所宣称的实质，就是开展“和平演变”的攻势。基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其次，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对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即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反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他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曾经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这里，毛泽东对和平演变的忧虑之情，跃然纸上。

再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总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毛泽东在讲阶级斗争时，常常把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加以分析。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强调，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他认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渗透、颠覆、演变，为国内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提供了国际条件，而国内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又为国际的反动势力提供了社会基础，它们彼此遥相呼应，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国内就兴风作浪；国内一有微风细雨，国际上就推波助澜，演奏“和平演变”的狂想曲。

毛泽东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制高点上，用阶级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5页。

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深切的忧虑和关注。

第三，中苏关系恶化、美苏关系缓和的直接的国际背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策略早已有之，毛泽东为何至此才把它提到全党面前？这不仅与庐山会议有关，更与苏联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热衷于美苏缓和相联系。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政策，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自此，一方面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赫鲁晓夫竟然撕毁了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协议书。另一方面，美苏关系日趋缓和。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到达莫斯科参加美国第一次在莫斯科举办的展览开幕式，标志着美苏关系有了突破，巩固了已经明显出现的缓和倾向。随后，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进行了著名的戴维营会谈，实施了美苏和平共处的新战略。毛泽东认为，杜勒斯有章程的和平演变的讲话，正是为美苏关系出谋划策的。而赫鲁晓夫与美国的缓和，正好适应了杜勒斯和平演变的需要。这不仅是苏联变修的国际根源，也隐藏着中国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思维没有停留在这里。他联系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似乎看到了中国被和平演变的现实可能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之前，先后出访苏联和东欧等国，积极地寻求苏联军事上的技术援助和外交上的合作。在苏联的访问中，得到了赫鲁晓夫的特殊安排。彭德怀在庐山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后，赫鲁晓夫也发起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倘若如此，在中国彭德怀就可能成为屈从于赫鲁晓夫的适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需要的“三和”政策的代言人。这种思虑，尽管历史证明是多余的，但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又是真实的。

因此，当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的时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讲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林克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个讲话材料送给他看。毛泽东以前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并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1958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杜勒斯一篇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上加的批注为：

“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社会主义）的野心。”

195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杜勒斯“在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上写下如下批注：

“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

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1959年1月31日，在杜勒斯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上，毛泽东的批注为：

“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会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致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的目的。”

随即，毛泽东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和上述批注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他说：“这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个发言中讲：‘决不能结束冷战。’看来，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毛泽东继续说：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入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最后说：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后，“从而想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在这里，毛泽东高瞻远瞩，揭露了美国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第四代身上的阴谋，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

### 三 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原则

帝国主义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实现他们主宰世界的梦想。毛泽东针锋相对，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以便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使资本主义绝种、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的。为此，他系统地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

第一，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需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因此，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实质上是帝国主义与我们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从60年代起，毛泽东就针对西方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把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战略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他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认为，接班人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1964年9月，他在接见老挝贵宾时说：“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权，资本主义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为此，必须加强对青年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的教育，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

第二，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意识形态的渗透。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到杜勒斯的“和平解放政策”，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到里根、布什的“政治攻势”和“超越遏制”战略，都是要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他们曾经宣称，在宣传上花1个美元，等于在军事上花5个美元。因此，毛泽东以极大的注意力抓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是“攻心”、“夺权”、“私有化”。他们首先用资产阶级思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乱中夺权。然后实行私有化，把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如果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社会上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批判不力，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那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第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实践证明，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自身变质。毛泽东认为，要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首先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防变的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等人谈论共产党执政以后怎样防变的问题时，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我说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

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解放后，毛泽东把强调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当成防止自身变质、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措施。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更是把反对“和平演变”的注意力集中在党的领导层的变质变修的问题上。他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此后，他把警惕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出问题，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反复地提出来。

## 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为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提出不仅在国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和巩固公有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国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 一 对“秘密报告”的喜与惧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这股反共浪潮，既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蜕变使然。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世界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据此，要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来战胜资本主义。24日晚，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用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出现了一股翻案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共浪潮。这些风浪，震撼了全世界，尤其是各国共产党。它不仅涉及到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一大段历史，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表现了“喜”“惧”参半的复杂心态。他在1956年3月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

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喜在何处？

一喜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在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犯过不少右的和“左”的错误，对毛泽东独立自

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问题提出了许多的责难，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右倾的。他极力扶植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斯大林派来的鲍罗廷、李德、王明……，李德、王明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的确，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同东欧共产党相比较，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毛泽东信奉独立自主的路线和政策，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保持一定距离，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可以任意摆布和随意插手的“儿子党”。斯大林和苏共支持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的职务，但没有实际的作用。相反，他们常常因犯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组织上保持自己在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正是因为这一点，国际上许多学者称毛泽东为“非斯大林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他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使那些迷信的人清楚了一些，也可以促使我们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分析，不要那样迷信。

二喜去掉了压力。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并没有因对中国民主革命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而自责，仍然企图把他的意图强加给中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家的人住在那里”。后来，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苏联不讲，还说我们搞‘自由主义’。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如此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为了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毛泽东采取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种压力，对毛泽东来说，是很大的。因此，有斯大林在，毛泽东尽管有自己的思想，但也不得不考虑斯大林的影响。他编《毛泽东选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加上“斯大林”的大名，诸如此类小事足见毛泽东在当时的处境与心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也更谨慎，力求科学、准确。一旦毛泽东想到头上的“盖子”已经“揭掉”，身上的“压力”已经去掉，他已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时候，革命家的胸怀，诗人的豪情，哲学家的思维，统统自由地表露出来了。1956年提出要超过苏联，1957年底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搞大跃进等等，几乎都或多或少与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之后的“喜”有关。

三喜解放了思想。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是根据苏联的国情和建设的实践抽象出来的。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不少即使是在当时的苏联，也失之偏颇。但是，一方面苏联自身以“老大哥”自居，要把他们的经验强加给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国内，不少人不顾国情，照搬苏联，搞教条主义。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照搬。毛泽东讽刺地说，当时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可见，把苏联经验教条化到什么程度。现在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也

为之一喜，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构想。他认为，斯大林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以及由此而削弱工农联盟是错误的。斯大林把权力过分集中到中央，束缚了地方与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企业实行“一长制”不符合列宁的管理思想，影响了工人积极性的发挥。斯大林在经济上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资本主义经济在现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斯大林在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本来应该、也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苏联实行的一党制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应该保留民主党派，以对执政党实行监督。斯大林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错误的，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斯大林在理论上，也犯有许多形而上学的错误。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后来他虽然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矛盾，但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从而否定了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

应当承认，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已经触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正是这种批判，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新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是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

但是，毛泽东更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属于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如此全盘否定斯大林，必定在国际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不仅危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危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因此，毛泽东在“喜”的同时，更感到“惧”。

一惧全盘否定斯大林，违反了历史事实，在这背后，隐藏了赫鲁晓夫的祸心。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1917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但其功大于过，要三七开。因此，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阐明了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4月6日，苏联米高扬访华，毛泽东在当晚接见他时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有全面估价”。毛泽东还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

历史经验表明，否定历史，就是为了否定现实。毛泽东认为，领袖人物作为个人，在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杰出人物总是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及其形成的历史共命运。否定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必将联系到他所领导的党、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历史。毛泽东琢磨着：“苏联过去把斯大林

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斯大林活着，赫鲁晓夫称他是父亲，父亲有犯错误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是“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骂他是“凶手”、“强盗”、“混蛋”、“白痴”和“罪犯”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里隐藏着赫鲁晓夫借否定斯大林之名，来否定现实，搞修正主义的祸心！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警惕的大问题。

二惧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出现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相联系，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有可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合作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在国际共运中有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不少支持者，大有市场。这种理论矛头直指十月革命道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定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因此，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经历就是在列宁领导下走十月革命道路。列宁逝世后，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全盘否定斯大林，就必定会影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这一“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标准，不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这个名字，不在于是否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在于承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到当时的现实，就是承不承认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时下人们谈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骤变，其实质也就在这里。

三惧国际反共势力趁机兴风作浪。赫鲁晓夫的报告被视为秘密，但不久后就被西方报刊予以刊登，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炮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趁机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同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内，一些被批倒的机会主义者，也趁机纷纷翻案。就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几天内，即2月19日，原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成员苏、波、意、保、芬5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声明，指出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当时关于敌对分子已经渗入波共领导队伍的指责而解散波共的决议是错误的，肯定了波共的光荣革命历史。2月2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发表文章，恢复贝拉·库恩的名誉。3月27日，匈牙利又为前第一书记拉斯洛·拉伊克恢复

---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引自《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5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

名誉。4月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1951年被捕的哥穆尔卡获释。4月14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宣布科斯托夫案件纯系捏造。4月22日，苏联为李可夫、奥辛斯基和斯捷克洛夫恢复名誉。6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免去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日，《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列宁的政治遗嘱，称斯大林不是列宁的理想传人。随即，在东欧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要在中国搞大民主的情况。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有三喜三惧，但在毛泽东灵魂深处“惧”大于“喜”，惧更具有根本的原则性。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展开了严肃的斗争。

## 二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较量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但是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这么多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阵营，阵营要有一个领导中心，领导中心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来协调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个观念，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只在内部进行，在公开场合，仍然强调友好合作，同志式的团结，支持帮助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7年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出席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兄弟党加强团结的辩证法。因此，赫鲁晓夫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好转，还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公开检讨了苏共过去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真正闹翻，是从赫鲁晓夫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以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开始的。1958年4月，苏联致函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曾遭受半殖民地屈辱的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要求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苏联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不无感触地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核潜艇的要求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并要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信后，急忙于7月31日来到中国，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赫鲁晓夫说：“我先后跟你们谈了三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赫鲁晓夫在毛泽东这儿碰了一鼻子灰，一直讳莫如深。这是中苏关系由联合的顶点到闹翻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回顾历史时说，事实

上同苏联闹翻是 1958 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但是，尽管有这种尖锐的争论，包括 1959 年 6 月 20 日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中双方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毛泽东并没有把矛盾暴露在世界面前，还想努力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内部的团结。直到 1960 年 6 月以后，中苏论战才走向公开化。

1960 年 6 月 20 至 25 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经商定，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利用这个机会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6 月 23 日下午，苏联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 84 页。《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24 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有准备、预先策划好的大多数党向中共党进行围攻的事件。中共代表团根据“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方针，发表了声明，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当他在 26 日的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攻击中共的时候，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锋相对，作了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揭穿了他的阴谋，打击了他们老子党威风。此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3 月，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专家、学者。中国采取对等行动，中国高教专家安全归国，但在苏联各原子能研究中心工作的中国核专家，归国时乘坐苏联的飞机，因飞机爆炸全部遇难。1961 年 10 月 17 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上把中苏争论公开暴露于世。其后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在自己的党代表会上，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 1963 年 9 月 6 日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直至赫鲁晓夫下台，论战才告一段落。

### 三 毛泽东的反修理论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肯定斯大林，是为了肯定自己；有的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是毛泽东想在斯大林之后，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更有人说，毛泽东评论苏联共产党的是非，不仅行不通，而且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下，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由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各国共产党，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些路线、方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其核心，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此为据，来协调各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评判各国共产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的是非曲直。这就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阵营，统一的领导中心，统一的路线纲领。

因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肯定斯大林，也不是为了肯定自己。他担心的是由否定斯大林而引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维护的是与斯大林相联系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普遍原则和列宁主义的旗帜，肯定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以及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反修理论和总路线中追踪他的基本思路。

第一，毛泽东反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老子党”、“儿子党”，主张党际平等。诚然，毛泽东提出过“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互助合作，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出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但是，以苏联为首并不是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不是“父子党”，必须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地位。

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由、一律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兄弟党之间，没有太上皇。他们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对有关的共同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的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他承认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但是这种前列地位，并不是长期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犯了错误，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现在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如果任意地听从他的摆布，就必定会给苏联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必须揭露、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表明，毛泽东能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党际之间的关系，这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第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表现在国内问题上，是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这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赫鲁晓夫指出，由于苏联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与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与此相联系，赫鲁晓夫还宣布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些主张，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

胜谁负”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苏联报纸的资料论证了像苏联这样搞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第三，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上，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提出，在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条件下，美帝国主义也在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操心，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要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的翻版。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同样，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指出：除了用“和平演变”改变它的策略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共处。它们要发动战争，还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摔，我们也摔，打得一塌糊涂，打了之后，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我们再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据此，他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 第三节 过渡理论与理论的过渡

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否认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根据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情况，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他系统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开始了技术革命到政治革命的理论过渡。

#### 一 过渡时期的新理论

如前所说，毛泽东早在1957年6月，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至15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国将在10至15年内，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经过若干年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的观察，出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考，于1962年9月29日，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我们把它称为过渡时期新理论，就在于这里把过渡时期延伸到了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无疑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

早在 1953 年，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设想得很短，规定 10 年至 15 年。实际进程中，只用了 3 年。他没有看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导致了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观盲目性，遭到了客观规律的严厉惩罚。因此，到 1958 年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成”提出了与苏联不同的新标准。1936 年苏联宣布建成的标准为 3 条，而毛泽东改为 7 条：1. 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全民所有制；2. 实现国家工业化；3. 彻底解决衣食住行问题；4. 实现 6 小时工作制；5. 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6. 基本上消灭阶级；7. 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这样，所谓社会主义建成，已不再单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指建成发达的、可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而且，苏联宣布的社会主义建成同未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间不相衔接，中间有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非过渡期。而毛泽东这时设想的中国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是中间没有停顿的不断革命。

正是出于这个设想，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期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书中所写的“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提问说：“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他作出回答，肯定是后者。现在有些同志把两个过渡理论看成是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关系，从而肯定小过渡理论的正确性，批评大过渡理论的错误性，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两者是一个包容关系，小过渡包含在大过渡之中。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经过若干历史阶段，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的过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也有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此，毛泽东把过渡时期肯定为由资本主义直到共产主义来到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益的。并不能说有什么错。

大过渡理论除了包含的时间长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本质的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此，这个过渡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复辟与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必须坚持、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点，较之小过渡理论，要清晰、鲜明得多，毛泽东在 1953 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主张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这里，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革命的性质以及取何种形式，没有具体的说明。在大过渡的理论中，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帝国主义颠覆的危险性和执政党变质的严重性。

毛泽东的过渡理论，不是他个人兴之所至而提出的，也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他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的理性思考。

第一，1962 年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造成了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周围的环境显得很不安。同时，蒋介石又在叫嚣反攻大陆。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对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认斯大林，极力推行“三和”、“两全”政策，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这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占了重要位置。

第三，经济困难时期开始以来国内和党内的一些矛盾，使他想到中国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正如1964年他曾作的说明那样：“1962年上半年时，很多人说形势的全面好转要8年、10年，要包产到户，不搞社会主义经济了。在北戴河，我之所以讲形势、阶级、矛盾，是有个来源的。”

第四，是对马列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就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当刘少奇讲到斯大林说谁战胜谁的问题国内解决了，国际未解决，还是主席讲得对，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时，毛泽东插话承认说：“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1924年死的，革命胜利后有7年的实际经验。”

的确，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列宁指出：“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在这里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语意，是非常清楚的，不会产生歧义，也很难产生误解。在这里，马克思、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大过渡理论的问题不在于毛泽东看到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在于看重了这种阶级斗争。事实是，经过第一个过渡之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之后，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但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完整意义上，而是以残余形态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却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它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 二 理论过渡

毛泽东的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存在着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导致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的复归，出现了理论的过渡。

1958年元月，毛泽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他指出：“我们的革命步骤是：（1）夺取政权；（2）土地革命；（3）再次土地革命；（4）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5）技术革命。（1）、（2）、（3）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

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非常清楚，这里的不断革命，其着眼点就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这一情况，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立即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作为不断革命的紧迫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他曾在党内强调指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受束缚。他号召鼓一把劲，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地、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在这一进程中，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大跃进”失败了。但是，任何失败和挫折所带来的沉重心情都会被他那崇高的理想主义，乐观的进取意志，为公为民、为党为国的无可挑剔的用心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热情所冲淡，所吞没。他仍然要不断革命。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不断革命，不是去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办法，而是把它用于“大跃进”而引起的党内矛盾上，转向政治思想和上层建筑层面上，过渡到阶级斗争的领域中。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核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因此，必须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从着眼于“技术”的“不断革命”过渡到着眼于“政权”的继续革命，以理论的形式反映了毛泽东这一阶段思想轨迹的变化。由经济过渡到政治，由建设过渡到批判，由国内革命的思考过渡到世界革命的忧虑，如此等等。伴随着这种理论过渡，“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毛泽东的思考之中了。

## 第二十五章 迷误中的困惑和悲剧

当毛泽东把革命的兴奋点由技术革命转向反修防修的时候，他错误地发现，北京已经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他的身边。他由忧患意识变成了愤懑情绪，他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正是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懑情绪，使毛泽东深深地陷入了思维的迷津之中，导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权旁落的反抗，不是权力分配的争斗，更不是人欲的追求；而是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民族心理和时代因素等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 理想模式的追求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当人民还囿于困难时期留下的种种痕迹的时候，毛泽东却在绘制他的“新世界”蓝图。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要建设一个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理想蓝图，就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林彪呈送的解放军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称为“五·七指示”，它不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政治抱负的凝炼，社会理想的寄托，继续革命的蓝图。这是打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

我们从“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大致轮廓：

其一，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具体说来，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军、学农”；“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样，整个社会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以便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这样，每一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

其二，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经济的社会。在“五·七指示”的

各业兼学中，没有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曾出现过反复。“大跃进”初期，他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后来，在“共产风”泛滥时，他又强调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他下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因此，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消灭商品、货币和工资制度。“五·七指示”道路就是他设定的消灭商品经济的途径。

其三，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为社会每一个成员提供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力。知识分子、科技干部，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进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校，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其四，社会主义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的社会。毛泽东设计的各业兼学中，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他要求人们在革命大批判中，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要通过“斗私批修”，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在最大的广度上把资产阶级留藏在每个角落里的灰尘打扫干净，在最大的深度上把几千年来居于垄断和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连根拔除”，以便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思想条件。

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蓝图，不无理论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规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曾作过原则的规定。

他们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设想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范围，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加以废除，对生产资料实行全社会共同占有制，即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使全体劳动者都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他们设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自觉地根据社会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生产哪种产品，生产多少，都不再通过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来调节，而是由整个社会来调节，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他们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虽然还不能“按需分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即社会的总产品扣除了生产方面的消耗和社会共同需要之后，以劳动为尺度，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品的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

---

转引自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这样，社会的平等也随即到来。

他们设想，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直接的社会生产和直接的分配排除了一切商品交换，商品和货币将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没有商品生产，就没有商品和商品交换，也就不需货币了。在这里，商品经济已经被消灭。

他们设想，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代全面发展的人迅速发展成长，社会分工随即消失。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规定，既不是从善良愿望出发的幻想，也不是从理性原则出发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分析资本主义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必然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把他们的设想当成了现实。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失误。

第一，他们的设想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结果，不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最终真理。列宁说过，“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马克思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虽然经历了几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其中包括巴黎公社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诞生，他们没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具有超前研究的性质，其中个别论断难免会带有空想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尽可能地避免陷入空想，他们对于未来社会只作一些原则的论述，而对具体问题总是拒绝回答。例如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讨论一个问题：假如社会党人取得了政权，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应当采取哪些立法措施？当他们将这个问题提给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作了这样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恩格斯晚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然而，毛泽东却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脚本，用它来剪裁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不是用经验来检验、修改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更增加了空想的成分。

第二，他们的设想，是舍弃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特点的科学抽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说，根据这些原理，在将来某一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什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9页。

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就是说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并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深地扎根于实践的土壤，才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违背了他曾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忽略了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生命力，开出的只是无果之花。

第三，他们设想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首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社会主义首先在一系列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相继取得胜利。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新探索。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考虑到当时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曾打算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法令，直接按照马克思所阐发的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甚至想比较快地消灭商品和货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证明，此路不通。列宁尊重实践的裁决，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像在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历史经验证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一系列新课题，这些课题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必须靠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实践经验，独立地进行理论探索。而毛泽东在实践探索中，没有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没有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使理论离开了生活常青之树，陷入了灰色的渺茫之中。

第四，他们设想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然而社会主义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个联系、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有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既不是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可以概括总结，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后，才算从根本上建成。而毛泽东以为可以凭借主观愿望和道德的力量，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拔苗助长，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公越好，产生了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倾向，忽略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发展阶段，把将来可以做的，当作现实必须做的，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就不能不处处碰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 二 经济上的急于求成

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因时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极终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拂去历史层面的尘埃，就不难发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动因，就是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有人把毛泽东说成破坏生产力，专搞阶级斗争的凶神。其实，毛泽东却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战略家。毛泽东懂得，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生产力发展作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不能建成，建成了，也不会巩固。因此，他想以“大跃进”的形式，以主观意志的超越来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晚年犯了不少，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其动因，不是他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忽视生产力发展。恰恰是因为过急地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

如前所述，当毛泽东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他就惊人地发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向全党发出了“被开除球籍”的警告。毛泽东作为一位坚韧不拔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他曾经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他并不满足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他认为国家还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并不高，历史赋予共产党和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尽快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让中国跻身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是自己的责任。

但是，当毛泽东在贫穷落后的现实面前，在生产水平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在理论上发生了失误。列宁曾经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革命成功的，经济上比俄国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更加困难。毛泽东却误以为这种说法不对，似乎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容易，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历史的责任感、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理论上的失误，就决定了毛泽东经济建设上必然急于求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既得力量。它既是前人实践活动的客观结果，又是人们当前生产实践活动以及由它决定的其他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是人类把社会历史继续推向前进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毛泽东由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就不可能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力基础来发展经济，而企图靠“大跃进”等群众运动来发展生产，以为单凭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使生产力成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地增长。这样，势必要求过高的计划指标，要求更快的发展速度。

这样，当1956年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经济发展计划不平衡的情况开展反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4页。

冒进的时候，就与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思想发生了矛盾。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的表现，反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派的一个口号。要发动“大跃进”，就必须批判反冒进。因此，从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就反复批判反冒进，而且越批越严厉，越批越上纲，以致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内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1957 年国民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年份之一，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7%。毛泽东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样，他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如果不是反冒进使 6 亿人民泄了气，1957 年的经济工作成绩会更大；反之，如果不是反右派斗争，就连这样的成绩也得不到。结论是，抓阶级斗争能促进经济建设。

在毛泽东反复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大跃进”运动就发动和开展起来。“大跃进”是急于求成的产物，很快受到了经济发展固有规律的惩罚。毛泽东自己也很快觉察出来了。经过两次郑州会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纠正了一些错误。毛泽东准备通过庐山会议，继续纠“左”，以统一全党认识，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不料变成了反右，出现了“左”上加“左”，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没有从指导思想认识“左”的错误，他认为 1070 万吨钢的超额完成，证明“大跃进”是对的，“三面红旗”没有错。成绩的取得是执行以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的结果，也同反右派和批判反冒进分不开。毛泽东不但没有认识到所犯错误的实质，而且是满腹曲肠，认为与彭德怀等人的争论，是过去 10 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开始把党内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不同意见也看作了阶级斗争的反映。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对经济建设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刘少奇等人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主张，这恰好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原则。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经济，但这是一条通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道路来实现的，而他一生所奋斗的就是要避免走这条道路。搞“三自一包”必然引起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一大禁忌。因此，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重提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又是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工作中党内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又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这个“灵”，不是别的，还是“灵”在发展生产力上。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已经有了 10 年抓阶级斗争促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他认为这些经验，是有成就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种成效，与自己的理想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在 1970 年曾表示过这种心情。他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这就是说，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但是，这些局部的阶级斗争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有必要发动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面性的阶级斗争来最后解决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仍然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建设沿着他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一

句极为著名的语录，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促经济建设这一观念的高度概括和明确表述。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壮举。可以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业相媲美。他认为，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斗、批、改，清算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生活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想在自己的晚年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为此，确定了建国后“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但由于缺少经验，加之理论上的失误，因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要求高速度，高指标。而这种高速度，高指标违背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脱离了实际，不可能实现。而毛泽东将其原因归之于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不同意见，而且将这两种不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又错误地把1956年以后经济工作中的成绩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得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认识。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毛泽东陷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10年的全局性的错误之中。

### 三 伦理政治思想的积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追求，也是伦理政治思想积淀的结果。毛泽东伦理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的反映。因此，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当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谛，把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奋斗作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生活的最高目的，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之中，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事业与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基础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政治思想，不仅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党性原则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伦理政治思想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曾经提出过“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伦理政治思想。

管子提出过“人本”主张。他认为，“夫霸王之业，应以人为立国之本，无人无以出师征伐，无人无以国强民富。”否则，不仅不能竞争霸业，而且连国都保不住。因此，他认为，为政要顺人心，注意人心向背。《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就是说，为政的根本，在于治理好国家；国家能否治理好，其根本在于顺还是逆民心。他强调，为君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管子·牧民》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就是说，人民厌恶，不仅不能去做逆民心之事，而且要根据人民的厌恶，去改善人民的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使之佚乐，富贵、存安和生育。

孔孟提出过“仁学”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节用爱人，使君以时”。这就是说，治国要爱护老百姓。在《论语·阳货》中提出“恭、宽、信、敏、惠”为仁的具体内容。其中“宽”，就是治国家要宽厚对待人

民，便能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惠”，就是仁爱恩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就是说，顺着人民谋利的路子使之得到实惠，便能给人民以好处而无所耗费。对人民要做到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样，行之天下，始可谓仁。孟子更是发挥了孔子的仁学主张，在政治上提出了“政在得民，民贵君轻”的思想。

贾谊根据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提出了“民本”思想。他在《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海，吏以民为贵贱。”在他看来，民是国家的命运所系，功业所在，力量之源；民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胜败。因此，民“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反复告诫人们，要重视人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戒之哉；戒之哉，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中，这些“爱民”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趋向，是我国思想文化遗产中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优秀传统。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其本质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说的“爱民”，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治民”。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系统地研究并吸收了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成果，对它进行了改造，从而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其根本目的，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一批党员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群众。他一反“官官相护”的统治术，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的政治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他对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要求干部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在合作化运动中他批示说，“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他把干部的腐败现象视为不可饶恕的丑恶，要严加惩处。“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党的干部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在1957年3月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说：“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对此他要求“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对官僚主义作风，更是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病重期间，毛泽东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

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中，始终表现出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浓烈的、稳定的、持久的爱。正因为如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中去，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群众，到下面去研究问题。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防止他们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虽然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张曾导致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其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凝聚力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毛泽东这样说，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对自己家人及亲戚的要求也很严格。50年代，他就任国家主席时，他外祖父家有人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当地政府管理。他就去信批评教育“不应该特殊”，要求政府严加管理。三年灾害时，他和孩子也与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带过日子。当他了解到农民吃饭问题严重时，在一段时间里，心情沉重，以不吃肉、不吃细粮的行动来寄予同情。警卫人员见其女儿生活太苦，提醒毛泽东能否给她提高一些待遇，他没有同意，并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特殊。毛泽东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是令人敬佩。革命胜利之际，他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请客送礼，歌功颂德。晚年他虽然产生了骄傲情绪，但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保持不变。所以，当他用自己的要求来审视党内存在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时，他就要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消除党内存在的这种腐败现象。

## 第二节 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

由于“以民为本”政治伦理思想的积淀，出于对马克思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毛泽东建构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但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他决不会满足于形成一个理论的自我。只有使这个理论的自我得以对象化，即按照自己的理想直接改造社会，他才能安静和满足。因此，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

### 一 “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喜三惧引起了对“修正主义”的警觉，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问题。

毛泽东按照政治思维的特征，针对苏共二十大“三和”“两全”的路线和国内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在毛泽东那里，修正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内涵之一，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针对1956年苏共的路线，他多次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60年代以后，又多次讲到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的代理人。内涵之二，就是指资本主义。他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

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他在 1964 年与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内涵之三，就是指“和平演变”的代表人物。他把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问题看成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抵制资本主义，防止修正主义，作为“防腐拒变”、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

毛泽东根据这种思维逻辑，提出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 1962 年 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和湖南“四清”中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修正主义根子”。这次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确定的对象，强调的是一种“可能”。但已表明，他由国际上的反修，转入了国内的防修。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走向并非毫无原因。

第一，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出现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对于以伦理政治为标准，追求纯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二月的西楼会议上，发现财政预算尚有 50 亿赤字，认识到实际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所以刘少奇又说：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的非常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一致强调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对此，毛泽东批评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一片黑暗”，不合实际，形成一般“黑暗风”，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 年 3 月，安徽省要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到秋末，全省推广，承包责任制占全省 85.4%，10 月，毛泽东否定了这种作法。1962 年 5 月 24 日，邓子恢在贯彻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过程中，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了除了小队核算制 30 年不变的立法外，还要稳定和扩大一点社员小自由，即自留地、自留山、饲养家禽家畜等，集市贸易不能关死，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五六月间，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争论，次年元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华东区的汇报，他们认为安徽“责任田”是包产到户，是单干，这是一种方向性错误。邓子恢争辩，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是中国人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只要经过试行改进，很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好办法。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引用安徽人民的话说，不管黑黄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对于这一切，毛泽东认为是刮单干风。8 月 9 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说，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引起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出“修正主义”的警觉。后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把这些观点与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1964 年 2 月 9 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

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单干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可猖狂啦。1964年2月，金日成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深层的谈话。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也有主张“三自一包”的。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上半年到处宣传。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说，要向全国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和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谈到援助越南问题时说：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很厉害。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19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一封自我批评的信中说：在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3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象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第二，王稼祥关于对外方针的建议，加深了毛泽东国内出“修正主义”的观念，60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小矛盾尖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这种形势下，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于1962年上半年，几次谈了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2月27日，他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他认为，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以便“冲淡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不要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援的支票。要适当收缩。对此，毛泽东两次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到这个问题。1963年5月22日，在武汉会谈中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

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谈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与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这一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厉害，在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别派。“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王稼祥是联络部长，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本来害病，没管事，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他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他们的国际纲领。可见，毛泽东把“三和一少”视为国际共运中赫鲁晓夫二十大“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直接反映。

第三，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和干部的状况，促使毛泽东做出了国内出“修正主义”的判断。继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收集了各地有关农村“四清”阶级斗争情况的20个报告材料。其中浙江省7个、湖南省4个、河南3个、河北3个、东北局1个、湖北1个、山西1个。根据这些材料，毛泽东列出了阶级斗争的9种表现：（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现；（8）在社会上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横财；（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毛泽东把这种种情况同党与干部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提出了党和国家会变颜色的警告。他在浙江省7个材料上批示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里，毛泽东为人们描绘了一种令人警觉，担忧、可怕的危险景象。

正是这种警告使全党首先是党中央，几乎无例外地接受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深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清除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同时也关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提出“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时，提到了“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化艺术问题。随后，他在巡视省时，对文艺也给予了很大的注意。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他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专问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现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当时人们怀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诚忧虑和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责任感，投入了批判鬼戏《李慧娘》及其“有鬼无害”评论的斗争。在文化艺术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开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多次的批评。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霸天，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旧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就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文艺指示。他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接着，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文艺处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第二个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孙治方的有关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自主权等经济学观点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

毛泽东60年代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一系列批判，都是从“防修斗争”的政治高度出发的。

为了在中国有效地避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审察了阶级斗争情况，引起了警觉。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情况的审察上，他鉴于赫鲁晓夫的教训，特别注意党内有没有支持这种种“资产阶级影响”的政治代表人物，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1月13日，他曾同有的领导同志说：“去年10月，

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他为这番话没有引起地方上反应感到担忧。1965年10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各大区第一书记正式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正是这一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刘少奇曾有1953年“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批评，也有1955年砍合作社的埋怨。但没有动摇对他作为接班人的信任。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并与他分手，则始于1962年，公开暴露于1964年。1962年，党内有些人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刘少奇支持这种意见。说过工业上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等话。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不满。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支持它就是右倾。

但那时，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主要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与刘少奇正面冲突，还是在1964年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刘少奇却说，“四清”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后来，在1965年1月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正式批评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负责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负责的国家计委。接着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个提法，刘少奇表示不同意。从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问及“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分道扬镳了。于是，“炮打司令部”一声炮响，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祸及全国的10年灾难发生了！

## 二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随即开展了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为“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针对“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出学习海瑞问题。他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胡乔木的建议，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各地出现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在1959年下半年的一次政协会上，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海瑞戏。据此，吴晗1960年底写了《海瑞》一戏，后接受别人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剧团上演。该剧叙述了明朝大臣海瑞终于将宰相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因强占民田、强奸民女罪而处死，并通令给绅退田的故事，宣扬了

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但是，从1962年开始，党内对于采取什么措施克服经济困难时，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并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此剧，但均遭拒绝。1963年前后，报刊上出现了一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1964年，康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64年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有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说1961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的时候，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文章写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中央常委无一人知道。后来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披露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卡特·巴卢库时也谈到：“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

由于人们不知文章的来由和底细，虽然全国地方各大报纸都先后转载，但中央书记处持慎重态度，北京各大报刊仍未转载。当时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对点名批判没有经过中宣部批准感到震惊。认为“上海这种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随后，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委决定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真答复，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再说。

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

对此，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极为不满。他在1967年5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11月下旬，彭真回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考虑一下再说。他在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时说，吴晗的性质不同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在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要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11月29日，《北

京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了编者按，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转载姚文元文章，以表示不同的态度。并加编者按说：“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毛泽东则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以此为信号，从1958年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意见分歧等问题中，毛泽东想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从而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坚定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耽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看法。

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各报转载后，如何进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彭真、陆定一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尖锐的政治问题，而是一般的社会思潮，力求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并在其他场合称：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有关政治批判的部分就好了。在这种氛围下，北京各报发表了一批有关“道德继承论”、“清官”、“让步政策”等学术性文章，而对有关“要害”等政策性批判的文章不予发表。彭真在1966年2月3日的“五人小组”会议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收”，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过头，要慎重。尔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根据彭真的指示，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先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意后，于2月12日批发全国。《提纲》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机构批准”。并要求“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在适当的时机，对“左派”进行整风。

《提纲》发出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3月初到中宣部询问《提纲》的情况，向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提出了一些问题。许立群带着这些问题向彭真汇报，请示怎样答复。当许立群谈及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提的是谁时，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当谈及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因为有大腿的《女跳水队员》行不行时，彭真反讥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泳过没有？”当谈及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时，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陆定一的讲话，北京各报的学术批判，《二月提纲》的规定，中宣部扣发政治批判稿件的作法，如此等等，与毛泽东的从政治“要害”上批判的观点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2月8日，毛泽东在听取《提纲》汇报时就表示：左派整风3年以后再说，并问：吴晗是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3月初，毛泽东在修改《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后面加了一段批语，他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道路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得知彭真对杨永真询问的答复后，非常生气。他两次找康生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和陆定一。他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根本上扭转了《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5.16通知）；第二，成立“文比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到4月底，先后7次修改“通知”，强调指出：批判了彭真等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称他们是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义、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派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人，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所有这些，不仅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实际上也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三 “文化大革命”实现的途径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成为千百万群众参加的长达10年的内乱？这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政命令，也不是臂佩袖章，手执棍棒的乌合之群的打砸抢，更不是心地虔诚，口念语录的芸芸众生的宗教崇拜，而是理论掌握了群众，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

能甲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理论虽属精神的范畴，但一旦与实践着的群众相结合，就会变成强大的社会威力，以感性物质力量的形式，冲出精神的范畴，进入实践的领域，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在使用这一观点的时候，更多地看到是革命理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其实不然，马克思这个哲学理论，还包含了另一个层面，即错误的理论也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在我党历史上，因为错误理论掌握群众，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教训也不少。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式，掌握千百万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阻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看来，彭真只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即使是刘少奇，“5·16”通知之后，党内罢免，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事实上，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因此，就所谓个人权力纷争来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到此为止。

但是，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不在于捅倒彭真，不在于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而是要建立一个理想模式。因此，他不容许以党的领导的方式，把群众限制在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之内。他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直接诉诸于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治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首先是通过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了“天下大乱”。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中所说的，这条路线，已经在全会上解决了，刘少奇等人已经承担了责任。但是，毛泽东却要在8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百万人的庆祝大会，将党内矛盾公布于众，造成“天下大乱”的态势。在大会上，毛泽东异乎寻常地穿上了军装，直接走到队伍之中，掀起群众欢呼的狂热，并戴上了师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献的“红卫兵”袖章。这就意味着红卫兵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乡。他们以战斗队的形式，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四旧”为口号到处冲杀，而《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天下大乱”的需要，大肆渲染；毛泽东一再接见。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人数达1100万之众。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红卫兵誓死捍卫毛主席，两者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卫兵以毛泽东的支持而所向披靡，而毛泽东以红卫兵的拥戴而走上了神坛。全国各级领导机构，陷入全面瘫痪。就亿万参加红卫兵的青少年来说，绝大多数是一些真诚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怀着“反修防修”的宏愿，进行“造反”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是理论掌握广大青少年的结果。

应当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红卫兵，并不是靠行政系统和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崇拜运动的产物。毛泽东的激烈的“左”倾理论观点，急进的革命形象，成了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保卫他和贯彻他的革命主张就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动力。红卫兵是在一个

接着一个的政治口号和战略部署下行动的，它的行动是有一定理性色彩的。例如，在“横扫四旧”，批判“文艺黑线”的行动中，他们奉行的并不是毁灭一切文化的主张，而是那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在“横扫”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毁灭文化，而恰恰相反，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捍卫最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因此，红卫兵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组织起来的有着他们自己信念和思想的战斗队。当然，由于红卫兵的年幼，他们为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和驱使，这只能增加红卫兵运动的复杂性，但不能改变红卫兵运动的思想意义，红卫兵运动使60年代的青少年过早地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在疾风暴雨中他们政治上早熟起来，这一批青少年是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后来他们抛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甚至早于一般干部，所以不是完全像有些影视中千篇一律地描绘的那种野蛮地吆喝着，抽打着的脸谱。这样的场面，在生活中确有，但不是本质。如果在理论上，在文学艺术上更多地反映出红卫兵幼稚的思想色彩，那么人们就会更深地理解错误理论是如何深深地掌握着这些青少年的灵魂和行动，了解错误理论掌握群众产生的摧毁力。

从红卫兵运动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们的实践中往往比理论本身更“革命”。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具体的。把理论变为运动则需要具体化，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体现理论，则决定于红卫兵，决定于他们的创造性。红卫兵对一种理论的理解是各式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要体现了红卫兵的创造。“文化大革命”中对领袖崇拜的形式，如早请示、晚汇报等并不是个人崇拜固有的形式，苏联人、法国人对领袖的崇拜就不是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反映了中国相当多的群众的思想特点。开展破“四旧”、“大批判”，是“继续革命”理论本身所要求的，但用鞭子和拳头的“武器”去批判则是有些人的创造。由于红卫兵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并不一定是系统全面的，往往通过一条语录，一句口号去理解，因此在红卫兵运动中，理论往往容易被庸俗化，甚至把“继续革命”理论的谬误推向更加荒唐的程度，“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旦转化为红卫兵的实践，带来的将是比它本身的错误更加严重的后果，成为物质性的惩罚。

红卫兵的“冲杀”所造成的“天下大乱”毕竟是社会表层的现象，力量所及，不可能深入到工厂、农村，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暴露了红卫兵许多弱点。“革命”的狂热开始冷却，无政府主义已经泛滥。因此，毛泽东对此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工、农、兵起来造反。1966年10月5日，毛泽东批发了在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蔓延部队，进行“烧荒”；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违反中央指示，先斩后奏，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的革命行动的处理意见。“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开始在全国工矿和农村燃烧。

由工、农、兵在各个领域中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1966年12月，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我们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水平发展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民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来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些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宏旨，就是执着于他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毛泽东这种执着的追求，又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群众的掌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辩论，实际上是“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普及，几乎家家户户都卷入了辩论之中。比如，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走资派，什么叫资产阶级司令部，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复辟的危险性在哪里，怎样估量阶级斗争的形势，什么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什么叫造反，17年到底是黑线还是成绩是主要的等等，争论不休，在辩论中这些理论观点逐步深入到人民的思想中。

如果说，运动开始时各级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由于党的传统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红卫兵、工农兵的革命造反行动，采取自保观望态度的话，那么从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革命”，毛泽东借此号召全国全面夺权，触及干部的根本利益之后，广大干部再也不能不亲自投身“革命”了。他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不理解”，逐步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在不断的灌输之中，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许多干部的自我批判和检查，否定17年来的实践，转而信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自我批判是真诚的，是“文化大革命”理论渗入和掌握这些干部思想的结果。

许多干部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往往不是从认识开始的，而是从感性开始的。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有至高的威望，党的干部多年来对毛泽东个人十分崇敬和信赖，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对他的指示的正确性人们不仅不应怀疑，实际上也下去怀疑，因为它是神圣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正是由于多年来养成的对毛泽东的这种信赖和遵从，不仅不去怀疑当前开展的这场运动，相反却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似乎有充分的说服力，从而被这个理论所掌握。广大干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比起红卫兵来要晚得多，但干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它自己的道路和特点，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斗批改”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总题目下，进一步渗透到各种业务和制度中去，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许多不同的分支理论。如文艺革命理论，教育革命理论，知识分子再教育理论，党内矛盾理论。其中，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理论中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不仅在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原则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招生、考试等方面都有大胆改革的主张，否定文科大学，轻视知识，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充满了偏见与偏激，有些甚至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导致的后果也最为严重。

“文化大革命”理论贯彻得愈深入，它的谬误暴露得愈充分，它愈益走向自己的反面。“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虽然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了。但“九大”以后，不仅“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口号

实现不了，而且党的分裂、人民的分裂越来越严重，林彪事件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由此开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日益失去了对群众的掌握，“四五”运动的爆发，最终表达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抛弃。

### 第三节 历史的悲剧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掌握群众的方式，以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纯粹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为目标，进行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上的一个大曲折，远远脱离了他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是一场历史性的大悲剧。

#### 一 结果与初衷的矛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1967年2月3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特·巴卢库的谈话中有一个说明：“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是在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形势下，采取非常手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以便建立一个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生产绝种的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比民主革命更壮丽的事业。

毛泽东的这种社会理想，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在他对现实的浪漫主义的高蹈远举上的。当人们为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雀跃，一些理论家、文学家以粉饰现实为己任时，他却不落世俗之见，认为在我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理想的天国并没有到来。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端不断出现并正在发展。在这里，既有干部的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也有社会的沉渣泛起，牛鬼蛇神的蠢蠢欲动。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却将诸如此类的现象归结为道德的沦丧，认识政策的缺陷。因此，他要用直接的道德力量，或以群众运动实施他道德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却没有我们崇高和公正，修正主义以物质利益激发出来的热情不如我们的崇高理想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毛泽东的理想中充满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斥责，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要寻找避免这种种弊端的社会发展之路，这就是以“五七指示”为模式，以大庆、大寨为榜样，以“文化大革命”为途径来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与道德沦丧的矛盾，讲求实利与追求理想之间的矛盾，消除魔鬼与天使的永恒冲突，换言之，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弊端，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

---

转引自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但是，任何伟人的强力，无法转变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事与愿违，由美好初衷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却结出了毛泽东未曾预料的苦果。

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大破坏”。仅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起诉书》所列举的受诬陷名单的统计，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中央党政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000多人。此外，专政机关本身也被砸烂，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党的各项政策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受到极大削弱，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几十年英勇奋斗的革命成果濒临毁灭。

“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多次强调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且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我国，50年代末期，也曾着重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进行技术革命，把技术革命作为不断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提到全党面前。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文化、科学的落后状态。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同上述意义的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这场革命冠有“文化”二字，而且也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它很快就转入了所谓的“夺权阶段”，而对文化、教育、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是进行所谓“批判”，“破”字当头，很大一部分教授、教员、作家和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有成就的专家、科学家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结果学校停课，文艺停演，科研停研。10年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长，历史文化遗产和社会主义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的学习被耽误，旧的文盲未扫除尽，新的文盲又大量产生，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达2.3亿。这些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是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一场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还曾被宣传为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把“斗私批修”，作为这场革命的思想纲领。“文化大革命”本来也包括有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意思。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所用的方法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思想文化问题，对待人们的世界观问题，绝不能使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人民的实践来解决。掌握革命的科学的的世界观，要靠学习、靠自觉。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像“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样，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侮辱人格，等等，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经过10年动乱，不仅没有破旧立新，反而使我们的党风和优良革命传统被破坏了，

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道德水平下降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各种歪风邪气泛滥起来，以致需要我们党花很大的气力才能逐渐消除这种恶劣的影响。

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不是思想革命，而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首先是思想上乱了。建国以来 17 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观点，被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乘机空前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也乘机泛滥开来。

组织上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派别，互相对立；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入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

社会生活也乱了。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乱，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自己折腾自己，也就是乱党、乱国、乱人民。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他们的帮派骨干分子，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们就是要在乱中夺权。他们总是嫌乱得不够，不允许有社会的安定，不允许有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稍作一点整顿，他们就感到大难临头，稍微采取一点有利于安定的措施，他们就要千方百计进行干扰、阻挠；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发难，兴风作浪。群众说，“‘四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是一点也不错的。

毛泽东开始曾把这种“乱”错误地看作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后来，他曾设想要由“乱”达到“治”，使局势稳定下来，也曾为此提出过许多要求，并且采取过许多措施，如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4 年和 1975 年一再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等等。但是，动乱始终不能停止，局势始终不能稳定，安定团结的目的始终不能实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指导思想 and 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它完全违反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发展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相容，因而必然引起内乱。而只要坚持这一套理论、方针、办法不变，坚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坚持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势必就要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就势必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以可乘之

机，因而内乱也就不可能终结。既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又想实现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不可解脱的矛盾。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彻底粉碎凭借“文化大革命”而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完全消除内乱的根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真正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

## 二 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

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痛苦与“邪恶”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的心理与习惯不断变化的过程。其间，充满着竞争的机制与道德抗争的矛盾，自由发展的机会均等与社会平等失衡的矛盾。在这里，一切传统道德的判断和审美价值的观念，都失去了它应有的魅力。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是以现实的态度，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办事，还是按照道德意志办事？历来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义厚道，克己尽忠的传统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有李嘉图与西斯蒙第的斗争。李嘉图认为，社会必须以物质生产自身为目的，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在所不惜。对此，马克思说：“他要求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伤感主义的反对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牺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抗，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对于李嘉图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的方法，马克思也予以肯定；“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恰恰相反，西斯蒙第则用应该怎么样的道德评价和善良愿望代替了严肃的科学分析。他指责李嘉图注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忘记了人，主张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幸福。对此，列宁指出：西斯蒙第“只限于以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西斯蒙第的肤浅性在于，将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深深植根于现实制度的种种矛盾，当作人们，首先是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措施，甚至道德上的错误。因此，他们主张用已被现代社会冲破了的传统道德去规范现代社会，他们以正义的热情，崇高的品德向社会进行道德的说教，正义的申诉，向统治者发出拯救的呼吁，提出解决策略。其结果，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

---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121 页。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 122 页。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63 页。

毛泽东正是这样，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与伦理道德力量的矛盾冲突中，他持重于后者。他以无私的道德风貌和精神力量去推动社会的生产，改造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切，他坚信自己的理想可以对象化。他曾说过，资本主义的方式也可以发展生产，但是，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绝不容许。因此，谁采取现实的态度，顺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谁就是迷失政治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谁就是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伦理道德的力量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是这一理论能够掌握具有浓厚伦理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民众的力量所在，也是造成历史悲剧的根源所在。

毛泽东用政治大革命来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实现他的理想，不仅没有理论根据，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是指阶级对抗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变革，其基本标志就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政治革命的前提，是存在着阶级的对抗；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政治革命的形式，是激进的暴力对抗。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政治革命已经失去了它发生的前提与目的。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归结为继续进行政治革命，而是一种社会革命，即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它既不是完整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也不是大量地存在的矛盾，而且其基本形式表现为敌人的破坏与无产阶级对敌人实施的专政。这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但不是政治革命。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是革命，人民对敌人的专政也不是革命，因此，这时发动政治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理论根据。

同时，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归结为“政治大革命”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如前所述，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停止支取定息，作为剥削阶级已不存在，掌握政权的是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党内存在蜕化变质的腐败分子，也不是整个党整个阶级的问题，而毛泽东在《5·16通知》中所估计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也不符合实际。在这种估量下，决定发动一场新的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对象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虽然合乎一种逻辑的推论，却违背了客观的事实，这只能成为一场历史性的灾难。

### 三 出路在于改革

我们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深重灾难，并不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完美无缺，不需革命了。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6年、1958年和1960年前后，提出了三次社会主义改革的设想，为我们今天的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经验教训。这种改革既不同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同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它必须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某些环节。因此，改革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唯一出路。

第一，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运动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较

资本主义社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往一切社会形态一样，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经济的或政治的改革。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也曾说过，今天在发展生产力和其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在这里，恩格斯、列宁的思想都说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有之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机体，不是僵化的，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向前运动和发展。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具体环节和具体形式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地方。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制度不够完善。所有制形式的现有结构同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结构不相适应；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条块分割，政企不分；如此等等，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这些生产关系的具体环节和具体形式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的是原来模仿外国的模式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这本来就与我国生产力发展不适应；有的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适合的，现在变得不适应了，原来矛盾不大的，现在矛盾突出尖锐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自身的这些缺陷，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改革，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非对抗性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对抗和冲突，只有经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社会基本矛盾才能得到解决，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调节，比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行政干预，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使社会基本矛盾出现某种暂时的缓和。但是，由于其矛盾性质的对抗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中某些环节上的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它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解决。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基础上不断地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表现为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党和人们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克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克服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和缺陷，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处于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许多制度不够完善，导致了权力过分集中，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作风、平均主义思想、“官工”、“官商”、“官农”式的管理方式等等弊端严重地存在。历史的逻辑往往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滋生着“左”的思想指导，“左”的思想指导，又形成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制约着生产的发展。所有这些，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地推陈出新，除旧布新，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这样，既能坚持政策的正确性，相对稳定性和前后连贯性，又能保持方针的动态性、功能的综合性、效率的持续性。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出现失误和挫折，因而导致的种种改革，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它丢掉的，只是由于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引起的种种弊端，获得的却是生机盎然的青春活力。实践证明，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都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斗争。远的不说，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革命，既有查理的复辟，也有波旁王朝的颠覆。前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斗争。而社会主义建立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况且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失误，因而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是不难理解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过错，恰恰是误解、曲解、违背这些原则的结果。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也的确纠正了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个别结论，提出了一些符合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新政策和新理论，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什么危机，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发展。

第三，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搞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国情是什么？常说是底子薄，人口多。其实，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正是这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构成了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生动局面。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在运动、变化着。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以中国现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有机整体，它们都不能游离于中国社会有机整体之外。反过来，这个社会有机整体随着它失去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它就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的结构和功能。从它的静态方面看，它规定着中国国情的基本构成状况，规定着中国社会现状的相对稳定性，显现出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国情的区别，维系着中国与国际环境方面的现存结局；从动态方面看，它又以规律的面貌出现，规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规定着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进程。

过去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缺少这种系统的分析，往往是从感性直观出发，或者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者是甲乙丙丁，罗列现象，抓不住本质。不能把握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矛盾体系发展总过程的质的规定性，结果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是这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见之于行动决策，在工作目标上搞“单打一”，在工作步骤上搞“一刀切”，在工作部署上搞“一锅煮”，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还是应该回到毛泽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上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过去了，但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矛盾、弊端，以及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这就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使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在中国的特殊中体现出来，不论是技术结构上，还是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各方面都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的风格。不仅如此，我国各地区生产发展很不平衡，人们的觉悟程度很不一致，因此，制定政策，必须因地制宜；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制定政策必须因时制宜；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

个部门，在生产水平，所有制关系等条件上很不一样，各种制度，必须因行业制宜。一句话，不能以原则去剪裁现实，而要从现实去制定原则。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勇于破除一切陈旧过时的老框框、旧模式，不断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能主观随意，头脑发热，也不能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应以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舞台上，演出一场场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来。因此，实行改革，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 第二十六章 憧憬中的世界革命

毛泽东早年刚刚步入社会生活的时候，就满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决心挑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担，“为全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他以此为己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标志着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胜利。但是，毛泽东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途径，现在应该把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国际条件提到议事日程。于是，毛泽东满怀世界革命的憧憬，深切关注世界的新领域，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制定了世界革命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思想。

### 第一节 “两个阵营”与“三个世界”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即 1949 年 6 月，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宣布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阶级斗争的问题，常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名义加以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问题，也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加以处理。但是，时隔不久，60 年代中苏两国就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分裂和对抗。这时，毛泽东认为，不仅两个阵营不复存在，而且苏联与美国一样，成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变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中国却与第三世界为伍，形成三个世界的格局。他以此为据，作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他的主观杜撰，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国际国内各种现实的、历史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 一 世界格局的新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第三世界民主运动的高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在这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际政治力量的划分，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国际资产阶级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国际工人运动由于异己阶级的存在和影响，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进行国际斗争的时候，不能从概念出发，必须立足客观现实，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策略原则。

毛泽东认为，经过战后近 30 年发展，美苏两国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威慑力量与打击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两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它们的对峙与缓和，造成了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充分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曾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和 1974 年 4 月同西欧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多次说过：“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因此，毛泽东把苏联看成是对我国安全直接的最大威胁。他的这个判断，不是

因为我国与苏联的局部冲突，而是着眼于当时形成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条件

第一，苏联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危险性。列宁曾经说过。后起的帝国主义更要重新瓜分世界，因为它“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因此，就显得“更加凶恶，更加蛮横”。苏联要想成为世界的霸主，就不能不从美国手中争夺地盘，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所以毛泽东在 1976 年 2 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铺得太宽，当时不能不力图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得不处于守势。而苏联却相反，它打着“和平”的幌子公然宣称：“经济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强，使苏联胜利地在国际舞台上展开积极的攻势，现在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这实际上就是说，苏联当时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建立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第二，苏联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当时苏联在经济力量上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同美帝国主义相比，同它称霸世界的需要相比，还显得薄弱。因此，它疯狂地扩军备战，企图夺取军事上的优势，以便掠夺别国的资源，来弥补它在经济上的劣势。当时，苏联的武装部队人数比美国多一倍，战略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比美国多 400 多件。坦克、装甲车、大炮等常规武器的数量也大大超过美国，它拥有一支“进攻型”的海军。这些说明，苏联在向美国争夺霸权时，必然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为主要手段。

第三，苏联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与此同时，它在进行侵略、干涉、颠覆、扩张活动的时候，常常打着“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和平民主利益”等旗号，这种特有的欺骗作用，增加了它成为战争策源地特有的危险性。

毛泽东认为，由于苏联的蜕变，不仅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情况的出现，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出现了美苏中三大角的政治大国，制约着全球政治风云的变幻。

在这三角关系中，美国不得不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的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着更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的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在这之前，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早在 1968 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就已经指出：“我们历史学家一定要把一句中国战略性的老格言给时新，这句格言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同中国和解，必然努力奋斗，必须获胜。”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渠道给中国打

---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75 页。

1997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原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74 卷，第 3 期（1969 年 2 月）。

招呼，拟想与毛泽东缓和关系，争取建立一个新的战略。这样，经过 20 多年的包围与封锁之后，中国突然成为全球关系新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统帅全局，巧妙地发动了一场准“世界革命”，他毅然决定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实际出发，突破意识形态分歧的屏障，打开中美关系，登上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纵谈国际形势时提出：“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的谈话，在 1971 年 5 月 3 日，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形式，传达到党内。这样，整个中国获得了一个信息，中美关系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转机。随后，7 月上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中美发表公报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加快。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尼克松访华，北京接待了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大洋彼岸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不仅标志着中美关系新阶段的到来，也意味着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开始，毛泽东以巨人的豪迈步伐，登上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

## 二 确立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确立了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在这里，他所思虑的不是以“美国牌”反对苏联的权宜之计，也不为充当第三世界政治领袖的野心所驱使，而是包含了无产阶级特有的价值取向，这就是立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利益，立足于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

立足于我国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安全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往往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成为主权国家之间建立特定稳固的合作关系的真正基础，50 年代初期，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既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是基于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作出的合理决策，它在外交上平衡了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在战略上能够对美国起到威慑作用，在经济上，可以争取苏联的援助，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禁运和封锁，摆脱落后挨打的处境，在 6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赫鲁晓夫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不惜牺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根本利益，热衷于苏美合作，企图在利益均等的条件下与美国共同主宰全球事务，争霸世界。这种战略方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都是不能接受的。中苏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前所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仇视中国的政策，除了经济上的封锁之外，在军事上先后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他们在台湾驻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在沿海地区进行骚乱和破坏，对我们进行军事包围和遏制。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国上的北侧，又受到苏联陈兵百万的武装威胁。国家处在“帝、修、反”大合唱的全面包围中，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1969 年 3 月前后，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省珍

---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 年 12 月 18 日）。

宝岛等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更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使他对国际形势的忧虑日益严重，认为战争的危險在增长，3月1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着重谈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可以反映出当时他的心态。在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还专门论述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此外，过去讲过了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颁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在毛泽东看来，对我国安全直接的、最大的威胁，已由美国转为苏联，因此，在“珍宝岛事件”后，在党内外做了广泛的战备动员，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不惜重金加快三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群众挖防空洞的活动。备战的对象是苏联，由于苏联在6月初还提出要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与不安，当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北京路过，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决定从10月起恢复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时，毛泽东怀疑苏联是把谈判作为向我国发动突然进攻的烟幕。在10月中旬，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略，疏散中央领导人，疏散城市人口，发布了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的命令，以迎击苏军入侵，保卫国家的安全。在这样一个特定背景下，毛泽东同斯诺谈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北京与尼克松会谈，显然是为了在各种反华力量的包围中，找到一个突破口，维护国家的安全。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还直接打击林彪集团的阴谋。林彪集团对于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极其不满，当基辛格秘密访华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宣布以后，听到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对我们改善中美关系表示反对时，林彪集团中的李作鹏等人竟然以称赞阿尔巴尼亚的来信是一封“马克思主义的信”的形式，来表示他们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极为关注。把批判、揭露林彪集团的极左路线和反革命阴谋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他表示对林彪提出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厌，强调个人崇拜“要降温了”。当周恩来去毛泽东住处汇报与基辛格的会谈情况时，毛泽东指令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熊向辉参加一起汇报。汇报议程一开始，毛泽东却搁下同基辛格会议的“正题”，向熊向辉了解总参谋长黄永胜在部里领导“批陈整风”的情况，发现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在总参谋部内严密封锁中央精神的问题，觉察到黄永胜、李作鹏的后台是林彪。随着中美接触逐步加深，林彪集团败露愈烈，毛泽东对其真相的认识也越深，最后导致林彪一伙仓皇出逃，自我爆炸。此事表面看起来互不相干，毛泽东却认为它与改善中美关系，维护国家安全有着内在的联系。

立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毛泽东早期刚刚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时，就具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当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他坚定了一个牢固的信念：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进程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中国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再存在之后，毛泽东合乎逻辑地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秩序中担负

着特殊的使命，国为中国已成为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紧急关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最终胜利的主要保证。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在进行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之前，他所思虑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和根本利益，他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分析各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以此为据，判别出哪一些国家与世界人民为友，哪一些国家在统治剥削与压迫其他国家。毛泽东遵循对人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对国家的阶级分析，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相互矛盾中，为国际工人运动找到了主要敌人，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为自己找到了广大的同盟军，从而把亚非拉和其他地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革命浪潮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这从国际范围内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立足于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寄希望于人民”，这是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和其他国际事务时常讲的一句话。世界政治力量划分的精髓，就是充分肯定世界人民的力量，努力结成一个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正如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所一再强调的：第三世界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因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总是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他在分析苏联的情况说：“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对于日本人民，他指出：“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在同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谈话时指出：“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

### 三 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家利益的价值取向，为毛泽东确立三个世界的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但是，当我们透过现实，拓宽视野，还会发现，近代历史和深层文化的背景对毛泽东判断国际局势，处理国际关系的深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5000 年来的中国文明史和近 100 年来的中外关系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基本看法。长期以来，因昔日强盛和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而产生的大国意识和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与因近百年来处于落后挨打的弱者地位而产生的民族耻辱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起积淀于中国人民心中，它使中国人民对一切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

---

引自 1977 年 1 月《人民日报》。

引自 1977 年 1 月《人民日报》。

引自 1977 年 1 月《人民日报》。

引自 1997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

问题时，都极度敏感。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为恢复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尊严，为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驱逐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这正是毛泽东确立三个世界理论，反对美苏两霸，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在中国近代史上，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一样，以武力相威胁，强令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中，美国实行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出钱、出枪、出军事顾问，援助蒋介石打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死敌。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不得不把美国视为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最大障碍，以至在渡江战役期间命令第二和第三野战军作好抗击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的准备。1950年中国革命刚刚胜利，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妄图把中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朝鲜战争的硝烟未散，美国又在中国的南疆点燃了侵越的战火。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派遣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使中国领土台湾处于被割裂状态。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进行频繁的入侵和军事挑衅，特别是1958年金门炮战打响以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一支拥有六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并配有核武器的特混舰队，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神圣事业。甚至计划使用核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机场和军港进行摧毁性的核攻击。美国的侵华史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反共叫嚣和镇压民族民主革命的种种称霸世界的罪恶历史，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毛泽东把其称为超级大国，列为第一世界，是理所当然的。

苏联与美国不同，它有十月革命的光荣历史。它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榜样，而且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以巨大的援助，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但是，在中苏关系史上，也有沉重的历史遗产和两国近代以来截然相反的国势和境遇。这种历史遗产和不同境遇，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中苏双方相互交往时完全不同的心态，在中苏友好的关系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俄国原是偏于东欧一隅的落后小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俄罗斯一直处于蒙古金帐汗国的征服和统治之下。自沙皇伊凡雷帝执政以后，俄国开始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在短短的300年时间里，俄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空前庞大的军事封建帝国。对外不断侵略扩张，疆土急剧扩大，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与此相伴随，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俄国社会中也急剧膨胀起来，形成了中俄两国在政治传统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冲突。在西方列强中，沙俄是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国，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所受沙俄之祸仅次于日本侵略，直到1921年，苏俄仍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派兵进入外蒙古追剿白军，其后又编造种种借口拒绝撤军，在后来的一系列协定中，苏联都将外蒙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最后在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联会同美国一起，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地位，又一次割占了中国领土。

十月革命后，苏联一直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旧的残余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反而长期在苏联社会中得到宣传和歌颂，使它形成了既支援别国革命，又指手划脚、发

号施令的习惯，在对外政策中，往往带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因此，毛泽东曾经指出：“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指导和援助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曾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也有许多错误的指导和干涉。正是这种错误的指导和干涉，加之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形成了中苏两党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指出的国共合作的战略方针，带有严重的夸大国民党的革命性，贬低共产党的作用以及包办代替和“苏联利益中心”的倾向。此外，共产国际对依仗苏联援助而建立的黄埔军校和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右翼集团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一再妥协退让。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成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及其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所造成的严重弊病，先后导致中共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从拖住日军主力，避免两线作战的现实利益出发，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视为中国抗战的中坚，把对华援助全部交给国民党，并要中共“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斯大林认为，中共“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还是显得太屠弱。”他还尖锐批评中共“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挥得不够”。在1942年5月苏联统帅部紧急呼吁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开赴南满策应苏军作战，而我党鉴于当时形势没有受命的时候，他们批评八路军只限于“打局部的防御战”，指责中共在苏德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却忙于党内整风和清除共产国际的影响，并认为中共领导人不关心苏联命运，也就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

抗战胜利后，面对复杂的中国局势，苏联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实用主义对华政策。为了避免因支持中共而导致苏美冲突，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实际上是让中国革命服从苏美妥协的战略需要。但是，苏联又深恐亲西方的国民党政府向美国“一边倒”，使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渗入中国东北对苏联形成巨大威胁，于是，苏联会同美国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出兵对日作战和承诺不支持中共为条件，换取蒋介石在外蒙和东北的主权上作出让步，以确保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

后来，毛泽东在概括这种矛盾冲突时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苏八届十中全会上谴责赫鲁晓夫反华时回顾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准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见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

这些历史积怨和矛盾冲突，对毛泽东判断现实中的中苏关系不能不产生着重大影响，有些甚至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当 1969 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中国愤怒声讨“老沙皇”和“新沙皇”的领土野心，更强化了这种民族感情。这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成为毛泽东把苏联和美国并列视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的重要因素。

## 第二节 “三个世界”的新理论

当毛泽东在北京同尼克松、田中角荣等一个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握手的时候，当同美、日、德等一个个资产阶级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的时候。他带着实践的重锤，敲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大门。他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进行权衡比较，依次排队，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 一 三个世界理论形成的过程

毛泽东独具特色的三个世界理论，不是他一时的思想灵感，而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当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根据这一观点，毛泽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结成了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战后，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创建了无产阶级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发出反苏的叫嚣，毛泽东以非凡的洞察力揭破了这一叫嚣的实质。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在这里，毛泽东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的进攻。

1956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对此，毛泽东指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7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93 页。

毛泽东在这里关于三种力量的分析，正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先导。

60年代中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前所说，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分崩离析”；另一方面，由于苏联1965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世界形势呈现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即一派大乱景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被这种大乱景象所迷惑，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到世界形势发展的三种基本态势：首先是长期以来被压迫、被奴役的亚非拉地区人民正在觉醒，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次是苏联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特别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日益采取霸权主义，甚至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再次是美国盟友的离心倾向不断发展，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这时，毛泽东不再使用“两个阵营”的概念，他认为，美苏都想统一世界，它们都有力量发动战争，不过也都有困难。根据对战争的态度，他重新解释了“中间地带”的理论，把亚非拉称作第一中间地带，而把西欧和日本称作第二中间地带。两者都不愿意打仗。因此，究竟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一时难以断言。按照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宁可把战争估计得高一些，以防万一。因此，他把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得更大一些。这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萌芽。

70年代后，毛泽东针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压力，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他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判断。认为革命形势的发展超过了爆炸的危险性。1970年元旦社论把这种状况描述成“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整个地球上再也没有一块安定的绿洲了”。毛泽东同年在“五·二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他赋予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更加革命的色彩，中国被宣传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对此，西方出现了世界政治力量“三大角”的议论。尼克松、基辛格对此比较欣赏。但是，毛泽东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1年11月1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时，向世界公开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大会发言时指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

其后，毛泽东在同外宾分析国际政治新格局时，不断地深化了自己的这一观点。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强调，“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他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更加系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1页。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第8页。

转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三个世界”的理论早已有之。但都是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划分的。提出帝国主义为第一世界，社会主义为第二世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第三世界。后来，西方有人提出：“三大角”理论，也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毛泽东既不同意“三大角”的说法，也不同意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理论，而主张以经济为基础的多因素标准划分世界新格局。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他指出：“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则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 二 三个世界理论的结构

纵观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这个理论的基本结构。

第一，提出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宗旨。毛泽东确立三个世界理论，不是解决局部矛盾的权宜之计，而是概括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提出的总的战略原则。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毛泽东立足现实世界，对世界未来的憧憬，也是毛泽东制定世界革命战略、策略原则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阐明了世界的主要倾向。毛泽东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仍然存在，但主要倾向是革命。他认为，美苏已经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敌人，他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但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站在反对美苏两霸斗争的最前列，有效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因此就世界历史的根本趋势来说，已经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怕帝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毛泽东把这种局势概括为“东风压倒西风”。世界既不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也不是以美苏缓和为中心，而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

第三，确定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毛泽东改变传统的以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思路，主张以对待战争与革命的态度来划分世界，而各个国家的态度是以经济发展程度、实力强弱、在国际事务中的状况和国家利益来决定的。面对着亚非拉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美苏两霸为了稳定它们所设立的世界秩序，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它们企图用战争毁灭人类的论调吓唬群众，压制革命。他们宣称：“发展战争技术的最新成果，使所有先进国家的活动家都相信，战争再也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目的的有力工具，原子弹不遵循阶级的原则，因此，什么阶级矛盾，什么正义战争和

非正义战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统都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照赫鲁晓夫的话说，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他们需要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里所说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实质是要求别的国家和人民，服从它们的既得利益，主宰他人的命运。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来说，为了完成独立后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反对美苏两霸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是，它们硬要把战争加给世界人民，世界人民将毫不畏惧，奋起反对。正如毛泽东经常说的，“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战争不能消灭人类，人类一定能够消灭战争。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最终消灭战争。

第四，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在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个宣告，既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光明磊落的国际主义的胸怀，又蕴含了中国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诚然，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中没有论述世界革命的领导地位问题。在对外宣传中，曾多次批示，不要把中国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自我吹嘘”，不要提“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说出，这是所谓‘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如此等等。但是，在毛泽东划分世界的格局中，无论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中国人民，抑或是毛泽东本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和领导力量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认为，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具有社会制度先进与经济发展落后的双重属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革命和发展道路，这不仅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而且带有普遍适用性。中国站在反对两霸侵略威胁的最前列，受害最深因而最革命，中国又是第三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政治上最先进，最有组织和最有力量，因此，在第三世界中必然发挥关键的作用，是世界革命进军中的领导力量。这些，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领导世界革命的宏伟抱负。

### 三 “三个世界”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把国际政治关系中美、苏、中三大政治大国的鼎立，划分成三类政治力量的较量，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说，毛泽东的划分是“放弃了阶级原则”，“鼓吹反动的地理政治学”。我们则认为，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世界范围阶级斗争客观现实的科学概括，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捍卫和发展。

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国家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毛泽东关于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表面上，只涉及到当时世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实质上，它所涉及的正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但是，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必须从国际阶级斗争的整体出发，联系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对个体作出具体的分析。没有一个永不变动的固定的公式。如果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抽象地、孤立地去观察，那么，对国际政治现象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列宁斯大林从来没有认为世界除了两个阵营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方面。世界政治力量不能作其他的划分。列宁 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报告时说：“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斯大林 1924 年在谈到民族问题时也说：“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财政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造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这正是他们对世界上的各种矛盾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由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漫长曲折和充满复杂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中，世界政治力量必然会有不同的组合，世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是怎样，无产阶级关于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和由此而决定的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就应当怎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但同时提出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恩格斯强调，“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他们不但十分重视欧洲民族的独立斗争，而且十分重视中国、印度等国的独立斗争，他们总是用国际无产阶级集体利益的观点，来看具体的民族运动和各种政治力量。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忘记国际阶级斗争，恰恰是为了国际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民族解放斗争看成是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列宁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时也第一次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1916 年，列宁在谈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关系时说：“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

---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 年 8 月 8 日。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33 页。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12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8 页。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54 页。

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明确地把各国政治力量划分为三类，并以此作为决定国际无产阶级战略策略的基本出发点。他 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就是帝国主义大战后世界状况的轮廓。被压迫的殖民地人口十二亿五千万人，其中包括波斯、土耳其、中国这类正在被人活活瓜分的国家，以及那些因战败而沦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的人口，不超过二亿五千万，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陷于依赖美国的地位，战时在军事上也处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后，是居民不到二亿五千万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只有上层分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瓜分世界的利益。……我提醒你们注意全世界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了对第二国际作激烈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在这里，列宁不是把世界政治力量简单地分为两类，相反，他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国家分别划分到三类国家里。一类是享受瓜分世界利益的战胜国，二类是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三类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战败国。他把社会主义俄国放在第三类。

同时，列宁还充分肯定了三类国家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他说：“十二亿五千万人决不会让‘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任意奴役下去，要知道，他们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后来，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必然胜利时仍然强调，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极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放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在这里，列宁不仅对当时国际政治关系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而且似乎看到了当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看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占世界人口 70% 以上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之后，捍卫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原理，并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包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力量，无论这些力量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观点如何，他们为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斗争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斯大林也曾不止一本他讲到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但是在划分不同时期世界政治力量的时候，他所依据的却是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变化的总情况，而不是根据某种超事物的逻辑。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是通过客观地、深入地分析不同时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全局，而不是依靠任何一成不变的公式来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定势。毛泽东把世界政治力量划分为二类，正是运用这种思维定势，长期观察和分析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历史产物，是毛泽东晚年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的一个杰出的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17～318 页。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25 页。

但是，现在有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两级分化，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已经过时了。英国学者梅尔文·韦斯特莱克 1991 年 9 月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发表的《第三世界》一文中断言，“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概念已经消失”。他指出：“它与冷战同生，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共识，然而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发生的某些事件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因为“苏联集团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我们认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虽然是一个历史范畴，但它是在世界上出现霸权主义并进行“冷战”和存在发展中国家并受到国际剥削压迫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因此，只要霸权主义还存在，只要发展中国家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还存在，并继续受到霸权主义和发达国家的压迫和剥削，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就不会过时。

的确，随着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上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关系继续趋向缓和，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霸权主义仍然存在。现在美国利用苏联解体，政治、经济不能与自己匹敌的机会，正踌躇满志，盛气凌人，大有独霸全球之势。它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第三世界继续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并力图控制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由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没有消除，特别是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它除了必然要继续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之外，还必然要残酷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它表面上承认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独立，实际上却通过各种手段，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继续控制这些国家，将其纳入自己的范围。它正是凭借这些手段，成了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独霸全球的斗争，使整个世界动乱不安，对世界人民构成了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又面临着像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这样一些新对手，随着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争夺霸权斗争的激化，第一世界必将有新的构成而继续存在。欧共体作为抵制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威胁，谋求自身政治经济的独立、安全和发展的组织，正在不断地发展，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有效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的第三世界，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们继续受着美国和第二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与此相联系，它们也成了当今世界不容忽视的重大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加强。因此，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好适用。今天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无论在观察分析国际形势，还是在制定对外关系的大政方针时，都必须遵循这一理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断作出贡献。

### 第三节 世界革命的新战略

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总的战略原则。1965 年 9 月，林彪在《红旗》杂志第 10 期上发表了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20 周

年的纪念文章，在谈到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当代的国际意义时，提出了世界革命的基本道路问题。林彪说：“从全世界范围内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将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这段话虽然出自林彪的手笔，但是它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世界革命的心态和战略原则。

毛泽东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两霸斗争中，应当起先锋模范作用，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正确地分析世界革命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全力支持和援助各国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以保证这一斗争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并取得最终胜利。

### 一 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电文中强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这既是毛泽东对亚、非、拉人民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的伟大作用的崇高评价，也是确认世界革命主力军作用的一种预见。

毛泽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和其他地区革命人民站在反帝反殖斗争的最前列，革命武装斗争连续不断，取得了一系列改变战后世界面貌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并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

第一，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已经和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说明世界阶级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哪里有民族统治，哪里就有民族的反抗斗争。但是，在过去的一段很长时间内，这种斗争绝大多数是孤立分散的。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速了历史的革命化进程，占人口70%以上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作为一支有世界规模的反帝队伍投入了世界革命的洪流。无论是斗争的范围和深度，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都极大地超过了以往的水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且不同程度地排除了殖民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和其他坚持反帝反霸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成为第三世界行列中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历史上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世界帝国主义离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的掠夺就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并且将最终摧毁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反抗。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仍然是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坚决支持他们的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亚非拉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反帝反霸的主要力量。这些国家虽然宣布了独立，仍然面临着争取彻底的政治独

立和经济独立的严重任务。大多数帝国主义者尽管在民族解放的怒潮中不得不退出他们的领地。然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必然用各种手段继续保留自己的力量，或者由新的霸权主义国家取代他们的地位。此外，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第三世界大搞经济渗透，利用在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控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单一经济产品，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制品价格，进行经济剥削；在政治方面，它们使用种种手段对新独立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和干涉，肆意侵犯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直至实行武力威胁、武装入侵以至发动侵略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独立，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展开持久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新的民族解放战争必然继续发生，它们之间的这种无法避免的矛盾和斗争，决定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主力军作用的长期性。

第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经过同帝国主义的长期的艰苦斗争，逐步地认识了一条伟大真理，就是弱国能够战胜强国，小国能够战胜大国。毛泽东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在这里，毛泽东既是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巨大鼓舞。现在，就世界历史的根本趋势来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各国的相互支援，包括国际无产阶级在内的各种反侵略力量的相互支援，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第三世界已经独立的国家运用自己的国家权力，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斗争手段和更广泛的斗争场所，在共同斗争中能够逐步加强合作，采取联合行动，第三世界国家把许多主要的国际讲坛变成指控帝国主义的庄严法庭。它们成立了许多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组织，联合起来为保卫共同的权益而斗争。许多国家参加的不结盟运动，对于协调各国利益，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世界性力量。团结战斗的不断加强，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霸斗争规模更大，水平更高，成效更显著。与此相反，相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广大地区来说，帝国主义的力量显得极其有限，而它们的利益又有种种冲突，经常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利用这个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冲破重重阻碍，把反帝反霸斗争推向前进。

## 二 联合第二世界的反霸斗争力量

毛泽东晚年在谈到世界革命、判断世界政治形势时，总是强调要把第二世界国家作为反帝反霸斗争的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说：“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毛泽东认为，在企图发动战争和正在进行革命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存在着有一股中间力量，即第二世界，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重性：既保持着殖民主义的某些特点，又不同程度地受到美苏的控制和威胁。它们虽然要维护旧的殖民制度，但是也倾向于摆脱美苏的控制，维护国家的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它在战争中取得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利用它对原子武器和一系列尖端军事科学技术的垄断，通过建立以美元为中心

的世界性货币体系和它一手控制的包括北美、中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的各种军事集团，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空前未有的霸主地位，使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仰其鼻息。

但是，西欧、日本等国家近 30 年来在政治、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欧、日本等国经过二、三十年的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同时利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政策的严重挫折，已经改变了战后初期那种不得不接受美国支配的处境。西欧共同市场的建立，法国戴高乐奉行的独立政策，西欧各国对美国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所采取的消极和批评态度，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西欧、日本同美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标志着昔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四分五裂。他们虽然与美国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反对控制而要求平等伙伴关系的斗争亦不会中止。

特别是欧洲处于世界争霸的战略重点，苏联曾陈兵于欧洲东部和欧洲南北水域，对西欧处包围态势。这使西欧国家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不得不加强自身的防务，协调相互间的关系，维持和加强从经济上、政治上到防务上的联合。

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等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近年来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英、法、西德、日本等国，尽管仍在使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在新的条件和新的形势下力图保持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但从全面来看，它已经不能再成为控制、压迫第三世界的主要力量。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甚至不得不多少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一些让步政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反霸斗争表示一定的支持、同情或保持中立。

当然，毛泽东也看到：第二世界一些国家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是根深蒂固的，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但是，他们面对霸权主义的干涉、控制和欺负，这是一个更加严重而且将日益严重的现实。毛泽东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论述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时说过，“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毛泽东根据同样的道理，把当时主要敌人美苏两霸同第二世界国家区别对待，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霸斗争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共同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中同第二世界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联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第二世界是在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决不意味着可以抹煞第二世界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决不意味着可以取消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世界只能在斗争中前进，联合只能在斗争中实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种联合和团结，只有在反对卖国主义、绥靖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反动势力进攻进步力量的斗争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和加强。

对于第二世界各国来说，面临霸权主义日益严重的战略威胁，它们有必要加强自身之间，同第三世界之间，同可能的同盟者之间的联合，以便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前进。为了保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联合斗争是唯

一 正确的道路。

### 三 中国的历史责任

如前所说，毛泽东在确立三个世界的理论时，就不言而喻地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位，把领导世界革命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在这里，我们不想论及在世界革命进程中，中国所处中心地位和领导责任的可能性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此并不是要求分享什么特权，谋取什么私利，而是要求中国人民在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

第一，要把战争的危險告诉各国人民。毛泽东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产生的，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1974年2月他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谈话时指出：“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看呢，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战争；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战争既然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为了消灭世界战争，只有实行推翻帝国主义制度的革命。这种革命现在尚未发生，我们就没有理由放松对世界战争的警惕。当然，有时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帝国主义之间也会达成某种协议，但只是他们备战的一种补充。毛泽东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

而这种争夺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对此，各国人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加紧反霸，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准备战争，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但是，只要我们积极开展反霸斗争，就会打乱他们准备发动战争的时间表乃至制约侵略战争。现代战争，不单是一个孤立的军事问题，它与内政、财政、经济、对外关系等因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战争准备，必然不断地加重压迫剥削人民，加剧它们各自经济上的矛盾，加剧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它们与被侵略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它们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犹如“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因此，我们要和世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站在反霸斗争的最前列，与霸权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争部署，制约战争的爆发。

第三，积极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制约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邓小平曾经指出：“制约战争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

---

转引自《红旗》1977年第11期第20页。

转引自《红旗》1977年第11期第20页。

的独立、发展每增加一分，制约战争的力量就增加一分”。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他们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做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

## 后 记

本书是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分别确立的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的重点科研课题。

我们承担这一课题，除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确实令人深深敬仰外，主要是想正确地承继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曾说过，人无完人。毛泽东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在毛泽东的光辉灿烂的人生旅途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苦痛。由于毛泽东处于历史巨人的地位，他的成功令人折服，为世人所望尘莫及；同样，他的失误所造成的影响也为世人所不及。巨大的成功和严重的失误，构成了毛泽东的完整一生。我们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既为毛泽东的巨大成功而欢呼，而惊喜，而叹服，也为毛泽东的严重失误而惋惜，而痛苦。但历史毕竟塑造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毛泽东。我们只有从历史条件出发，总结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才能正确地继承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切。如果脱离历史条件去苛求毛泽东，或者不顾历史条件而盲目地崇拜毛泽东，都无益于我们继承毛泽东的事业，无益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构思本书的初衷。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参加本书写作的有成晓军（第一至第四章）、唐正芒（第五至第八章）、李佑新（第九至第十五章）、李晖（第十六至第十九章）、范贤超（第二十至第二十六章）。全书由范贤超、李佑新、李晖负责修改、统稿、定稿工作。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湖南出版社的热情支持；本书还得到了湖南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教委科研处、湘潭大学科研处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还借鉴和吸收了理论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毛泽东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尽管国内有关的研究著作很多，但我们并不认为研究毛泽东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力求从历史条件出发研究毛泽东，写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也仍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我们不敢奢求完成这一课题的全部任务，而只求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或者说是交出一张初步的答卷。书中错误或谬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作 者  
1993年1月

